



联 合 国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 第二卷

第一〇三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4 日)

第一〇四届会议  
(2012 年 3 月 12 日至 30 日)

大 会

正式记录  
第六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 40 号(A/67/40)



大 会  
正式记录  
第六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 40 号(A/67/40)

##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 第二卷

第一〇三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4 日)

第一〇四届会议  
(2012 年 3 月 12 日至 30 日)



联合国·纽约, 2012 年





### 说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 目录

段次 页次

## 第一卷

- 一. 权限和活动
  -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两项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 B. 委员会的届会
  -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 D. 特别报告员
  - E. 工作组和国别报告组
  - F. 有关的联合国人权活动
  - G. 根据《公约》第四条实行的克减
  - H. 与缔约国的会晤
  - I. 根据《公约》第四十条第4款发表的一般性意见
  - J. 人力资源和正式文件翻译
  - K. 委员会工作的宣传
  - L. 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出版物
  - M. 委员会今后的会议
  - N. 通过报告
- 二. 《公约》第四十条规定的委员会工作方法和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 A. 程序方面的最新动态和决定
  - B. 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
  - C. 《意见》的后续行动
  - D. 与其他人权条约和条约机构的联系
  - E.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 三. 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四十条提交报告的情况
  - A. 2011年8月至2012年3月提交秘书长的报告
  - B. 逾期未交的报告和缔约国未履行第四十条义务的情况
  - C. 报告所涉期间审查缔约国报告的周期

四. 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四十条提交的报告和在无报告情况下根据议事规则第 70 条审议缔约国的情况

牙买加

科威特

挪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危地马拉

土库曼斯坦

也门

马拉维

佛得角

五. 根据《任择议定书》审议来文

A. 工作进展情况

B.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处理的案件量

C. 根据《任择议定书》审议来文的方法

D. 个人意见

E. 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F. 委员会《意见》中要求采取的补救措施

六. 根据《任择议定书》对个人来文采取的后续行动

A. 自上次年度报告以来收到的全部后续落实情况资料

B. 《意见》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与缔约国代表的会晤

C. 其他资料

七. 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

A. 委员会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后续行动报告

B. 委员会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后续行动报告

附件

- 一. 截至 2012 年 3 月 30 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两项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以及依照《公约》第四十一条发表声明的国家

-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
- B. 《任择议定书》缔约国
- C. 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缔约国
- D. 依照《公约》第四十一条发表声明的国家
- 二. 2011 年至 2012 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 A. 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
  - B. 主席团成员
- 三. 缔约国按照《公约》第四十条提交报告和补充资料的情况 (截至 2012 年 3 月 30 日)
- 四. 委员会在报告所涉期间审议的报告和情况以及委员会尚待审议的报告
  - A. 初次报告
  - B. 第二次定期报告
  - C. 第三次定期报告
  - D. 第四次定期报告
  - E. 第五次定期报告
  - F. 第六次定期报告
  - G. 第七次定期报告
- 五. 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列表
- 六.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请大会批准 2013 年和 2014 年追加临时资源的决定
- 七. 委员会决定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 八. 人权事务委员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 第二卷

- 九.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的《意见》 ..... 1
  - A. 第 1316/2004 号来文, Gryb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1
  - B. 第 1547/2007 号来文, Torobekov 诉吉尔吉斯斯坦 (2011 年 10 月 27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10
  - C. 第 1563/2007 号来文, Jünglingová 诉捷克共和国 (2011 年 10 月 24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0

D.	第 1637/2008 号来文, Canessa 诉乌拉圭 第 1757/2008 号来文, Barindelli Bassini 等人诉乌拉圭 第 1765/2008 号来文, Torres Rodríguez 诉乌拉圭 (2011 年 10 月 24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5
E.	第 1641/2007 号来文, Calderón Bruges 诉哥伦比亚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33
F.	第 1750/2008 号来文, Sudalenko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41
G.	第 1755/2008 号来文, El Hagog Jumaa 诉利比亚 (2012 年 3 月 19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49 62
H.	第 1759/2008 号来文, Traoré 诉科特迪瓦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64 76
I.	第 1772/2008 号来文, Belyazeka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77
J.	第 1781/2008 号来文, Berzig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86 100
K.	第 1782/2008 号来文, Aboufaied 诉利比亚 (2012 年 3 月 21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104 118
L.	第 1801/2008 号来文, G.K. 诉荷兰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126
M.	第 1811/2008 号来文, Djebbar 和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144 161
N.	第 1815/2008 号来文, Adonis 诉菲律宾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165 173
O.	第 1820/2008 号来文, Krasovskaya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附录.....	176 184

P.	第 1828/2008 号来文, Olmedo 诉巴拉圭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186
Q.	第 1829/2008 号来文, Benítez Gamarra 诉巴拉圭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195
R.	第 1833/2008 号来文, X. 诉瑞典 (2011 年 11 月 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04
	附录.....	217
S.	第 1838/2008 号来文, Tulzhenskova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18
	附录.....	224
T.	第 1847/2008 号来文, Klain 诉捷克共和国 (2011 年 11 月 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27
	附录.....	233
U.	第 1853/2008 号来文, Atasoy 诉土耳其 第 1854/2008 号来文, Sarkut 诉土耳其 (2012 年 3 月 29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34
	附录.....	245
V.	第 1859/2009 号来文, Kamoyo 诉赞比亚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53
W.	第 1862/2009 号来文, Pathmini Peiris 诉斯里兰卡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57
X.	第 1866/2009 号来文, Chebotareva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66
Y.	第 1880/2009 号来文, Nenova 等人诉利比亚 (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73
Z.	第 1883/2009 号来文, Orazova 诉土库曼斯坦 (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85
AA.	第 1905/2009 号来文, Khirani 诉阿尔及利亚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92
	附录.....	305
BB.	第 1914/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 第 1915/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 第 1916/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 (2012 年 3 月 21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308

附录 .....	318
CC. 第 2024/2011 号来文, Israil 诉哈萨克斯坦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	319
十.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宣布 来文不予受理的决定 .....	326
A. 第 1606/2007 号来文, A.I.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26
B. 第 1627/2007 号来文, V.P.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32
C. 第 1634/2007 号来文, Korneenko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44
D. 第 1749/2008 号来文, V.S.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48
E. 第 1752/2008 号来文, J.S. 诉新西兰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54
F. 第 1789/2008 号来文, G.E. 诉德国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63
附录 .....	368
G. 第 1800/2008 号来文, R.A.D.B. 诉哥伦比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72
H. 第 1802/2008 号来文, L.O.P. 诉西班牙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79
I. 第 1816/2008 号来文, K.A.L. 和 A.A.M.L. 诉加拿大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85
J. 第 1819/2008 号来文, A.A. 诉加拿大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394
K. 第 1850/2008 号来文, S.L. 诉捷克共和国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402
L. 第 1858/2009 号来文, Y.M.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406
M. 第 2058/2011 号来文, O.D.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	414
十一. 根据《任择议定书》采取的后续行动 .....	416



## 附件九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的《意见》

A. 第1316/2004号来文，Gryb诉白俄罗斯  
(2011年10月26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Mecheslav Gryb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4年7月9日(首次提交)
事由:	部长拒绝签发律师从业执照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的程度
实质性问题:	不公正审判; 基于政治理由的歧视/迫害
《公约》条款:	第二条; 第十四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2011年10月26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Mecheslav Gryb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1316/2004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Mecheslav Gryb 先生是白俄罗斯国民，1938 年生，他称他是白俄罗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的受害人。虽然提交人在首次来文中没有援引第二十一条，但在以后的来文提出了似乎可援引《公约》第二十一条处理的问题。他没有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白俄罗斯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一位政治家，曾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主席(1994-1996 年)。1997 年以来，他一直是明斯克律师协会的会员。根据 1997 年 5 月 3 日关于改善白俄罗斯律师和公证员活动的若干措施的第 12 号总统令，提交人的律师执照被吊销。<sup>1</sup>但他可以重新参加司法部的律师从业资格委员会(下称“委员会”)的考试。他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参加考试并通过。

2.2 提交人称，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表现出偏见的态度，所以考试是不公正的。他认为，这是因为他是反对党领袖，公开批评过现任政权。他还说，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部长(下称“部长”)在考试后，拒绝发给他律师执照。提交人后来于 1997 年 7 月 7 日得知(不是被告知)，是部长下令推迟发给他执照的。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发现提交人因 1997 年 3 月 15 日参加未经批准的街头集会，纪念 1994 年《白俄罗斯宪法》通过三周年，而于 1997 年 3 月被法庭罚款。<sup>2</sup>

2.3 1997 年 7 月 30 日，部长表示永久不发给提交人律师执照，据称理由是后者违反了现行立法和职业操守。这一决定是根据《资格委员会条例》(下称《条例》)作出的。

2.4 关于这一点，提交人说，当他再次参加考试时，司法部长无权推迟或拒绝向那些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发放执照。《条例》是司法部 1997 年 6 月 4 日通过的。1997 年 7 月 29 日，同一部长修改了这些条例，获取了不签发执照的权力；部长利用这一权力对提交人案件追溯适用新规定。因此，提交人认为，部长的拒绝是非法的，对他的案件追溯适用经修订的《条例》严重影响了他的境况。<sup>3</sup>

2.5 提交人称，部长的拒绝也违反了《律师法》(1993)第 10 条。该条明确列出了不应发给执照的所有情况。据他介绍，犯有行政过失不应导致拒绝发给他律师

<sup>1</sup> 由于法律的变化，在通过资格考试时属于公务员的所有人的律师执照都被注销。提交人在通过律师考试时，是国家官员，相当于公务员。

<sup>2</sup> 事实上，提交人因于 1997 年 3 月 15 日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而被明斯克 Partizansky 区法院 1997 年 3 月 20 日处以罚款，明斯克市级法院 1997 年 5 月 21 日判定维持原决定。

<sup>3</sup> 提交人指出，根据《法律规范法》第 67 条，法律的适应如果对有关人员的法律情况产生不利影响，则不得溯及既往。此外，《白俄罗斯宪法》(1996)第 104 条第 6 款规定，法律除在适用上限制或取消公民责任的情况外，否则不能具追溯效力。

执照。此外，提交人还称，1997 年 3 月他仍享有议员豁免权。只有经议会的具体默许，才能起诉国会议员。然而，在他的案件中，总检察长涉嫌滥用自己的权力，1997 年 3 月 17 日发出书面指示不与议会协商就追究提交人的行政责任。提交人补充说，为此他向一家法院投诉，但被驳回(没有提供确切日期)。

2.6 提交人向明斯克莫斯科区级法院投诉 1997 年 7 月 30 日部长拒发执照，但投诉于 1997 年 8 月 18 日被驳回。他又上诉于明斯克市级法院、明斯克市级法院院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上诉分别于 1997 年 9 月 5 日、12 月 24 日和 1998 年 3 月 18 日被驳回。

2.7 提交人称，对 1997 年 7 月 29 日《条例》的修改是非法的，旨在允许对反对现任政权的律师进行处罚。据他说，诉讼结果也证实了提交人的怀疑：该案件的结果是事先决定的。他还说，在白俄罗斯，法官是不独立的。

2.8 2004 年 8 月 17 日，提交人重申，部长的决定是注定了的，并证明了对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发表政治观点和恪守民主价值观的歧视。1996 年，他获得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前主席的养恤金，相当于在任最高委员会主席薪金的 75%。然而，这一数额从未更新过，2004 年为每月 3,600 白俄罗斯卢布(1.5 美元)。其他反对现政权的最高委员会前主席也处于与提交人同样的境况。与此同时，白俄罗斯总统则下令给予支持其政策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或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几位前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个人养恤金，相当于白俄罗斯总理实际工资的 75%。

2.9 提交人说——虽然没有提供细节，自 1998 年以来，他和妻子已经不享有特殊医疗保健待遇，他向总统办公室投诉，但迄今未获答复。

2.10 此外，提交人仍无法从事律师工作。1998 年，他开始在一所私立法学院担任讲师。然而，当局获悉后，就要求该学院院长立即解雇他。

2.11 提交人认为，他已不可能得到新的律师执照，因为资格委员会是总统代表、司法部官员或律师们组成的，主席是司法部副部长。1997 年以来，他的境况没有好转。

##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他根据第十四条享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遭到侵犯，因为他的案件并未经过主管的或独立的或公正的法院的审理，特别是白俄罗斯的法官依赖于司法部，主管他案件的是司法部。

3.2 提交称他在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之下的权利遭到侵犯，由于他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他因政治见解而受到迫害。出于这个原因，司法部长非法决定，不发给他律师执照。提交人还声称，他无法找到工作，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作为最高苏维埃前主席的特殊养老金，他已经失去了特殊医疗保健待遇。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4 年 12 月 17 日, 缔约国解释说, 根据《律师法》第 11 条, 资格委员会有权决定谁有权从事律师职业。1996 年 2 月 29 日, 委员会对当时仍是议会议员的提交人进行考试。根据委员会的决定, 司法部于 1996 年 5 月 27 日向提交人发放了第 1238 号律师执照。

4.2 缔约国说, 后来知道, 提交人参加考试时具有公务员地位(国家雇员)。按照当时有效的(新)法律, 提交人的律师执照被注销。这同样适用于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所有公务员。然而, 由于提交人已不再是公务员, 他获准重新参加考试。为此, 他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再次参加考试, 委员会认为他可以获发律师执照。委员会没有透露为了《律师法》第 10 条的目的为什么拒绝向提交人发放律师从业执照。

4.3 缔约国指出, 根据《资格委员会条例》(1997 年 6 月 4 日第 1902/12 号)第 32 条, 当发现委员会的决定与案件事实不符, 违反现行法律, 背离律师职业道德操守, 或存在其他资料证明有关个人无能力行使律师职业时, 司法部长有权推迟发放或注销律师执照。

4.4 司法部长在 1997 年 7 月 7 日第 75 号指令中推迟向提交人发放律师执照, 在 1997 年 7 月 30 日第 91 号指令中拒绝向提交人发放执照。第一个指令是基于对提交人行政过失情况的核查结果。第二个指令是因为提交人违反了现行立法和律师职业操守。他于 1997 年 3 月 15 日参加了非法集会, 1997 年 3 月 20 日被明斯克 Partisansky 区法院处以罚款。

4.5 缔约国解释说, 提交人的行政过失构成不当行为, 不符合律师的职业操守, 违背《律师法》第 18 条第 2 款的要求, 也背离了律师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和不断保持最高专业标准的律师道德准则。

4.6 鉴于资格委员会在判定提交人案件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 司法部长有权推迟或拒绝向提交人签发律师执照。提交人关于司法部不应考虑到罚款问题的说法有悖现行法律。

4.7 缔约国认为, 提交人关于司法部长无权修改委员会《条例》和无权决定推迟或拒绝签发律师执照的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司法部长有权这样做, 特别是根据 1997 年 5 月 3 日关于改善律师和公证员活动的若干措施的第 12 号法令这样做。

4.8 缔约国指出, 提交人要求法院宣布部长的指令是非法的, 并责成司法部向他发放律师执照。1997 年 8 月 18 日, 明斯克莫斯科区法院驳回了他的要求。1997 年 9 月 25 日, 明斯克市级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状。缔约国说, 这些法院的判决是合法的和有充分根据的。这些法院了解到, 明斯克 Partizansky 区法院 1997 年 3 月对提交人处以罚款。鉴此, 它们认定部长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发布指令是合法的, 因为提交人违反了现行法律。

4.9 缔约国还说，最高法院还根据监管审查程序审查了提交人的投诉，并审查了下级法院的决定是否合法和有充分根据。最高法院认为没有理由质疑这些决定。

4.10 缔约国指出，目前提交人可以请司法部要求资格委员会组织一次新的法律考试。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5 年 1 月 21 日，提交人说，缔约国提供的资料大多不符合现实。他 1996 年初获发律师执照。当时，他是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拥有法律学位和“白俄罗斯共和国荣誉律师”称号。1996 年 11 月，最高委员会被解散，提交人已不再是国会议员。

5.2 1997 年 1 月，他开始在明斯克市律师协会从业担任律师。1997 年 5 月 3 日，白俄罗斯总统颁布政令，禁止公务员持有律师执照，向公务员发放的所有执照均注销。在政令颁布时不再是公务员的，可以重新参加资格考试。据提交人说，该法令具追溯效力，侵犯了那些在此命令颁布前就已获得律师执照者的权利。该政令还涉嫌违反《宪法》第 104 条，根据该条款，法律除了在上应用上无限制或不取消公民责任的情况外，不具追溯效力。

5.3 提交人重申，司法部长无权拒绝向已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发放执照。提交人称，部长是在 1997 年 7 月 29 日对《资格委员会条例》修改后获得这一权利的。根据提交人，这一权利与白俄罗斯《宪法》相矛盾，也违反《法律规范法》第 67 条，根据该条，法律规范不得追溯适用。提交人重申，不发给他律师执照，是因他的反对派行动而公开迫害他的有预谋行为。

5.4 提交人还声称，仅参与一次集会(批准或未经批准的)不应导致禁止他从事律师职业。缔约国在答复中只重复了对他的“捏造的指控”。

### 各当事方的补充意见

6.1 2005 年 11 月 15 日，缔约国重申，1997 年提交人的律师执照被吊销是因为改革。对同样情况下的所有律师都是这样做的。他通过了新的考试，不久之后，又发现他 1997 年 3 月被法院罚过款，所以这个决定才生效。

6.2 根据《资格委员会条例》(1997 年 6 月 4 日)，司法部长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签发律师执照。犯有行政过失，是不符合律师的职业操守的。提交人在活动中违反了《律师法》第 18 条第 2 款；根据《资格委员会条例》第 32 条，司法部长拒绝为他签发律师执照是对的。法院确认了部长的拒绝。根据《律师法》第 24 条，个人犯了不符合律师职业操守的过失，是不能当律师的。因此，没有任何问题显示，在本案中，司法部存在着偏见。此外，提交人可以重新参加考试。

7.1 2007 年 8 月 29 日，提交人再次反驳了缔约国的看法。他说，1996 年 11 月，白俄罗斯议会被非法解散，他失去了国会议员地位。提交人声称，1997 年 3

月 15 日的集会得到了明斯克市议会的批准。他被罚款，是因为在参加者很多的情况下，他只在街上走了几步，试图到人群周围转转。据他说，对他罚款，当局侵犯了他的和平集会权。后一事实也似乎在第二十一条之下引起问题，尽管提交人没有明确援引该条规定。当局是在任意适用法律，据提交人称他受到的罚款数额特别高，是当时最高的，这也证实了这一点。

7.2 提交人重申，部长拒绝发给他执照的后果是他无法工作，自 1998 年以来一直依靠作为前内务部成员的退休金生活。担任过前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终身养老金没有支付给他的，说明他因政治原因而受到迫害。

8.1 2008 年 5 月 2 日，缔约国解释说，白俄罗斯总检察院于 2005 年审查了明斯克莫斯科区法院 1997 年 8 月 18 日对提交人投诉司法部长案判决的合法性。法院驳回提交人的投诉，明斯克市级法院 1997 年 9 月 25 日维持原判。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诉又被最高法院副主席驳回。

8.2 缔约国重申，司法部长有权推迟或拒绝签发律师执照。1997 年 7 月 7 日，部长推迟向提交人签发律师执照，以核实提交人行政过失的情节。7 月 30 日，部长拒绝向提交人签发律师执照，是因为提交人 1997 年参加过集会并被法院罚款，法院认为部长是在其权限内行事，他下达的指令是合法的，有充分根据的。

####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9.1 委员会在 2009 年 3 月 30 日第九十五届会议上审查了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它注意到，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和(丑)项的要求，同一事项未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不可质疑的是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

9.2 它还注意到，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因为他的案件没有经过主管的或公正或独立的法院审查。他还称——尽管没有详细说明，审理其案件的法官对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没有答复。他最终认为，白俄罗斯的法官不是独立的，因为他们隶属于司法部。缔约国在答复中说，法院对提交人案件的所有判决都是合法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主要与事实和证据的评价有关；它回顾说，一般而言是由缔约国法院评估某一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除非它可以确定评估显然是武断的或有失公允。<sup>4</sup> 委员会决定，来文的这一部分因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9.3 同样，由于缺少其他相关证据或解释，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笼统地说缔约国的司法机构缺少独立性，是证据不足，为了受理的目的，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9.4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受到歧视，因为他被剥夺了特殊医疗保健待遇，他就此写的信件也未得到答复。他作为最高理事会前主席的养老金未从提高或支

<sup>4</sup> 另见第 541/1993 号来文，Simms 诉牙买加，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

付给他，而忠实于现政权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其他最高苏维埃前主席——与他的情况完全相同，则根据总统令领到了个人生活养恤金。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具体评论这些指控；在没有任何其他相关资料或解释的情况下，从卷宗的文件无法证实这些指控是否向缔约国主管机关和法院提出过。因此，委员会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9.5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可以肯定的是，提交人的律师执照没有发给他，因为他 1997 年 3 月参加了未经批准的街头集会，在白俄罗斯属于行政过失，违反了现行法律。提交人称，因他的政治见解，司法部长为了惩罚他，任意地利用这一事实，由此违反了《公约》第二条。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提交人没有明确地说明，但他的申诉在第二十一条下引起问题(见第 7.1 段)。鉴于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所保护的行为有密切关联，委员会认为，来文也可能在《公约》第十九条之下引起问题。所以，委员会决定，应审查因行政处罚而拒绝发放执照是否侵犯了提交人根据这些条款享有的权利。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提出的指控为了可否受理的目标已具备充分证据。因此，它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在《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本身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之下引起问题，可予受理。

###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10.1 缔约国在 2009 年 3 月 24 日的普通照会<sup>5</sup>上提交了补充信息。它回顾其先前的意见，并补充说，提交人认为司法部在发放律师执照问题上不应该考虑他参加过未经允许的集会，这与现行法律，特别是与《律师法》第 24 条是矛盾的。缔约国说，如果律师犯有行政过失，那么他/她就从事了与律师活动不符的行为，因此不可能向他发放从业执照。因此，不能认为司法部在该案件中行事抱有偏见。

10.2 在白俄罗斯，律师执照五年换发一次。因此，提交人现在可以请求司法部组织律师资格考试。

10.3 缔约国还说，1997 年 8 月 18 日，明斯克莫斯科地方法院驳回了提交人投诉司法部长拒绝发放律师从业执照问题。明斯克市级法院 1997 年 9 月 25 日驳回上诉，维持原状。1998 年 3 月，提交人根据监管审查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的上诉被最高法院副院长驳回。提交人没有再向其他有权决定是否请求对一项民事案件进行监管审查的官员提出上诉，因此本案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 提交人的评论

11.1 提交人 2011 年 6 月 3 日作出评论。他首先指出，缔约国没有对委员会的可否受理决定发表意见，也没有说明他根据《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遭受侵犯，更没有解释限制他依据这些条款享有的权利的理由。

<sup>5</sup> 缔约国的函文是在委员会通过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后收到的。

11.2 关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问题，提交人回忆说，他已要求最高法院根据监管程序审查他的案件，但没有成功。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39 条，监管审查可由最高法院主席(或他/她的副手)和明斯克地区或市级法院院长或其副手启动。

11.3 他还指出，他是因参加纪念白俄罗斯新宪法的未经批准的集会而被罚款的。他不是以律师的身份参加集会，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参加的集会。对他罚款，不是按照法律规定，而是根据总统令作出的，因而违反了《公约》第二十一条。

11.4 提交人还指出，根据《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与其他公民一样，律师也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特别是，他们应有权参加有关法律、司法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等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有权加入或筹组地方的、全国的或国际性的组织和出席这些组织的会议而不致由于他们的合法行为或成为某一合法组织的成员而受到专业的限制。律师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应始终遵照法律和公认准则以及按照律师的职业道德行事。”尽管有此规定，提交人还是因参加集会而被罚款，并由此被拒发从业执照，尽管他通过了资格考试。

11.5 提交人最后指出，司法部在 1997 年 7 月 30 日拒绝发给他律师执照前，从来没有因为律师参加过和平集会而不发给执照的情况。据他说，该部 1997 年 7 月 30 日后，就不这样做了。提交人说，这表明，因为他从事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并对现任政权进行批评，当局把他当成了目标，对他进行歧视性对待。

#### 缔约国的补充说明

12.1 缔约国在 2011 年 8 月 10 日的普通照会中作出了补充说明。它回顾了该案件的事实，并补充说，1997 年 2 月，提交人请求在白俄罗斯最高法院的监管审查程序下进行审查。最高法院副院长裁定驳回他的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39 条第 1 款，最高法院院长或他/她的代表或总检察长或他/她的代表可以下令进行这样的审查。缔约国还说，《民事诉讼法》并不妨碍提交人再次向同司法监管机构再次提出上诉。因此，根据缔约国，提交人没有用尽现有的国内补救办法。

12.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还没有正式寻求审查委员会 2009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本案的可否受理决定。

#### 审议案情

13.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参照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3.2 提交人声称，在参加纪念白俄罗斯 1994《宪法》通过一周年和平集会后，他被罚款，也被拒发律师执照，即使他通过了资格考试。他声称，他受到了基于政治理由的歧视，因为他属于批评现任政权的反对派运动，处于这种情况的其他律师则没有被拒发律师执照。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在《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之下引起问题。缔约国没有按照《公



约》的规定，具体地处理这些申诉，只是解释，提交人被拒发从业执照，是因为他参加了未经批准的集会，违反了总统的指令，犯有行政责任，不符合《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操守。

13.3 委员会回顾，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而且也是每个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基石。<sup>6</sup> 它还指出，《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受到限制。根据第十九条第 3 款，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同样，《公约》第二十一条第 2 句也要求，对和平集会权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施加的限制。

13.4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只是解释，根据《行政处罚法》对提交人的罚款是合法的，因为行政过失，按照《律师法》没有发给他从业执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说明不发给提交人律师执照，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和/或第二十一条第 2 句，是合理和必要的。在本案中，在没有任何其他卷宗资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遭受侵犯。

13.5 鉴于以上结论，委员会决定不再另行审议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和相关联的第二条提出的申诉。

14.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

15.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规定，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包括向提交人重新发放律师执照和提供补偿，包括适当的赔偿。缔约国还应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侵权情况。

16.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翻译成白俄罗斯文，以缔约国两种正式语文广泛分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6</sup> 见关于第十九条第 2 款的第 34(2011)号一般性意见。

B. 第 1547/2007 号来文，Torobekov 诉吉尔吉斯斯坦  
(2011 年 10 月 27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Munarbek Torobekov (由律师 Nurbek Toktakunov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吉尔吉斯斯坦
来文日期:	2006 年 4 月 12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未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提交法官审讯；庭审程序违反公正审判保障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任意逮捕和拘留；尽快接受法官审理的权利；在独立和公正法庭上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无罪推定的权利；为准备辩护获得足够时间和设施的权利；在不无故拖延情况下受审的权利；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获得证人出庭和询问的权利；任意闯入他人家庭
《公约》条款:	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乙)、(丙)、(丁)、(戊)项；以及第十七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547/2007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Munarbek Torobekov 是吉尔吉斯斯坦国民，1966 年生。提交人称，吉尔吉斯斯坦侵犯了他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乙)、(丙)、(丁)、(戊)项，以及第十七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95 年 1 月 7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 Nurbek Toktakunov 代理。

##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称，2003 年 4 月 25 日上午，内务部 Pervomaysky 地区警察局(地区警察局)刑事侦探股的几名警察在 Zh.O.先生的带领下，进入他在比什凯克的公寓。情形似乎是这样，提交人刚一打开房门，一名警察就向他询问有关一台电视机的事情，提交人立刻指了一下屋门旁边内装电视机的纸箱。虽然提交人试图阻止警察进屋，但 Zh.O.先生出示了他的警员证，并警告提交人说，如果提交人反抗，警察会对他使用武力。提交人要求查看搜查证，但 Zh.O.先生说没有必要提供搜查证。Zh.O.先生没收了电视机，并填写了证明查获电视机的报告。虽然提交人要求将电视机的序列号记入报告，但 Zh.O.先生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向提交人提供报告的拷贝。<sup>1</sup>

2.2 同一天，提交人及其女友和一名朋友 T.B.先生被带到地区警察局审问。地区警察局调查员 T.I.女士随后根据《刑法》第 167 条第 3 部分(抢劫)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提交人和 T.B.先生被逮捕，并作为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受到审讯。提交人在证词中说，那台电视机是 A.R.先生因为殴打提交人女友，作为补偿送给提交人的，因为提交人的女友需要治疗费。提交人称，在审讯之前，他们没有被告知嫌疑人的权利。然而，2003 年 4 月 25 日载有提交人签名的逮捕报告声明，提交人已了解该报告，已向其告知其在《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之下的权利和义务。

2.3 同一天早些时候，A.R.先生及其母亲 T.R.女士作为受害者接受了调查员的审问，他们在证词中说，提交人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凌晨 3 时左右抢走了他们的电视。但是，他们拒绝为了证明其指称接受法医检查。提交人称，审讯报告没有包括该案所涉电视机及其序列号的描述。调查员于同一天命令 A.R.先生和 T.R.女士接受法医检查，但没有向提交人和 T.B.先生告知相关命令。当提交人私人雇佣、同时为 T.B.先生代理的律师到达地区警察局时，调查员以其工作过多为托词，定于第二天，即 2003 年 4 月 26 日进行审讯，但此前她已经在其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提交人和 T.B.先生进行了审问。

<sup>1</sup> 2003 年 4 月 25 日关于查获电视机的报告中有提交人的签字。

2.4 2003 年 4 月 26 日, 调查员声称, 因为嫌疑人没有从临时看守所(IVS)送来, 所以将审讯时间推迟到 2003 年 4 月 28 日。<sup>2</sup> 同一天, 提交人的律师试图在临时看守所与其客户会面, 但被拒绝进入看守所, 理由是“关于拘留涉嫌和被指控犯罪者的程序和条件”的法律第 17 条, 根据该条规定, 监禁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导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见到检察官或调查员提供的书面许可的情况下, 才可允许涉嫌和被控犯罪者与律师会面。提交人称, 他的律师无法获得这一许可, 因为地区警察局登记处周六不办公, 而该许可必须加盖登记处公章才被视为正式文件。

2.5 2003 年 4 月 28 日, 提交人的律师因病住院。他向负责该案的调查员告知自己住院一事, 并请调查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6 条的要求, 为他的当事人另外指派一名律师。同一天, 调查员将电视机归还 T.R.先生, 但没有在重要证据检查报告中登记电视机的序列号。同一天早些时候, 提交人和 T.B.先生被指控预谋抢劫、在抢劫时使用非致命武力或威胁, 以及闯入他人居所。随后, 提交人和 T.B.先生作为被告, 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调查员审讯。Pervomaysky 地区公诉人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批准对两人进行羁押。Pervomaysky 地区公诉人的决定显示, 对提交人进行羁押是必要的, 因为他有前科, 如果将其释放, 他有可能潜逃。

2.6 2003 年 5 月 4 日, 即上述事件发生 9 天后、命令进行法医检查 8 天后, A.R.先生和 T.R.女士接受了一名医学专家的检查。2003 年 5 月 13 日, 调查员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让提交人和 T.R.女士当面对质。2003 年 5 月 19 日, 医学专家得出结论说, A.R.先生和他的母亲身上有瘀伤和抓痕等轻微伤痕。提交人称, 没有人向他及他的同案被告告知法医检查的结论。

2.7 2003 年 5 月 28 日, 提交人的律师(已出院)向调查员提出投诉说, 还没有为他的当事人委派另一名律师。2003 年 5 月 28 日, 负责该案的调查员 T.I.女士辞职, 2003 年 6 月 11 日, 该案转交另一名调查员负责。2003 年 6 月 18 日, 提交人的律师请求新的调查员 M.N.先生在他在场的情况下审问其当事人, 并要求 A.R.先生与他的当事人当面对质。调查员于 2003 年 6 月 21 日拒绝提交人的律师关于当面对质的请求, 理由据称是他无法确定受害者的下落。

2.8 调查员 2003 年 6 月 21 日的决定显示, 提交人的律师没有出席定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对他的当事人进行的审讯, 但他没有向调查员和 T.I.女士告知他缺席的原因。由于没有后备代理律师, 调查员无法为提交人和 T.B.先生指派新的律师。在未指明日期的某一天, 新调查员 M.N.先生询问了之前的调查员 T.I.女士, T.I.女士说, 2003 年 4 月 25 日, 提交人和 T.B.先生的律师指示他的当事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作证, 并告诉他们他可以早些时候签署审讯报告。2003 年 4 月 28 日下午 4 时左右, 该律师给调查员打电话, 通知调查员说他因住院而无法为他的当事人代理, 但他将派另一名律师代替他。但替补律师并未出现, 也没有找到后备

<sup>2</sup> 临时看守所是监禁涉嫌犯罪但尚未被定罪的个人机构。

代理律师。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员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开展调查行动。

2.9 2003 年 6 月 21 日，提交人及其同案被告在其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了新调查员的审讯，并被告知对 A.R.先生和他的母亲进行法医检查的结论。

2.10 调查于 2003 年 6 月 24 日结束。提交人的律师在审查了刑事案件卷宗的内容后，要求调查员结束这一刑事案件调查，因为电视机是警察在没有搜查提交人公寓的许可的情况下非法查扣的，因此，该重要证据不具备证据价值。他还认为，法医检查的结论也不具备任何证据价值，因为该检查违反了程序性要求。此外，医学检查于 2003 年 5 月 19 日就已得出结论，但他的当事人直到 2003 年 6 月 21 日才被告知该检查的结论。

2.11 2003 年 6 月 25 日，调查员拒绝了提交人的律师于 2003 年 6 月 24 日提出的请求。调查员 2003 年 6 月 25 日的决定显示，参考了“关于调查和搜查行动”的法律第 8 条，该条规定，调查人员出于寻找犯罪迹象的目的，可以“检查”嫌疑犯的住所。该法律以《宪法》为依据，没有违反个人住所不可侵犯的权利。根据该决定，调查人员是在提交人允许后进入其公寓的，他们在“检查”的过程中未使用任何武力或其他暴力。

2.12 提交人的刑事案件在未指明日期的某一天被转交给比什凯克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2003 年 10 月 14 日，在审讯开始之前，提交人的律师要求法院承认重要证据不具备证据价值，因为该证据是非法获得的。2003 年 10 月 14 日，Pervomaysky 地区法院否决了上述请求，但未提供这一决定的依据。同一天，法院对提交人及其同案被告进行了审讯，两名被告在证词中说，A.R.先生和 T.R.女士自愿送给他们电视机，作为殴打提交人女友的赔偿。此外，提交人在证词中说，他并未允许警察进入他的公寓，也没有人向他出示任何允许他们进入其公寓的文件。也是在同一天，T.R.女士在法庭上说，她的儿子已经去俄罗斯，他不打算出庭作证。

2.13 2003 年 10 月 14 日，Pervomaysky 地区法院将该案件发回 Pervomaysky 地区公诉人，要求他提供“被告罪行的进一步证据”，并“确保 A.R.先生出庭”。提交人的律师要求释放他的当事人。但法院拒绝改变对提交人和 T.B.先生适用的限制措施，认为对他们的羁押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有前科，释放后可能潜逃。此外，他们被指控犯有特别严重的罪行，<sup>3</sup> 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10 条第二部分，“羁押候审可适用于被控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人，唯一根据是所犯罪行的严重性”。

<sup>3</sup> 根据《刑法》第 13 条，特别严重的罪行是指可处以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的有预谋犯罪。根据《刑法》第 167 条第三部分，提交人被指控可判处 7 至 12 年有期徒刑和没收财产的有预谋犯罪。

2.14 2003 年 12 月 25 日，Pervomaysky 地区法院继续对提交人和 T.B.先生的审讯，但 A.R.先生没有出庭。提交人的律师再次要求取消对其当事人的羁押候审，但该请求被驳回，理由与过去相同。由于 A.R.先生缺席，Pervomaysky 地区法院决定推迟审讯。2004 年 1 月 5 日，A.R.先生还是没有出庭。同一天，Pervomaysky 地区法院法官命令 Pervomaysky 地区公诉人确保 A.R.先生在 2004 年 1 月 9 日前出庭，并声明：“在听取受害者证词之前，不可能对该案件的实质作出任何决定”。

2.15 2004 年 1 月 9 日，公诉方仍然未确保 A.R.先生出庭，法院决定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审查该案件。法院询问了 2003 年 4 月 25 日查扣电视机的警察 Zh.O.先生，他在证词中说，虽然他未获准搜查提交人的公寓，但提交人自愿准许他进入公寓。公诉人随后请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继续审讯，并建议在法庭上宣读据称受害人在初步调查时提供的证词。提交人的律师称，他“不得不同意”在受害人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讯，以便结束对他的当事人无限期的审前羁押。法院随后宣读了受害人在初步调查时提供的证词。提交人在其声明中说，据公诉方声称，受害人的证词和在调查期间收集的其他案件资料已证明提交人和 T.B.先生的罪行。

2.16 2004 年 1 月 14 日，提交人的律师要求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宣告对其当事人的指控不成立，以及对案件作进一步调查，理由如下：(1) 电视机是在警察无搜查提交人公寓许可的情况下非法查扣的，因此，重要证据不具有证据价值；(2) 法医检查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价值，因为该检查违反了程序性要求；以及(3) 法院无法对 A.R.先生进行讯问，据提交人和 T.B.先生说，A.R.先生的证词可能使他们免于被起诉。法院否决了提交人的律师有关查扣电视机的证据价值以及法医检查结论的论断，声明是提交人自己将电视机交给警察，此外，有关医学检查结论的论断没有根据。同一天，Pervomaysky 地区法院根据《刑法》第 168 条(暴力抢劫)，判定提交人和 T.B.先生有罪，分别判处其 6 年<sup>4</sup> 和 8 年有期徒刑。

2.17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 2004 年 1 月 14 日的判决显示，该判决参考了《刑法》第 61 条，该条规定，审前拘留的时间可从法院判决的有期徒刑总时间中扣除。根据这一规定，提交人被审前拘留一天相当于在高度警戒监狱监禁两天。

2.18 2004 年 1 月 14 日，提交人的律师向比什凯克城市法院提交上诉，反对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的判决。比什凯克城市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庭于 2004 年 3 月 11 日驳回该上诉。2004 年 5 月 25 日，最高法院刑事和行政案件司法庭通过监督复审程序，维持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 2004 年 1 月 14 日的判决以及比什凯克城市法院 2004 年 3 月 11 日的决定。

<sup>4</sup>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曾于 1995 年 11 月 30 日判处提交人 6 年有期徒刑，因此，该法院 2004 年 1 月 14 日的判决认为，提交人为重犯同一罪行。

## 申诉

3.1 提交人称，吉尔吉斯斯坦侵犯了他依据《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乙)、(丙)、(丁)、(戊)项，以及第十七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

3.2 就《公约》第九条第 1 款而言，提交人称，自他被逮捕的那一刻起，就被怀疑犯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6 条的要求，从他被逮捕的一刻起就应被指派一名律师。然而，与这一要求相反，他是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被逮捕、审讯和被指控犯有特别严重的罪行。提交人补充说，Pervomaysky 地区公诉人未能确保依法批准对他进行审前羁押，而案件材料中明显缺乏律师的签字。

3.3 此外，任何拘留情况都应当是必要和公正的。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剥夺提交人的自由，因为本来可通过较轻的限制措施确保提交人出席调查和司法程序。此外，相关主管机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提交人释放后可能潜逃或犯其他罪行。另外，正如提交人的律师在法庭上所说，他“不得不同意”在受害人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讯，以便结束对其当事人无限期的审前羁押。提交人的律师曾两次请求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释放提交人，但两次请求均被驳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39 条第二部分，一审法院有关适用限制措施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不得对其提出上诉。

3.4 提交人称，缔约国的法律并不要求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留者立即接受法官审讯，这一点与《公约》第九条第 3 款相违背。一名公诉人批准对提交人进行审前羁押，但公诉人并不独立。此外，根据第九条第 3 款，审前羁押是一项特别措施，但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两次驳回了提交人的律师要求释放其当事人的请求，其唯一依据是所犯罪行的严重性(见以上第 2.13 段)。提交人称，他依照第九条第 3 款向国内法院提出指控是无效的，因为在没有相关国内法的情况下，法院无法使其行使受《公约》第九条第 3 款保障的权利。根据《公约》这一条款，指控没有可供用尽的国内补救办法。

3.5 提交人称，他是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的受害者。在初步调查和庭审阶段，提交人的律师都反对法医检查的结论及被查扣的电视机的证据价值。缔约国的法律要求向嫌疑者和被告告知专家检查的日期，以便让他们出席、向专家提出其他问题以及对结论提出反对。调查员于 2003 年 4 月 25 日命令 A.R.先生和 T.R.女士接受法医检查，但没有向提交人和 T.B.先生告知相关命令，导致他们无法行使其权利。调查员直到 2003 年 6 月 21 日才向提交人和 T.B.先生告知有关进行法医检查的命令及该检查的结论，导致两名被告已不可能反对作出的结论。此外，电视机是警察在没有搜查提交人公寓许可的情况下非法查扣的；电视机的序列号和特征没有进行任何登记，使提交人无法证明警察没收的电视机不属于受害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要求以有利于被告的方式解释所有疑问。尽管 A.R.先生没有出庭，但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使用了他在初步调查期间提供的证词作为判

决的依据。缔约国的法院以有利于公诉方的方式对有关提交人罪行的所有疑问进行解释，将证明其清白的举证责任推给提交人，这一做法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2款。

3.6 2003年4月26日，提交人的律师无法与其当事人会面，因为“关于拘留涉嫌和被指控犯罪者的程序和条件”的法律规定，监禁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导和工作人员只有在见到检察官或调查员提供的书面许可的情况下，才可允许涉嫌和被控犯罪者与律师会面。提交人称，上述法律本身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乙)项。

3.7 提交人称，他的案件的初步调查和庭审程序共耗时10个月零16天。他因此声称，他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丙)项规定，不得无故拖延受审时间。

3.8 提交人称，在2003年4月28日至5月23日期间，他无法准备为自己辩护和咨询自己的律师，因为他自己挑选的律师住院，而调查员没有为他指派另一名律师。结果导致他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被正式逮捕，审讯、受到指控和审前羁押，该做法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乙)项和(丁)项。

3.9 提交人称，尽管他和他的律师多次要求确保A.R.先生出庭，但公诉方没有做到这一点，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戊)项保证的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出庭和受讯问的权利。

3.10 第十四条第1款规定了由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的权利。除其他外，公正性意味着法院要充当公诉方和被告方之间的裁判，然而，在提交人的案件中，法院明显偏向公诉方，有时甚至代其完成任务。

3.11 关于根据第十七条第1款提出的申诉，提交人指出，电视机是警察在没有获准搜查其公寓的情况下非法查扣的。然而，提交人及其律师所有关于这一非法入室的投诉均被驳回，理由是没有发生这类搜查，因为是提交人自己打开公寓房门，并将电视机指给警察看。提交人辩称，他的公寓是被搜查还是“检查”与《公约》第十七条的目的无关，因为警察无论如何都需要进入公寓以查扣电视机。提交人补充说，缔约国的法院应作出裁决，声明被查扣的电视机是非法取得的，所以不得用作重要证据，以确保其住所不可侵犯的权利。

## 缔约国不合作

4. 2007年3月6日、2008年4月28日、2009年10月1日和2010年9月1日的普通照会请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供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资料。2010年12月20日，委员会应缔约国2010年12月9日的请求，将该案件2006年4月12日初次提交的全部资料转交缔约国。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没有收到要求缔约国提交的资料。委员会遗憾地指出，缔约国未就提交人的申诉可否受理及其实质内容提供任何信息。委员会回顾说，根据《任择议定书》，有关缔约国必须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者声明，澄清有关事项以及可能已经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由



于缔约方没有作出答复，因此必须对提交人的指称给予应有的重视，前提是这些指称确有充分证据。<sup>5</sup>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5.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5.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在没有缔约国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

5.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和(丁)项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因为他在其个人雇用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正式逮捕、审讯、受到指控和羁押。委员会还注意到，调查员 2003 年 6 月 21 日的决定(见上文第 2.8 段)显示，提交人的律师 2003 年 4 月 25 日和 2003 年 4 月 28 日的缺席至少可部分归咎于该律师本人。此外，2003 年 6 月 21 日，提交人及其同案被告是在他们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新调查员的审问，并被告知对 A.R.先生和他的母亲进行法医检查的结论。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不可受理。

5.4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 1、第 2 款和第 3 款(戊)项提出的指称，委员会指出，这些申诉主要涉及对审讯时举出证据的评估。委员会回顾，<sup>6</sup> 通常是由《公约》缔约国的法院评估某一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除非可以肯定评估明显存在任意性或构成执法不公。就本案而言，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为可否受理目的表明其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这类缺陷。委员会因此认为，来文这一部分未得到充分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不可受理。

<sup>5</sup> 见第 1208/2003 号来文，Kurbonov 诉塔吉克斯坦，2006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第 1209/2003 号、第 1231/2003 号和第 1241/2004 号来文，Sharifova 及其他人诉塔吉克斯坦，2008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第 1461 号、第 1462 号、第 1476 号和第 1477/2006 号来文，Maksudov 及其他人诉吉尔吉斯斯坦，2008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 段。

<sup>6</sup> 除其他外，见第 541/1993 号来文，Errol Simms 诉牙买加，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第 1188/2003 号来文，Riedl-Riedenstein 及其他人诉德国，2004 年 11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7.3 段；第 886/1999 号来文，Bondarenko 诉白俄罗斯，2003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9.3 段；第 1138/2002 号来文，Arenz 及其他人诉德国，2004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8.6 段；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 (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26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2/40 (Vol. I))，附件六。

5.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其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因为他在 2003 年 4 月 26 日无法与他的律师会面，因为该律师不符合“关于拘留涉嫌和被指控犯罪者的程序和条件”的法律的规定。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解释这一点对确定针对他的刑事指控有何影响。因此，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来文这一部分，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不可受理。

5.6 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声称，他于 2003 年 4 月 23 日被逮捕，相隔 10 个月零 16 天后，比什凯克城市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庭才于 2004 年 3 月 11 日作出判决，随后执行对他的判决，这种拖延是不合理的。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 2003 年 4 月 28 日被正式指控，于 2004 年 1 月 14 日被判罪。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没有提供充分资料，说明他为什么认为这一延误过长。<sup>7</sup> 鉴于收到的资料，委员会认为这一申诉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不可受理。

5.7 最后，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提出的指称，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警察进入、搜查或检查其公寓是否合法，以及提交人是否同意或反对警察采取这类行动的申诉非常模糊。因此，委员会无法认定这些指称具备可受理性的充分证据。委员会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5.8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3 款提出的其余申诉证据充分，符合受理要求，并进一步进行案情审理。

### 审议案情

6.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6.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3 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一名不能被视为独立的检察官授权对他实行羁押。委员会就此回顾其判例，<sup>8</sup> 第九条第 3 款规定，因刑事指控被拘禁者有权获得对他/她的拘禁的司法控制。在正确行使司法权力的做法中普遍认可的是，应由一个对于所处理事项独立、客观、公正的机构来行使这种司法控制。在本案中，委员会不认为检察官可被视为第九条第 3 款所指在制度上具有必要的客观性和公平性，从而可以被认定为“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人”，因此认定发生了违反这个条款的行为。

<sup>7</sup> 见第 1338/2005 号来文，Kaldarov 诉吉尔吉斯斯坦，2010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7.8 段。

<sup>8</sup> 除其他外，见第 521/1992 号来文，Kulomin 诉匈牙利，1996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3 段；第 1218/2003 号来文，Platonov 诉俄罗斯联邦，2005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第 1348/2005 号来文，Ashurov 诉塔吉克斯坦，2007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5 段；Kaldarov 诉吉尔吉斯斯坦(上文脚注 7)，第 8.2 段。

6.3 委员会还指出，根据第九条第 3 款，任何因刑事指控被拘禁的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指出，为了避免任意性，拘禁不应超过缔约国能够提供适当解释的期限。<sup>9</sup> 就本案而言，Pervomaysky 地区法院确定对提交人的羁押是必要的，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并且有前科，因此担心他被释放后可能潜逃。虽然提交人认为他在等待审讯期间应被释放，但他并未声称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拘禁他的理由不适当。委员会还注意到，对提交人的审前拘留时间按照一天相当于两天的比例，从 Pervomaysky 地区法院对其判处有期徒刑的总时间中扣除(见上文第 2.17 段)。委员会据此认为，对提交人的审前拘留时间不应被视为不合理，因此在这方面没有违反第九条第 3 款。

7.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的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3 款并侵犯提交人权利的情况。

8.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以适当补偿的方式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9.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泛分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9</sup> 见第 900/1999 号来文，C 诉澳大利亚，2002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第 1014/2001 号来文，Baban 诉澳大利亚，2003 年 8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

C. 第 1563/2007 号来文, Jünglingová 诉捷克共和国  
(2011 年 10 月 24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Oldřiška (Olga) Jünglingová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6 年 5 月 29 日(首次提交)  
 事由: 以公民身份为由在归还财产问题上实行歧视  
 程序性问题: 滥用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公约》条款: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三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Oldřiška (Olga) Jünglingová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563/2007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6 年 5 月 29 日来文的提交人是 Oldřiška (Olga) Jünglingová 女士, 1917 年 2 月 19 日生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洛穆茨区 Bystročice, 入籍为美国公民, 现住美利坚合众国。她称她是捷克共和国违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行为的受害者<sup>1</sup>。她无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sup>1</sup> 由于捷克共和国通告继承, 1991 年 3 月 12 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批准的《任择议定书》, 因此, 1993 年 1 月 1 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对捷克共和国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的丈夫 Augustin Jüngling 是一位福音教派牧师，1948 年 2 月共产党政变后不久，就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1949 年提交人带着两个女儿也离境投奔丈夫。1957 年，全家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并且一直在美国生活，直至 1994 年举家返回捷克共和国。

2.2 1938 年 3 月 31 日，提交人得到了作为嫁妆一部分的资产：奥洛穆茨区土地登记册记录的两块地皮：第 219/1 号地块——86.180 平方米和第 324/3 号地块——183.280 平方米。一架清单上未列有的新钢琴，购价 20,000 捷克克朗。提交人还有一张 15,990 捷克克朗的银行存折。当初逃离捷克斯洛伐克时，提交人所有的资产，包括她的两小片地块、设备配套的房产和家具统统被国家没收。

2.3 1995 年 10 月 20 日，Bystročice-Žerůvsky 农业合作社与提交人达成了关于归还资产的协议。1996 年 4 月 23 日，奥洛穆茨的区土地局依据第 229/1991 号法案驳回了这一协议，理由是提交人不符合 1993 年 1 月 31 日之前拥有捷克公民身份的条件，<sup>2</sup> 因为她在 1995 年 5 月 29 日才获得捷克国籍。1997 年 2 月 4 日，奥斯特拉发州法院核准了奥洛穆茨区土地局的裁决。1997 年 8 月 13 日，奥洛穆茨区土地局裁定，这两片地块曾属 Bystročice 市政府资产。1950 年地产估价 37,952 捷克克朗，并已出售。

2.4 1999 年 2 月 22 日，奥洛穆茨区法院以她本应在法定限期截止日之前提出，而且她在法定归还期限内不是捷克公民为由，驳回了提交人依据第 87/1991 号《关于法外退赔法》提出的 60,000 捷克克朗赔偿要求。<sup>3</sup> 2000 年 5 月 24 日，奥斯特拉发州核准了奥洛穆茨区法院的裁决。

2.5 提交人引述宪法法院一项维持裁决符合 87/1991 号法律的案例<sup>4</sup> 辩称，国内并无关于归还她的资产问题的补救办法。

## 申诉

3. 提交人声称，捷克共和国对她适用第 87/1991 号法律，规定必须具备捷克公民的身份才可归还资产，违反了他依《公约》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

<sup>2</sup> 第 229/1991 号《关于土地及其它农业资产关系管制法》第 13 节第 4 款。

<sup>3</sup> 捷克政府颁布的第 87/1991 号《关于法外退赔法》列明了向在共产党统治下被没收资产的个人退还资产的条件。根据该法，为了索回资产所有权，凡要求归还资产的人必须具备：(a) 捷克国籍；和(b) 在捷克共和国境内有长期的住址。在提出归还资产要求的限期，即从 1991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的限期内，必须满足上述两项要求。1994 年 7 月 12 日，捷克宪法法院(第 164/1994 号)裁决书废除了长期住址的条件，并设定了资产索要人提出索回要求的新时限，据此，凡够资格的人可从 1994 年 11 月 1 日至 1995 年 5 月 1 日期限内提出索回要求。

<sup>4</sup> 1997 年 6 月 4 日，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的第 Pl. ÚS. 33/96-41 号裁决。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7 年 11 月 12 日，缔约国就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发表了意见。缔约国引述了两项适用法，即：第 229/1991 号《关于土地及其它农业资产关系管制法》和第 87/1991 号《关于法外退赔法》。

4.2 根据第 229/1991 号法律第 4 节第 1 款和第 13 节第 4 款，捷克公民在规定时限内(截止至 1993 年 1 月 31 日)可收回先前被国家没收土地的隶属个人的合法所有权。第 87/1991 号法律(第 3 节第 1 款和第 13 节第 2 款)还允许有资格的人，即捷克公民获得赔偿金(60,000 捷克克朗)，只要依照第 119/1990 号《司法反正法》下达的司法裁定，国家须归还他们已被没收的固定资产。资产赔偿要求必须在该法生效即日起的一年之内，或在驳回归还要求的最后判决即日起的一年之内提出。

4.3 缔约国概要阐述了驳回提交人索回要求的理由：除了她未在第 229/1991 号法案和第 87/1991 法律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索回要求而且她在相关的法定期限内还尚不是捷克公民之外，提交人本应与 Bystročice 市政厅对簿公堂，而不是将 1995 年 10 月 20 日与她达成了归还资产协议的 Zemědělské družstvo Bystročice-Žerůvsky 合作社告上法庭。另一个驳回她要求的原因是，与第 87/1991 号法案第 13 节第 2 款的明文规定相悖，被没收的部分资产属于固定资产。

4.4 缔约国还说，提交人因滥用《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提交权而不可受理。缔约国回顾了委员会的案例，据此，《任择议定书》并未设定任何固定的时限，仅因提交来文的延迟其本身并不构成滥用提交权的行为。然而，缔约国称，提交人是 2006 年 5 月 29 日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而这已经是 2000 年 5 月 24 日国内法庭下达了判决之日的六年之后。缔约国辩称，提交人并未就此延迟说明任何合理的理由，并因此认为，委员会应宣布来文不予受理。<sup>5</sup>

4.5 关于案情，缔约国称，提交人不符合法定公民身份的要求，并回顾缔约国先前就类似案件发表的意见，清楚阐明了颁布归还资产法律方案的理念和历史原因。最后，缔约国称，委员会应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宣布来文不可受理，也可依据《公约》第二十六条，认定来文缺乏依据，不予受理。

### 提交人的评论

5.1 2008 年 1 月 4 日，提交人针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的意见发表了评论。

5.2 关于延迟提交本来文问题，她称，缔约国并未公布过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因此，她只到后来才知道这个渠道。

<sup>5</sup> 缔约国提及 2001 年 7 月 16 日对第 787/1997 号来文 Gobin 诉毛里求斯案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6.3 段。

5.3 关于案情，提交人重申了第 229/1991 号法案和第 87/1991 号法律关于公民身份的要求带有歧视性质，侵犯了她依《公约》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说，提交人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她本可针对 2000 年 5 月 24 日奥斯特拉发州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然而，委员会回顾，若明知补救办法无效，提交人提交来文则不必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注意到，其他提交人就是否符合宪法问题未获胜诉；委员会对先前类似案情的意见仍未得到落实；而且宪法法院依然坚持《归还法》符合宪法。<sup>6</sup> 委员会反观先前的司法案例<sup>7</sup>认为，提交人任何进一步的上诉均系徒劳无益。

6.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鉴于来文延迟提交，被视为滥用了《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提交权，因此，应宣布不可受理。缔约国宣称，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后，耽搁了六年多才向委员会提出申诉。提交人辩称，由于信息不畅才造成的耽搁。委员会说，根据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委员会新编适用收受来文的第 96 (c)项规则，委员会必须确定来文未构成滥用提交权行为。滥用提交权原则上不是基于延迟提交理由依属时管辖作出不予受理裁定的根据。然而，当提交人在国内补救办法用尽五年之后才提交，或在适用情况下，当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得出结论三年之后才提交，即有可能构成滥用提交权行为，除非鉴于来文所涉的所有情况具备了可证明延误提交的理由。然而，与此同时，并依据目前的法理，委员会认为，依据目前的具体案情，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以来，六年零五天的延迟不可被视为相当于滥用《任择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提交权。<sup>8</sup> 因此，委员会决定来文可予受理，因为显然在《公约》第二十六条之下引起问题。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当事各方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表明，对提交人适用第 87/1991 号《关于法外退赔法》，是否相当于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委员会重申其案例阐明

<sup>6</sup> 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第 Pl. ÚS. 33/96-41 号。

<sup>7</sup> 见第 1742/2007 号来文，Gschwind 诉捷克共和国，2010 年 7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sup>8</sup> 见第 1574/2007 号来文，Slezak 诉捷克共和国，2009 年 7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



并非所有的区别对待都可被视为第二十六条所列的歧视。符合《公约》条款并基于客观和合理原因的区别对待并不就是第二十六条含义所禁止的歧视行为。<sup>9</sup>

7.3 委员会回顾了其就捷克无数涉及归还资产案发表的意见，<sup>10</sup> 在这些意见中认为，要求提交人必须获得捷克公民身份为先决条件，才可归还其资产，或归还不了，则予以赔偿，违反了第二十六条且不符合《公约》规定。要铭记的是，提交人原本对其资产的所有权并未预先设定得具备公民身份，委员会认为在这些案情中，公民身份是无道理的要求。以 *Des Fours Walderode* 案为例，<sup>11</sup> 委员会注意到，法律规定以公民身份为归还早先被当局没收资产的必要条件，实属一项任意的规定，并因此是一项歧视性的规定，在那些同样都是遭受到早先政府迫害的个人之间划出了区别，并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委员会认为，上述案件确立的原则也适用于本来文的提交人，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对提交人适用第 87/1991 号法案的公民身份要求，侵犯了她依据《公约》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上述事实显示存在着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情况。

9. 依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包括若无法归还她的资产，即予以赔偿。委员会重申缔约国应审查其立法，确保人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和同等的法律保护。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泛分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9</sup> 见第 182/1984 号来文，*Zwaan-de Vrie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段。

<sup>10</sup> 第 516/1992 号来文，*Simunek* 诉捷克共和国，1995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6 段；第 586/1994 号来文，*Adam* 诉捷克共和国，1996 年 7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6 段；第 857/1999 号来文，*Blazek* 诉捷克共和国，2001 年 7 月 12 日通过的《意见》，第 5.8 段；第 945/2000 号来文，*Marik* 诉捷克共和国，2005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第 1054/2002 号来文，*Kriz* 诉捷克共和国，2005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第 1463/2006 号来文，*Gratzinger* 诉捷克共和国，2007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7.5 段；第 1533/2006 号来文，*Ondracka* 和 *Ondracka* 诉捷克共和国，2007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sup>11</sup> 第 747/1997 号来文，*Des Fours Walderode* 诉捷克共和国，2001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8.4 段。



- D. 第 1637/2008 号来文, Canessa 诉乌拉圭  
 第 1757/2008 号来文, Barindelli Bassini 等人诉乌拉圭  
 第 1765/2008 号来文, Torres Rodríguez 诉乌拉圭  
 (2011 年 10 月 24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Néstor Julio Canessa Albareda, Mary Mabel Barindelli Bassini, Graciela Besio Abal, María del Jesús Curbelo Romano, Celia Dinorah Cosio Silva, Jorge Angel Collazo Uboldi and Elio Hugo Torres Rodríguez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乌拉圭

来文日期: 2007 年 7 月 5 日、2008 年 1 月 15 日和 2008 年 2 月 18 日(初次提交)

事由: 以年龄为由对公务员实行歧视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

《公约》条款: 第二条; 第五条; 第二十五条第 2 款(丙)项;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Canessa 先生等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637/2007 号、第 1757/2008 号和第 1765/2008 号来文  
 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的所有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丛科·赞纳勒·马久迪纳女士、尤丽雅·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富宾恩·奥马·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意见

1. 2007 年 7 月 5 日第一份来文的提交人是 Néstor Julio Canessa Albareda, 乌拉圭公民, 生于 1944 年。2008 年 1 月 15 日第二份来文的提交人是 Mary Mabel Barindelli Bassini、Graciela Besio Abal、María del Jesús Curbelo Romano、Celia Dinorah Cosio Silva 和 Jorge Angel Collazo Uboldi, 他们是乌拉圭公民, 分别生于 1942 年、1939 年、1942 年、1942 年和 1946 年。2008 年 2 月 18 日第三份来文的提交人是 Elio Hugo Torres Rodríguez, 乌拉圭公民, 生于 1940 年。所有上述个人都是前外交官, 他们称乌拉圭侵犯了他们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第三份来文的提交人还称, 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十五条(丙)项。《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无律师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这些提交人在 1973 年和 1980 年之间开始作为公务员在乌拉圭外交部工作, 根据行政部门在 2001 年至 2006 年通过的决定, 他们在年满 60 岁时, 被解除了外交部门的秘书职位。这些决定依据的是 1990 年 12 月 28 日的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 该条取代了 1974 年 6 月 6 日第 14.206 号法第 20 条(“外交部外事服务条例”), 条文如下: “第 20 条: 在外交部内部履行职责的最高年龄限制规定如下: 大使、公使、公使衔参赞、参赞和 A 类技术人员, 70 岁。一等秘书、二等秘书和三等秘书, 60 岁。”<sup>1</sup>

###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2.2 2005 年 9 月 17 日, 第一份来文提交人提交了对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的宪法审查申请, 他称, 该条违反了平等原则和工作权。在 2006 年 10 月 12 日的一项决定中, 最高法院驳回了该项申请, 未审查遭质疑条文的合宪性。最高法院认为, 一旦法律已经适用, 就不能对该法申请宪法审查, 因为宪法审查的目的是, 宣布某个条款在某个具体案件中不适用, 而不是将其完全废除。在一份并存意见中, 两名最高法院法官认为, 该申请可予受理, 但该案并无违反平等原则的情况, 因为对处于同等职位即一等秘书的个人并无不平等待遇。<sup>2</sup>

<sup>1</sup> 第 14.206 号法第 20 条的早先版本规定了在外交部内部履行职责的以下最高年龄限制:

- (a) 大使、公使、“AaA”类技术人员: 70 岁;
- (b) 公使衔参赞: 65 岁;
- (c) 参赞: 60 岁;
- (d) 一等秘书: 55 岁;
- (e) 二等秘书: 50 岁;
- (f) 三等秘书: 45 岁。

<sup>2</sup> 此段所引细节均摘自 2006 年 9 月 20 日最高法院的决定, 附于提交人的初次来文之中。

2.3 第一份来文提交人指出，废除行动对于本案而言并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根据行政法院《组织法》第 23 条，废除行动仅适用于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属于不当使用、滥用或过分使用权力或有违法治。在本案中，宣布提交人占有的一等秘书职位空缺的决定依据的是一项法律规定，不满足上述任何条件。因此，这种行动没有成功机会。第一份来文提交人得出结论认为，他提交的宪法审查申请是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因此，他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2.4 第二份来文提交人也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对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进行宪法审查；他称，该条违反了平等原则和工作权。最高法院在 2007 年 6 月 8 日的决定中驳回了申请。法院援引了 2006 年 9 月 20 日的先前决定，认为，由于此先前决定与本案完全相符，该决定所用推理应被视为适用于本决定。

2.5 2007 年 4 月 26 日，第三份来文提交人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对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进行宪法审查；他称，该条违反了平等原则和工作权。最高法院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驳回了这项申请。法院认为，在法律范围内，不同职位的个人得到不同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平等原则未受损害。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律推定是以任意或歧视性方式作出的”。<sup>3</sup>

#### 为争取立法机构废除遭质疑条文所作的努力

2.6 提交人指出，1998 年以来，他们作过多次尝试，争取立法机关废除第 246 条，均未成功。他们补充指出，1998 年 11 月，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废除法案，<sup>4</sup> 但遭到时任外交部长的反对，相信是出于政治原因。

#### 申诉

3.1 这些提交人认为，上述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使其在年满 60 岁时失去了拥有秘书职位的权利，该条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和第二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提交人称，该条款对平等个人即外交公务员规定了不平等待遇。提交人认为，在终止职务方面，秘书待遇与外交机构高级别公务员(参赞、公使和大使)待遇之间的差别既不合理也不客观，因为仅使用了年龄作为将个人排除于一种职业生涯之外的唯一标准，在这种职业生涯中，知识能力和经验应是最为重要的。提交人指出，在年满 60 岁之前未达到参赞职级的公务员被迫离职并从事行政任务，失去了他们合法获得的所有权利和特权，包括外交地位。相比之下，在年满 60 岁前升至参赞职级的公务员可保留其职位至 70 岁。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在 Love 等人诉澳大利亚一案(第 983/2001 号来文)中的意见，在该案中，委员会认为，与年龄相关的区分，如果并非基于合理的和客观的标准，可构成《公约》第二十六条下的“其他身份”为由的歧视。他们还援引了委员会的第 18、25 和 26 号一般性意见，以及哥伦比亚宪法法院的有关决定。

<sup>3</sup> 本段引用文字摘自最高法院 2004 年 12 月 14 日的决定。

<sup>4</sup> 提交人在 2008 年 10 月 10 日的来文(见下文第 5.1 段)中附上了该法案副本。

3.2 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五条第 2 款。为此，还请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有权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美洲人权公约》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在平等条件下进入公职部门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洲人权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七条(工作权)、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和《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3.3 第三份来文提交人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十五条(丙)项，但未提供任何论点，以证明该说法。

###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9 月 2 日，缔约国告知委员会，它与乌拉圭公务员的关系是法定的而非合同性的。因此，一项任命不是一份雇佣合同，而是将被任命者分配到一个规定了其权利和义务的法定职位上。占据某个职位的权利意味着，继续满足该职位要求的所有公务员不能被调动，除非在条例所规定的条件下——在本案中，即《外交部门条例》。缔约国强调，占据某个职位的权利不应与永久持有该职位的权利相混淆。公务员是去填充职位的；职位并非为了公务员的利益而存在。因此，外交地位是职位特权，不是个人特权。

4.2 缔约国称，遭质疑条款——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并不是歧视性的，因为它满足合理性和客观性要求，这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该条款规定，所有公务员，在达到 60 岁时，如果未升至参赞职位，须离开 M 类(外交人员)，加入 R 类(专业非外交人员)；已升至参赞职位的公务员将留在 M 类。缔约国称，该条款平等地影响与提交人处于同样境况的所有公务员：即年满 60 岁，持有参赞以下职位。因此，对于拥有相同法定职位的个人而言，并不存在歧视。缔约国指出，它有权使公务部门合理化，包括规定入职标准、晋升、竞争考试和退休，并且，在不侵犯人权的前提下，有一定的酌处权。缔约国补充指出，与提交人相同情况的公务员，即在年满 60 岁前未升至参赞职位的公务员，仍是外交部的公务员，即使他们被分配到 R 类的不同职位但同样是有尊严的职位上。此外，提交人的退休和社会保障权益不受影响。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8 年 10 月 10 日，提交人称，缔约国所说的与他们处于同样级别的公务员——年满 60 岁、未升至参赞职位的秘书——得到了平等待遇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因为这一类组的存在本身就是执行歧视性条款的结果。《乌拉圭外交部门条例》将 M 类工作人员视为一个单一类组，未按职级或等级对其进行区分。但是，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却对 M 类内部的四个职级(参赞、公使衔参赞、公使和大使)偏爱有加，这些人可继续保留外交职务直至 70 岁，而秘书则在 60 岁时被解除职务。提交人援引《宪法》第 250 条，作为支持该项争议权利的一个事例。该条规定，司法部门的所有成员，在年满 70 岁时离职，不假任何歧视。提交人补充指出，缔约国未对第 246 条所作的区分提供正当理由。提交人称，这种

区分是任意的和歧视性的，其唯一目的是，创造职位空缺，使新聘公务员能够因为“审美”原因被任命。提交人援引了外交部为回应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废除第 246 条的建议于 1998 年 5 月 20 日致该委员会的一封信函。信函指出，“在履行外交职能方面，秘书职级公务员，其年龄比其他国家的相应人员高出许多，这种情况的存在可对国家的海外形象产生负面影响”。<sup>5</sup>

5.2 提交人称，乌拉圭《宪法》第 60 条规定，公务员的行政职业生涯由预算负担，并宣布，公务员拥有终身合同地位。提交人认为，由于他们在 60 岁(他们的退休年龄)至 70 岁之间没有晋升机会，他们的职业发展机会被剥夺了。

5.3 提交人指出，他们并非仅仅是被重新分配到不同职位，而是被除去了原职并被分配到另一个较低级别的职位上。提交人补充指出，在被剥夺了外交地位、不能履任海外职位、薪酬大幅降低、晋升无望的情况下，缔约国不能指望他们能心情舒畅地继续留任公务员。<sup>6</sup> 提交人强调指出，他们的职位并未取消，而是留为空缺，提交人则被重新分配到 R 类职位上。

5.4 提交人最后指出，在订定一项法律时，缔约国必须确保该法律符合《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要求，即该法律不得是歧视性的。提交人补充指出，最高法院未就他们在申请中援引的《公约》条款作出任何评论。

### 各当事方的补充意见

6. 2009 年 2 月 6 日，缔约国重申了在 2008 年 9 月 2 日照会中提出的关于公务员职位性质和在受质疑条款中并无歧视的论点，因为它对同级公务员规定了平等待遇。缔约国指出，在受争议条款修订案之前，第 14.206 法的原第 20 条已包含了对不同级别公务员的不同年龄限制。缔约国还提及最高法院关于提交人提出的宪法审查申请的决定。最高法院认为：“受争议条款的法律理由似乎是，除其他外，避免外交部一等秘书职责的履行效力由于反应力和记忆力的丧失而下降，这种丧失常见于 60 岁以上的人。其目的是，使上述职责由在立法者看来有可能由于其年龄更有效履行的人来履行。虽然这一目的……可能会有人质疑，但似乎并非不合理。”<sup>7</sup> 缔约国补充指出，在得到通知已将其从 M 类移除和被重新分配到 R 类之间的期间内，第一份来文提交人有机会，参加参赞职位考试，但他未得到足够高的分数，不够晋升资格。

7.1 2009 年 3 月 9 日，提交人对缔约国的意见作出了回应。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仅是重申了相同论点，这些论点并未证明《公约》第二十六条和所援引的其他条款未遭违反。提交人认为，14.206 号法的原第 20 条为外交部门不同级别公务员规定了不同年龄限制这一事实并不能为起草一项新的同样是歧视性的规定提供正当理由。提交人重申了以下论点：受争议条款构成对年

<sup>5</sup> 该信函附于提交人 2008 年 10 月 10 日的评论。

<sup>6</sup> 提交人在来文中附列了一份 M 类公务员工资单和他们在被重新分配到 R 类职位后所领的工资单。

<sup>7</sup> 引自最高法院第 42/93 号、第 206/2002/312/2004 号和第 192/2005 号决定。

满 60 岁的外交部秘书的歧视，这是因为，尽管允许他们继续担任公职，他们被分配到较低等级的行政职位上，不在外交部领薪，而且没有晋升机会。

7.2 2011 年 1 月 11 日，提交人向委员会通报说，2010 年 12 月 27 日的《国家预算法》(第 18.719 号)颁布了。经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修订的此项法律第 333 条取代了第 14.206 号法第 20 条，内容如下：“第 20 条。兹规定，履行外交部 M 类职责的最高年龄限制为 70 岁。在本法生效日，由于适用先前有效的条款(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所规定的年龄限制而在外交部担任 R 类职位的公务员，无论何种情况，将自动重新获任他们以前担任的 M 类职位。薪酬差额须以个人补偿的形式解决。”

7.3 提交人指出，颁布此项新法律并将外交部所有公务员的最高年龄限制定位 70 岁，这表明，缔约国承认以前存在歧视。然而，提交人仍指出，对于他们在被中断外交生涯和被剥夺相应权利的年份，他们无法获得公正补偿。此外，某些提交人在上述第 333 条生效前已到 70 岁。所以，在被任意剥离外交职务 10 年之后，他们已经退休了，但上述条款并未为其规定任何补偿。因此，提交人请委员会作出《公约》遭到了违反之裁决并请委员会要求缔约国为重新获任 M 类职位的人所遭受的伤害和损失提供公正补偿，尤其是，为在先前法律规定下在 70 岁时从 R 类退休的人所遭受的伤害和损失提供适当赔偿。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第三份来文提交人提及第二十五条(丙)项。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未提供关于违反该条的任何证据。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8.4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五条第二款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未证明，对于缔约国所承认的人权，缔约国借口《公约》未予承认或只在较小范围上予以承认而予以限制或克减。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受理条件而言，提交人未对这项申诉提供充分佐证；委员会宣布该项申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8.5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二十六条和第二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认为，就受理条件而言，该项申诉有充分证据。因此，委员会宣布可予受理。

## 审议案情

9.1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9.2 委员会必须确定提交人是否因第二十六条遭到违反而成为受害者。委员会回顾其久已确立的如下判例：并非所有区别待遇都必然构成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歧视——如果此种区别的标准是合理和客观的并且旨在实现与《公约》相符的某个目的。<sup>8</sup> 委员会认为，年龄可构成第二十六条禁止的一种歧视理由，倘若这种建立差别待遇的理由并非基于合理和客观的标准。<sup>9</sup>

9.3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说明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在外交部秘书和其他 M 类公务员之间建立的区别之目的，这种区别致使提交人的职务被终止；缔约国也未为这种区别提出合理和客观的标准。作为受争议条款的一个可能的法律理由，乌拉圭最高法院提到，反应力和记忆力的丧失可能会对履行一等秘书职责的工作人员的效能产生不利影响——这种推理，该法院并不认为不合理。

9.4 委员会认为，对某个职业规定强制退休年龄，本身并不构成以年龄为由的歧视，<sup>10</sup> 在本案中，秘书和其他 M 类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不相同，对于这一区分，缔约国并未提出正当理由。缔约国的推理依据的是以下两个方面：(1) 最高法院的论点，即待遇差别“似乎并非不合理”；(2) 缔约国辩称，在行使公共行政合理化这项权利的过程中，它有权享有一定的酌处权。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说明，公务员的年龄如何专门对秘书的绩效产生影响，且有别于对参赞、公使或大使的绩效的影响，从而为强制退休年龄方面的 10 岁差别提供正当理由。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摆在委员会面前的事实表明，存在基于提交人年龄的歧视，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表明，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

<sup>8</sup> 参见第 1565/2007 号来文，Gonçalves 等人诉葡萄牙，2010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第 983/2001 号来文，Love 等人诉澳大利亚，2003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第 182/1986 号来文，F.H. Zwaan-de Vrie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段；180/1984 号来文，L.G. Danning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和 14 段；以及第 172/1984 号来文，S.W.M. Broek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段。

<sup>9</sup> 参见第 983/2001 号来文(上文脚注 8)，第 8.2 段；以及第 1016/2001 号来文，Hinostroza Solís 诉秘鲁，2006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

<sup>10</sup> 参见第 983/2001 号来文(上文脚注 8)，第 8.2 段。

11.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供的资料，即，第 16.170 号法第 246 条已经由 2010 年 12 月 27 日第 18.719 号法第 333 条修订，规定外交部所有 M 类职位的最高年龄限制为 70 岁，并规定对受到现已废除的第 246 条不利影响的公务员所遭受的收入损失进行补偿。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提交人的以下指称：对于他们在被剥离职位和相应权利的年份，他们无法获得公正补偿。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必须承认应向提交人提供赔偿，包括适当补偿其所遭受的损失。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领土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E. 第 1641/2007 号来文, Calderón Bruges 诉哥伦比亚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Jaime Calderón Bruges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哥伦比亚
来文日期:	2007 年 5 月 22 日(初次提交)
事由:	上诉后仍被判有罪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
实质性问题:	由合格、独立和无偏倚法庭公平和公开审理的权利; 被推定无罪的权利; 定罪和判决由更高一级法庭依法复审的权利; 既判力的原则不可违反; 不受歧视地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權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1、2、5 和 7 款; 第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Jaime Calderón Bruges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641/2007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Jaime Calderón Bruges 系哥伦比亚国民，生于 1941 年 3 月 17 日。他声称他是哥伦比亚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2、5 和 7 款，第十五条，以及与第二条第 1 及 3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相关联的第二十六条行为的受害人。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克里斯蒂娜·沙内、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瓦尔特·卡林、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杰拉尔·L·纽曼、迈克尔·奥弗莱厄蒂、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奈杰尔·罗德利、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克里斯特·特林和马戈·瓦特瓦尔。

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对哥伦比亚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8 年 11 月，总检察官办公室(*Fiscalía General de la Nación*)开始调查提交人被指称的与知名毒贩 Miguel Angel Rodríguez Orejuela 的关系。他被控从 Orejuela 处借钱，而钱是后者从事非法活动所得，这将构成非法致富罪。1998 年 12 月 7 日，他被审前拘留，因此，他的民事登记员职务被中止。

2.2 在 2000 年 1 月 18 日的判决中，波哥大第三特别刑事巡回法院以缺乏结论性证据判定提交人无罪。公共法律事务处(*Ministerio Público*)向波哥大司法区高级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 2000 年 6 月 15 日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因为既没有证据证明提交人认识 Rodríguez Orejuela 先生，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他通过第三者借的钱的来源是非法的。此外，高等法院指示将 2000 年 3 月 30 日的暂时释放提交人的命令变成最后的无条件的命令。

2.3 2000 年 8 月 24 日，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翻案上诉，其中列举了波哥大高等法院的证据评价中的所谓错误。2004 年 7 月 21 日，最高法院裁定波哥大高等法院有错并宣布其判决无效。它判定提交人 5 年监禁和罚款并剥夺同样时间的公共权利和义务。然后他被送进监狱，他自从无罪获释后一直担任的公证员职务也被停止。

2.4 提交人向昆迪纳马卡司法委员会纪律庭对翻案裁决提出 *tutela* (法律保护)申请，声称，除其他外，他的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法定诉讼程序权被侵犯。他说，翻案上诉提出时第 553/2000 号法令第 1 条和第 6 条在生效，其中允许对高等法院的二审有效(最后)判决提出这种上诉。虽然这些条款被宪法法院在其 2001 年 2 月 28 日第 C-252 号判决中宣布在这方面不可执行(违宪)，但适用的是对提交人不利的早先的法律。最高法院裁定它有权审理上诉，因为上诉是在当时有效的法律<sup>1</sup>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的，并且 2001 年的宣布违宪是以预期效果适用的。司法委员会在 2004 年 11 月 18 日的裁决中拒绝了司法保护申请，并裁定司法保护不适用于司法解释，由于最高法院面临的诉讼程序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规提起的，因此它的行动并不是任意的。

2.5 提交人对这一判决提出质疑，从而导致司法高级委员会管辖纪律庭的复审。2005 年 2 月 2 日，高级委员会裁定赞成适用法律保护并推翻了昆迪纳马卡司法委员会的裁决。它裁定，根据宪法法院第 C-252 号判决，最高法院本来不应受理对波哥大高等法院判决的翻案上诉，因为那是个有效判决。因此，它得出结论：最高法院无视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最有利法律原则，因此违反了提交人的法定

<sup>1</sup> 第 553/2000 号法令第 6 条规定，翻案上诉必须在二审法院有效判决宣布后 30 天之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如果没有提出上诉，案件的原始卷宗将移交判决执行法官。

诉讼权利和自由权。这样，高级委员会裁定最高法院的判决无效，维持波哥大高等法院判决并命令将提交人立即释放。

2.6 宪法法院随后对高级司法委员会的判决进行了复审并于 2005 年 6 月 20 日就法律保护的适用问题宣布了新的裁决。宪法法院裁定，最高法院裁定审理 2000 年 8 月提出的翻案上诉并没有违反 2001 年第 C-252 号裁决，是符合当时有效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在宪法法院关于部分不可强制性问题宣告性判决之前。宪法法院的判决规定，不一定有“一种单一的、排他的和不可避免的解釋而导致得出结论：最高法院……本不应就针对开释被告的有效判决提出的翻案上诉宣布任何判决，如上诉人声称的那样，由于那个机构采取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如果这样的上诉是在 2001 年第 C-252 号裁决[宣布]之前提交的，……它就需要对它们做出裁决，一视同仁。”因此，宪法法院推翻了高级委员会的裁决并维持昆迪纳马卡司法委员会的判决。

2.7 提交人提出这一裁决无效的申請，但于 2005 年 9 月 26 日被宪法法院全体会议驳回。高级司法委员会的裁决被推翻后，提交人被再次剥夺了自由。

## 申诉

3.1 提交人坚持认为，根据宪法法院第 C-252 号判决，最高法院无权审理翻案上诉，因此，其判决侵犯了《公约》第十四条下他应有的权利。

3.2 更具体地说，提交人称他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行为的受害人。他说，他在普通法院被审过两次，在这种法院里可提出并可反驳证据、辩护和上诉，并可提出质疑。他在两次审判中都被无罪释放，判决是正式有效的。后来也从未出现过任何证据否定这些判决所确定的他的清白无辜。然而，最高法院进行了翻案诉讼程序，在此过程中他没有机会提出或反驳证据，或上诉，更不用说对法院的判决提出正式质疑了。他声称，根据《公约》的法定诉讼程序的要求，这不是真正的审判。

3.3 提交人坚称，随着二审法院对他的最后的无罪判决，对他的审判已经结束。因此，翻案诉讼程序并不代表普通的或非常的补救，而是一种导致关于同一行为的新的判决的单独的诉讼，而在其中没有机会对定罪提出质疑。这种情况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5 款，其中规定任何已判罪的人都有对任何处罚或定罪提出质疑的权利。

3.4 哥伦比亚司法部门由于没有坚持二审法院下达的最后无罪判决和以同一罪名——两家法院在完全符合程序并给提交人机会反驳和抗辩对他的指控的诉讼中被开释的罪名——再次审判受害人，从而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7 款规定的既判案件原则和同一罪行不受两次审判原则。

3.5 提交人称，最高法院无视他的受益于最有利的法律原则的权利，从而违反了《公约》第十五条。法院应用的是因违反基本权利而在早先已被废除的程序规则。翻案上诉是根据第 553/2000 号法令提出的，其中规定在二审法院有效判决

宣布后 30 天之内可以这样做。根据已被第 553 号法令废除的以前的法律，上诉须在二审法院下达最后判决之前提出。宪法法院第 C-252 号判决恢复了被第 553 号法令废除的法律，那个法律应在两次审判中都应用，因为在裁定翻案上诉时该法律是有效的并且也是为了要遵守最有利的法律原则。

3.6 提交人称，最高法院毫无理由地对完全一样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一方面，一个已被有效判决宣布无罪而其案件在宪法法院 2001 年下达判决前被提出翻案的人不得不放弃其权利。另一方面，在宪法法院于 2001 年下达判决后被有效判决宣布无罪的人其开释不可推翻。这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1 和 3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在 2008 年 2 月 6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坚持认为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委员会无权评价事实和证据，而提交人提出的是委员会作为上诉法院或四审法院行事，评价事实和情况，或解释国内法，而本国的法律系统、尤其是宪法法院已经进行了评价。缔约国回顾说，委员会的意见不应取代国内法院关于某个案子的事实和证据的评价的判决。而是，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各国向其公民提供一种符合《公约》中所载的法定诉讼程序规定的司法系统。

4.2 2008 年 6 月 26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案情的意见。它肯定翻案程序是一种特别监督机制，能够对一审和二审法院的诉讼程序已结束的判决进行司法复审。它要核实一个法官的判决的合法性并提供一个机会以考虑在判决(关于案情)或发还再审理令(关于程序)中是否有任何错误。这一法律补救措施并不规定重新考虑一个判决已解决的事项，而是评估结束诉讼程序的判决的下达是否违反法律。在本案中，法院在判决上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它没有正确地掂量证据。

4.3 根据第 553/2000 号法令，对有效判决提出翻案上诉是允许的，这就是为什么检察院于 2000 年 8 月 24 日对波哥大高级法院 2000 年 6 月 15 日的判决提出了这样的上诉。同时，向宪法法院提出了公诉，要求审查第 553 号法令的各项条款、包括允许对有效判决提出翻案上诉的条款是否符合宪法。在第 C-252 号裁决中，法院裁定这样的上诉违反法定诉讼程序。

4.4 根据宪法第 235 条，最高法院可担任翻案法院。翻案程序是一种特别监督机制，可以对一审和二审法院诉讼终结后的判决进行司法复审。根据第 553 号法令和它所取代的法律，在一项判决违反了实质性法律的某条规则的情况下翻案上诉被视作是可受理的，而那种违反可能是在证据评估中的错误造成的——如本案的情况那样。这一法律补救措施不允许对在一审和二审法院中已经审理过的事项进行复审，而是允许对结束审理程序的判决的下达是否违反法律进行评估。因此，翻案程序与一审和二审法院的程序并不是脱离的。

4.5 鉴于如宪法法院的判决中所隐含的那样，关于相关法律不符合宪法的裁定是将来适用的，宣布某个法律条款——当时翻案上诉可受理的依据——不可执行没

有任何理由影响该上诉的审理或阻止最高法院下达判决。缔约国指出，正如委员会所指出的，国内法律的解释首先是相关缔约国的法院和当局的事情。

4.6 先不说提交人希望委员会充当四审法院这一事实，他没有证明最高法院刑事庭的法官有失公正或任何程序上的异常，也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理由让人相信对他的定罪不公平。没有证据证明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1款。

4.7 关于提交人声称他的推定无罪权利没有受到尊重，缔约国指出，推定无罪限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扩大到翻案审理。在这样的审理中，被告并不是再次受审，而是审查判决的合法性。此外，提交人已被通知翻案上诉已经提出，他有机会提出申辩，并且他的申辩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正式审理。提交人直到提出翻案上诉前一直被推定无罪，但未能证明司法系统或司法官员的行动如何导致他在被定罪前受到如同犯罪的待遇。

4.8 关于所指称的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7款，缔约国指出，虽然翻案上诉提出时有有效的法律允许对有效的判决提出翻案上诉，但“有效”一词这种判决是不可被质疑或推翻的。根据第553/2000号法令，对这一判决——即使它是“有效”的——提出的翻案上诉是可受理的，并允许在二审法院宣布有效判决后30天内可对判决提出上诉。鉴于法律规定对有效判决提出的翻案上诉是可受理的，这种判决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确实，在哥伦比亚一个判决的有效性可以由于其他行动的结果而被取消，例如，要求复审的请求或法律保护，而这些如同当时的翻案上诉一样也是为了避免不公平的审判或与宪法或法律背道而驰的有效判决。因此，翻案程序显然是一种旨在确保合法性的监督机制，可合法地应用于二审刑事法院下达的判决。因此，不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7款的情况。

4.9 关于所指称的违反《公约》第十五条，缔约国反驳说，提交人被定罪是因为其行为在当时是构成违法的。提交人并没有重判，尽管规定更重处罚的新法律(第599/2000号法令)在翻案判决下达时已经生效。适用的法律是事情当时有效的法律，在判决上更宽大。因此，缔约国是遵守了《公约》第十五条的。

4.10 关于所指称的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缔约国否认提交人受到歧视性待遇。它对当时有效的法律的应用是前后一致的，其中规定对有效判决可以提出翻案上诉。一旦第C-252号判决宣布后，缔约国在适用对有效判决翻案的特别补救上也是前后一致的。因此，没有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

####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意见的评论

5.1 2008年9月4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2 提交人重申他在一开始就提出的论点。他指出，他对相关司法裁决和程序的分析旨在说明是如何违反《公约》相关条款的，绝不是为了寻求在本国法院之外诉诸另一个或上一级的法院。

5.3 据提交人称，缔约国所谓的最后判决的执行状在翻案中可放在一边的说法不合逻辑。《公约》、国内立法、国际判例或国内判例都没有将这一操作特点作

为翻案补救做法的特点。能推翻有效判决的只有两种行动：司法复审和 *tutela* (法律保护)或 *amparo* (宪法权利保护令)。这些行动旨在在执法中确立实质性真相和坚持个人的基本权利。

5.4 关于第十四条第 2 款，提交人坚持认为他的推定无罪已转化成了凭借普通的审判最终由有效判决判定无罪这一证据确凿的事实。

5.5 关于第十四条第 1 款，提交人称，缔约国将翻案上诉与对翻案裁决的上诉混为一谈了。前者是 2000 年 8 月 24 日根据允许对有效判决提出翻案上诉的第 553/2000 号法令提出的。而翻案裁决则是 2005 年 7 月 21 日下达的，那是宪法法院以有效判决的翻案违反基本权利(从而违反《公约》)为理由而将其从法律制度中取消多年以后的事。他重申，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庭就翻案上诉进行裁决时，它并没有资格这样做，因为它应用的是不能执行的法律条款，因此违反了《公约》中所规定的全部基本权利。一般而言，除非判决书具体说明有其他情况，或适用较轻的刑事法规的追溯效应原则，否则裁定某个法律违宪它必定有预期效力。

5.6 关于第十四条第 7 款，提交人重申他的观点，即，在翻案中有效判决是不可推翻的，并且立即适用实质性的诉讼规则。提交人摘引了第 C-252 号裁决的话，即，“翻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司法质疑，用于使实体法生效，恢复诉讼参与者的基本权利和平反冤案。因此，对于这些目的，这成了最合适、最有效的补救措施，但条件是它必须在二审法院裁决之前实行，因为这一补救措施是确定裁决的合法有效的手段，而只有在同一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才有可能这样做。”

5.7 关于第十五条，提交人坚持认为缔约国的指称不适当、不合逻辑，并提及他在初次来文中提出的观点。关于第二十六条，他肯定，不管诉讼的结果如何，平等在于没有歧视地应用最有利的法律原则。在二审法院维持定罪的情况下，翻案诉讼程序应根据那条原则进行。同样理由，当被告已被该法院判决无罪，该法院就应拒绝审理它。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来文应被视为不可受理，因为委员会不可对国内法院已经审查和决定的事实进行评估。但是，委员会发现提交人申诉的目的并不是要委员会重新评估国内法院已经审查过的事实和证据；他们只是如下文所阐述的对某些程序性事项是否符合《公约》提出疑问。

6.4 关于所指称的违反第十四条第 1 和 2 款、第十五条和第二条第 1 和 3 款，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只是一般性地援引这些条款，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证明其申诉，即，所指称的事实构成对这些条款的违反。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由于证据不足，所以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关于违反第二十六条的申诉，即，大意是在诉讼期间没有坚持平等原则，委员会发现在提交人提交的来文的资料中没有证据证明在该条规定的标准方面有歧视。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一申诉为受理目的没有证据证明，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决定其也不可受理。

6.5 提交人称自己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7 款的受害人，因为他由于翻案诉讼程序为已在一审和二审中被宣判无罪的同一行为再次受到审判。委员会认为，根据案件卷宗中的资料，翻案上诉并没有构成新的审判，而是针对提交人的始于 1998 年的诉讼程序的一个进一步的阶段。那个上诉是于 2000 年根据当时生效的法律要求提出的。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为其申诉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其不可受理。

6.6 关于提交人所称的违反第十四条第 5 款，委员会认为已有足够证据证明缔约国没有对国内补救办法已被用尽的断言提出质疑，以及受理的其他要求也已被满足。因此，委员会认为这一申诉可受理并着手根据案情进行审议。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提交人指出，在他被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宣布无罪后被最高法院在翻案判决中定罪，从而造成对《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的违反。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交了若干法律保护申请，包括向宪法法院，其中他对最高法院在他的案子中提起翻案诉讼程序的管辖权提出质疑。然而，委员会认为，为第十四条第 5 款的适用目的，这些诉讼程序是不相关的，因为它们的目的不是决定控告提交人的刑事罪名。

7.3 委员会忆及其判例，大意是第十四条第 5 款保证定罪得到复审的权利。<sup>2</sup> 委员会在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违反第十四条第 5 款的情况不仅包括一审法庭判决如果是终审的，而且还包括在下级法院宣布无罪后较高级法院不能根据国内法复审上诉法院或终审法庭的定罪。”<sup>3</sup>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提交人受到波哥大第三特别刑事巡回法院的审判和判决无罪。公诉人针对这一判决向波哥大司法区高级法院提出上诉，被该法院维持初审法院的原判。随后，检察官向最高法院提出翻案上诉，其中指出了高级法院在证据评价上的所谓错误。最高法院

<sup>2</sup> 第 1095/2002 号来文，B.G.V. 诉西班牙，2005 年 7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7.1 段。

<sup>3</sup> 见关于第十四条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在法院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的权利和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CCPR/ C/GC/32)，第 47 段。

宣布高级法院的判决无效并判处提交人，除其他外，5 年监禁。由于这一定罪未被更高一级的法院复审，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的情况。

8.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它收到的资料显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其中包括对他的定罪进行复审和提供足够的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在今后防止类似的违反。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领土内或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F. 第 1750/2008 号来文，Sudalenko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Leonid Sudalenko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5 年 3 月 17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没收和部分销毁选举印刷品，侵犯了不受不合理限制地传递信息的权利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法律面前平等；传递信息权；可允许的限制；由合格、独立和无偏倚法庭公平审理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Leonid Sudalenko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50/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以下：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Leonid Sudalenko 先生是白俄罗斯国民，生于 1966 年。他称他是白俄罗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十九条第 2 款行为的受害人。《任择议定书》自 1992 年 12 月 30 日起对缔约国生效。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勋爵、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萨尔塞姆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 2001 年成为联合公民党党员，2002 年担任戈梅利市公共协会“公民倡议”分部主席和“白俄罗斯记者协会”会员，2000 年开始担任在戈梅利开设的“Lokon”公用事业公司法律顾问。

2.2 2004 年 8 月 9 日，在向霍伊尼基第 49 号选区地方选举委员会(地选委)登记后，由 57 人组建了一个签名征集组。他们商定收集选民签名，支持提名提交人为 2004 年国民会议(议会)代表院竞选的候选人。2004 年 9 月 16 日，地选委拒绝提交人作为候选人进行登记。尽管他作为候选人登记遭到拒绝，但提交人继续向其支持者进行“宣传和信息传递工作”，向他们通告不让他按候选人资格登记的原因，并且发表他本人对该国即将到来的政治竞选事件的见解。

2.3 2004 年 10 月 8 日，当他驱车前往霍伊尼基镇时，他的私有小汽车遭到交警的拦截，以他乘坐的是被盗小汽车为由进行了搜查，并展开调查。提交人被解送到霍伊尼基地方内务部。此时，他的下列一些印刷品被收缴：(1) 题名为“致亲爱的同胞们！”(479 份)传单；(2)《人民意愿报》刊登的一篇文章(479 份)影印件，和(3) 题名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五个步骤”(479 份)传单。

2.4 2004 年 10 月 10 日，提交人与其签名征集组长 N.I 先生在分发印刷品时，一起遭到霍伊尼基警官的拘留。此次，提交人又被押送到了霍伊尼基内务部，上述第 2.3 段所列三类印刷品，各 310 份一并被收缴，同时还有 310 份《周刊》报的影印件。

2.5 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提交人就他遭任意拘留和没收印刷品的做法，向霍伊尼基区检察院提出了申诉。2004 年 10 月 15 日，霍伊尼基地方检察官通告提交人，被没收的材料不符合《关于新闻和其它大众媒体法》第 26 条的规定，而提交人的行为隶属受 1984 年《白俄罗斯行政犯罪法》第 8 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非法制作和分发大众媒体制品)规定的制约范围。<sup>1</sup> 霍伊尼基区法官还向他通告，2004 年 10 月 13 日，霍伊尼基地方内务部将其根据《行政犯罪法》第一部分第 234 条第 2-2 条展开的调查结果报送了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代表院，以便地方代表院就他与 N.I 先生问题形成一份行政报告。

2.6 2004 年 11 月 9 日，霍伊尼基地方行政委员会的一位行政官员起草了一份行政报告，阐明提交人因非法散发违背《新闻和其它大众媒体法》第 26 条规定编制的印刷品，犯有《行政犯罪法》第 8 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所列的行政罪。这份报告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转送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

2.7 2004 年 11 月 18 日，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审查了 2004 年 11 月 9 日关于提交人的报告，并判定他犯有《行政犯罪法》第 8 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所列的罪行。提交人被责令支付 144,000 卢布(六个基线数额)<sup>2</sup> 的罚款。

<sup>1</sup> 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白俄罗斯新颁布的《行政犯罪法》更替了 1984 年的《行政犯罪法》。

<sup>2</sup> 约 66.2 美元或 51.1 欧元。

法庭还下令没收和销毁每类被收缴印刷品的“一份拷贝”。法庭得出结论，在既未与编辑部或出版社签订契约，又无任何其它法律理由的情况下，擅自影印《人民意愿报》2004年9月2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进行分发，提交人犯下了违法散发大众传媒制品的行为。此为终裁且可执行的裁决。<sup>3</sup>

2.8 提交人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就2004年11月18日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的裁定，向戈梅利区法庭和最高法庭提出了上诉，要求履行监察复审程序。提交人指出，他向最高法庭提交了《人民意愿报》总编辑2004年12月3日信函的拷贝，函件阐明该报编辑部不反对提交人拷贝报刊发表的文章。然而，2月10日戈梅利区法庭庭长和2005年3月31日最高法庭副庭长则分别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上述两法庭均认定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2004年11月18日的裁决符合法律，且论据确凿。

## 申诉

3.1 提交人宣称，恰恰与《公约》所列的第十四条第1款相反，他在法庭面前的平等权和得到合格、独立和无偏倚法庭的公平审理权遭到了侵犯。他尤其指出：

(a) 判定他有罪所依据的《行政犯罪法》第8部分第172条第1款规定，追究“非法印制和分发大众媒体制品”的责任。<sup>4</sup> 依据《新闻和其它大众媒体法》第10部分第1条，对“大众媒体制品”一词的解释是，全部或部分传播“定期印制发表的作品”，<sup>5</sup> 播放一段电台、电视、新闻影片作品；全部或部分播放电台或录像节目。同一法律第2部分第43条规定，当法律与白俄罗斯作为缔约国的国际条约之间产生冲突时，应以遵从国际条约为优先。因此，提交人宣称，法庭在评估他2004年10月8日至10日的行为时，本应按《公约》第十九条规定来评判，对他的制裁是否系属“为维护他人的权利或声誉，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众的健康和道德”采取的必须举措；<sup>6</sup>

(b) 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未采取任何措施确定，为何提交人必须就《人民意愿报》公开发表的报章与编辑部或出版社签订一项契约，才可拷贝该报某期刊登的文章。法庭未明确提交人若不签订这样的契约会如何不利地贬损对他权利或声誉的尊重，有损于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乃至对公众健康和道德的保护；

(c) 《行政犯罪法》第8部分第172条第1款的惩处部分内容并未规定，没收和销毁每类被收缴印刷品的一份拷贝；

<sup>3</sup> 根据《行政犯罪法》第266条，法庭对行政案的裁决为终决，并且不得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提出上诉。然而，上级法庭或司法机构的首席法官可通过监察复审程序推翻此项裁决。

<sup>4</sup> 提交人的来文再次予以强调。

<sup>5</sup> 同上。

<sup>6</sup> 同上。

(d) 法庭除了关于《人民意愿报》文章的拷贝之外，根本未评估提交人关于分发印刷品的行为。然而，法庭则下令没收和销毁每类被收缴印刷品的一份拷贝。法庭并未评判提交人 2004 年 10 月 8 日采取的行动，而据霍伊尼基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报告称，当初他还非法散发了大众媒体的产品。

3.2 提交人还宣称，依《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规定他应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因为任意没收了与竞选相关的印刷品，尤其侵犯了他传递信息的权利，而且缔约国并未阐明限制这项权利的必要理由。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5 月 2 日，缔约国发来的普通照会就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发表了意见。缔约国确认，2004 年 11 月 18 日，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查实提交人犯有《行政犯罪法》第 8 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所列的行政罪，并责令他支付 144,000 卢布(六位基数额)的罚款。2004 年 11 月 9 日的行政报告还载明，提交人违背《新闻和其它大众媒体法》，散发非法印制的报刊拷贝和传单。此外，提交人并未否认他参与了印制和散发所述印刷品。因此，法官基于向他出示的证据裁定，对提交人犯有行政罪的判决证据确凿。

4.2 缔约国说，《行政犯罪法》第 238 条规定可将罪犯带往警署编写行政报告。根据上述法律第 28 和 244 条，构成行政犯罪的直接物证可予以收缴，继而没收。因此，为编写行政报告将提交人带往警署，以及收缴并随之没收构成行政犯罪直接物证的印刷品系属合理合法之举。缔约国还说，戈梅利区法庭的裁决和最高法庭驳回提出的上诉是符合法理之举，而且他并未就针对他提出的行政起诉，向总检察厅提出申诉。

4.3 据缔约国称，《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阐明，可对行使本条第 2 款所列各项权利设置一些限制。因此，《新闻和其它大众媒体法》确定了一个印制和散发大众媒体制品的程序。《行政犯罪法》第 172 条第 1 款规定，一旦当提交人采取了所述行为，即应就违反所述程序承担责任。缔约国的结论认为，针对提交人非法印制和散发大众媒体制品的行为提出行政起诉，并不违背《公约》规定，因此，并未侵犯提交人受《公约》保障的各项权利。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2 月 22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的意见发表了评论。他指出，缔约国宣称他违反了《行政犯罪法》规定，系为限制他传递信息权所作的狡辩。在引述了白俄罗斯宪法确认普世公认国际法原则的最高地位并阐明白俄罗斯法律必须遵循国际法原则的第 8 条第 1 款规定之后，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援用国内法规定为该国内不遵循《公约》要求的辩护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还提及国内法融入的《国际条约法》第 27 条“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以及国内法与依据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6 和 27 条须恪守既定条约之间的关联关系。

5.2 提交人说，就他的案情而论，限制他的传递信息权，并不是一项符合《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所列的合法理由，因此，违背了与《公约》第二条一并解读的第十九条第 2 款规定。

5.3 提交人重申他关于据称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行为的申诉，并且还说，委员会就白俄罗斯第四次定期报告(CCPR/C/79/Add.86)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关切地注意到，针对所有各级法官的任期、整束和解职等程序并未遵循司法机构独立和公正的原则(第 13 段)。<sup>7</sup>

5.4 最后，提交人说，他本人之所以没有行使向总检察厅提出上诉权的原因是，既然上诉不会促使法庭复审案情，因此构不成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他提醒地指出，依据委员会的案例，人们不仅必须援用无遗既有，而且还得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

###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6.1 2009 年 9 月 4 日，缔约国发来普通照会阐明，依据《行政犯罪执行法》第 12.11 条，控方可就法庭判定某人犯有行政罪的裁决提出反对。同时可就业已生效的可执行裁决提出反对。缔约国还说，2008 年，检控机构在行政诉讼框架内总共收到 2,739 起申诉；其中 422 起案的控方获得胜诉裁决。2008 年，最高法院庭长在行政诉讼框架内，基于总检察厅提出的反对意见，具体推翻了 146 项法庭裁决。缔约国还说，2006 年通过监察复审程序，撤销了 427 项裁决，修改了 51 项裁定。2007 年，分别撤销和修订了 507 和 30 项裁决，而 2008 年分别为 410 和 36 项。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提交人宣称的总检察厅所设立申诉机制无效之说系属无稽之谈。

6.2 缔约国还说，白俄罗斯宪法保障法官享有履行司法的独立性、不可撤换且享有赦免，并禁止任何干预行政司法的行为。《司法体制和法官地位法》还规定了对独立行使司法的法律保障。根据宪法第 110 条，法官拥有独立性，仅受法律的约束，对实施司法的任何干预既不被准许，且可受惩处。<sup>8</sup> 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提交人关于白俄罗斯法官缺乏独立性和带有偏向性的宣称，是他本人的臆想妄念，并不符合缔约国的法律与实践。

### 提交人的进一步意见

7.1 2011 年 2 月 16 日，提交人重申了他先前的论点，宣称在法庭下达了关于某人犯有行政罪的裁决业已生效执行之后，允许控方提出反对，履行监察复审的程序并无成效。他还说，缔约国未具体阐明，该国提供的统计数据是否包括任何撤销或修改因个人行使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或因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遭行政迫害

<sup>7</sup> 提交人还提及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Dato' Param Kumaraswamy，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0/42 号决议，提交的对白俄罗斯的走访报告，E/CN.4/2001/65/Add.1。

<sup>8</sup> 缔约国还列出了《司法制度和法官地位法》所载的关于司法机构独立性的若干具体保障。

案的数字。提交人说，过去十年来，未听说过总检察厅对任何案件提出过反对意见，要求撤销就公民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他说，是否履行监察复审程序系属有限几位高层公务官员，诸如总检察长和最高法庭庭长等掌握的酌情处置权。即使准予履行监察复审，亦不会举行庭审，仅允许提出法律问题。此外，缔约国的法律不准个人向宪法法庭提出上诉。因此，提交人宣称，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的规定，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已援用无遗。

7.2 提交人还说，缔约国未解决他就《公约》第十四条第1款提出的任何具体诉求。此外，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虽未就须如何处置2004年10月8日至10日从提交人手中收缴的其余印刷品下达过裁决，<sup>9</sup>然而，他仍不知道这些材料最终的结局如何。提交人还说，2004年11月18日，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的法官仅根据国内法下达了裁决，并未考虑缔约国依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提交人引述了委员会关于Park诉大韩民国<sup>10</sup>的案例，以佐证他的论点证明，缔约国须首先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远高于执行国内法。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93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的规定，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提交人未针对他提出的起诉向总检察厅提出申诉，尤其注意到控方还可就有关业已生效执行的裁决提出反对。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提交人解释称，他已援用无遗一切国内现有补救办法，并称他之所以未向总检察厅提出申诉，因为监察复审程序不构成有效补救办法。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向最高法庭提出了上诉，但法庭维持了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的裁决。为此，委员会回顾其案例，据此，针对法庭判决业已生效的监察复审程序构成了上诉的例外措施，此措施取决于法官或检察官的酌处权，并仅限于法律问题。<sup>11</sup>由鉴于此，委员会认为为了受理的目的，此点并不阻碍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对来文的审理。

<sup>9</sup> 提交人述及下列印刷品：(1) 题名为“致亲爱的同胞们！”(789份)传单；(2)《人民意愿报》刊登文章(789份)影印件，和(3)题名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五个步骤”(789份)传单。

<sup>10</sup> 第628/1995号来文，Park诉大韩民国案，1998年10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10.4段。

<sup>11</sup> 见，例如，第1537/2006号来文，Gerashchenko诉白俄罗斯案，2009年10月23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6.3段；第1814/2008号来文，P.L.诉白俄罗斯案，2011年7月26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6.2段；第1838/2008号来文，Tulzhenkova诉白俄罗斯案，2011年10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8.3段。

8.4 至于提交人依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申诉首先直接涉及那些隶属《公约》第十九条所列问题，即：提交人的传递信息权。委员会还注意到，这并不妨碍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受理申诉，并宣布申诉可受理。既然得出了可受理的结论，委员会决定不分开审议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sup>12</sup>

####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经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9.2 委员会需审理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提交人案件援用《行政犯罪法》第 8 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是否造成了没收和部分销毁下列各类竞选相关材料：(1) 题名为“致亲爱的同胞们！”(789 份)传单；(2)《人民意愿报》刊登文章(789 份)影印件，和(3) 题名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五个步骤”(789 份)传单，以及随后的罚款是否构成第十九条第 3 款含义所指，对提交人传递信息权利的限制。委员会注意到，《行政犯罪公约》第八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确立了非法印制和分发大众媒体制品要承担的行政罪责。委员会还注意到，自缔约国设立了“审理印制和分发大众媒体制品程序”以来，缔约国实际上为行使《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保障的传递信息自由设置了障碍。<sup>13</sup>

9.3 因此，第二个问题是，本案所述的这些障碍是否属《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允许的某种合理，但仅仅依法规定的必要限制：(a) 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声誉；和(b)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健康或道德。委员会回顾其关于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的第 34 (2011)号一般性意见。据此，见解和言论自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分割的条件；这是任何社会的基本必要条件；并且成了构筑每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石。<sup>14</sup> 对见解和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必须遵循符合出于必需和相称程度的严格标准，并且“必须只可按为此目的所确立的规定适用，并且必须与限制所规定的必要性直接相关”。<sup>15</sup>

9.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辩称，《行政犯罪法》第 8 部分第 172 条第 1 款对他不适用，因为 2004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他散发的印刷品并不构成《新闻和其它媒体制品法》第 10 部分第 1 条含义所指的“大众媒体制品”，因此，处罚是不合法的，并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十九条的行为。为此，委员会注意到：第一，关于提交人被收缴的与竞选相关印刷品是否属于按《新闻和其它媒体制品法》的规定，是否为必须受“大众媒体制品印制和分发程序”管辖的“大众媒体制品”，提交人与缔约国之间存在着分歧。提交人尤其驳斥了必须遵照规定与某

<sup>12</sup> 见第 1377/2005 号来文，Katsora 诉白俄罗斯，2010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sup>13</sup> 第 780/1997 号来文，Laptsevich 诉白俄罗斯，2000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1 段。

<sup>14</sup>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6/40(Vol. I))附件五，第 2 段。

<sup>15</sup> 同上，第 22 段。



家报刊编辑部或出版社事先签订契约协议，然后才可分发某报刊所发表文章影印件的说法；第二，委员会注意到，从案卷载述的材料来看，戈梅利区霍伊尼基地方法庭仅以未与《人民意愿报》编辑部或出版社达成契约协议为据得出的调查结论。

9.5 委员会认为，即使依据国家法律可以对提交人进行制裁，但缔约国尚未提出任何理由可说明为何惩罚是《公约》第十九条第3款所列某个合法目的的必要之举。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解释为何，若违背与报刊编辑部或出版社事先签订契约协议而后可分发某期报刊所发表文章的规定，就必须受到制裁，并没收和部分销毁所述传单。最后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向戈梅利区法庭和最高法庭提供了《人民意愿报》总编辑2004年12月3日信函的影印件，阐明该编辑部并不反对提交人拷贝该报刊发表的文章。委员会得出结论，在缔约国未给予任何相关解释的情况下，限制提交人行使传递信息的权利，不可被视为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声誉的必要之举。因此，委员会认为，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2款规定，本案提交人应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白俄罗斯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第2条。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包括退还因2004年11月情况，对提交人处以罚款的数额和所承担的任何法律费，以及赔偿。缔约国也有义务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违约行为。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以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在缔约国境内广为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G. 第 1755/2008 号来文, El Hagog Jumaa 诉利比亚  
(2012 年 3 月 19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

提交人: Ashraf Ahmad El Hagog Jumaa  
(由律师 Liesbeth Zegveld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利比亚

来文日期: 2008 年 1 月 7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提交人遭受酷刑, 在不公正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程序性问题: 指控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酷刑、不公正审判、任意拘捕和拘押; 不公正审判后判处死刑

《公约》条款: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Ashraf Ahmad El Hagog Jumaa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55/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 Ashraf Ahmad El Hagog Jumaa 是巴勒斯坦裔保加利亚公民, 1969 年 10 月 25 日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他声称因利比亚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四条而成为受害者。他由 Liesbeth Zegveld 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5 月 16 日对缔约国生效。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艾哈迈德·阿明·法塔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本意见附有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签署的个人意见(部分反对)。

1.2 2008 年 4 月 17 日，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决定将来文的可受理性与来文案情分开审议。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在 2007 年 7 月 24 日抵达保加利亚之前是巴勒斯坦裔的无国籍人。此前，他和家人自 1972 年 9 月 4 日起一直居住在利比亚。本案所涉事件一开始时，提交人是利比亚班加西大学的医科毕业生。他自 1998 年起在班加西的阿里法塔儿科医院担任实习医生。

2.2 1999 年 1 月 29 日，提交人被捕。他被指控预谋杀人，以及因向阿里法塔儿科医院的 393 名儿童注射艾滋病毒而导致病毒蔓延。

2.3 提交人声称在审讯时遭严刑逼供，故而屈打成招。据称使用的酷刑方式包括：将他赤裸裸地绑在铁窗上，多次电击腿、脚、手和胸部；打脚底板；绑住手吊起来；让他感到窒息和被勒住；靠手臂挂在半空中；蒙上眼睛威胁放狗咬；殴打；注射药物；不让睡觉；剥夺感官；用滚水或冰水淋浴；关在极为拥挤的牢房里，用强光刺眼睛。提交人声称遭到肛交强奸。他认罪导致一系列人员，特别是在利比亚的保加利亚医务工作者被捕。

2.4 1999 年 2 月 9 日，利比亚警方逮捕了在班加西多家医院，包括阿里法塔儿科医院工作的 23 名保加利亚公民，没有告知逮捕原因。其中 17 人于 1999 年 2 月 16 日获释。据称，提交人及共同被告的五名保加利亚护士<sup>1</sup>被连续折磨了近两个月。他们认罪后，酷刑频率降低，但仍然持续。1999 年 2 月 9 日被捕的五名护士之一——Kristyana Valcheva 从未在阿里法塔儿科医院工作过。

2.5 1999 年 5 月 15 日，此案转交检察院，指控提交人和五名共同被告人侵犯利比亚主权，出于破坏国家安全之目的导致肆意杀害平民(死罪)，密谋并串通犯下上述经策划的罪行；通过向阿里法塔医院的 393 名儿童注射艾滋病毒，蓄意造成病毒蔓延(死罪)；通过向儿童注射艾滋病毒，使用致命物质预谋杀人(死罪)；做出违反利比亚法律和传统的行为(例如非法造酒，在公共场所饮酒，非法外汇交易和非法性关系)。在 1999 年 5 月 16 日，即在他们被捕后约四个月，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第一次被带到检察院。此后，他们每 30 至 45 天见一次检察官。

---

<sup>1</sup> Kristyana Venelinova Valcheva、Nasya Stoycheva Nenova、Valentina Manolova Siropulo、Valya Georgieva Cherveniyashka 和 Snezhanka Ivanova Dimitrova.

## 初审

2.6 2000 年 2 月 7 日，人民法院<sup>2</sup>开始审理此案。2000 年 2 月 17 日，即开庭后 10 天，提交人首次获准与律师见面。当时，他在法庭上提出了酷刑指控。他一直没有机会与律师自由交谈，因为国家代表一直都在场。2001 年 3 月 20 日，提交人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送进医院，住院了 25 天。2001 年 6 月，他的两名共同被告人<sup>3</sup>撤回了供词，声明供词是在酷刑下作出的。随后，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提出了“无罪”申诉。他们的供词以及国家元首关于被告人为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摩萨德特务的指称被视为本案的基础。

2.7 最初，由于法庭没有收集到证明他们犯下颠覆国家罪的充分证据，暂停审理针对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的刑事案件。2002 年 2 月 17 日，人民法院不再受理此案，转交给作为普通刑事司法系统一部分的刑事检察厅。检察官撤回了颠覆国家罪指控，提出了非法药物实验和导致 426 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新指控。<sup>4</sup> 整个期间，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一直被拘押。

## 二审

2.8 2002 年 8 月，班加西上诉法院起诉庭维持了刑事检察厅检察官提出的指控，并将此案转交普通刑事法院——班加西上诉法院。起诉基于提交人及一名共同被告人<sup>5</sup>的供词，以及对另一名共同被告人住所的搜索结果，<sup>6</sup>警方在搜查中发现了五瓶被污染的血浆。二审于 2003 年 7 月开庭。Luc Montagnier 教授和 Vittorio Colizzi 教授担任指定专家。2003 年 9 月，这两位教授作证阿里法塔医院的血浆样本是在 1997 年被感染的，比指控的事实早两年，而且是在提交人进入该医院一年以前。专家认定感染原因不详，并非蓄意感染。这种院内感染<sup>7</sup>是由非常特别的、极具感染性的病毒株引起的，是卫生条件差和失职造成的。<sup>8</sup> 2003 年 12 月，法庭指定了第二个专家小组，其中包括五名利比亚医生。2003 年 12 月 28 日，第二个专家小组否定了前两位知名教授提出的调查结果，他们指出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并不是院内感染造成的，也不是重复使用受感染医疗器械造

<sup>2</sup> 审理危害国家罪的特别法院。

<sup>3</sup> Kristyana Valcheva 和 Nasya Nenova。

<sup>4</sup> 在向提交人宣读的指控中，受感染儿童人数从一审的 393 人上升到二审的 426 人。

<sup>5</sup> Nasya Nenova。

<sup>6</sup> Kristyana Valcheva。

<sup>7</sup> 提交人明确指出，院内感染指在病人在进入医院时没有，在医院或类似医院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时引起的感染。

<sup>8</sup> 见“Luc Montagnier 教授和 Vittorio Colizzi 教授就利比亚班加西阿里法塔医院艾滋病毒院内感染问题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交的最后报告”(巴黎，2003 年 4 月 7 日)，结论为“没有发现任何蓄意注射含艾滋病毒的材料(生物恐怖主义)的证据。按照住院时间对血清阳性反应数据和分子分析结果进行的流行病学分层研究，完全排除了这一可能性。”(第 21 页)。

成的，而是故意的行为。被告要求进行进一步的专家鉴定，但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要求。

2.9 2004 年 5 月 6 日，班加西上诉法院以造成 46 名儿童死亡、380 名儿童被感染为由，判处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死刑。在阿里法塔医院工作的九名利比亚人也被指控犯有同样罪行，但在诉讼一开始就被保释，审前也未还押。他们被无罪释放。关于被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指控实施酷刑的八名利比亚安全人员，法院放弃了管辖权，将案件转回检察院。2004 年 7 月 5 日，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就法律问题向利比亚最高法院上诉。检察官要求法院撤销死刑判决，将此案送回班加西上诉法院重审，原因是在逮捕和审讯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时存在“不当”。几经推迟后，最高法院撤销了班加西上诉法院的判决，并于 2005 年 12 月 25 日将此案送回的黎波里上诉法院重审。法院拒绝保释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理由是没有充分保障确保他们将再次出庭受审。

### 再审和释放

2.10 2006 年 5 月 11 日，的黎波里上诉法院再次审理此案。检察官再次要求判处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死刑。提交人再次辩称无罪，并重申他是屈打成招。2006 年 12 月 19 日，再次判定提交人有罪并判处死刑。法院指出由于另一法院已驳回酷刑指控，它不能重新审查这些指控。

2.11 2006 年 12 月 19 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2007 年 7 月 11 日，最高法院举行听证，尽管本应在接到上诉后三个月内举行听证。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资料，法院只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为期一天。结果是维持对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的死刑判决。2007 年 7 月 17 日，高等司法理事会宣布根据与受害者家属达成的赔偿协定，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根据利比亚与其他国家政府的谈判结果，提交人于 2007 年 7 月 24 日被送到保加利亚服刑，一到达保加利亚后就立即被赦免并释放。

2.12 提交人自 2000 年以来提出的酷刑指控没有得到应有的迅速、彻底的调查。2001 年 6 月，两名共同被告人<sup>9</sup>撤回了供词，称供词是刑讯逼供获得的，并指认了酷刑实施者。直到 2002 年 5 月，刑事检察厅才决定调查此事，并要求出示体检报告。因此，检察官向负责调查的八名安全官员、一名医生和一名口译提出了指控。2002 年 6 月，检察官指定的一名利比亚医生检查了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的身体，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他认为因“身体折磨”和“殴打”造成的伤痕。班加西上诉法院在 2004 年 5 月 6 日的一项裁决中指出，由于罪行并非发生在其管辖范围内，而是发生在的黎波里上诉法院的管辖范围，它无权就此作出裁决。

2.13 2004 年 5 月 7 日，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就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的案件，向缔约国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缔约国就酷刑指控和不公正审判提

<sup>9</sup> Kristyana Valcheva 和 Nasya Nenova。

供资料。他们还要求说明为何没有指控实施酷刑的官员。<sup>10</sup> 缔约国在答复中指出，检察部已将关于警察的案件提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因为只有该法院有权审理此案。的黎波里法院已开始审理关于警察、医生和口译的案件。在审讯中，部分警察承认他们对提交人和部分共同被告人施以酷刑以获得供词。<sup>11</sup> 被告提交了一份专家体检报告，不过体检是在指控事实发生三年后进行的；法院拒绝接受这份报告，理由是据正式指定为专家的利比亚医生称，该检查没有按照正规程序进行，没有发现酷刑痕迹，而且无论如何，指称的酷刑在两至三周后就看不到痕迹了。的黎波里法院于 2005 年 6 月 7 日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嫌疑人。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就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但于 2006 年 6 月 29 日被利比亚最高法院驳回。2007 年 8 月 10 日，国际媒体报导称，穆阿迈尔·卡扎菲总统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曾遭到酷刑。<sup>12</sup>

## 申诉

3.1 提交人指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2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四条。

<sup>10</sup> 见 E/CN.4/2005/7/Add.1, 第 396 至 398 段。

<sup>11</sup> 警察局警犬训练负责人 Salim Jum'a Salim 上校 2002 年 6 月 30 日的证词摘录：

“Harb Derbal 准将下令将嫌疑人 Ashraf、Kristiyana、Nasya、Snezhana 和 Valya 带到刑事调查处审问。[……]审问开始时，他[刑事调查处处长 Harb Derbal]拿来一个带底座的电话机。他想在审问中使用。它能够产生电击效果。审问时，把每个人单独带进来。Harb 准将命令把电线绑在他们的手指上。他下令启动电话机，以便审问嫌疑人。他多次命令我启动电话机。因为是命令，我只好执行。还把嫌疑人蒙上眼睛放在操场上。名为 Ashraf 的嫌疑人被关进笼子，不过笼子里没有狗。审问时没有用到狗。[……]请来一名麻醉师。他名叫 Abduljalil Wafaa。给所有嫌疑人注射了镇定剂。[……]我启动机器的时候，是因为想到我是一名军人。命令我启动机器，我就启动。”

提交人的看守、刑事调查处士官长 Izzudin Mukhtar Saleh Al Baraki 2002 年 7 月 29 日的证词摘录：

“问：你有没有注意到上述嫌疑人身上有任何暴力痕迹？”

答：有，我看到手指间有暴力痕迹。有一次，他正在祈祷，Nwar Abu Za'ainin 中尉叫他过去。中尉在他祈祷的时候推他。他并没有停止祈祷。我挡住中尉以免他继续挨打。我看他[Ashraf]每次受审回来都显得很恐惧。他有时会哭，我看过他流泪。”

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的看守、警察局警犬训练负责人 Salim Jum'a Salim 2002 年 7 月 29 日的证词摘录，审问时他也在场：

“问：你能告诉我们嫌疑人遭到怎样的压力和暴行吗？”

答：Ashraf Ahmad Jum'a、Kristiyana 和 Nasya 被施以电刑。嫌疑人还被关进狗笼里。还逼他们在广场上跑。我知道 Jum'a Al Mashari 用电刑施以暴力。还有 Abdulmajid Al Shawal 和 Harb Derbal 准将也是。审问时，Usama Uwaidat 通常也在场。”

<sup>12</sup> 赛义夫·伊斯兰曾在采访中指出：“是的，他们遭到电击，还威胁将他们的家人作为目标。不过，那名巴勒斯坦医生指称的很多内容都是谎言。”

3.2 他指称死刑判决是在不公正和任意的审判后作出的，违反了第六条第 2 款。他认为 2006 年 12 月 19 日作出的判决以及最高法院 2007 年 7 月 11 日维持该判决的裁决都是极为不公平和任意审判的结果。他援引委员会判例及其第 6 号一般性意见，认为对他施以多处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不公正审判，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2 款。<sup>13</sup> 虽然后来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但不应免除缔约国在该条款下的义务。提交人强调，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是因为向受感染儿童家属提供了巨额赔偿，且欧洲联盟、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施加了很大压力。

3.3 提交人声称他遭到酷刑和被麻醉。他指出，陈述的事实(已得到体检报告和证人证词的确认)清楚地证明了利比亚当局应当为提交人遭到调查人员的酷刑负责；部分酷刑实施者避而不谈或否认更加严重的虐待行为，但是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的体检报告戳穿了他们的谎言。虽然医生无法确认强奸和电击的确切时间，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提交人刚被拘留时身体不好。他强调不应单由他承担举证责任。<sup>14</sup> 他一有机会马上提出了申诉，但是隔离监禁八个月后才被带上法庭。当时他身上有明显的酷刑痕迹，但是检察官和法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sup>15</sup> 提交人称其遭受的虐待极为严重，而且是为了逼供，必须定性为酷刑。长期对他施以残忍的手段，而且上述许多做法本身就构成了酷刑。<sup>16</sup> 鉴于这些做法以及没有及时、彻底地调查其酷刑申诉，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提交人最后指称，他在整个拘押期间的待遇也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七条的情况。

3.4 提交人认为对他的逮捕和拘留是任意的。根据利比亚法律，提交人本应在被逮捕后 48 小时内带见检察官。然而，直到四个月后，即 1999 年 5 月 16 日，提交人才见到检察官。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当局仍然将他隔离监禁，直到 1999 年 11 月 30 日才最终允许家人探视。因此，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款。此外，据称提交人未被立即告知对他的指控。他在见到检察官时才正式得知对他的指控，而且那时仍然没有律师。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2 款。最后，没有立即让提交人接受“司法当局”审理，事实上，直到 2000 年 2 月 7 日他才第一次出庭。在那之前他只见过检察官，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3 款。

<sup>13</sup> 见第 250/1987 号来文，Carlton Reid 诉牙买加，1990 年 7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0/1996 号来文，Marshall 诉牙买加，1998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6/1977 号来文，Daniel Mbenge 诉扎伊尔，1983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349/1989 号来文，Clifton Wright 诉牙买加，1992 年 7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464/1991 号和第 482/1991 号来文，Peart 和 Peart 诉牙买加，1995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719/1996 号来文，Levy 诉牙买加，1998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

<sup>14</sup> 提交人援引委员会判例，特别是第 1096/2002 号来文，Kurbanova 诉塔吉克斯坦，2003 年 11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以及第 992/2001 号来文，Louisa 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

<sup>15</sup> 提交人援引委员会关于该问题的判例，包括：第 612/1995 号来文，Arhuacos 诉哥伦比亚，1997 年 7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563/1993 号来文，Bautista de Arellana 诉哥伦比亚，1995 年 10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以及第 04/1977 号来文，William Torres Ramirez 诉乌拉圭，1980 年 7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

<sup>16</sup> 提交人在这里提到电击生殖器和肛交强奸。



3.5 提交人指称他被逮捕后遭受的待遇还构成侵犯《公约》第十条权利的情况。他还称，在拘押期间没有获得其健康状况应有的医疗保健，这也违反了《公约》第十条第1款。在他健康突然恶化后，才于2001年3月20日被送进医院。

3.6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其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他被关押了四个月后才得知对他的指控，而且直到2000年2月17日，即开审十天、亦即被捕一整年以后，才为他指派了律师。他因遭受酷刑而被迫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词；他向检察官认罪时没有律师在场；法院在没有提供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接受Montagnier教授和Collizi教授的专家报告，尽管他们的报告足以确定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无罪；警察在对Valcheva女士家进行第二次搜查时“幸运地”<sup>17</sup>发现了五瓶被感染的血浆，而搜查时既没有提交人在场也没有辩护律师在场；那次“发现”<sup>18</sup>存在种种漏洞，加上检察官从未出示搜查记录，而法院本身也将一次搜查与另一次搜查结果混为一谈，证明这一切是捏造的。提交人指称审判还毫无理由地被推迟。<sup>19</sup>提交人称以上均构成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情况。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8年3月24日，缔约国以指控证据不足为由，对来文可否受理提出质疑。缔约国指出，长时间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是为了查明一个涉及450余名儿童及其基本生命权遭受侵犯案件的真相。缔约国认为已按照国际标准为提交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确保其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利比亚民间团体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和驻利比亚的外交使团全程跟踪了诉讼情况。

4.2 缔约国回顾，利比亚公民Mohammed Bashir Ben Ghazi于1998年9月30日向检察部提出申诉，称他儿子14个月大时在班加西阿里法塔儿童医院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是在儿子被转送到埃及接受治疗时得知这一消息的。由于又收到更多申诉，检察部于1998年10月12日展开调查。检察部共收到来自受感染儿童父母的233项申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发布禁止该医院所有外国工作人员出境的禁令。

4.3 司法和公共安全人民委员会部长发布第28/1209号决定，下令调查曾在阿里法塔儿科医院就医的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调查委员会由刑事调查总署署长、总署高级调查人员以及医生组成。委员会自1998年12月9日起开始工作，并最终确定提交人——一名巴勒斯坦医生和五名保加利亚护士为嫌疑人。缔约国解释道，委员会于1999年5月15日结束工作，并向检察院提交了一份载有证据和嫌疑人名单的报告，检察院传唤了嫌疑人。提交人和五名护士承认了罪行。

4.4 缔约国解释道，由于提交人于2002年6月3日向班加西上诉法院提出酷刑指控，起诉庭法官发布了一项决定，委托检察部的一名代表调查提交人的指控。

<sup>17</sup> 提交人首次提交的来文将它放在引号内。

<sup>18</sup> 对瓶内物质的分析是在1999年3月进行的；而搜查Valcheva家是一个月以后的事。

<sup>19</sup> 从1999年1月29日被捕到最高法院2007年7月11日作出最终判决，历时八年多。

检察部自 2002 年 6 月 13 日起接受被告关于酷刑指控的证词。检察部还接受了负责调查儿童感染艾滋病毒情况的委员会的证词。调查结束后，向起诉庭报告了调查结果，起诉庭于 2003 年 7 月 4 日将此案转交班加西上诉法院。法院就此案开庭 20 多次。2004 年 5 月 6 日，上诉法院判处提交人死刑，并裁定针对调查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酷刑指控，该法院没有地域管辖权。

4.5 缔约国解释称，关于酷刑指控的案件已转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2005 年 6 月 7 日，法院作出调查委员会成员无罪的判决。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就班加西上诉法院 2004 年 5 月 6 日作出的死刑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于 2005 年 12 月 25 日作出裁决。最高法院撤销了死刑判决，并将此案转回班加西上诉法院，由另一批法官审理。自 2006 年 5 月 11 日起，新一批法官审理了该案，共开庭 13 次。2006 年 12 月 19 日，法院再次判处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死刑。2007 年 2 月 12 日，被告决定再次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作出判决。

4.6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调查的每个阶段——从一开始接受调查委员会调查，到之后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利比亚最高司法调查机构)，<sup>20</sup> 再后来在检察院，以及决定延长对其预防性拘留的多次法庭审讯期间，都承认参与了犯罪。

4.7 本案司法程序持续时间长，是为了查明真相，确认严重案件的犯罪实施者。这些程序是为了向被定罪者提供充分的保障，使他们能够接受公正的审判，审判过程遵守了所有正当程序标准。缔约国指出，被定罪者有一个律师团队为其辩护。审判是在公开法庭进行的，民间社会和人权组织的许多代表以及驻利比亚外交使团代表均在场。被定罪者通过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第一次，最高法院撤销了死刑判决，并将此案转回班加西上诉法院，由另一批法官审理。新审判小组判定被告有罪，于是被告再次上诉最高法院。这一次，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

4.8 关于酷刑指控，缔约国指出提交人于 1999 年 4 月 11 日接受了负责调查此案的委员会的调查。他承认参与了犯罪。之后，他被带到总检察长办公室，于 1999 年 5 月 15 日接受了就职于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名检察部官员的审讯。提交人详细供认了他与保加利亚护士一同参与犯罪的经过。他并没有提到上述调查委员会对他们施以酷刑。他自始至终向审理此案的所有不同司法部门承认参与了犯罪。直至人民法院宣布无权受理此案，于 2002 年 6 月 3 日将此案转交南班加西一审法院起诉庭时，提交人才告知起诉庭法官他曾遭受酷刑。法官立即委托检察部调查提交人的指控。检察部展开了调查，并接受了提交人、保加利亚护士和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证词。尽管检察部确认这些酷刑指控毫无依据，但还是向调查委员会成员提出了指控。法院审理了此案，并于 2005 年 6 月 7 日作出了调查委员会成员无罪的判决。

<sup>20</sup> 缔约国提供了一份提交人的详细供词。



4.9 缔约国回顾，被定罪者在关押期间，外国组织和外交使团成员共探视 115 次。司法部长发布了指示，在提交人被关押期间，允许提交人家属每周日探视。还允许保加利亚的一个律师团队参与为被告辩护。

4.10 关于提交人就班加西上诉法院 2006 年 12 月 19 日判决向利比亚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抗辩，缔约国指出最高法院答复了提交人就上诉法院判决提出的所有抗辩。<sup>21</sup>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8 年 7 月 2 日，提交人重申来文可以受理。他补充道，正如首次提交的来文中解释的，在酷刑申诉和对不公正审判的指控方面，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他指出，缔约国没有说他未用尽补救办法。此外，他刚被送到保加利亚，缔约国就让他签署了一份保证不对缔约国启动诉讼程序的文件。

5.2 关于缔约国所说的指控证据不足，提交人认为他已经证实并全面陈述了缔约国对其《公约》下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意见只是一味地否认，并没有在法律上准确陈述逮捕和拘留提交人的情况。提交人忆及，他被隔离监禁 11 个月，而那种牢房通常是关押死刑犯的。房间只有 10 平方米，没有电和自来水。

5.3 提交人驳斥了缔约国关于他在据称遭受酷刑四年后才提出申诉的说法。他从被隔离监禁(1999 年，持续了 10 个月)一开始，就不断声称曾遭到酷刑。1999 年 12 月 31 日，他的家人获准探视，他告诉他们遭到了酷刑。当时，他的家人请了一名律师，多次提出指控。提交人在法庭上多次昏厥后，法官才最终答应提交人律师的请求，送提交人去医院，他住院了 25 天。在整个审讯期间，法官都拒绝研究提交人及五名护士提出的酷刑指控。在一些报告中，已确认提交人及五名护士遭到了酷刑。刑事调查小组的部分成员也承认了曾对提交人和五名护士施以酷刑，或称目睹他们遭受酷刑。安全警察局副局长称，酷刑对提交人和五名护士认罪有直接影响；实施酷刑的 25 名官员中，有 10 人被起诉。

5.4 提交人解释道，1999 年至 2007 年被拘留期间，他大多数时候是被隔离监禁的。从 2004 年 5 月 6 日判处死刑到被释放，都不允许他见辩护律师。他还称一名高级官员叫他全部供认据称犯罪行为，说这样可以获释。

### 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6.1 2009 年 10 月 5 日，委员会第九十七届会议审议了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sup>21</sup> 利比亚最高法院 2007 年 7 月 11 日的判决完全维持了班加西上诉法院 2006 年 12 月 19 日的原判。最高法院重点指出提交人及共同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证词前后矛盾，他们时而承认审讯期间作出的供词，时而否认这些供词。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以指控证据不足为由，质疑提交人申诉的可受理性，并称已按照国际标准，向提交人提供了确保公正审判权的充分保障。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调查的每个阶段均承认参与犯罪行为，而且尽管利比亚当局对提交人的酷刑指控的可靠性有所怀疑，仍然开展了调查。在缔约国看来，委员会应基于这两点，认定来文因指控证据不足而不予受理。另一方面，提交人认为他已经为满足受理要求，全面证实了其申诉，而缔约国只是一味地否认陈述的事实。考虑到提交人提供的大量资料，包括证词、体检报告和专家报告，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为满足受理条件，充分证实了被拘留期间所受待遇，并且他接受的审讯在《公约》第七、九、十和十四条之下提出问题，委员会应根据案情予以审查。

6.4 关于提交人指称在不公正审判后判处其死刑违反第六条，委员会注意到死刑判决未得到维持。由于对提交人的死刑判决已减刑，因此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提出的申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据此，委员会认为申诉的这一部分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sup>22</sup>

#### 缔约国未就案情发表意见

7. 委员会在 2009 年 11 月 5 日、2010 年 8 月 6 日、2010 年 10 月 7 日和 2011 年 3 月 2 日的普通照会中，请缔约国向其提交关于来文案情的资料。委员会指出尚未收到这些资料。委员会忆及，根据《任择议定书》，有关国家应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该国已采取补救办法，则亦应一并说明。鉴于未收到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委员会将根据档案所载资料审查案情。对于提交人提出的已得到充分证实的指控，委员会将予以应有的重视。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案情

8.1 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称他在审讯期间遭到酷刑和被麻醉，而且在法庭上体检报告和证人的证词证实了他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不能单由他来承担举证责任，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他身上发现的强奸和电刑的痕迹是被拘留前留下的，因此表明酷刑是审讯人员所为。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称，2000 年 2 月他第一次见到法官时，身上仍然能够看到酷刑的痕迹，但是法官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调查不彻底，而是草草为之。

<sup>22</sup> 见第 971/2001 号来文，Arutyuniantz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5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09/1995 号来文，Williams 诉牙买加，1997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61/2003 号来文，Kharkhal 诉白俄罗斯，2007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1141/2002 号来文，Gougnina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8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据，即提交人自始至终向所有审理其案件的不同司法当局承认参与所指控的罪行；直至 2002 年 6 月 3 日，提交人才告知起诉庭的一名法官他曾遭受酷刑；该法官立即委托检察部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尽管认为酷刑指控毫无依据，检察院仍然对调查委员会成员提出了指控。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指出，有权受理提交人的酷刑指控的黎波里上诉法院于 2005 年 6 月 7 日作出调查委员会成员无罪的判决。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否认了缔约国指出的他第一次报告酷刑的时间，重申他在 2000 年第一次见到法官时便报告了酷刑，而且每次面对司法当局时都提出了酷刑申诉。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进一步指控称，从 1999 年 1 月 29 日被捕到 1999 年 5 月 16 日第一次被带到检察院，他一直被隔离监禁；那四个月中，禁止他与家人及外界接触。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指称，他被判处死刑后，被关在隔离牢房 11 个月，而且不让他见律师；牢房只有 10 平方米；没有电和自来水；判刑之前，他也几乎一直被隔离监禁。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否认这些指控。

8.5 委员会重申其判例，<sup>23</sup> 即举证责任不能由来文提交人单方面承担，特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并不总能平等地获得证据，而且往往只有缔约国才掌握相关资料。《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意味着缔约国有责任本着诚意，调查所有关于缔约国及其代表违反《公约》的指控，并向委员会提供所掌握的资料。在提交人已为收集支持其申诉的证据作出一切合理努力，需要只有缔约国才掌握的资料才能作出进一步澄清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或缔约国提出相反的解释，委员会也可以认为提交人的指控已得到证实。委员会还回顾其判例，指出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就据称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违反禁止酷刑的行为开展彻底调查，还有义务起诉、审判和惩治责任人。关于隔离监禁，委员会承认长期被关押、不得与外界接触的痛苦。委员会回顾了其关于第七条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建议各缔约国规定禁止隔离拘押。<sup>24</sup>

8.6 鉴于以上种种，委员会得出结论称，提交人所受待遇构成酷刑，而缔约国提供的解释，包括 2005 年 6 月 7 日的黎波里上诉法院的判决，不足以证明在提出了遭受酷刑的明显证据，如体检报告所载证据和据称酷刑实施者的证词后，立即开展了充分和公正的调查。委员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得出结论称，鉴于提交人遭受的酷刑、隔离监禁、定罪之前和之后均长期与世隔绝，以及由于缔约国未立即对事实进行充分和公正的调查，构成违反《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情况。

8.7 委员会在作出上述结论后，决定不再审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条提出的指控。<sup>25</sup>

<sup>23</sup> 第 1412/2005 号来文，Butovenko 诉乌克兰，2011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sup>24</sup> 委员会关于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1992)号一般性意见，第 11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47/40)，附件六，A 节。

<sup>25</sup> 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8 段。

8.8 关于指称违反《公约》第九条，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 1999 年 1 月 29 日被捕，1999 年 5 月 16 日才第一次被带到检察院，而根据利比亚法律，本应在被捕后 48 小时内带见检察官。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提交人指称在那之后仍然不让他与家人接触，他的家人第一次获准探视是在 1999 年 11 月 30 日；提交人还指称，他被带见检察官时才被告知对他的指控；没有为他指派律师；他在 2000 年 2 月 7 日开审时才第一次见到法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提供任何资料，否认这些指控。鉴于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解释，委员会认为存在违反《公约》第九条的情况。<sup>26</sup>

8.9 提交人还指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关于这一点，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称，直到 2000 年 2 月 17 日，即开审后 10 天，亦即他被逮捕一年多以后，他才第一次见到律师；而且他一直没有机会与律师自由交谈。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指称他被施以酷刑才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词，而且在警方审问和为审判做准备时，都没有律师在场。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指称法院在没有提供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接受 Montagnier 教授和 Collizi 教授的专家报告，尽管他们的报告足以确定提交人无罪；搜查其中一名共同被告人住所时，被告和律师均不在场；检方从未出示搜查报告。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为提交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确保其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审判是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司法程序持续时间长是为了查明真相，确认严重案件的犯罪实施者；有律师团队为提交人辩护。

8.10 委员会重申其关于第十四条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强调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的权利一般性保障第十四条第 1 款第二句所述的原则之外，还保障平等机会和权利平等原则，并保证有关诉讼方不受任何歧视。<sup>27</sup> 在本案中，委员会考虑到缔约国提供的资料，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一系列公正审判权，包括侵犯了不被迫作出不利于自己证词的权利，违反了权利平等的原则——双方不能平等地获得证据和专家意见，以及侵犯了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被告在开审前没有律师，而且不能与律师自由交谈。因此，委员会判定对提交人的审判和定罪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情况。

9.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本身及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以及违反《公约》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的情况。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规定，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包括重新就酷刑和虐待指控开展充分和深入的调查，对那些导致提交人所受待遇之人启动适当的刑事诉讼程序；同时向提交人提供适当补救，包括赔偿。缔约国亦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sup>26</sup> 第 1761/2008 号来文，Giri 诉尼泊尔，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8 段。

<sup>27</sup> 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公正审讯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8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2/40(第一卷))，附件六。

11.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泛分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个人意见 (部分反对)

1. 总体而言，我赞成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第 1755/2008 号来文——El Hagog Jumaa 诉利比亚的《意见》的导言部分和结论，但是恕我不能赞同第 6.4 段的内容：“关于提交人指称在不公正审判后判处其死刑违反第六条，委员会注意到死刑判决未得到维持。由于对提交人的死刑判决已减刑，因此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提出的申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据此，委员会认为申诉的这一部分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2. 我原本以为委员会在审议案情时可能会决定再次讨论是否受理关于可能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指控，可惜委员会维持了原立场，因此我持部分反对意见。
3. 委员会在《意见》中总结称“侵犯了一系列公正审判权，包括侵犯了不被迫作出不利于自己证词的权利，违反了权利平等的原则——双方不能平等地获得证据和专家意见，以及侵犯了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被告在开审前没有律师，而且不能与律师自由交谈。因此，委员会判定对提交人的审判和定罪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情况。”(第 8.10 段，着重号后加)。
4. 上一段正确地指出，判处 El Hagog Jumaa 先生死刑是不公正和任意审判的结果。出于一致性考虑，委员会本应判定，在不满足《公约》要求的司法程序后作出的死刑判决违反了第六条。
5. 即使死刑没有执行，也可能存在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 2 款的情况；正如委员会曾经指出的，“在不尊重《公约》条款的审理结束时下达死刑判决，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情况”(第 1096/2002 号来文，Safarmo Kurbanova 诉塔吉克斯坦(CCPR/C/79/D/1096/2002)，2003 年 11 月 6 日，第 7.7 段)。该判例的依据是委员会之前的决定，其中称预审没有遵守第十四条规定的保障，因此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2 款(Conroy Levy 诉牙买加，第 719/1996 号来文，第 7.3 段；Clarence Marshall 诉牙买加，第 730/1996 号来文，第 6.6 段)。有鉴于此，我无法理解委员会既然确认了对 Ashraf Ahmad El Hagog Jumaa 先生的诉讼过程中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的情况，为何还认为本案——El Hagog Jumaa 诉利比亚案不存在违反第六条的情况。
6. 死刑减为较轻的徒刑并不意味着违约行为没有发生；利比亚最高法院 2007 年 7 月 11 日作出维持死刑判决的裁决时，正是相关违约行为发生之时。
7. 本案中将死刑减为较轻的徒刑是为了避免任意剥夺生命权，从而避免缔约国为违反第六条第 1 款负责，但不能变成将实际发生的违约行为(本案中是违反第六条第 2 款)视为没有发生。

8. 正如我之前在个人意见和联合意见中主张的，委员会必须适当宣布案件中的所有违约行为，因为这将产生实际影响，例如在应有的赔偿方面。<sup>a</sup>

9. 委员会应重申在这方面提供最大保障的判例；并重申根据最具有保护性的解释，进步和不倒退原则要求违约行为受害者获得的保护措施和解决办法至少应当与同一机构在以往案件中提供的相当。<sup>b</sup>

10. 因此，我承认本案中存在将死刑减为较轻徒刑的情况，但仍然认为委员会本应指出 El Hagog Jumaa 案中亦存在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 2 款的情况。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sup>a</sup> 见第 1378/2005 号来文，Kasim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9 年 7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部分反对)的个人意见，第 4、7 和 8 段；第 1284/2004 号来文，Kodi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9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委员会委员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和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部分反对)的个人意见，第 3、6 和 7 段。

<sup>b</sup> 同上。

H. 第 1759/2008 号来文, Traoré 诉科特迪瓦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Zoumana Sorifing Traoré (由世界禁止酷刑组织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堂兄 Chalió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

所涉缔约国: 科特迪瓦

来文日期: 2007 年 11 月 29 日(首次提交)

事由: 任意逮捕和拘留; 对一人施加酷刑和不人道的拘留条件; 提交人堂兄因被控持不同政见而强迫失踪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尊重人的固有尊严; 获得有效补救权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第 1 款; 第七条; 第九条; 第十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Zoumana Sorifing Traoré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59/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7 年 11 月 29 日来文的提交人 Zoumana Sorifing Traoré 先生是科特迪瓦国民, 生于 1977 年 11 月 12 日, 以其本人及其分别生于 1971 年和 1974 年的堂兄 Chalió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 之名提交本来文。他认为他是科特迪瓦违反《公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签署的个人意见文本附于本决定。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2、3、4 和 5 款和第十条行为的受害人。此外，他还提出其两个堂兄是科特迪瓦违反《公约》上述条款和第六条第 1 款的受害人。提交人由世界禁止酷刑组织(禁止酷刑组织)代理。<sup>1</sup>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2 年 9 月，提交人 25 岁，是一名大学生，在 Williamsville(阿比让)租了一间大学宿舍。他加入了共和人士联盟，还是大学城该组织青年支部成员。但他并不是一名积极的活动分子，只是同情者。为了筹集学费，他还在 GESTOCI 公司兼职。这份工作是其堂兄 Bakary Traoré 先生帮他找到的。

2.2 Bakary Traoré 先生和 Chalió Traoré 先生是兄弟。前者生于 1974 年，是 GESTOCI 公司的电工；后者生于 1971 年，在阿加美的大集市上修理缝纫机。Bakary 也加入了共和人士联盟，并已有多年党龄。他还曾经是青年共和人士联盟的主席。至于 Chalió 先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共和人士联盟的同情者。

2.3 2002 年 9 月 18 日，阿比让发生冲突，并逐渐蔓延至科特迪瓦其他城市。冲突过程中，三组反政府武装力量打败了由军队和安全部队组成的政府军。一夜的战斗后，提交人的堂兄 Bakary Traoré 来访，时间是 9 月 19 日上午接近 11 时。后来，由于实行宵禁，他们决定一起在提交人住处过夜。第二天早上 8 时，Bakary Traoré 回到自己家中。

2.4 鉴于安全局势日益恶化，提交人决定不再出门。2002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夜間，几个身着军装、佩戴武器的人突然闯进来。在既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就搜查了提交人的房间，仅仅询问了他的姓名。什么也没发现之后，便开始殴打提交人，并将其逮捕。提交人被带至位于其大学城某条路上的共和国治安队总部。治安队的警察认为提交人是一名“攻击者”，用死来恐吓他。他们用烟头烫他，对他拳打脚踢，还使用了警棍，甚至用高压水枪朝他眼睛里喷水。提交人的左眼遭受如此暴力伤害，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他的眼伤不断恶化，再也不可能治愈了。

2.5 提交人很快受到审讯。其中一名警察问他是否认识 Bakary Traoré 先生。提交人回答，Bakary Traoré 先生是他的堂兄弟。该警察又问了 Bakary Traoré 先生的职业，提交人回答，他是 GESTOCI 公司的电工。这名警察还就 Chalió Traoré 先生问了相同的问题。提交人再次以肯定作答，说 Chalió Traoré 先生既然和 Bakary Traoré 先生是兄弟，自然也是其堂兄弟。他回答，后者在阿加美的大集市上修缝纫机。就是这时，其他警察大喊道：“就是他们！你们全部都是攻击者！等着瞧吧！”最后，共和国治安队的警察告诉提交人他的堂兄弟 Bakary Traoré 和 Chalió Traoré 均已被逮捕，Bakary Traoré 先生的伴侣 Charlotte Balma 小姐也

<sup>1</sup>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92 年 3 月 26 日和 1997 年 3 月 5 日对科特迪瓦生效。

被逮捕了。当局怀疑 **Chalio Traoré** 先生是叛乱分子的同谋。一些人说，他为战斗中受伤的进攻者提供援助；另一些人则说，他自己也参加了战斗，受了伤，然后被他治疗的医生向警察局告发了。提交人接受审讯过程中，共和国治安队的警察声称他们已经对其堂兄弟实施了“改造”，很快就会轮到他了。随后，他们要求他陈述其同谋罪行，但他没有作答。就在这时，一名警察抓起一个钳子，狠狠夹住提交人右脚的第二个脚趾。由于仍旧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名警察夹断了提交人的脚趾。

2.6 不久后，提交人的两个堂兄弟以及 **Charlotte Balma** 小姐也被带到了共和国治安队总部。提交人注意到三个人都遭受了酷刑。**Chalio Traoré** 先生的左臂“体无完肤”，一只手上还被刺穿。他曾要求警察直接杀了他，是他们中受伤最严重的。**Bakary Traoré** 先生背部也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好像被人在地上拖曳过。他的脸上也有伤，站都站不稳。2002 年 9 月 23 日当夜，他们一行四人被转移至位于高地区(Plateau)的阿比让警察局，然后又被带至同样位于高地区(Plateau)的司法警局驻地。除了 **Balma** 小姐，所有人都在司法警局遭受了酷刑。审讯过程中，提交人遭受了警棍击打以及多次电击。最后，他被关入一间禁闭室。**Bakary Traoré** 和 **Chalio Traoré** 也经历了同样的审讯。最终，他们承认参加了袭击 **Agban** 宪兵队的活动，并且曾接受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易卜拉欣·库利巴利为期一年的训练。提交人认为他的堂兄弟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为了保护他而为之。提交人的断趾得到了一些治疗，但他的堂兄弟却没有得到任何医治。

2.7 2002 年 9 月 27 日下午，提交人及其亲属被转移至位于阿比让高地区(Plateau)的宪兵侦察队驻地。在那里，宪兵对他们进行了审讯，用死亡恐吓他们，并且不提供任何食物或饮料。此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已对他们进行了登记，但向科特迪瓦当局申请对 **Chalio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 进行治疗时却遭到宪兵队的反对。当日傍晚，他们三人和 **Balma** 小姐被转移至阿加美镇(阿比让)宪兵队。在那里，提交人那里第二次见到了来访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时间是 2002 年 10 月 14 日。2002 年 9 月 29 日，在提交人在场的情况下，**Chalio Traoré** 被几个穿军装的总统卫队士兵带走了，理由是执行其指挥官 **Dogbo** 上校的命令。这些士兵第二天，即 2002 年 9 月 30 日又回来了，带走了 **Bakary Traoré**。自此之后，两兄弟都失踪了。提交人认为两人均已被执行了法外处决。随后，提交人被拘禁了七个月，主要是在阿比让拘禁教养所，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堂兄弟，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2.8 2002 年 10 月 15 日，当提交人还被拘禁在阿比让宪兵侦察队的时候，第一次接受一名法官的询问。该法官告知提交人他被指控犯有“危害国家权威、参与武装团伙、持有战争武器、伙同罪犯、暗杀政治人士、强奸、抢劫、危害人身安全和破坏公共财产”罪行。提交人利用此次法官聆讯的机会，揭发了他所遭受的酷刑及其堂兄弟失踪的情况。法官回答他，开展关于酷刑事件的调查属于共和国检察官的职责范围。

2.9 聆讯结束后，法官向提交人发出拘禁令，并决定当日将其送往阿比让拘禁教养所。2002 年 10 月 15 日，提交人和 Balma 小姐一起被转移至阿比让拘禁教养所。他被关入教养所的 C 楼，一幢戒备森严的独幢小楼，内设专门用于惩罚被认为是危险分子的罪犯的牢房。这些牢房每间大约 5 平方米，隔成两个区域，配备一个厕所、一个大约 20 升的水壶和一张混凝土床。唯一的通风口是天花板上有一个开口，装有铁窗，白天的空气和光线透过铁棒间隙进入牢房，是唯一可用的照明。提交人被拘禁期间，被拘禁者均全身赤裸呆在牢房，每间安置 10 至 12 个人，甚至只能睡在地上，而且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每周洗一次没有肥皂的淋浴。每天只供应一顿饭，是用平底碗盛着的一夸脱白米饭，而且不放任何调料。被拘禁者无权接受其亲属的探访。后者只能在每周三给他们送食物，还经常被刑事犯据为己有。

2.10 提交人在阿比让拘禁教养所期间，医生第一次检查了他的眼睛。医生的诊断是必须作进一步眼科检查，但没能获得医疗检查许可。在阿比让拘禁教养所期间，提交人又三次接受法官聆讯。每次，他都揭露自己在阿比让拘禁教养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但法官一直重复说这事归检察官管辖。2003 年 4 月 18 日，提交人被拘禁七个月后，法官根据《利纳—马库锡协定》，决定将其释放。<sup>2</sup> 自出狱伊始，提交人就一直遭受个别警卫人员的威胁。成功认出其中一个参与其堂兄弟失踪事件、身着迷彩服的人后，提交人确定自己被该事件的制造者追查。而且，好几次险些被这些人逮捕。

2.11 面对日益不断的压力，2006 年 10 月 7 日，提交人最终逃离科特迪瓦，前往摩洛哥避难。到达摩洛哥后，他便联系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驻摩洛哥办事处，并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获得难民身份。但由于提交人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难民署决定将其转移至另外一个国家，以便让他接受紧急外科手术。于是，2007 年 6 月 29 日，提交人被转移至挪威接受医治。直至今日，他仍然居住在挪威。

2.12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一事，提交人曾试图向不同机构求助。被拘禁期间，他不止一次向法官揭露自己所遭受的酷刑折磨，但该法官一直拒绝表态，也未曾给予他任何与相关程序有关的信息。提交人还曾问这位法官是否知道他的堂兄弟在哪里，该法官也没有回答。2003 年 4 月 18 日，提交人一出狱，便向其家属打听有关两位堂兄弟的消息。但他发现由于害怕被报复，没有人敢就此事采取行动。

2.13 2003 年 5 月，提交人联系了两名律师，但考虑到科特迪瓦的局势，都不建议他申诉。提交人又咨询了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也没有给予他任何帮助。2004 年，提交人又咨询了联合国国际调查委员会，也没有获得帮助。2006 年 4 月 20 日，由于无法得到有效的补救，提交人致信科特迪瓦战争受害者

<sup>2</sup> 该协定经联合国、欧盟和非盟批准，主要旨在释放所有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拘押的人员和赦免被指控犯有此罪的士兵。

声援部，依据关于赦免自 2002 年 9 月 19 日以来的突发事件的第 2003-309 号法，要求对其被拘禁期间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他在信中还提到了自己失踪的两位堂兄弟。截至提交人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本来文之日，一直未获得该信件的回复。2007 年 5 月 14 日，为了找到其堂兄弟，提交人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了一些行动，还由于资料不足，后者不得不停止了寻找。

##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侵犯了他依《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2、3、4 和 5 款以及第十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侵犯了其堂兄弟 Chalio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 依《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2、3、4 和 5 款以及第十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提交人要求委员会承认上述侵权事实，并建议缔约国就上述侵权事实进行一次全面、独立和公正的调查，以便查明肇事者，将其交由一个独立、能胜任和公正的法庭审判，对他们适用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

3.2 至于提交人本人，他首先指出无法向司法机关求助的事实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战争受害者补偿问题的沉默态度，均有悖于《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的规定。为此，提交人援引了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的六次定期报告以及非政府组织 2002 年至 2007 年的一些报告，证明在科特迪瓦对于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不存在有效的补救办法。<sup>3</sup> 鉴于自己曾被堂兄弟失踪事件的责任警方追查，提交人还提请注意在科特迪瓦，如果寻求补救办法便会遭受威胁。

3.3 此外，在《利纳—马库锡协定》基础上，2003 年 8 月 8 日，科特迪瓦通过了第 2003-309 号法律(大赦法)，对 2002 年 9 月 19 日以后的行为予以赦免。该法律旨在促进全国和解，相关条款规定特赦所有触犯危害国家安全和国防罪行的主犯、共犯和从犯，不论其所犯或可能犯有的过错或罪行的性质如何。同时，该法还规定会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但赔偿、补偿和平反方式将以法律形式确定。然而，赔偿方式一直没有确定。因此，实际上，受害者家庭不可能依据大赦法获得赔偿。提交人还指出他在科特迪瓦的时候根本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国内的补救办法不是无法用便是无效。

3.4 自 2002 年 9 月 22 日被捕至 2002 年 10 月 15 日被转移至阿比让拘禁教养所，整个被拘禁期内，提交人的家属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也从未能与亲属取得任何联系。同样，在被拘禁在阿比让拘禁教养所的六个月期间，提交人也从未能与亲属保持联系。被拘禁的前几周，他在阿比让拘禁教养所遭受了严重的酷

<sup>3</sup> 提交人援引了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人权处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期间的六次定期报告：《科特迪瓦人权状况报告》。提交人还援引了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两个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报告，主要包括：《科特迪瓦：政治僵局的人权代价》，人权观察，2005 年 12 月 21 日，第 27 页。另外，提交人还援引了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科特迪瓦侵犯人权事件的调查报告：根据《利纳—马库锡协定》附件六的规定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2004 年 5 月 25 日声明(S/PRST/2004/17)编写的科特迪瓦共和国 2002 年 9 月 19 日至 2004 年 10 月 15 日的人权状况报告。

刑。而且，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sup>4</sup> 相比，阿比让拘禁教养所的拘禁条件苦不堪言。提交人遭到死亡威胁，亲眼目睹自己的堂兄弟被酷刑折磨令他痛苦万分，至今仍然无法摆脱他们的失踪造成的痛苦和自己所受酷刑留下的心理阴影。他所遭受的待遇均已构成《公约》第七条以及与其有关的第十条第 1 款禁止的酷刑行为。

3.5 提交人被捕 23 天后才被告知自己被捕的理由。被拘禁期间，也从未能向任何机构申辩自己被捕或被拘禁的合法性。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的所有条款。

3.6 关于 Chalió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提交人援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 2 款(一)项。科特迪瓦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调查两人的失踪，也没有向其家属提供任何关于其遭遇的信息。没有一位政府成员被起诉，失踪者的家属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如果两人均已死亡，缔约国就侵犯了其家属获知两人死亡情况和遗体所在地的权利。因此，缔约国侵犯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规定的保证受害人得到有效补救的权利。

3.7 提交人认为，所有证据显示 Chalió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 已被执行法外处决。果真如此的话，该处决不会是为了保护他人或防止他们逃跑。因此，科特迪瓦当局草菅人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1 款。两人被秘密监禁以及遭受恶劣的待遇和拘禁条件均全部或分别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十条。

3.8 最后，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对于《公约》第九条关于失踪、任意逮捕、长期秘密拘禁和推定死亡等多项侵权案件的司法案例。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5 月 8 日，缔约国就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反对，理由是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4.2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为其采取的行动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对于酷刑、法外处决和虐待此类严重的侵权事件，科特迪瓦《刑法》规定任何人都可根据《刑法》第四十至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六条向检察官检举其所知的犯罪行为。因此，提交人、两名失踪者的家属和人权组织完全可以向科特迪瓦刑事法院求助，要求后者开展司法调查。提交人甚至还可以向警方申诉，即使他断言自己和其堂兄弟是被警方绑架的。

4.3 缔约国补充说，法官聆讯一个人，本案涉及的是提交人打听其堂兄弟消息的法官，结果是该事件不在该法官的管辖权范围，这在司法机构的案例中是常有之事。据此，缔约国推断提交人当时诉求的司法机构不适当，因为此类诉求的证据很容易核实。在此，缔约国援引了资料登记簿、检察院的记录甚至是警察局的

<sup>4</sup> 依据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2004 年 5 月 25 日声明(S/PRST/2004/17)的结论而制定。

笔录。这些参考资料记录着科特迪瓦司法机构的诉求情况。既然无此证据，提交人也就不能断言科特迪瓦司法机构对本案的处理不尽人意。

4.4 最后，缔约国指出科特迪瓦的法律(《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护所有公民不受类似上述严重犯罪行为危害。正因如此，2003 年通过的《大赦法》将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排除在外。所以，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情况不符合《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规定的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条件。

4.5 2010 年 9 月 7 日，缔约国在一封补充信函中进一步说明，先前转交的意见针对的是提交人以其本人及其两位堂兄弟名义发表的声明，同时涉及本事件的可受理性和案情。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1 年 2 月 17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的意见发表了评论。他首先指出缔约国意见发表的长时间延误。而且，缔约国未就申诉的案情发表任何评论。缔约国如此渎职，导致申诉处理的长时间延误，而该延误给提交人造成了额外的痛苦。

5.2 鉴于缔约国只是质疑来文的可受理性，提交人在其评论中仅就这些方面进行重新阐述，因为缔约国对其他各项问题没有提出异议。提交人首先援引他首次提交的来文。在这份文件中，他详细描述了为了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采取的措施。2007 年修订的《大赦法》取消了所有与诉究酷刑行为的刑事责任、侵犯提交人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的规定。另外，提交人还强调，国内补救程序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限，采用这些程序会给提交人带来额外风险。他觉得在科特迪瓦没有任何可供其使用的有效补救办法了。

5.3 提交人回顾，自己被拘禁期间，曾四次接受法官聆讯，每次他都揭露自己遭受的酷刑和虐待以及自己两位堂兄弟失踪的事实。四次聆讯均在阿比让法院举行，第一次是在 2002 年 10 月 15 日，后三次是在该日期至 2003 年 4 月 18 日之间。每次聆讯，法官都拒绝倾听提交人的申辩。他说这属于检察官的管辖范围，只有检察官才有权开展调查，然而检察官从未参与本案。提交人提到了他向科特迪瓦人权运动求助的事实，该组织给他建议了两名律师，但都劝他不要申诉，因为“鉴于国内局势，任何律师或法官都不可能冒险为他辩护”。既然无法诉诸于司法，提交人便向战争受害者声援部求助，要求对自己遭受的损害获得赔偿，并调查两位堂兄弟的失踪，结果仍是徒劳。因此，尽管冒着巨大风险，提交人还是试图利用科特迪瓦的司法和行政机构行使其权利，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5.4 提交人认为，《关于国内补救办法的实质性和有效性特征及其不得无理拖延的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b)项规定的特殊情况应适用于本事件。他援用了委员会处理 Phillip 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的判例。在该事件中，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如果认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对其构成危险，可以不用尽国内补救办法。<sup>5</sup> 另外，

<sup>5</sup> 提交人援引了第 594/1992 号来文，Phillip 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1998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在 Pratt 和 Morgan 诉牙买加一案中，委员会也认为既然客观条件不允许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无须用尽国内补救办法。<sup>6</sup>

5.5 经历过严重的动乱后，缔约国没有表示出任何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的政治意愿。事实证明，司法系统办事效率低下，屈从于行政压力和外界影响。为此，提交人引用了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原文，后者认为“科特迪瓦急缺一个中立、公正、独立和足够有效和平解决冲突的机构”。<sup>7</sup> 除了司法系统毫无独立性可言，安全局势的日益恶化也是个人无法获得补救办法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申诉就等于向当局暴露自己，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面对如此令人堪忧的状况，提交人还是试图寻求正义，但均徒劳无果。这样的局势无法让提交人实际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5.6 提交人回顾，由于自身安全不断受到危险，他逃离了科特迪瓦，在摩洛哥获得了难民身份。难民署承认了提交人的难民身份，依据是提交人接受审讯期间遭受了严重的身体暴力，还被逼承认了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同时还被用死亡恐吓，如此待遇均已构成酷刑。此外，提交人提到，他被释放后仍然受到治安部门某些人员的直接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是为了让他不诉诸于司法。尽管提交人已经冒着风险向某国家部门(战争受害者声援部)求助，他认为，鉴于自己承受的风险，该补救办法不应作为必需途径予以要求。

5.7 最后，提交人指出，2003 年 8 月 8 日科特迪瓦通过的关于赦免 2000 年 9 月 17 日至 2002 年 9 月 19 日期间的突发事件的法律只保证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人不受处罚，但将“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行排除在外。该法律还规定对所有侵权行为展开调查，并赔偿受害者。事实上，没有拨付任何赔偿，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根据 2007 年 4 月 12 日颁布的第 2007-457 号政令，新的《大赦法》生效。这两项法律内容几乎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所覆盖的时间段不同。第二项法律赦免的是 2000 年 9 月 17 日至 2007 年 4 月 12 日之间的罪行，还取消了第一项法律中将严重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排除在大赦范围的这条规定之外。只有这些修订是对 2003 年法律的实质性修正。提交人据此推断，缔约国是为了避免因科特迪瓦冲突时期所犯的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被人起诉。另外，缔约国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让受害者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5.8 关于案情，提交人称，自己只要求执行《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七条以及与其有关的第十条第 1 款和第九条，并代表他的堂兄弟要求执行《公约》相同条款和第六条第 1 款。

<sup>6</sup> 提交人引证了第 210/1986 号和第 225/1987 号来文，Earl Pratt 和 Ivan Morgan 诉牙买加案，1989 年 4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3 段。

<sup>7</sup> 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见上文。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件没有在同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b)项的规定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注意到，在此问题上，缔约国的意见是，对于酷刑、法外处决和虐待此类严重侵权事件，科特迪瓦《刑法》规定任何人都可根据《刑法》第四十至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六条向检察官检举其所知的犯罪行为；提交人甚至还可以向警方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既然法官对一个人的聆讯结果证明不在该法官的管辖权范围内，说明提交人求助的司法机构不适当。

6.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向法官揭露了自己及堂兄弟遭受的酷刑以及两位堂兄弟失踪的事件，而且是 2002 年 10 月 15 日第一次出庭聆讯，即被捕三周后，便已告知法官；法官回复，开展关于酷刑的调查属于检察官的职责；此次聆讯后，检察官并未涉足此案。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每次聆讯都向该法官检举所遭受的酷刑和两位堂兄弟强迫失踪一事，但却没有开展任何调查，而且法官也没有告知提交人申诉自己所受待遇所需的程序。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申辩说由于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自己无法在科特迪瓦获得实际有效的补救办法；他本人自出狱伊始便受到治安机构某些人员的威胁；这些威胁使他无法诉诸于司法，更何况这样做就等于向当局暴露自己，也就是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最终，提交人不得不逃到摩洛哥，在那里获得难民身份。

6.5 委员会参照之前的司法案例，提醒说，提交人应利用一切司法补救办法，只要这些补救办法对本案有效且实际向提交人开放，以便符合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的规定。<sup>8</sup> 就本案而言，提交人已将遭遇的严重酷刑和强迫失踪事件告知法官，而且是早在 2002 年 10 月 15 日便已采取该行动，当时他尚被拘禁，法官是他唯一能利用的司法渠道。出狱后，提交人受到安全威胁，让他无法求助于相关职能部门。所受威胁如此严重，他只得逃离科特迪瓦，在第三国获得难民身份。委员会重申，缔约国不仅有责任就其政府部门获知的侵犯人权行为开展深入调查，还应对任何被控侵犯人权的肇事者提起刑事诉讼，进行审判，进而判刑。<sup>9</sup> 就提交的资料来看，委员会推定科特迪瓦的司法补救办法没有实际向提交

<sup>8</sup> 第 1003/2001 号来文，P.L.诉德国案，200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5 段。见第 433/1990 号来文，A.P.A.诉西班牙案，1994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

<sup>9</sup> 第 1780/2008 号来文，Zarzi 诉阿尔及利亚案，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



人开放，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无法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据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b)项并不妨碍提交人及其堂兄弟来文的可受理性。

6.6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为了来文可予受理，已经充分证实以其本人及其堂兄弟名义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二条第 3 款提出的指控，因此委员会开始审议来文所述的案情。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尽管委员会多次要求，缔约国还是仅就来文的可受理性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未针对提交人提出指控的案情予以阐述说明。而且，缔约国是在委员会将来文告知其一年多后才发表的意见。委员会称，缔约国应认真调查所有针对缔约国及其代表违反《公约》的指控，并将其所持有的资料转交委员会。<sup>10</sup> 如果提交人提供的可靠资料能够证实相关指控，而且补充说明只能通过缔约国自己持有的资料获得，在缔约国不提供证据和令人满意的解释予以辩驳的情况下，委员会便认为这些指控论证充分。如果缔约国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说明，应给予提交人的指控应有的重视。<sup>11</sup>

7.3 委员会注意到了提交人关于他及其堂兄弟所遭受的酷刑，包括被烟头灼伤、殴打、提交人眼部严重受伤和右脚脚趾被截断、电击；缺乏适当的医治；提交人的堂兄弟失踪。鉴于缔约国没有对这些事件予以辩驳，委员会的结论是，提交人及其堂兄弟遭受的酷刑、秘密拘禁和提交人堂兄弟的强迫失踪均违反了《公约》第七条。<sup>12</sup>

7.4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提交人及其堂兄弟在阿比让高地区搜查宪兵队的拘禁条件和他在阿比让拘留教养所的拘禁条件的指控，并注意到缔约国并未就这些信息提出异议。委员会提到，被剥夺自由者不得遭受任何与剥夺自由无关的困苦或限制，而且他们必须得到依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给予的待遇。<sup>13</sup> 委

<sup>10</sup> 除其他外，见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第 1780/2008 号来文，Mérim Zarzi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sup>11</sup> 见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6 年 7 月 11 日通过的《意见》，第 6.5 段；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6.2 段；第 1761/2008 号来文，Yubraj Giri 诉尼泊尔，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

<sup>12</sup> 见第 1761/2008 号来文，Yubraj Giri 诉尼泊尔案，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6 段。

<sup>13</sup> 关于第十条的第 21(44)号一般性意见，第 3 段和第 5 段；第 1134/2002 号来文，Fongum Gorji-Dinka 诉喀麦隆，2005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5.2 段；第 1813/2008 号来文，Ebenezer Derek Mbongo Akwanga 诉喀麦隆，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员会认为提交人所描述的拘禁条件侵犯了任何人均有权受到人道及尊重其人格尊严的待遇的权利，因为违反了《公约》第十条第 1 款。

7.5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被秘密拘禁在共和国治安队驻地，被捕三周后才到庭应审，法官才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鉴于缔约国对此事没有任何合理解释，委员会的结论是，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九条。<sup>14</sup>

7.6 提交人还引用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其中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确保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委员会称，委员会十分重视缔约国为审查侵权投诉而建立的各种司法和行政机制，即便是面临紧急状态。<sup>15</sup> 委员会还提到，如果缔约国不调查关于侵权行为的指控，这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公约》。<sup>16</sup> 就本案而言，委员会收到的资料显示，由于科特迪瓦司法机构没有就提交人早在 2002 年 10 月 15 日就已提出的指控开展调查，还威胁提交人不得诉诸于司法，提交人未能获得有效的补救。关于 2003 年通过并于 2007 年予以修订的《大赦法》，委员会注意到了提交人的论据，他认为 2007 年《大赦法》被修订后，更加不可能再追究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就此修订案表态，而是仅就 2003 年的法律原文发表了意见。委员会的结论是，它所收到的事实表明，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

7.7 最后，关于提交人的堂兄弟被强迫失踪和可能被法外处决事宜，委员会注意到，2002 年 9 月 29 日，在提交人在场的情况下，Chalio Traoré 被身着军装的总统卫队士兵带走了，理由是执行其指挥官 Dogbo 上校的命令；这些士兵第二天，即 2002 年 9 月 30 日又回来了，带走了 Bakary Traoré；自此之后，两兄弟都失踪了，提交人认为两人均已被执行了法外处决；提交人早在 2002 年 10 月 15 日，即他第一次被法官聆讯之日，就将自己堂兄弟失踪一事告知司法机关；但没有对他的指控开展任何调查。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这些指控予以辩驳，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说明 Chalio Traoré 和 Bakary Traoré 两位先生的遭遇。根据现有资料，委员会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1、7 和 9 款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7.8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它所收到的事实表明，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以及与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委员会还认为，就提交人的堂兄弟 Chalio Traoré 先生和

<sup>14</sup> 见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案，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5 段；第 1469/2006 号来文，Sharma 诉尼泊尔案，2008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sup>15</sup> 关于第四条的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A/56/40(第一卷)，附件六，第 14 段。

<sup>16</sup> 关于第二条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A/59/40(第一卷)，附件三，第 15 段。

Bakary Traoré 先生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7.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的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提交人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特别是：(一) 就提交人及其堂兄弟遭受的酷刑行为和提交人堂兄弟的强迫失踪案开展彻底、严格的调查，追究和惩罚相关肇事者；(二) 向提交人提供关于其调查结果的详细资料；(三) 如果 Chalió Traore 和 Bakary Traore 尚被拘禁，应予以立即释放；(四) 如果 Chalió Traore 和 Bakary Traore 已经死亡，应将其遗体归还其家属；(五) 向提交人、Chalió Traore 和 Bakary Traore 以及三人的家属提供恰当的补偿，尤其是适当的赔偿。缔约国也有义务采取行动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7.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的不同意见

委员会注意到针对 Chadio Traoré 先生和 Bakary Traoré 先生存在直接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情况。我们不同意委员会的这个结论，相关原因我们已经在关于指控阿尔及利亚的两例强迫失踪案件的不同意见中已经说明<sup>a</sup>，委员会已在同一次会议上对这两例案件和本事件表态。本次审议的案件，委员会本应注意到不存在单独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的情况，仅仅存在违反与《公约》第二条第 3 款有关条款的情况。

克里斯特·特林(签字)

迈克尔·奥弗莱厄蒂(签字)

[提出的意见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其中法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sup>a</sup> 第 1781/2008 号来文，Djebrouni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1811/2008 号来文，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

I. 第 1772/2008 号来文，Belyazeka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Syargei Belyazeka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8 年 2 月 23 日(首次提交)

事由： 驱散纪念斯大林政权镇压行为受害者和平集会，侵犯了言论自由权利和不受不合理限制举行和平集会的权利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言论自由权；可允许的限制；和平集会权

《公约》条款： 第十九条第 2 款；第二十一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无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Syargei Belyazeka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72/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以下：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Syargei Belyazeka 是白俄罗斯国民，1974 年生，现住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他声称自己是白俄罗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行为的受害人。《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克里斯蒂娜·沙内、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瓦尔特·卡林、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杰拉尔德·L·纽曼、迈克尔·奥弗莱厄蒂、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奈杰尔·罗德利、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克里斯特·特林和马戈·瓦特瓦尔。

## 事实背景

2.1 2007 年 10 月 30 日，提交人与其他 30 名有亲戚在苏维埃俄国斯大林主义集中营里丧生的维捷布斯克居民一起参加了一场纪念活动。据提交人说，所有参加纪念活动的人都持有共同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专制的，旨在压制苏维埃社会中的政治多元性。因此，提交人和其他参与者参加这一纪念活动，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集体表达他们反对以暴力镇压不同政见的做法。按计划，纪念活动包括访问 Polyai 村附近的一个处决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地点，以及访问靠近 Voroni 村和 Kopti 村的两处墓地，献上花圈并立起一个十字架。

2.2 参与者到达 Polyai 村纪念活动现场旁的一个停车场时，警察要求终止纪念活动，因为维捷布斯克区内务部副部长认为这是一个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即“抗议活动”。参与者拒绝停止，并得到允许进行纪念活动。然而他们登上一辆巴士，准备前往 Voroni 村和 Kopti 村时，维捷布斯克区内务部副部长登上了巴士并宣布他要驱散纪念活动，且巴士上的所有乘客都将因参与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抗议活动”)而被拘留。参与者，包括提交人，对这一决定表示异议，但服从了命令。

2.3 提交人与其他参加人一起被巴士送往维捷布斯克区内务部，内务部草拟了一份与提交人有关的行政程序书。依据《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第 3 部分，提交人被控犯下行政违法行为(违反组织或举行群众活动或“抗议活动”的既定程序)。

2.4 2007 年 10 月 31 日，维捷布斯克区法院的一名法官依据《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第 3 部分，判定提交人犯下行政违法行为，并责令他缴纳 62 万白俄罗斯卢布的罚款(20 个基线值单位)。<sup>1</sup> 提交人当庭对其行为的法律定义提出质疑，质疑理由包括：他没有展示任何旗帜，纪念活动也是在林区进行的，并非公共场所。法院援引 1997 年 12 月 30 日《群众活动法》第 2 条的规定：

“抗议活动”指一个或一群公民(不举行游行)，通过包括绝食在内的手段，使用或不使用海报、标语或其他材料，就任何问题公开表达其公共或政治、集体或个人以及其他利益或举行抗议的行为。

维捷布斯克区法院得出结论，提交人在一公共场所积极地参与了一场群众活动，特别是与群众活动的其他参与者一起，在一个停车场长时间举着展开的旗帜和一个十字架，从而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

2.5 2007 年 11 月 8 日，提交人就 2007 年 10 月 31 日的判决向维捷布斯克地区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提交人在上诉中说，维捷布斯克区法院对他的行为下了错误的法律定义。特别是，提交人提出，他没有展示任何海报、标语或其他宣传材料，因此无法公开表达任何集体、个人或其他利益或抗议。即便他确实参与了未经批准的群众活动(“抗议活动”)，《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禁止的

<sup>1</sup> 约合 288.4 美元/202.9 欧元。

是违反既定程序组织或举行群众活动或“抗议活动”，并没有将这类仅仅参与群众活动的行为定为违法。此外，2007年10月28日至2007年11月3日期间，白俄罗斯的基督徒正在庆祝秋季的亡者节：举行宗教仪式并不受白俄罗斯法律的约束。最后，提交人声称，他参与的纪念活动只是公民的和平聚会。他们并没有威胁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以及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他受《白俄罗斯宪法》和白俄罗斯的国际义务所保障的和平集会权受到了侵犯。

2.6 2007年11月28日，维捷布斯克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法院援引了《群众活动法》<sup>2</sup>，该法要求参加纪念活动的人申请国家主管当局的批准以举行群众活动。根据提交人的撤销原判上诉，本案中并没有提交这样的申请。此外，《行政违法法》第23.34条规定，如果某一个人已因违反组织或举行群众活动或“抗议活动”的既定程序受到处罚，且在受罚之后一年内反复犯下同一种违法行为，则负有行政责任。维捷布斯克地区法院注意到，早些时候，在2007年4月27日，提交人已被判犯有违反《行政违法法》第23.34条第1部分的违法行为，并被责令缴纳15.5万白俄罗斯卢布的罚款。<sup>3</sup>

2.7 2007年12月21日，提交人针对维捷布斯克区法院和维捷布斯克地区法院的判决，依据监督复核程序上诉至最高法院。提交人在上诉中重申了自己的论点，即《行政违法法》第23.34条只规定，违反组织或举行群众活动或“抗议活动”的既定程序负有行政责任，但没有规定仅仅是参加这些活动也负有法律责任。而他只是参加了纪念活动，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领导者。2008年2月4日，最高法院副院长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最高法院考虑了提交人之前曾依《行政违法法》第23.34条第1部分受到行政处罚这一情况，并认定下级法院依据同一条款第3部分对提交人行为作出的定义无误。

## 申诉

3.1 提交人指出，2007年10月30日警察在纪念活动举行期间将他拘留，妨害了他受《公约》第十九条第2款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提交人坚称，如警方展示的罪证录像所示，他没有展示任何旗帜、海报或其他宣传材料，因此，法院将其行为定义为群众活动是错误的。

3.2 提交人还指出，举办纪念活动的初衷绝不是进行一场具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意义的行动，因此参加者也没有向主管部门要求组织群众活动的批准。他参加的纪念活动是公民的和平聚会，参与者的行动既未妨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也未对公民或市政财产造成任何损害。据提交人称，当局并未提供任何事实说明，在纪念活动期间有违反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行为，这就证明了纪念活动的和平性

<sup>2</sup> 见《群众活动法》第5条(举行群众活动的申请)；第6条(审议申请并作出决定的程序)；第7条(对禁止举行群众活动，或更改活动日期、地点和时间的决定的上诉)。

<sup>3</sup> 约合72.3美元/53.6欧元。

质。当局也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实他们试图危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道德，或是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还侵犯了他依据《公约》第二十一条所享有的和平集会权。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提交了意见。缔约国证实，在 2007 年 10 月 31 日，维捷布斯克区法院依据《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第 3 部分判定提交人犯下了行政违法行为，并责令其缴纳 20 个基线值单位的罚款。法院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提交人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2 时 30 分，无视《群众活动法》所规定的举行群众活动的程序，在 Polyai 村附近维捷布斯克—利奥兹诺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停车场参加了一场公开表达个人和其他利益的活动。证人的证词和 2007 年 10 月 30 日的活动录像都证明提交人参与了上述群众活动。

4.2 缔约国指出，举行上述群众活动并没有得到当地行政机构首长或副首长的批准。缔约国还补充说，《群众活动法》旨在创造条件，以便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而在此类群众活动期间遵守《群众活动法》，是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保障。缔约国得出结论，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以及白俄罗斯国际义务的这一指称是没有根据的。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8 年 7 月 2 日，提交人评论了缔约国的意见。他注意到，依据《公约》第二条第 2 款，白俄罗斯承诺通过必要的法律和立法措施，以确保受之管辖的个人可以行使权利。提交人指出，《宪法》第 33 条保障人人享有思想自由、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宪法》第 35 条规定，“国家应保障举行不影响法律和秩序、不侵犯其他白俄罗斯公民权利的集会、会议、上街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的自由。举行上述活动的程序应由法律确定。”他说，白俄罗斯公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行使这些权利，只受到法律规定的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的限制。

5.2 提交人重申了其论点，即他在被拘留和出庭时，并没有被指控侵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他也没有被指控破坏公共秩序或威胁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威胁他人的道德，或侵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提交人指出，他被处罚款，仅仅是因为他参加了一场据称没有顾及举行群众活动的程序而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

5.3 提交人回顾说，仅是参与群众活动，并不为《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所禁止。他补充说，自己被拘留和出庭时，并没有人认定是他组织或者领导了这次纪念活动。因此，只是作为活动的一名参与者，他不应被带离现场并受到行政处罚。提交人解释说，缔约国当局将他带离纪念现场的行为剥夺了他的和平集会权。集会的目的是向受到斯大林主义压迫的受害者表示哀悼，这证明了集会的和



平性质。无论是拘捕提交人的警察，还是审理案件的缔约国法院，还是在缔约国提交给委员会的意见中，都没有质疑纪念活动的和平本质。

5.4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驱散纪念活动这一行为，还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权。他回顾说，自己并没有展示任何海报、旗帜、标语或其他宣传材料，参加活动是他表达对过去政治压迫的见解的唯一方式。提交人补充说，他特意采用了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因为这种方式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提交人宣称，自己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2款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 缔约国的进一步陈述

6.1 在2008年12月11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称依据《行政违法法》第23.34条第3部分判定他负有行政责任不合法，是没有根据的。缔约国解释说，在《宪法》第35条之外，《群众活动法》规定了举行此类活动的程序，从而创造条件，使公民得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并在此类群众活动中确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6.2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评论中，对他参与了2007年10月30日的群众活动这一事实未提出争议。他将这一活动表述为一场和平集会，即纪念活动。同时，该活动在一个停车场举行，而停车场并不是用于举行这类活动的场所。另外，活动中还在维捷布斯克—利奥兹诺高速公路上使用了白—红—白色的旗帜。这种颜色搭配的旗帜并不是白俄罗斯的国家官方标志。

6.3 缔约国指出，各级法院正确地认定，提交人参与了一场“抗议活动”，《群众活动法》第2条载有“抗议活动”的定义。支持这一结论的事实是，许多个人参加了活动，他们使用的标志并非白俄罗斯的国家官方标志，且他们试图在随意选择的地点树立十字架。此外，上述这些行动还伴有公开声明。

6.4 缔约国还指出，与《群众活动法》的规定相悖，2007年10月30日的“抗议活动”没有得到批准。因此，到达群众活动现场的警察要求参与者停止活动。这一要求并未得到配合。因此，法院正确地认定，提交人参加“抗议活动”违反了举行“抗议活动”的程序。鉴于提交人曾于不到一年之前犯下了相似的行政违法行为，又参加了2007年10月30日的“抗议活动”，这次依据《行政违法法》第23.34条第3部分，判定提交人行政违法。

6.5 缔约国最后说，一群公民举行或参与群众活动的意愿不应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国家通过确保人们遵守《群众活动法》的规定等方式，保障对公民的保护。

### 提交人的进一步陈述

7.1 2009年1月23日，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当局并未引证任何额外的论点支持他们的主张，即他没有权利参加和平集会，即纪念活动，或公开表达他对苏维埃俄国政治迫害的见解。他补充说，缔约国在意见中已经承认：(1) 举行纪念活动

的地点是当年政治迫害受害者被处决的地点；(2) 纪念活动是一次和平集会；(3) 纪念活动是在农村地区举行的；(4) 参与者使用的标志(白—红—白色旗帜和木质十字架)并没有被法律或法院所禁止；(5) 公开声明中并没有呼吁推翻政府、组织群众骚乱或从事其他非法行为；(6) 缔约国当局(警察)干涉了和平集会，也干涉了参与者表达自己见解的行为；(7) 没有任何资料表明，纪念活动给任何人造成了道德上的痛苦或身体伤害；(8) 没有任何人因纪念活动而权利遭受侵害。

7.2 提交人说，纪念活动是在林区举行的，那里是政治压迫受害者被处决的地点，并不是在停车场或者高速公路上。他注意到，缔约国当局未能查明活动的组织者，反而随机选择了纪念活动的一些参与者进行处罚。提交人重申了自己的论点，即他通过参加和平集会，合法地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统治时期政治迫害的见解。因此，警察要求停止纪念活动，并不是旨在制止提交人的非法行为，而是在剥夺他的和平集会权和言论自由权。

### 缔约国的补充陈述

8.1 在 2009 年 5 月 25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重申了之前提出的，已在上文 6.2 至 6.5 段概括的论点，并补充说，《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规定，可以对第十九条第 2 款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加以一定的限制。《公约》第二十一条保障了和平集会权。不得对该项权利的行使施加任何限制，除非是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和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8.2 缔约国认为，白俄罗斯已在国家立法中落实了《公约》的条款<sup>4</sup>，包括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与此同时，《宪法》第 23 条允许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加以限制，但只有根据法律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健康和道德，为了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时，才允许这么做。

### 提交人的补充陈述

9. 2009 年 7 月 21 日，提交人指出，他的整体政见与白俄罗斯目前的当权派不同，他已多次因参加和平集会和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处罚。他得出结论，缔约国因为他的政见和其他观点，特别是反对苏维埃俄国斯大林主义迫害，未能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他行使和平集会权和言论自由权，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1 款。因此，提交人恳请委员会认定，他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sup>4</sup> 请参阅《宪法》第 33 条和第 35 条。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10.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10.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甲)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缔约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乙)项的要求已经达到。

10.3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提出的申诉证据充分，符合受理要求，宣布本案可予受理并进一步审理案情。

### 审议案情

11.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结合各当事方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来文。

11.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缔约国当局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驱散哀悼受到苏维埃俄国斯大林主义迫害的受害者纪念活动的这一行为，侵犯了他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因为他被带离了纪念现场，并随后被处 62 万白俄罗斯卢布的罚款，罪名是在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中公开表达个人和其他利益。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称，提交人违反了组织和举行群众活动的程序，依据《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第 3 部分，负有行政责任。

11.3 委员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提交人的案件适用了《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第 3 部分，因而导致纪念活动终止以及随后的罚款，是否对提交人的言论自由权构成第十九条第 3 款意义内的限制。委员会注意到，《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第 3 部分规定，违反组织或举行群众活动程序要负行政责任，委员会还注意到，因为缔约国施加了“举行群众活动”的程序，实际上是对传递信息的自由的行使设立了限制，而这一自由是《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所保障的<sup>5</sup>。

11.4 因此，第二个问题是，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本案中这些障碍是否合理，即，是否由法律所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 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 为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委员会回顾，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自由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它们是每个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基石。<sup>6</sup> 对行使这类自由加以限制必须符合关于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严格判断标准，“施加限制的目的仅限于明文规定的，并且必须与所指特定需要直接相关。”<sup>7</sup>

<sup>5</sup> 第 780/1997 号来文，Laptsevich 诉白俄罗斯，2000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1 段。

<sup>6</sup>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第十九条：见解和言论自由的第 34 号(2011)一般性意见，第 2 段。

<sup>7</sup> 同上，第 22 段。

11.5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认为《群众活动法》的条款旨在创造条件，使公民得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并在此类群众活动中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对他不适用，因为该条款并没有规定，仅仅参加群众活动也要负行政责任。此外，鉴于这些纪念活动并不受白俄罗斯法律的约束，2007 年 10 月 30 日纪念活动的参与者没有向主管当局请求获得组织群众活动的批准。就此，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和缔约国的分歧在于，该纪念活动是否构成“群众活动”，要遵守《群众活动法》所规定的“举行群众活动的程序”，分歧还在于，《行政违法法》第 23.34 条是否禁止仅仅是参加群众活动，以及提交人是否展示了旗帜或其他标志或宣传材料。

11.6 即使对提交人的制裁根据国家法律是允许的，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出任何论点，说明是否具备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所阐述的任何一项合理目的的要求实施这些制裁，以及提交人公开表达自己反对苏维埃俄国斯大林主义迫害会带来什么危胁。委员会得出结论，在缔约国没有作出有关解释的情况下，限制提交人行使言论自由权，不能被视为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所必需采取的措施。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提交人依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11.7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提交人的主张，即他依据《公约》第二十一条享有的集会自由权受到了侵犯，因为他被专制地禁止举行和平集会。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说，《公约》第二十一条所阐述的权利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受到限制。《公约》第二十一条的第二句话规定，对和平集会权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了(1) 按照法律需要而作出的限制，(2) 在民主社会中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作出的限制。<sup>8</sup>

11.8 在本案中，委员会必须考虑，依据《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句话所阐述的标准，对提交人自由集会权的限制是否合理。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强调说，限制是按照法律实行的。然而，缔约国没有向委员会提供任何资料，证明纪念受斯大林主义迫害受害者的行为如何会在实际上侵害《公约》第二十一条所阐述的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利益、公共秩序、对公共卫生或道德的保护或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在本案中，缔约国还侵犯了提交人依据《公约》第二十一条所享有的权利。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表明白俄罗斯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一条。

<sup>8</sup> 见第 1604/2007 号来文, Zalesskaya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6 段。

13.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甲)项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包括按2007年10月的价值折算退还对提交人的罚款，为提交人支付全部法律费用并给予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14.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在缔约国内以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广泛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J. 第 1781/2008 号来文, Berzig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Fatma Zohra Berzig  
(由 TRIAL — 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Kamel Djebrouni (提交人之子)及提交人本人

所涉缔约国: 阿尔及利亚

来文日期: 2008 年 2 月 8 日(首次提交)

事由: 被迫失踪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 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待遇;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利; 尊重人类固有的尊严; 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和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第 1 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 至 4 款; 第十条第 1 款; 第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Fatma Zohra Berzig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的第 1781/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玛·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按照《议事规则》第 90 条, 利扎里·布各德先生没有参加来文的审议。

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费边·奥玛·萨尔维奥利先生和科内利斯·费林特曼先生签署的两份个人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 意见

1.1 2008 年 2 月 8 日来文的提交人 Fatma Zohra Berzig, 生于 1936 年 3 月 2 日, 是阿尔及利亚公民。她代表她的儿子 Kamel Djebrouni 及本人提交来文。Kamel Djebrouni 1963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阿尔及尔的 Sidi M'hamed。她称其儿子是阿尔及利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第十条第 1 款和第 16 款行为的受害人。此外, 她称自己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 7 款的受害人。她的案件由 TRIAL(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sup>1</sup>

1.2 2009 年 3 月 12 日, 负责新来文的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决定拒绝缔约国 2009 年 3 月 3 日提出的要求, 即请求委员会将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分开审议。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4 年 11 月 19 至 20 日夜里, 凌晨两点钟, 十五六个身穿制服、持械蒙面的军人包围了 Kamel Djebrouni 在 Sidi M'hamed (阿尔及尔)巴尔扎克城的住所, 并逮捕了他。军人是乘军车和一辆小装甲车来的。他们一开始找错了门。听说军人们要找 the taxi driver, 一个邻居将他们带到了 Djebrouni 家门口。他们叫醒了提交人和她的三个儿子, 向 Kamel Djebrouni 要资料和车钥匙, 并迫使他跟他们去。提交人看她的儿子只穿了一件运动裤和一件 T 恤, 就要军人给他点时间穿衣服。他们中的一个人回答说几分钟就回来了, 很快就释放他。

2.2 此后, 受害者就再也没回来, 当局没有告知家人他的情况。亲戚们得到的关于此事的唯一消息, 也未曾得到证实, 就在 1995 年 2 月 23 日, 失踪者的一位前同事来到家里, 告知他们以前的囚犯提供的证词, 但他不愿透露该囚犯的身份和地址, 该囚犯 17 天前被执法当局释放, 他曾和受害者住一间囚室。然而, Djebrouni 家人不能直接与这名囚犯交流。

2.3 在 Kamel Djebrouni 被逮捕后, 他的哥哥立刻去了该区的警察局(第 8 区)。在场的警察声称不能给他提供相关信息, 并建议等到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 12 天拘押期满。期满后, 家人与阿尔及尔不同法院进行了很多次交涉, 想知道 Kamel Djebrouni 是否已移交检察院。

2.4 1995 年 1 月 11 日, 受害人的兄弟前往国家人权观察站告知了受害者被逮捕的详细情况。接待他的人员表示将要求各安全部门查找其下落, 并且会书面通知他调查的结果。但尽管受害者哥哥几次打电话, 3 年之后(1998 年 2 月 14 日)又写信联系该机构, 国家人权观察站并未向受害人家属提供关于受害人的任何信息。

<sup>1</sup>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9 月 12 日对阿尔及利亚生效。

2.5 1998年9月12日，宪兵来到家里，寻找受害人。他们要提交人第二天带着户口簿和两名逮捕见证人到 Bab Edjedid 宪兵队。提交人、她的儿子和两名证人于1998年9月13日到了该地。首先对提交人儿子的证词做了记录。然后宪兵又分别听取了两名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只记录第一个证人的证词有用，认为第二名证人什么都没看到。反驳之后，提交人和两名证人还是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以及1998年9月24日 Sidi M'hamed 的 Daira 认证的签名记录了事件的经过。

2.6 1999年6月9日，国家人权观察站给受害人家庭寄了一封信，通知他们搜寻工作没有结果，安全部门并未通缉 Kamel Djebrouni，也没有逮捕他，这与1998年9月15日，即听取家人和证人证词后两天，宪兵队提交的笔录是一致的。其家属没有被通知执法当局采取的调查方式，也从未收到国家人权观察站所寄信件中提到的笔录复印件。提交人指出，1999年6月9日寄给家属的信提到的逮捕日期是错误的。因为受害人是在1994年11月20日被逮捕的，而信中提到的日期为1995年9月2日。1999年8月24日，提交人的儿子给国家人权观察站的秘书长写信，目的是提醒其注意不正确的数据。

2.7 2004年7月27日，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咨询委员会在国家人权观察站之后给 Djebrouni 家属寄了一封信，要求他们2004年8月7日到其总部。其家属听从了这一传唤，并向其讲述了与受害人被绑架有关的所有情况，但之后并没有收到该机构的消息。

2.8 此外，家属还将 Kamel Djebrouni 失踪的消息告知大赦国际，大赦国际于1995年12月11日将该案件交给联合国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工作组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寻找受害人，但缔约国并未对该要求做出回应。

## 申诉

3.1 提交人称，她的儿子被迫失踪，<sup>2</sup> 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1至4款、第十条第1款和第16款行为的受害人。提交人还称她本人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七条以及第二条第3款行为的受害人。

3.2 缔约国国家官员逮捕 Kamel Djebrouni 之后，拒绝承认剥夺其自由并隐瞒其遭遇。他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他的长期失踪以及被逮捕的情形和背景使人认为他在拘留期间丧生。根据委员会对第6条的一般性意见，<sup>3</sup> 提交人提出，单独监禁的情况导致侵犯生命权的风险很高，因为受害人任凭狱卒的摆布，由于性质和环境的关系，狱卒不受任何监控。即使在假设失踪并没有导致丧生的情况下，由于政府没有履行保护基本生命权<sup>4</sup> 的义务，受害人生命因而受到

<sup>2</sup> 提交人援引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2(一)款规定的“被迫失踪”的定义，以及《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的规定。

<sup>3</sup> 提交人援引了1982年7月27日第6号一般性意见第4段。

<sup>4</sup> 提交人援引了第84/1981号来文，Dermi Barbato 诉乌拉圭，1982年10月21日通过的《意见》，第10段。



威胁，这也违反了第六条。提交人还补充说，缔约国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调查受害人的遭遇，所以更没有履行保护 Kamel Djebrouni 生命权的义务。因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以及第二条第 3 款。

3.3 根据委员会的判例，提交人指出，被强迫失踪这一事实本身即构成了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因此，因 Kamel Djebrouni 与家人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长期被拘留引发的焦虑和痛苦对 Kamel Djebrouni 构成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sup>5</sup> 此外，在失踪者家属不知道受害人的任何遭遇的情况下，以及受害人或许死亡、他死亡时的情况以及是否被埋葬的情况下，提交人认为她儿子失踪在过去和将来都为来文提交者以及其他亲属构成了使人麻痹的、痛苦和焦虑的折磨。根据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判例，<sup>6</sup>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还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二条第 3 款，侵犯了她的权利。

3.4 提交人指出，Djebrouni 家属求助的政府机构不承认拘留了受害人；通过国家人权观察站的途径，缔约国明确否认军人逮捕了 Kamel Djebrouni；至今阿尔及利亚政府还未承认非法逮捕和拘留了该公民，而这一逮捕是在证人目睹的情况下发生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至 4 款。关于第九条第 1 款，提交人提到，Kamel Djebrouni 是在没有法院命令，也未被告知逮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从他被逮捕后，所有家庭成员都没再见到他，也无法与他联络。从 Kamel Djebrouni 被逮捕的情况来看，他一直未被告知对其进行的刑事指控，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2 款的行为。此外，Kamel Djebrouni 在合法拘留期间或拘留期满后均未被送往法庭或逮捕地和领土管辖地阿尔及尔法院的检察院等其他司法机关。需要注意的是，秘密拘押本身就违反第九条第 3 款，提交人认为 Kamel Djebrouni 的案件中显示存在违反该条款。最后，Kamel Djebrouni 在未被确定的拘押过程中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他无法提起诉讼质疑该拘押的合法性也不能要求法官释放他，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4 款。

3.5 此外，提交人认为，由于违反《公约》第七条实行秘密拘押，她的儿子没有受到人道的、尊重人类固有尊严的待遇。因此她认为她儿子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条第 1 款行为的受害人。

3.6 提交人还强调指出，Kamel Djebrouni 是被迫失踪的受害人，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为此，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在与被迫失踪判例中的立场。

<sup>5</sup> 提交人参照了委员会的判例，尤其是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9.8 段；以及第 950/2000 号来文，Sarma 诉斯里兰卡，2003 年 7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9.5 段。

<sup>6</sup> 除了上文提到的判例，提交人特别参考了第 1044/2002 号来文，Shukarova 诉塔吉克斯坦，2006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8.7 段；第 959/2000 号来文，Baza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5 段；第 1159/2003 号来文，Sankara 等人诉布基纳法索，2006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2 段。

3.7 提交人还认为，她为了解儿子的遭遇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没有得到回应，缔约国没有履行保障 Kamel Djebrouni 获得有效救助的义务，因为该国本应对其失踪做深入、认真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通知家人。2006 年 2 月 27 日颁布第 06-01 号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法令颁布后，在法律层面上规定实行全部和普遍赦免，缺乏有效救助的情况就更明显了，该宪章禁止为揭示被迫失踪等严重罪行进行法律救济，否则将被处以监禁，以确保行为责任人不受法律惩罚。该赦免法违反了国家对严重侵犯人权以及受害人寻求有效救助的权利进行调查的义务。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对她和她的儿子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

3.8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是否已用尽的问题，提交人强调说，提交人及其家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以失败告终。第 8 区的警察不迅速开展认真、公正的调查，这不仅造成了缔约国违背国际承诺，也违反了国内法，因为《阿尔及利亚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当司法警察得知有违法现象发生时，要在共和国检察官的指示下或依职权进行初步调查”。<sup>7</sup> 除了对国家人权观察站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咨询委员会采取的行动，还有宪兵队做的所谓调查，这是目前为止所做的唯一一项调查。但宪兵队的调查是表面的、不充分的，在听取家人和唯一一个证人陈述刚过两天就把笔录作为最终报告寄给国家人权观察站，而听证程序一般是一切调查的开始。当局甚至否认国家部门介入到 Kamel Djebrouni 失踪的事件中，而受害人整个家属和他们的一些邻居都是逮捕的证人。

3.9 提交人还补充强调，在第 06-01 号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法令颁布后，她发现在法律层面无法向司法机关申诉。<sup>8</sup> 如果提交人提起的所有诉讼已经无用和无效，此后就完全不可用了。所以，提交人认为为了委员会能受理来文，她不必再继续寻求完成国内程序，以免遭到刑事起诉。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9 年 3 月 3 日，缔约国反对受理来文和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其他十份来文，并在“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与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有关的来文不予受理参考备忘录”中表明了其立场。因为缔约国认为来文指控公职人员或者在发生被迫失踪案件发生、即 1993 年至 1998 年期间的责任，按政府部门命令行动应在整体框架下进行处理，指控的事实应置于政府很难应对恐怖主义的国内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下。

<sup>7</sup> 修改和补充过的 1966 年 6 月 8 日第 66-155 号《刑事诉讼法》法令。

<sup>8</sup> 提交人指出，《宪章》拒绝“任何旨在让国家为故意失踪现象承担责任的指控”。此外，2006 年 2 月 27 日颁布的法令第 45 条规定“不能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包括所有部门)成员所采取的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任何个人或集体诉讼。所有的指控或起诉都不被主管司法机构受理”。第 46 条规定，“通过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行为，利用或以国家遭遇的损害为工具，对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机构造成伤害、危害国家安定、损害为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声誉、或在国际层面上玷污阿尔及利亚形象的任何人都将被处以 3 至 5 年监禁和 250,000 至 500,000 第纳尔的罚款”。

4.2 在那个时期，政府要与一些松散的团体作斗争。所以有些行动是在平民当中混乱开展的。民众很难区分恐怖主义集团的行动和执法当局的行为。平民多次认为被强迫失踪事件是由执法当局所造成的。然而，被迫失踪的情况有很多原因，缔约国认为并不应该归咎于政府。根据很多独立来源提供的数据，尤其是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资料，在该时期阿尔及利亚一般概念的失踪人员涉及 6 起独立案件，其中没有任何一起案件归咎于政府。缔约国列举了被其亲属宣布失踪者的情况，但是这些人是自己秘密藏匿起来，以加入武装团伙，同时要求家属宣称他们被安全机构逮捕，以“混淆视听”并避免被警察“骚扰”。第二种情况是，一些被安全部门逮捕后失踪的人在被释放后加入地下组织。还有一种情况是失踪的人被武装团伙绑架，因为武装团伙没有被辨认出来，或是盗用警察或军人的制服或身份证明文件，所以被错误地当成武装部队或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第四种情况是，家人寻找的人因长期的个人问题或家庭纠纷主动放弃亲属，有时甚至离国他去。第五种情况是，家人认为失踪的人事实上是在敌对武装团伙之间“趋势之战”、或“学说之争”或“战利品分赃不均”之后被搜寻、杀害、葬身丛林的恐怖主义分子。最后缔约国提到了第六种可能性，被寻找的失踪人员要么在国内要么在国外被找到，用伪造证件网络提供的假身份生活。

4.3 缔约国强调，阿尔及利亚立法者在对《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进行全民公决后，考虑到一般概念失踪所包含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张通过在“国家悲剧”背景下救助所有失踪人员，在整体框架下处理失踪人员的问题，支持所有受害人以使其能够克服这一困难，并赋予所有失踪受害人及其权利继承人获得赔偿的权利。根据内政部机构所作的统计，申报了 8,023 起失踪案件，审查了 6,774 起案件，5,704 起案件被接受进行赔偿，934 起案件被拒绝，还有 136 起正在审查。已对相关受害人进行了 371,459,390 第纳尔的赔偿。此外，还有 1,320,824,683 第纳尔是以每月抚恤金的方式支付的。

4.4 缔约国还强调指出，并未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强调了区分向政治或行政机关提出的简单程序、向咨询或协调机构进行的非诉讼申诉以及向各种司法机构提出的诉讼申诉的重要性。缔约国注意到，从提交者<sup>9</sup>的声明中可以看出，申诉人给政治或行政机关写信，向咨询或协调机构申诉，并向检察官代表(检察长或共和国检察官)递交请求，但严格地说并未进入法律救济程序并通过运用上诉和复审等所有可用的申诉手段将其进行到最后。在所有这些机关中，只有检察署的代表有权依法开展初步调查并提交给预审法官。在阿尔及利亚司法系统中，共和国检察官负责接收申诉，并在必要时，进行起诉。但为保护受害人或其权利继承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授权他们可以直接向预审法官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受害人而不是检察官并向预审法官提出诉讼。《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和第 73 条规定的这一补救没有被使用，而受害人本应依此提出诉讼并促使预审法官进行调查，即使检察院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sup>9</sup> 缔约国已为 11 份不同的来文做出了总体回答，在备忘录中指的是“提交人”。这也包括此份来文提交人的情况。

4.5 缔约国还注意到，在提交人看来，全民公决通过的《宪章》及其实施文件，尤其是第 06-01 号法令第 45 条使人认为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存在对失踪受害人家人有效、有用和可用的国内补救。在此基础上，提交人自认为没有义务告知主管司法机关，而是预断其在实施该法令中的立场和评价。然而提交人不能援引该法令及其实施文件为没有使用可用的司法程序找借口。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的判例，按照该判例，“一人主观认为或推定申诉无用并不能使其免于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sup>10</sup>

4.6 缔约国随后又提到了《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及其实施文件的性质、基础和内容。根据已成为国际和平法的不可剥夺和平的原则，缔约国强调，委员会被要求促进和巩固这一和平并促进民族和解，以使受内部危机影响的国家增强其能力。为努力促进民族和解，政府通过了这一宪章，其条例规定了中止诉讼以及为恐怖主义行为者减刑或加刑等法律措施，或已经享受了民事纷争条款的权利，但不包括进行集体屠杀、强奸或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袭击的主犯或从犯。这些条例还规定了通过宣布死亡司法程序支持处理失踪问题的措施，该程序规定了权利继承人代替“国家悲剧”受害人享有补偿的权利。此外，还采取了社会经济措施帮助再就业或为“国家悲剧”受害人进行赔偿。最后，条例规定了禁止任何在过去操纵宗教、造成“国家悲剧”的人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措施，并宣布不受理任何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包括所有部门)成员所采取的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的个人或集体诉讼。

4.7 除了为“国家悲剧”所有受害人设立赔偿基金外，缔约国指出，阿尔及利亚人民接受采取民族和解措施，这是抚平创伤的唯一方式。缔约国强调，公布该宪章就是想避免发生司法冲突、媒体的无据报道和政治规则冲突等情况。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申诉的事件属于《宪章》条款规定的国内整体解决机制范围内的事件。

4.8 缔约国要求委员会注意提交人描述事件和状况的相似性，以及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认识到提交人并未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并注意到缔约国政府设立了内部处理机制，并按照《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条约和《公约》原则一致的国家和平与和解条款制定了来文所指案件的整体规则；判定这些来文不可受理并请提交人寻求补救。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补充意见

5.1 2009 年 10 月 9 日，缔约国向委员会移交了一份附加报告书，在其中询问了提交给委员会的一系列个人来文是否绕过程序，旨在向委员会提交一个整体的历史问题，委员会对其原因和背景都不了解。为此缔约国注意到，这些“个人”来文注意的是失踪现象发生的整体背景，只是集中于执法当局的行为，从未提到各种武装团伙的行为，这些团伙采用了违法的伪装技术让武装部队来承担责任。

<sup>10</sup> 缔约国主要引用的是第 210/1986 号和第 225/1987 号来文，Pratt 和 Morgan 诉牙买加，1989 年 4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

5.2 缔约国坚持，在对可否受理问题做出决定之前，缔约国将不会对关系上述来文的案情表态；在审议案情之前，任何司法机构或相关机构的义务首先是处理先决问题。缔约国认为，对可否受理问题以及这种情况下与案情联合和伴随发生的问题进行审议的决定，除了没有被商议之外，无论在整体性质上还是内在特性上，都对提交的来文做出适当的处理造成严重损害。按照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内部规则，缔约国注意到与委员会审议来文可否受理有关的部门与审议案情的部门是分开的，因而可以分开审议。特别是在国内补救程序用尽的问题上，缔约国强调，提交人提交的任何来文都不经过使其经受国内司法机关审议的司法进程。只有提交的某些来文到了重罪起诉庭，即法院层面上的第二级预审司法机关。

5.3 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义务方面的案例，强调指出，仅对成功前景有所怀疑以及担心延期并不能免除提交人用尽这些补救办法。关于《宪章》的颁布使人无法对这方面进行申诉，缔约国回答说，提交人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使申诉得以解决的状况，目前也无法使阿尔及利亚当局决定扩大或限制该宪章条款的适用性。此外，条例要求宣布不可受理的只是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成员”按照共和国要求的基本职责采取的行动，即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的诉讼。相反，可能要归咎于防卫和安全部队行为的起诉，可以被证明是在此框架外采取的行动，可能要由主管司法部门进行审理。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6.1 2011年5月13日，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做出评论，并提供了关于案情的补充论证。

6.2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接受委员会具有处理个人来文的权限。这一权限是普遍的，委员会行使该权限不受缔约国控制。特别是，缔约国无权评判委员会受理特殊状况的提诉是否恰当。在委员会对来文进行审议时，应由委员会做出这种评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为救助“国家悲剧”受害人所采取的内部法律和行政措施不应在审议可否受理阶段提及，用来禁止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个人求助于《任择议定书》规定的机制。<sup>11</sup> 理论上，这些措施可以对冲突的解决产生有效的影响，但应在审查案情时进行分析，而不是在可否受理阶段。正如委员会指出的那样，<sup>12</sup> 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法律措施本身就违反了《公约》中规定的权利。

<sup>11</sup> 《维也纳公约》关于条约法的第二十七条规定“一方不能援引一部内部法律的条款证明一份条约没有执行。该规定不损害第四十六条。”

<sup>12</sup> 提交人参照的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阿尔及利亚，CCPR/C/DZA/CO/3，2007年12月12日，第7、8和13段。提交人还参照了第1588/2007号来文，Daouia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2010年7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9.2段；以及第1196/2003号来文，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11段。提交人还参照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阿尔及利亚，CAT/C/DZA/CO/3，2008年5月16日，第11、13和17段。最后还参照了关于紧急状态下减损法律效力的第29号一般性意见，第1段。



6.3 提交人回顾说, 1992 年 2 月 9 日阿尔及利亚颁布的紧急状态绝不影响到个人向委员会提交个人来文的权利。因为《公约》第四条规定, 公布紧急状态只会减损《公约》某些条款的效力, 并不影响其《任择议定书》中权利的行使。因此提交人认为, 缔约国对于来文是否恰当的考虑不是不予受理的有效原因。

6.4 此外, 提交人评论了缔约国的论点, 根据其论点,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及之后的条款(第 25 款),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要求提交人通过向预审法官提交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申诉提出诉讼。她提到了委员会最近在 *Daouia Benaziza* 案件中的一个判例, 2010 年 7 月 27 日通过了意见, 在该案件中,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对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 尤其是涉及到被迫失踪和损害生命权, 而且有义务对任何可能对这些权利造成损害的行为人进行刑事诉讼, 审判并公布其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提交的有严重罪行的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诉状不能取代共和国检察官应亲自提出诉讼”。<sup>13</sup> 因此提交人认为, 像提交的如此严重的案件, 应该由主管机构来审议案件。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由 *Djebrouni* 家属采取了各种措施将 *Kamel Djebrouni* 的失踪事件告知相关机构, 而且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徒劳的。

6.5 关于缔约国提出的简单的“主观相信或推定”不能免除来文提交者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的论点, 提交人提到了第 06-01 号法令第 45 条, 按照该法令规定, 不能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起诉防卫和安全部队成员。提起这种诉讼或控告将被处以三至五年的有期徒刑和 250,000 至 500,000 第纳尔的罚款。缔约国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如何能使提交的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诉状不仅不能被有管辖权的机构受理并进行正式申诉, 这意味着这些机构违反了法令第 45 条的规定, 以及提交人如何能免受法令第 46 条的限制。正如条约机构的案例所证实的那样, 阅读这些条款即可得出结论, 即任何关于包括提交人和她儿子所受到的侵害在内的申诉不仅是不可受理的, 而且甚至要受到刑事处罚。提交人指出, 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例证, 用来说明尽管存在上述法令, 仍有某一案件在和该案件类似的情况下, 侵犯人权的责任人受到了真正的起诉。提交人最后说, 缔约国提到的补救是无效的。

6.6 关于来文的案情, 提交人指出, 缔约国仅列举“国家悲剧”受害人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失踪的情况。这些一般意见与该来文陈述的事实并不冲突。此外, 还在一系列其他案件中以同样的方式列举了这些一般意见, 因此表明缔约国还是不想按案件的个别情况处理这些案件。

6.7 根据缔约国的论点, 缔约国有权要求将可否受理的程序和处理来文案情的程序分开, 提交人引证了《议事规则》第 97 条第 2 款, 该款规定“出于案件的特殊性, 工作组或特别报告员可以只要求做出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书面答复。”这些特权既不属于来文提交人, 也不属于缔约国, 只有工作组或特别报告员有该

<sup>13</sup> 第 1588/2007 号来文, *Daouia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 第 8.3 段。

权限。提交人认为，本案件与其他被迫失踪的案件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把可否受理的问题和案情问题分开。

6.8 最后，提交人指出，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的陈述。很多关于执法当局在该时期违法行为的报告以及她采取的很多行动都证实并确认了其陈述。鉴于缔约国对她儿子失踪应负的责任，提交人无法提供更多资料支持其来文，因为这些资料在缔约国手中。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因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子)款规定必须这样做，委员会应确保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没有正在审议同样的问题。委员会指出，Kamel Djebrouni 失踪已向联合国强迫失踪工作组报备。然而，委员会提醒说，人权事务委员会或人权理事会设立的公约外程序或机制，其职责在于审议并公开报道一国或他国或某土地上的人权状况，或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一般来说不属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子)款意义上的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sup>14</sup>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该条款，委员会认为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工作组对 Kamel Djebrouni 案件的审议并没有导致来文不可受理。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没有考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2 和 73 条通过附带民事部分构成向预审法官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使申诉得以解决的状况目前也无法使阿尔及利亚当局决定扩大或限制《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条款的适用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Kamel Djebrouni 失踪的第二天，他哥哥就去了阿尔及尔(Sid M'hamed)第 8 区警察局并打听其遭遇；失踪者家属随后也到阿尔及尔各法庭打听 Kamel Djebrouni 是否已被提交检察院；而且 Bab Edjedid 旅的警官于 1998 年 9 月 13 日对提交人、她儿子和两名证人做了听证之后，也没有进行任何深入调查。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第 63 条规定“当司法警察得知有违法现象发生时，应按共和国检察官的指示或依职能进行初步调查”。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论述中认为，对于像申诉这样严重的事件，应由主管部门审议案件，但并没有这样做。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第 06-01 号法令第 46 条惩罚在法令第 45 条规定的行动框架下提出申诉的任何人。

7.4 委员会回顾说，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对这些机构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尤其是涉及到被迫失踪和损害生命权，而且有义务对任何可能对这些权

<sup>14</sup> 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1996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7.1 段。

利造成损害的行为人进行刑事诉讼，审判并宣判刑罚。受害人家人多次将 Kamel Djebrouni 的失踪告知相关部门，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的。缔约国对提交人的儿子失踪没有进行任何深入和认真的调查，而这是涉及被迫失踪的严重案件。此外，缔约国没有提供资料证明一种有效、可用的补救办法事实上是存在的，而 2006 年 2 月 27 日第 06-01 号法令继续在适用，尽管委员会建议使其与《公约》相一致。<sup>15</sup> 委员会重申了之前的判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交的有严重罪行的附带民事部分构成的诉状不能取代共和国检察官应亲自提起的诉讼。<sup>16</sup> 此外，鉴于法令第 45 条和第 46 条的规定有不明确性，且没有缔约国对其做出解释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的确凿信息，提交人对提交申诉的结果有所恐惧是有道理的。委员会判定《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丑)款并不妨碍来文的可受理性。

7.5 委员会得出结论，申诉引起了《公约》第六条第 1 款和第七、九条第 1 至 4 款、十、十六条以及第二条第 3 款下的问题，提交人已对其陈述做了足够的论证，因此开始对来文的案情进行审查。

### 审查案情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出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正如委员会在之前的来文中已经强调的，缔约国为其提供了关于这种申诉的提交人提出的严重申诉的共同和一般意见，不得不指出的是，缔约国仅仅满足于主张要求公职人员承担责任的来文或在 1993 至 1998 年期间在政府授权下从事被迫失踪案件的来文，都应在整体框架下处理，应把申诉的事件置于政府应对恐怖主义时期国内的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之下。委员会坚持重申 2007 年 11 月 1 日对阿尔及利亚的最终意见<sup>17</sup> 及其判例<sup>18</sup>，据此，缔约国不能援引《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条款反对援引《公约》条款或已提交或将要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人。第 06-01 号法令，没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修正，似乎鼓励有罪不罚，因此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申诉案情做出回应，并提及一份案例，<sup>19</sup> 按照该案例，举证的责任不应完全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别是鉴于提交人和缔约国双方获取证据的渠道并非总是相同，而且往往只有缔约国一方才能获得相关的资料。《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含蓄地提出，缔约国有义务对它和它的代表违反《公约》行为的所有指控进行认真调查，并向委员会提供所掌握的相关信

<sup>15</sup> 人权委员会最终意见，阿尔及利亚，CCPR/C/DZA/CO/3，2007 年 12 月 12 日，第 7、8 和 13 段。

<sup>16</sup> 第 1588/2007 号来文，Daouia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第 8.3 段。

<sup>17</sup> CCPR/C/DZA/CO/3，第 7(a)段。

<sup>18</sup> 第 1196/2003 号来文，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 段；第 1588/2007 号来文，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第 9.2 段。

<sup>19</sup> 参见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利比亚，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



息。<sup>20</sup> 在缔约国没有对此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只要提交人进行了充足的证据，便可以相信提交人的指控。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她的儿子是自 1994 年 11 月 20 日被逮捕后失踪的，而尽管他是在有证人目睹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但当局一直否认将其拘押。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找到 Kamel Djebrouni 活着的希望日趋渺茫，他长时间失踪让人认为他在拘留时丧生；单独监禁的情况导致侵犯生命权的风险很高，因为受害人任凭狱卒的摆布，由于性质和环境的关系，狱卒不受任何监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供反驳该指控的任何资料。委员会得出结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没有履行保护 Kamel Djebrouni 生命权的义务。<sup>21</sup>

8.5 委员会认识到与世隔绝无限期被拘禁会有多痛苦。委员会提到了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第七条，其中建议缔约国采取措施禁止单独监禁。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Kamel Djebrouni 于 1994 年 11 月 20 日被逮捕，至今下落不明。在缔约国没有充足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 Kamel Djebrouni 的失踪违反《公约》第七条。<sup>22</sup>

8.6 委员会还注意到 Kamel Djebrouni 的失踪为提交人带来的焦虑和悲痛。委员会认为，所申诉的事件违反了《公约》第七条。<sup>23</sup>

8.7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申诉，从提交人的陈述中得出，Kamel Djebrouni 是在没有法院逮捕令、也未被告知逮捕理由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一直没有被告知对他的刑事指控；他从未被带见法官或其他司法机构，无法质疑自己被无限期拘留的合法性。在缔约国没有做出充足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的结论是，缔约国就 Kamel Djebrouni 一案而言违反了第九条。<sup>24</sup>

8.8 关于第十条第 1 款的申诉，委员会重申，被剥夺自由者不得遭受任何与剥夺自由无关的困苦或限制。必须人道地对待他们，尊重其尊严。鉴于单独监禁的

<sup>20</sup> 参见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

<sup>21</sup> 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Saker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9.11 段；第 449/1991 号来文，Barbarin Mojica 诉多米尼加共和国，1994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意见》，第 5.6 段；以及第 181/1984 号来文，Elcida Arévalo Pérez 诉哥伦比亚，1989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 段。

<sup>22</sup> 参见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wani 诉利比亚，2007 年 7 月 11 日通过的《意见》，第 6.5 段，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利比亚，上文，注释 16，第 6.2 段，第 540/1993 号，Celis Laureano 诉秘鲁，1996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8.5 段；以及第 458/1991 号，Mukong 诉喀麦隆，1994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9.4 段。

<sup>23</sup> 参见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利比亚，第 7.5 段，第 1422/2005 号，El Hassy 诉利比亚，上文注释 16，第 6.11 段，第 107/1981 号，Quinteros 诉乌拉圭，1983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14 段；以及第 950/2000 号，Sarma 诉斯里兰卡，上文，第 9.5 段。

<sup>24</sup> 参见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5 段。

情况，且缔约国对此没有提供信息，委员会认定存在违反《公约》第十条第 1 款的行为。<sup>25</sup>

8.9 关于违反第十六条的申诉，委员会重申了其一贯的判例，根据该案例，有目的地长期使一个人得不到法律保护可能构成不承认此人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如果受害人最后被外界看到时是在国家主管当局的掌控中，同时，如果其亲属争取可能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诉诸法院(《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的行动受到系统的阻碍。<sup>26</sup> 在本案中，提交人表示没有她儿子的消息，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的申诉提供充足的解释。委员会认为 Kamel Djebrouni 被迫失踪将近 17 年使其无法受到法律保护，并剥夺了承认其法律人格的权利，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

8.10 提交人援引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该款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公约》承认的权利被侵犯的任何个人能够进行有效补救。委员会极为重视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建立处理有关侵犯权利的指控的适当司法和行政机制。委员会提到了第 31 (2004)号一般性意见，其中阐明如果缔约国不对侵犯权利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可能会引起对于《公约》的再次违反。在本案中，受害人家人多次将 Kamel Djebrouni 的失踪告知相关职能部门，但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徒劳的。缔约国对提交人的儿子失踪没有进行任何深入和认真的调查。此外，关于落实《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第 06-01 号法令颁布之后，无法向司法机构进行合法申诉使 Kamel Djebrouni 和提交人无法进行任何有用的申诉，因为该法令禁止为澄清被迫失踪等最严重罪行进行申诉，否则将被处以监禁。<sup>27</sup> 委员会认为，它面前的事实表明，就 Kamel Djebrouni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以及相关关联的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六款；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二条第 3 款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七条。

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就 Kamel Djebrouni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六条，以及与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sup>25</sup> 参见关于第十条的第 21 [44]号一般性意见，第 3 段，以及第 1780/2008 号来文，Mériem Zarzi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7.8 段；第 1134/2002 号来文，Gorji-Dinka 诉喀麦隆，2005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5.2 段。

<sup>26</sup> 第 1780/2008 号来文，Mériem Zarzi 诉阿尔及利亚，第 7.9 段；第 1588/2007 号来文，Daouia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第 9.8 段；第 1327/2004 号来文，Grioua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8 段；以及第 1495/2006 号来文，Zohra Madaoui 诉阿尔及利亚，2008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7.7 段。

<sup>27</sup> CCPR/C/DZA/CO/3，第 7 段。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办法，主要包括(a) 对 Kamel Djebrouni 的失踪进行深入、认真的调查；(b) 为提交人提供关于调查结果的详细信息；(c) 如果还被单独监禁的话应立即将其释放；(d) 如果 Kamel Djebrouni 已死亡，将其遗体归还家人；(e) 对此种违法行为负有责任者提出刑事起诉、审判和处罚；以及(f) 对提交人所蒙受的侵权行为进行适当的赔偿，如 Kamel Djebrouni 在世，也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赔偿。缔约国尽管颁布了第 06-01 号法令，但还应该确保不能阻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人获得有效救助的权利。此外，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11. 铭记缔约国加入了《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按照《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一百八十天时间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法文本为原文。最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的个人意见 (反对)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履行保障 Kamel Djebrouni 和 Mourad Chihoub 生命权的义务，直接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我不赞成这一结论，原因如下。

长期以来委员会关于被迫失踪案件的判例中，事实并不能解释为受害人确实死亡，这些案例强调缔约国按照第二条第 3 款确保保护和保障有效且可强制执行补救的义务，因此援引第六条第 1 款以及与其有关的条款。委员会近期证实了在两个起诉同一缔约国并有着同样事实背景的被迫失踪案件中采用的这一方法模式。<sup>a</sup>

然而在审议本案中，委员会没有进入辩论，甚至也没有提及案件中提出的论证，<sup>b</sup> 做出了至今仍是少数成员立场的结论，即直接违反了第六条第 1 款，没有将其与第二条第 3 款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对《公约》确保的生命权的这一广义解释将委员会置于未知的道路上，导致以后在被迫失踪背景之外的各种状况下，不考虑受害人是否死亡都认定为直接违反第六条。至少，大部分都应该提供证明实施新的违反第六条的理由。

克里斯特·特林(签字)

迈克尔·奥弗莱厄蒂(签字)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最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a</sup>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第 1588/2007 号来文)，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以及 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第 1780/2008 号来文)，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特别是 Fabián Salvioli 先生在这两起案件中的不同意见。

<sup>b</sup> 参见第 1780/2008 号来文第 7.11 段。

## 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和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的个人意见(同意)

1. 我完全支持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Djebrouni 诉阿尔及利亚案件(第 1781/2008 号来文)中确定因 Kamel Djebrouni 被迫失踪造成的侵犯他和母亲 Fatma Berzig 人权的决定。

2. 相反, 鉴于以下原因, 我认为委员会还应得出结论: 国家应对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承担责任。最后, 委员会应指出, 缔约国应修改第 06-01 号法令的条款, 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 (a) 委员会有权确定违反来文中没有提及的条款

3. 自从我担任委员会委员以来, 我一直认为委员会不可思议地自己限制了在没有专门法律诉求的情况下得出违反《公约》规定的的能力。当事实明确表明出现违约行为时, 委员会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法律知悉法律(*iura novit curiae*)原则——将事件写入法律。缔约国并非不能接受的这一立场的法律基础和原因在我为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第 3 至 5 段)案件中写的部分不同意见中有所阐述, 我将其提交给这些来文。<sup>a</sup>

4. 在任何情况下, 需要强调的是, 在该案件(Djebrouni 诉阿尔及利亚)中, 提交人明确提出违反第二条(可以参看第 1.1 款和第 3.1 款), 虽然所提及的条款是该条第 3 款。

### (b) 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2 款的规定

5. 国家的国际责任可以产生于行使或不行使其某项职能, 当然特别是立法权, 或依照《宪法》有权制定法律的权力。《公约》第二条第 2 款规定: “该公约缔约国承诺, 与其宪法程序和该公约条款相一致, 做出安排采取某种法律措施, 以落实可能还没有生效的该公约中认可的权利。”虽然第二条第 2 款中规定的义务是一般层面上的, 但不履行义务需要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

6. 该条款是有效力的。委员会在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中强调: “《公约》中规定的义务, 尤其是第二条规定的义务适用于整个缔约国。任何层次(国家、地区或地方)所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和所有其他公共或政府部门都能履行缔约国的责任”。<sup>b</sup>

<sup>a</sup> Anura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案件, 第 1406/2005 号来文; 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不同意见。

<sup>b</sup> 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 《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种类, 2004 年 3 月 29 日第 2187 次会议通过, 第 4 段。

7. 同样,《公约》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立法措施使权利得到落实,即使第二条第2款规定了一项消极的义务:缔约国不能采取违反《公约》的法律措施;采取这样的措施本身就违反了第二条第2款规定的义务。

8. 1989年9月12日,阿尔及利亚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承诺遵守《公约》的所有条款,进而履行第二条第2款规定的以及从这些条款中得出的所有义务。同样是在1989年9月12日,缔约国加入了《任择议定书》,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接收和审议个人的来文。

9. 在审议的来文中,委员会具备将提交的事件写入法律的能力:国家于2006年2月27日批准了第06-01号法令,该法令禁止为澄清被迫失踪等最严重罪行进行申诉,这确保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人不受处罚。毋庸置疑,缔约国用这样一种立法行为定立了一个准则,该准则违背了《公约》第二条第2款确定的义务,这本身就构成了侵犯,除了已确定的侵权行为之外,委员会本应在其决定中指出该侵权行为,因为提交人及其儿子是这一法律条款的受害人。

10. 该条款直接适用于本案,因此在 Djebrouni 案件中认定违反了第二条第2款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辞问题。最后,不应忘记确认违约对委员会要求做出的修正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委员会对每份来文发表意见时都应要求做出修正。

### (c) Djebrouni 案件的补救

11. 决定第10段是完整补救方法模式的极好例子:要求采取非承袭的补救措施,重建、满足并保障非重复(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释放活着的受害人、将死亡受害人的遗体归还家人并对犯有侵犯行为的责任人进行起诉、审判和惩罚);在决定中,委员会还要求采取承袭的补救措施(对提交人以及若还活着的 Kamel Djebrouni 所蒙受的侵权行为进行适当的赔偿)。

12. 然而,在第10段末,委员会指出,“不考虑第06-01号法令,缔约国还应确保不能阻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人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此外,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违约现象。”

13. 引用的该段中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委员会认为,第06-01号法令的条款与《公约》不兼容,委员会要求缔约国确保受害人能够获得有效补救,“不考虑该条款”。因此……委员会的意思是司法机构不应实施阻碍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继续进行调查的该条款?

14. 回答是肯定的;司法机关有义务进行“兼容性控制”并不实施与《公约》不兼容的任何国内条款。为履行人权方面的义务并避免在国际层面上不履行国家义务,这都是不可或缺的。

15. 但是,《公约》并不只对司法机关起作用,对国家其他机关也起作用,这些机关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保护人权,《公约》第二条第2款明确表明是“法律层面的措施”。

16. 怎样确保不重复事实呢？国家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警察局和武装部队的成员进行人权方面的培训、通过强迫失踪案件的高效行动议定书、采取措施记录所发生的事件等)。在对这些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委员会确实应该在决定的第 10 段中指出，阿尔及利亚政府应修改国内条款(2006 年 2 月 27 日第 06-01 号法令)，以使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本身违反《公约》的条款继续生效不符合当前对侵犯人权进行补救的国际准则。

费边·萨尔维奥利(签字)

科内利斯·弗林特曼(签字)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K. 第 1782/2008 号来文, Aboufaied 诉利比亚  
(2012 年 3 月 21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Tahar Mohamed Aboufaied  
(由卡拉马人权组织和瑞士反对有罪不受罚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Idriss Aboufaied 和 Juma Aboufaied  
(提交人哥哥)以及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利比亚

来文日期: 2008 年 4 月 5 日(首次提交)

事由: 非法逮捕; 隔离拘押; 秘密拘押; 酷刑和虐待; 无证逮捕; 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强迫失踪

程序性问题: 缔约国不合作

实质性问题: 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生命权; 禁止酷刑和残忍及不人道待遇;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任意逮捕和拘留; 尊重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固有尊严; 自由迁徙和自由选择其居住地的权利; 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在法律面前的人格获得承认的权利; 言论自由权利; 以及和平集会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第 1 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 至 4 款; 第十条第 1 款; 第十二条第 2 款; 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Tahar Mohamed Aboufaied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82/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塔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 连同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沃尔特·凯林先生和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共同签署的四份个人意见, 附于本意见之后。



## 意见

1.1 2008 年 4 月 5 日来文的提交人 Tahar Mohamed Aboufaied, 为利比亚公民, 1974 年出生, 现住利比亚 Gheriane 市。他代表他的哥哥 Idriss Aboufaied(1957 年出生)和 Juma Aboufaied(年龄不详)并以自己的名义提交本来文。他由卡拉马人权组织和反对有罪不受罚协会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5 月 16 日对利比亚生效。

1.2 提交人称, 他的哥哥 Idriss Aboufaied 两次被捕, 都与他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观点有关。被捕后遭长期拘押, 包括隔离拘押和不公正审判, 加上缺乏有效的补救措施, 构成了缔约国侵犯后者依《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第 4 款、第十条第 1 款、第十二条第 2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和 3 款(甲)项和(丁)项、第十六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的行为。

1.3 提交人还称, 他的哥哥 Juma Aboufaied 遭非法逮捕和隔离拘押一年多, 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最后, 他指出, 他本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七条享有的权利也受到侵犯。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来文叙述了提交人两个哥哥 2008 年 4 月之前的如下情况。提交人后来通知委员会, 他的两个哥哥均已获释, 仍然活着。<sup>1</sup>

### *Idriss Aboufaied*

2.2 Idriss Aboufaied 是一名医生, 在利比亚各城镇从业。1987 年在乍得与利比亚武装冲突期间应征加入军队医疗队, 被派往前线。他被乍得军队抓获, 拘留两年。由于卡扎菲拒绝承认武装冲突的存在和被抓利比亚人员的战俘身份, Idriss Aboufaied 参加了反对派组织——“拯救利比亚国民阵线”。1990 年, 他获准在瑞士政治避难, 在那里继续谴责在本国的侵犯人权行为。1998 年, 他与其他利比亚难民成立了“国家改革联盟”, 是最活跃的利比亚反对派流亡团体之一。作为该团体的秘书长, 他参加了许多利比亚持不同政见者重要会议, 公然倡导促进法治和尊重人权。

2.3 2006 年夏天, 卡扎菲邀请流亡的反对派返回利比亚, 并向他们保证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言论, 并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于是, 2006 年 8 月, Idriss Aboufaied 宣布他打算返回利比亚, 在那里继续从事他的政治活动。<sup>2</sup> 2006 年 9 月, 利比亚驻伯尔尼大使馆发给他一本护照, 并重申了政府的保证, 即他在

<sup>1</sup> 见下文第 5.1 至 5.4 段。

<sup>2</sup> 提交人附上 Idriss Aboufaied 签署的一份公开声明, 时间为 2006 年 9 月 16 日(标题为“全国改革联盟”)。

利比亚不会受到迫害。Idriss Aboufaied 2006 年 9 月 30 日抵达的黎波里，在那里见到了利比亚各安全机构的人员，并受到盘问。他们不作任何解释地没收了他的护照，并告诉他下周到国内安全局领取。然后，Idriss Aboufaied 返回距的黎波里约 100 公里的 Gheriane 市的家中。他在家给两个反对派网站写信，重申他呼吁在利比亚实现民主和尊重人权。几天后，家人告诉他，国内安全局派人找他，而他不在家，要求他到首都的国内安全局办公室报到。然后，大约在当天午夜，国家安全局特工人员出现在他的家里，命令 Idriss Aboufaied 第二天上午到国内安全局在 Gheriane 市的办公室报到。他如期报到。经过审讯，命令他 2006 年 11 月 5 日到黎波里的国内安全局办公室报道。此期间，Idriss Aboufaied 与一些反对派网站联系，通知他们国内安全局人员来过，他将按照命令前往的黎波里。<sup>3</sup>

2.4 2006 年 11 月 5 日，Idriss Aboufaied 到的黎波里的国内安全局办公室报到，遂被警方拘捕。此后，家人没有他的音信。2006 年 11 月 21 日，他的案件转交给人权理事会的几个机制。<sup>4</sup> 2006 年 11 月 22 日，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医生前往看守所进行检查，<sup>5</sup> 诊断出中毒和强烈疲劳症状。证实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到酷刑，几天被剥夺睡眠。然后，Idriss Aboufaied 被送到的黎波里的 Gargarech 精神病院。

2.5 2006 年 12 月 29 日，在秘密拘押 54 天后，Idriss Aboufaied 被释放。囚禁期间，他从未被带到法官面前，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下落和被捕原因，因为当局拒绝提供这些信息。

2.6 2007 年 1 月 17 日，Idriss Aboufaied 设法要回自己的护照，以便返回有合法居留权的瑞士，但收到的书面通知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寻找律师提起法律程序，但没有人愿意代理他的案件，因为担心遭到报复。他责成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卡拉马<sup>6</sup> 代表他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申诉。2007 年 1 月 22 日，该组织以他的名义致函利比亚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要求归还他的护照。

2.7 2007 年 2 月 1 日，Idriss Aboufaied 在外国新闻网站上发表声明，宣布他打算 2007 年 2 月 17 日在的黎波里组织公开和平抗议活动。<sup>7</sup> 他还将这一计划通知了美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

2.8 2007 年 2 月 16 日，即计划的抗议活动的前一天，一批武装人员闯进了 Idriss Aboufaied 的家并逮捕了他。负责人被认出是本地的国内安全局局长。与计划游行有关的另外 11 人也被逮捕。

<sup>3</sup> 附上这方面的两份公开声明。

<sup>4</sup> 即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

<sup>5</sup> 提交人没有说明受害人当时被关押的拘留场所。

<sup>6</sup> 为本来文提交人的共同律师。

<sup>7</sup> 纪念班加西 12 名示威者死亡一周年，并要求尊重人权和法治。

2.9 据报告，Idriss Aboufaied 被秘密拘押在的黎波里的国内安全局看守所两个月。2007 年 4 月 20 日以后，他与四名同案被转移到黎波里的 Ain Zara 监狱，关在一间地下室几个月，没有灯光，不准家属探视。所有被拘留者都报告说，在头五个月的监禁期间遭到了酷刑，包括拳击，木制物品的殴打，拍打脚底，审讯时为了恐吓放在棺材里。

2.10 2007 年 4 月 20 日，Idriss Aboufaied 病得很厉害，还是连同 11 名同案被告被带到黎波里 Tajoura 区的特别法庭，面对一些刑事指控。<sup>8</sup> 这些指控相当含糊和严重，如策划推翻政府，藏有武器，与外国政府官员会面。Idriss Aboufaied 否认前两项控罪，但承认他 2007 年 2 月在计划的示威之前与美国大使馆联系过。案件被转移到“革命安全法庭”，那里对 Idriss Aboufaied 提出的控告包括违反《利比亚刑法》第 206 条。<sup>9</sup> 当局为他指派了律师，但他不能在法庭外与其见面。

2.11 审理于 2007 年 6 月 24 日开始，2007 年 7 月共开庭公开审理三次。“革命安全法庭”的另一次开庭定于 2007 年 11 月 20 日，后推迟到 2007 年 12 月 4 日。又无故推迟至 2008 年 1 月 8 日。终于在 2008 年 3 月 11 日开庭。在大多数庭审中，被告都未出庭。<sup>10</sup>

### *Juma Aboufaied*

2.12 Idriss Aboufaied 2007 年 2 月 16 日第二次被捕后不久，<sup>11</sup> 住在 Gheriane 市家中的弟弟 Juma 通知了卡拉马组织的代表，还通过电话与利比亚反对派新闻网站联系，说他不知道哥哥的下落，并担心自己也会因为发送这一消息而遭到报复和逮捕。同一天凌晨 4 时，Juma Aboufaied 在家中被国家特工人员逮捕。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二天后，被带回家取手机和电脑，这些物品后来被没收。自那时起直至向委员会提交本来文，提交人一直没有收到 Juma Aboufaied 下落的消息。<sup>12</sup> 因为他不是示威的组织者，所以提交人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Juma Aboufaied 的被捕和拘留与他同哥哥 Idriss 的关系，以及他透露 Idriss 被捕的消息有关。事实上，他被捕时，国家特工人员提到了他在电话中的谈话，两天后没收了他的手机。

<sup>8</sup> 提交人列出了所有同案被告的名字。

<sup>9</sup> 提交人说，第 206 条规定，对呼吁“建立法律规定的团体、组织或协会”的人，以及对属于或支持这类组织或协会的人可判处死刑。

<sup>10</sup> 提交人还说，在卡扎菲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当时有影响力的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执行董事)2007 年 8 月 2 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宣布，被告曾拥有武器和弹药，“Idriss Aboufaied 和他的同伙[是]恐怖分子”。

<sup>11</sup> 见以上第 2.8 段。

<sup>12</sup> 然而，出现了新的事实，详见提交人随后提交委员会的函件。见下文 5.1-5.4 段。

## 申诉

3.1 提交人称，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均遭受了利比亚当局实施的强迫失踪，尽管是在不同时间。2006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29 日，Idriss Aboufaied 被国家特工人员非法拘留，并隔离拘押，不许与家人或律师联系。在第二次拘留的头两个月零四天，情况相同，<sup>13</sup> 直到 2007 年 4 月 20 日在 Tajoura 法院出庭受审。2006 年 Idriss Aboufaied 遭强迫失踪 54 天，2007 年超过两个月。提交人还说，Juma Aboufaied 的拘留条件与其哥哥 Idriss 类似，自 2007 年 2 月被捕后一直遭强迫失踪。

3.2 提交人称，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六条的受害者，尽管缔约国不承认隔离拘押，但任由拘押者虐待，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因此，即使这类情况没有导致受害者死亡，但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未能履行其保护他们生命权的义务，违反了《公约》第六条。

3.3 提交人还声称，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遭受强迫失踪，无法与亲人和外界联系，这一事实就是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sup>14</sup> Idriss Aboufaied 第一次被拘留时遭到酷刑，导致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不得不接受医疗。他病重时，还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首次出庭受审。同一天，他被转移到 Ain Zara 监狱，关在一间地下室几个月，没有灯光。虽然提交人对 Juma Aboufaied 受到的待遇和健康状况不了解，但指出，一直有报告称利比亚拘留场所广泛使用酷刑，居住条件恶劣；并说 Idriss Aboufaied 遭受了虐待。他还强调，尽管 Idriss Aboufaied 和 11 名同案被告都投诉遭受了酷刑，但缔约国没进行任何调查，更不用说向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因此，提交人重申，就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而言，缔约国在几个方面违反了第七条。

3.4 提交人称，他自己也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受害者，<sup>15</sup> 由于两个哥哥连续失踪，并知道他们两人处于危及生命的条件下和遭到了酷刑，所以一直倍受煎熬。

<sup>13</sup> 即在 2007 年 2 月 16 日至 4 月 20 日之间。

<sup>14</sup> 提交人提到第 449/1991 号来文，Mojica 诉多米尼加共和国，1994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意见》；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1996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542/1993 号来文，Tshishimbi 诉扎伊尔，1996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440/1990 号来文，El-Megreis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1994 年 3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5.4 段；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9.8 段；第 950/2000 号来文，Sarima 诉斯里兰卡，2003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5 段。

<sup>15</sup> 提交人提到第 107/1981 号来文，Quinteros 诉乌拉圭，1983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14)；第 950/2000 号来文，Sarima 诉斯里兰卡(前注 14)；第 886/1999 号来文，Schedko 诉白俄罗斯，2003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2 段；第 1044/2002 号来文，Shukurova 诉塔吉克斯坦，2006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8.7 段；第 959/2000 号来文，Baza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5 段；和第 1159/2003 号来文，Sankara 诉布基纳法索，2006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2 段。

3.5 提交人称，国内安全局特工人员无有效逮捕证逮捕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长期拘押不进行司法审查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违反了利比亚法律<sup>16</sup>和《公约》第九条第1款。<sup>17</sup>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都没有被及时告知他们遭拘留的原因。前者在第二次被捕两个多月后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提交人认为，两个人都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九条第2款的受害者。此外，Idriss Aboufaied 在第一次被捕后一直没有被带到司法机构受审。第二次被捕后，于2007年4月20日在 Tajoura 区特别法庭出庭，但他的被捕和出庭相隔两个月，超过委员会解释第九条第3款时所说的“几天”。<sup>18</sup> Juma Aboufaied 没有在任何司法机构出庭受审，也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起诉。因此，提交人认为，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都是缔约国违反第九条第3款的受害者。虽然 Idriss Aboufaied 三次简短出庭，并有一名正式委派的律师，但诉讼缺乏公正性以及固有缺陷，事实上导致他无法反驳逮捕和拘留的合法性。Juma Aboufaied 在拘留期间无法见到律师或家人。提交人认为，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根据《公约》第九条第4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3.6 提交人还称，因为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在被拘留期间受到了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所以对他们的虐待自然导致其依《公约》第十条第1款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sup>19</sup>

3.7 提交人称，Idriss Aboufaied 抵达利比亚后，缔约国主管当局无故没收其护照，而且明确拒绝归还。这样做阻碍了他行使迁徙自由的权利，违反《公约》第十二条第2款。当局没有就没收和保留护照提出任何理由，而且不存在任何情节允许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3款采取这些行动。<sup>20</sup>

<sup>16</sup> 提交人引述《利比亚促进自由法》第14条；《刑事诉讼法》第30条，以及第122条和第123条，其中规定最长羁押时间为15天，如果法官认为有必要，可延长至45天。

<sup>17</sup> 提交人提到第1297/2004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7月14日通过的《意见》，第8.5段；第1422/2005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年10月24日通过的《意见》，第6.5段；和第1196/2003号来文，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2006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第9.5段。

<sup>18</sup>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关于个人享有自由和安全的权利的第8号一般性意见(1982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37/40)，附件五；还提到第1128/2002号来文，Marques de Morais 诉安哥拉，2005年3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6.3段；第992/2001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14)，第9.6段；第1196/2003号来文，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17)，第9.5段；和第277/1988号来文，Terán Jijón 诉厄瓜多尔，1992年3月26日通过的《意见》，第5.3段。

<sup>19</sup>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关于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人道待遇的第21号一般性意见(1992年)，《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47/40)，附件六，B节，第3段。

<sup>20</sup>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关于迁徙自由的第27号一般性意见(1999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5/40 (Vol. I))，附件六，A节，第9段；还提到第1107/2002号来文，El Ghar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4年11月2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和第1143/2002号来文，El Dernaw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年7月20日通过的《意见》，第6.2段。

3.8 根据第十四条，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司法机构普遍不独立于行政当局，尤其是革命安全法院等特别法庭，以及对政治对手的审判。多数庭审是不公开进行的，Idriss Aboufaied 被禁止参加。多数控告没有向他明确说明，在被捕二个月才通知他。<sup>21</sup> 他从来没有得到足够便利准备和提出辩护，因为他从未看到过案件卷宗，也无法在法庭外会见律师。此外，他不能要求更换律师。由于这些原因，提交人认为 Idriss Aboufaied 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项和(丁)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sup>22</sup>

3.9 提交人还指出，作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也被剥夺了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得到承认的权利，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sup>23</sup>

3.10 提交人称，因 Idriss Aboufaied 试图与其他人和平集会和表达对现政权的不同意见而遭到监禁，并有可能受到严厉处罚。<sup>24</sup> 对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此种干涉，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限制，因为缔约国从未说过它在保护《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所列的合法目的之一。因此，提交人认为，Idriss Aboufaied 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的受害者。

3.11 关于第二条第 3 款，提交人提到委员会的判例，<sup>25</sup> 强调，在发生违反《公约》第六、七、九、十、十二、十四和二十一条本身的情况时，缔约国没有为保护受害者权利采取必要措施，并向他们提供有效的补救，缔约国还违反了与这些条款相关联的《公约》第二条第 3 款。

3.12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问题，提交人称，利比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实际上得不到任何补救。提交人提及缔约国的侵犯人权行为，<sup>26</sup> 说因害怕报复，他不敢代表他的两个哥哥提出司法诉讼或诉诸其他国内补救措施。Idriss Aboufaied 在第二次被捕前试图寻求专业法律援助未果，因律师担心报复几乎找不到法律代

<sup>21</sup> 见上文第 2.10 段。

<sup>22</sup>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2/40 (Vol. I))，附件六；第 80/1980 号来文，Vasilskis 诉乌拉圭，1983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 段；第 52/1979 号来文，Lopez Burgos 诉乌拉圭，1981 年 7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段；和第 662/1995 号来文，Lumley 诉牙买加，1999 年 4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

<sup>23</sup> 提交人在这提到第 1328/2004 号来文，Kimouche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9 段；和第 1327/2004 号来文，Grioua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9 段。

<sup>24</sup> 在提交人提交初次来文时，对 Idriss Aboufaied 司法诉讼仍未结束。

<sup>25</sup> 提交人提到第 612/1995 号来文，Arhuacos 诉哥伦比亚，1997 年 7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委员会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59/40 (Vol. I))，附件三，第 8 段。

<sup>26</sup> 如任意逮捕和拘留、法外处决、集体惩罚和不停骚扰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家人。



理人，这些构成了诉诸法律的严重障碍。<sup>27</sup> 此外，提交人还指出，即使存在国内补救措施，他也可以得到这些补救措施，但缔约国司法系统的严重缺陷使这些措施完全无效。<sup>28</sup>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交人请委员会考虑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

### 缔约国不合作

4. 2009 年 1 月 28 日、2009 年 4 月 22 日和 2009 年 7 月 14 日，委员会发函请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提出意见。委员会说它没有收到任何这类意见。委员会对缔约国不就提交人申诉的可否受理及实质内容提供任何意见表示遗憾。委员会回顾，根据《任择议定书》，相关缔约国必须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声明，澄清问题并说明可能提供的任何补救办法。如果缔约国不作答复，只要提交人指控证据充足，就适当考虑提交人的指控。<sup>29</sup>

### 提交人的补充陈述

5.1 2008 年 7 月 4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一直关押在 Abu Salim 监狱的 Idriss Aboufaied 于 2008 年 4 月初被转移到 Sabrata 医院，<sup>30</sup> 只在出庭受审时才允许离开医院。据他的家人说，他的健康状况严重，并迅速恶化。

5.2 2008 年 4 月 15 日，在 Abu Salim 监狱附近开庭审理，被告和一名家庭成员出席。另一次庭审在 2008 年 5 月 13 日举行，被告及两名家庭成员出席。在 Idriss Aboufaied 请求保外就医后，法院要求提供医疗报告，并休庭。2008 年 6 月 10 日，最后一次开庭，有 12 名被告出席。提交人当时也在场。当天，Idriss Aboufaied 被判处 25 年监禁。法庭没有提及保外就医的请求。提交人说，既然对 Idriss Aboufaied 判罪本身是极不公正审判的结果，<sup>31</sup> 那么根据这一决定进行的拘留就应被视为侵犯他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利，因此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款。

<sup>27</sup> 提交人提到第 798/1998, Howell 诉牙买加, 2003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5.3 段；和第 146/1983 号和第 148-154/1983 号来文, Baboeram-Adhin 等人诉苏里南, 1985 年 4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

<sup>28</sup> 提交人提到了司法机构事实上没有独立性，长期和一贯地进行政治审判，如“特别革命法庭”(2005 年取代“国家安全法院”)的不公正和任意审讯，以及旨在恫吓政敌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审判和缺席审判。

<sup>29</sup> 另见第 1422/2005 号来文, 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7)，第 4 段；第 1295/2004 号来文, El Al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2007 年 7 月 11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第 1208/2003 号来文, Kurbonov 诉塔吉克斯坦, 2006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和第 760/1997 号来文, Diergaardt 等人诉纳米比亚, 2000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2 段。

<sup>30</sup> 在提交人提供补充资料时，他还在医院。

<sup>31</sup> 提交人回顾他在上文 3.5 和 3.8 段提出的意见。

5.3 在同一来函中，提交人还告诉委员会，Juma Aboufaied 在被秘密监禁 15 个月，于 2008 年 5 月 27 日获释。在被拘留期间，他从未在司法机构出庭，也没有被控任何罪名。他获释后，缔约国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对任意逮捕和长期秘密拘留 Juma Aboufaied 给予赔偿，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澄清事实和起诉责任者。提交人要求委员会在审议本来文时考虑这一事态发展。

5.4 2008 年 10 月 22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Idriss Aboufaied 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晚获释。他获释前，关押在 Sabrata 医院，是 2008 年 4 月初从阿布·萨利姆监狱转移到该医院的。提交人还说，Idriss Aboufaied 曾要求获准离开该国，以便到国外接受适当治疗，但此期间仍然在家里受到严密监视。最后，提交人请委员会在审议本来文时考虑这一情况。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委员会注意到，Idriss Aboufaied 的案件于 2006 年提交给以下机构：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然而，委员会也注意到，前人权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权理事会建立的非常规程序和机制，任务是对具体国家或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或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侵犯人权现象进行审查并提出公开报告，不属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意义内的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sup>32</sup> 此外，Idriss Aboufaied 已获释，关于他的来文是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转交的，转交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sup>33</sup>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于 Idriss Aboufaied 权利的事项没有根据第五条第 2 款(子)项在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接受审查。

6.3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问题，委员会再次关切地指出，尽管三次向缔约国发出提醒函，但都未收到缔约国关于来文可否受理或案情的任何资料或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它可以审议本来文。

<sup>32</sup> 见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前注 14)，第 7.1 段；第 1776/2008 号来文，Bashasha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10 年 10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2 段；第 1559/2007 号来文，Hernandez 诉菲律宾，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

<sup>33</sup> 见第 688/1996 号来文，Arredondo 诉秘鲁，2000 年 7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2 段；第 1172/2003 号来文，Madani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2.7 和 7.2 段。



6.4 关于违反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本身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指控，委员会认为，鉴于所收到的资料有限，提交人的指控没有为可予受理的目的得到充分证实。委员会认为，其他指控证据充分，没有理由认为来文的其余部分不可受理。因此，委员会着手根据以下申诉审议案情：(一) 关于 Idriss Aboufaied 的申诉，涉及《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第十条第 1 款、第十二条第 2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和(丁)项以及第十六条；(二) 关于 Juma Aboufaied 的申诉，涉及《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和(三) 关于提交人本人的申诉，涉及《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七条。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出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关于指称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遭秘密和隔离拘押问题，委员会承认无限期拘押而不与外界联系造成的伤害程度。它回顾其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其中建议缔约国作出规定禁止隔离拘押。它指出，Idriss Aboufaied 在两段不同时间(2006 年 11 月 5 至 12 月 29 日；从 2007 年 2 月 16 日第二次被捕到 2007 年 4 月 20 日在 Tajoura 法院受审)被单独关押在一处秘密地点。在这两段时间，他与外界隔离，不允许与家人或律师接触。他被关押到 2008 年 10 月 8 日，总共有近 22 个月，<sup>34</sup> 其中约 4 个月是秘密关押。Juma Aboufaied 从 2007 年 2 月被捕后遭秘密关押 15 个月，直到 2008 年 5 月 27 日获释。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他的两个哥哥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遭受利比亚当局实施的强迫失踪。委员会回顾，它认为凡导致此种失踪的行为均构成侵犯《公约》所规定的许多权利的行为，包括在任何地方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的权利(第十六条)、人身自由和安全权(第九条)、不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第七条)和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受到人道待遇和其固有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第十条)。也可构成侵犯或严重威胁生命权的行为(第六条)。<sup>35</sup>

7.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就提交人关于他的两个哥哥遭到强迫失踪的指控，以及 Idriss Aboufaied 在被拘留时遭受酷刑的指控作出任何答复。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Idriss Aboufaied 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被转移到 Ain Zara 监狱，

<sup>34</sup> 从 2006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29 日和从 2007 年 2 月 16 日至 2008 年 10 月 8 日(其最后获释日期)。

<sup>35</sup> 见第 1328/2004 号来文，Kimouche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23)，第 7.2 段；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29)，第 6.2 段；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14)，第 9.2 段；和第 950/2000 号来文，Sarma 诉斯里兰卡(前注 14)，第 9.3 段；另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3 号决议通过)，第一条第 2 款。

关在一间地下室几个月，没有灯光，尽管缔约国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委员会重申，举证责任不能只由来文提交人承担，尤其因为提交人和缔约国并非总是有同等机会获取证据，往往只有缔约国掌握有关资料。<sup>36</sup> 《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2款表明，缔约国有义务对关于它和它的代表违反《公约》行为的所有指控进行调查，并向委员会提供它所掌握的资料。在提交人已将有可信证据支持的指控提交缔约国，而进一步澄清完全有赖于缔约国所单独掌握的资料的情况下，如果缔约国未能针对提交人的指控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和解释，委员会即可视指控已得到证实。在没有收到缔约国这方面答复的情况下，对于提交人提出的指控，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对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长时间关押，禁止他们与家人和外界联系，对 Idriss Aboufaied 实施酷刑，就两个人而言，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七条的情况。<sup>37</sup>

7.5 关于提交人，委员会注意到他的两个哥哥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相继失踪给其造成的痛苦和悲伤。委员会回顾其判例，认为，它面前的事实表明，就提交人而言，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的情况。<sup>38</sup>

7.6 关于第九条，委员会收到的资料显示，Idriss Aboufaied 两次被捕时，缔约国特工人员都没有出示逮捕证，他每次被秘密关押约两个月，得不到辩护律师协助，没有被告知逮捕理由，没有被带到司法机构接受审讯。他首次知道自己的罪名是 2007 年 4 月在 Tajoura 区特别法庭。Juma Aboufaied 被秘密拘押 15 个月，得不到律师协助，从来没有被告知逮捕理由。此期间，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没有机会反驳对其拘留的合法性和任意性。在缔约国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对 Idriss Aboufaied 两次拘留和对 Juma Aboufaied 的整个拘留，都违反了《公约》第九条。<sup>39</sup>

7.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第十条第 1 款指控说，Idriss Aboufaied 在被拘留期间遭到酷刑，尽管健康情况不佳仍被关押在不适当拘留设施；Juma Aboufaied 在整个期间被隔离关押。委员会重申，被剥夺自由的人不得因被剥夺自由而承受任何艰难或限制，他们必须得到人道待遇和其尊严受到尊重。在缔约国未说明提

<sup>36</sup> 见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7)，第 6.7 段；和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17)，第 8.3 段。

<sup>37</sup> 见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29)，第 6.5 段；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7)，第 6.2 段；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前注 14)，第 8.5 段；第 458/1991 号来文，Mukong 诉喀麦隆，1994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9.4 段；和第 440/1990 号来文，El-Megreis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4)，第 5.4 段。

<sup>38</sup> 见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7.5 段；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7)，第 6.11 段；第 107/1981 号来文，Quinteros 诉乌拉圭(前注 15)，第 14 段；和第 950/2000 号来文，Sarma 诉斯里兰卡(前注 14)，第 9.5 段。

<sup>39</sup> 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17)，第 8.5 段。

交人哥哥在监禁时受到的待遇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根据第十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sup>40</sup>

7.8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以下不容质疑的情况：缔约国特工人员 2006 年 9 月 30 日在 Idriss Aboufaied 抵达时没收了他的护照，并明确拒绝归还他，使他无法离国返回他在瑞士的合法居所。委员会回顾，《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规定，护照向国民提供了“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的手段，根据该条第 3 款，这一权利也受到“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提出任何争辩。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收提交人护照并拒绝归还，必须视为无理干涉他的迁徙自由权，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sup>41</sup>

7.9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表明，2007 年 4 月 20 日，即 Idriss Aboufaied 第二次被捕 2 个月后，在的黎波里 Tajoura 区特别法庭前接受了审讯，他面临几项以前未告知的刑事指控。然后，案件转移到“革命安全法庭”，该法庭出于未说明的原因，举行了几次非公开审理。虽然获得了当局指派的律师，但他不能在法庭外与律师会面，也不能检查卷宗材料，也不允许参加某些庭审。2008 年 6 月 10 日，他被判处 25 年监禁，一直关押到 2008 年 10 月 8 日获释。尽管他以健康原因提出保释，但法院没有考虑这一请求。基于委员会面前的资料，也鉴于缔约国没有提出反驳意见，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 Idriss Aboufaied 的审判和判刑表明存在着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和(丁)项的情况。得出结论后，委员会将不另行审查关于违反与第十四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申诉。

7.10 关于第十六条，委员会重申其已确立的案例法，据此，如果受害人最后一次露面时是由国家当局所控制，同时受害人亲属争取获得可能的有效补救措施，包括司法补救(《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的努力受到系统的阻挠，则故意长期剥夺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可构成拒绝承认受害人在法律面前人格的行为。<sup>42</sup> 在本案中，缔约国当局对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实行隔离监禁，并拒绝向其家人提供关于其下落或状况的信息，还恐吓家属不要再为他们进一步寻求补救或协助。

<sup>40</sup> 见委员会关于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人道待遇的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47/40)，附件六，B 节，第 3 段；第 1134/2002 号来文，Gorji-Dinka 诉喀麦隆，2005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5.2 段；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利比亚(前注 38)，第 7.7 段；和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7)，第 6.4 段。

<sup>41</sup> 见第 1143/2002 号来文，El Dernaw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20)，第 6.2 段；和第 1107/2002 号来文，El Ghar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20)，第 7.3 段。

<sup>42</sup> 见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38)，第 7.9 段；第 1327/2004 号来文，Grioua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23)，第 7.8 段；和第 1495/2006，Madoui 诉阿尔及利亚，2008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7.7 段。

因此,委员会认为,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的强迫失踪,在此期间剥夺了他们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

7.11 提交人援引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该款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确保所有个人享有可利用、有效和可实施的补救措施,以维护《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委员会重申其十分重视缔约国建立适当的司法和行政机制,以根据国内法处理有关侵犯权利的指控。委员会提及其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其中指出,如果缔约国不对侵犯权利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可能会引起对于《公约》的再次违反。在本案中,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表明,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无法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认为,就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就 Idriss Aboufaied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十二条第 2 款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sup>43</sup> 委员会还认为,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sup>44</sup>

7.12 得出上述结论,并鉴于两个哥哥已经获释的事实,委员会将不另行审议关于违反第六条的申诉。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表明,就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它还认为,就 Idriss Aboufaied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及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和(丁)项。委员会也认为,就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而言,缔约国还违反了与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就 Idriss Aboufaied 而言,违反了与第十二条第 2 款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最后,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及其哥哥提供有效补救,包括:(一)充分和彻底调查关于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失踪和在拘留时遭受任何虐待的指控;(二)向提交人及其哥哥详细说明调查的结果;(三)起诉、审判和惩罚造成失踪或其他虐待行为的责任人;(四)对提交人及其哥哥遭受的侵权行为提供适当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

<sup>43</sup> 见第 1422/2005 号来文, 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前注 17), 第 6.9 段和第 1196/2003 号来文, 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17), 第 9.9 段。

<sup>44</sup> 见第 1811/2008 号来文,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 第 8.11 段。

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言广泛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一. 委员会委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的个人意见(同意)

虽然我带着一些犹豫同意了委员会的实质性结论，但对委员会不加解释地将这一案件——至少是 Idriss Aboufaied 的案件——明确地定为“强迫失踪”略感不安。毫无疑问，两个兄弟都被秘密拘押。问题是他们是否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从而可以证明这类拘押属于强迫失踪，违反第十六条。

经手处理过骇人听闻和不可思议的强迫失踪案件的人，都知道需要将秘密拘留与强迫失踪的可怕现实区别开来，前者也许超过了国家或国际的时限，至少还属于任意拘留。这种区别可能意味着强迫失踪概念中存在一个时间因素。事实上，如果是指无论多短时间的任何秘密拘留(我理解是秘而不宣和不披露下落的拘留)，那么对这一概念的处理可能有点轻率了。

另一方面，强迫失踪的国际定义中只有一个，即《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第七条第 2 款(一)项，论述了时间因素。<sup>a</sup> 它要求必须有将个人“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意图。也就是说，时间因素可能是将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证据。事实上，委员会在有关第十六条的第 7.10 段中使用的标准语言就是“长期”。

通常情况下，我认为，在没有重要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委员会应该要求不仅仅是断言——虽然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回应——某人的案件属于这一类。因为仅以此为基础，不构成剥夺法律保护的充分证据。

在本案中，对遭秘密拘留 15 个月的 Juma Aboufaied 如此处理疑问较少；他的哥哥两次被秘密拘留 2 个月事实上与他的案件分不开。此外，利比亚存在强迫失踪做法已经为委员会所熟知。<sup>b</sup> 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俩可能确实都被剥夺了法律保护，从而可以定性为强迫失踪，违反第十六条。

<sup>a</sup> 其他定义见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06 年)，第二条；《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1994 年)，第二条。

<sup>b</sup> 见第 440/1990 号来文，El-Megreis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请注意本案中未援引该术语)；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l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第 1751/2008 号来文，Aboussedra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第 1776/2008 号来文，Bashasha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不过，疑虑依然存在；大多数强迫失踪实际上是秘密谋杀的伪装。有时受害者会重新出现。我们对于将相对较短时间的秘密拘留——尽管是任意和存在着酷刑——当作真正的强迫失踪处理，需要持谨慎态度。

[有英文本(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二. 委员会成员瓦尔特·卡林先生的个人意见(部分不同意)

虽然我同意大多数委员关于在 Juma Aboufaied 案件中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六条情况的意见，但无法赞同对其哥哥 Idriss 两次分别被秘密拘留两个月所作出的结论。兄弟俩都被秘密拘留，因而违反了《公约》第九条；但是，令人怀疑的是，按多数委员的看法，秘密拘留，无论多长时间，一概属于侵犯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的权利。

《公约》第十六条保护一项绝对和不可减损的权利，即承认个人有能力拥有各种权利和义务。由于“承认法律人格是[……]行使个人所有其他权利的必要先决条件”，所以是所有权利中最根本的权利。<sup>a</sup>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犹豫不决不对强迫失踪案件适用第十六条。只是到 2007 年，委员会才开始考虑强迫失踪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构成违反第十六条。它指出，“如果受害人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是在国家当局的控制之下，同时受害人的亲属争取获得可能的有效补救措施，包括司法补救(《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的努力受到系统的阻挠，则故意长期剥夺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可构成拒绝承认受害人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的行为”。它解释说，在这些案件中，受害人“实际上，由于国家行为的直接结果，被剥夺了依法行使权利，包括《公约》规定的所有其他权利的能力，也被剥夺了取得任何可能补救办法的机会”。<sup>b</sup>

这一推理表明，并非每一个对侵权行为拒绝司法或补救的情况都违反《公约》第十六条。正如委员会自 2007 年以来一直承认的，<sup>c</sup>只有在受害人被系统和长时间剥夺行使自己权利的可能，而且当局对剥夺权利行为拒绝补救措施时，这一不可减损的保证才遭到违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承认拥有各项权利的权利在事实上被剥夺的情况才会发生。根据委员会所收到的资料，<sup>d</sup>我无法得出结论认为，在 Idriss Aboufaied 案件中，这些条件已得到满足。

这一结论不应该被解释为无视 Idriss Aboufaied 及其亲属所遭受的极度折磨和痛苦。我深知，关于强迫失踪的当代人权定义不包含时间因素。<sup>e</sup>然而，由于

<sup>a</sup> Manfred Nowak,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第 2 版，(Kehl am Rhein, Engel, 2005)，第 369 页。

<sup>b</sup> 第 1327/2004 号来文，Grioua 诉阿尔及利亚，第 7.8 段，和第 1328/2004 号来文，Kimouche 诉阿尔及利亚，第 7.8 段。

<sup>c</sup> 另见第 1751/2008 号来文，Aboussedra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第 7.9 段。

<sup>d</sup> 见本案的意见第 2.4、2.5 和 2.9 段。

<sup>e</sup> 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2006)，第二条；《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1994)，第二条。相反，《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第 2 款(一)项要求必须有将有关个人“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意图。



强迫失踪是最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我坚持认为，委员会的任务是适用第十六条，而不是解释《公约》所包含的一个概念。对此，我担心，在根据第十六条审查案件时，不考虑剥夺个人的法律保护的期限和系统性这些因素，多数委员可能冒轻率处理这一基本人权保障的风险。

[有英文本(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三. 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与委员会委员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共同发表的个人意见(同意)

我对委员会在阐述决定不处理《公约》第六条所涉问题的理由时，使用“鉴于兄弟俩被释放时还活着”一语表示保留(第 7.12 段)。

这一句可能被解释是指必须确定无疑地证明已经死亡，才能判定强迫失踪，违反第六条。

我认为，这种解释错误地将第六条第 1 款的最后一句——“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置于优先地位，损害了该款第二句——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护”，而两句话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强迫失踪的问题上，不论受害者是活着还是死了，单独监禁，切断了有关个人与整个社会的联系，不允许彼此之间接触，即使是暂时的，也会引起生命的风险，国家对此负有责任。

这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Djebrouni 诉阿尔及利亚案*(第 1781/2008 号来文)和 *Ouaghlossi 诉阿尔及利亚案*(第 1905/2009 号来文)中所作的分析，不应该因我批评的措辞而引起不同解释，使这一分析受到损害。

[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法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四. 委员会成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个人意见 (部分不同意)

1. 我大致同意委员会对 Aboufaied 诉利比亚案件(1782/2008 号来文)的裁决,但我遗憾地表示不同意《意见》第 7.12 段的内容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在该段中,委员会决定,鉴于先前已判定违反与第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也鉴于 Aboufaied 兄弟俩在获释时还活着的事实,“委员会将不另行审议违反第六条本身的申诉”。

2. 委员会通常将“保证……的义务”置于《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之下;在我看来,有关规定只是指义务的一个方面,即确保对所发生的侵权给予补救。国际人权法下的保证的义务,比提供有效补救措施宽泛得多;保证一项权利的行使,不仅是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而主要是侵权行为发生之前的国家义务。

3. 在以前对委员会处理的其他单个案件的个人意见中,<sup>a</sup> 我提到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保证的权利”的三个层面。虽然我提及这些声明,是为了避免在发生本案等强迫失踪案件时不再重复相同论述,但我认为,在 Aboufaied 的案件中,铭记“保证……的权利”的第三个层面,委员会应该对两个受害人都判定违反《公约》第六条。

4. 除了仅着重于生命权外,只有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才违反第六条的立场,忽略了“保证……的义务”覆盖了《公约》规定的每项权利(在本案中为生命权),而每项权利都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在本案中为第六条)。

5. 将“保证……的义务”限定于存在有效的司法补救措施,按照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在本案中的推理,是淡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必须真诚地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本案中,即保障生命权。因此,我认为,委员会应该在《意见》中认定,就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两兄弟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六条第 1 款。

#### 拘留被视为强迫失踪是否需要最低限度时间长度?

6. 我不愿意在结束本意见时不提及另一问题,虽然在本案中得到了合适解决,但可能在未来引起问题。我指的是引入时间这一额外因素可能削弱强迫失踪的概念。

7. 在本案中,委员会正确将 Idriss 和 Juma Aboufaied 的情况归类于“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是公务官员和人员在国家支持或默许下行动,从而归于国家的复杂侵犯人权行为;它涉及拘留(合法或非法)、剥夺自由、拒绝承认拘留或隐瞒被拘留者的命运或下落,以便将其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这是一项持续性罪行,结

<sup>a</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588/2007 号来文,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不同意见,第 19-21 段。

束于受害者再次出现，无论是活着或是死亡(因此，对个人的法外处决不是强迫失踪罪的一个决定因素)。

8. 联合国编纂强迫失踪法律始于《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sup>b</sup> 在该文书中，拘留的因素是与作案者地位(不论是否属于国家代理人)和拘留的性质(合法或非法)相脱离的，虽然《宣言》确定规定了必须拒绝承认失踪或透露有关个人的命运或下落。<sup>c</sup> 甚至没有提到时间因素(确定是否属于强迫失踪需要最低限度时间长度)。

9. 强调拒绝透露有关个人的下落，表明受害者确实可能受到某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侵害。因此，毫不奇怪，《宣言》指出，“应将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遵照国家法律，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还指出，“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除非有关人员[被剥夺自由者]表示与此相反的愿望”。<sup>d</sup>

10. 本议题的两项具体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sup>e</sup> 和开创性的《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sup>f</sup>)坚持了相同的标准。国际公约规定：“在本公约中，‘强迫失踪’系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逮捕、拘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sup>g</sup> 美洲国家间公约以几乎相同的术语限定强迫失踪：“为了本公约的目的，强迫失踪被视为以任何方式剥夺一个人或一群人自由的行为，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个人群体所为，之后不透露有关信息或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或隐瞒该人的下落，从而阻碍其诉诸可适用的法律补救办法或程序保障”。<sup>h</sup>

11. 这两项文书所规定的清晰规则，省去了我的进一步论证；但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疑虑，也因为不妨可以对拘留的时间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构成“强迫失踪”或“秘密监禁”。无论如何，《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都强调“任何人都不应受到秘密监禁”。<sup>i</sup>

<sup>b</sup>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宣言》，大会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3 号决议通过。

<sup>c</sup> 出处同上，第三序言段。

<sup>d</sup> 出处同上，第十条第 1 和 2 款。

<sup>e</sup>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大会 2006 年 12 月 20 日。

<sup>f</sup> 《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美洲国家组织大会 1994 年 6 月 9 日通过。

<sup>g</sup>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

<sup>h</sup> 《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第二条。

<sup>i</sup>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十七条。

12. 《罗马规约》<sup>j</sup> (不是人权条约, 而是国际刑事法律条约), 因没有遵循国际人权文书中规定的各类犯罪定义而饱受批评; 就强迫失踪而言, 它纳入了时间维度(作案者必须打算将一个人长期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但是, 应该指出的是, 没有提及拘留期限: 它只是要证明作案者的意图在于将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置于法律保护之外。<sup>k</sup> 因此,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人被国家代理人或在其默许下拘留或绑架, 不告知拘留地点, 几天后, 有关人员被发现已经死亡, 或者即使他成功逃脱并与家人团聚, 也很难认为他不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世界上许多国家, 特别是军事独裁时期的南美洲发生的众多案件就是这种情况。

13. 将时间维度引入正在讨论的这一议题, 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过去多长时间, 才允许执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规定的紧急行动机制<sup>l</sup>和联合国非条约机制?<sup>m</sup> 国际人权法非常明智, 从未提出过最低限度拘留时间, 以设定强迫失踪罪的人为和非完整标准。

14. 时间维度, 即最低限度拘留时间, 在强迫失踪罪的分类中没有任何位置。关于在处理强迫失踪案件时应适用的文书, 建议人权事务委员会不要引用《罗马规约》作为参照, 而应该继续遵行自身丰富的判例(从未提到过拘留时间)或联合国这一议题公约的明确规定。

[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 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j</sup> 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1998 年 7 月 17 日通过。

<sup>k</sup> 见“国际刑事法院, 罪行的要素”, 联合国文件 PCNICC/2000/1/Add.2 (2000), 第 7 条(l) (i), 第 6 段。

<sup>l</sup> 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三十条;《美洲国家间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第十四条。

<sup>m</sup> 如强迫或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L. 第 1801/2008 号来文，G. K 诉荷兰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G. K.  
(由 Böhler Franken Koppe Wijngaarden Avocate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荷兰

来文日期： 2008 年 7 月 30 日(首次提交)

事由： 被驱逐回亚美尼亚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返回亚美尼亚后可能遭拘禁和酷刑；缺乏有效的补救措施

《公约》条款： 第七条；与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无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G. K.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01/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1 2008 年 7 月 30 日来文的提交人 G. K.，是亚美尼亚国民，生于 1967 年 9 月 19 日，他声称，如果荷兰将他引渡回亚美尼亚，将侵犯他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801/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0 条，委员会委员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未参加本决定的通过程序。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以及与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享有的权利。提交人由律师 Böhler Franken Koppe Wijngaarden Advocaten 代理。<sup>1</sup>

1.2 2008 年 8 月 5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提交人的案件期间不引渡提交人。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公开表示反对亚美尼亚政府萨尔基相总统的亚美尼亚反对党领袖捷尔·彼得罗相的坚决支持者。他从 1994 年至 2008 年 6 月 15 日离开亚美尼亚前一直在埃里温警察局担任警官。作为埃里温警察局的警官，他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银行的安全以及在公众活动时维持公共秩序。警察机构受政府直接管辖，警察部队内部不允许有持异见者。提交人从未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在 2008 年的大选前后，<sup>2</sup>他曾经三次拒绝服从镇压反对萨尔基相总统的示威活动的命令。虽然警察在这类示威活动期间使用暴力受到鼓励，但提交人拒绝使用这种方法对付示威者。在 2008 年 4 月 24 日的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期间，有人承诺使用武力可获得奖金，但提交人拒绝这样做。提交人的行为被上司发现。他们对提交人进行了恐吓和人身虐待。他的上司后来还不断地对他进行恫吓。

2.2 选举前，该区区长及其雇员在群众中发钱，以使他们能够投票给萨尔基相总统。他们当时也去过几次提交人在埃里温郊区的住所。提交人始终拒绝他们提供的金钱。该区政府因此了解到提交人的政治观点。

2.3 提交人的妻子也因为支持捷尔·彼得罗相而受到恐吓。她曾经在议会大厦工作，并在那里受到同事的恐吓。他们试图说服她为萨尔基相总统投票，但被她拒绝。她的拒绝因此招来了威胁和恫吓。2008 年 3 月 19 日至 25 日，当局试图逼迫她就范。当局对她施加折磨，但提交人在荷兰申请庇护程序的第一个阶段无法透露这一情况。经过这些事件之后，提交人的妻子于 2008 年 4 月 4 日逃往俄罗斯。

2.4 提交人留在亚美尼亚并试图保持低调。他继续上班，但他受到的恐吓后来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他的上司于 2008 年 4 月 24 日在工作单位殴打他。2008 年 5 月 10 日，提交人要求休假，但遭到拒绝。他的第二次请求也遭到拒绝。然而，当提交人承诺说如有必要，他在休假期间也可以工作时，他被批准从 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6 月 19 日休假。在这一期间，他有好几次被要求上班。2008 年 5 月 19 日，他再次被其上司殴打。从那一天起，他们要求他每天上班，并对他进行恐吓。2008 年 6 月 5 日至 15 日，提交人躲藏起来，有几个晚上在他的岳母和朋友家过夜。他同时开始准备逃离：他于 2008 年 4 月首次向美利坚合众国使馆

<sup>1</sup> 《任择议定书》于 1978 年 12 月 11 日对缔约国生效。

<sup>2</sup> 谢尔日·萨尔基相总统在战胜另外几名候选人后，于 2008 年 4 月 9 日就职，其他候选人包括列翁·捷尔-彼得罗相(1991 至 1998 年任该国总统)，他在 2008 年 2 月 19 日进行的选举中排名第二。

提交了签证申请，但于 2008 年 5 月 6 日被拒签。他又向埃及使馆提出签证申请，并于 2008 年 6 月 2 日获得签证。提交人带着签证、自己的有效护照和一张机票，于 2008 年 6 月 15 日离开亚美尼亚。

2.5 提交人的一些同事也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而遭到逮捕、拘留和虐待。在提交人离开本国后，警察首次于 2008 年 6 月 22 日开始对提交人的家人(母亲、兄弟 Artak 及其妻子 Nelly)进行骚扰和恫吓。他们询问提交人的下落，用武器对其家人进行威胁和恫吓。2008 年 7 月 17 日，提交人的兄弟 Artak 被逮捕，一个特别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从他那里获得提交人的下落，对他施行了非人道的待遇。

2.6 提交人于 2008 年 6 月 15 日离开亚美尼亚，逃往荷兰，他于同一天到达荷兰，并立即提交了庇护申请。2008 年 6 月 16 日，提交人接受了第一次面谈，在面谈中回答了有关其身份、国籍和旅行日程等问题。2008 年 6 月 18 日，提交人在第二次面谈时说明了自己提交庇护申请的原因。

2.7 2008 年 6 月 19 日，荷兰政府发出书面通知，表明驳回提交人庇护申请的意向。荷兰政府认为，虽然提交人的叙述是可信的，但未将他视为有可能遭到迫害的重要的政治反对派分子。该报告指出，提交人在休假期间继续工作，呆在自己的岳母和朋友那里(在缔约国看来，当局明显可在这些藏身之处找到提交人)，以及他用自己的护照离开亚美尼亚，均证明提交人不可能受到迫害，或返回亚美尼亚可能遭到非人道的待遇。缔约国允许提交人在 3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陈述对政府意向通知的看法，提交人按照要求这样做了。

2.8 提交人于当天下午 6 点，即收到第二次面谈报告和政府的意向通知 3 小时之后，上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以及对第二次面谈所涉内容的更正和补充。提交人在补充资料中指出，因为他拒绝遵守警方的命令，所以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受到其三名上司的威胁和殴打。他的政治观点是他受到这类待遇的唯一原因。提交人此时还提及，他的妻子在逃往俄罗斯之前，不仅受到与区长有关系的个人和议会大厦工作人员的威胁，还遭到强奸。提交人还提交了人权观察、国际危机组织和大赦国际的报告以及自由欧洲电台的文章，作为其申请的证据。这些报告证实该国没有进行自由选举，反对派受到武装部队(军队和警察)的恫吓、威胁和暴力袭击。报告还指出，安全部队是一个强权机构，能够不受阻挠或惩罚地开展行动，公务员在其上级的逼迫下为萨尔基相总统投票并参加支持萨尔基相的集会。提交人强调他与他的妻子受到的虐待和威胁，此外，他在假期结束后没有回去上班，结果导致对他的政治立场的负面关注。

2.9 提交人的庇护申请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被驳回，理由包括：他在亚美尼亚从未受过迫害、逮捕、拘留或判刑；提交人在第二次面谈时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妻子受到的虐待；来自其上司的威胁不成为回国可能受到迫害的充分理由；第二次面谈后提供的文件非常宽泛，与提交人的案件没有直接关系等。提交人向哈勒姆的海牙地区法院提出上诉，以他的母亲和一名同事受到威胁作为申诉证据。他还提交自己在埃里温的财产证明，以表明他并非出于经济原因离开亚美尼亚。该上诉于 2008 年 7 月 8 日被驳回。提交人又向国务院行政司法处提出上诉，并在



补充资料中指出，警察分别于 2008 年 6 月 22 日、7 月 3 日和 10 日到他的母亲及岳母家询问他的下落。

2.10 2008 年 12 月 18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缔约国当局已将所有关于他的文件，如他的护照、结婚证、警员证及机票寄至亚美尼亚使馆。因此，亚美尼亚当局已获悉提交人在荷兰，这一点加大了他返回后受到迫害的风险。

##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决定将其驱逐回亚美尼亚，将违反他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还声称，他经历的加速庇护程序违反了与《公约》第七条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 3 款。

3.2 提交人声称，作为警察机构内部的政治异见者，如果他返回亚美尼亚，将面临受到迫害的真实风险。警察部门处于萨尔基相总统的强势影响和控制之下。作为一名警官，提交人不得表现出政治上的积极性，或加入任何一个政党。他和他的妻子过去曾受到恫吓、威胁和虐待。一些证人关于这类虐待的信件可作为这些指称的凭据，这些证人包括提交人的母亲，她证实提交人受到殴打，还有一名同事的母亲也声称她自己的儿子遭到类似对待。提交人还声称，自他离开亚美尼亚后，警察使用武器对他的家人进行恫吓和威胁。2008 年 7 月 17 日，提交人的兄弟 Artak 被逮捕，一个专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获得提交人的下落，对他施行了不人道的待遇。

3.3 人权观察、国际危机组织、大赦国际以及自由欧洲电台的文章证实了 2008 年发生的暴力行为。一些报告指出，有关于被拘押者在被捕和去往警察局的途中受到殴打和虐待的情况。有些人在拘押期间继续受到虐待。<sup>3</sup> 报告还指出，选举结束后暴力行为仍在继续。提交人指出，这些报告没有对重要的反对派和普通政治反对派进行区分。鉴于提交的报告中显示的政治反对派受到的对待，如果他被驱逐到亚美尼亚，缔约国将违反《公约》第七条。

3.4 提交人根据与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享有的权利也受到侵犯，因为他的庇护申请是在加速庇护程序的框架下审议的，该程序有时间限制(处理时间为 48 小时)，使寻求庇护者及其代表几乎没有时间做准备。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指出，加速程序常常剥夺申请人的申请受到全面和公平审议的根本权利；申请人几乎没有机会记录自己受保护的需要。僵化的时间限制还使人无法获得真正的法律咨询，导致严重的驱回风险。因为这一批评，司法部长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宣布计划修订加速程序，将其从 48 小时延长至 8 天。

3.5 提交人认为，应对他适用长期庇护程序，因为当局认为他申请庇护的陈述是可信的。长期程序可使当局对提交人有关违反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的指控进行更广泛的审查。为了使缔约国当局获

<sup>3</sup> 见人权观察，“选举后的亚美尼亚”，书面声明，2008 年 4 月 17 日。

得更可信的资料，应给予寻求庇护者更多的时间收集信息和证据，为其指控提供依据。提交人还指责缔约国当局拒绝将提交人家人的证词视为相关证据。此外，哈勒姆的地区法院和国务院对上诉案件的审查不足。举证责任不能仅由申请人承担，特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通常并不享有同等的获得证据的机会。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2 月 5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及案情的意见。缔约国首先重新介绍了提交人的庇护程序，明确指出在 2008 年 6 月 16 日第一次面谈之后，提交人于 2008 年 6 月 17 日在一名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准备了第二次面谈。法律顾问可能与寻求庇护者讨论了第一次面谈的报告、对他的身份、国籍及旅行路线调查的结果，并至少花了两个小时帮助他准备第二次面谈。<sup>4</sup> 在第二次面谈时，提交人获得机会对他的庇护申请作详细解释。两次面谈都编写了报告，面谈是在一名口译员的帮助下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2008 年 6 月 19 日的书面通知向提交人告知缔约国驳回其庇护申请的意向。第二次面谈的报告作为该通知的附件。

4.2 提交人获得机会，以书面形式对有关第二次面谈的报告作了大量更正和/或补充。还给予了提交人对驳回其庇护申请的意向通知发表意见的机会，提交人在 2008 年 6 月 19 日的信中发表了个人意见。以上通知的附件中包括许多公开文件。2008 年 6 月 20 日，庇护申请依申请中心程序(加速程序)被驳回。<sup>5</sup> 因为在没有进行耗时调查的情况下能够确定，提交人不符合 2000 年的《外国人法》第 29 节提及的在荷兰居住的资格要求。<sup>6</sup> 同一天，提交人提交了一份司法审查申请。提交人还申请发布暂停对其驱逐的命令。位于哈勒姆的海牙地区法院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审议了两份申请。地区法院 2008 年 7 月 8 日的判决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请。提交人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向国务院行政司法处提出上诉，该处 2008 年 7 月 25 日的决定宣布提交人的上诉明显缺乏根据。<sup>7</sup>

4.3 在第二次面谈中，提交人提及其作为警官的地位，尽管受到来自其上司的压力，他不愿意为萨尔基相总统投票，以及他没有参与任何政党等情况作为庇护申请的理由。提交人解释说，从 2008 年 2 月 20 日起，即萨尔基相总统成功当选

<sup>4</sup> 这一时间可应要求延长至 3 小时。

<sup>5</sup> 据缔约国称，申请中心程序是一种加速程序，依照 2000 年的《外国人法》第 29 节，在申请中心程序未经过耗时调查的情况下，如果确定可基于 2000 年的《外国人法》第 30 或 31 节或《行政法通则》第 4:6 节的理由驳回申请(其中包括无效案件和在《都柏林公约》框架下的申诉案件)或接受申请，可在 48 小时内作出决定。

<sup>6</sup> 见 2000 年的《外国人法》第 29 节，其中规定可对以下外国人颁发临时庇护居留许可：符合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含义的难民；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有合理理由相信可能面临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真实风险的个人；在司法国务秘书看来离开原籍国的理由涉及重要的人道主义性质，因而不应返回原籍国的个人；在国务秘书看来返回原籍国可能受整体局势影响而陷入特别困境的个人。

<sup>7</sup> 根据 2000 年的《外国人法》第 91 节第 2 分节，该处在发布判决时(如本案)，可仅限于陈述上诉明显缺乏根据这一意见。

后，发生过几次和平示威活动，提交人在活动期间在场维持秩序。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示威活动中开始出现暴力行为。因为提交人在 2008 年 3 月 1 日时正在休假，所以在第一次暴力示威活动中不在场。但提交人在 2008 年 3 月 21 日、3 月 23 日和 4 月 9 日的示威活动中以警察身份在场。因为他的位置处于队伍的末尾，所以不必用武力对付示威者。提交人在庇护程序期间报告说，该区的区长是政府党派的成员，知道提交人和他的妻子拒绝接受金钱为萨尔基相总统投票。2008 年 3 月底，区长和另外一些人试图绑架和强奸提交人的妻子，提交人怀疑他的上司也有所参与。提交人的妻子设法逃脱，并违背其丈夫的意愿，决定于 2008 年 4 月 4 日逃往俄罗斯。2008 年 4 月底，提交人也决定离开亚美尼亚。

4.4 在此次面谈时，提交人还提及他已开始对示威者表示同情，因此不赞成警察部队对待他们的方式。正因如此，他编造了一个借口，避免在 2008 年 4 月 24 日举行的示威活动期间在场。他那一天上班是去守卫一家银行。提交人分别于 2008 年 5 月 10 日和 19 日上交了休假申请。两份申请一开始都被驳回。但是，为了避免在示威活动期间工作，提交人与他的上司达成一项协议，即如果其上司批准他的书面休假申请，他会去上班，但只负责守卫银行。提交人从 2008 年 5 月 19 日开始不去上班。从那一天起，他的电话每天都响，但是他没有接听。2008 年 6 月 1 日，他的指挥官告诉他如果他还不去上班，将对他采取措施。他的指挥官补充说，他知道提交人为谁投了票。他还说，如果提交人再不去上班就会消失。提交人当时正在准备飞机票和埃及签证，他于 2008 年 6 月 2 日回到警察局报到上班，他接到指示，每隔一天上班守卫银行。2008 年 6 月 3 日，提交人收到了埃及签证。在 2008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期间，有人继续给提交人打电话，在此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岳父母或一个朋友家中。2008 年 6 月 15 日，提交人飞到埃及，然后去往荷兰。

4.5 缔约国回顾了庇护申请程序，以及诉诸申请中心的快速程序的可能性，并解释说，对提交人庇护申请的评估是基于外交部 2008 年 3 月的国家报告，以及提交人在程序期间提交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国际危机编写的不同报告。在作出决定时，有关亚美尼亚寻求庇护者的政策以 2008 年 3 月的国家报告为依据。缔约国强调，亚美尼亚的局势并不意味着来自亚美尼亚的所有寻求庇护者都应被自动给予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所指的难民地位，也不能断定返回亚美尼亚本身会导致个人面临《公约》第七条所指的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

4.6 在对提交人的庇护申请作出决定时，缔约国考虑到某些特定群体需要特殊的关注，这类群体包括反对派政党的成员。缔约国参考的资料指出，反对党自 2008 年 3 月以来受到亚美尼亚当局的压制，有关于突袭、逮捕、炸弹袭击和纵火的报告，有时使用了致命武力，一些人因为政治观点被逮捕和定罪。该国家报告是 2008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所涉期间为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 月，因此没有包括 2008 年 2 月 19 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总统选举的情况，也没有包括选举之后、尤其是在提交人离开之前那个阶段令人震惊的局势。然而，缔约国在评估提

交人的庇护申请时使用了其他一些公开文件所载信息，即提交人在国家程序期间提交的文件。

4.7 就提交人有关《公约》第七条的申诉而言，缔约国首先承认，提交人的叙述与 2008 年 2 月 19 日总统选举之后亚美尼亚的政治局势相符。缔约国特别提及一些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这些报告指出，亚美尼亚的许多国家雇员受其上级逼迫为萨尔基相投票或参加他的集会。<sup>8</sup> 许多人是因为参加 2008 年 3 月 1 日的游行示威活动被逮捕的，其中大多数被拘留者被控有罪和判刑。<sup>9</sup> 因此，缔约国并不否认提交人在第二次面谈时陈述的情况，即有人给他和他的妻子金钱换取为萨尔基相投票，被他们拒绝，提交人试图避免在示威活动期间工作，以及他的妻子是强奸未遂的受害者等。

4.8 然而，缔约国认为，提交人陈述的情况并不足以断定有充分理由证明可能出现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提交人从未在本国从事过反对当局的政治活动，也不是政治积极分子。提交人仅仅是同情反对派，并为总统对手投了票。与提交人在提交委员会的来文中所作申诉不同的是，从第二次面谈的报告中无法断定提交人向亚美尼亚当局透露了他的政治信念。面谈的报告指出，当提交人拒绝接受金钱为萨尔基相投票时，他怀疑他的上级已了解他的政治同情心。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提交人曾明确地表明其政治倾向。缔约国提及有关第二次面谈的报告，提交人在此次面谈时指出，因为他还没有收到薪水，所以他拒绝在 2008 年 4 月 24 日的示威活动期间工作。缔约国因此将这一行为理解为用于对其上级掩饰其政治倾向的手段。

4.9 此外，提交人提及的报告谈及政治积极分子。基于提交人的陈述，无法将他视为任何一个这类群体的成员，也无法推定当局会将这类反对派活动归咎于他。此外，根据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 2008 年 9 月 29 日发布的报告，即使是反对派的积极成员和 2008 年 3 月 1 日和 2 日暴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受到的最严重的处罚也仅仅为监禁，对大部分人采用了非拘押措施。仅仅凭借提交人和他的妻子拒绝接受金钱为萨尔基相投票和他拒绝执行某些警察的工作，并无法断定当局对提交人有特殊兴趣。根据对第二次面谈的报告，提交人将他的上司与他的谈话描述为威胁，但其实这些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提交人回到工作岗位履行其职责。在这些谈话中提及提交人支持捷尔一彼得罗相作为总统候选人，不足以证明《公约》第七条遭到违反。提交人基于没有证实的怀疑，害怕今后可能遭到恶劣对待，但缔约国根据其对于亚美尼亚的了解，认为提交人的这一畏惧并不可信。

4.10 此外，提交人与他的上司之间的对话并没有促使提交人立刻离开本国。甚至他的妻子在 2008 年 3 月底被强奸未遂也没有促使提交人离开，他直到 2008 年 6 月

<sup>8</sup> 见 OSCE/ODIRH，2008 年 5 月 30 日关于 2008 年 2 月 19 日亚美尼亚总统选举的《选举观察团报告》；以及国际危机组织 2008 年 4 月 8 日题为“亚美尼亚：重拾碎片”的报告。

<sup>9</sup> 见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 2008 年 9 月 29 日的报告：“亚美尼亚特派团，调查结果摘要，埃里温，2008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

15 日才离开该国。另外，提交人未能证实亚美尼亚当局应对该强奸未遂事件承担部分责任，他的断言仅基于怀疑。提交人并没有向警方报告这些事件，也没有证实报告这类事件可能无用的断言。提交人提供的文件没有为他的申诉提供更多依据。

4.11 提交人在其上级的命令下，于 2008 年 6 月 2 日返回警察局工作，当时他似乎没有遇到对他不利的情况。如果当局因提交人的政治同情心将其视为怀疑对象，就有可能对他采取一定的纪律行动。此外，提交人离开本国时使用自己的护照和签证，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提交人选择的离境方式表明，他估计不会遇到当局制造的麻烦。

4.12 缔约国的结论并没有因提交人后来于 2008 年 4 月 24 日和 2008 年 5 月 19 日有关他受到上司的虐待和他的妻子受到强奸的指称而改变，提交人直到面谈后才作出这些指称。为了就庇护程序作出相关决定，寻求庇护者有责任说出任何必要相关事实。在本案中，提交人得到一名律师的协助，该律师负责建议他透露与程序相关的所有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敏感或不愿透露的信息。尽管听到这些建议，但提交人未提及他后来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以下行为令缔约国更为疑惑，因为第二份访谈报告指出，当被明确问及他是否受到虐待时，提交人回答他未受到虐待。面谈时还问及提交人他是否确定他的妻子想办法逃脱了袭击她的人并且未受到伤害，提交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此外提交人 2008 年 6 月 19 日的信中有对第二次面谈报告的更正和补充，在这封信中，提交人仅提及 2008 年 5 月 19 日发生的一次攻击事件。后来他又声称自己在 2008 年 4 月 24 日受到虐待。提交人叙述的内容不断变化。

4.13 缔约国不太相信后来从提交人的亲属那里收集的证词，因为无法将他们视为客观的证据来源。即使考虑信件的内容，也只能说亚美尼亚当局仅试图确定为什么提交人不去上班以及他住在哪里。

4.14 提交人在 2008 年 12 月 18 日的信中辩称，因为他的护照、结婚证、警员证和飞机票已寄至亚美尼亚驻荷兰代表机构，所以亚美尼亚当局现在知道他住在荷兰，就这一指称，缔约国答复说，如果外国人或其代表没有在两个月内领取留在皇家军事警察部队的文件，则将所有文件归还外国人原籍国的代表机构是一种标准做法。在本案中，提交人的代表在提交人获释后三个月才要求领取这些文件。缔约国坚称，该国没有向外国人的外交代表机构透露有关难民程序的任何信息。

4.15 关于提交人在《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之下的指称，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的难民程序遵守了所有的程序性保证。他有律师代理，并有机会两次提出上诉，先向地区法院上诉，然后向司法处上诉。仅仅凭借司法程序没有产生有利于提交人的结果这一事实，不足以说明提交人没有获得司法补救。缔约国因此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毫无根据。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对缔约国的意见作了评论。提交人声称，他的庇护申请过于复杂、涉及面广，无法通过申请中心程序处理，应当作为普通程序

的特例。根据荷兰的《外国人事务公告》，如果有可能不经过耗时的调查即可决定申请应驳回，则可以按照申请中心程序审查案件。提交人无法在程序规定的 48 小时内证实其首次申诉，主要是因为他必须向亚美尼亚、并向一名医生或精神病医师索取资料。

5.2 提交人提及大赦国际于 2009 年 3 月 7 日要求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提供了一名精神病医师基于提交人有关受到其上司虐待的指称，对提交人的身体状况所作的评估。精神病医师在该报告中证实，在进行面谈时，提交人的精神状态使他无法提及受到的虐待以及他的妻子被强奸未遂的情况。精神病医师还证实，提交人受到的虐待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症状提供了解释。精神病医师的结论认为，提交人的慢性症状和高血压可能说明其长期的紧张情绪不断加剧，这可能是所称的酷刑导致的结果。因此，这一报告为提交人所说在逃离之前在亚美尼亚发生的创伤事件提供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提交人在庇护程序的最初阶段就说出他的妻子和他自己受到虐待的情况。

5.3 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就涉及另一国家的问题声明：“对提交庇护申请自动和机械地适用[时限要求]，必须加以区别对待，保护《公约》第三条所载根本价值观。”<sup>10</sup> 如缔约国自己指出，对提交人的庇护申请进行评估的依据是外交部 2008 年 3 月的国家报告所载资料(未包括所称事件)，以及提交人提交的报告。因此，缔约国仅采用了提交人提交的材料，自己并未开展任何调查。

5.4 就庇护申请程序期间提交的指控，缔约国没有仔细审议提交人的声明。缔约国未否认以下情况：提交人三次拒绝遵守命令，镇压反对萨尔基相的示威活动；以及他因支持总统候选人捷尔-彼得罗相为人所知，受到其上司的口头威胁。提交人已作了解释，即不仅警察机构内部，而且区长及其雇员都知道提交人的政治信念，因为他们数次来到提交人的住所，为提交人及其妻子提供金钱以换取选票。提交人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因为当局明确了解他的政治观点。作为一名警官，他被禁止加入任何政党。他三次违抗命令、逃离亚美尼亚，以及他的亲属在他逃离后不断受到恫吓，将其置于违背国家雇主要求的忠诚义务的处境之中。缔约国提及的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的报告为他的指控提供了依据，因为罚款与监禁反映了亚美尼亚政治活动分子受到镇压的情况。报告还强调缺乏公正审判的情况，报告认为，仅仅基于政治意见或非暴力活动继续拘押或对任何人定罪是无法接受的。

5.5 提交人还声称，他的妻子的确遭到强奸，而并非强奸未遂。关于提交人没有向警方报告其妻子受到强奸的说法，提交人指出，他的妻子在遭到强奸后立即逃离了该国。他引用了 2008 年 12 月 11 日的一份专家报告，报告的作者是 Robert Chenciner，他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高级客座学者以及 Dagestan 科学中心俄罗斯科学院名誉成员。该报告指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在亚美尼亚发生的强奸是一种可怕的罪行，尤其是对警察的妻子实施强奸。在亚美尼亚，暴力侵害妇女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这一背景下，应严肃对待强奸，将其视为一种惩罚手

<sup>10</sup> 见欧洲人权法院，Jabari 诉土耳其，2001 年 7 月 11 日的判决(第 40035/98 号)。

段。提交人因此认为，向当局投诉其妻子被强奸可能对他不利，尤其是因为他被视为政治反对派。

5.6 关于其亲属的信，提交人称，他母亲在其中一封信中提及，他的兄弟为了解提交人的下落而受到特工人员长达两天多的不人道待遇。此外，他的岳母说，她及其家人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受到骚扰和恫吓。这些不能被视为当局为获得有关提交人下落的信息作出的正常行为。《荷兰行政法》适用自由证据理论，指得是任何类型的证据在申请庇护程序期间均可受理。提交人还提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手册》，该手册声明：“鉴于难民地位申请人所处特殊情况所致收集证据方面的困难，证据要求不应过分严格。”难民署还声明：“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减轻通常由申请人承担的举证责任，难以从申请人之处获得的信息可由其他渠道，如朋友，亲属及其他与申请人关系密切的个人提供。”<sup>11</sup> 提交人还指出，欧洲人权法院相当重视来自亲属的信件。<sup>12</sup> 因此，虽然原则上应由提交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确定和评估所有相关事实的义务应由提交人和缔约国分担，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做到这一点。

5.7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未能证实关于提交人用自己的护照离开本国是不怕当局会制造麻烦的断言。缔约国没有考虑提交人被批准正式休假的事实，该事实是警务人员离开该国的唯一条件。

5.8 缔约国将提交人的原始个人文件寄给亚美尼亚外交代表机构，违反了一国不得在庇护程序期间联系或接触寻求庇护者原籍国当局的绝对规则。只有在寻求庇护者明确同意以及经过与移民局协商后才可与外交代表机构联系。因此，缔约国故意使提交人面临风险，尤其是因为，这些文件是在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且特别报告员允许采取临时措施之后寄到外交代表机构的。

### 缔约国的进一步说明

6.1 缔约国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答复说，提交人在其评论中显著拓宽了其原始来文的范围，提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庇护申请中心程序问题。缔约国坚持认为，委员会接收个人来文程序的目的，不是抽象地质疑似乎与《公约》相悖的国家法律或惯例。<sup>13</sup> 此外，提交人关于第七条的指控的核心问题在于，将他驱逐回原籍国是否将使他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待遇的真实风险。

<sup>11</sup> 见难民署，《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 1951 年公约和 1967 年议定书确定难民身份的程序和标准手册》(HCR/IP/4/Eng/REV.1)，第 197 和 210 段。

<sup>12</sup> 见欧洲人权法院，Ammari 诉瑞典，2002 年 10 月 22 日的判决(第 60959/00 号)。

<sup>13</sup> 见委员会第 35/1978 号来文，Aumeeruddy-Cziffra 及其他人诉毛里求斯，1981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



6.2 就申请中心程序而言，<sup>14</sup> 案件在程序进展的若干时点进行评估，以确定能否在该背景下进行适当处理，或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一次面谈之后进行第一次评估，申请者的法律顾问可借此机会向移民和归化局陈述其意见，表明该案件还需要更多调查。然后由移民和归化局决定是否继续加速程序，还是将申请转交一名负责处理的工作人员供进一步审议，并将寻求庇护者移交接待中心。在本案中，法律顾问没有使用这一备选办法。在第二次面谈结束时，需重新决定该案件是否适于在申请中心进一步处理。最后决定是在寻求庇护者就决定意向发表意见后作出的。提交人于 2008 年 6 月 19 日发表的意见没有为中止申请中心审议其案件提供依据。为了确保对风险进行准确和适当的评估，已制定了足够的保障方法。多次面谈为第一项保障，申请者的面谈得到法律顾问的协助，第二项保障是在多个时点作出决定，以确定继续在申请中心处理该案件是否适当。该决定可向国内法院上诉，提交人采纳了这一做法。国内法院并不认为不可能在申请中心程序内部评估有悖于《公约》第七条待遇的风险。

6.3 缔约国还反对提交人关于给他准备申请的时间过短的指称。寻求庇护者并不需要证明其原籍国发生的事件，他们只需保证其陈述的合理性。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第二次面谈时所作的陈述是合理的。提交人提交的文件在申请中心程序内部以及在法院进行了全面评估。然而，这些文件不足以证实提交人关于返回亚美尼亚就会遭受有悖于《公约》第七条的待遇这一指称的合理性。鉴于提交人于 2008 年 6 月 15 日才离开本国，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获得为其叙述提供依据的文件。

6.4 提交人于 2009 年 4 月 16 日提交了一份新的庇护申请，并以大赦国际的报告和有关其体检报告的文件作为申请的佐证。这些文件促使缔约国要求体检部门 (Bureau Medische Advisering (BMA)) 对提交人进行体检，并对大赦国际体检组 2009 年 3 月 7 日发布的报告作出回应。体检部门对提交人进行了体检，并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和 2009 年 8 月 12 日向缔约国报告了体检结果。提交人新的庇护申请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被驳回。提交人随后上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对这一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在缔约国提交进一步资料时，该事项仍有待审议。<sup>15</sup>

6.5 在第二次面谈之前，有人询问提交人是否有身体原因使他无法接受面谈。提交人回答说，他能够接受面谈。提交人在 2009 年 4 月 16 日新的庇护申请中上交了大赦国际的报告，表明在第二次面谈时，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透露他受到其上司虐待的情况，以及他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与他在亚美尼亚受到的不人道待遇相关。在缔约国看来，该报告并无明确结论，无法令人信服地确定这类指称。尽管提交人的身体创伤，如上腹部持续局部疼痛、胫骨上有 3 毫米的伤疤，以及缺失几枚臼齿，都可能是酷刑的后果，但也可能是其他情况导致的创伤。

<sup>14</sup> 见 2000 年《外国人法执行准则》，C12/3 和 C13/2。

<sup>15</sup> 缔约国在 2010 年 9 月 2 日的信中告知委员会，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海牙地区法院宣布提交人的复审申请没有根据。提交人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就这一判决向国务院行政司法处提出上诉。提交人在 2011 年 1 月 18 日的信中告知委员会，他的上诉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被驳回，国内补救办法又一次终止。



6.6 大赦国际的报告指出，提交人的叙述载有提交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证据。但该报告指出，最好将这些症状列为适应障碍。该报告还指出，此人目前生活状况不确定的情形也导致其症状的发展和加剧。然而，报告的结论认为，虽然生活状况不确定也许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提交人的障碍症状似乎是酷刑/虐待的后果。体检部门的医生在 2009 年 8 月 12 日的报告中对大赦国际的专家得出这一结论所使用的方法表示质疑，因为其初步评估的结果是适应障碍。

6.7 哈勒姆地区法院在其 2008 年 7 月 8 日的判决中指出，关于第二次面谈的报告显示，当被要求重新叙述自己的情况时，提交人作了一份详细陈述，那时他似乎没有被打断或受到阻止。当要求提交人作进一步澄清时，他回答的方式令人满意。法院还指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提交人为什么不能在第二次面谈时陈述他受到攻击的情况。在面谈之后询问提交人关于面谈的情况时，提交人答复称，他对面谈进展的方式表示满意。因此，缔约国质疑提交人后来所说他受到攻击及他的妻子受到强奸等情况的真实性。

6.8 缔约国最后提及亚美尼亚恶劣的人权状况，尤其是在整个难民程序期间考虑了与总统选举相关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政治权利的影响。然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根据美国国务院 2009 年的《人权报告》，亚美尼亚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宣布了一次大赦。与总统选举相关的 44 名反对派支持者中约有 30 人于 2008 年 2 月获释。缔约国坚持认为，提交人返回亚美尼亚不会面临有悖于《公约》第七条待遇的风险。因为提交人的上司并不了解提交人的政治信念，他不可能仅仅因为在 2008 年总统选举期间拒绝接受金钱而投票，或因为逃避作为警察的某些任务而陷入危险境地。此外，到 2010 年时，大选已经过去了两年。

### 提交人的进一步评论

7.1 2010 年 10 月 1 日，提交人提出详细论据，说明对他适用的加速程序不符合允许进行风险分析的最低要求。加速庇护程序自 2010 年 7 月 1 日以后已为普通庇护程序所取代，时间延长为 8 天。加速程序由普通庇护程序所取代表明之前的程序不能够保障寻求庇护者的权利。这一新的程序允许个人在进程开始之前至少有 6 天的休息和准备时间。在 2010 年 7 月 1 日之前适用的加速庇护程序中，没有休息和准备时间，没有在律师办公室的会谈，而且在程序不同阶段的参与律师不同。因此，在第一次面谈之后协助提交人准备第二次面谈的律师与第二次面谈之后与之会见的律师并非同一人。这些情况导致的气氛无法使申请人有充分的安全感，因而无法一开始即说明其申请庇护权的所有理由。

7.2 提交人就否决其庇护申请的意向发表了意见，他在提交的更正和补充资料中声称，他因为在政治上支持捷尔-彼得罗相，所以受到其上司的威胁、殴打和人身虐待，他的妻子遭到与区长相关者的强奸。这些更正资料应促使缔约国决定不应通过加速程序处理提交人的请求。但缔约国却简单地指出，这些更正和补充资料似乎不可信。此外，缔约国没有考虑提交人亲属的来信，是因为这些来信是在上诉阶段才提交的。缔约国辩称，提交人在离开本国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证

据，为其陈述提供依据，提交人答复说，如果他携带这类文件，文件很有可能在他起飞前被机场发现。另一方面，其亲属的来信是在他离开之后书写的，因此在申请程序的第一阶段无法收集到。

7.3 在提交人的第二次庇护申请程序期间，缔约国没有审议提交的文件内容，还适用严苛的程序规则，声称这些文件不真实及/或非出自客观来源，或仅属于一般性文件，与提交人本人无关。阿姆斯特丹的地区法院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驳回了提交人的复审申请，认为大赦国际对提交人的体检报告、亚美尼亚问题专家 Robert Chenciner 的报告等文件，以及缔约国当局将与提交人相关的原始文件寄往亚美尼亚外交代表机构的事实等，不属于《行政法通则》第 4:6 节所指的新的事实，提交人认为，这一做法没有确保提交人获得适当风险评估所要求的程序性保障。

7.4 提交人提及荷兰人权监察员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指出，缔约国在庇护程序进行期间将提交人的原始文件寄至亚美尼亚外交代表机构的做法违反了法律。监察员还指出，不能排除亚美尼亚当局收到这些文件后也了解到提交人向缔约国提出庇护请求的情况。

7.5 关于大赦国际的报告，提交人反对缔约国声称该报告不清楚且没有明确结论的说法。该报告的作者是一名精神病医师，他已声明提交人的精神问题似乎是酷刑/虐待的结果。他的结论指出，提交人的精神症状、左腿上的伤疤及提交人的臼齿缺失，与所称受到的酷刑/虐待一致。缔约国的医学顾问在 2009 年 8 月 12 日的一份报告中对上述报告作出回应，他指出，并不清楚为什么精神病医师认为酷刑/虐待对提交人精神症状的影响大于当前生活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医学顾问没有质疑可将精神症状归为所称酷刑/虐待的影响的结论。此外，对报告中关于伤疤和缺失牙齿与酷刑/虐待一致的结论，医学顾问未提出任何质疑。

7.6 提交人提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该法院认为：“虽然证明并非由一名专门从事酷刑伤害评估的专家出具，[……]但已向当局说明，有重要迹象表明申请人的伤疤和创伤可能是由虐待或酷刑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当局]应驱除有关这类伤痕原因的所有质疑。在申请者对伤痕的原因提出确凿的表面证据的情况下，[国家当局]应指示寻求专家意见，以确定可能导致这类伤痕的原因。国家当局并未这样做，上诉法院也没有这样做。[……]特别是在有重要迹象表明申请人的创伤可能是由酷刑导致的情况下，国家有义务明确所有相关事实。”<sup>16</sup> 在上述判例中，报告是由一名非专家提供的，而就提交人的案件而言，报告是由大赦国际的一名精神病医师出具的。因此，提交人反对缔约国关于他应该在庇护程序一开始就提供与他的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的说法。反之，缔约国应提出医学证据，以质疑大赦国际说明提交人无法在庇护程序的初期阶段说出其遭受酷刑情况的体检报告。

<sup>16</sup> 见欧洲人权法院，R.C.诉瑞典，2010 年 3 月 9 日的判决(第 41827/07 号)，第 53 段。

7.7 提交人在回顾其先前有关可能遭受有悖于《公约》第七条的待遇的论据后，又回到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具体而言，即 R.C.诉瑞典的案件，就该案件，法院认为：“法院考虑到可免除申请者[……]证明其[曾]遭受酷刑的责任，[认为]国家应[承担]义务，驱除任何关于对申请人实施驱逐后该人可能遭受有悖于第三条的待遇的疑问。”<sup>17</sup>

7.8 提交人提及近来关于亚美尼亚人权状况的报告，指出在对 2008 年的总统选举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后，亚美尼亚议会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警察和安全部队在镇压骚乱方面未犯任何错误；此外，自 2009 年 6 月大赦以来，仍有一些人因这些活动而入狱；<sup>18</sup> 在接受采访的囚犯中，有一半以上声称他们在被转送到监狱之前，在接受警察调查时遭受了酷刑；亚美尼亚当地的民间社会团体有关于拘押期间虐待和酷刑的大量报告。<sup>19</sup> 因此，提交人坚称，酷刑和虐待在亚美尼亚仍然十分普遍，缔约国已违反了他在第二条第 3 款之下与第七条一并解读的权利，如果他遭遣返亚美尼亚，缔约国将违反他在第七条之下的权利。

###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和提交人的进一步评论

8.1 缔约国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指出，用普通庇护程序取代申请中心程序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处理庇护申请的质量，这并不说明依照过去的程序所做的决定没有经过所须的妥善处理。

8.2 提交人声称，他在准备第一次面谈时未获得法律顾问的援助，他并不是指第一项庇护程序未得到妥善处理。寻求庇护者寻求庇护的原因不是在第一次面谈，而是在第二次面谈时讨论。提交人在准备第二次面谈时得到了一名法律顾问的协助，并在第二次面谈时被明确告知说出与他的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和情况的重要性。似乎没有任何原因能够解释提交人在这一阶段为什么不能说出其妻子被强奸以及他自己在原籍国受到不人道待遇的情况。缔约国注意到，哈勒姆地区法院在 2008 年 7 月 8 日的判决中以大量篇幅讨论了第二次面谈是否得到妥善处理的问题，并得出了正面结论。

8.3 关于第二份申请，缔约国辩称，当局在评估时考虑了提交人律师的请求，提交人于 2009 年 4 月 15 日接受了一名医生的检查。该医生认为，提交人的身体状况不适于接受时间过长的面谈，但是可以听他简要叙述一些事实或情况的变化。面谈于第二天举行，对提交人的身体状况作了考虑。移民和归化局还要求体检部门(Bureau Medische Advisering (BMA))对大赦国际体检组的报告作出回应，并就提交人的健康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体检组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和 2009 年 11 月 6 日提交调查结果后，已与提交人的律师达成协议，以书面形式说明一些问题，因此不再需要进一步面谈。后来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发出的意向通知以及

<sup>17</sup> 同上，第 55 段。

<sup>18</sup> 见荷兰外交部长，关于亚美尼亚的国家报告，2010 年 8 月 27 日。

<sup>19</sup> 见人权观察就“酷刑和虐待”向亚美尼亚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材料，2009 年 11 月。

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作出的决定都考虑了以下问题，即提交人的身体状况能否为其返回原籍国可能遭遇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这一结论提供合理解释。

8.4 《行政法通则》第 4:6 节之下的新申请程序规定，如果出现新的事实或情况有所变化，允许寻求庇护者请求对早先驳回庇护申请的决定进行复审。根据该《通则》第 4:6 节第 2 分节，移民和庇护政策部长可参考早先驳回上一份申请的决定，自行斟酌驳回新的申请。但是，在本案中，该部并没有利用后一项条款，反之，该部对新的申请作了大量评估，重点关注提交人上交的所有文件，然后声明了驳回申请的原因。在审查驳回决定时，地区法院考虑了提交人是否提交之前未上交的新的事实或证据，以及引证的事项是否可能影响原始裁决采纳的立场等问题。法院在 2010 年 7 月 15 日的判决中认定，大赦国际的报告没有明确结论；提交的有关亚美尼亚一般局势的报告(包括 Chenciner 先生的报告)和文章没有影响对提交人个人状况的评估；2008 年 4 月 11 日和 2008 年 6 月 28 日的报纸所载文章为拷贝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且它们与提交人的情况无关；提交人的朋友和亲属是应他的要求撰写的来信，没有任何客观来源予以证实。国务院行政司法处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确认地区法院的判决。

8.5 提交人有权向地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 2008 年 6 月 20 日和 2010 年 1 月 14 日的裁决进行复审，提交人确实这样做了。地区法院进行全面的评估并作出判决后，提交人又就其判决向行政司法处提出上诉，行政司法处维持原判决。因此，针对原庇护申请或新的庇护申请被驳回的问题，存在《公约》第二条第 3 款所述有效的法律补救。

8.6 大赦国际体检组的报告指出，提交人的症状不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界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标准，他的状况也无法被定为精神病学意义上的抑郁或脑损伤，对其当前症状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所称的酷刑/攻击。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分类，他的症状最好应归为适应障碍。正如体检部门在 2009 年 8 月 12 日的报告中指出，尚不清楚体检组调查员究竟是以什么为依据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的精神障碍是由所称的酷刑/攻击造成的。关于为什么所称的酷刑/攻击对提交人当前精神症状的影响远远大于当前的不确定性及其生活中其他事件的影响，该报告和检查都没有提供任何原因。调查员使用了“一致”一词，这并不能排除也许是一些其他原因导致提交人症状的可能性。缔约国援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议定书》)，其第 187(b)段声明：“一致”一般指得是“损伤可能是由所述创伤造成，但不很明确，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关于缺失的臼齿，只能说其中一颗臼齿的缺失与所称酷刑/攻击一致，而另一颗臼齿是由牙医拔除的。鉴于使用的表达方式，缺失的臼齿和提交人胫骨上 3 毫米的伤疤都有可能存在其他成因，因此，无法认为该报告足以证实提交人事实上受到攻击或虐待的指称，也不能认为其可以合理解释提交人没有能力在第二次面谈时进行连贯一致陈述这一结论。

8.7 最后，缔约国认为，亚美尼亚的整体局势并不能证明在该国总统选举三年之后的现在，提交人有理由害怕受到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这一推定。

9. 2011 年 9 月 9 日，提交人重申其之前关于加速程序不适于他的复杂案件的论据；认为对大赦国际体检组的报告等文件没有给予妥善关注；以及他如果被遣返亚美尼亚可能仍然遭遇的风险。除了他在亚美尼亚遭受的酷刑和虐待以外，体检报告的结论很难对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找到其他病因，该结论有详尽和全面的调查作为依据。提交人还提及近来于 2011 年 4 月由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2011 年 1 月由人权观察发布的报告，以及 2011 年 5 月由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发布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逮捕政治反对派；自 2008 年选举以来继续拘留；以及审讯期间实施的酷刑行为。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10.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10.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10.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对来文可否受理提出异议。委员会认为，受理问题没有障碍，提交人已充分证实了在《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七条之下的指控。委员会因此宣布来文可以受理，并开始审议案情。

#### 审议案情

11.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根据各当事方提出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1.2 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牢记缔约国有义务根据《公约》第二条确保在其领土内的或者受其管辖的个人享有《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包括在实施驱逐非公民的程序中确保所有个人的这些权利。<sup>20</sup> 委员会忆及，一般由《公约》缔约方的诉讼法院审理评估这些案件的事实。<sup>21</sup>

11.3 委员会必须评估的内容包括：提交人断言其返回亚美尼亚后面临风险的庇护请求是否得到缔约国当局的充分评估；提交人返回原籍国是否面临遭受酷刑或虐待的真实风险。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其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提及：“如果有重大理由相信确实存在会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时，缔约国有义务不采取引渡、驱逐出境或者其他手段将有关人士逐出其国境”(第 12 段)。

<sup>20</sup> 见委员会第 6 和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

<sup>21</sup> 见委员会第 1763/2008 号来文，Pillai 诉加拿大，2011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2 段。

11.4 就提交人有关缔约国将其引渡至亚美尼亚会侵犯其在《公约》第七条之下的权利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在 2008 年举行总统选举时，提交人和他的妻子拒绝接受金钱为候选人萨尔基相投票，在区长的团队中引起了怀疑。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否认这部分指称。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作为一名警官，试图在选举后的示威活动期间避免镇压政治抗议人士，因而向其上司泄漏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部分否认这方面指称，指出在进行国家层面庇护程序期间，提交人仅仅声明，他为了不在 2008 年 4 月 24 日的示威活动期间工作，声称自己尚未收到工资，这种说法更为可信，因为提交人从未因所称违抗命令的行为受到过纪律处罚。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断言，虽然在这一时期政治反对者受到暴力镇压，但在亚美尼亚当局眼中，不会仅仅因为提交人拒绝接受金钱为萨尔基相投票就将其视为政治活动分子；因此，提交人未能证实他因此吸引当局的特别兴趣。

11.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即他分别于 2008 年 4 月 24 日和 5 月 19 日两次被其上司殴打；他的妻子受到与区长相关者的强奸；以及他的妻子随后逃往俄罗斯。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否认这些指称，依据是它们缺乏可信度，因为提交人不断更改其叙述的情况与在第二次面谈时的声明相矛盾。关于提交人的妻子被强奸或强奸未遂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对为什么在第二次面谈时不愿意证实的确发生强奸提供了解释；但委员会也注意到，提交人将这些攻击描述为对其妻子本身的政治意见的报复，而非针对提交人。但是，对其被殴打一次或多次的说法不一致的问题，提交人未提供充分解释。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当局认为这些不一致之处严重影响提交人指称的可信度，这一点并无不合理之处。

11.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对他的案件适用加速程序，没有对他提交的文件给予足够重视，违反了与《公约》第七条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 3 款。虽然委员会对申请中心程序的时间限制表示关切，<sup>22</sup> 但注意到提交人有多次机会对其申请进行补充，在他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一项证据足以化解他对离开亚美尼亚之前发生事件的不同说法的矛盾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缔约国审议其申诉的程序不当或剥夺了他的有效补救。

11.7 就缔约国认为可信的提交人指称的版本而言，仍存在提交人今后是否可能在亚美尼亚面临酷刑或虐待的真实风险的问题。委员会对提交人的文件被错误地寄至亚美尼亚使馆这一事实表示关切。尽管如此，鉴于提交人一直不是政治上活动分子，已不再是一名警官，而且自 2008 年具有争议的选举以来已过去了一段时间，所以委员会无法认定提交人被遣返亚美尼亚后会面临有悖于《公约》第七条待遇的真实风险。

<sup>22</sup> 见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CCPR/C/NLD/CO/4)，2009 年 7 月 28 日，第 9 段。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将提交人引渡至亚美尼亚不会侵犯其在《公约》之下的任何权利。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M. 第 1811/2008 号来文, Djebbar 和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Taous Djebbar 和 Saadi Chihoub  
(由 TRIAL—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提交人之子, 分别生于 1977 年和 1980 年)以及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阿尔及利亚

来文日期: 2008 年 8 月 25 日(首次提交)

事由: 两个人遭强迫失踪, 过去 15 年一直被单独监禁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 禁止酷刑和残忍与不人道的待遇;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尊重人的固有尊严; 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禁止非法和任意干扰个人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权; 未成年人受到保护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第 1 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 款至第 4 款; 第十条第 1 款;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二十三条第 1 款; 第二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甲)项和第 2 款(乙)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Taous Djebbar 和 Saadi Chihoub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11/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0 条, 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没有参加审查本来文。

由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签署的两份个人意见的案文附于这些意见之后。



## 意见

1.1 2008 年 8 月 25 日来文的提交人是 Taous Djebbar 和 Saadi Chihoub, 两人都是阿尔及利亚国民。他们代表两个儿子——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提交来文, 两个儿子分别于 1977 年 1 月 8 日生于 Hussin Dey (阿尔及尔)和 1980 年 9 月 29 日生于 EI Harrach (阿尔及尔)。提交人声称 Djamel Chihoub 和 Mourad Chihoub 是阿尔及利亚实行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至第 4 款、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他们还声称, Mourad Chihoub 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十四条第 1 款行为的受害者。来文提交人还声称, 他们本人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七条、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行为的受害者。他们由 TRIAL (瑞士反对有罪不罚协会)代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9 月 12 日对阿尔及利亚生效。

1.2 2009 年 3 月 12 日, 新来文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拒绝了缔约国 2009 年 3 月 3 日的请求, 该项请求要求委员会与案情分开审议来文是否受理的问题。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Djamel 无业, 单身; Mourad 为高中学生。两人均居住在其父母在阿尔及利亚 Baraki 的住所。提交人声称, 1996 年 5 月 16 日上午 8 时一群阿尔及利亚军人出现在 Baraki 家的住宅前。这群人包括 20 名来自 Baraki 营地身着伞兵制服的士兵, 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 2 名来自搜查与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员和一名戴风帽的民兵。这些士兵手持一份名单和一些照片。指挥官<sup>1</sup>向 Saadi Chihoub 出示了他的大儿子 Saïd Chihoub 的照片。Saïd Chihoub 于一年半前离家, 并询问 Saïd 在哪里。Saadi Chihoub 说他不知道。那些士兵就抓住了 Djamel Chihoub 说“等 Saïd 自首了, 我们才会释放 Djamel Chihoub”。Saadi Chihoub 和他的最小的儿子 Mourad 试图干预, 但这些士兵打了 Mourad, Mourad 倒在地上。这些士兵推开其父亲, 抓住 Djamel, 带着 Djamel 离开了住所。这一事件发生时, 来文提交人及其 5 个女儿和他们的儿子 Mourad 都在场, 当时他们都在公寓内。若干邻居也目睹了这一情景。<sup>2</sup>

2.2 来文提交人指控, 绑架其儿子 Djamel 是武装部队各个部门联合进行袭击的一部分, 在此种袭击中, 同一街坊中的若干人士也遭到被捕。根据后来被释放的同牢囚徒, 据称 Djamel Chihoub 先被带到搜查和安全部的营房, 然后被带到 Châteauneuf 的行动指挥总部。根据其他未确实来源, 据说他后来被转到在 Beni Messous 的搜查与安全部营房。其家属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的长兄 Saïd Chihoub 是那些士兵进入其家庭住所要寻找的人。Saïd Chihoub 后来在 1996 年 6 月 27 日

<sup>1</sup> 来文提交人指出了该指挥官的姓名。

<sup>2</sup> 来文提交人附上两名邻居的证词, 他们证明他们看到 Djamel Chihoub 被捕。

的冲突中被安全部队打死在街头。然而根据负责逮捕 Djamel Chihoub 的官员，Djamel Chihoub 作为搜索其兄弟 Saïd Chihoub 的人质，但 Djamel Chihoub 从未被释放。

2.3 1996 年 11 月 13 日晚上 11 点左右，来自 Baraki 营房的十几名士兵来到文提交人住所夺门而入，既没有出示逮捕令也没有提供任何解释，逮捕了他们最小的儿子 Mourad Chihoub，他当时才 16 岁。带领逮捕 Djamel Chihoub 的同一名指挥官指挥了这次行动，他由两名中尉和两名未授军衔的官员协助。和这些士兵一起来的还有至少一名民兵，该民兵就住在周围，所有的居民都认识他，他往往参与同样的行动。Mourad Chihoub 被当着提交人及其他的 5 个姐妹的面被逮捕。若干邻居也在场。<sup>3</sup> 其父亲 Saadi Chihoub 试图干预几乎被杀害。指挥官和 Saadi Chihoub 对话并证实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受害者参与了任何非法活动。

2.4 据称 Mourad Chihoub 与其他被捕的人先被带到 Baraki 的营房。其家属后来从被释放的同牢囚犯中得知 Mourad Chihoub 在那里被拘留了 3 个月之后被转移到在 EI Madania 的行动指挥总部(Salembier)，然后被转到 Ben Aknoun 的搜查与安全部中心，自那时起，他的家属再也没有看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2.5 Chihoub 家庭，特别是提交人，坚持不懈地寻找他们的孩子。在 Djamel，然后在 Mourad Chihoub 逮捕之后，提交人立即试图了解其儿子的遭遇，以及他们被拘留在何处。他们向在这个区的各个营房、检查站和宪兵防守站询问情况，并向 EI Harrach 的公共监察办公厅打听消息，但没有任何结果。

2.6 1996 年 7 月 15 日，Saadi Chihoub 写信给全国人权观察主席请他说明小儿子 Djamel 的下落，他还于 1996 年 7 月 26 日写信给共和国总统，并在第二天写信给司法部长。然后 Saadi Chihoub 于 1996 年 9 月 7 日写了两封信，就其儿子 Djamel Chihoub 被绑架一事向阿尔及利亚最高法院公共监察官正式提出申诉，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1997 年 3 月 16 日，Saadi Chihoub 向共和国总统发出了第二封信，并向监察官发出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进行干预，解释其两个儿子失踪的问题。他又一次向司法部长致函，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2.7 直到 Saadi Chihoub 向监察官报告 Djamel Chihoub 失踪后十个月，监察官才于 1998 年 1 月 18 日确认收到了 Saadi Chihoub 的申诉。在那封信中，监察官答复说，他所能做的一切是向有关当局汇报这一案件，而 Chihoub 家属已经这么做了。1998 年 7 月 4 日，Taous Djebbar 写信给共和国总统请求其就其两个儿子的失踪给予帮助。但她没有收到该信的答复。

2.8 1999 年 11 月 13 日，在 Chihoub 家属就其儿子 Djamel Chihoub 的事情向全国人权观察申诉后两年半，该机构告诉 Chihoub 家，根据国家宪兵的一个股所进行的调查结果，Djamel Chihoub 并非是当局要追捕的人，安全服务部并没有颁发任何逮捕他的命令，不管怎样，调查并没有阐明他的命运。根据来信，国家宪兵

<sup>3</sup> 提交人附上了一名邻居的证词，该邻居声称他知道 Mourad Chihoub 被捕的情况。

队在调查该事项之后起草了一份日期为 1997 年 1 月 18 日的报告。然后，从未准许提交人查看这一文件，该文件可能会提供一些答案说明有关 Djamel Chihoub 失踪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在进行调查期间，没有通知该家庭已经开始调查或者通知其调查的进展情况，国家人权观察只在将近两年之后才向其通报调查已经结束。

2.9 1999 年 10 月 9 日，Saadi Chihoub 就其儿子 Mourad Chihoub 被绑架和失踪事项向 El Harrach 的调查法官正式提出申诉。Mourad Chihoub 在被捕时还是一名未成年人。Taous Djebbar 就其两名儿子被绑架事项于 1999 年 12 月 22 日向阿尔及利亚公共监察官提出申诉。同一天，她还写信给司法部长询问她的儿子是否还活着，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被关押在何处。Taous Djebbar 在 2004 年 5 月 23 日的来信中提请共和国总统注意她儿子的案件。

2.10 由于 Chihoub 家庭没有从他们联系的主管当局得到任何反应，Chihoub 家庭转而求助于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工作小组。Chihoub 兄弟的案件于 1998 年 10 月 19 日提交工作组。然而，缔约国并没有通报工作组这两兄弟的下落。

2.11 1998 年年初，提交人几次被传唤到国家各主管当局作证，这些主管部门包括宪兵队、军事检察官办公室、El Harrach 调查法官、Baraki Daïra 的警察、阿尔及利亚首席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和全国保护和促进人权咨询委员会(替代全国人权观察)。Chihoub 家庭不知道这些证词是在什么样的诉讼程序下采信，因为在有关的传讯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一信息。此外，提交人并不知道是否还采取了其他调查步骤。特别是，就提交人所知从未讯问或者质问过参与绑架其失踪儿子的个人。而且，从未传讯见证这两起绑架事件的邻居作证作为这些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提交人所采取的这些步骤没有产生任何法庭裁决，甚至没有产生任何认真和合理的完整调查。对此事件作出裁决的唯一司法主管部门是 El Harrach 的调查法官，该法官在 2000 年 4 月 3 日的驳回诉讼中宣布停止诉讼程序。Chihoub 家庭只得到简短的书信通知，而且没有告诉该决定的任何理由。Chihoub 家庭从没有收到正式驳回诉讼的副本。

##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其儿子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分别于 1996 年 5 月 16 日和 1996 年 11 月 13 日被缔约国的工作人员逮捕，从那一刻起他们俩就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sup>4</sup> 自他们被捕之后，缔约国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自由或者透露他们的下落，故意使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sup>5</sup> 提交人强调与世隔绝的拘留含有高度侵犯生命权的风险，因为受害者完全听凭监狱看守的摆布，而监狱看守在这种情况的性质下是完全没有监督的。即使失踪并没有导致最不好的后果，但那一时刻对

<sup>4</sup> 提交人提到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 条第 2 款(i)项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关于“强迫失踪”的定义。

<sup>5</sup> 提交人补充说，缔约国的强迫失踪做法是有计划和普遍的，达到了可被认为是一种反人类罪的程度。

受害者生命的威胁构成了违反第六条，而缔约国并没有履行其保护基本的生命权利的职责。<sup>6</sup> 提交人补充说，更为严重的是缔约国没有努力地询问他们的下落，因而没有保障两名受害者的生命权。而且指出，现在自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在秘密拘留设施失踪已历时 12 年之久，找到他们的机会非常渺茫。<sup>7</sup> 提交人提到了委员会关于第六条的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1984 年)，声称他的两名儿子遭到了侵犯其《公约》第六条之下保障的权利，以及第二条第 3 款之下的权利。<sup>8</sup>

3.2 提交人还声称，就他们两名受害者而言，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强迫失踪以及所导致的焦虑与遭遇构成了侵犯《公约》第七条的待遇。<sup>9</sup>

3.3 就他们自己而言，提交人认为，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失踪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一种惊愕、痛苦和不安的经历，因为他们对其两个儿子的命运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已经死亡，不知道他们死的情况或者他们被埋葬的地方。这些不定因素不断地导致整个家庭极度的痛苦，这种痛苦从其 1996 年 5 月和 11 月被捕起一直困扰不断。自那时起主管当局并没有努力进行有效的调查来解脱该家庭的痛苦不安。提交人声称，就他们本人而言，单独解读第七条和与《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一起解读缔约国侵犯了《公约》第七条。<sup>10</sup>

3.4 关于《公约》第九条，提交人提到他们的儿子是在没有逮捕证，也没有通报其被逮捕的理由的情况下被缔约国的武装部队的成员逮捕。自他们被捕之后，其家庭成员中没有任何人再见到他们，也没有能够与他们联系。在没有来自缔约方的任何正式通信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和这两名受害者一起拘留的第三方家属成员才了解到 Djamel Chihoub 被关押在 Châteauneuf 行动指挥总部和在 Beni Messous 搜查与安全部的营房内，Mourad Chihoub 曾被暂押在 Baraki 军事营房，后被关押在 El Madania 的行动指挥总部(Salembier)。之后提交人为了解其儿子的消息而做的种种企图都没有结果。根据提交人，就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严重地没有履行其在第九条第 1 款之下的义务。<sup>11</sup>

<sup>6</sup> 提交人提到了第 84/1981 号来文，Guillermo Ignacio Dermit Barbato 和 Hugo Haroldo Dermit Barbato 诉乌拉圭，1982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 段。

<sup>7</sup> 现为 15 年。

<sup>8</sup> 提交人还提到第 84/1981 号来文，Dermit Barbato 诉乌拉圭，上述，第 10 段。

<sup>9</sup> 提交人提到了第 440/1990 号来文，Youssef El-Megreis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1994 年 3 月 24 日通过《意见》，第 5.4 段；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意见》，第 9.8 段；和第 950/2000 号来文，Sarma 诉斯里兰卡，2003 年 7 月 16 日通过《意见》，第 9.5 段。

<sup>10</sup> 提交人除其他事项外提到了第 107/1981 号来文，María del Carmen Almeida de Quinteros 诉乌拉圭，1983 年 7 月 21 日通过《意见》，第 14 段和委员会关于审议阿尔及利亚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CPR/C/79/Add.95，1998 年 8 月 18 日，第 10 段。

<sup>11</sup> 提交人提到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意见》，第 8.5 段和第 1196/2003 号来文，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5 段。

3.5 提交人补充说，由于从未通知其儿子对他们提出的刑事诉讼，对这两名受害者而言，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2 款。特别是 Djamel Chihoub，据称指挥逮捕他的指挥官说“等 Saïd 自首，我们将释放 Djamel”，似乎逮捕他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向他的兄弟 Saïd 施加压力，这侵犯了法律与司法原则。此外，逮捕 Djamel 的指挥官自己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Djamel 参与了任何非法活动。至于 Mourad，1996 年 11 月逮捕 Mourad 显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仅为了故意迫害这一家庭，因为其兄弟 Saïd Mourad 已在一个月之前被杀害。缔约国当局后来也确认，Mourad Mourad 并非是当局要拘捕的人，并且没有逮捕他的证件。<sup>12</sup> 因此，就这两名受害者而言，违反了第九条第 2 款。

3.6 鉴于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没有立即受到一名法官或者其他司法当局的审讯，提交人认为就这两名受害者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九条第 3 款。<sup>13</sup> 最后，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还是违反第九条第 4 款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自 1996 年以来被与世隔绝地拘留，剥夺了与外部世界的全部联系，因而他们实质上不可能对他们拘留的合法性提出争议或者要求法官释放他们。

3.7 提交人进一步认为，鉴于其儿子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被与世隔绝地拘留，因而他们的待遇是非人道的或者没有尊重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固有尊严。因此他们声称他们的儿子是缔约国侵犯《公约》第十条第 1 款之下所保障的各项权利的受害者。

3.8 提交人还声称，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作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被剥夺了被承认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权利——换言之，将他们下降至“非人”的地位，因而缔约国侵犯了《公约》第十六条。<sup>14</sup>

3.9 提交人进一步认为，鉴于缔约国的武装部队在没有逮捕其两名儿子的证件的情况下夺门而入，并且为了逮捕 Mourad Chihoub 把门都打破了，还威胁其父亲，这构成武断干涉提交人私人生活和家园，侵犯了《公约》第十七条。<sup>15</sup> 他们补充说，由于他的两名儿子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居住在其父母的家里，因而他们也是第十七条的受害者。<sup>16</sup>

<sup>12</sup> 上述第 2.8 段。

<sup>13</sup> 提交人除其他事项外提到了委员会 1982 年 7 月 8 日第 8 号[16]一般性意见，第 2 段；第 1128/2002 号来文，Marques de Morais 诉安哥拉，2005 年 3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第 1196/2003 号来文，上述，第 7.6 段；和第 992/2001 号来文，上述，第 9.6 段。

<sup>14</sup> 提交人提到第 1328/2004 号来文，Kimouche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9 段；和第 1327/2004 号来文，Grioua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9 段。

<sup>15</sup> 提交人提到第 687/1996 号来文，Rafael Armando Rojas García 诉哥伦比亚，2001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3 段。

<sup>16</sup> 提交人引用了第 778/1997 号来文，José Antonio Coronel 和其他人诉哥伦比亚，2002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9.7 段。

3.10 由于他的儿子 Djamel 和 Mourad 的强迫失踪以及他们大儿子 Saïd 的死亡，提交人失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因此，他们声称缔约国当局以其行动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违反了《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1 款所规定的保护家庭的义务。<sup>17</sup>

3.11 提交人指出 Mourad Chihoub 在其父母家被武断逮捕并被置于与世隔绝的拘留中才只有 16 岁，提交人认为，就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第二十四条第 1 款。<sup>18</sup>

3.12 提交人还认为，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揭示其两个儿子下落的步骤没有任何结果，由于他的两个儿子被禁止行使其争辩其拘留合法性的权利，缔约国没有履行其保障 Djamel 和 Mourad 有效补救的义务，因为缔约国本应该进行深入和认真的调查。他们还争辩，除了没有有效补救之外，更为严重的是已经合法地宣布大赦免，保障了对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有罪不罚。由于缔约国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提交人认为，就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sup>19</sup>

3.13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问题，提交人认为，他们提交申诉的所有主管当局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他们向司法、政府和行政主管都提出了请求但毫无结果。<sup>20</sup>因而提交人认为，所有可获得的补救都被证明是无用与无效的。作为补充，他们又说，由于颁发了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第 06-01 号法令，他们已不再有任何法律权利启动司法诉讼程序。该条法令禁止为阐明最为严重的罪行，例如强迫失踪，请求法律补救，违者将罚以监禁。<sup>21</sup>因而，提交人认为，他们不能再为确保他们的来文能够得到委员会的受理继续在国家一级努力，因为这将使他们受到刑事起诉。

<sup>17</sup> 提交人提到了第 962/2001 号来文，Marcel Mulezi 诉刚果民主共和国，2004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5.4 段。

<sup>18</sup> 提交人提到第 1069/2002 号来文，Bakhtiyari 诉澳大利亚，2003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9.7 段；和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1996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8.7 段。

<sup>19</sup> 提交人提到第 612/1995 号来文，José Vicente 和其他人诉哥伦比亚，1997 年 7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委员会 1992 年 3 月 10 日第 20 号[40]一般性意见，第 15 段；和 2004 年 3 月 29 日第 31 号[80]一般性意见，第 18 段。

<sup>20</sup> 上述第 2.5 至 2.11 段。

<sup>21</sup> 提交人指出，《宪章》拒绝有关缔约国对故意失踪负有责任的指控。此外，2006 年 2 月 27 日的第 06-01 号法令，根据刑事诉讼惩罚，禁止启动法律诉讼程序，因而受害者不再有用尽国内补救的义务。该项法令禁止因失踪或其他罪行对安全和国防部队提出诉讼(第 45 条)。提交人补充说，根据该项法令，主管法律当局必须宣布所有指控或诉讼不可受理，此外，任何人通过其口头或书面的声明或者任何其他行动，利用民族悲剧创伤攻击国家机构，攻击其工作人员等名誉或者损害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名誉，都可以对其采取法律行动(第 46 条)。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9 年 3 月 3 日，缔约国就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本来文以及其他十份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提出了争辩意见。缔约国在“关于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关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来文可否受理的背景备忘录”中提出了争辩意见。缔约国认为，这些来文将在 1993 至 1998 年阶段强迫失踪中代表公众当局行事的公务人员或其他人员以罪论处，但这些来文应参照当时该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和安全状况予以考虑，而在该阶段政府正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

4.2 当时，政府不得不打击非正式组织的团体。民众往往将强迫失踪归罪于安全部队。强迫失踪的案件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都归罪于政府。包括新闻和人权组织在内的许多独立来源收集编制的的数据表明，在该阶段，阿尔及利亚的失踪概念包括六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没有一种能够归罪于政府。第一种现象是由其亲属报告失踪的人事实上自己躲藏起来以加入武装集团，并请其家属声称他们被安全服务部队逮捕，作为一种方法“掩盖起来”避免警方的“骚扰”；第二种现象是在其被安全服务部队逮捕之后报告失踪的人，这些人利用其释放的优势躲藏起来；第三种现象是被武装集团绑架的人，这些武装集团的人由于没有确认身份或者偷了制服或者身份证件，被误认为是武装部队或者安全服务部队的成员。第四种现象是其家属报告其失踪的人，但这些人事实上是由于个人的问题或者家庭纠纷决定背弃家庭，在有些情况下，甚至离开了国家。第五种情况涉及被通缉的恐怖主义者，这些人在派别内讧、理论争斗或者敌对武装集团之间混战之中被杀害和被埋葬在树丛中。最后，缔约国提到的第六种可能性，是据报道失踪的人事实上通过证件伪造者网络编造的假证件居住在阿尔及利亚或国外。

4.3 缔约国指出，它认为失踪的一般概念涵盖了这一局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举行《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公投之后，阿尔及利亚立法机关建议对失踪问题采取全面的方针，据此将处理在“民族悲剧”期间失踪的所有人的案件，对所有受害者提供支助以克服他们的苦难经历，所有失踪受害者及其受益者将有资格得到补偿。根据内务部的统计数据，已报告有 8,023 起失踪案，已经审查了 6,774 起案件，批准 5,704 起案件应予赔偿，934 起案件被拒绝，136 起案件仍在处理之中。为所有有关受害者进行赔偿已经支付了总共 371,459,390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DA)。<sup>22</sup> 此外，以每月抚恤金形式支付了 1,320,824,683 第纳尔。<sup>23</sup>

4.4 缔约国进一步争辩，并非所有的国内补救已经用尽。缔约国强调重要的是要区分涉及政治或者行政主管当局的两种简单手续，一种是通过咨询或者调解机构进行的非争议补救，另一种是通过有关的司法法庭进行的争议补救。可以从提交人的申诉看出，<sup>24</sup> 原告向政治和行政主管当局、咨询或调解机构和检查部门

<sup>22</sup> 相当于 5,241 美元。

<sup>23</sup> 相当于 18,636 美元。

<sup>24</sup> 缔约国提供了对 11 个不同的来文的共同答复，提及了“提交人”。因此也包括本来文的提交人。

的代表(主检察官和公诉员)提出了申诉,但实际上没有启动任何法律诉讼程序,没有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上訴补救和撤销原判的补救。只有检查部门的代表有法律被授权可进行初步调查,并将案件提交一名调查法官。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律系统内,公诉员接受申诉,如果这些申诉被认可,则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然而,为了保护受害者及其受惠者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典》授权后者对损害提出诉讼,直接向调查法官提交诉状。在这种情况下,是受害者而不是检察官将这一事项提交调查法官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事实是,即使检查部门另有决定,受害者所需做的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或迫使调查法官公布一切资料,尽管如此,《刑事诉讼程序法典》第 72 和 73 条所规定的补救没有被利用。

4.5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提交人错误地认为根据第 06-01 号法令的第 45 条,提交人没有义务将这一事实提交有关的法庭。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有关这一事项的判例法表明,一个人主观认为或者假定认为补救毫无用处并不豁免一个人用竭所有国内补救的要求。<sup>25</sup>

4.6 然后,缔约国转而论及《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性质、原则与内容及其实施法律。缔约国强调,根据和平不可分割原则,这已经成为国际和平权,委员会应支持与巩固和平,鼓励民族和解以期加强受国内危机影响的缔约国。作为实现民族和解努力的一部分,缔约国通过了这一《宪章》,通过了规定各种法律措施的执行法令,以便为查实犯有恐怖主义行为者或者受益于民事异议法律条款者停止刑事诉讼程序,减刑或者赦免,但是犯有或合伙犯有大规模杀害,强奸或者公共场所进行爆炸活动者例外。这项法令还为有助于解决失踪问题,采用了一个为假设死亡提出官方调查的程序,这项程序授权受益者得到赔偿。还采取了社会和经济措施,例如提供就业安置援助和赔偿。最后,法令还规定了各种政治措施,例如禁止以往利用宗教牟利者担任任何政治职位,并规定任何针对阿尔及利亚国防与安全部队成员因保护人民或财产,捍卫民族和维持其各种机构而采取行动的个人或团体提出的任何诉讼程序不予受理。

4.7 除了建立基金赔偿受害者之外,根据缔约国,阿尔及利亚人民同意进行民族和解的进程。全面的国内解决机制包括了提交人的指控。

4.8 缔约国请委员会注意提交人所描述的事实与状况如此相像,并请委员会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与安全状况;注意提交人并没有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注意缔约国的当局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国内机制,为实现与《联合国宪章》及之后的各项公约的原则相符的和平与民族和解采取种种措施处理和解决这些来文所提到的案件;请委员会裁定上述来文不可受理;并请提交人利用适当的补救。

<sup>25</sup> 缔约国特别引用了第 210/1986 号和 225/1987 号来文,Pratt 和 Morgan 诉牙买加,1989 年 4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补充意见

5.1 2009 年 10 月 9 日，缔约国向委员会转交了一份补充备忘录，在该项备忘录中缔约国重申，提交委员会的来文涉及委员会不可能意识到的广大涉及各种原因与情况的历史问题。

5.2 缔约国声称，在这些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不会审查这些来文的案情，并且声称，所有司法或者司法机构有责任在审议案情之前解决初步问题。根据缔约国，关于在这些案件中，同时一起审议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问题的决定——除了这一决定并非是在磋商基础上达成的事实之外——严重地影响了从这些来文的一般性性质及其固有细节方面适当地审议这些来文。缔约国在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sup>26</sup>的议事规则时指出，有关委员会确定来文是否受理的程序的章节是与审议来文案情的章节分开的，因而这些问题应该分开来审议。特别就用尽国内补救程序的问题而言，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提交的来文没有一项通过国内法庭渠道供阿尔及利亚司法当局予以审议。所提交的来文中只有少量来文递交给申诉法庭，这是一个具有审讯上诉司法权的调查法庭。<sup>27</sup>

5.3 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关于用尽国内补救义务的判例法，缔约国强调，对成功与否的怀疑或者对延误的担忧不能免去提交人用尽这些补救的义务。至于是否因颁发了《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使其不能够在这方面利用补救的问题，缔约国答复提交人至今未启动任何程序，阻止阿尔及利亚当局就《宪章》适用性的范围与限度采取任何态度。此外，根据所提及的法令，唯一不予以受理的诉讼程序是针对履行符合其共和国核心职责行动，即保护个人与财产、捍卫国家与维护其各个机构的“共和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各个部门的成员”的诉讼程序。在任何其他情况下的发生的涉及国防或安全部队行动的指控将受到适当法庭的调查。

5.4 最后，缔约国重申就《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建立的解决机制的相关性表达了其立场。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6.1 2011 年 7 月 22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提交了评论，并就来文的案情提供了补充论点。

6.2 关于委员会的实质性职能，提交人指出，《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12 月 12 日在缔约国生效——发生在此来文之前——缔约国批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由此承认委员会有职能接受和审议来自缔约国管辖之下声称是缔约国侵犯了《公约》所规定权利的受害者的来文。这一职能属于一般性质，不由缔约国任意处置。尤其，不是缔约国的政府决定一个具体的情况提交委员会是否合适。相反，委员会根据其实质性职责确定是否所指控的事件构成侵犯

<sup>26</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3-98 条(决定可否受理的程序)和 99-101 条(审议来文案情的程序)。

<sup>27</sup> 缔约国没有具体说明其所指的是哪一项来文。

《公约》之下保护的各項權利進行裁決時，由委員會作出這一決定。同樣，不能在決定可否受理階段引用阿爾及利亞政府為解決“民族悲劇”受害者通過了國內行政與法律措施的事實來阻止受委員會管轄的個人行使其《任擇議定書》第五條之下的權利。即使此類措施可能影響糾紛的解決，這些措施也應該根據案情而不是根據其是否受理予以分析。提交人還強調，締約國在這案件中的論點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委員會早已指出，所通過的立法措施本身侵犯了《公約》之下保護的權利。<sup>28</sup>

6.3 提交人提到，1992 年 2 月 9 日阿爾及利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不影響個人向委員會提交個人來文的權利。《公約》第四條規定僅僅《公約》的一些條約可在公共緊急狀況下減損，因而不影響行使《任擇議定書》所規定的各項權利。提交人由此認為締約國關於來文適當性的意見並不構成其宣布不予以受理的有效理由。

6.4 關於提交人在提出損失訴訟時沒有將這一事項提交調查法官而沒有啟動訴訟程序，因而提交人並沒有用盡所有國內補救。關於這個論點，提交人提到了委員會在 *Benaziza* 案件中的判決，<sup>29</sup> 在這項意見中委員會認為，“特別就強迫失蹤或侵犯生命權，締約國有職責不僅對所指控的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徹底的調查，並且還應該對此類侵犯行為負有責任者進行起訴、審訊和懲罰。對於本案所聲稱的嚴重罪行提出起訴和要求賠償不能替代檢察官應該對此提出的指控。”<sup>30</sup> 因而提交人認為，在發生所指控的如此嚴重事件的案件內，應由主管當局啟動訴訟程序。在本案內，該家屬所採取的步驟都是無用的，包括所提交的刑事訴訟和向司法部、共和國總統和全國人權觀察發出的信函。儘管警察和公訴員都知道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失蹤，但沒有下令進行調查，沒有啟動法庭調查，沒有要求任何一名參與失蹤的人解釋這一情況。在本案中，如此嚴重的侵权行为，締約國不應該不了解，因而不能責怪提交人沒有用盡國內補救。

6.5 締約國爭辯僅憑主觀認為或者假設不能免於來文提交人用盡所有國內補救的要求，關於這一點，提交人提到了 2006 年 2 月 27 日第 06-01 號法令第 46 條。根據該條，主管司法當局對針對共和國國防和安全部隊成員的個別或集体的指控或申訴必須宣布為不予以受理。而且提交此類申訴或指控將受到三年至五年監禁的懲罰，並且要支付 25 萬到 50 萬第納爾的罰款。鑑於此類申訴將違反《法令》第 45 條，締約國並沒有令人信服地解釋如何對損害提出訴訟能够使主管法

<sup>28</sup> 提交人提到 2007 年 12 月 12 日人權事務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阿爾及利亞)，CCPR/C/DZA/CO/3，第 7 段、第 8 段和第 13 段；第 1588/2007 號來文，*Benaziza* 訴阿爾及利亞，2010 年 7 月 26 日通過的《意見》，第 9.2 段；第 1196/2003 號來文，*Boucherf* 訴阿爾及利亞，上述，第 11 段。提交人還提到 2008 年 5 月 16 日反對酷刑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阿爾及利亞)，CAT/C/DZA/CO/3，第 11、13 和 17 段。最後，他們引用了關於緊急狀況下不減損的第 29 號一般性意見(2001 年)，第 1 段。

<sup>29</sup> 見第 1588/2007 號來文，*Benaziza* 訴阿爾及利亞，2010 年 7 月 26 日通過的《意見》，上述。

<sup>30</sup> 如上，第 8.3 段。

庭接受和调查所提交的任何申诉，缔约国也没有解释如何提交人能够免于《法令》第 46 条的实施。因而客观地阅读实施的条款表明不仅关于侵犯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权利的申诉将被宣布不可受理，而且还会遭到刑事处罚。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提到的补救将是没有效果的。

6.6 关于来文的案情，提交人指出，缔约国仅仅列举了一些“民族悲剧”的受害者可能失踪的情况。这些泛泛的言论毫不针对本来文所提出的申诉，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复了对所有其他案件的答复，因而这表明缔约国并不希望个别地解决这些事项，也不愿意对提交人的申诉及其他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作出反应。

6.7 提交人指出，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缔约国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分开审议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相反，这是委员会独有的额外特权。本案件与委员会审议的其他强迫失踪的案件没有任何区别，因而没有理由分别审议其可否受理。

6.8 简而言之，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没有驳斥其指控。在提到委员会的判例法时，<sup>31</sup> 他们坚持其来文中所提出的所有事实，指出，许多有关该阶段安全部队行动的报告以及所采取的许多步骤证实并且增加了他们指控的分量。鉴于缔约国对提交人儿子的失踪负有责任，15 多年来提交人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其儿子的消息，提交人无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来佐证其来文，因为只有缔约国才掌握这些证据。总之，提交人再次要求委员会着手审议来文的案情，理由是，他们的指控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他们认为，缔约国对来文案情没有做任何答复进一步证实缔约国默认了提交人所指控的事实准确性，因而委员会应该认为这些事实得到了证实。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甲)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委员会注意到 Djamel Chihoub 和 Mourad Chihoub 失踪的案件已提交强迫和非自愿失踪工作组。然而，委员会忆及，人权事务委员会或人权理事会设立的额外常规程序或机制其任务是对具体国家或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或世界范围的侵犯人权的普遍现象进行审查并提出公开报告，但并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甲)项意义内的国际调查或解决

<sup>31</sup> 根据该条，“如果指控得到提交人所提供的可信证据的证实，而且需要由完全掌握在缔约国手中的资料来进一步澄清，那么委员会可认为提交人的指控有充分的佐证，因为缔约国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反驳证据或解释。”(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6.7 段)。

程序。<sup>32</sup> 因此，委员会认为强迫或非自愿工作组对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案件的审查并不使本来文在此条款下变得不可受理。

7.3 委员会指出，根据缔约国，提交人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因为他们不认为可将这一事项提交调查法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就损害提出诉讼。然而委员会指出，1999 年 10 月 9 日，Saadi Chihoub 就他的儿子 Mourad Chihoub 被绑架和失踪正式向 El Harrach 调查法官提出了申诉。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采取了许多步骤了解其两个儿子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下落，其中包括向政治家、El Harrach 公共检察办公室、调查法官和主管行政当局提出了申诉。委员会提到有关这一事项的判例法，提交人必须利用所有的法律补救以履行用尽所有可获得的国内补救的要求，只要这一补救在一案件中是有效的，并事实上向来文提交人予以提供。<sup>33</sup> 委员会认为，2006 年 2 月 27 日第 06-01 号法令仍然实施，尽管委员会就该法令与《公约》符合性提出了建议，缔约国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事实上向提交人提供此类补救。<sup>34</sup> 因而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乙)项并非是用来文受理的障碍。

7.4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的指控证据充分，因为在《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和第二条第 3 款之下提出了问题。因而，委员会开始着手审议来文的案情。

#### 审议案情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指出，缔约国倾向于认为控告 1993 年和 1998 年期间在强迫失踪中代表公共主管当局行事的公务员或个人的来文必须参照当时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时期普遍存在的国内社会—政治和安全环境来考虑，因而委员会不能在个人申诉机制下审议这些案件。委员会愿再次提到其九十一届会议上对阿尔及利亚提出的结论性意见，<sup>35</sup> 以及其判例法，<sup>36</sup> 据此，缔约国不应该对已经引用《公约》各项条款或者已经或者可能向委员会提交来文者引用《和平与国内和解宪章》的条款。正如委员会在其结论性意见中所强调的那样，<sup>37</sup> 委员会只能重复，第 06-01

<sup>32</sup> 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上述，第 7.1 段。

<sup>33</sup> 第 1003/2001 号来文，P.L.诉德国，200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受理决定，见 6.5 段。还见第 433/1990 号来文，A.P.A.诉西班牙，1994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受理决定，第 6.2 段。

<sup>34</sup> CCPR/C/DZA/CO/3，上述，2007 年 12 月 12 日，第 7 段、8 段和 13 段。

<sup>35</sup> CCPR/C/DZA/CO/3，上述，第 7(a)。

<sup>36</sup> 见第 1780/2008 号来文，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第 1588/2007 号来文，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和第 1196/2003 号来文，Boucherf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第 11 段。

<sup>37</sup> CCPR/C/DZA/CO/3，第 7 段。

号法令，在没有委员会建议的修正的情况下，似乎促进有罪不罚，因而目前的法令不能认为是符合《公约》的。

8.3 委员会提到其在以前案件中的一些意见<sup>38</sup> 并指出，缔约国没有答复本来文提交人提出的有关本案案情的申诉。委员会还强调，举证责任并不仅应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别因提交人和缔约国并非总是能够同样的获得证据，往往只有缔约国能够得到必要的资料。<sup>39</sup> 《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清楚阐明缔约国有责任诚心诚意地调查对其和其代表提出的所有侵犯《公约》的指控，并向委员会提供其所获得的资料。

8.4 委员会指出 Djamel Chihoub 于 1996 年 5 月 16 日被缔约国武装部队成员逮捕。至于 Mourad Chihoub，据称他是于 1996 年 11 月 13 日被来自 Baraki 营房的军官们逮捕，下达逮捕令的是几个月前指挥逮捕 Djamel Chihoub 的同一名指挥官。Mourad Chihoub 被逮捕时只有 16 岁。据称，自此，其家属中没有一人再见到他或听到他的消息。根据提交人，在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失踪 15 年后找到他们还生存的机会极其渺茫，他们俩长时期无杳无音讯，以及他们被捕时的背景与状况很可能表明他们已在拘留中死亡。委员会指出，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反驳这些指控，因而认为缔约国没有履行保障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生命权的职责，违反《公约》第六条。<sup>40</sup>

8.5 关于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被单独监禁的申诉，委员会承认长期与外界隔绝情况下带来的痛苦。委员会提到了关于第七条的 20 号(1992 年)一般性意见，该项意见建议各缔约国规定禁止单独监禁。委员会认为，据其收到的各种资料，Djamel Chihoub 和 Mourad Chihoub 自 1996 年以来被单独监禁，不准他们与其家属和外部世界进行通信的事实，就他们俩而言，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七条的行为。<sup>41</sup>

<sup>38</sup> 见第 1780/2008 号来文，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第 1588/2007 号来文，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和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

<sup>39</sup> 同上，还见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6.7 段；第 139/1983 号来文，Conteris 诉乌拉圭，1985 年 7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和第 1297/2004 号来文，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第 8.3 段。

<sup>40</sup> 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2006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9.11 段；第 449/1991 号来文，Mojica 诉多米尼加共和国，1994 年 7 月 15 日通过的《意见》，第 5.6 段；第 181/1984 号来文，Elcida Arévalo Pérez 诉哥伦比亚，1989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 段。

<sup>41</sup> 见第 1780/2008 号来文，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第 1588/2007 号来文，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还请见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 年 7 月 11 日通过的《意见》，第 6.5 段；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上述，第 6.2 段；第 540/1993 号来文，Celis Laureano 诉秘鲁，上述，第 8.5 段；和第 458/1991 号来文，Mukong 诉喀麦隆，1994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9.4 段。

8.6 关于提交人 Taous Djebbar 和 Saadi Chihoub, 委员会承认由于提交人的两个儿子失踪, 15 年杳无音讯, 且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调查以确定受害者的命运, 尽管提交人自他两个儿子被捕之后采取了许多步骤, 所有这些使提交人倍受煎熬。因而委员会认为, 现有事实表明, 就提交人而言, 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 并且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sup>42</sup>

8.7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申诉, 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表明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是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缔约国的代理人逮捕的, 然后被单独监禁, 无法得到任何辩护律师, 并且没有通告他们拘捕他们的理由或者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提到, 根据第九条第 4 款, 如果拘留被宣布为不符合《公约》条款, 特别不符合第九条第 1 款的条款, 对拘留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必须规定下令释放被拘留者的可能性。由于缔约国当局本身承认没有对 Djamel Chihoub 提出任何指控, 没有颁发逮捕他的证件,<sup>43</sup> 而且缔约国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委员会认为拘留 Djamel Chihoub 和 Mourad Chihoub 违反了第九条。<sup>44</sup>

8.8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 委员会重申, 被剥夺自由者除了因被剥夺自由而导致的限制之外, 不得遭受任何磨难或限制, 他们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 尊重他们的尊严。委员会注意到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被与世隔绝关闭 15 年, 并由此剥夺了与其家属和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 并还指出缔约国没有提供有关其在各种军事设施内拘留期间所受到待遇的资料, 委员会认为对这两名受害者而言, 违反《公约》第十条第 1 款。<sup>45</sup>

8.9 关于第十六条, 委员会重申其既定判例法。根据其判例法, 如果受害者在最后被看到时在缔约国当局的掌握之中, 并且如果其亲属努力获得有效补救, 包括法律补救, 被有系统地阻挠, 这样长期故意地不让一个人获得法律保护, 可能构成否认其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的权利。<sup>46</sup> 在本案中, 就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失踪已以各种理由向缔约国当局申诉, 但缔约国的当局并没有向提交人提供任何有关他们的资料, 委员会认为,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被强迫失踪 15 年否认了他们在这一阶段的法律保护, 剥夺了他们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的權利, 违反《公约》第十六条。

<sup>42</sup> 见第 1640/2007 号来文, 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上述第 7.5 段; 第 1422/2005 号来文, 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上述, 第 6.11 段; 第 107/1981 号来文, Quinteros 诉乌拉圭, 1983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 第 14 段; 和第 950/2000 号来文, Sarma 诉斯里兰卡, 上述第 9.5 段。

<sup>43</sup> 上述, 第 2.8 段。

<sup>44</sup> 除其他外见第 1297/2004 号来文, Medjnoune 诉阿尔及利亚, 上述, 第 8.5 段。

<sup>45</sup> 见关于第十条第 3 款的第 21 号[44]一般性意见; 第 1134/2002 号来文, Gorji-Dinka 诉喀麦隆, 2005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 第 5.2 段; 和第 1422/2005 号来文, 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上述, 第 6.4 段。

<sup>46</sup> 见第 1327/2004 号来文, Grioua 诉阿尔及利亚, 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 第 7.8 段; 和第 1495/2006 号来文, Zohra Madaoui 诉阿尔及利亚, 2008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 第 7.7 段。



8.10 委员会认为它所收到的事实表明，缔约国在没有任何逮捕证和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逮捕了 16 岁的 Mourad Chihoub，那时他还是个未成年人，然后将他与世隔绝地拘留，剥夺了他与其家属所有的联系，时间长达 15 年，缔约国没有确保对 18 岁以下儿童所要求的专门保护。因而，委员会认为就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二十四条之下保障的权利。<sup>47</sup>

8.11 提交人还援引《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该条要求缔约国为维护《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确保每个人能够得到有效的可付诸实施的补救。委员会重申这一重要性，它授权缔约国建立适当的司法和行政机制，处理侵犯国内法之下各项权利的指控。委员会提到了其第 31 号(2004)一般性评论，在该项评论中委员会申明缔约国没有对侵权行为指控进行调查其本身是对《公约》的又一个违反。<sup>48</sup> 委员会还提到任何强迫失踪行为构成了对《公约》所规定的若干权利的侵犯，还构成侵犯生命权或者严重威胁生命权。<sup>49</sup> 在本案中，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表明，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父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补救，因为他们为了解其儿子命运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没有结果。此外，继颁发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第 06-01 号法令之后否认采取司法诉讼程序的法律权利继续剥夺他们获得有效补救，因为该法令禁止要求阐明最为严重的罪行，如强迫失踪的法律补救，违者将处以监禁。<sup>50</sup> 委员会认为，现有事实表明，就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就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二十四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委员会还认为，就提交人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8.12 委员会在查实违反《公约》第七条之后，将审议有关违反《公约》第十七条和二十三条的申诉。

9.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其所收到的资料表明，就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它还认为，就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四条。委员会认为，就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也违反了与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就 Mourad Chihoub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二十四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最后，委员

<sup>47</sup> 见例如，第 1069/2002 号来文，Bakhtiyari 诉澳大利亚，上述，第 9.7 段。

<sup>48</sup> 第 15 和 18 段。

<sup>49</sup> 第 1328/2004 号来文，Kimouche 诉阿尔及利亚，2007 年 7 月 1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上述，第 6.2 段；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第 9.2 段；和第 950/2000 号来文，Sarma 诉斯里兰卡，上述，第 9.3 段，还请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

<sup>50</sup> CCPR/C/DZA/CO/3，上述，第 7 段。

会认为，就提交人(受害者父母)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七条本身以及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包括(一)对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失踪进行彻底有效的调查；(二)向家属提供调查结果的详细信息；(三)如果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仍然被与世隔绝地拘留，立即释放他们俩；(四)如果他们已死亡，将他们的遗体转交其家属；(五)起诉、审讯和惩治那些对所犯侵权行为负有责任者；和(六)对提交人及其家属所遭受的侵权行为提供充分赔偿，如果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仍然活着，对他们所遭受的侵权行为提供充分赔偿。此外，尽管存在 06-01 号法令，缔约国仍应确保该法令不影响诸如酷刑、法外杀害和强迫失踪罪行受害者享有有效补救的权利。缔约国还应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1.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法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克里斯特·特林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的个人(反对)意见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履行保障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生命权的职责，因而裁定其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我不同意这一裁决，理由如下。

当被迫失踪案件的事实本身不能解释受害者确实死亡，委员会在这类被迫失踪案件中的既定判例法是强调缔约国有职责按照第二条第 3 款保护和确保有效和可实施的补救，因而只在与该条一并解读时援引第六条第 1 款。在最近两起针对同一缔约国，并在相似事实框架下的失踪案件中，委员会确认了这一做法。<sup>a</sup>

然而，在我们讨论的这起案件中，委员会未经任何讨论，并且未提到本案件是如何争议的，<sup>b</sup> 根据至今只有少数人提出的意见得出结论，即直接违反了第六条第 1 款，与第二条第 3 款毫无关系。

我认为如此泛泛的解释《公约》之下的生命权，使委员会采取了从未采取的方式，今后将在强迫失踪范围之外的各种情况下载定直接违反第六条的行为，即使受害者被假定为还活着也是如此。至少大多数人应该提出违反第六条的新的适应性的理由。

(签署)克里斯特·特林

(联署)迈克尔·奥弗莱厄蒂

[提交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英文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a</sup> 第 1588/2077 号来文，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和第 1780/2008 号来文，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和特别是，Salvoli 先生在这两起案件中的反对意见。

<sup>b</sup> 见第 1780/2008 号来文，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上述，第 7.11 段。

## 费边·萨尔维奥利和科内利斯·弗林特曼的个人(赞同)意见

1. 我完全同意人权事务委员会对第 1811/2008 号来文,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案件的裁决, 完全同意关于违反 Djamel 和 Mourad Chihoub 的人权及因前者强迫失踪导致对其父母 Taous Djebbar 和 Saadi Chihoub 的人权侵犯的裁决。

2. 然而, 根据以下理由, 我认为委员会还应该裁定缔约国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委员会应在其意见中指出缔约国阿尔及利亚应修订第 06-01 号法令以确保不再重复此类行为。

### (a) 委员会有权裁定申诉中为提及的条款遭到违反

3. 自我成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我认为, 委员会在没有具体法律申诉情况下, 令人费解地自我限制其对违反《公约》行为的裁定。只要事实清楚地表明存在此类违反行为, 委员会应该也必须根据法院了解法律的原则审查这一案例的法律框架。在我对 Weeramansa 诉斯里兰卡案件的部分反对意见的第 3 至第 5 段中载有何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给予缔约国辩护机会的法律依据与解释。为避免重复, 我在此提及。<sup>a</sup>

4. 无论如何, 应该指出, 在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的本案中, 尽管提到了该条第 3 款, 来文提交人明确地指控违反第二条的行为(见例如, 第 1.1 段和 3.12 段)。

### (b) 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2 款

5. 一缔约国, 除其他外, 可因其任何政府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引起国际责任, 这些部门当然包括立法部门, 或按其宪法享有立法权力的任何其他部门。

《公约》第二条第 2 款规定, “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 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尽管第二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是一般性义务, 但一缔约国若不遵行该义务, 可能需担负国际责任。

6. 该条款是一项自我生效的条款。委员会在第 31 号(2004)一般性意见中正确地指出: “《公约》的一般性义务, 尤其第二条规定的义务对于所有缔约国都是有约束力的。政府的所有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及国家、地区或当地各级的其他公共机构或政府机构均应承担缔约国的责任。”<sup>b</sup>

7. 正如《公约》缔约国为使所有权利生效必须通过法律措施那样, 缔约国还肩负来自 2.2 条的负面义务, 即不通过有悖于《公约》的法律措施; 如果这样做, 缔约国本身违反了第二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

<sup>a</sup> Anura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 第 1406/2005 号来文; 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

<sup>b</sup> 2004 年 3 月 29 日第 2187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80]一般性意见第 4 段。

8. 阿尔及利亚于 1989 年 9 月 12 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阿尔及利亚已批准《公约》，就对整个《公约》作出承诺，必须承诺履行第二条规定的并来自第二条的各项义务。该缔约国于同一天，1989 年 9 月 12 日加入《任择议定书》，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职权受理个别来文。

9. 在本案中委员会完全有权力审查它所收到的事实的法律框架：2006 年 2 月 27 日，缔约国颁发了第 06-01 号法令，该项法令禁止为阐明最为严重的罪行，例如强迫失踪，诉诸法庭，因而确保了对严重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有罪不罚。毫无疑问，通过这一立法，缔约国实施了直接有悖于《公约》第二条第 2 款所规定的义务，其本身构成了违反行为，委员会在其裁决中除已确定的违反行为之外，应该指出这一点，因为提交人及其儿子除其他外是有关法律条款的受害者。

10. 该条例直接用于本案例，因而在 Chihoub 案件中有关违反第二条第 2 款的结论并非是抽象的或纯粹学术性的。不容忽视的是所裁定的侵权行为在委员会裁定一项个别申诉时直接影响委员会所规定的赔偿。

### (c) Chihoub 案件的赔偿

11. 委员会裁决的第 10 段是全面赔偿做法的优秀典范：它规定了平反和赔偿的非金钱措施和不重犯保障(对事实进行彻底调查，如果受害者还活着释放受害者，如果他们已死亡向其家属移交遗体，起诉、审讯和惩治对所犯违反行为负有责任者)。委员会的裁决还规定了赔偿的金钱措施(对所犯的侵权行为向提交人提供充分的赔偿，如果他们的两个儿子还活着，对这两个儿子给予充分的赔偿)。

12. 而且，在第 10 段的末尾，委员会申明，尽管存在第 06-01 号法令，缔约国还应确保其不损害诸如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并且它还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3. 此段落未留下任何置疑余地，在委员会的意见中，第 06-01 号法令违背《公约》，为此理由委员会指出，尽管有该条款，缔约国必须保障受害者的有效补救。因而委员会是否说缔约国的司法可忽视这一条例，而这一条例阻碍对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的进展？

14. 答复是“是”。司法有责任监督与各项条约相符性，而不应实施有悖于《公约》的国内立法。这不仅对履行人权义务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还将避免缔约国承担国际责任。

15. 然而，不仅仅是司法受约束于《公约》，政府的其他部门也应该通过有关的措施保障各项人权，第二条第 2 款具体地提到了立法措施。

16. 委员会的一贯做法是采取一般的措辞指明缔约国应在今后防止类似的行为，本裁决的第 10 段的末尾也这么做了。如何保障不重复此类行为？缔约国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公务员，特别是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成员进行人权培训，通过有效的诉讼程序处理强迫失踪的申诉，采取纪念性措施，等等)。在不损害

于此类步骤的情况下，委员会应毫无疑问地在其《意见》第 10 段内指出阿尔及利亚应修订受到质疑的国内立法(2006 年 2 月 27 日)颁发的第 06-01 号法令，使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下的各项义务。继续实施本身有悖于《公约》的法律不符合目前关于对侵犯人权案件进行赔偿的国际标准。

(签署)费边·萨尔维奥利

(联署)科内利斯·弗林特曼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N. 第 1815/2008 号来文：Adonis 诉菲律宾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上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Alexander Adonis (由律师 H. Harry L. Roque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菲律宾  
 来文日期： 2008 年 7 月 3 日(初次提交)  
 事由： 一电台播音员因诽谤罪被监禁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言论自由权；正当程序保障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3 款(乙)、(丙)和(丁)项；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五条第 2 款(乙)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Alexander Adonis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15/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8 年 7 月 3 日来文的提交人 Alexander Adonis，是菲律宾国民，生于 1964 年。他声称是菲律宾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丙)和(丁)项和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的受害人。他由律师 H. Harry L. Roque 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委员会成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签署的两份个人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来文提交人在菲律宾 Davao 市 Bombo Radyo 担任电台播音员工作。<sup>1</sup> 2011 年 7 月 27 日，提交人从 Bombo 电台新闻中心收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该项新闻报道一名议员与一名已婚的电视名人的所谓“非法”关系。其他两家国家报纸，Manila Standard 和 Abante Tonight 报道了同一条新闻。电台经理在收到这条新闻报道时指示提交人核实所收到的信息，并与有关人士接触。提交人立即试图与这些人士接触，但没有任何结果。同一天上午 7 时，提交人与电台经理主持了其日常新闻节目，在新闻节目期间，未披露姓名地报道了所提到的信息。在提交人上午 11 点 30 分的电台节目中，同一条信息还成了辩论主题。

2.2 2001 年 10 月 23 日，该议员提出两起文字诽谤刑事诉讼，一起是因上午 7 时的新闻报道指控提交人与电台经理合谋，第二起诉讼针对提交人 11 点钟的新闻节目。指控的依据是《菲律宾修正刑事法典》第 353 条，该条界定文字诽谤为“意在损坏一名自然人或法人的名誉、信誉或者鄙视而对真正或臆想的罪行、不良行为或者缺陷，或者任何行为、不行为、条件、地位或状况进行公开和恶意的诋毁。”

2.3 2007 年 1 月 26 日 Davao 市城区审判法庭作出联合判决，以第一项投诉缺乏足够证据判定提交人和电台经理无罪。然而，同一法庭根据《修订刑法典》第 353 条宣判提交人犯有第二项投诉提出的诽谤罪。法庭认为，对该议员的法律推定，“如果属实，则属于通奸罪，这是一项私罪，与其正式履行议员的职责无关”。法庭补充说被告列举的事实“并不构成有效辩护”，无论如何，“没有提供任何此类诋毁事实的证据”。法庭进一步认为，提交人言辞的语调和实质毫无疑问是具有恶意和诋毁性质的言论。法庭认为，原告律师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提交人不容质疑的犯有恶劣、武断、胡乱和不负责任地诋毁该议员及其家属的荣誉、名誉和声誉的行为”判其五个月零一天至四年，六个月零一天的囚禁非确定刑期，以及 10 万菲律宾比索(将近 2,300 美元)的赔偿作为对受害者心理损伤的赔偿，另外 10 万比索作为“臭名昭著的不负责任报道的例子”的“惩戒性损害”的罚款。

2.4 提交人指出 Davao 城区域审判法庭尚未解决他案子前，他已被其公司转到 Cagayan de Oro 城工作，该城市离 Davao 有 6 小时的路程。提交人说，由于指控其犯有文字诽谤罪，他情绪低落，没有向其新的单位报到。这样，他的雇主停止支付其私人律师，而该位私人律师立即停止其服务。他声称，因为没有通知他事实上他已不再有一名律师代理，并且没有向他委派一名职业律师，他在缺席情况下被判罪。而且，他不能在法律规定的 10 天时间框架内对该项裁决提出上诉。

2.5 根据附于来文的 Davao 城区域审讯法庭所作裁决中确立的事实，提交人私人律师撤销服务的原因是他不能接触提交人，因据称提交人已经潜逃，因而他无

<sup>1</sup> Bombo Radyo Philippines 是菲律宾最大的电台网络之一。

法代表提交人的利益。因此，其私人律师提交了一份撤销作为律师出庭的动议，该项动议于 2006 年 2 月 6 日获准。之后，撤销了提交人暂时的自由，并向提交人发出了逮捕令。根据同一决定，提交人的律师提交了若干动议，但未能在若干场合出庭，结果在诉讼程序的两次审讯中，为提交人委派了一名公共律师。法庭指出，律师的这种行为“显而易见具有延误程序的意图”。<sup>2</sup>

##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根据《菲律宾修正刑事法典》判其诽谤罪构成非法限制其《公约》十九条之下言论自由权利。他争辩说，将诽谤以罪论处是采取杀鸡用牛刀的方式处理不正当攻击名誉的问题，因为其抑制了批判性新闻，为欧洲人权法庭承认的言论自由制造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影响。<sup>3</sup> 提交人指出，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滥用刑事诽谤法表示关注，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若干国家的结论性意见中表示刑事诽谤法可被滥用来限制对政府或国家官员的批评。根据提交人，这些法律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构成了侵犯言论自由权。提交人进一步引用了尊重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他的美洲国家组织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仁的联合宣言。该份联合宣言声明“诽谤罪是对言论自由的不公正的限制；应废除所有刑事诽谤法，并酌情以合适的民事诽谤法取代”。<sup>4</sup> 提交人补充说，菲律宾法律所规定的制裁诽谤的刑事性质永久地损害了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在新闻记者中间触发极端抑制性的自我新闻审查。根据提交人，此类条例造成了恐惧气氛，在这种恐惧气氛中，作者、编辑和出版者越来越不愿意报道和出版涉及公众利益的事项。

3.2 提交人称辩到，菲律宾的文字诽谤法，及一般的刑事诽谤法对言论自由权构成非法限制。对文字诽谤进行囚禁惩处不符合第 19 条第 3 款规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标准。见于可用其他方式有效保护他人名誉，监禁是不必要的惩处。提交人引用了委员会在 *Marques de Morais* 诉安哥拉案件中的《意见》，<sup>5</sup> 委员会在《意见》中指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适合于其力图予以保护的价值。

3.3 提交人进一步争辩，菲律宾的文字诽谤法并非是一个合理的限制，因为该法不允许作为一个完全被告者证实事实，仅允许其在非常限制的情况下证明事实。根据《修订刑事法典》第 361 条，只有当对政府官员的诽谤涉及其履行官方职责时，才受理事实证据。因而，在他的案例中，阻止其作为被告方引用事实。

<sup>2</sup> 2007 年 1 月 26 日 Davao 市区域法庭裁决所载资料。

<sup>3</sup> 来文提交人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以下案例中的裁决：*Lingens* 诉奥地利，1986 年 7 月 8 日，申请号 9815/82，第 42 段；*Oberschlick* 诉奥地利，1991 年 5 月 23 日，申请号 11662/85 号，第 59 段；和 *Lopes Gomes da Silva* 诉葡萄牙，2000 年 9 月 28 日，申请号 37698/97，第 30 段。

<sup>4</sup> 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媒体自由问题代表，美洲国家组织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 2002 年 12 月 10 日的联合声明。

<sup>5</sup> 第 1128/2002 号来文，*Marques de Morais* 诉安哥拉，2005 年 3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6.8 段。

提交人引证了国际判例法和软法，证实所控诽谤声称的事实证据能够完全免除被告的任何责任。

3.4 提交人指出，菲律宾的文字诽谤法不允许援引合理的出版物作为辩护。根据提交人，诽谤不能成为严格责任，因为即便是最好的新闻记者也会犯诚实的错误。对每一个不真实或者错误的声明施加刑事惩处将损害公众及时获得信息的利益。他指出，重要的是新闻故事需要及时发表。提交人提到欧洲人权法庭，《欧洲公约》第 10 条向新闻记者提供的有关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问题的保障是他们必须按照新闻报道的道德标准诚实地提供准确或可靠的信息。”<sup>6</sup> 提交人还提到了国家判例法承认，当新闻按照职业准则行事时，应考虑指控所依据的信息性质，来源的可靠性和证实信息所采取的步骤，应获益于合理出版物的辩护。<sup>7</sup> 提交人指出，Davao 城的区域法庭没有考虑提交人提交的职业水平符合标准的证据。

3.5 提交人坚持认为，菲律宾的文字诽谤法并非是对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因为其假定所控诽谤言论是恶意的，并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不要求控告人证实所控诽谤言论是不符事实的。相反，假设此类言论是诽谤性的，除非被告能够表明这些言论属于《修正刑事法典》第 354 条所规定的例外，根据该条“每一个诽谤性的毁誉即使是真实的，但如果不能表明进行此类诽谤的良好意图或合理动机，此类诽谤性的毁誉被认为是恶意的，但以下情况例外：1. 任何人在履行法律、道德或社会职责时向另一人所作的私人通信；和 2. 本着良好意愿的公正和真实的报道，没有任何保密性质的司法、立法或其他官方程序的评论或意见，或者在所述程序中所作的任何声明、报告或演讲的评论或意见，或者对公务人员在行使其职责时所履行的其他行为的评论或意见。”提交人提到了上述 3.1 段内所提到的联合声明以及区域和国家的判例法，所有这些都确认原告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涉众公关注事项的事实的不真实性。<sup>8</sup> 提交人补充说《言论自由和保护名誉原则》第 7 条(b)规定“在涉及公共关注事项的案件中，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任何所控诋毁事实的罪名的申诉的不真实性”。他指出，所指控的通奸行为——根据菲律宾的法律，一名议员，一名公务员与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属于涉及公共关注和利益的事项。

3.6 提交人声称，没有通知其撤销其律师的服务，因而《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所确认的法律援助权利遭到了侵犯。由于他在这个阶段既没有一名律师代理，也没有通知其提出上诉的延误，该项决定成为最后裁决。根据菲律宾的法律，所有诉辩与法庭诉讼程序都由律师担任。他引用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判例法，表明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都应提供法律援助，欧洲人权法庭的判例法

<sup>6</sup> 欧洲人权法庭关于 *Bladet Tromsø 和 Stensaas 诉挪威* 案件的裁决，申请号 21980/93，1999 年 5 月 20。

<sup>7</sup> 来文提交人除其他事项外引用了南非最高上诉法院的裁决，国家媒体有限公司及其他诉 *Bogoshi*，1999 年 LRC 616，第 631 页。

<sup>8</sup> 在这方面，来文提交人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 2002 年 6 月 25 日在 *Colombani 诉法国* 案例中的裁决，申请号 51279/99，第 65 段以及其他的国家判例法。



也是如此。提交人争辩应该委任他一名职业律师或者一名公诉员。相反，在上诉的关键时刻他没有法律代表，而且没有通知他其律师已经被撤销。结果，他被剥夺了有效上诉的权利。

3.7 提交人声称由于他是在缺庭的情况下被判罪，因而侵犯了第十四条第 3 款第(丁)项确认的在出庭受审的权利。没有通知他重新恢复对他的诉讼程序，由于他本人没有得到通知，因而不能够对这一重新开庭进行上诉。

3.8 最后，提交人声称第十四条第 3 款第(丙)项确认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但他的这一项权利遭到侵犯。提交人指出，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他的案件始终没有启动。原先定于 2006 年 7 月 26 日提审他，但他的律师要求将其推迟到 2006 年 9 月 28 日。在那一天提交人已不再有任何律师代理——原告律师要求将其推迟到 2006 年 12 月 14 日。该案件在闲置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于 2007 年 1 月 26 日被定罪。<sup>9</sup>

3.9 提交人要求委员会宣布上文所提及的为侵权行为，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赔偿他在监狱里所消耗的时间，以及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就业的损失。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09 年 1 月 9 日的来文中指出，《公约》或《菲律宾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并非是绝对的。正如菲律宾最高法院所裁定的那样，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有损于其他人权利的同等享有，也不应该有损于社区或社会的各种权利。缔约国认为言论和新闻自由不应超越公共事项或利益，应该有责任地予以行使。缔约国并不授予“不加限制的许可”，对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加追究，因为这将影响其他需要保护的其他社会权利或价值。

4.2 缔约国指出，私人名誉的享有与生命或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享有在同一层次是一种合符宪法的权利，法律保护此种权利免遭诽谤攻击。属于言论自由权利范围内的对公务人员的批评必须针对其政策或官方行为，不应针对其私人问题。缔约国引用《经修订刑法》第 353 条和 354 条以及国家的判例法，认为在这两起案件中，认为污蔑性的毁名是诽谤性或恶意的。

4.3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的申诉，缔约国指出，《菲律宾宪法》承认自由诉诸司法的权利(第 11 节)以及“因犯罪被调查者有权利了解其有权利按照其本人的选择获得胜任和独立的律师。凡无能力支付律师服务费用者，必须向其提供一名律师”(第 12 节)。《宪法》第 14 节承认被告有权利由他本人或律师出庭受审，并有权利获得快速、公正和公开审讯，有权享有其他适当的程序保障。然而，该节第二段规定“在提审之后，如果及时地通知了被告，并且他的不出庭是

<sup>9</sup> 根据 Davao 城区审判法庭的裁决，来文提交人的律师提交了无数拖延这一程序的动议和事件。在 2001 年 12 月的两次预定的传讯中律师没有出庭。律师分别于 2002 年 4 月和 8 月提出了新的动议。此后宣布审前预备结束，并定于 2003 年 4 月 15 日审查案情。在这一阶段，由一名新的律师和现有的律师一起代表来文提交人。

没有理由的，那么审讯可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如果被告已被提审，向他进行了适当的通知，他的缺席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则可合法地放弃在其辩护时亲自出庭受审的权利。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10 年 5 月 17 日的来信中指出，他已提交了用尽所有国内补救的请求，对此缔约国并没有反驳。他进一步指出，对他提出的事实，包括没有通知他他的律师已经从这一案件退出，以及在审讯的关键时刻没有委任一名公共或称职的律师等事实，缔约国并没有提出异议。缔约国没有这么做，则承认了《公约》第十四条之下的责任。

5.2 提交人告诉委员会，他已经服了刑。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免除缔约国在《公约》之下的责任，特别由于《刑法》内仍然存在文字诽谤罪，而且法庭仍然继续采用这一法律。提交人指出，菲律宾的文字诽谤法侵犯了言论自由必要与合理限制的标准，缔约国对此论点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缔约国也没有质疑提交人就第十四条第 3 款和第 19 条之下的权利遭到侵犯的论点。缔约国未能证实事实上向提交人提供了在菲律宾向被告提供的所谓的宪法保障。在缔约国的来文中没有指明在提交人的案件中是否遵行了这些保障。

5.3 在 2011 年 9 月 12 日的来信中，提交人指出，菲律宾最高法院解释文字诽谤罪是言论自由权利的合法例外。根据这一点，菲律宾的低级法院通常认为刑事诽谤罪是符合宪法的，是与符合宪法的自由相一致的。因此，即便允许某些例外，例如公众利益和公共人物的例外之外，菲律宾的法律仍然将刑事诽谤罪判以监禁作为惩罚。然而，这些例外并没有公平地予以实施，并没有阻止导致违背言论自由的起诉案件，例如本案件。提交人认为，在菲律宾的司法制度之下，他已经无法对侵犯其言论自由的行为提出质疑。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甲)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关于提交人指控他在《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之下的正当程序保障的权利和第 19 条之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遭到侵犯的诉求，委员会认为这些诉求足以证明受理的目的，开始着手审议这些问题的案情。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参照当事各方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指出，提交人声称由于没有通知他他的律师已经撤销各项服务，因而在区域法庭没有一名律师代表他，也没有通知他提出上诉的截止日期，因而在第十四条第 3 款(d)项之下的权利遭到了侵犯。提交人补充说，根据菲律宾的法律，所有申诉和法庭诉讼程序都由律师代理，因而在撤销其律师时，应该向他委派一名职业律师或公诉员。缔约国没有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区域审讯法庭作出律师撤销其服务的决定是因为他不能和提交人联系。

7.3 提交人声称，由于没有通知他恢复对他的诉讼程序，并在他缺庭的情况下定罪，他在第十四条第 3 款之下的出庭受审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缔约国在这方面的提到，根据《宪法》第 14 节第二款，如果适当地通知了被告，而被告没有出庭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么可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讯程序。

7.4 委员会提到其以前的判例：在某些情况下，为适当行使司法有时允许缺席审判；例如，尽管在事先留有充分时间下及时将审判通知被告，但被告拒绝行使出庭权利。因此，只有采取必要措施及时传唤被告并事先通知其审判的日期和地点请其出庭，这类审判才符合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sup>10</sup>

7.5 委员会指出，缔约国没有提供证据表明法庭努力通知提交人撤销其律师的情况，法庭的裁决也没有明确表明是否委任了另一名律师代表提交人。缔约国也没有证明在通知法庭裁决时是否给予提交人足够的时间使他能够提出上诉。然而，一旦 2007 年 1 月 27 日的裁决作为最后的裁决时，逮捕了提交人。

7.6 根据上述，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在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下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后，委员会将不受理提交人有关受审时间被无故拖延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指控。

7.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根据《菲律宾刑法典》对其诽谤定罪构成了非法限制其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其不符合《公约》第 19 条第 3 款所确立的标准。提交人提出，特别是，《菲律宾修正刑法典》规定的对文字诽谤实施囚禁的刑事惩处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原因如下：(a) 没有比较轻微的惩处方式；(b) 除了极有限的案件之外，其不受理被告事实证明；(c) 没有考虑作为被告的公共利益；或者(d) 它假设所控的诽谤申诉是恶意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sup>10</sup> 见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第 40 号增补，第一卷(A/62/40(第一卷))，附件六，第 36 段。

7.8 第 19 条第 3 款规定了具体条件，只有在符合这些条件时可以实施限制：例如，限制必须有法律规定；只能出于第 3 款(甲)项和(乙)项所立任一理由实施限制；以及必须符合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严格判断标准。<sup>11</sup>

7.9 委员会提到了其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根据该条意见“应谨慎拟订诽谤法，以确保这些法律符合第 3 款，并且在实行中不会妨碍言论自由。所有此类法律，特别是诽谤相关刑法，应包括捍卫真理等抗辩措施，并且不得对性质未经核查的言论表达方式采用此类法律。至少在关于公众人物的评论方面，应考虑避免处罚或者以其他方式对错误但确无恶意情况下发表的非法虚假言论作出有罪裁决。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将公众对受批判事项的关注视为一种捍卫。缔约国应注意避免采取过度惩罚性的措施和处罚。缔约国应考虑对诽谤行为免除刑事处罚，并在任何情况下，只应支持在最严重案件中适用刑法，监禁绝不是适当的处罚。”<sup>12</sup>

7.10 根据上述，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对来文被告人施加的监禁惩罚不符合《公约》第 19 条第 3 款。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委员会所收到的事实表明菲律宾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和第十九条。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的规定，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包括对其在监狱的服刑时间予以适当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在今后发生此类侵权行为，包括审查有关的文字诽谤立法。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是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11</sup> 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第 22 段。

<sup>12</sup> 同上，第 47 段。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部分反对)的个人意见

1. 我完全同意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Adonis 诉菲律宾的案件，第 1815/2008 号来文中有关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的裁决。委员会准确地裁定所确立的事实构成侵犯言论自由权利。

2. 然而，鉴于以下所立的各条理由，我认为委员会应该裁定，缔约国在本案件内还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委员会还应在其意见中指出，缔约国应修订用来伤害提交人和不符合《公约》的立法。

#### (a) 委员会有责任裁决在控诉中未提到的侵犯条款的行为

3. 自我成为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在事实清楚地表明有此类侵权行为，但没有具体的法律申诉时，委员会自愿地令人费解地限制其确定一项对《公约》侵权行为的职责。为何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给缔约国辩护机会的法律依据和解释可以在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案件的部分反对意见第 3 段至第 5 段内找到。在该些段落内我提到了这点。<sup>a</sup>

#### (b) 对《公约》第二条第 2 款的违反

4. 根据《宪法》，国家可，除其他事项外，因其一个部门，当然包括立法部门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权威的部门的行为或者不行为承担国际责任。《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具体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盟约每以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盟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盟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尽管第二条第 2 款所规定的义务是属于一般性质的，但不履行这一义务将由缔约国承担国际责任。该条款属于自我生效性质。委员会非常正确地指出：“公约一般的义务，特别是第二条的义务对每个缔约国整个国家而言具有约束力。政府的所有部门(执法、立法和司法)，及其他公共或政府当局不管在哪一层次(国家、区域或地方)都应承担缔约国的责任。”<sup>b</sup>

5. 正如《公约》缔约国可能没有通过侵犯所承认的权利和自由的措施，不调整国内立法使其符合《公约》的条款，依我来看，本身意味着违反了第二条第 2 款所规定的义务。就本案件而言，Adonis 提交人具体地指控《菲律宾刑事法典》规定的准则违反《公约》(见委员会决定第 3.1 段和 3.2 段)。

<sup>a</sup> 第 1406/2005 号来文，Anura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

<sup>b</sup> 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第 31 (2004)号一般性意见，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正式记录，第 40 号增补，第一卷(A/59/40(第一卷))，附件三，第 4 段。

6. 在这起案件内，委员会得出结论：对提交人施加的制裁不符合《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段(第 7.10 段)，最后裁定事实表明违反了这一条款(第 8 条)。

7. 因为《刑法典》的规定，法庭对提交人施加了上述惩处；结果，该惩处不符合《公约》，《菲律宾刑事法典》内继续存在这一法律侵犯了调整国内立法使其符合《公约》的责任，而这是第二条第 2 款具体要求的。由于惩处已经实施，委员会不可能针对缔约国的立法政策“抽象地”裁决。结果，委员会应发现在这起案件内违反了第二条第 2 款，对 Alexander Adonis 造成了损害。

### (c) 赔偿

8. 委员会没有前后一致，如果委员会认为一项准则不符合《公约》，但没有明确地提请注意修订这一准则的必要性：在其决定的第 9 段内，委员会指出缔约国应该审查其立法。是否缔约国仅仅审查其《刑法典》就提供了赔偿？如果在此类审查之后，缔约国不改变其准则，哪又将怎样？很清楚，委员会认为不符合《公约》的准则将仍然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又将如何遵行委员会裁决的那部分，在该部分内委员会声明“该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是否将授权司法部门无视这一准则？

9. 为了避免责成国家承担国际责任，要求司法部门查明与各项条约的符合性，不再实施任何与《公约》相违背的国内准则；然而政府的所有部门，当然包括立法部门，在人权方面都将负着同样的义务。在本案内，Adonis 诉菲律宾，委员会错过一个明显的机会，没有直截了当地向缔约国指出它必须改变有关诽谤罪的刑事法，使其符合《公约》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的标准。

10. 委员会裁定的赔偿措施越具体，缔约国就越容易实施其意见，更容易兑现它已经接受的保障在其管辖之下的所有人的人权的国际承诺。

[签署]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委员会委员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的个人意见

在审议本来文的结论时，我曾指出我可能和我的同事萨尔维奥利一起另外发表一项意见，由他提议和执笔，这就是他现在提交的意见。然而我希望我提出一些意见，并提出另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可能非常有用地符合委员会通常对待《公约》第二条的做法。

如我对我的同事萨尔维奥利对目前的案例的做法的理解，由于是缔约国立法本身据说限制了提交人第十九条所保障的权利，作为逻辑的法律结果，委员会可合法地得出结论，侵犯提交人第十九条之下的权利也必然构成缔约国没有实施其在第二条第 2 款之下的义务。

我认为，一个缔约国在《公约》第二部分之下所承担的不同义务(第 2 至第 5 条)在性质上是基本的和一般的。这些义务适用于《公约》第三部分(第六条至第 27 条)下保障的所有权利，并适用于缔约国领土内或者属于其管辖之下的所有个人。侵犯了一名受害者的任何这些权利必将意味着缔约国没有履行《公约》第二部分之下的义务，这取决于所侵犯的受害者权利的具体性质以及缔约国违反第 2 至第 5 条之下任何一条相应义务，例如第 5 条第 1 款，当缔约国从事一项活动——很可能包括立法行为——对于一项权利的限制与约束超过了《公约》所准予的程度。

在《公约》第三部分规定的个人具体权利和《公约》第二部分规定的缔约国的一般性义务之间肯定有直接的联系以确保和尊重这一权利。我认为，如委员会在其《意见》第 9 段所做的那样，另辟一个段落论述缔约国的义务是不正确的。

因而，我不清楚，明确具体地宣布违反第二条的该项条款是否是必要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否与委员会就缔约国按照第二条第 3(a)款规定提供有效补救的一般义务所通过的决定相符的替代方式可能不是最为适当的解决办法。显然，《任择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认为委员会有责任确认缔约国是否向受害者提供了此类补救。

当然，我冒昧在委员会中提出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所有相关案件中通常的起草模式，在这些案件中。委员会确认侵犯了《公约》第三部分下保障的一项权利，正如在提到第二条第 3 款(a)项那样，委员会提到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参见意见第 9 段的开始部分)。确实，我认为，当建议审查有疑问的或不适当的立法时，只要正式提到第二条第 2 款，可能就会达到所预想的目的。至少，这一方式在补救方面符合委员会在《意见》第 9 段内处理第二条第 3 款(a)项的方式。这样《意见》第 9 段最后部分只要如该段在有关补救问题的第一部分所做的那样以斜体字指明的方式适当地提到：“缔约国还有义务根据第二条第 2 款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包括审查有关的立法”。

[签署]拉杰苏默·拉拉赫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O. 第 1820/2008 号来文, Krasovskaya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Irina Krasovskaya 和 Valeriya Krasovskaya(由 Böhler, Franken, Koppe 和 Wijngaarden 律师事务所代理)

据称受害人: 两位提交人分别代表已故丈夫和父亲 — Anatoly Krasovsky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8 年 6 月 10 日(初次提交)

事由: -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任意剥夺生命; 酷刑和虐待; 任意剥夺自由; 未进行有效调查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和第十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 Anatoly Krasovsky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20/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两位来文提交人 Irina Krasovskaya 和 Valeriya Krasovskaya 分别为 1958 年和 1982 年出生的白俄罗斯国民, 目前居住在荷兰。他们分别以各自的丈夫和父亲 Anatoly Krasovsky(1952 年出生)的名义提交来文, 宣称白俄罗斯违反了他依《公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勋爵、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桑贝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签署的个人意见案文见本《意见》附录。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享有的权利。两位提交人另称，他们还是违反《公约》第七条规定权利的受害者。提交人由 Böhler, Franken, Koppe 和 Wijngaarden 法律事务所(芬兰)代理。1992 年 12 月 30 日，《任择议定书》对白俄罗斯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Krasovsky 先生原是白俄罗斯商人。1990 年代期间，他为政治反对派提供了资金和其它的支持，并且是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一位主要反对派人士，Viktor Gonchar 的个人私友。Gonchar 先生也曾任(1994-1995 年)白俄罗斯副总理并于 1999 年任(议会)最高理事会主席。

2.2 1999 年 8 月，警察以未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罪名逮捕了 Krasovsky 先生。一周之后，他支付了 102,000 美元保释金获释。他还因政治活动遭当局的骚扰。

2.3 1999 年 9 月 19 日，Krasovsky 先生的朋友 Gonchar 先生正计划主持一场议会扩大的听证会，听取议会特设委员会关于卢卡申科总统犯有严重罪行指控的调查结果，以确定是否要启动弹劾程序。1999 年 9 月 16 日，当 Gonchar 先生与 Krasovsky 先生在街上行走时，几名身份不明的人围拢过来。这些人强迫他俩坐进 Krasovsky 先生的私人驾车，驶往一个无人知晓的地点。事后，在他俩被绑架的案发地点发现了一些血迹。

2.4 这起绑架事件显然有政治动因。为佐证他们的申诉，两位提交人引述了 Christos Pourgourides 为欧洲委员会议会编撰的备忘录(《欧委议会备忘录》)相当大部分段落内容。<sup>1</sup> 据提交人称，其时白俄罗斯总统无视基本人权的行径已臭名昭彰，而且在 Krasovsky 先生失踪的前一个月，前内务部长 Yuri Zakharenko 也已经失踪。

2.5 1999 年 9 月 20 日，检察厅就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案启动了刑事调查。Chumachenko 先生被指派担任这起案件的调查官。

2.6 2000 年 11 月 21 日，白俄罗斯刑警总监，Nikolai Lapatik 将军致函白俄罗斯内务部长。<sup>2</sup> Lapatik 将军的亲笔信确认，白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曾下令杀害前内务部长 Yuri Zakharenko。据 Lapatik 将军称，这是在时任内务部长 Yuri Sivakov 辅佐下，由一位高级军官，Dmitry Pavlichenko 上校实施的谋杀。时任内务部长，Yuri Sivakov，为 Pavlichenko 先生提供了临时从监狱里调取的手枪。<sup>3</sup> Lapatik 将军还确认，1999 年 9 月 16 日，Gonchar 先生与 Krasovsky 先生俩人被绑架失踪那天使用的是同一把手枪。

<sup>1</sup> 该备忘录叙述了，欧委议会报告员，Christos Pourgourides 就白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四起案件，包括 Krasovsky 先生失踪案在内，实施的调查工作结果。这是 Pourgourides 先生对白俄罗斯进行了走访并与该国若干政府官员会晤之后编撰的一份备忘录。

<sup>2</sup> 提交人未提供该信函的复印件。

<sup>3</sup> 据该将军称，所述武器是一把特制手枪，是执行对关押在死囚牢房死刑犯行刑所用的手枪。

2.7 当局无法就这把手枪被擅自挪用作出任何可说得通的解释。检察厅未查清这把手枪被从监狱擅自挪用的原因。《欧委员会备忘录》的调查显示，这把手枪很可能被用于实施了对 Krasovsky 先生的谋杀。

2.8 两位提交人引述《欧委员会备忘录》说，Lapatik 将军手书信件的具名收件人，时任内务部长，Vladimir Naumov，和时任白俄罗斯总检察长，Sheyman 先生均确认了 Lapatik 将军亲笔信的真实性。《欧委员会备忘录》查明未就 Lapatik 将军信函所载的指控开展过调查。例如，在犯案现场找到的红色油漆与 Lapatik 将军信中所述据称 Pavlichenko 上校驾驶的那辆红车油漆比对不上。《欧委员会备忘录》的调查显示，调查期间显然有暗中做手脚，欲盖弥彰的动作。

2.9 此后，并由于 Lapatik 将军的信件，Pavlichenko 上校于 1999 年 11 月 22 日被捕。逮捕证是由时任白俄罗斯克格勃主席，Matskevich 先生签发，并得到总检察长的核可。然而，Pavlichenko 上校很快就获释，且据称他由卢卡申科直接签发的命令获得晋升。曾指证另一些参与了绑架事件军官的几位军官很快就被撤职或解职。自那以后，对 Krasovsky 先生和 Gonchar 先生案件的调查被叫停了。

2.10 2003 年 1 月 20 日，一位检察官决定要终结此案。两位提交人就检察厅叫停对 Krasovsky 先生失踪案调查的决定提出了上诉。由此，正式重启了对此案的审理工作。迄今为止，白俄罗斯警察对此案的调查尚无任何明显成果。每隔三个月就有一封信函发送给两位提交人称调查仍在进行之中，非但无法证实，甚至也毫无一点可说明调查工作实际正在进行的显示。一些强有力的迹象表明，上述两人遭强迫失踪应归咎于白俄罗斯的某些官员，而警察不是遭到一再阻挠不让披露案情，就是按政府上层高官的旨意行事。

2.11 据若干非政府组织的报告称，现今政权为了牢牢掌控大权，显然丝毫不顾忌犯天下之大不讳。<sup>4</sup> 当初 Krasovsky 和 Gonchar 两位先生失踪时，反对派们正在开展推举候选竞选总统运动的预备候选人，而这两位先生都积极地投身于其中。白俄罗斯的政治局势极其不稳定。

2.12 两位提交人一直不断地要求当局调查某些具体的迹象。然而，调查官员根本就不采纳他们的任何提议。两位提交人分别于 2002 年 10 月 9 日、2002 年 11 月 5 日、2002 年 11 月 20 日、2003 年 1 月 10 日、2003 年 2 月 3 日及另一些日期提出了无数次申诉，再无可竭尽援用的补救办法了，而且，无论怎么说，国内补救办法早已就遭到了无道理的拖延。

## 申诉

3.1 两位提交人宣称，缔约国就 Krasovsky 先生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的规定，因为他极有可能已沦为遭国家官员法外处决的受害者。

<sup>4</sup> 两位提交人为佐证他们的宣称，引述了 2000 年 1 月 1 日和 2000 年 7 月 21 日大赦国际发表的两份报告，和 2005 年 10 月 19 日，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发表的调查结果。

3.2 缔约国还违反了依《公约》第七条规定，Krasovsky 先生应享有的权利。两位提交人指出，委员会曾就多起案件坚持认为，强迫某人失踪构成了残忍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行为，因为受害者依《公约》第七条规定应享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而且其亲属也同样遭受了伤害。两位提交人宣称，正因为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由此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痛苦，致使他们依据《公约》第七条应享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因此也沦为了受害者。

3.3 缔约国还侵犯了 Krasovsky 先生依《公约》第九条规定应享有的权利，因为他遭绑架的案情，应被视为对他的任意和非法逮捕行为。他非但未被即时交送法官，而且无法向法庭提出诉讼。

3.4 最后，两位提交人宣称，鉴于 Krasovsky 先生很可能已经遭国家官员毒手遇害，因此，存在着违反《公约》第十条的现象。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10 月 20 日，缔约国就案情和可否受理问题发表了意见。缔约国宣称，两位提交人系以 Krasovsky 先生失踪的臆断为据提出的申诉。

4.2 白俄罗斯并不是欧洲委员会会议(欧委会)成员国，并且未参与 Pourgourides 先生编撰的《欧委会备忘录》。因此，两位提交人所述的备忘录与本案情毫无关系。

4.3 1999 年 9 月 17 日，Krasovsky 和 Gonchar 两位先生的亲属向明斯克市执法机构报警称他们俩人已经失踪。1999 年 9 月 20 日，明斯克市检察厅启动了刑事调查。

4.4 调查期间业已查实，人们最后见到 Gonchar 先生和 Krasovsky 先生是他们俩一起走出洗手间，坐进一辆 Krasovsky 先生的私驾车——切诺基吉普。经对案发现场的勘察，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塑料和玻璃碎片，车轮轨迹显示出了车辆刹车印痕并撞上了一棵树，留下了一些血迹。

4.5 根据作为调查内容部分举行的刑侦验检，这些塑料和玻璃碎片可能属于 Krasovsky 先生的那部私驾车——切诺基吉普。刑侦验检还肯定，遗留的血迹系属 Gonchar 先生，但不是 Krasovsky 先生的血。

4.6 调查期间，执法当局审查了案犯的若干方面动机，包括一些个人关系、政治关系和商业活动等。执法当局还追踪了大众传媒的一些报导。这些报导称 Gonchar 先生与 Krasovsky 先生是被一把从第一临时拘押所临时擅自挪用的手枪杀害。这些全都是第一临时拘押所前任所长，Oleg Alkaev 和明斯克市刑警总监，Lapatik 先生散布的谣传，后经查实纯属无稽之谈。

4.7 执法当局还勘察了据一些报告称掩埋 Gonchar 先生和 Krasovsk 先生尸体的地点。勘察没有找到被掩埋的尸体。执法当局还讯问了被怀疑与案情有牵连的两人，I.先生和 M.先生，这两人均因犯有其它严重罪行正在服刑役，但查明并无牵连。

4.8 缔约国还反驳称，两位提交人来文述及的 Pavlichenko 上校，从来就不是此案的嫌疑人，而且从未因此案遭到过逮捕。

4.9 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但 Gonchar 先生和 Krasovsky 先生的下落依然无人知晓。对此失踪案的调查还在继续，而且在此案了结之前，有关此案的情报依然保密。缔约国说，两位提交人宣称有关执法机构不作为和中止调查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4.10 既然调查仍在进行之中，那么两位提交人就还尚未援用无遗一切国内现有补救办法，因此，委员会应认为来文不可受理。

### 提交人的进一步陈述

5.1 2010 年 2 月 19 日，提交人说，尽管 2009 年 10 月 20 日缔约国发表了不可受理的意见，然而，依据《任择议定书》所列各项规定，必须认定来文可受理。

5.2 两位提交人重申他们的立场说，缔约国没有恰如其分地调查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案。在发现了若干指向一些高层官员可能涉嫌犯罪的线索之后，调查“崩溃了”，并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被正式叫停。2003 年 6 月 23 日重启了案情调查。两位提交人说，每隔三个月他们都会收到一封信称，调查仍在进行。

5.3 为佐证他们的申诉，他们再次引述了《欧委议会备忘录》。他们宣称，缔约国不应忽视这份载有极其重要调查结果的备忘录。

5.4 鉴于过去十年来的调查未取得任何显著成果，两位提交人业已援用无遗了一切国内补救办法。自 2003 年 6 月 23 日调查重启以来，两位提交人向警察进行了多次询问，打听调查的进展情况。

5.5 依据委员会扎实牢固的法理，举证责任不能只由来文提交人承担。两位提交人称，缔约国有责任本着诚意调查一切损害《公约》规定及其代表的侵权行为，并向委员会通报该国所掌握的情况。两位提交人宣称，正因为缔约国不提供这类情况，所以此案件的调查才毫无实效。<sup>5</sup>

5.6 Krasovsky 先生案件已提交了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委员会。两位提交人称，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此案。

### 缔约国的进一步陈述

6. 2010 年 7 月 8 日和 2010 年 9 月 4 日，缔约国再次发表了意见，缔约国重申其立场说，该国履行了《任择议定书》第一条规定的义务，受理和审议该国管辖下每一位因缔约国违反《公约》所述任何权利沦为受害者的人发送的申诉来文。缔约国说，缔约国不接受《任择议定书》第一条所列的任何其它义务。因此，缔约国宣称，委员会不可审议第三方提交的来文。

<sup>5</sup> 两位提交人引述了各国议会联盟人权委员会决议的部分内容，其内容又援引了 Pourgourides 先生为欧洲理事会议会编撰的备忘录所载的调查结果。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委员会注意到，Krasovsky 先生失踪案已提交给了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然而，委员会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或人权理事会设立的额外常规程序或机制，其任务是对具体国家或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或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侵犯人权现象进行审查并提出公开报告，但一般并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含义所指的调查或解决程序。<sup>6</sup> 委员会认为，强迫或非自愿工作组对 Krasovsky 先生案件的审查并非因此构成依本条款所述不可受理本来文的情况。

7.3 至于缔约国声称委员会不可审议第三方提交委员会来文的辩称，委员会指出，《任择议定书》绝无任何规定阻止提交人指定第三方代理他们受理与委员会的函件往来。委员会还指出，提交人可指定他们选择的代表，不仅受理来往函文，并且可代理委员会的审理事宜，是委员会长期以来的惯例。本案两位提交人业已为他们按应有手续聘请的律师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因此，委员会认为，受害人为了《任择议定书》第一条的目的，通过他们本人按应有手续指派的代理人呈递了来文。

7.4 至于缔约国辩称提交人尚未援用无遗国内现有补救办法，委员会注意到，两位提交人宣称他们就 Krasovsky 先生失踪案提出了一系列的申诉，然而，检察厅的调查毫无实效，一无所获，而且此调查从 1999 年起就一直在进行之中。委员会注意到两位提交人分别于 2002 年 10 月 9 日、2002 年 11 月 5 日、2002 年 11 月 20 日、2003 年 1 月 10 日、2003 年 2 月 3 日等另一些日期提出了申诉。委员会注意到，鉴于各项指控的严峻和严重性质以及多年来显然毫无任何线索的状况，缔约国既未提供任何相关调查详情，也未显示出仍在持续进行的调查有切实的实效。这就让缔约国无法回避委员会审议一份仅宣称正在进行的调查不知道何年何月正在才会有成效的申诉来文。基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已经遭到无道理的拖延。<sup>7</sup> 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规定并不妨碍审议该来文。

<sup>6</sup> 2011 年 10 月 31 日就第 1811/2008 号来文，Djebbar 和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

<sup>7</sup> 见，具体如：2008 年 10 月 30 日就第 1560/2007 号来文，Marcellana 和 Gumanoy 诉菲律宾案通过的《意见》，6.2 段。2006 年 7 月 14 日就第 1250/2004 号来文，Lalith Rajapakse 诉斯里兰卡，通过的《意见》，第 6.1 和 6.2 段；和 2006 年 3 月 30 日就第 992/2001 号来文，Bousroual 诉阿尔及利亚，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

7.5 委员会认为，两位提交人为受理目的就申诉所列证据充足，因此，可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着手审议申诉所述案情。

#### 审议案情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规定，参照各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注意到，两位提交人宣称，缔约国因 Krasovsky 先生的强迫失踪案，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委员会回顾其案例称，除切实保护《公约》所列权利之外，缔约国还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可诉诸切实有效补救办法来维护这些权利。<sup>8</sup> 委员会注意到，委员会收到的来文并未提供充分资料明确指出，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或据认为死亡的原因，或任何被指认为据称制造此失踪案嫌疑人的身份，因此，尚无法证实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与据称缔约国导致此失踪案发生的行为和活动之间有足够充分的关联关系。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委员会面前的事实无法使之得出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系由缔约国本身所为的结论，而且这些也不足以确定曾经发生过违反《公约》第九和十条行为。

8.3 委员会回顾，缔约国得积极承担义务，确保维护每个人享有《公约》所列权利不受侵犯，不仅不受国家工作人员的侵犯，而且不受他人或实体的侵犯。<sup>9</sup> 委员会还回顾了委员会第31号一般性意见，据此，缔约国必须设立一个处置有关侵权投诉的相关司法和行政机制(第15段)，以及刑事调查和事后追究工作，以采取必要措施补救《公约》第六和七条所保护的各项人权遭受到的侵犯。<sup>10</sup> 就本案而论，委员会认为，两位提交人虽提出了无数次申诉，却未使一名案犯遭逮捕或追究。委员会还注意到，政府不仅未展开恰如其分的调查，而且在 Krasovsky 先生失踪十年之后，仍无法说明调查到底进行到了哪个阶段。鉴于缔约国无法解释为何调查毫无进展，并参照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委员会得出结论，缔约国未就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案开展恰如其分地调查并采取相应的补救行动，违反了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所规定的义务。

9.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白俄罗斯违反了与《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

<sup>8</sup> 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31(2004)号一般性意见，第15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59/40 (Vol. I))，附件三)。

<sup>9</sup> 同上第8段。

<sup>10</sup> 还请见2010年3月23日就第1619/2007号来文，Pestaño 诉菲律宾案通过的《意见》，第7.2段；2009年4月2日就第1447/2006号来文，Amirov 诉俄罗斯联邦案，通过的《意见》，第11.2段；2008年7月8日就第1436/2005号来文，Sathasivam 和 Saraswathi 诉斯里兰卡案通过的《意见》，第6.4段。

10. 缔约国有义务依照《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为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包括开展克尽职守的事实调查；追究和惩处案犯；向两位提交人通报缔约国的调查结论并给予充分赔偿。缔约国还应采取措施确保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侵权行为。

11.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在缔约国境内以白俄罗斯文和俄文广泛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签署的个人 (不同)意见

1. 本人深感遗憾，我必须针对委员会审议第 1820/2008 号来文，Krasovskaya 诉白俄罗斯案，以多数票通过的调查结果形成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个人认为有必要通过如下各段文字的阐述，表明本人的立场。
2.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 Krasovskaya 案情时面临一些错综复杂的事实，特别是证据的篇幅和实质，导致了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白俄罗斯应为违反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和七条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 3 款所列规定的行为承担责任。
3. 然而，针对违反国际人权文书的行为，应追究一国承担的是客观性质的国际责任，然而，国内法就证据所规定的准则截然不同。若国家不予应有的配合，则尤其不可要求受害者的代理人承担无法履行的举行义务。
4. 就本案而论，委员会“认为，两位提交人虽提出了无数次申诉，却未使一名案犯遭逮捕或追究。委员会还注意到，政府不仅未展开恰如其分的调查，而且在 Krasovsky 先生失踪十年之后，仍无法说明调查到底进行到了哪个阶段”(第 8.3 段)。就在此前，委员会“注意到，委员会收到的来文并未提供充分的资料明确指出，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或据认为死亡的原因，或任何被指认为据称制造此失踪案嫌疑人的身份，因此，尚无法证实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与缔约国据称导致此失踪案发生的行为和活动之间有足够充分的联关系。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委员会面前的事实无法使之得出 Krasovsky 先生的失踪系由缔约国本身所为的结论”(第 8.2 段)。
5. 依此分析，缔约国恰恰正获益于其本身的不作为：不开展恰如其分的调查，甚至最低程序的法庭诉讼程序；无所进展，既不逮捕也不追究任何人，因此，委员会无法证实受害者的失踪系为该国的责任。
6. 然而，若给予旁证和各种迹象应有分量的考虑，则可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为政治反对派成员，特别是 Gonchar 先生提供支持的活动，受害者遭到过逮捕和骚扰是确凿的事实；他与若干不知名的政治异见人士一同遭逮捕，而且自那事件后他即失踪了，也均是得到印证的事实；最后，该国丝毫未作努力去恰如其分地调查这些事实，系为确认的事实。
7. 此外，申诉人提交了欧洲委员会会议报告员编撰的备忘录，阐述了欧委员会对包括 Krasovsky 先生在内，四起失踪案的调查结果。缔约国的答复则说，该国不是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不是成员国勿庸置疑，但应考虑的不是该国是否属为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问题，而是经与这起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形成的档案证据。



对此，委员会本应持如下立场，即：鉴于未就此档案证据作出答复，可根据责任评估标准，评判此档案证据。

8. 对此，当事国应就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若不予说明，那么，申诉人即面临“恶魔证据”(*probatio diabolica*)的局面。失踪是否为了勒索的目的？勒索显然不是犯案的动机，因为无人向家眷索要释放受害者的赎金。这是否普通的抢劫案？若是，那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当初案发现场是否频频发生过先劫持，继而杀害受害者，再后毁尸灭迹的抢劫案；当事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此问题的刑事统计数字。鉴于无法作出任何进一步解释，那么，受害者的政治活动、当初他遭绑架时在一起的人、所遭受到的骚扰和案发后政府在调查方面的不作为态度，均足以佐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认定该国应就直接侵犯生命权、人身健全权、人身自由权和履行应有程序权的行为，承担国际责任。

9. 然而，委员会则基于所谓有缺陷的证据，仅仅判定缔约国应对可能侵犯受害者人权的行為、未为受害者提供有效补救承担责任。鉴于所涉案件的特性，如此结果实属敷衍了事。

10. 委员会很快就必须审查和讨论，确定缔约国是否应承担《任择议定书》所列国际责任的证据评判标准；本案结论会对诸如给予应有赔偿之类核心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发表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P. 第 1828/2008 号来文，Olmedo 诉巴拉圭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Florentina Olmedo(由巴拉圭人权协调委员会和世界禁止酷刑组织代理)

据称受害人： Eulalio Blanco Domínguez

所涉缔约国： 巴拉圭

来文日期： 2008 年 8 月 25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在示威游行期间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侵犯生命权和获得有效补救权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和第六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Florentina Olmedo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28/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8 年 8 月 25 日来文提交人 Florentina Olmedo 是巴拉圭国民，生于 1942 年，她代表已故丈夫 Eulalio Blanco Domínguez 行事，她的丈夫是巴拉圭国民，生于 1940 年。她称其丈夫是巴拉圭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六条第 1 款行为的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 1995 年 1 月 10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Blanco Domínguez 是一名农业工人，居住和劳动的农场都位于 Andrés Barbero 社区(San Pedro de Ykuamandyju 区)。他属于 María Auxiliadora 协会会员，该组织将柠檬马鞭草(alloysia)种植者组织起来，得到当地最大的农民贸易组织“农业生产者协调办事处—San Pedro Norte (CPA-SPN)”的支持。由于巴拉圭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平等，农民组织的主要诉求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一情况往往导致地主、农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冲突。

2.2 最初，政府支持种植和销售柠檬马鞭草。2002 年，政府将销售交与私营部门负责，引发价格下跌，未售作物增加，种植者遭受损失。在 CPA-SPN 支持下，2003 年 2 月 10 日、4 月 24 日和 5 月 19 日，柠檬马鞭草种植者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举行示威活动，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继这些有组织的抗议活动之后，农业畜牧部承诺给予种植者补助；但只提供了部分补助，谈判失败之后，2003 年 5 月 29 日，农业工人再次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聚集，安营扎寨，继续组织抗议。自此之后，农业工人每天举行两、三次示威活动，并在一处公共场所设立了营地。

2.3 2003 年 6 月 2 日，柠檬马鞭草种植者组织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当局于 6 月 3 日上午 7 点之前全部落实农业部签署的协议内容，否则，将和平封锁 Santa Rosa del Aguaray 第三大道，以向当局施加压力。

2.4 2003 年 6 月 3 日，包括 Blanco Domínguez 在内的大约 1,000 名示威者在示威现场汇合。示威者看到现场有大量警察、防暴警察和军人，由当天值班的 Santa Rosa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刑事检察官 L.A.指挥。面对警方设置的障碍物，示威者无法继续前进，决定封锁道路。检察官命令示威活动的领导者解除道路封锁，并声称如不照做，将动用武力清除道路。

2.5 谈判进行过程中，检察官命令清除道路封锁。警察立即采取暴力行动，动用了催泪弹、枪械和高压水枪。提交人说，警方事先没有就将采取的干涉行动用扩音器向其他示威者发出警告。

2.6 警察暴打许多示威者，向四散逃跑的人员胡乱射击，破门冲入并损坏附近房屋，殴打被逮住的人员。滥用大量实弹和橡皮子弹。数名遭到枪击的示威者称，他们没有得到警察要开枪的警告。他们说，射击根本是多余的，胡乱扫射，示威者在向四处逃散时被射击，或他们已经投降还被近距离开枪射击。<sup>1</sup> 约只花了 10 到 15 分钟道路即被清空。

2.7 Blanco Domínguez 一直站在示威队伍前头，他和其他示威者一样没有反抗，跪地向警察举手投降。此时，国家警察局的一名警员近距离射击他的背部。倒地后，警察打他头。几分钟后，一些示威者和其他警察将其救下，送至 Santa

<sup>1</sup> 提交人附了一份八名示威者的宣誓证词。

Rosa del Aguaray 医疗中心。由于该中心没有抢救设备，Blanco Domínguez 先被转送至 San Estanislao 地区医院(Deaprtment of San Pedro)，后来又送至 Asunción 医疗急救医院。在经过 2 次手术之后，Blanco Domínguez 于 2003 年 6 月 5 日死亡。<sup>2</sup> 大约还有 16 人在事件中受伤，需在上述医疗中心或医院接受治疗。

2.8 2003 年 6 月 3 日，国家警察局向刑事检察官 L.A.提交了针对 Blanco Domínguez 和其他 42 名示威者的起诉，称其犯有下述罪行：给高速道路上行人安全造成威胁、给人员安全和生活秩序造成威胁、以枪支和刀具进行反抗。<sup>3</sup> 当天，刑事检察官发布命令，对 Blanco Domínguez 和其他示威者进行临时拘留。2003 年 6 月 4 日，检察官提出指控，并请求下达对 Blanco Domínguez 和其他被告人进行审前拘留的命令。2003 年 12 月 3 日，刑事检察官对 32 名示威者提出控告，其中未包括 Blanco Domínguez。2007 年 5 月 2 日，San Pedro de Ykuamandyju 刑事法院以诉讼程序已经超过最长的 3 年时限为由，撤销了对 32 名示威者的指控，未作出任何最终司法判决。对此判决没有提出上诉，因此成为最终判决。

2.9 根据警方 2003 年 6 月 6 日向检察官 L.A.提交的警务函件，启动了针对 Blanco Domínguez 死亡的调查。这一案件交由 Santa Rosa del Aguaray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首席检察官办理。应公诉机关(*Ministerio Público*)的要求，San Pedro 警察总长于 2003 年 6 月 3 日就此事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陈述如下：

该行动中采取的战略战术事先已有预案，其制定是基于绝大多数示威者通常持敌对态度，并对执法人员人身构成严重威胁这一共识。行动伊始，动用了两部已注满水的高压水枪和催泪弹，配有橡皮子弹的一队射手做后援，机关炮做掩护，其目的是专门为了对示威者进行掌控。示威者向警察开枪，用各种口径的子弹向高压水枪射击，迫使警察退至路边，意图很明显要对其进行包围。在此期间，当一直位于道路两旁安全距离的执法人员向前行进时，他们与示威者短兵相接。配有武器的示威者慌忙逃入小街，边跑边开枪射击作为掩护，其他人则寻找一切可藏身之处进行躲藏。多数示威者返回位于农业福利研究院(IBR)办公室的住所，并立即使用该建筑物中迪斯科舞厅音响设备的扩音器，呼喊口号“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击败”，鼓动其追随者血战到底。

2.10 该报告对因冲突导致一名人员死亡表示遗憾，并声称警方仅使用橡皮子弹。提交人指出，San Pedro 警察局局长既未就报告提供事件的物证，也未提供已经验证的证据。

<sup>2</sup> 尸检报告描述了所施行的外科手术，说“对腰椎施行了椎板切除手术，从腰椎右侧取出橡皮子弹和一个异物”。

<sup>3</sup> 提交人指出，6 月 3 日的照会说，“事件中，受伤严重(但非危急)者被救护车送往 Asunción 医疗急救医院，其中包括：Eulalio Blanco Domínguez (……)，他们被橡皮子弹打中，伤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2.11 2003 年 6 月 16 日，检察官要求 Asunción 医疗急救医院院长提供受害人医学诊断证明。该证明后被收入调查报告之中。

2.12 2003 年 6 月 17 日，提交人要求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履行各种取证程序，同日，提交人之子要求针对其父被杀事件展开调查。2003 年 7 月 3 日，提交人和她的儿子向检察官作证并提供了事件可能证人的姓名。<sup>4</sup>

2.13 应检察官要求，2003 年 8 月 8 日，Santa Rosa 医疗中心主任提交的报告被收入调查记录。该报告指出，Blanco Domínguez 于 2003 年 6 月 3 日接受治疗，受到妥善救治，后被转送至另一所医院。2003 年 8 月 14 日，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就武装部队总司令要求部署 30 队士兵以阻止 2003 年 6 月 3 日的示威游行一事提交了一份报告。应检察官要求，医疗急救医院法医部于 2003 年 11 月 14 日提供了 Blanco Domínguez 的医学诊断证明。2004 年 1 月 29 日，公诉机关的法医提交的报告被收入事件记录，该法医对医疗急救医院法医部的医学诊断进行了分析。

2.14 检察院未就提交人和她的儿子所确定的其他证人的供述展开调查，也未接受其他示威者及/或事件中受伤人员的陈述。她还坚称，诸如对受害人进行尸检、弹道学检测报告、犯罪现场检查、事件现场证据收集等各种法定程序并未履行。

2.15 2006 年 11 月 5 日，一名作为受害者亲属代理人的巴拉圭人权协调委员会(CODEHUPY)律师要求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提供一份刑事调查记录。2008 年 4 月 2 日和 5 月 8 日，提交人要求提供有关诉讼程序的补充信息。检察院对上述要求从未做出答复。

2.16 还提交了有关其丈夫死亡的其他控告。2003 年 6 月 17 日，就 2003 年 6 月 3 日 Blanco Domínguez 被任意处死及其他侵犯人权事件，巴拉圭人权协调委员会向参议院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2003 年 6 月 20 日，人权委员会主席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控告。2003 年 6 月 24 日，总检察长办公室将该控告转至处理违反人权罪的特别法庭检察官；但未就该指控展开调查。

2.17 本来文属于事先须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用尽规定的例外范畴，《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对此作出规定。根据适用的国内法，自诉讼程序启动之日起，检察院应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调查(预审诉讼程序)。如果案件极其复杂，这一期限可以延长；但不论任何情况下，预审诉讼的延长不能实际延长刑事审判的整个时限，《刑事诉讼法》规定这一时限为三年。

2.18 提交人递交本来文时，案件调查已超过五年，仍未作出指控。她还说，对此延误，检察院未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未解释为何没有下令进行各种常

<sup>4</sup> 提交人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中包括了许多证人的证词。一位证人说他看到一名警察用步枪射击 Blanco Domínguez。另一位证人说，对他开枪的警察使用的是手枪。第三名证人说他自己与 Blanco Domínguez 同时被身着咔叽制服的警察近距离射中身体侧面。

规调查程序，诸如尸检、弹道学检测报告、石蜡测试或传召证人为提交人及其儿子作证等。因此她坚称，根据国内法律她得到补救的程序被无理拖延。

## 申诉

3.1 提交人称，所述事实等于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的行为，因为她的丈夫因公职人员非法、不必要和不相称地使用武力被任意剥夺了生命。虽然缔约国有权下令阻止阻塞了交通的示威游行，但有关机构也不能蔑视人的尊严，任意行使赋予其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权利，如本案所发生的国家执法人员的行为可能危及受害人生命权时尤其如此。通过和平集会阻碍公共通道的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使用火器对付示威者是合理的，除非后者对国家官员或第三方的生命或人身完整造成严重的即刻威胁。

3.2 提交人争辩说，受害人没有对警察犯下任何暴力行为，也没有危及第三方的生命，因而可以合理地对其使用火器。他被杀害前，已经毫无反抗地接受逮捕，跪在地上，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即使提交给检察官的警察报告是真实的(后来没有得到属实或证实)，警方事实上不得不向示威者的枪击作出反应，显然她的丈夫被枪杀时，警方没有区分哪些人会带来严重的即刻威胁，哪些人不会。

3.3 枪是近距离开的，瞄准的是可能造成严重伤害或甚至死亡的身体部位。此外，开枪后提供的急救不足、急救拖延，完全是随意拼凑的。没有采取措施确保在必要情况下，公共紧急服务医疗队向示威现场的伤者提供适当急救。从 Blanco Domínguez 被射杀到入院接受适当治疗之间的时间超过了 12 个小时。

3.4 提交人指称还存在违反第六条第 1 款的行为，因为国家警察没有预先警告示威者他们会使用火器。警察朝示威者开枪前没有先尝试采用其他讨论或非致命武力的方法，说明警方没有应对示威、集会或占领公共或私人财产的程序。缔约国警察条例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不符这一事实是任意处决 Blanco Domínguez 的决定因素。第 222/93 号法，即《国家警察组织法》在这一事件发生时是生效的，并且目前仍然生效，但该法对合法授权警察使用火器的情况的规定模糊不清。第 145 至 148 条仅只规定了公职人员使用火器的刑事和行政责任，以及在调查期间可能施行的预防措施。实施该法的《警察程序手册》也不明确，与上述《基本原则》不符。

3.5 此外，警方没有具体说明可以使用哪类武器和弹药，也不说明如何购买或登记注册。每位警务人员都是自己购置武器弹药，没有就此制定体制标准，因此无法追查警方行动中使用的子弹或查证使用火器是否必要或相称。<sup>5</sup>

3.6 提交人认为，指称的事实还构成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情况，因为没有以有效的方式对其丈夫被任意处决进行调查，没

<sup>5</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巴拉圭第二次定期报告结论性意见中对这种状况表示关切，载于 CCPR/C/PRY/CO/2 号文件，第 11 段。

有考虑到《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审即决事件的原则》<sup>6</sup> 或《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即决处决手册》。

3.7 据提交人报告,调查自 2004 年 2 月起始终处于停滞状态。<sup>7</sup> 调查中没有进行尸检,急救医院提供的病历报告或检察院法医书面报告都不符合尸检的特定要求,这在澄清调查最基本问题方面本应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一漏洞。没有封锁犯罪现场,也没有进行法医检查来搜集证据。检察院没有采取措施访谈目击证人,包括提交人和她的儿子在证词中提供的证人。检察院也没有认真确保由专家检查参加疏通道路的警察使用过的火器。从 Blanco Domínguez 尸体内取出的子弹一直没有找到,没有由专家检查,也未作为刑事调查记录所列证据。参加驱散示威游行的警察携带的武器都没有接受专家检查。在调查中没有取得这些基本的物件意味着确定真相和提起刑事指控至为关键的证据已经丢失。

3.8 提交人请求委员会向缔约国建议:(a) 对任意剥夺受害人生命的情况进行彻底有效的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惩罚肇事者,保障提交人在调查的各个阶段和层面有充分接触的机会和采取行动的能力;(b) 供应和核查警察部队的全部武器弹药,按照《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基本原则》制定使用武力的条例;及(c) 采取措施确保提交人遭受几年的痛苦均能获得充分赔偿。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09 年 6 月 2 日的普通照会中称,提交该案是因 2003 年 6 月 3 日在 San Pedro 部柠檬马鞭草种植者带头的农民示威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警察和示威者均有人受伤。缔约国认为,已严格按照适用的宪法和法律规定执行警察和司法程序,这种行为符合合法和合理使用武力的原则,并对事态的严重性给予了适当关注。

4.2 缔约国还称,还在对各种情况进行调查,以便确立事实。尽管如此,缔约国尚未能够确定枪击来自何处或由谁开枪,缔约国对 Blanco Domínguez 的死亡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努力查明事实。

4.3 缔约国援引国家警察局长办公室 2009 年 1 月 29 日提交的第 39 号一般性备忘录。该备忘录表明,曾要求北圣佩德罗农业生产者协调办公室(CPA-SPN)领导人,特别是 Eulalio Blanco Domínguez 和 Ernesto Benítez Gamarra 带头的示威者不要阻塞道路,以便恢复通车。然而,在这些合法要求提出后,他们拒绝对话,对执法人员作出激烈的回应。因此,根据适用的国内规章条例,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值班检察官的指挥和监督下,采取措施疏通道路,逮捕了最恶劣的领导者。

<sup>6</sup>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9 年 5 月 24 日第 1989/65 号决议提出的建议。

<sup>7</sup> 缔约国递交的起诉文件副本(调查记录)包括 2008 年 6 月 9 日向两名证人签发的传唤他们出庭作证的通知副本。



4.4 缔约国还援引 San Pedro 警察局长办公室 2003 年 6 月 19 日向检察院提交的报告。该份报告指出，在 Santa Rosa 第 18 号派出所前通过的示威者“喊叫、欢呼、抗议和谩骂警察。招摇地携带枪支[……]和带钉木棒，在主要带头者的指令下[……]，威胁要杀死警察”。报告还指出，参与这次行动的警察只使用了橡皮子弹，此次事件中有 10 名警察被火器击伤。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10 月 5 日，提交人对缔约国的意见提出评论。她辩称，虽然缔约国说为查明事实进行了调查，在来文提交日期，对这一事件的调查阶段已持续五年以上，没有对肇事者提出指控，也没有开展任何程序来查明事实。

5.2 提交人重申，来文中提到的事件不是与执法人员冲突的结果，不像缔约国所说的那样警察和平民都受了伤，而是警察对行使其示威权利的柠檬马鞭草种植人过度不当使用武力。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件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说仍在对一些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查明事实。在这方面，提交人指出，本来文属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规定的事先须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用尽的例外范畴，因为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程序仍没有结束。事实上，2003 年 6 月 16 日开始刑事调查，自此之后，没有就 Blanco Domínguez 死亡的情况作出结论。委员会回顾指出，除非确定已经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得审议来文。但为了《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目的，国内补救办法必须有效和可以利用，不得不合理地拖延。在本案情况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能解释调查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也没有提供结束调查的可能日期。因此，委员会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受到无理拖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不妨碍它审议申诉。<sup>8</sup>

6.4 鉴于来文符合受理的其他要求，委员会宣布来文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二条第 3 款规定提出的问题可予受理。

<sup>8</sup> 见第 1560/2007 号来文，Marcellana 和 Gumanoy 诉菲律宾，200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2 段；和第 1619/2007 号来文，Pestaño 诉菲律宾，2010 年 3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认为她的丈夫是示威游行期间由于警察非法、不必要和不相称使用武力遭到任意处决的受害者。她指称，她丈夫投降后被近距离枪击，随后头部中弹。她还指称，没有有效地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事件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澄清，尽管时日已久，仍未确定责任所属。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辩词，认为严格按照适用的宪法和法律条款执行警察和司法程序，这些程序符合有关合法和合理使用武力的原则。委员会还指出，据缔约国报告，为了确定事实，仍在对若干情况进行调查。然而，缔约国没有提交任何具体证据说明 Blanco Domínguez 是如何或被谁造成致命伤的。

7.3 关于提交人认为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行为的论点，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应采取措施，不仅防止和惩罚刑事犯罪剥夺生命的行为，而且还要防止国家保安部队任意杀戮的行为。<sup>9</sup> 委员会援引其判例认为，刑事调查和相应的起诉是对侵犯第六条所保护的人权行为的必要补救。<sup>10</sup> 因此可能由于缔约国未能采取适当措施调查和惩处或纠正这类侵权行为而造成违反《公约》的情况。<sup>11</sup>

7.4 委员会还回顾，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的规定，缔约国应保证所有人都为了实施《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能获得有效和可执行的补救。委员会还回顾其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认为在调查显示存在侵犯《公约》规定的某些权利时，缔约国应确保将责任者绳之以法。<sup>12</sup>

7.5 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的生命，就本案而言，缔约国有义务保护示威者的生命。造成 Blanco Domínguez 死亡的情况严重，需对缔约国警察部队可能参与进行有效调查。尽管情况如此，缔约国没有解释 2003 年 6 月 16 日开始进行的调查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仍未作出任何明确结论。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反驳提交人的陈述，提交人说没有做尸检，从 Blanco Domínguez 的尸体中取出的子弹没有检查，还放丢了，造成现在无法说明特别重要的调查问题。委员会还回顾指出，举证责任不能仅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别是提交人和缔约国并非总可以平等获得证据，往往是只有缔约国可以获得有关资料。《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隐含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真诚地调查所有

<sup>9</sup> 见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6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第六条)，《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37/40]，附件五，第 3 段。

<sup>10</sup> 例如见第 1447/2006 号来文，Amirov 诉俄罗斯联邦，2009 年 4 月 2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2 段，及第 1436/2005 号来文，Sathasivam 诉斯里兰卡，2008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sup>11</sup> 见第 1619/2007 号来文，Pestaño 诉菲律宾，2010 年 3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

<sup>12</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37/40[第一卷])，附件三，第 18 段。

针对该国和该国当局违反《公约》规定的指称，并向委员会提供其所拥有的资料。<sup>13</sup>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审议的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和与第六条第 1 款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情况。<sup>14</sup>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第 1 款和与第六条第 1 款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情况。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规定，缔约国有义务提供有效补救，包括彻底地认真调查事实，起诉并惩治罪犯，以及提供充分赔偿。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13</sup> 见第 1756/2008 号来文，Zhumbaeva 诉吉尔吉斯斯坦，2011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8.7 段。

<sup>14</sup> 见第 1458/2006 号来文，González 诉阿根廷，2011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第 9.4 段和第 1756/2008 号来文(见上文脚注 13)，第 8.8 段和第 8.10 段。

Q. 第 1829/2008 号来文, Benítez Gamarra 诉巴拉圭  
(2012 年 3 月 22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Ernesto Benítez Gamarra (由巴拉圭人权协调委员会和世界禁止酷刑组织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巴拉圭

来文日期: 2008 年 8 月 25 日(首次提交)

事由: 示威时被捕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拒绝有效补救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无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Ernesto Benítez Gamarra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29/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8 年 8 月 25 日来文的提交人 Ernesto Benítez Gamarra 是巴拉圭公民, 生于 1969 年。他称他是巴拉圭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七条行为的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 1995 年 1 月 10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农业工人，他的家和农场都位于 Táva Guaraní 社区。他是北圣佩德罗农业生产者协调办公室成员，担任教育协调员职务。巴拉圭农村工人组织的主要要求是实行农业改革。这经常引发土地所有者、农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冲突。

2.2 柠檬马鞭草的种植和销售最初由政府扶持。2002 年，政府将这种作物的销售交予私营部门负责，结果导致价格下跌，未售作物增加，种植者蒙受损失。在北圣佩德罗农业生产者协调办公室支持下，柠檬马鞭草种植者于 2003 年 2 月 10 日、4 月 24 日和 5 月 19 日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举行示威活动，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继这些有组织的抗议之后，农业和畜牧业部承诺给予种植者补助；但只提供了部分补助。谈判失败后，2003 年 5 月 29 日，农业工人再次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聚集，并安营扎寨，继续组织抗议活动。自此之后，农业工人每天举行两、三次示威活动，并在一处公共场所设立了营地。

2.3 2003 年 6 月 2 日，种植者组织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当局于 6 月 3 日上午 7 时之前全部落实农业部签署的协议内容，否则将和平封锁 Santa Rosa del Aguaray 第三大道，以此作为一种施压手段。

2.4 2003 年 6 月 3 日，包括提交人在内的大约 1,000 名示威者在示威地点汇合。迎接他们的是一只由 239 名警察和国家警察局特别支队的 40 名防暴人员组成的强大安全力量。警察和防暴人员由圣佩德罗省警察局长 V.A.R. 指挥。另外还有一个由 30 名武装军人组成的特遣队。军人和警务人员由 Santa Rosa del Aguaray 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检察官 L.A. 指挥。安全部队配有防暴水炮车，并全副武装。由于示威者无法冲破警察防线，遂决定封锁道路。检察官命令示威活动的领导者解除道路封锁，声称否则将采取措施，用武力清理道路。提交人是代表示威者举行谈判的人之一。

2.5 谈判进行当中，检察官命令清理道路。警察立即采取暴力行动，动用了催泪瓦斯、实弹和水炮。提交人说，警察在干预之前并未用扩音器向其他示威者发出警告。

2.6 警察殴打了许多示威者，胡乱开枪射击，并强行进入示威者藏身的附近几间房屋，造成巨大破坏，毒打被逮住的人员。道路在大约 10 分钟后清理完毕。

2.7 提交人和大约 120 名其他示威者设法从这次镇压中逃脱，躲进他们在距离暴力事件现场约三四百米的农村福利院搭建的营地。警察用枪械和警棍清理了这一地区，然后列出了 20 至 25 名待捕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提交人。被拘留者的身份一旦确定，即被迫躺在地上，遭到警棍殴打、脚踢和踩踏。

2.8 提交人在试图用手机与 Cáritas 广播电台联系时，被一位警察局长认出。一群警察将他围住，其中一个警察开了一枪，把他打倒在地，用的大概是橡胶子弹。同其他被拘留者一样，他被迫双手抱头、面朝下躺在地上。他遭到军人和警

警察的殴打和脚踢。他们还用脚踩他。后来，警察毁坏并放火烧了他们的财物，包括两辆摩托车和一个用于运送给养的车辆。

2.9 在遭到殴打后，提交人和其他被拘留者被军用卡车带到约 500 米外的 Santa Rosa del Aguaray 第 18 号警察局。途中他们被迫双手抱头、面朝下躺着。他们在警察局再次遭到殴打。提交人成为特殊目标；他被带到一个房间里，警察和军人用脚踢他，并用警棍打他的背部、腹部、脚和头，而他的手被铐在背后。他们在打他时，还对他进行威胁，说是他造成了该地区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他杀掉。他们还向他的脸上喷射刺激性气体。看到他哭，警察还取笑他，在他脸上涂口红，并剪了几绺他的头发，说要“送给局长作纪念”。这种待遇持续了几个小时，在报道示威活动的记者达到警察局后才停止。提交人说，当时正在警察局的检察官 L.A. 见证了这些行为，但未下令停止。

2.10 随后，提交人和其他被拘留者被关进一间宽 1.5 米、长 8 米、高 3 米的牢房，不能坐，也不能躺。他们在那里一直被关到第二天，即 2003 年 6 月 4 日凌晨 5 时 30 分，而且不许上厕所。

2.11 2003 年 6 月 3 日，国家警察局向刑事检察官 L.A. 提出申诉，控告提交人和其他示威者犯有“妨碍交通”、“扰乱和平”、“以犯罪相威胁”以及“用枪支和带刃武器抵抗”等罪行。同一天，该检察官下令临时拘留提交人和其他 40 名示威者。对提交人的临时拘留令是在他被捕后发出的。

2.12 2003 年 6 月 4 日，提交人和其他 31 名被拘留者被转到 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地区监狱。同一天，检察官指控提交人和其他 42 名示威者犯有“妨碍交通”和“扰乱和平”罪。

2.13 公诉机关和司法部门法医在 2003 年 6 月 4 日和 5 日才对提交人和其他被拘留者进行检查。<sup>1</sup> 提交人说，法医检查既不一致，也不符合《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规定。<sup>2</sup>

2.14 2003 年 6 月 9 日，应公设辩护人的要求，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刑事法院下令暂时释放提交人和在押的其他示威者。2003 年 12 月 3 日，公诉机关向刑事法院控告提交人和 31 名其他示威者犯有“妨碍交通”和“扰乱和平”罪。但未就这些指控举行口头审理，公诉机关也没有为此采取必要的程序性步骤。2007 年 5 月 2 日，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刑事法院裁定，应当撤销对提交人和其他 31 名被控示威者的刑事诉讼，因为刑事诉讼的三年时效已经到期，而且没有作出任何最终的司法裁决。此判决为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sup>1</sup> 司法部门法医 2003 年 6 月 4 日的报告指出，“患者左颈部有一个直径约 4 厘米的肿块，左侧额顶叶肿痛”。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区检察官办公室法医 2003 年 6 月 5 日的报告指出，提交人“左膝有轻微擦伤”，“未见其他伤痕”。

<sup>2</sup> 提交人附上了照顾酷刑受害人的专家 Carlos Portillo 医生 2008 年 7 月 9 日的报告，其中指出，2003 年 6 月 5 日的检查报告不符合《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要求。

2.15 2003 年 6 月 10 日, 提交人(和其他示威者)向公诉机关提出了酷刑和虐待申诉。巴拉主人权协调委员会也向参议院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 指控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对提交人实施的酷刑。2003 年 6 月 20 日, 人权委员会主席向公诉机关提出申诉。

2.16 2004 年 5 月 31 日, 侵犯人权罪行特别股为查明事实传唤了提交人; 他确认了自己的申诉, 并提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2004 年 7 月 12 日, 在事件发生一年后, 特别股检察官指控 Santa Rosa del Aguaray 第 18 号警察局局长和检察官 L.A. 在执行公务期间造成了人身伤害。公诉机关请求给予 6 个月的起诉时间, 并寻求对被告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如禁止出境、每月出庭一次和禁止与受害人交流等。被告并未被暂停职务。

2.17 2005 年 3 月 18 日, 公诉机关请求暂停对被告的诉讼, 理由是虽有证据表明实施了犯罪, 但尚未获得能确定犯罪行为人的证据。<sup>3</sup> 公诉机关指出, 尚待收集的证据包括 33 名证人的证词, 并称该机关人员需要前往事发地点获取证词。另外, 向参议院人权事务委员会提起申诉的巴拉主人权协调委员会律师也未提供证人证词。

2.18 2005 年 8 月 3 日, 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关于保障问题的临时刑事法院驳回了暂停诉讼的请求, 并裁定应当撤销起诉被告的案件, 理由是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应继续进行该案件。<sup>4</sup> 提交人说, 并未正式向他通知这一裁决, 他是自行获得了有关撤销案件的信息。侵犯人权罪行特别股就这一裁决提起了上诉, 但 2006 年 5 月 24 日, 卡瓜苏和圣佩德罗上诉法院以未在最后期限前提起为由, 宣布上诉不可受理。

<sup>3</sup> 该请求如下: “安全部队殴打和逮捕了许多农场工人, 并在逮捕时使用了过度和不成比例的武力, 因为他们业已走投无路, 举手投降。随后, 被捕者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继续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 尽管他们已不再反抗警察……公诉机关为获取据称受害人的证词作出了努力, 但尚未取得经确定在事发现场的许多受害人的证词。调查表明, 负责指挥行动的检察官在示威者遭受身体虐待时在场, 因此受到指控。还显而易见的是, 穿制服人员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警察局继续殴打示威者; 因此, 该区警察局长……也被指控……医疗报告、受害人和事件见证人的证词以及照片和其他报告等大量证据确凿表明实施了犯罪行为; 证据表明, 一些在 Santa Rosa del Aguaray 示威的柠檬马鞭草种植者所受到的身体虐待和伤害系国家警察局和武装部队人员殴打所致……但要将被告诉罪, 必须证明他们犯了罪。虽然警方报告证实这一行动的负责人之一是被指控的警察局长……, 但没有具体证据表明他对下令殴打示威者负有责任。另外, 尽管检察官 L.A. 下令解除道路封锁, 但无证据表明他下令穿制服人员过度使用武力。因此……不能认为调查已经结束, 为获取关于起诉或相关申请的进一步证据, 还须另行调查。”

<sup>4</sup> 法院在裁决中指出: “暂停诉讼的法律依据取决于他们想为继续诉讼而提交的具体证据是否有可能构成改变案件进程的充分证据。在本案中, 公诉机关代表没有提到任何能支持其申请的证据……本法院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被告实施了所控罪行。另外, 检察官办公室也没有提到旨在确立案件事实的任何其他调查。”

2.19 2008 年 3 月 6 日和 18 日，提交人请 Santa Rosa del Aguaray 刑事法院和 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刑事法院提供一份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警察局长和检察官的法院记录，但该记录却没有找到，不在其应在的法院。2008 年 5 月 7 日，公诉机关通知提交人无法就 2005 年 8 月 3 日作出的撤销案件的裁决提起进一步的上诉。因此，提交人称已经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

2.20 2004 年 9 月 21 日，提交人指出，法官弹劾小组应 San Pedro del Ykuamandyju 刑事法院的要求，启动了追究检察官 L.A. 行政责任的程序。该法院向小组通知了检察官 L.A. 提出的指控，即控告他在执行公务期间对提交人和其他被拘留的示威者造成了人身伤害。同一天，法官弹劾小组决定在就该刑事案件作出最终裁决前暂停弹劾。后来，该小组于 2005 年 11 月 22 日宣告检察官 L.A. 无罪，理由是刑事法院已经撤消了该案件。

## 申诉

3.1 提交人称，上述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七条的情况。

3.2 关于《公约》第七条，提交人称，他在 2003 年 6 月 3 日受到的身体虐待相当于酷刑，至少是残忍或不人道的待遇，违反了《公约》第七条。警察和军人对他实施酷刑的目的是恐吓他，并暂时破坏他继续领导农民进行抗议的能力。缔约国对他进行起诉和审前拘留的目的不是因为有理由对他提起刑事指控，而是为了对他予以限制，并将他置于警方和检方监督之下。他指出，他所遭受的殴打、窒息体验和死亡威胁是经后来下令拘留他的刑事检察官同意而实施的。

3.3 提交人指出，殴打给他留下了身心后遗症。<sup>5</sup> 从近处直接向脸上喷射刺激性气体，造成类似于浸入水中时窒息和被淹死的感觉，目的是要产生剧痛和由于被浸没而死于呼吸困难的体验。他说，由于这种行为是经负责保护他的生命和身心安全的司法人员同意而实施的，因此更加剧了他的痛苦和恐惧感。

3.4 提交人忆及，公诉机关在国内法院面前承认实施了体罚。在 2005 年 3 月 18 日暂停诉讼的申请中，刑事检察官称，有大量证据确凿地证明发生了所控罪行。但所采取的司法行动未能充分明确犯罪情节，处罚负有责任者，赔偿受害人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

<sup>5</sup> 提交人附上了 Chistian Palmas Nicora 医生(一位整形外科和创伤科医师)2008 年 7 月 14 日和 Carlos Portillo 医生 2008 年 7 月 9 日的医疗报告。前一份报告指出，提交人右肩外展不超过 120 度，外旋最大 90 度，且伴有疼痛；右上肩胛区疼痛；右侧锥旁肌肉和肩胛周围肌肉萎缩。提交人左手食指远端指间关节僵硬，食指和中指近端指间关节肿痛，手指弯曲能力部分丧失，左手肌肉力量下降。他的右侧第三肋骨后弓陈旧性骨折，左手食指远端指间关节脱位。根据第二份报告，他在获释时全身骨头和关节复发性疼痛，目前主要是双膝疼痛；左手食指第二和第三指骨间关节变形；小便困难；双眼结膜对之前不会引起流泪的外来刺激敏感；他对类似爆炸或枪声的任何声音感到烦躁、无法忍受。



3.5 缔约国没有履行立即就提交人的酷刑申诉适当展开有效调查的责任。为了结合第七条而适当解释《公约》第二条第3款所规定的义务，委员会应当考虑到《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原则》，<sup>6</sup>特别是《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即《伊斯坦布尔议定书》。

3.6 提交人称，酷刑申诉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后来的处理过程缓慢而无效。两名刑事责任不言自明的公职人员在事件发生13个月后才被指控。公诉机关没有要求以暂停这两人(或任何其他人员)的职务来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防止他们阻碍调查并对公诉进程造成影响。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在表示异议的最后期限到期两个月后才就撤销案件的命令提出上诉。这种无能和合理的拖延表明现有补救办法无效。

3.7 提交人称，公诉机关和司法部门法医对提交人和其他受害人进行的医疗检查不符合《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要求。这些泛泛的检查仅限于对受害人的外观检查，而没有进行化验或心理评估。他说自己直到被拘留和殴打后才获得了医疗护理。

3.8 实施酷刑的地点被封锁，也没有为收集证据而进行司法检查。检察官对犯罪现场的第一次检查于事发4个月后的2003年10月15日进行，第二次检查于事发16个月后的2004年10月16日进行。第一次检查只注意到牢房的大小和警察局的办公地点，第二次检查限于画出警察局的基本平面图。据称受害人和其他证人都没有接到检查通知或参与其中。检查时只有一名被起诉的官员即警察局长在场。

3.9 检察官的调查主要侧重于收集证人证词。因此，调查具有不公正性，因为大多数证人都是参与镇压的官员，他们的证词是要掩盖自己和上司的责任。公诉机关访问的证人包括七名警官、五名军人、一名公诉机关人员和四名示威者，包括提交人在内。没有安排说法严重不一的证人进行对质，也没有开展国内法律规定的其他必要调查。

3.10 在公诉机关提出的暂停诉讼程序的申请中，检察官办公室提到尚未在诉讼的适当阶段访问33名证人和受害人，关于该项申请，提交人称，这些人中有19人已被公诉机关指控，并在以示威期间封锁道路为由对他们提起的刑事案件中受到警方和检方监督。因此，说很难确定和集合受害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大多都为公诉机关所知，正处在警方和检方监督之下，可以对他们进行访谈和审判。

3.11 提交人提到缔约国的有罪不罚现象，指出公诉机关由于缺乏在诉讼程序的适当阶段收集的证据而未能在刑事调查中起诉，也与这种有罪不罚现象相一致。

<sup>6</sup> 大会2001年2月22日第55/89号决议。



在这方面，提交人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sup>7</sup>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sup>8</sup>

3.12 提交人请委员会建议缔约国：(一) 对提交人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情况开展全面有效的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惩罚负有责任者；(二) 采取措施确保提交人为所受伤害获得全面、充分的补救。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在 2009 年 7 月 2 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指出，本案的起因是柠檬马鞭草种植者 2003 年 6 月 3 日在圣佩德罗省举行的示威活动。在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后，警察和示威者都受了伤。缔约国指出，国家警察局的报告表明，安全部队人员没有目睹或参与警察部队实施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折磨。示威者是在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受伤的。警方和司法程序严格符合《宪法》和法律，遵守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并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

4.2 缔约国称，为确定事实，仍在调查一些情况，国家主管当局一再表示决心有效跟踪关于人权的申诉，防止发生任何导致提起这类申诉的犯罪行为。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10 月 5 日，提交人重申，造成来文所涉事实的原因并不是如缔约国所说“与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警察和示威者都受了伤”，而是警察对行使示威权利的柠檬马鞭草种植者使用了过度和不合理的武力。

5.2 提交人重申，酷刑诉讼由于撤消了起诉被控行为人的案件而被中止。2008 年 5 月 7 日，检察官通知提交人，没有就所作出的撤销裁决提起上诉的补救办法或其他程序性手段。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sup>7</sup> 关于巴拉圭的结论性意见，CCPR/C/PRY/CO/2，第 12 段。

<sup>8</sup>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的报告，A/HRC/7/3/Add.3，2007 年 10 月 1 日，第 53 至 55 段。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为确定事实，仍在调查一些情况。但缔约国未就这些情况作详细说明。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该案已经最终撤销，2008年5月7日，公诉机关通知他说，无法就撤销指控的裁决提起进一步的上诉。因此，委员会认为，来文符合《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规定的已经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

6.4 鉴于其他受理规定均得到满足，委员会宣布来文可受理，因为它提出了《公约》第七条和第二条第3款下的问题。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规定，联系各当事方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他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并在警察局与其他被拘留者一起被带到一个房间，警察和军人在这个房间里多次对他进行殴打，并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他还称，除其他外，他受到了死亡威胁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并向他脸上喷射了刺激物。如2008年出具的医疗报告所示，殴打给他留下了身心后遗症。

7.3 委员会还注意到，2003年6月10日，提交人就这些事件向公诉机关提出了申诉。但一直到2004年7月12日，警察局长和一名检察官才被控犯有执行公务期间造成人身伤害的罪行。提交人称，主要为了提取证人证词的检方调查是不公正的，因为大多数证人都是警察或军人，被访问者中只有四名示威者。委员会注意到，2005年3月18日，公诉机关确认，诸如医学测试、受害人和证人的证词、照片及其他报告等大量证据确凿地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但要起诉两名被告，还需要收集更多证据，包括许多受害人的证词。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警方和司法程序都严格符合法律规定。

7.4 考虑到提交人对2003年6月3日事件的详细描述、他提交的医疗报告和公诉机关对这些事件的承认，委员会认为，警察不成比例地使用了武力，提交人受到的待遇违反了《公约》第七条。

7.5 关于提交人就案件调查提出的申诉，委员会忆及其关于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20号(1992年)一般性意见<sup>9</sup>、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31号(2004年)一般性意见<sup>10</sup>及其既有判例，<sup>11</sup>其中认为，主管当局必须对有关违反第七条的申诉展开及时、全面和公正的调

<sup>9</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47/40)，附件六，A节，第14段。

<sup>10</sup> 第31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CCPR/C/21/Rev.1/Add.13 (2004年)，第18段。

<sup>11</sup> 例如，见第1436/2005号来文，Sathasivam/Saraswathi 诉斯里兰卡，2008年7月8日通过的《意见》，第6.3和6.4段；以及第1818/2008号来文，MacCallum 诉南非，2010年10月25日通过的《意见》，第6.7段。

查，并须采取适当行动惩治被查明有罪的人。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于 2003 年 6 月 10 日提起申诉，而在一年多以后，即 2004 年 7 月 12 日，检察官才起诉了两名嫌疑人。2005 年 3 月 18 日，检察官请求暂停诉讼，以便收集进一步的证据。但刑事法院不允许收集这类证据，并撤消了案件。在这些情况下，再加上缔约国没有说明为何中断对案件的调查，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无法获得有效补救，委员会面前的事实显示存在违反与《公约》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行为。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及与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的情况。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规定，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除了迄今所采取的措施外，这些补救还应包括对事实进行公正、有效和全面的调查，起诉和处罚负有责任的人，并提供充分补偿，包括适当赔偿。<sup>12</sup> 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确保广泛传播。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12</sup> 例如，见第 1605/2007 号来文，Zyuskin 诉俄罗斯联邦，2011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段。

R. 第 1833/2008 号来文, X. 诉瑞典  
(2011 年 11 月 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X. (由律师 Anna Lindblad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来文日期: 2008 年 11 月 26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将双性恋者遣返回阿富汗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返回原籍国后将面临酷刑和死亡的风险  
 《公约》条款: 第六条; 第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 X 先生提交的第 1833/2008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8 年 11 月 26 日来文提交人 X 先生, 是阿富汗国民。他声称他是瑞典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权利的受害人。他由律师 Anna Lindblad 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布齐德·莱兹赫里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0 条, 通过本决定时,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特·特林先生没有参加。

本《意见》附有委员会委员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签名的个人意见。

## 事实背景

2.1 2002 年 10 月 2 日，提交人抵达瑞典，并于次日，2002 年 10 月 3 日，提出了庇护申请。他的庇护申请阐明，1989-1990 年期间，他一直是阿富汗共产党的活跃成员。他为阿共工作采取的方式是，摄制记录片；编写剧本、文学和报告；抨击圣战者组织，而且他还扮演剧中人。这项工作使他为公众所熟悉。1993 年，纳吉布拉政权垮台之后，他被当时掌权的圣战者组织——Mazar-e-Sherif 逮捕。他被押送到一座唯一监押政治犯的治安监狱。他遭到单独监禁，每日蒙受酷刑，包括电击、拳打脚踢、性虐待，乃至强奸。他在监狱内关押了约六个月，既不审判，也得不到律师援助。最后，他父亲通过贿赂一个人，致使他获释。随后几年，他一直东躲西藏，从一个城镇藏匿到另一座城镇，直至 2002 年他得以逃离该国。他宣称，他父亲被圣战者组织杀害了。2005 年 8 月 16 日，他的庇护申请被瑞典移民局驳回。提交人向外籍人上诉委员会提出了上诉。2006 年 1 月 20 日他的上诉被驳回。这次驳回是就此决定的最后裁决。2006 年 4 月 7 日，移民委员会因阿富汗国内的情况宣布暂停遣返，批准了提交人(以及其他申请遭拒绝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暂住许可，有效期至 2007 年 4 月 7 日截止。

2.2 2006 年 12 月 20 日，提交人根据《外籍人法》第 12 章再次提出了庇护申请，宣称出现了新情况，提出担心遭到迫害，包括酷刑，并提供了斯德哥尔摩 Danderyd 医院危机和心理创伤中心，就以往所受酷刑的影响出具的医检证明。2007 年 6 月 20 日，瑞典移民委员会称，提交人并未提供任何新情况，驳回了他的申请。2007 年 7 月 16 日，他的申诉被移民事务法庭驳回。

2.3 2008 年初，提交人再次提出了庇护申请。他再次宣称，因为他是当年逃离该国的政治囚犯，并因他以往的所作所为，他仍被视为反圣战组织人士，而且面临遭杀害的风险。他宣称，圣战者组织在阿富汗国内仍处于掌握着极大实权的地位。提交人就此申请呈送的文件中附有一封阿富汗官员的信件，确认他若返回国内，仍有遭受酷刑的风险。2008 年 3 月 13 日，瑞典移民委员会驳回了他的宣称，辩称提交人未提出新情况，因此没有理由复审他的案件。

2.4 2008 年 9/10 月，提交人再次向瑞典移民委员会提出了庇护申请。他的申请首次透露，他系出于双性恋原因申请庇护。他解释称，他第一次同性恋行为是 15-16 岁与另一男孩之间发生的关系，他们在一起约有四至五年。提交人说，他从未透露过他的性取向，他的朋友和家人都不知道，因为他担心遭到非国家行为者或国家当局的严厉惩处。他仍坚持他先前的庇护宣称，但还补充说，1993 年他遭逮捕的主要原因是，他撰写了一部描述双性恋的剧本，而且他本人扮演了这部剧，还在剧中亲吻了男性。当他遭到威胁之后，这些表演就中止了。他宣称，他就是因此遭逮捕，被控犯有反伊斯兰教和政治反对派行为。他遭到酷刑并宣称遭到作为酷刑部分实施的强奸。在他获释之后，他继续与男性和女性都有过性关系，在他的婚姻存续期间亦一样。他始终担心，一旦此事暴露，他会遭举报，会遭到政府或一些人的严刑拷打，甚至杀害，因为政府是不会提供保护的。

2.5 他在瑞典期间曾有过短期和长期的双性恋关系史，并成为瑞典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联盟成员(以下简称“同性恋联盟”)。同性恋联盟向移民局和移民事务法庭发函，抗议将他遣返回阿富汗的决定。他在瑞典境内居住期间，虽然并不隐瞒他的性生活，但出于怕遭报复的担心，他从未将自己的性取向告诉任何阿富汗人。然而，有些阿富汗人完全有可能知道，且有可能将此事告诉阿富汗国内的人。

2.6 2008 年 11 月 17 日，瑞典移民委员会驳回了提交人的再次申请，宣称他未就为何当初没有向庇护主管机构说明他的性取向问题给出站得住脚的理由。提交人答复说，这是因为阿富汗文化针对这种双性恋和同性恋所持的鄙视态度；自己的耻辱感；担心他原先的律师、移民当局和翻译对他有看法，以及出于一旦别的阿富汗人知道会打击报复他的担心所致。此外，他也不知道，担心基于性取向的迫害，可成为向瑞典申请难民地位和庇护请求的有效依据。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理由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2.7 2008 年 11 月 24 日，提交人就瑞典移民委员会最近一次裁定，向移民事务法庭提出了上诉。除了辩称由于他的个人情况和阿富汗的国情，他若返回国内，他会有遭酷刑和迫害的风险之外，他还称，移民委员会没有正确地适用证据标准。他说，移民委在对有理由复审案情的情节，未适用最低的证明标准，却采用了“极大可能的验证标准”。同性恋联盟为他出面解释了在庇护申请过程中双性恋和同性恋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其性关系难以启齿的问题。该联盟支持提交人的论点：即，他若返回阿富汗，会有遭受迫害和酷刑的风险。2008 年 11 月 25 日，移民委员会向移民事务法庭表示的意见称，提交人没有就事前为何不提及其性关系，给出任何可站得住脚的理由。移民委觉得，他既然在瑞典境内不隐瞒他的性取向，并有同性恋关系，出入男同性恋俱乐部，然而，他却认为不宜向移民主管机构透露这个问题，岂不是自相矛盾。2008 年 11 月 26 日，移民事务法庭维持了瑞典移民委员会的裁定。移民庭认为，根据 2005 年《外籍人法》第 12 章第 19 节，没有理由审理依据这些新事实再次提出的庇护申请。因此，提交人被遣送回了阿富汗。

2.8 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称，对于移民事务法庭的裁决是可以向瑞典上诉法庭提出上诉。然而，这不能被视为有效的补救办法，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时间不够，因为遣送在即；其二，有理由认为，上诉不会阻移民事务法庭的遣送，因为移民事务庭在上次裁决中就清楚地阐明，法庭极为严格地理解“有效理由”标准。鉴于上述原因，提交人认为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 申诉

3.1 提交人宣称，瑞典强迫他返回阿富汗相当于侵犯他依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应享有的权利，因为返回阿富汗会面临遭受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真正风险，以及面临阿富汗当局、个人甚至武装集团

危害他生命的威胁。阿富汗当局不克尽职守为他提供防止非国家行为者迫害的有效保护。

3.2 提交人引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和瑞典外交部的资料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生活不敢在阿富汗境内公开,否则人权就会有遭侵犯的风险。难民署“评估阿富汗寻求庇护者需要国际保护的资格准则”(2007年12月)阐明,“鉴于阿富汗保守的社会准则,同性恋不可能公开。此外,男女同性恋者都有可能招致家庭或社区成员的暴力,大部分可适用的刑法解释表明,一旦当局发现同性恋行为,即会予以严厉的惩处。”(第9段)。同一份文件还称,“私下的同性恋关系是[……]不被接纳的。同性恋者必须隐瞒他们的性取向。伊斯兰法禁止同性恋关系,并且可按‘胡毒’(Hudood)罪处死”(第72段)。根据(2008年3月)瑞典外交部2007年阿富汗人权情况报告称,“不存在同性恋问题,而且依据伊斯兰教法,禁止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对于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原因遭到的歧视,法律不提供保护”。提交人还称,瑞典的《外籍人法》第12章第19节与《公约》第六和第七条相悖,因为驱回若要有风险,那么,“有效理由”即是风马牛不相关的问题。他宣称,这也违背了瑞典不把任何人送回他或她将面临酷刑或其它严重侵犯人权风险国家的国际义务。

#### 提交人的补充意见

4. 2010年3月31日,律师来函阐明,她联系上了阿富汗境内的提交人,提交人称他的生活十分艰难,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两国之间的各个城镇东躲西藏,从一地藏匿到另一地。他不敢出门,只能苟且度日,因为他是靠其在海外的兄弟经济上接济度日。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5.1 2011年2月25日,缔约国就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发表了意见。缔约国提供与瑞典庇护法相关的详细资料。关于2005年《外籍人法》第12章第19节所载的“有效理由”概念,缔约国说,移民上诉庭对此概念作狭隘理解,基本着眼点如下。瑞典庇护程序旨在保障瑞典移民委员会和移民事务法庭对庇护申请的审理,在一般审理程序框架内尽可能保持高水平的法律确定性。这样的程序将最终形成一项具备法律实效且可执行的裁决。因此,惟有在例外情况下,寻求庇护者被视为具有有效理由,才可在不援用一切相关情节之前,下达此类决定。

5.2 缔约国还以瑞典移民委员会和移民事务法庭案例档案为首要根据,提供了有关提交人案情的下列资料。2002年10月3日提交人提出了庇护申请,当天移民委员会与提交人举行了初次面谈。面谈期间,提交人称,上学时他就加入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阿民党)青年部。他开始在该党的安全部门工作,并一直干了三年。在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即将被推翻之际,他不干了。他宣称,今天那些曾为纳吉布拉效力的人,无法在阿富汗境内生活,而他若被迫返回,他会遭逮捕和判刑,因此,他为自己的生命担忧。

5.3 2003 年 12 月 3 日，为他指定一位律师为他的法律代理。2005 年 3 月 14 日和 2005 年 3 月 18 日，提交人向移民委员会发送了两份函文，阐明 1993 年他遭到圣战者组织的逮捕，被投入地方监狱，监押了六个月。他被指控为共产党和与圣战者组织为敌。当局知道提交人过去的活动。他一再遭受到拳打脚踢、电击和性骚扰等酷刑的迫害。一天夜晚，他的父亲来到监狱，对某人行贿，使得他获释。自他出狱之后，他不得不躲避圣战者组织。他曾在喀布尔内或周边躲藏。他父亲遭到搜捕他的圣战者组织杀害。过去一年来，他一直无法与其妻子和儿子联系。提交人还说，他浑身上下饱受疼痛，患有头脑剧痛，无法入眠等病症，他认为这些均系他所受酷刑落下的症状。他提供了从其病历摘录的诊断记录影印件。

5.4 2005 年 8 月 16 日，瑞典移民委员会拒绝了他居住许可证、工作许可证、难民地位证明和旅行证件的申请，并下令将他遣返回阿富汗。根据从难民署、国际危机组织(危机组织)和阿富汗合作中心(阿合中心)收到的资料，移民委认为，曾为阿民党员的低层人员在阿富汗境内不会有风险。尚无资料透露阿富汗政府或当局正在迫害原阿民党党员的情况。此外，许多原阿民党党员已得以从海外返回并在公共部门找到了工作。提交人作为他需要保护所引述的这些事件，均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而且他呆在阿富汗境内这几年期间，未曾发生过任何事。因此，移民委得出结论，提交人并未证明，他很可能会因其政治参与或其宗教而遭到经政府首肯的迫害。此外，对此案件人道主义情况的总体评估也未显示出有任何极为非同寻常的情况，可令瑞典当局根据《外籍人法》第 2 章第 4 节考虑批准其居住许可。

5.5 提交人就外籍人上诉委员会的裁决提出了上诉，大体宣称如下。当初他在共产党内是一名活跃且大胆敢言的党员。正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直接招致了逮捕和酷刑。他宣称，阿富汗各个治安管区域都设有监管返回者的特别行动队，他担心这些别动队会对他实施逮捕、酷刑，乃至杀害行动。2006 年 1 月 20 日，外籍人上诉委员会驳回了他的上诉，并维持了移民委员会的决定。对此裁决不得再提出上诉。

5.6 2006 年 4 月 7 日，移民委员会基于提交人在瑞典境内居住了相当长时期，而且阿富汗境的国情如此之糟，无法采取强迫手段对之实施遣返决定等原因，暂行批准提交人的居住许可(截止至 2007 年 4 月 7 日)。遣返提交人回原籍国的法令并未中止。虽然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决定批准提交人的暂行居住许可，但许可限期仅一年。

5.7 2007 年 4 月 27 日，提交人向移民委员会提出了居住许可申请。他宣称，他患有严重的头痛症，正在医治遭受酷刑受害者的危机和心理创伤中心接受治疗。他还说，他已经找到了长期就业工作，随后向移民委提交了 2007 年 6 月 13 日危机和心理创伤中心原先开具的一份报告。报告称，提交人患有头痛症，记忆衰退、无法集中注意力等症状，而且乏力不济，并一位神经专科医生正在对他进行检查。2007 年 6 月 20 日，移民委拒绝了他根据 2005 年《外籍人法》第 12 章第



19 节提出的复审要求，并认定无妨碍执行驱逐令的遏阻因素。移民委还说，阿富汗境内提交人原籍地的治安未构成诸如武装冲突之类的情况。

5.8 此后，提交人发送了一封信件声称，他不能返回，因为那些曾关押过他的圣战者组织力量依然盘据统治着他的原籍区域。移民事务法庭将此信作为申诉受理。2007 年 7 月 16 日，移民事务法庭驳回了此申诉，理由是提交人所述的新情况是基于他原先所引述情节略作的一些修改和修订。提交人向移民事务法庭发送了另一信件，声称迫使他出逃的人，不仅统治着他的原籍省份，而且仍掌控阿富汗的半壁疆土。2007 年 9 月 17 日，移民上诉庭决定不批准，就移民事务法庭 2007 年 7 月 16 日裁决提出上诉的请求。

5.9 2007 年 9 月 21 日，提交人致函移民委员会坚称他不能返回阿富汗，他提供了证书证实 1993 年他曾受伤并住医院接受了十天的治疗。该证书还证实他的生命有危险。2007 年 10 月 2 日，移民委员会认为所提供的证件无证据价值，拒绝复审案情。

5.10 提交人就移民委员会不批准复审的裁决提出了上诉，宣称由于他曾从事的工作，他可被阿富汗人，包括掌权者和该国政府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他宣称，1993 年他遭逮捕之后，他逃到了另一城镇，但又不得不从那儿逃离。他收到警方的信件，他陷于生命危险之中。他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还在国内。他若被迫返回，他会被控异端邪恶，敌视伊斯兰教和皈依基督教罪，因此会招杀身之祸。2007 年 11 月 9 日，移民事务法庭拒绝了提交人口头听证的要求，但允许他可最终编撰一份书面陈述。2007 年 11 月 20 日，移民事务法庭宣称未列举出新情节，驳回了上诉。2008 年 2 月 21 日，移民上诉庭裁定不批准就移民委员会的裁决提出上诉的请求。

5.11 2008 年 3 月 3 日，移民委员会登记了提交人发来的一封复审其先前要求的诉状。2008 年 3 月 13 日，移民委员会决定驳回提交人第三次要求复审的上诉。

5.12 2008 年 10 月 3 日，移民委员会登记了提交人宣布为上诉状的又一封信件。提交人在信中首次宣称，他是双性恋者。2008 年 10 月 9 日，上诉因已逾相关限期被驳回。然而，该信件被作为请求复审案情的上诉进行了登记。此后，提交人以他所谓的双性恋为据提出了又一次上诉。

5.13 2008 年 11 月 17 日，移民委员会决定驳回提交人第四次请求复审的上诉。关于提交人为双性恋者被视为主管机构先前未曾审理过的新情况，移民委说，阿富汗涉及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情况，本身还尚不到要提供保护的地步，而且必须基于个体情况展开审查。移民委认为，提交人尚未确立他若返回阿富汗，会有遭受迫害的风险。

5.14 提交人向移民事务法庭提出了上诉。移民委员会被给予了就此上诉发表意见的机会，然而，移民委阐明如下。《外籍人法》第 12 章第 19 节规定的复审必要条件是，先前未曾引述过的情节，或外籍人证明，他或她具备不提出未引述情节的有效理由。不引述新情节延迟的耽搁时间越久，就越发须要在审理晚期阶段

就为何没提出这些新情节作出解释。当寻求庇护者隐瞒对审查他的庇护申请举足轻重的情况时，这会对所引述新情况的可信度产生重大影响。在提交人在瑞典境内居住长达六年期间，他曾有过无数次机会和各种不同场合，可述说他的性取向问题。在他提交的资料并未说明具体的时间，他的叙述仅称“最终”加入同性恋联盟并与其他男性约会，较为公开双性恋者生活。尽管他的保护申请屡次遭拒绝，但提交人却也未说明为何他不能向当局述说这些情况。提交人在未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一方面开始公开双性恋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对瑞典当局无足够的信任，不肯袒露此事。鉴于到后期才披露，这项申诉的可信度颇低，他不太可能使之成为最后阻碍对他执行遣送令的因素。因此，移民委裁定，不批准提交人复审的请求。

5.15 2008 年 11 月 26 日，移民事务法庭维持了移民委员会的裁定。提交人未就移民事务法庭的裁决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

5.16 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说，2006 年 1 月 20 日，当外籍人上诉庭驳回了，提交人就移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16 日决定提出的上诉之后，遣送令就成为针对提交人的最后裁决。然而，在审理的后期阶段，提交人未以双性恋为由，就 2008 年 11 月 26 日移民事务法庭驳回他依据《外籍人法》第 12 章第 19 节提出的上诉的裁决，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据提交人在遭驱逐的前一天称，未提出上诉的原因是移民事务法庭决定不暂缓执行驱逐，而且，鉴于上诉庭很可能不会批准他上诉的请求，因此，他完全有理由认为，移民上诉庭也会拒绝他要求暂缓执行的要求。

5.17 缔约国说，当提交人决定向主管当局承认他的双性恋取向时(2008 年 10 月)，驱逐令成为对他的最后裁决已达二年半多了。移民委员会和移民事务法庭都认为，提交人关于其双性恋取向之说是“新情况”，因此，本可以根据《外籍人法》第 12 章第 19 节进行审查。然而，移民事务法庭还认为，依据同一条款，提交人并不符合“有效理由”的必要条件。提交人本可就移民事务法庭 2008 年 11 月 26 日的裁决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他本可向移民上诉庭请求在对上诉审理期间暂缓执行驱逐。该主管法庭既有权裁定相关的临时性措施，也可批准重审提交人的案情，因而，补救办法就此而论是有效的。然而，提交人却显然选择了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申诉。提交人未证明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确属徒劳之举。2008 年 11 月，移民上诉庭只就“有效理由”概念下达了一项裁决，并未涉及性取向问题，而且法庭阐明须视案情逐一作出评估。因此，远远无法推断，移民上会如何审定上诉人的上诉。鉴于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人权事务委员会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缔约国还坚称，提交人关于他会面临遭受相当于违反《公约》行为方式的待遇之称，没有为了受理目的需要给出基本程度的实证，因此，来文毫无根据，应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不予受理。

5.18 人权事务委员会若得出结论来文可受理，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强迫提交人返回阿富汗是否会违反瑞典依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承担的义务。参照委员会的案例，若要确定存在违反第六条和第七条的现象，就必须确定当事个人若

返回该国，是否会面临遭受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述行为的真正风险。之所以说必须是真正的风险，系指风险必须是强迫返回的必然且可预见的后果。<sup>1</sup> 委员会还阐明，这必须是对个人造成的风险。<sup>2</sup> 委员会的案例表明，对于确立是否存在不可弥补损害的真正风险，必须具备颇高程度的重大理由。因此，所有相关事实和因素都必须考虑到，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普遍人权情况。对缔约国所作的评估给予重大的考虑。委员会还认为，通常应由《公约》缔约国的法庭评估具体案情的事实和证据，除非查明评估显然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剥夺公正的现象。<sup>3</sup>

5.19 关于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一些记者<sup>4</sup> 说，阿富汗境内仍在发生一系列诸如法外处决、酷刑、非法拘留、强奸、非法征用私人财产、贩运、歧视和骚扰等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况；缺乏对人权的尊重与该国的安全局势直接相关；犯罪四处施肆且残暴，国家行政部门却疲弱无力，且正在构建之中；警察和监狱主管机构普遍滥用酷刑。新宪法和《刑法》均规定了死刑，而伊斯兰教法则规定可对谋杀和叛教行为处以死刑。人们显然敏锐地警惕可被视为散布不道德或非伊斯兰的信息。

5.20 至于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个人，依据伊斯兰教法，同性恋系为可判处死刑最严厉惩罚的“胡毒”罪。2009 年美国国务院报告称，当局只是零星地实行禁止，而尽管法律上仍可判处死刑，但自塔利班政权垮台之后，就未再下达过死刑判决。主张保护或行使性取向自由事务的组织仍处于隐蔽状态。难民署“评估阿富汗寻求庇护者需要国际保护的资格准则”(2010 年 12 月)具体阐明，“鉴于强烈的社会禁忌，以及视‘同性恋行为’为罪恶的观念，难民署认为，一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由于他们隶属某个具体的社会群体，即，因他们的性取向和/或性认同而可能面临一些风险，因为他们不遵守或被视为不遵守普遍的法律、宗教和社会准则”(第 29 段)。然而，2009 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尚无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或暴力事件发生，但社会禁忌仍然强烈。公开的同性恋尚未出现过。

5.21 瑞典移民机构根据《外籍人法》审议庇护申请所适用的标准，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约》审查申诉所适用的标准一样。国家主管机构举行面谈，可处于评估寻求庇护者所提供资料并判定他或她诉求可信度的甚佳地位。因此，瑞典移民局掌握充分的资料，包括档案所载的事实和文件汇编，以确保当局可凭借确凿的根据评估提交人是否需要保护。因此，对瑞典移民局的评估必须给予相当程

<sup>1</sup> 见 1997 年 8 月 11 日就第 692/1996 号来文，A.R.J.诉奥地利案通过的《意见》第 6.8 和 6.14 段。

<sup>2</sup> 同上，第 6.6 段。

<sup>3</sup> 见第 1549/2007 号来文，Nakrash 等人诉瑞典，200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至 7.4 段。

<sup>4</sup> 见瑞典外交部“2007 年阿富汗人权情况报告”(2008 年 3 月)；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2009 年人权报告：阿富汗”(2010 年 3 月)；联合王国内务部“原籍国情资报告—阿富汗”(2010 年 11 月)；大赦国际“2010 年报告—阿富汗”；和人权观察社“2009 年世界报告—阿富汗”。

序的重视。关于来文所述案情，缔约国依据的是移民委员会和移民事务法庭的裁决，以及裁决所列的评判理由。

5.22 至于提交人宣称，由于他在阿民党中的活动，他在阿富汗境内会面临遭受圣战者组织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真正风险，缔约国提醒地指出，移民委员会曾三次，而移民事务法庭曾二次审理过此宣称。如上所示，上述各庭的每次审理都驳回了此宣称。各主管机构的评估均无法被认定系属明显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剥夺公正的做法。此外，据提交人本人的交待，1993年他获释之后，直至他离开阿富汗为止，即(从1993至2002年)在为期将近十年期间未再受到威胁、骚扰、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据提交人称，截止缔约国目前发表意见之时，即自他返回阿富汗之后，又两年过去了，他未成为上述迫害行为的目标。有鉴于上述情况，瑞典移民委员会2005年8月16日裁决所表达的观点，再次得到了印证。因此，提交人并无实证证明他因其先前参与共产党政权会面临遭受阿富汗境内圣战者组织或其他行为者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真正风险。

5.23 至于提交人关于其所谓双性恋问题的宣称，缔约国回顾，提交人直至2008年10月3日向移民委员会提出的第四次庇护申请之时，即，已在瑞典境内滞留了六年之后才首次披露他是双性恋者。尽管向他人坦承，包括向移民局承认他或她的双性恋取向确实有个人难以启齿的困难，从寻求庇护者一抵达国境内寻求保护，从他或她基于本人性取向提出保护诉求，至可对评估他或她的请求产生影响之间，耽搁了相当长一段岁月，有时也不失为合理的行为。然而，依据国际和国内难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凡在他国境内提出保护请求的外籍人，应为获得保护的原因，在申请审理过程中尽早交待其本人寻求保护的一切理由。本案提交人虽一直以来，频频与移民机构和法庭交往，但却在六年以后才自称为双性恋者。

5.24 提交人告诉委员会，他没有在庇护申请审理的较早期阶段披露本人的性取向，是因为人们对双性恋和同性恋所持的相关鄙视态度；本人的耻辱感、他担心原先的律师、移民机构和翻译会对他有看法，和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担心若其他阿富汗人得知他的双性恋取向后会打击报复他。提交人引述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不知道，担心会遭受基于性取向原因的迫害，会成为在瑞典申请难民地位和请求庇护的有效诉求。缔约国认为上述理由不足。人们可以理解，一个来自阿富汗的人要承认自己是双性恋者会受到社会禁忌的掣肘。然而，提交人从15岁起，直至2002年逃离阿富汗，他先与男性，最后又与女性有过性关系；他负责编写并亲自上演了据称反映双性恋主题的剧本；他在抵达瑞典仅一年之后就开始了与男性的关系，从2004年起，他开始游逛男同性恋俱乐部，并参与了他们的社会活动。因此，缔约国得出结论，就提交人本人而论，不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瑞典境内均未剥夺他的双性恋关系。因此，提交人因鄙视、耻辱感或担心遭瑞典境内其他阿富汗人的打击报复，所以未在申请的早期阶段向移民机构通报他双性恋取向的理由，令人置疑。缔约国还说，瑞典是一个普遍认识并容忍个人性取向方面相关人权的国家。提交人早在2004年初就开始公开了双性恋者的生活，并与同类人进行社交，均表明他完全了解情势。为此原因，人们难以理解，为何

他耽搁了将近六年才引述他的性取向作为寻求庇护的理由，甚至还考虑到他来瑞典是为寻求庇护具体目标的事实。在整个国内审理过程，提交人均由律师代理，这就令人对他称无人告知他性取向可成为向瑞典寻求难民地位的有效诉求之说提出质疑。虽然有关性取向问题可造成一定的拖延是可以理解的，但缔约国感到六年的耽搁实属无道理的拖延。

5.25 缔约国还指出了提交人有关其双性恋取向陈述方面的前后矛盾点。同性恋联盟提供的文件称，提交人难以保守他与其它男性交往的秘密，而且他身边的那些人最终会开始察觉到他的双性恋取向，并对他进行骚扰，而提交人就他所谓的双性恋问题发表的其它叙说则称，关于他的双性恋取向，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人们也不知道。此外，提交人称，他曾积极参与了共产党，并为该党的安全部门工作了三年。他说，在此期间，他编写并上演了讽刺圣战者组织的剧本。当他披露了他的双性恋取向时，他虽坚持了原先的说法，但略作了一些修正。因此，他说，当初上演这部双性恋者的剧时圣战者组织派人去了现场，并因该剧情威胁和怒叱他。缔约国觉得圣战者组织派出的人不太可能会被允许进入演出场地，且不说剧情主题，这是共产党保密部门内部编排的剧本，而且当时共产党仍执掌阿富汗政权。因此，对此宣称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有鉴于此，有理由怀疑提交人的说辞以及他关于一旦返回阿富汗会因他本人的性取向而面临遭杀害和/或遭受酷刑或其它虐待的所谓风险之称。

5.26 缔约国还提醒地指出，据提交人称，1993 年曾发生过逮捕和酷刑事件，但他在阿富汗境内一直到 2002 年，期间再未遭到过逮捕或酷刑。缔约国还提醒委员会注意提交人律师 2010 年 3 月 31 日所作的叙述，并未提及自他返回后遭受到《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禁止的任何威胁、骚扰或虐待。根据上述叙述，提交人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往返旅行。

5.27 最后，缔约国说，由于未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丑)项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并且由于未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2 条为了受理目的，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宣称，因为提交人援用的文件和情节不足以证明有充足的理由可认为，一旦返回阿富汗，他会面临遭受违背第六条和第七条所列待遇的真正人身风险，因此，来文应宣布不可受理。关于案情，缔约国辩称，目前的来文并未显示出有违反《公约》的情况。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6.1 2011 年 5 月 4 日，提交人的律师承认，提交人并未就 2008 年 11 月 26 日移民事务法庭的裁决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她解释说，移民上诉庭是庇护案的最高上诉庭，上诉必须经申请同意后才可由该法庭对案件作出裁定。她还说，上诉申请获准率，占上诉申请案的百分之一到二，因此，一旦 2005 年 5 月 16 日移民事务法庭下达了裁决之后，国内补救办法就实际上用尽了。提交人的律师还称，当庇护案遭最终裁决之后，并在当事人被驱逐回原籍国之前，依据 2005 年《外籍人法》第 12 章第 19 节可无时间限制地提出，不论重复多少次的复审要

求。鉴于面临驱逐风险的寻求庇护者始终可以诉诸这种补救办法，因此，依据上述章节规定，可诉诸的法律补救办法永远也不会完全援用穷尽。

6.2 律师说，委员会应适当考虑到难民署的下述立场，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个人可能因其隶属社会的某个特定群体而面临风险，并坚称所提供的国别情况资料可佐证提交人的宣称。律师还通报，自 2010 年 3 月 31 日以来一直未与阿富汗境内的提交人取得联系。

### 缔约国的进一步陈述

7. 2011 年 7 月 5 日，缔约国致函强调，缔约国全面坚持其 2011 年 2 月 25 日意见，就本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所表达的立场。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提出的任何问题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确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至于缔约国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就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规定提出的论点，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提交人未就 2008 年 11 月 26 日移民事务法庭的裁决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移民事务法庭的该裁决驳回了提交人以其性取向为由提出复审案情的请求。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辩称，鉴于他面临即将执行的遣送，并认为所述补救办法不会有效用，而且移民上诉庭很可能会拒绝他要求暂缓执行，且不会批准他就“有效理由”作出狭隘解释的规定提出上诉的请求。缔约国反驳了上述论点，声称移民上诉庭有权裁定，是否可批准所要求的相关措施，以及是否允许复审有关提交人案情的裁决，因此，提交人未证明采取以向相关法庭提出上诉为表现形式的现有补救办法，是否无效或确为徒劳之举。此外，鉴于移民上诉庭关于“有效理由”的唯一裁决，并不涉及提交人性取向问题，他就不能断然称上诉庭会以何方式处置他的上诉，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法庭必须依案情逐一评估对“有效理由”概念的解释。

8.4 为此，委员会提醒地指出，参照委员会的案例，就所涉案情而论，只要所述司法措施有效而且提交人事实上可予以诉诸，就必须利用一切司法补救措施，以履行《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sup>5</sup> 尽管委员会确认，采取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的方式本可成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含义所指的有效补救办法，但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是在 2008 年 11 月 26 日移民事务

<sup>5</sup> 见，例如，第 1959/2010 号来文，Wasame 诉加拿大，2011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第 1003/2001 号来文，P.L.诉德国，200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6.5 段。

法庭的裁决通告提交人后不久便被执行了送回阿富汗的遣返，因此，事实上剥夺了他依据 2005 年《外籍人法》第 16 章第 10 节，从移民事务法庭下达裁决即日起后的三个星期之内向移民上诉庭提出相关上诉的权利。委员会认为，当面临被遣送至第三国的寻求庇护者仍可诉诸补救办法时，就必须让他们有合理长的时间诉诸剩余的补救办法，然后才可执行遣送措施，否则，这类补救即为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不啻为摆设的措施。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不妨碍对来文的审理。

8.5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为了受理目的，充分证明了依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提出的申诉。鉴于其它受理规定均得到满足，委员会认为，来文可受理，并着手审理案情。

###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来文进行了审议。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由于他的性取向，将他强行送回阿富汗，他会面临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风险，乃至生命危险。委员会提醒地指出，缔约国绝不可因引渡或驱回致使当事人面临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风险。<sup>6</sup>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移民事务主管机构给予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应有的考虑，但并不认为阿富汗境内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境况如此之糟糕，以至于仅为此情况本身就需要国际保护，而提交人亦未证明他若返回阿富汗即会面临遭受迫害的风险(见上文第 5.13 段)。为此，委员会回顾，通常应由《公约》缔约国的法庭来审议或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危险的事实和证据。

9.3 然而，就本案而论，委员会注意到，就委员会所收到的资料表明，缔约国的移民事务主管机构驳回提交人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提交人无可质疑的性取向以及性取向在阿富汗特定国情下对提交人影响的原因，而其依据的理由是有关性取向的宣称，是在庇护程序的后期提出的，对此，缔约国认为，尽管提交人阐述了他之所以直到后期才披露性取向问题的原因，即：针对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相关鄙视、耻辱感、出于怕招打击报复的担心，以及不知道性取向可成为申请难民地位和庇护的有效诉求，却大为贬损了提交人的信誉，并认为他不符合 2005 年《外籍人法》第 12 条第 19 节含义所列“有效理由”的标准。

9.4 缔约国认为，即使缔约国本身亦援引过一些国际报告称，阿富汗境内同性恋行为被列为可判处死亡极刑的“胡毒”罪，但缔约国认为，提交人返回原籍国

<sup>6</sup> 见委员会关于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问题的第 20 (1992)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第四十七届大会，大会正式记录，增编第 40 号(A/47/40)，附件六，A 节；和 2008 年 7 月 22 日就第 1494/2006 号来文，A.C.诉荷兰案，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8.2 段；2007 年 3 月 20 日就第 1234/2003 号来文，P.K.诉加拿大案，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7.2 段。

不会面临遭受任何酷刑的风险。委员会观察到，缔约国当局在对提交人返回阿富汗是否会遭受违背《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列待遇问题进行风险评估时，主要注重的是，提交人具体佐证事实的叙述前后不一致，以及由于到后期才宣称的性取向造成的信誉度低的问题。委员会认为，对于提交人宣称其性取向会在阿富汗国内引起的切实风险问题，未给予应有的充分程度的考虑。因此，委员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将提交人遣送回阿富汗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行为。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缔约国违反了他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提交人应享有的权利。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包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只要提交人本人愿意，即为之提供返回瑞典的便利。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约行为。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泛分发。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的个人意见

人权事务委员会就 X.诉瑞典案作出的《决定》第 10 段结论称，“缔约国违反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提交人应享有的权利”。委员会在 9.4 段中辩称，委员会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他在阿富汗境内可能面临的风险”的理由。换言之，仅仅因提交人若被遣送回该国，会冒着丧失生命的风险或较大可能性，就足以有理由认为直接违反了《公约》第六条。

我就此认为，与其它类似案情一样，委员会错误地运用了《公约》第六条的规定，该条在载明生命权的同时，亦清晰地阐明，“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委员会就此案采取的观点认为，鉴于他的性取向，提交人在阿富汗境内会面临丧失生命的风险——此风险却是缔约国未曾考虑到的，而正因为缔约国并未就此风险提出通常的外交保证要求——而就凭此风险，即足以裁定存在着违反第六条规定的现象，显然不啻扭曲了第六条的措辞，将之该条理解为“不得任意致使面临剥夺任何人生命的风险”。然而，这并不是第六条原本的含义，其原意清晰明确，没有半点含糊。只有“剥夺生命”才赋予其适用的理由，而仅因某人面临被剥夺生命的风险，不论其可能程度有多强多高，都不能成为得出直接违反本条款结论的理由。

由于本案情勿庸置疑地存在违反第七条规定的现象，因为，根据委员会的案例表明，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只是对人生理性质的迫害，而且也是心理性质的迫害，因此，本《意见》的正确措辞应该撰写成：“有鉴于本案，与第六条一并审议，存在着违反第七条规定的现象”。述及第六条是有道理的，因为提交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了可能遭死刑判决。

本人同意委员会《意见》的其它所有内容。

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签名)

[编撰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 第 1838/2008 号来文, Tulzhenskova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Maria Tulzhenskova(没有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8 年 10 月 27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因未遵守组织群众活动的法律规定而被罚款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限制言论自由, 包括传递消息的自由  
 《公约》条款: 第十九条第二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Maria Tulzhenskova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38/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2008 年 10 月 27 日来文提交人 Maria Tulzhenskova 系白俄罗斯国民, 生于 1986 年。她声称白俄罗斯侵犯了她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白俄罗斯生效。提交人没有律师代表。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 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 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由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和拉杰苏默·拉拉赫签署的两份个人意见附于本意见。

## 事实背景

2.1 2008 年 3 月 14 日，提交人散发有关即将在 Gomel 举行和平集会的传单。警方将她逮捕，提出报告，指控她违反《白俄罗斯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第 1 款，犯下行政罪行。该条款明确规定违反组织或举办集会、会议、示威、上街游行及其他群众活动程序应承担行政责任。提交人指出，《白俄罗斯共和国群众活动法》(以下称《群众活动法》)对组织群众活动做出了规定。根据该法第 8 条规定，在获准举行群众活动之前，其组织者及其他有关人员无权在大众媒体公布活动举行的日期、地点和时间以及印制和散发传单、海报及其他出于此目的的相关材料。由于提交人散发的传单涉及尚未批准的和平集会内容，警方认为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警方起草并向 Gomel 中央区法院转交了关于提交人犯有行政罪行的报告。

2.2 2008 年 3 月 17 日，Gomel 中央区法院根据《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第 1 款，判处提交人犯有行政罪行，并处以 350,000 卢布的罚金。<sup>1</sup> 法院特别指出，提交人在得到当局批准之前大肆宣传上述活动，因而违反了组织和举办群众集会的法令。提交人称，法院的推论完全以警方提供的报告为基础，未考虑限制其消息传递权的行为对实现《公约》第十九条所载任何合法目的是否必要。她称，法院的判决缺乏有根据的解释来作为法律依据，以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大众健康或公共道德需要、或出于对他人权利和名誉的尊重为理由，对她处罚金没有法律根据，因此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赋予她的权利。提交人还称，其关于对她处以行政处罚违法的论点得到委员会就 Laptsevich 诉白俄罗斯的第 780/1997 号来文中意见的支持。

2.3 提交人称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2008 年 4 月 11 日，Gomel 地方法院维持了中央区法院的判决，驳回提交人的上诉。2008 年 10 月 17 日，白俄罗斯最高法院院长驳回其依据监督复核程序提出的申请。提交人称，对其符合《公约》所载准则的行为，国家法院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她特别提请法院注意《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根据该条约的规定，须善意遵守条约条款，缔约国不得援用其国内法规定作为不遵守条约的理由。她还回顾，根据《国际条约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白俄罗斯加入为缔约国的国际公约属于国内法律的组成部分。

## 申诉

3. 提交人称，上述事实表明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享有的权利。她还称，《群众活动法》限制自由传递消息自由权的规定与白俄罗斯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相悖，因为所述限制不符合以下必要条件的规定：(a) 尊重他人

<sup>1</sup> 根据网上兑换率，这一数额在 2008 年 3 月 17 日(罚款日期)相当于 162.76 美元或 103.76 欧元。由于白俄罗斯卢布空前大贬值，现在(2011 年 10 月 10 日)这一数额值 62.25 美元或 46.53 欧元。

权利或名誉；(b)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众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她坚称，国内法律规定的必要条件违反《公约》第十九条，构成对其包括第十九条第 2 款规定的传递消息的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权不许可的限制。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2 月 19 日，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提供了意见。缔约国指出，2008 年 3 月 17 日，Tulzhenkova 女士被行政拘留，原因是根据《白俄罗斯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第 1 款，她违反了组织和举行群众活动的程序。根据 1997 年 12 月 20 日《群众活动法》第 8 条规定，在获准举行群众活动之前，其组织者及其他有关人员无权在大众媒体公布活动举行的日期、地点和时间、印制并散发传单、海报及其他出于此目的的相关材料。Tulzhenkova 女士在散发呼吁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召开群众集会的传单时，尚未接到可举行有关群众集会的许可。因此，根据国家法律规定，Tulzhenkova 女士受到行政处罚。

4.2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根据国内法律，Tulzhenkova 女士可就 Gomel 中央区法院的判决向最高法院院长提出上诉，也可向总检察长提出申请，要求他向最高法院院长提出异议。最高法院院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得再予上诉。依据《行政犯罪执行程序法规》第 12.11 条第 3 和第 4 款规定，自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可对已生效的行政犯罪判处提出异议，逾期不予受理。提交人未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诉，因此，她尚未用尽所有可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也没有理由相信提交人无从利用那些补救办法或补救办法无效力。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09 年 4 月 11 日的评论中指出，缔约国在其意见中没有说明为何在她有关发布举行和平集会的消息须事先获得批准的国家法律规定的个案中，限制其权利在《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意义内是准许的做法。不论立法机构的意图如何，如果对一项国家法律的适用结果导致了对受《公约》保护的人权或自由的限制或侵犯，该法律本身即违反《公约》。

5.2 关于缔约国声称她并未用尽所有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指出，根据委员会的判例，在某些缔约国，在根据监督程序对法院判决进行复核的决定取决于人数有限的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时，诉诸国内补救方法仅限于撤销原判的诉讼。提交人还回顾，她曾利用向白俄罗斯最高法院院长提出监督性复审申请的权利，但她没有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这一申请，因为这并非有效的补救办法。她还回顾称，根据人权委员会既往惯例，国内补救办法必须用尽的前提是这些办法既可适用又有成效。因此，一旦法院审理了她的翻案上诉，所有国内补救方法即已用尽无遗。

####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09 年 5 月 26 日，缔约国指出，《宪法》第 35 条保障人们有集会、聚会、街头游行、示威和组织纠察线的自由，但不得扰乱公共秩序和侵犯其他公民

的权利。举行此类活动的程序由法律规定。为此,《群众活动法》有关条款旨在创造条件,在街头、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举行此类活动期间,确保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缔约国进一步重申了此前提提交的报告(见上文第 4.1 段)中有关对提交人处以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并回顾称,Tulzhenkova 女士散发传单呼吁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举行群众集会时,尚未获准可举行群众集会,因此,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受到行政处罚。

6.2 缔约国还指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的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但《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言论自由权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

6.3 白俄罗斯共和国是《公约》缔约国,已将第十九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纳入其国内法律体系。按照《宪法》第 23 条的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为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时,才允许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实行限制。对《宪法》第 35 条的分析明确显示,该条款在规定保障公共活动自由权利的同时,对举行此类活动的程序确定了法律框架。目前,2003 年 8 月 7 日《群众活动法》对组织和举行集会、聚集、街头游行、示威及纠察线的规则作出了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以及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目的时,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才可能受到限制。因此,白俄罗斯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与其承担的国际义务并无抵触,这些限制旨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特别是就《白俄罗斯行政犯罪法》第 23.34 条和《群众活动法》第 8 条的规定而言。

###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7.1 在 2009 年 11 月 14 日信函中,提交人驳斥了缔约国的论点,即对她因违反组织和举办群体性活动程序而处以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并符合《公约》第十九条允许施行的限制规定。白俄罗斯有义务在其领土内尊重和确保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并按照其宪法程序和《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实施《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群众活动法》第 8 条规定的限制情况,即在获准举行群众活动之前,禁止在大众媒体公布活动举行的日期、地点和时间、印制并散发传单、海报及其他出于此目的的相关材料,不符合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的必需条件,因此每次适用这项条款时,其结果便违反《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

7.2 提交人不同意缔约国下述观点，即目前国内法律对言论自由权的限制规定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这些限制并不违反白俄罗斯承担的国际义务。如果国内法院将其行为定性为属于第十九条所载允许施行的限制范畴，缔约国的论点才成立。由于缔约国无法证明禁止准备和发布有关群众活动信息对第十九条第 3 款规定的法律根据之一必不可少，因此，根据《公约》第十九条规定，这类限制构成对其权利的侵犯。当缔约国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强加某些限制时，这些限制或许不会扼杀权利本身，但缔约国必须证明强制施加的限制对于实现合法目的之一是“有必要的”。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该案件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件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者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规定的必需条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未能向总检察长申请监督性复审，请求他向最高法院院长提出异议，因此，她并未用尽所有可以援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解释，即她要求申请了监督性复审，但遭白俄罗斯最高法院院长驳回，由于监督性程序不构成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因而她未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请。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其判例，认为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的监督性复审程序是取决于法官或检察官的酌处权的特别上诉途径，这类复审只限于复审法律问题。<sup>2</sup>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为可否受理的目的，委员会不排除审议来文。

8.4 委员会认为，为可否受理的目的，提交人已经充分证实了她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的规定提出的指称，也符合其它受理规定，因此委员会认为来文可以受理，并开始审议案情。

### 审议案情

9.1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双方所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sup>2</sup> 例如见第 1537/2006 号来文，Yekaterina Gerashchenko 诉白俄罗斯，2009 年 10 月 23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3 段；第 1814/2008 号来文，P.L. 诉白俄罗斯，2011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因其未按国内法律规定在有关活动获准之前即散发即将召开的和平集会的传单，被处以行政处罚一事对其受《公约》第十九条第2款保护的传递消息自由权构成非法限制。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辩词，即提交人因违反组织和举行群众活动程序受到行政处罚，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在本案中，委员会须根据第十九条第3款规定的标准审议对提交人言论自由权的限制措施是否合法。委员会指出，第十九条规定某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 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ordre public)，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委员会回顾，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个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些自由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它们是每个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基石。<sup>3</sup> 对行使这类自由加以限制必须符合关于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严格判断标准，“施加限制的目的仅限于明文规定的，并且必须与所指特定需要直接相关。”<sup>4</sup>

9.3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辩称，《群众活动法》有关条款旨在创造条件，在街头、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举行此类活动期间能确保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然而，缔约国未能具体说明，提交人分发传单提前传递消息会造成何种危害。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说明根据第十九条第3款规定的标准，对提交人判处罚款有法律依据。委员会因此作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2款应该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行事，认为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2款享有的权利。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甲)项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包括按2008年3月当月兑换率退回对提交人的罚款及其所支付的全部法律费用和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违约事件。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180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成白俄罗斯文，并以缔约国两种官方语言广为分发。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3</sup> 见委员会关于见解和言论自由的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第2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40号》(A/66/40, (第一卷))，附件五。

<sup>4</sup> 同上，第22段。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个人意见(同意)

1. 我同意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 Tulzhenskova 诉白俄罗斯违反《公约》第十九条(第 1838/2008 号来文)一案的决定, 该案涉及援引违反《白俄罗斯共和国群众活动法》第 8 条施加行政制裁, 根据该法第 8 条规定, 在获准举行群众活动之前, 其组织者及其他有关人员无权在大众媒体公布活动举行的日期、地点和时间, 或印制和散发传单、海报及其他出于此目的的相关材料。
2. 但基于下列原因, 我认为委员会还应作出结论, 判定缔约国还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委员会还应在其《意见》中表示, 缔约国应该修正其适用于提交人但与《公约》不符的法律。
3. 自担任委员会委员以来, 我就持下一观点: 认为委员会按照自己的意愿, 令人费解地将其权限限制在不考虑具体法律诉求, 而只确定是否违反了《公约》。假如事实明白显示存在违约行为, 委员会则可以而且必须——按照“法院知道法律”(“法院应了解法律”)的原则——审查案件法律框架。我在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一案部分持反对意见第 3 至 5 段中就阐述了法律依据和解释, 说明为什么这并不是说缔约国就处于不能辩解的处境, 我提及这些段落, 避免重复。<sup>a</sup>
4. 应当提到, 在 Tulzhenskova 诉白俄罗斯一案中, 提交人就援引对她适用的法律称: “国内法律的适用如果造成限制或违反《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则国内法律本身也许就违反《公约》”。

## (a) 违反《公约》第二条第 2 款

5. 缔约国任何部门, 其中当然包括立法部门或根据《宪法》拥有立法权力的其它部门, 除其它外特别是由于行为或不行为而承担国际责任。《公约》第二条第 2 款规定: “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 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 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虽然第二条第 2 款规定的义务属一般性义务, 但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可能造成缔约国须承担国际责任。
6. 所涉条款具有自动执行的性质。委员会在其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中正确地指出: “《公约》的一般性义务, 特别第二条规定的义务, 对所有缔约国都是有约束力的。政府的所有部门(执法、立法和司法)以及国家、地区或者当地各级的公共机构或者政府机构均应承担缔约国的责任。”<sup>b</sup>

<sup>a</sup> 见第 1406/2005 号来文, Anura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 附录: 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部分反对意见。

<sup>b</sup> 委员会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性法律义务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第 4 段,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 40 号》(A/59/40 (Vol.I)), 附件三。



7. 《公约》缔约国必须采取立法措施来实现各项权利，同样如果违反《公约》不采取立法措施，也承担第二条第 2 款所产生的消极义务；如果确实如此，缔约国本身便违反第二条第 2 款所规定的义务。

8. 白俄罗斯共和国于 1973 年 11 月 12 日批准了《公约》。从那时起，它已承担明确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采用适当立法或其他措施以落实《公约》(第二条第 2 款)所确认的权利，因此，有义务不采取侵犯《公约》规定权利的规范。此外，白俄罗斯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加入了《公约任择议定书》，从而承认委员会审议个人来文的权限。

9. 白俄罗斯共和国于 1997 年 12 月 20 日通过了《群众活动法》；这样做，无论该法是否已适用，均违反了《公约》。随后，提交人就对她适用《群众活动法》向委员会提交了诉求；委员会应在其意见中表明，缔约国不仅违反了第十九条，而且通过该项法律也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2 款。

10. 《群众活动法》对本案直接适用；因此，Tulzhenkova 一案中有关违反了第二条第 2 款的结论既不是抽象的，也不仅是具有学术价值。最后，委员会确定存在侵犯权利的情况对决定每一案件时也许作出的赔偿产生直接影响，这一点不应受到忽视。

#### (b) Tulzhenkova 一案的赔偿

11. 委员会的意见第 11 段不足以表明，“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违约事件再次发生……”，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如果缔约国不修订委员会认为违反《公约》的国内法律，将如何遵照委员会这部分意见去做？毫无疑问，委员会应当指出，白俄罗斯共和国应该修订有关的国内法(《群众活动法》第 8 条)，使其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义务。一项本身就不符合《公约》规定的法律，如保持其效力，这样作本身就不符合有关赔偿侵犯人权案件的现行国际标准。

12. 因此，委员会有必要在非金钱赔偿方面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尤其是补偿、满足和不再重犯的措施方面更应如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越清晰，缔约国就越容易遵守。

费边·萨尔维奥利(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委员会委员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的个人意见(同意)

我认为委员会的定论与来文的特殊情况(第 9.3 段)相关,即缔约国提供信息不足或没有提供信息,说明限制为什么是合理的,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也许是许可的。因此委员会认为,如提交人特别诉求的,她享有《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

显然,认定的侵犯权利情况源于法律的应用,该项法律没有明确说明,在没有证实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超越《公约》第十九条第 3 款(乙)项所许可的情况下,限制是不适用的。

我在 Adonis 诉菲律宾(第 1815 年/2008 号来文)一案的个别意见中解释了一些原因,我的看法是,如果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2 款要求审查该项法律,也许会平息我的同事萨尔维奥利对缔约国没有履行义务采取适当立法的关切。

我认为,在《意见》第 11 段中,如果能增加一项委员会在发现违约行为是由有问题或错误的法律造成的情况下通常会提出的请求,也许会有建设性和更为务实。为此,谨建议在《意见》第 11 段中包括一些诸如此类的内容,即根据第二条第 2 款,缔约国应审查其法律。

拉杰苏默·拉拉赫(签字)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T. 第 1847/2008 号来文, Klain 诉捷克共和国  
(2011 年 11 月 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Miroslov klain 和 Eva Klain(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6 年 3 月 16 日(初次提交)  
 事由: 以公民身份为由在归还财产问题上实行歧视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滥用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公约》条款: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三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Miroslov klain 先生和 Eva Klain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47/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Miroslov Klain 和 Eva Klain, 分别于 1927 年 8 月 25 日和 1937 年  
 2 月 24 日生于捷克斯洛伐克, 两人均已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现居住在美国坚合  
 众国。他们说, 他们因捷克共和国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  
 六条而受害。<sup>1</sup> 他们没有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1 条, 通过本决定时委员会委员杰拉尔德·纽曼先生没有参加。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特·特林先生签署的个人意见案文见本《意见》附录。

<sup>1</sup> 由于捷克共和国发出通知, 表示对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1991 年 3 月 12 日批准《任择议定书》的做法予以继承, 因此, 《任择议定书》于 1993 年 1 月 1 日对捷克共和国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及其两个子女于 1968 年 11 月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利坚合众国寻求避难。他们最后于 1978 年获得美国公民资格，因而根据 1928 年《入籍条约》，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资格。由于提交人是未经允许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因此他们受到缺席审判，分别被判处两年半和一年徒刑，财产被没收。1990 年，他们被彻底平反，但由于随后的第 87/1991 号财产归还法，他们无法要求归还其财产。提交人的财产有：一些动产，以及位于缔约国 Lhotka 土地清册区内的一处住宅(No.11)和建筑地块(No.1872 和 No.1873/2)。<sup>2</sup>

2.2 提交人无法根据捷克法律《第 87/1991 号法外退赔法》要求归还其财产。<sup>3</sup> 提交人说，他们并没有寻求任何国内补救办法，因为他们知道，除非他们恢复捷克公民资格，否则任何法院都不会命令归还其财产。因此，他们提出了申请，并最终在 2004 年底左右获得了捷克公民资格。提交人说，在宪法法院于 1997 年 6 月作出裁决<sup>4</sup> 之后，没有任何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可加以利用。

## 申诉

3. 提交人说，捷克共和国适用第 87/1991 号法律，因而违反了他们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该法规定，请求归还财产须具备捷克公民资格。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6 月 3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缔约国进一步确认了提交人陈述的事实，表示，提交人因在 1978 年 10 月 20 日取得美国公民资格而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资格，他们于 2004 年 6 月 29 日以声明方式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

4.2 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应当以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裁定来文不予受理。缔约国指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目的，在于使缔约国有机会在其面临的关于《公约》遭到违反的指称提交委员会审议之前，防止或纠正这些指称的违法行为。缔约国表示，提交人是在自购置之日起四十多年之后请求归还被没收的财产，如果提交人诉诸捷克法院，法院是会审查他们提出的关于遭受《公约》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歧视的指称

<sup>2</sup> 这处住宅的地址现已改为 Na dlouhe mezi 11/2, Lhotka 142 00 Praha 411。

<sup>3</sup> 捷克政府通过的《第 87/1991 号法外退赔法》，规定了归还在共产党统治下被没收财产的各项条件。根据这一法律，有权利要求归还其财产的人必须是，(a) 捷克公民，及(b) 捷克共和国的永久居民。申请人在提出归还申请期间，即 1991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1 日，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捷克宪法法院于 1994 年 7 月 12 日作出裁决(第 164/1994 号)，废除了永久居民这一条件，并为因此而成为权利人的人员设定了新的提交归还申请期限，即 1994 年 11 月 1 日至 1995 年 5 月 1 日。

<sup>4</sup> 见宪法法院 1997 年 6 月 4 日在 Jan Dlouhy 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作出的裁决。

的实质的。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寻求任何可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如诉诸各级法院直至宪法法院。因此，缔约国表示，应当宣布来文不予受理。

4.3 缔约国还认为，应当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以滥用呈文权而认定来文不予受理。缔约国提及委员会的判例，即《任择议定书》没有规定任何固定的期限，提交来文方面的延误本身并不构成滥用呈文权。不过，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是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提交来文的。缔约国说，这一日期距离财产归还法规定的期限终止日(根据宪法法院的解释，为 1995 年 5 月 1 日)已经过了将近 11 年。缔约国表示，考虑到提交人没有为拖延提出任何合理的理由，此种拖延是毫无道理的。缔约国还表示，在委员会审议的捷克共和国面临的类似案件中，委员会一名委员在他的反对意见中表达了看法，缔约国也持这种看法。这一看法认为，由于《任择议定书》没有对滥用呈文权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因此委员会本身需要对来文提交应遵守的期限作出界定。<sup>5</sup>

4.4 关于案情，缔约国提及委员会关于第二十六条的判例，该判例认为，基于合计和客观标准的差别待遇并不构成《公约》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被禁止的歧视。<sup>6</sup> 缔约国说，提交人未能遵守法律规定的公民资格要求，因此，没有资格根据现行立法要求归还其财产。最后，缔约国说，《公约》第二十六条并不意味着缔约国有义务对《公约》并不存在之时，在前一个政权执政时期出现的不公正现象提供补救。缔约国认为，缔约国的立法机构在判定它们试图处理的以往的不公正的实情以及采取何种补救办法方面，应当享有很大的酌处权。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7 月 16 日，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提出了评论。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说，1997 年 6 月，宪法法院作出裁决，裁定不向丧失捷克公民资格的人员归还财产的做法属于正当做法，在此之后，无法在缔约国采用有效补救办法。提交人还说，如果他们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就会白白支付律师费，因为据他们所知，法院没有在任何一起案件中判定，应当向捷克裔美国公民归还财产。

5.2 关于提交人没有及时提交来文，他们说，由于宪法法院关于公民资格和归还问题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因此他们认为，除非他们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否则就无法重新得到财产。为此，他们提出了公民资格申请，并在 2004 年底左右获得了公民资格。提交人说，在获得捷克公民资格一年零几周之后，他们就决定向委员会提交来文。所以，他们不接受缔约国关于提交人过了将近 11 年才提交来文的说法。

<sup>5</sup> 见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在第 1533/2006 号来文(Ondračka 和 Ondrackova 诉捷克共和国)中提出的反对意见。

<sup>6</sup> 例如，见第 182/1984 号来文，Zwaan-de Vrie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1 段至第 13 段。

5.3 关于案情，提交人认为，由于适用了以公民资格为由实行歧视的法律，他们要求全部归还财产的权利遭到了侵犯。他们认为，相关立法是非法而且违背宪法的。

###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 缔约国在未作任何详细阐述的情况下进一步表示，委员会应当基于属时理由宣布来文不予接受。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这一论点，即由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来文应当视为不予受理。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决定不采用他们可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此种补救办法旨在使法院能够联系《公约》第二十六条之下的不歧视规定，审理提交人提出的指称的实质。不过，委员会指出，必须用尽的，只是缔约国境内既可用又有效的补救办法。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由于国内最高法院已经就有争议的事项作出裁决，从而使国内法院的补救办法不可能奏效，因此，提交人无须为《任择议定书》的目的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此种补救办法事实上是徒劳无益的。<sup>7</sup> 委员会认为，在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作出第 185/1997 号裁决之后，归还财产取决于能否证明拥有公民资格。关于归还财产的第 87/1991 号法令规定了一个提出请求的期限，如宪法法院随后确认的那样，该期限到 1995 年终止。所以，可以认为，提交人在重新获得公民资格之后并无任何补救办法，因为，为了能够利用财产归还法，他们需要在 2004 年(他们取得捷克公民资格的年份)之前的某个特定时期取得公民资格。所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无法利用任何有效的补救办法。

7.4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来文应当视为不予受理，因为它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三条之下的滥用呈文权。缔约国说，提交人在宪法法院在解释财产归还法之时规定的期限之后将近 11 年才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因此，缔约国认为，鉴于提交人在向委员会提交来文方面出现了过度延误，而且缺乏合理的理由，应当以滥用呈文权为由宣布来文不予受理。然而，提交人将这一延误归因于为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而办理的手续，提交人说，捷克公民资格是追回财产的一个条件。因此，提交人说，在(于 2004 年)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之后一年零

<sup>7</sup> 第 1095/2002 号来文，Gomariz Valera 诉西班牙，2005 年 7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几周，他们就向委员会提交了来文，他们并没有像缔约国所认为的那样拖延了将近 11 年。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是从 1995 年开始计算延误时间的，这一年是为想要援引财产归还法追回财产的拥有捷克公民资格的个人规定的最后期限，这一期限是得到宪法法院裁决确认的。

7.5 委员会指出，《任择议定书》没有规定来文提交的期限，而且，提交前经过的时间，除了非常情况以外，本身并不构成滥用呈文权。<sup>8</sup> 显然，在判定何为过度拖延之时，必须根据本身的实情对每起案件进行裁决。在本案中，提交人于 1968 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之后被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资格。因此，在颁布财产归还法至 2004 年这一时期，提交人为美国公民。提交人说，之所以在提交来文方面出现拖延，是因为他们知道——缔约国似乎没有对此提出异议——除非他们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他们于 2004 年重新获得)，否则他们不可能追回其财产。

7.6 委员会指出，根据适用于委员会在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后收到的来文的新的议事规则第 96 条(c)款，委员会应当确定，来文并不构成滥用呈文权。原则上，滥用呈文权并非以提交出现拖延为由作出基于属时理由的不予受理决定的依据。不过，如果在来文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之后五年，或者凡属适当，在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结束之后三年提交来文，来文则可能构成滥用呈文权，除非有理由证明为何出现拖延，同时考虑到来文涉及的所有情况。与此同时，委员会适用其判例，该判例顾及认定存在滥用的情形的可能性，即在过了极长的时间之后才提交来文，同时又缺乏充足的理由。<sup>9</sup> 从本案的情况来看，委员会认为，考虑到提交人为了追回财产在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方面作了很大努力，而且尽管提交人作为捷克公民没有在国内采取任何行动，所涉拖延并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三条之下的滥用呈文权。

7.7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反对基于属时理由受理本来文。委员会提及先前的判例，认为，虽然没收财产发生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对捷克共和国生效之前，但是将不具备捷克公民资格的请求人排除在外的立法在《任择议定书》对捷克共和国生效之后，具有持续性后果，此种后果可能意味着歧视，从而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sup>10</sup>

7.8 在对受理本来文没有任何进一步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委员会宣布本来文可予受理——因为来文可能引起《公约》第二十六条之下的问题，并着手审议案情。审议案情。

<sup>8</sup> 例如，见第 1223/2003 号来文，Tsarjov 诉爱沙尼亚，2007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第 1434/2005 号来文，Fillacier 诉法国，2006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4.3 段；以及第 787/1997 号来文，Gobin 诉毛里求斯，2001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关于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6.3 段。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见第 1615/2007 号来文，Zavrel 诉捷克共和国，2010 年 7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8.6 段。

## 审议案情

8.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参照当事方向其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正如当事方所陈述的那样，对提交人适用第 87/1991 号法外退赔法是否构成歧视，从而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委员会重申其判例，即并非所有差别待遇均可视为第二十六条之下的歧视性待遇。符合《公约》的规定，基于客观、合理理由的差别待遇，并不构成第二十六条意义上的被禁止的歧视。<sup>11</sup>

8.3 委员会回顾在 *Des Fours Walderode* 一案中提出的意见<sup>12</sup>，即法律规定公民资格为归还先前被主管机构没收的财产的一项必要条件，属于对同为国家先前的没收行为受害者的个人作出的任意因而具有歧视性的区分，从而构成对《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违反。委员会认为，在以上案件和许多其它案件中确立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本来文提交人。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对提交人适用第 87/1991 号法之下的公民资格要求，侵犯了提交人在《公约》第二十六条之下的权利。

9.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情况。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在财产无法归还的情况下向提交人提供切实有效的补救，包括赔偿。委员会重申，缔约国应当审查立法，以确保人人都能享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11.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的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这些意见翻译成官方语文并广为散发。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11</sup> 见第 182/1984 号来文，*Zwaan-de Vrie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3 段。

<sup>12</sup> 第 747/1997 号来文，*Des Fours Walderode* 诉捷克共和国，2001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8.4 段。还见下列来文：第 586/1994 号，*Adam* 诉捷克共和国，1996 年 7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6 段；第 857/1999 号，*Blazek* 诉捷克共和国，2001 年 7 月 12 日通过的《意见》，第 5.8 段；第 945/2000 号，*Marik* 诉捷克共和国，2005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第 1054/2002 号，*Kriz* 诉捷克共和国，2005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第 1463/2006 号，*Gratzinger* 诉捷克共和国，2007 年 10 月 25 日通过意见，第 7.5 段；第 1533/2006 号，*Ondracka* 和 *Ondracka* 诉捷克共和国，2007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特·特林先生的个人意见(反对意见)

多数委员认定，来文应予受理。我对此持不同看法。我认为，来文应当视为不予受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裁决应修改如下。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依照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在《公约任择议定书》之下是否可予受理。

7.2 委员会认定，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目的，同一事项目前没有在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之下得到审议。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这一论点，即由于没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与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结合起来阅读)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此来文应当视为不予受理，因为提交人没有向本国主管机构提出相关问题。

7.4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未能用尽补救办法，提交人唯一的论点是，由于宪法法院 1997 年 6 月关于公民资格和归还财产问题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因此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徒劳无益。但是，提交人说，为了追回财产，他们于 2004 年获得了捷克公民资格。提交人表示，除非重新获得捷克公民资格，否则他们就无法使其财产得到归还。然而，从现有资料来看，提交人没有向任何捷克法院或其它国内机构提交任何此种请求，因而，提交人从未在任何国内程序中提出在归还财产方面受到歧视的问题。<sup>a</sup>

7.5 所以，出于以上段落陈述的理由，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未能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来文不予受理。

7.6 鉴于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提及缔约国关于提交人滥用呈文权和来文基于属时理由不予受理的论点。

8.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克里斯特·特林[签名]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a</sup> 见第 1515/2006 号来文，Herbert Schmidl 诉捷克共和国，2008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

U. 第 1853/2008 号来文, Atasoy 诉土耳其  
 第 1854/2008 号来文, Sarkut 诉土耳其  
 (2012 年 3 月 29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Cenk Atasoy (第 1853/2008 号来文)和 Arda Sarkut  
 (第 1854/2008 号来文)(由美利坚合众国律师 James  
 E. Andrik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土耳其

来文日期: 2008 年 12 月 8 日(第 1853/2008 号来文)和 2008 年  
 12 月 15 日(第 1854/2008 号来文)(初次提交)

事由: 依良心拒服兵役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 —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

《公约》条款: 第十八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分别由 Cenk Atasoy 和 Arda Sarkut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53/2008 号来文和第 1854/2008 号  
 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哈伊巴先生、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桑贝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由委员会 3 组委员分别提出的三份个人意见全文附于本意见：杰拉尔德·纽曼先生与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岩泽雄司先生和沃尔特·凯林先生联合提出；奈杰尔·罗德利爵士与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和克里斯特·特林先生联合提出以及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提出。

## 意见

1.1 本来文提交人是 Cenk Atasoy(第 1853/2008 号来文)和 Arda Sarkut(第 1854/2008 号来文),两人均为土耳其国民。他们自称是土耳其共和国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的受害人。提交人由美利坚合众国的 James E. Andrik 律师代理。《任择议定书》于 2007 年 2 月 24 日对缔约国生效。

1.2 2009 年 4 月 14 日,应缔约国的要求,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将来文可否受理问题与案情分开审议。

1.3 2010 年 7 月 5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4 条第 2 款决定,鉴于这 2 份来文所涉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极相似,决定就两份来文一并作出决定。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 Cenk Atasoy 的案件

2.1 Atasoy 先生是耶和华见证人教徒。2007 年 8 月 7 日,他向征兵办事处提出请愿书,解释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信徒,由于他的宗教信仰无法服兵役。2007 年 8 月 31 日的回函告知他,根据宪法第 10 和第 72 条和《兵役法》第 1 条,他不能免服兵役。2008 年 1 月 29 日,他通过他的大学,收到国防征兵事务部的一封信,通知他,他应于 2008 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之间办理兵役手续,并在 2008 年 4 月入伍。

2.2 2008 年 3 月 21 日,提交人到征兵办事处提交了另一份请愿书,重申他无法服役的理由。他解释称,基于同一理由,他无法参加定于 4 月 1 至 3 日举行的预备军官考试。提交人收到一份逃避入伍身份证明书,并被要求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至 31 日之间办理兵役手续,并在 2008 年 8 月入伍。2008 年 4 月 9 日,他收到了关于其 2008 年 3 月 21 日请愿的答复,其中重申根据宪法第 10 和第 72 条和《兵役法》第 1 条,他“无法免服国家兵役”。

2.3 2008 年 7 月 25 日,他前往征兵办事处就 2008 年 8 月的征召入伍一事提交了一份请愿书,重申无法服役的理由。提交人再次收到一份逃避入伍身份证明书,指出他必须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之间办理兵役手续,并在 2008 年 12 月应召入伍。他提出另一个请愿书,说明为什么他不能于 2008 年 12 月应召入伍,并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收到一封信,指出他无法免服兵役。提交人称情况将会是继续如此:他将继续被要求应召入伍,最终被监禁。2008 年 11 月 4 日,他被移送刑事法院,因为他未于 2008 年 4 月应召入伍。案件尚未结案。他还担心政府可能会写信给雇用他的公司,要求将他解雇。

2.4 在所有的请愿书中,提交人均表示,他可以从事不会与他的宗教原则相抵触的“公共”服务。他解释说,他已收到国防部的答复,他不能被免服国家兵

役。不过，他辩称，他并没有要求豁免服役；他只是说，他不能按国家要求的方式从事这种服务。

### Arda Sarkut 的案件

2.5 Sarkut 先生也是耶和華见证人教徒。2006 年 10 月 27 日，他开始在 Mersin 大学首饰和配件技术和设计学院担任助理讲师。2007 年 2 月，他前往 Mersin 征兵办事处提交一份请愿书，指出由于他的宗教信仰无法服兵役。此后，他每四个月一次到征兵办事处提交类似的关于国家征召的请愿书，说明为什么他不能服役。征兵办事处始终拒绝接受他的请愿，随后，提交人以挂号信件将副本寄到安卡拉国防部征兵局。

2.6 2007 年 4 月 6 日，Beşiktaş 征兵办事处发函 Mersin 大学，要求从 2007 年 7 月 31 日起解雇提交人，以便他能参加 2007 年 8 月的梯次应征入伍。大学还被要求不得重新雇用提交人，除非他提供征兵办公室的文件。大学若重新雇用他，会被指控除其他外犯有第 1111 号军法第 91、第 92 和第 93 条规定的罪行。结果是，提交人被迫从 2007 年 7 月 15 日起接受停薪留职。

2.7 2008 年 7 月，提交人收到 Mersin 大学的来信，指出大学对他尽管已得到服役的假期但未服兵役一事展开调查。2008 年 8 月 12 日，他发了一封信，说明他未服兵役的原因，并要求复职。2008 年 10 月，他收到大学的来信，说他因提供“假陈述”而被撤职。他致函大学表示反对解雇他的决定，2008 年 11 月 20 日，他收到了大学的来信表示，“不接受”他的反对。据提交人，大学不再雇用他担任教师，因为他依良心拒服兵役；国防部已经阻止他在支付“社会保障”的单位任职，他仍然失业，并由于诉讼而压力重重。

2.8 在所有的请愿书中(在他提交的来文时，约 20 件)，他可以从事不会与他的宗教原则相抵触的“公共”服务。他解释说，他已收到国防部的答复，他除其他外不能根据宪法第 10 条豁免国家服务。

2.9 两位提交人均提到和提供了军事最高法院关于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决定的副本，决定指出“被告辩护人说他由于宗教信仰不能服兵役，但根据《兵役法》第 35 和 47 条以及军事刑法第 45 条施加于被告的强制性兵役违反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 24 条规定的宗教和良心自由，被认为不合法、正当和正义。”<sup>1</sup> 鉴于最高军事法院的这些决定，提交人认为国内补救办法不会有效。

### 申诉

3.1 提交人申诉说，缔约国没有规定义务兵役的替代役，因此他们遭到刑事起诉和监禁，这侵犯了他们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

<sup>1</sup> 见最高军事上诉法院，安卡拉，第 2004/400 号原则和第 2004/396 令，2004 年 4 月 9 日。

3.2 提交人提到委员会 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第 1321/2004 和 1322/2004 号来文中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一案的意见，委员会在其中，依据与本来文所涉的相似事实，裁定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并要求缔约国必须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救济。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09 年 2 月 20 日来文中，对两件来文可受理表示质疑，理由是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至于提交人认为国内补救办法无法产生效力，缔约国辩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唯一例外是“不合理的拖延”，无效的证据并未被规定是例外情况。无论如何，缔约国还辩称，补救办法一旦用尽终究会产生效果的。

4.2 关于提交人称按照最高军事法院就 4 名耶和华见证人教徒依良心拒服兵役作出的决定，他们的案件并不必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论点，缔约国指出，2006 年关于《军事法院的建立和审判诉讼法》的第 353 号法业经修订，根据该法，在和平时期平民逃避《军事刑法》第 63 条规定的兵役的罪行应由民事法庭而不是由军事法庭审判。<sup>2</sup> 民事法庭的判决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4.3 根据缔约国，提交人逃服兵役案件的审判尚未结束。两位提交人的案件尚待 Beyoğlu 第一刑事庭(一审法院)审判，而所述第二位提交人还另外有一个案件待第二刑事庭审判。所述第一位提交人在 2008 年 11 月 4 日的审讯中说，他作为耶和华见证人教徒由于他的良心并根据他的信仰，他无法服役。他还认为，逃避兵役的指控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 9 条。第二位提交人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4.4 缔约国指出，国际条约对土耳其具有直接效力，一经批准即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土耳其加入的人权条约与关于同一问题的国内法相抵触时，应以国际条约规定为准。因此，Beyoğlu 第一刑事庭在诉讼期间将在适当考虑到《欧洲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情况下，审议提交人的论点。

4.5 此外，提交人如在一审法庭败诉，他们还可就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后者是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最高审判法院。一审法庭和最高法院依法均不受军事法院判例的约束，尽管案件案情可能相类似。根据缔约国，事实上最高法院和军事法院对类似案件持不同的意见。此外，民事法庭没有关于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判例。

<sup>2</sup> 见第 353 号法第 13 条，经修正为第 5530 号法，2006 年 7 月 5 日由《官方公报》颁布，2006 年 10 月 5 日生效：“第 13 条，和平时期平民触犯属军事刑事法庭管辖罪行的审判法院——和平时期平民触犯第 55、56、57、58、59、61、63、64、75、79、80、81、93、94、95、114 和 131 条所规定的属军事刑事法庭管辖罪行不由军事法院审判：这类人的审判应当由普通法院进行”。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6 月 26 日，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他们各自来文可否受理的论点表示质疑。他们均提供了他们审判情况的最新资料。2009 年 4 月 2 日，Beyoğlu 第一刑事庭判定两位提交人所触犯的是军事刑法第 63/1-A 条，而不是民法。<sup>3</sup> 所述第一位提交人被判处一个月有期徒刑，易罚金 600 里拉。对所述第二位提交人作出 3 项判决：前两项判决判处 1 个月有期徒刑，按每日 20 里拉的罚金计易为 600 里拉的罚金；第 3 项判决判处 4 个月的有期徒刑，按每日 20 里拉的罚金计，并按 100 天而不是 120 天计算，易罚金 2,000 里拉。根据提交人，民事法庭造成的情况可能会比如果他们由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们的刑罚易为罚金(低于 2,000 里拉的门槛)意味着他们不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虽然法院根据军法审判提交人，但刑罚是根据民事刑法判处的。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 1412 号法第 305 条在适用部分规定，“刑事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然而，判决罚金低于 20 亿土耳其里拉(即 2,000 里拉，根据最近货币升值估计)……和‘确定’的判决不能上诉”<sup>4</sup>。

5.2 两位提交人的刑罚均低于该门槛。事实上，所述第二位提交人声称，他 4 个月的有期徒刑的换算方式是故意要确保刑罚无法达到门槛，从而使他无法享有上诉权利。此外，提交人称，所有的判决都明确表明是“确定”的判决，这也是一个排除向最高法院上诉的可能性的标准。提交人目前唯一的选择是缴纳罚金或入监。然而，此事预计不会就这样结束，因为提交人无法避免地总会被再次要求服役，面对同样的指控、判刑和刑罚。由于这些原因，提交人认为，国内补救办法都已用尽，他们的来文应根据案情加以审议。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委员会于 2010 年 7 月 5 日审议了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规定，委员会必须确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6.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两件来文由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均不可受理，因为在来文提交委员会之时，提交人的案件仍然由民事法庭审理之中。此外，缔约国认为法院对提交人作出的任何不利判决均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来文提交以来，提交人就提供了资料，表示一审法院当时已

<sup>3</sup> 见军事刑法第 63/1-A 条——在平时时期，没有合理理由在其同梯队人员或朋友已遣送入伍后仍未报到的逃义务兵役者、逃兵役者或未登记[服役]者；被征召入伍的后备军人没有理由[未报到]，以及[在所有上述情况下]，同梯队人员已遣送入伍后：在 7 天内报到者最多应判处 1 个月有期徒刑；[在 7 天内]被捕者最多应判处 3 个月有期徒刑；在 7 天至 3 个月内被捕者应判处 4 个月至 1 年半有期徒刑；3 个月后被捕者应判处 6 个月至 3 年有期徒刑的重刑。

<sup>4</sup> 提交人提供的非正式译文。

审判他们的案件，并就每一案件作出了不利于他们的判决。委员会认为提交人还提供详细资料，说明他们未就任一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理由。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对提交人的论点提出质疑。由于这些原因，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委员会可以审议来文，被认为两件来文均可受理。

#### 缔约国对委员会可予受理决定和案情的意见

7.1 缔约国在 2011 年 2 月 4 日的普通照会中对委员会可受理的决定提出评论。它解释说，Atasoy 先生在 2008 年和 2010 年末应征入伍，由于这个原因，他被移送刑事法院，对他指控的若干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此外，根据司法部提供的信息，Beyoğlu 第二和第三刑事治安法庭在大多数案件中裁定释放提交人，提交人被判有罪的案件仍在等待最高上诉法院审理。

7.2 关于 Sarkut 先生，缔约国解释说，他没有参加 2007 年至 2010 年的征兵，由于这些理由，他被移送刑事法院；控诉他的一些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根据当时提供的资料，刑事法院在两个案件中已下令释放提交人，而其他三个案件仍待最高法院审理。

7.3 缔约国进一步重申其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并争辩说，宪法法院在 2006 年和 2009 年作出的决定中，宪法法院认为《刑事诉讼法》第 305 条第 2 款(1)项与宪法相抵触，因此，被判处低于 2,000 里拉罚金的个人可提出上诉。

7.4 关于案情，缔约国重申，根据《宪法》第 72 条，服兵役是义务性的：“履行国家服务是每一个土耳其人的权利和义务。从事这项服务的方式或如何才被认为已履行，无论是在武装部队服役或在公共部门服务，应由法律规范”。此外，《宪法》第 10 条规定，在法律面前，所有个人不分语言、种族、肤色、性别、政治意见、哲学信仰、宗教，教派或任何这样的考虑都是平等的，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有义务确保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平等。任何个人、家庭、团体或阶层都不得享有特权。国家机关和行政当局在所有运作中应当遵守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宪法》第 18 条保障良心、宗教信仰和信念自由。

7.5 根据缔约国的宪政制度，宪法的所有条款具有同等分量，不分层次。条款是相互符合，相辅相成的；每一条款应与其他条款一并解读。因此，将《宪法》第 72、第 10 和第 24 条一并解读意味着，良心、宗教信仰和信念自由的行使不能超过服兵役的义务，因为不可以相互抵触或相互违反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规定。同样，第 10 条保证个人不受歧视地享受平等，禁止个人或团体以违反其宗教信仰为借口不服兵役。

7.6 《兵役法》规定男性公民年满一定的年龄后即须服兵役。即使根据暂定办法服兵役的个人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因此，根据法律，以良心为由拒服兵役是不可能的，根据缔约国，这个问题属于国内当局的评估范围。

7.7 根据缔约国，《公约》第十八条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它不提供任何拒服兵役的默认或明示担保。缔约国提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条约应

“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缔约国认为，根据《公约》的目标和宗旨用普通的含义来考虑《公约》第十八条，其中并没有任何内容可以被解释为其规定明确表明“有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或从中可以引申出这种权利。即使在辩论上，可以假设该条的文字和精神是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的，研究《公约》的筹备文件(准备工作)，确认起草人从未有意在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权利的范围制定一个单独的和绝对的“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事实上当时许多起草国是实施义务兵役制的。

7.8 根据缔约国，《公约》第十八条与第八条第 3 款(丙)项(二)目一并解读，一点都没有含糊的地方，因为后一规定明确指出“在承认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国家”。缔约国争辩说，如果起草人打算在第十八条之下制定一项“依良心拒服兵役”的独特和绝对的权利，以便根据这样的理解，义务兵役制将被视为“违反这项权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在第八条下见到这种矛盾的提法，即明确接受在不承认依良心拒服兵役时采取这种做法。在一个条款中，起草者的意图是禁止义务兵役制，而在另一条款中其用意是给与义务兵役制以合法性或至少是普遍承认这种做法，但又没有表示有必要促使第十八条和第八条保持一致，这种解释法是不一致的。如果假设起草者的意图是宣布义务兵役制违反“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那么人们可以合理地挑战为什么另一条款规定，可承认某些国家作为强迫或强制劳动的例外情况认可这种“违反”。

7.9 缔约国接着解释说，条约的条款之间不一致的解决办法是在其规定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以便使缔约国能够明确了解自己的义务。然而，在本案中，第八条明确表示，某些国家可能不承认依良心拒服兵役，但这种做法绝不会被视为违反《公约》的任何其他规定。第八和第十八条是相互一致的，因为后者并没有设想“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根据缔约国，任何其他解释均超越条约法现行规则所允许的范围。

7.10 为了论证，缔约国解释说，可以认为，第八条并没有排除将依良心拒服兵役作为一种国家行为，但是，肯定并未承认依良心拒服兵役是一项“权利”，同时明确并没有将国家实施的义务兵役视为非法，因而“侵犯”这种“权利”。根据缔约国，如果起草者的意图是在第十八条禁止义务兵役制，人们可以预期他们会以如下措辞加以明确禁止：“不得强迫任何人违反他们的思想、良心或宗教服兵役”。

7.11 根据缔约国，第八和第十八条的目标和宗旨从它们的普通含义来看是明确的。无法将其解释为义务兵役制“违反”不明确的“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缔约国认为，相反的主张违反《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关于解释的习惯规则。缔约国认为，鉴于《公约》其他规定承认兵役，这种违反《公约》“隐含的权利”的主张根据国际法构成“权利滥用”。此外，一方面像《公约》一样的核心条约制定一项权利(第十八条)，并预测某些国家会承认；同时另一方面，又允许其他国家可以不承认该项权利(如第八条的规定)会违反人权法的基本原则。根据缔约国，这种不一致的做法侵犯了人权普遍性的根本原则。



7.12 缔约国还说，本来文不应只根据《公约》第十八条加以评估，因为第八条提到“依良心拒服兵役”。根据《维也纳公约》，在解释条约条款时，应适当考虑到解释的目的的背景，其中应包括“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

7.13 缔约国承认，对条约规定的理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变”，这是可接受的，但这种“不断演变的解释”是受到限制的，当代对某一条款的解释不能忽视条约所写入的内容。解释不能超越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或缔约国最初的明确意图。在本案中，很明显，《公约》第八条的起草人承认在某些国家服兵役是强制性的，依良心拒服兵役可能未获承认。如果未来，鉴于情况已发生变化，《公约》缔约国要促使《公约》第八和第十八条取得一致，它们应该相应修订《公约》；之前，对约文的任何解释应忠于其文字和精神。

7.14 根据上述意见，缔约国认为，《公约》并未赋予“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即使是含蓄的，缔约国没有义务承认这项权利。因此，如《公约》所承认的，服兵役不能被视为“侵犯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

7.15 缔约国认为，在本案中，即使假设提交人的信仰表示已受到限制，但应当指出，提交人被判刑唯一理由是他们坚持不遵守兵役规定。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反对履行任何种类的军事职责。此外，根据《公约》第十八条第3款，民主社会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实施一些限制可能是必要的。因此，缔约国有权利和义务，以一种免服兵役不会捣乱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方式来评估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是否应受到限制。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8.1 提交人于2011年3月23日提交了他们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首先，他们通知委员会，他们的情况未改变，他们继续被起诉，因为他们拒绝服兵役。当时，Atasoy先生因3次征兵被起诉，他还须在法庭上为另外6个征兵梯次为自己辩护，总数为9个。Sarkut先生因6次征兵被起诉，必须在法庭上为另外6次征兵梯次为自己拒绝入伍进行辩护，总数为12个。由于军事人员于2008年11月向他的雇主所下的命令，Sarkut先生失去了他的教职；在他服兵役之前，此命令仍然有效。根据提交人，当局和法院事实上并不可能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永久免除他们服兵役，即使他们愿意执行任何其他公共服务作为备选办法。

8.2 关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提交人指出，2009年7月23日宪法法院决定可就低于2,000里拉的罚金提出上诉。这一决定是在2009年10月7日的《官方公报》上公布，并于2010年10月7日生效。此外，2010年10月7日之后，只可对此日期后判定的罚金提出上诉。即使最高法院对关于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罚金的上诉进行审理，也不可能合理地期望提交人将可免服兵役，或获得可接受的替代公共服务。因此，即使最高法院接受提交人对他们的罚金的上诉，用尽这些补救办法最后仍然还是会无效。

8.3 关于缔约国认为《公约》并没有规定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的论点，提交人回顾，虽然委员会初步作出结论，《公约》第十八条并没有规定这一权利，<sup>5</sup>对《公约》的解释此后已发生演变，目前委员会的立场是，对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进行不合理限制，相当于违反第十八条。提交人指出，这个立场已经在委员会就若干个人来文作出的决定和关于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权利(第十八条)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中获得确认，并且也是联合国其他机构的立场。<sup>6</sup>提交人认为，上述资料在这方面对缔约国的论点提供了一个适当的答案。

8.4 至于缔约国关于免服兵役会威胁到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看法，提交人称，他们无法想象他们如何能构成这种威胁。他们还说，诸如丹麦、以色列、荷兰、挪威、俄罗斯联邦或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家都制定了承认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法律，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也适用。因此，他们认为，缔约国的论点没有依据，因为目前在缔约国入伍军人中依良心拒服兵役者所占的比例不到 1%，很难设想如此小的比例如何可能构成威胁。

### 考虑是否重新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9.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案件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之中，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这就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9.2 就本案的情况而言，委员会认为，不需要重新考虑其 2010 年 7 月 5 日的可受理决定，并决定对来文案情进行审议。

### 审议案情

10.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参照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10.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由于缔约国没有义务兵役替代制度，因此他们依《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其结果是，他们未服兵役而受到刑事起诉，Sarkut 先生因而失业。委员会还指出缔约国未直接处理这一问题，而是解释第十八条本身未制定“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缔约国还援引第十八条第 3 款，宣称民主社会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实施一些限制是必要的。

<sup>5</sup> 见第 185/1984 号来文，L.T.K.诉芬兰，1985 年 7 月 9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

<sup>6</sup> 提交人除其他外提到第 1321-1322/2004 号来文，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593-1603/2007 号来文，Jung 等人诉大韩民国，2010 年 3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666/1995 号来文，Foïn 诉法国，1999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以及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特别是第 11 段；人权委员会 1971 年至 2004 年就依良心拒服兵役问题作出的若干决议和大会关于此事项的工作。

10.3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关于《公约》第八条的论点，即“在承认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国家中”，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国家服务不构成强迫或强制劳动。委员会回顾在其就第 185/1984 号来文，L.T.K.诉芬兰一案作出的不可受理的决定中，它确实认为这句话加强了第十八条未具体赋予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然而，自那时以后，委员会确认这句话在不同的上下文被拐弯抹角地使用“既不承认也不排除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sup>7</sup> 因此并不违背《公约》保障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必然后果。

10.4 委员会因此回顾其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在该意见中，委员会认为，第十八条第 1 款所载自由的根本性质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如《公约》第四条第 2 款所述，即便是在公共紧急状态下，也不许减损这一规定。虽然《公约》没有明确提及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但委员会认为，从第十八条可以推出这项权利，因为涉及使用致命武力的任务可能与良心自由严重冲突。<sup>8</sup> 委员会认为，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属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的一部分。它赋予个人在义务兵役与其宗教或信仰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被免除义务兵役的权利。这项权利不应当因强迫而受到损害。国家如果愿意，可要求拒服兵役者在军事领域之外和不受军队指挥的情况下服替代民役。替代役不得具有惩罚性，而应是在真正地为社会服务，符合尊重人权的原则。<sup>9</sup>

10.5 在这两个案件中，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拒绝应征服义务兵役的做法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点未被质疑，他们是真正信奉这些信仰的。委员会认为，随后起诉提交人和将他们判刑侵犯了他们的良心自由，违反了《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委员会回顾，镇压因其良心或信仰而不可能使用武器的个人拒服义务兵役，违反《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sup>10</sup>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作出结论，认为现有事实表明，在每个提交人的问题上，都存在土耳其共和国违反《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的情况。

12. 按照《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包括删除其犯罪记录，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赔偿。缔约国有义务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反《公约》的情况。

13.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所

<sup>7</sup> 见第 1321-1322/2004 号来文，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委员会注意到，在委员会作出解释之后，欧洲人权法院随后就《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4 条的类似措辞达成了类似的结论：见 Bayatyan 诉亚美尼亚，第 23459/03 号申请，2011 年 7 月 7 日的判决，第 62 至 64 段；另见 Erçep 诉土耳其，第 43965/04 号申请，2011 年 11 月 22 日的判决。

<sup>8</sup> 例如见，第 1642-1741/2007 号来文，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同上。

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将其译成缔约国所有官方语言和广泛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一. 委员会委员杰拉尔德·纽曼先生与委员岩泽雄司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和沃尔特·凯林先生联合提出的个人意见(赞成)

我同意委员会关于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八条的结论，但我以稍有不同的思维达到这样的结论。在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一案中，<sup>a</sup> 委员会解释说，因拒服兵役而对依良心拒服兵役者进行惩罚相当于对表示他们的宗教或信仰的能力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3 款的规定，并只有被证明根据第十八条第 3 款含义内的有效目的是必要的才可实施。在本案中，鉴于土耳其的具体事实情况，我进行同样的分析：缔约国并未确认任何实证理由，说明为了《公约》所列的合法目的之一有必要拒绝通融依良心拒服兵役。

多数委员采取不同的方法，委员会于 2011 年 3 月在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一案<sup>b</sup> 中首先采用。委员会将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视为直接属于良心自由权，未审议其必要性。事实上，委员会关于第十八条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指出，良心自由与表示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不同，它是无条件地受到保护的，不得受到任何限制。<sup>c</sup> 我仍然认为，多数委员就依良心拒服兵役采取的做法是错误的。

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是“广泛范围内的行为”<sup>d</sup> 之一，包括通过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宗教或信念的自由。这种拒绝行为所涉的不仅保持某种信仰，而且还包括通过从事由信仰促成的行动来表示信仰的权利。《公约》第十八条确实允许对这种自由实施，但须满足第 3 款所规定的标准相当高的理由。在本案中，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提供处理依良心拒服兵役的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是将维持信仰当作是受到绝对保护的权利。多数人也未澄清在这方面依良心拒服兵役如何能够与基于宗教理由请求豁免履行法律义务的诉求区分开。

<sup>a</sup> 第 1321-1322/2004 来文，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我注意到欧洲人权法院大多数人随后引述的案件采取与 Yoon 和 Choi 一案相同的思维：见 Bayatyan 诉亚美尼亚，第 23459/03 号申请，第 112 段和 Ercep 诉土耳其，第 43965/04 号申请，第 49 段。

<sup>b</sup> 第 1642-1741/2007 来文，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其中我加入了委员会委员岩泽雄司先生等人的个人意见。

<sup>c</sup> 关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48/40)，附件六，第 3 段。

<sup>d</sup> 同上，第 4 段；另见第 1876/2009 号来文，Singh 诉法国，2011 年 7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至 8.4 段，关于基于宗教理由用免冠身份照片的规定。

我承认，大多数人思维狭隘，无法扩大绝对保护以宗教为动机的行动和不行动的论点。我也承认，多数人的方法并没有导致本案产生不恰当的结果。尽管如此，我认为，分析的错误很大，委员会还没有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新方法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我还是愿意采用以表示宗教或信仰自由为依据的早期做法。

[提出时有英文(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二. 委员会委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与委员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联合提出的个人意见(赞成)

委员会在解释认定依良心拒服兵役问题的本案和以前的案件违反《公约》第十八条时——如在处理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sup>a</sup> 案件的做法——未提到《公约》第十八条第 3 款规定可对表示宗教或信仰施加的限制，委员会在上述意见第 10.4 段中称，“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属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的一部分。它赋予个人在义务兵役与其宗教或信仰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被免除义务兵役的权利。这项权利不应当因强迫而受到损害”。

我的理解是，这一演变的思想是，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包含着不表示和表示一个人真心实意的信仰的权利。只规定义务兵役，没有规定可能替代兵役的民役意味着，一个人可能被剥夺选择是表示或不表示他或她真心实意的信仰的权利，因为为了履行法律义务，他只好或者违法或者从事违背信仰的行动，在这方面，可能需要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

当然，还有一个人可能会被迫表示自己真心实意的信仰的其他情况。例如，义务兵役制度关于依良心拒服兵役的规定，可能要求希望利用替代服务的人申报使他可以有权选择这种服务的信仰。这里的区别是，该人为遵守法律必须这样做，才能当然避免被置于可能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的境地。

一如纽曼先生的个人意见和加入其意见的其他同事所指出的，还有可能出现以宗教或其他真心实意的信仰为由要求豁免履行其他法律义务的情况，依良心拒服兵役必须与其他这种诉求区分开。为本案的目的，典型的例子是要求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付自己应承担的部分的缔约国军费税。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可能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区别在于，害怕参与共谋剥夺性命的程度至少并不是明显的。我还认为，委员会先前就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sup>b</sup> 一案采取的办法未就如何区别依良心拒服兵役和类似的拒付军费的情况，或就此事项，以依良心为由遵守其他法律义务的情况提供指导。

此外，根据第十八条第 3 款分析是否违反也缺乏一定的现实依据。依赖该条款所涉的问题是，该条款所设想的社区利益可能高于个人的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利益。这种情况与我们所有拒服兵役的现象的经验不同。正是在武装冲突时期，有关的社会的利益最有可能受到最大的威胁，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才最需要受到保护，最有可能被援引，并且在实践中最有可能不受尊重。事实上，我从未认为委员会利用对第十八条第 3 款的分析，阻止某人援引依良心拒服兵役为法律责任做辩护。

<sup>a</sup> 第 1642-1741/2007 号来文，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

<sup>b</sup> 第 1321-1322/2004 号来文，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

我认为，关键问题并不仅在于第十八条，而是有第十八条影子的关于生命权的第六条，生命权自始就被委员会形容为“至高无上的权利”。<sup>c</sup> 诚然，在武装冲突(或其他情况)中并不是所有剥夺人的性命的行为都被认为违反第六条，而且剥夺生命(杀戮)与剥夺生命权并不相同。但是，该项权利的价值——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将其置于与《公约》所保护的其他重要的人类价值不同的视野中。

《公约》第十八条第 1 和第 2 款完全确认了这点；第 3 款不得不部分加以确认。拒绝杀戮的权利必须完全加以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较不适合以第十八条第 3 款作为其决定的依据的原因。

[提出时有英文(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sup>c</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6 号一般性意见(1982)，第 1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37/40)，附件五。



### 三. 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提出的个人意见(赞成)

1. 我赞成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第 1853/2008 和 1854/2008(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来文的决定以及委员会意见中提出的论点，论点巩固了第 1642-1741/2007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号来文所决定的关于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的极其重要的判例，后一决定是在 2011 年 3 月 24 日这一历史时刻通过的。委员会继续进行辩论，并作出了关于 Atasoy 和 Sarkut 案件的决定，该案是本分析的主题，促使我更详细地列出我的立场。
2. 有必要澄清，上述案件的决定是限于参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依良心拒服兵役作出的决定。委员会的意见并未处理其他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情况以及处理依良心拒服兵役是否符合《公约》的问题，因为委员会在其判例中无机会就此提出立场，<sup>a</sup> 因此在关于其他主题的个人来文中推测其立场是不适宜的。
3.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其他可能性如何——我认为，义务兵役制的本质及其与使用武力的关系是值得委员会关注的主题，一如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在关于 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的来文的个人意见最后两段所精湛解释的。
4. 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的概念在国际人权保护的框架内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发展，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于委员会的判例和意见中，必须将《公约》作为活文书来适用和解释。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最有远见的理论家同意，法律文书是动态的，并随着执行机构对它们的解释而发展，这本身反映了国际人权法的进展，并提供由其他组织和机构所使用的解释。依良心拒服兵役发展成一项人权是人权事务委员会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机关之间具有成效的互动的一个明显例子。
5. 前人权委员会第 1989/59 号决议确认人人有权依良心拒服兵役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正当行使。<sup>b</sup> 委员会随后在若干建议中保持这一立场，确认依良心拒服兵役源自良心的原则和理由，包括源自宗教、伦理、人道主义或类似动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sup>c</sup> 1998 年，委员会请联合国秘书长从各国政

<sup>a</sup> 应指出，委员会宣布不可受理的唯一这种案件涉及一位请愿人拒绝付相当于加拿大分配给军费的某一百分比的税。委员会指出，“虽然《公约》第十八条确实保护、保持、表示和宣传主张和信仰的权利，包括依良心反对军事活动和军费，但依良心拒纳税显然超出该条保护的范畴”(第 446/1991 号来文，J.P.诉加拿大，1991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意见》，第 4.2 段)。

<sup>b</sup> 人权委员会第 1989/59 号决议，1989 年 3 月 8 日通过，第 1 段。之前委员会于 1987 年 3 月 10 日通过了第 1987/46 号决议，其中呼吁各国确认依良心拒服兵役应被认为是合法行使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sup>c</sup> 人权委员会第 1995/83 号决议，1995 年 3 月 8 日通过(序言部分，倒数第 2 段)。另见人权委员会第 1998/77 号决议，1998 年 4 月 22 日通过，第 1 段。

府、专门机构和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收集关于这一方面的最近事态发展的资料，并提交一份报告，<sup>d</sup> 秘书长在 1999 年提交了报告。<sup>e</sup>

6. 人权委员会消除一切形式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数次探讨了这一问题；这一任务的第一位负责人安热洛·维达尔·达尔梅达·里贝罗制定了一套关于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问题的标准。<sup>f</sup> 后一位任务负责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强调，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是一项与宗教自由密切有关的权利，并表示支持人权委员会的意见<sup>g</sup>。

7. 人权理事会继续延长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前任特别报告员阿斯玛·贾汉吉尔在她 2007 年的报告中指出，许多个人声称，自己有权拒绝服兵役(依良心拒服兵役)，并说这种权利来自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sup>h</sup> 所有这些报告，当然都已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目前的任务负责人海纳·比勒费尔特在其报告中还说明他对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的立场，包括在他的国别访问报告，如 2012 年对巴拉圭的访问报告中加以说明。<sup>i</sup>

8. 所有文书都明确提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和人权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人权理事会在这一领域一直遵循“逐渐发展”的道路，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一原则贯穿整个国际保护领域。

9. 虽然在 Muhonen 诉芬兰一案中，来文提交人指称，由于他以伦理为由，依良心拒服兵役的事情，《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遭到违反，但委员会并未就此表示意见，因为委员会认为由于提交人已在缔约国获得补救来文不可受理，缔约国承认他所诉求的权利。<sup>j</sup> 随后不久在 1985 年，委员会就 L.T.K.诉芬兰一案作出了决定，其中委员会认为：“《公约》没有规定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第十八和第十九条都不能被接受为意味着这项权利，特别是在考虑到第八条 3 款(丙)项(二)目的情况下。”<sup>k</sup> 然而，委员会在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中强调，“《公约》没有明确提到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但是委员会认为，就使用致死力量的服兵役义务可能严重抵触良心自由和表示自己宗教或信仰的权利来说，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可以从第十八条找到依据”。<sup>l</sup>

<sup>d</sup> 人权委员会第 1998/77 号决议，1998 年 4 月 22 日通过，第 10 段。

<sup>e</sup> 秘书长根据委员会第 1998/7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E/CN.4/2000/55)。

<sup>f</sup> 秘书长关于消除一切形式宗教不容忍现象的报告(E/CN.4/1992/52)，第 185 段。

<sup>g</sup> 消除一切形式宗教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的报告(A/52/477)，第 77 至 78 段。

<sup>h</sup> 人权理事会，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HRC/6/5)，第 22 段。

<sup>i</sup> 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对巴拉圭的访问(A/HRC/19/60/Add.1)，第 56 段。

<sup>j</sup> 第 89/1981 号来文，Muhonen 诉芬兰，1984 年 4 月 6 日通过的《意见》(可受理的决定)。

<sup>k</sup> 第 185/1984 号来文，L.T.K.诉芬兰，1985 年 7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5.2 段。

<sup>l</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1993)，第 11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48/40)，附件六。

10. 2006 年, 在 Yeo-Bum Yoon 和 Myung-Jin Choi 的案件中, 委员会一并审议了两位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者的案件, 委员会称“只能根据《公约》第十八条评估本申诉, 而对第十八条的理解和对《公约》中的任何其他保障的理解一样,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其文字和宗旨引伸而来的”(着重部分是加上的)。<sup>m</sup> 委员会因此认为, 在本案中缔约国未表明在《公约》第十八条第 3 款的含义的范围内限制是“必要的”。根据这一推理方式, 委员会仍接受实施义务《兵役法》, 这种法律允许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表明一个人的宗教或信仰实施所需。<sup>n</sup>

11. 最后, 委员会关于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sup>o</sup> 的案件和关于 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的本案的判例是迄今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依良心拒服兵役问题的最重大的发展。

12. 事实上, 毫无疑问, 委员会现在认为, 良心和宗教自由(《公约》第十八条)包括依良心拒服兵役义务的权利, 这是与过去的做法差别很大。对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和 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的案件的决定进行分析无法得出其他结论: “依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属于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的一部分。它赋予个人在义务兵役与其宗教或信仰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被免服义务兵役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当因强迫而受到损害。”<sup>p</sup>

13. 正是因为委员会确认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属于依良心拒服兵役的一部分, 本事项才不能根据第十八条第 3 款处理。目前根据《公约》已没有可以迫使一个人服兵役的任何限制或可能性。

14. 委员会还明确规定了缔约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必需满足的关于提供替代兵役的民役的要求: “国家如果愿意, 可要求拒服兵役者在军事领域之外和不受军队指挥的情况下服替代民役。替代役不得具有惩罚性。它必须是真正地为社会服务, 符合尊重人权的原则。”<sup>q</sup> 因此, 任何人均可选择服满足这些要求的民役。

15.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规定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包括人人维持或改变他的信仰的自由以及表示这些信仰的自由。要求一个人违反其意愿服兵役侵犯了良心和宗教自由的两个方面; 这种推理导致委员会将依良心拒服兵役归类为属于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的一部分(这里我所指的是依良心

<sup>m</sup> 第 1321-1322/2004 号来文,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 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 第 8.2 段。

<sup>n</sup> 从委员会关于 1321-1322/2004 号来文,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的意见第 8.4 段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点。索拉里·伊里戈达先生在反对意见中表示, 他认为根据第十八条第 3 款审理本案不当; 委员会应完全按第十八条第 1 款审理本案。

<sup>o</sup> 第 1642-1741/2007 号来文,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 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

<sup>p</sup> 同上, 第 7.3 段(摘自委员会关于 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的意见第 10.4 段所引)。

<sup>q</sup> 同上。

拒服义务兵役，不是委员会在本案中未表示立场的其他依良心拒服兵役的可能形式)。

16. 在本案中，必须讨论的不是《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是否遭到违反：关于这点已有共识。而是缔约国的解释是否须符合第十八条第 3 款的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义务兵役阻碍依良心拒服兵役者享有维持或改变他的信仰的自由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 2 款禁止这种情况，根据该款，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

17. 一些委员的立场是，委员会关于 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和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两案的意见未能充分解释其新方法。<sup>r</sup> 我对此表示所有应有的尊重，但鉴于我提出的理由充分的个人意见所载的上述理由，我必须强烈反对这一立场。事实上，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在 21 世纪 20 年代保持以往的做法是合理的。根据老办法，缔约国可以找到理由强迫一个人使用武器，卷入武装冲突，可能被杀害，更糟的是杀人，而又不违反《公约》。这怎么可能与一个因其哲学或宗教信仰而依良心拒服兵役的人的良心和宗教自由取得一致(不论他们是否享有表示这些信仰的自由)？

18. 委员会在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一案中，就《公约》第十八条第 3 款称，“这种限制不得影响有关权利的实质本身”。<sup>s</sup> 依良心拒服兵役也涉及哲学信念或宗教信仰的表示。我要进一步提出一个论点，这一论点绝不与前两段的说法相矛盾，即服义务兵役绝不能被视为是《公约》第十八条第 3 款允许的限制，因为这种所谓的“限制”是不存在的：它的目的是完全取消这项权利。委员会对一个人表示信仰或宗教自由可能施加的限制的评估将适用于其他可能的依良心拒服兵役案件，但绝对不适用于依良心拒服义务兵役的案件。

19. 人们无法提出在历史上有多少人被迫违反其意愿服役而使其信仰遭受践踏或因拒绝参军而遭受迫害或监禁的数字；其他很多人在别无选择参与的武装冲突中被迫杀人或死亡。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依良心拒服兵役这一主题的最近判例不仅有牢固的法律依据，而且也是对那些受害者所表示的迟来的当之无愧的敬意。

[提出时有西班牙文本，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r</sup> 见委员会委员岩泽雄司先生、杰拉尔德·纽曼先生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就 Jeong 等人诉大韩民国的案件(第 1642-1741/2007 号来文)提出的个人意见(赞成)，其中提交人仅称委员会应采用它要求使用的推理方式；以及特别是杰拉尔德·纽曼先生(与岩泽雄司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和沃尔特·凯林先生联合提出的个人意见)就本 Atasoy 和 Sarkut 诉土耳其案件提出的个人意见。

<sup>s</sup> 第 1321-1322/2004 号来文，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2006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

V. 第 1859/2009 号来文, Kamoyo 诉赞比亚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William Kamoyo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赞比亚
来文日期:	2008 年 12 月 20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死刑, 上诉审理受到不当拖延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 死刑的强制性质; 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正当程序; 尽早接受审判的权利; 司法复审权
《公约》条款:	第六条; 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和第 5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William Kamoyo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59/2009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William Kamoyo, 生于 1973 年, 目前关押在赞比亚卡布韦戒备最森严的监狱死囚区。他声称是缔约国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受害者, 因为赞比亚最高法院无故拖延对其案件的复审。虽然他没有援引《公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约》的任何条款，他的来文似乎在《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四条之下提出问题。他无律师代理。<sup>1</sup>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92 年 6 月 9 日，提交人被指控谋杀。1993 年 5 月开始对他进行陪审团审判，他于 1995 年 6 月 12 日被判处死刑。

2.2 他被判刑后不到 30 天，提交人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向委员会提交他的来文之时，即他提出上诉 13 年之后，他仍在等待最高法院复审他的案件，因为他的案件档案已经遗失。

#### 申诉

3. 提交人声称，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审理已遭无故拖延，这种情况似乎在《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和第 5 款之下提出问题。

#### 缔约国不合作

4. 委员会先后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2010 年 3 月 16 日和 2011 年 1 月 24 日请缔约国提交关于来文是否可受理和案情的资料。委员会注意到尚未收到这方面的资料。委员会对缔约国没有就提交人申诉的可受理问题和/或实质问题提供任何资料感到遗憾。委员会回顾，根据《任择议定书》，有关缔约国有责任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解释或陈述，澄清事件和它可能采取的补救措施。在缔约国未提交答复的情况下，如果提交人的指控有证据，就必须给予应有的考虑。<sup>2</sup>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5.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所载的受理条件。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件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5.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未就此案件提供任何来文。提交人在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时，即在他被判刑 13 年之后，提交人的上诉还在等待审判，他被关在死囚区。缔约国未解释拖延处理提交人上诉的原因，也没有提供任何与来文相关的其

<sup>1</sup>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均于 1984 年 7 月 9 日对赞比亚生效。

<sup>2</sup> 除其他外，见第 1422/2005 号来文，El Hassy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第 1295/2004 号来文，El Alw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07 年 7 月 11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第 1208/2003 号来文，Kurbonov 诉塔吉克斯坦，2006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4 段；第 760/1997 号来文，Diergaardt 等人诉纳米比亚，2000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2 段。



他信息。因此，委员会认为，拖延处理提交人的上诉，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所指的不合理延长之拖延，因此宣布来文可以受理。

#### 审议案情

6.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6.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指称，他的上诉在他被判刑13年之后仍未审理，“因为案件档案已经遗失”，并回顾缔约国未对提交人的诉求提供任何意见。委员会重申，举证责任不能仅由来文提交人承担，特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和缔约国通常并不享有同等的获得证据的机会，往往只有缔约国能获得有关资料。《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2款默示缔约国有义务真诚地调查针对它及其代表提出的所有有关违反《公约》的指控，并向委员会提供它可获得的资料。鉴于缔约国未能就委员会受理的事件与委员会合作，如果提交人的指控有证有据，就必须给予应有的考虑。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被判处死刑，并回顾反映与其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32号(2007)一般性意见<sup>4</sup>的判例<sup>3</sup>及与其一并理解的载于第十四条第3款(丙)项和第5款的权利，赋予了不拖延地对判刑进行复审的权利，而且上诉权就死刑案件而言尤为重要。委员会指出，提交人被判刑13年之后，仍在等待最高法院审判其上诉，原因显然是因疏忽导致案件档案遗失。委员会回顾在审议本来文之时，即提交人被判刑约17年之后，缔约国未提交资料说明提交人的案件已审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本案的审理遭到拖延侵犯了提交人不加拖延进行复审的权利，因此认定《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丙)项和第5款遭到违反。

6.4 委员会回顾判例，即刑事诉讼未遵守《公约》规定，在审判之后作出死刑判决，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六条的情况。<sup>5</sup>在本案中，提交人就其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经过约17年仍待结案，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所保障的公平审判权，从而也违反了《公约》第六条。

<sup>3</sup> 例如见第390/1990号来文，Lubuto诉赞比亚，1995年10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523/1992号来文，Neptune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6年7月16日通过的《意见》；第614/1995号来文，Thomas诉牙买加，1999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702/1996号来文，McLawrence诉牙买加，1997年7月18日通过的《意见》；和第588/1994号来文，Johnson诉牙买加，1996年3月22日通过的《意见》。

<sup>4</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62/40(Vol.I))，附件六。

<sup>5</sup> 例如见第719/1996号来文，Levy诉牙买加，1998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第730/1996号来文，Marshall诉牙买加，1998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和第1096/2002号来文，Kurbanova诉塔吉克斯坦，2003年11月6日通过的《意见》。

6.5 委员会还认为，提交人被关押在死囚区，直到提交来文时已长达 13 年，这种情况提出了《公约》第七条下的问题。委员会回顾，长期拖延执行死刑本身并不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另一方面，每个案件均应按其本身的案情审议，并考虑到在缔约国，司法拖延不受惩罚，戒备最森严监狱的特别拘留条件及其对有关人员的心理影响的情况。<sup>6</sup> 在本案中，除了长期关押在死囚区所造成的心理焦虑之外，委员会收到的未被反驳的证据表明案件档案已遗失。委员会的结论认为，赞比亚最高法院未在合理期限内就提交人上诉作出判决乃是由缔约国的疏忽所造成的。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长期被关押在死囚区构成了违反赞比亚依《公约》第七条所承担的义务的情况。

7.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第十四条第 5 款和第七条。

8.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办法，包括根据《公约》所规定的一切保障重新审判或加以释放；<sup>7</sup> 以及适当的补救，包括适足的赔偿。缔约国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9.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的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言广泛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6</sup> 除其他外见 Johnson 诉牙买加(前注 3)，第 8.4 段及其后各段和第 606/1994 号来文，Francis 诉牙买加，1995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9.1 段。

<sup>7</sup> 除其他外见 Kurbanova 诉塔吉克斯坦(前注 5)，第 9 段和第 1503/2006 号来文，Akhadov 诉吉尔吉斯斯坦，2011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9 段。



W. 第 1862/2009 号来文, Pathmini Peiris 等人诉斯里兰卡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Annakkarage Suranjini Sadamali Pathmini Peiris  
(由亚洲法律资源中心的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其已故丈夫 Siyaguna Kosgodage Anton Sugath Nishantha Fernando 先生及两名幼年子女 Siyaguana Kosgodage Kalpani Danushi Fernando(1992 年出生)和 Siyagana Kosgodage Sinesh Antony Fernando (1997 年出生)

所涉缔约国: 斯里兰卡

来文日期: 2009 年 2 月 6 日(首次提交)

事由:

程序性问题: 缔约国不合作

实质性问题: 任意剥夺生命; 酷刑和虐待; 没有适当调查; 家庭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的权利; 家庭团聚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 款; 第十七条; 第二十三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无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代表 Annakkarage Suranjini Sadamali Pathmini Peiris 女士、Siyaguna Kosgodage Anton Sugath Nishantha Fernando 先生及其两名幼年子女 Siyaguana Kosgodage Kalpani Danushi Fernando (1992 年出生)和 Siyagana Kosgodage Sinesh Antony Fernando (1997 年出生)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62/2009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克里斯蒂娜·沙内、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拉杰苏默·拉拉赫、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杰拉尔德·L·纽曼、迈克尔·奥弗莱厄蒂、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克里斯特·特林和马戈·瓦特瓦尔。

## 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为 Annakkarage Suranjini Sadamali Pathmini Peiris 女士。她代表其丈夫 Siyaguna Kosgodage Anton Sugath Nishantha Fernando 先生(2008 年 9 月 20 日去世)、她本人以及两名年幼子女 Siyaguana Kosgodage Kalpani Danushi Fernando 和 Siyagana Kosgodage Sinesh Antony Fernando 提交来文。提交人称,她和家人是斯里兰卡人民民主共和国(“斯里兰卡”)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及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第七条及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第九条第 1 款及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以及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行为的受害人。她由亚洲法律资源中心代理。

1.2 2009 年 2 月 12 日,委员会通过新来文特别报告员,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确保在委员会审议案件时 Annakkarage Suranjini Sadamali Pathmini Peiris 女士及其家人得到保护。2009 年 9 月 15 日重申了这个要求。缔约国没有对委员会的这两项要求作出答复。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和她的丈夫 Siyaguna Kosgodage Anton Sugath Nishantha Fernando 先生在 2003 年 5 月 24 日从当时担任 Kochikade 派出所负责人的警官 M.P.那里买下一辆货车。这位警官把货车卖给提交人和她的丈夫,使他们以为他就是这辆货车的合法车主。后来透露出这辆货车是被盗车辆,这名警官在把车辆卖给提交人和她的丈夫之前更换了车牌。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得知这一欺诈行为后对 M.P.提出投诉,M.P.被纪律调查。调查伊始,这名警官就和他的几位同事企图威胁提交人和她的丈夫,让他们撤回申诉。2005 年 12 月这名警官被起诉,但他在同月死亡。因为这份最初提出的申诉,一些警员开始把提交人和她的丈夫视为威胁。

2.2 2003 年,提交人的丈夫曾因在街上被三名当地歹徒抢劫而去尼甘布派出所登记投诉,被警方捏造了一份针对他的假申诉。当时警察没有记录他的投诉,反而指控他报告虚假犯罪案件。提交人的丈夫向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对其案件进行调查,但没有任何行动。负责尼甘布派出所的警官 M.D.向提交人的丈夫索贿 2 万斯里兰卡卢比。<sup>1</sup> 后者拒绝支付,而且又向国家警察委员会(NPC)对该警官进行投诉。没有任何行动。2004 年 6 月 11 日,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向反腐败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投诉。该委员会在两年后才对 M.D.警官展开调查。科伦坡高等法院仍在审议此案。<sup>2</sup> 提交人认为,这一新事件使一些警察向 M.D.靠拢,与提交人及其家人对立。

2.3 2006 年,尼甘布警监 M.将提交人和她的丈夫传唤到他的办公室,借口是需要将他们的证词记录在对 M.D.的警署调查内。但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在警监办公

<sup>1</sup> 约 180 美元。

<sup>2</sup> 登记为 B/1658/2006。

室受到恫吓，他们被威胁说，除非立即撤回对 M.D.的投诉，否则就会为对抗警察付出沉重代价。没有记录证词。这次事件发生后，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对警监 M.提出申诉。

2.4 同一年，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因一辆车的文件问题去尼甘布派出所，见到了总督察 N.和另一名警官，这名警官介绍自己说是刑事科警员。这两名警官非但没有协助他们，反而朝他们喊叫，侮辱他们，命令他们说，如果他们要活命，就不要再到尼甘布派出所来。这两名警官还表示，如果他们想活着，就得撤回他们对几名警察提出的投诉。这次事件后，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就受到总督察和尼甘布派出所在场警官的死亡威胁向副总监办公室提出投诉，要求予以调查。令他们吃惊的是，副总监将这一投诉转给夫妇俩人已经投诉过的警监 M.。

2.5 2006 年，以对警监 M.的投诉要记录证词为借口，提交人和她的丈夫被传唤到高级警监办公室，在那里他们受到辱骂和威胁，说如果他们坚持投诉不撤，就会被杀死，要他们撤回对警官 M.D.和 M.的投诉。夫妇二人随后又向副总监办公室提出申诉，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寻求保护他们的家人。没有对这次投诉采取任何行动。

2.6 2006 年 9 月 10 日，提交人和她的丈夫骑摩托车去市场后，警察过来问他们为什么不戴安全帽。他们回答说需要，因为他们没有骑在摩托车上。另一名警察之后走向他们，要求他们立即撤回对警官 M.的投诉、收缴了摩托车的钥匙，还威胁要逮捕提交人的丈夫。同一天，夫妻俩被逮捕，登记了一个虚假案件，但俩人随后被尼甘布治安法院保释释放。

2.7 2007 年 9 月 23 日，协助提交人及其子女提交证词的律师受到匿名电话威胁。来电者威胁律师，如果她还要协助提交人及其家人，就要被杀死。一家当地人权组织“生命权”也接到类似的威胁电话。提交人和家人开始四处躲藏。

2.8 2007 年 11 月 12 日，两名警察，即副警监 A.和警员 D.来到提交人的住所，要她和她的丈夫不要在 2007 年 11 月 14 日向科伦坡高等法院提交针对 M.D.警官的证据。<sup>3</sup> 这名警官进一步侮辱提交人，并扬言要杀死她的丈夫。警官 A.后来打了提交人丈夫一耳光。提交人的丈夫让女儿记下警员的车牌号码，但该名警员朝着她开车，用摩托车撞她，把她撞到地上。另有六名警员被叫到提交人的家。提交人担心性命，立即与反腐败委员会联系寻求帮助。接到电话的警员告诉提交人会将信息转给总部督察员<sup>4</sup> 予以干预。总部督察员 S.来到提交人的家，同行的还有 50 名警员，其中 20 人进到屋里，殴打提交人全家。提交人的丈夫被打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警员还不停地殴打他、踢他，其他人殴打提交人。总部督察员用手枪打提交人的脸，另一名警员打提交人 10 岁儿子的脸，将他的脸撞在墙上。

<sup>3</sup> 诉讼登记号为 B/1658/2006，反腐败委员会将提交人对 M.D.警官的申诉移交后在科伦坡高等法院起诉，同前，第 2.2 段。

<sup>4</sup> 向科伦坡警察总部、而非当地派出所报告。

提交人、她的丈夫和女儿后来被强推进警车。一名警官企图脱掉提交人女儿的衣服。

2.9 这次事件后，<sup>5</sup> 提交人向斯里兰卡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内容为包括尼甘布警署高级警监、总监、副总监、士官和警员在内的 13 名警官酷刑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力。此案仍在高等法院审理中。<sup>6</sup>

2.10 提交人和她的女儿被尼甘布医院收治。提交人住院五天，后来因鼻部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警察拒绝给提交人的丈夫提供医疗帮助。提交人和她的女儿住院时，警察指控提交人全家妨碍警务工作。提交人一家获得保释，提交人称，由于这次攻击，她几处受伤，脸部、下巴和牙齿挫伤。

2.11 2008 年 6 月 23 日，一辆货车里坐着四个人，他们下令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在科伦坡路 Dalupata 桥的 Chilaw 附近停下，这四人里有 N.N.和 N.M. (N.N.有犯罪前科，部队逃兵)，他们大声说，受尼甘布警察指示，要杀死他们。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十分害怕，即刻返回住所。不久之后，他们在家门口看到 N.N.和 N.M.和另外两人，要她开门，威胁他们说，如果拒绝撤回申诉，第二天就杀死他们。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后来前往副总监(负责犯罪问题)办公室，就此事件提出申诉。<sup>7</sup>提交人的丈夫还在第二天就此事件向警察提交了一份宣誓证词。向亚洲人权委员会(AHRC)报告了该事件，委员会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致函科伦坡灾难管理和人权事务部长，寻求干预。亚洲人权委员会还向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提交了来文。

2.12 2008 年 9 月 20 日，提交人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子乘货车行至住所附近的 Dalupota 交叉路口，两名蒙面人走近他们，用一把小手枪朝提交人的丈夫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有打中他，但第二枪由耳朵打入头部，他当场死亡。刺客乘来时所乘车辆逃离现场。提交人的丈夫在抵达医院不久后即被宣告不治死亡。

2.13 2008 年 11 月 11 日，提交人向尼甘布治安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指称因指控警察受贿和施行酷刑，她和家人受到严重威胁。2008 年 12 月 7 日，提交人向 Paliyagoda 派出所又提交一份书面证词指出，由于没有对其丈夫的谋杀案件进行调查，凶手为了杀害提交人及其子女，正四处搜寻他们，他们不得不躲躲藏藏，生活十分困难。提交人在证词中强调指出，不查明或逮捕杀害其丈夫凶手的原因是谋杀案系由警方人员策划的，他们曾多次威胁提交人及其家人。

2.14 2009 年 1 月 24 日，生命权组织接到科伦坡的一通电话，威胁协助提交人申诉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他们继续协助提交人，会杀了他们。该组织主席就此向警署总监提出申诉，但迄今没有进行过适当调查。

<sup>5</sup> 提交人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是否被拘留，及拘押时间多长。

<sup>6</sup> 第 SCFR 446/2007 号案指控：尼甘布警署高级警监 P.V.、警监 M.、总部督察 S.L.、警署督察 S.、S.L.和 P.、警署副督察 A.、R.N.H.、L.、警署士官 S.L.和警署警员 D.。

<sup>7</sup> 申诉登记号为 SIIV 345/266。

2.15 2009 年 1 月 27 日，提交人的律师在尼甘布派出所代表提交人提出申诉、寻求对提交人及其子女进行保护时，最高法院一名警察(B.先生)受理提交人提出落实基本权利申诉时<sup>8</sup> 辱骂律师，并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帮助提交人，也会被杀死。这名警察殴打律师，威胁说如果他再去派出所就会死，强迫他撤回所有针对警察提出的申诉，包括有关贿赂、落实基本权利，以及针对警察在不同阶段对提交人及其家人进行威胁的申诉，还有关于酷刑的申诉，律师担心自己的安全，离开了派出所。

2.16 这次事件后，律师向包括律师协会在内的斯里兰卡各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诉，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2009 年 1 月 30 日，一名不明纵火犯放火烧了他的办公室。2008 年 9 月 27 日，两枚手榴弹扔进另一位律师的房子，这位律师的姓名出现在提交人的落实基本权利申诉中。没有对这些事件进行任何适当调查。

## 申诉

3.1 提交人指出，所述事实表明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第七条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第九条第 1 款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以及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的情况。

3.2 关于第六条，提交人强调，在 2007 年 11 月 12 日，她和家人公开受到殴打事件后，他们不断寻求有关部门的帮助。尽管他们一再投诉，威胁却不断加剧，最后造成提交人的丈夫被杀。提交人强调指出，缔约国没有采取扶持行动来保障她和家人尤其是她的丈夫的生命安全，侵犯了他们根据与《公约》第二条第 3 款一并解读的第六条规定的权利。<sup>9</sup>

3.3 关于第七条，提交人称，他们在 2007 年 11 月 12 日遭受严重酷刑，造成她和女儿住院。提交人强调指出，除这些酷刑行为外，由于不断受到警察对其生命的威胁，她及家人不得不四处躲藏，这种威胁在其丈夫死亡后仍在继续，此外，所有与提交人和她家庭有关的人都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提交人指出，即使在斯里兰卡酷刑被视为犯罪行为，<sup>10</sup> 但与案件相关者没有人受到处罚，她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落实基本权利申诉仍然悬而未决。她指出，没有对她和家人所遭受的酷刑行为给予惩罚，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3.4 关于第九条第 1 款，提交人强调其案件在斯里兰卡并非孤立事件，她称，缔约国未能采取适当行动保护她家人的安全，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及相关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sup>8</sup> 同上，第 2.9 段。

<sup>9</sup> 提交人援引第 90/1981 号来文 Luyeye Magana ex-Philibert 诉扎伊尔，1983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8 段。

<sup>10</sup> 《第 22 号法》(1994 年)。

3.5 提交人还指称缔约国违反了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她强调指出，自 2004 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到警察威胁电话和到访的骚扰。她争辩说，这使他们无法平静地享受生活，尽管多次提出保护请求，威胁却加剧，最终她丈夫被谋杀。提交人还回顾指出，她的家庭生活迄今一直以财政无保障和情绪不稳为标志，孩子们无法上学，从而剥夺了他们根据《公约》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1 款应该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家庭权利受到保护的权利。

3.6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提交人强调指出，尽管向缔约国有关部门提出十几份申诉，包括向斯里兰卡总统、斯里兰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灾难管理和人权部长以及该部干事、警署总监、警署副总监、国家警察委员会、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和尼甘布治安法院提出申诉，她的丈夫仍被杀害，他们不断收到更多的威胁，与这些事件有关联的人没有一人被逮捕，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协助他们的人权维护者和律师也受到恐吓。因此，提交人强调指出，诉讼没有进展，加上被控肇事者仍在履行警察职能这一事实，造成诉讼实际上没有给肇事者带来任何惩罚。她补充说，鉴于其案件的诉讼程序没有效力和受到拖延，<sup>11</sup> 根据在斯里兰卡普遍缺乏申诉人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sup>12</sup> 绝不可能启动任何可信的程序。因此提交人得出结论认为，已经证明国内补救办法无效，委员会不应要求她继续寻求国内补救，作为受理本案的前提。

### 提交人的进一步陈述

4.1 2009 年 9 月 10 日，提交人通知委员会，她于 2009 年 6 月 13 日至 8 月 26 日在印度期间受到威胁，她全家签证到期返回斯里兰卡后这一危险升级。2009 年 9 月 7 日，提交人出庭后开车返回家时被另一辆车追赶。她还收到若干匿名电话，说会烧了她的房子，杀死她全家。提交人还告诉委员会，尽管委员会为她提出了采取临时保护措施的要求，缔约国没有就此采取任何措施。

4.2 2009 年 9 月 15 日，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向缔约国转交了提交人提供的上述信息，并转发了委员会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确保在委员会审议本案期间保护提交人及其家人的提醒函。

### 缔约国不合作

5.1 2009 年 9 月 15 日、2010 年 2 月 24 日和 2011 年 1 月 24 日的几次普通照会都要求缔约国向委员会提出关于来文的可受理性和案情的资料。委员会注意到，仍未收到答复。委员会遗憾的是，缔约国未就可受理性问题或者提交人申诉的案

<sup>11</sup> 提交人援引第 59/1996 号来文，Encarnación Blanco Abad 诉西班牙，1998 年 5 月 14 日通过的决定，第 8.2 段和第 8.6 段，以及第 60/1996 号来文，M'barek 诉突尼斯，1999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的决定，第 11.6 段。

<sup>12</sup> 提交人强调指出，在斯里兰卡，由于国内法律制度崩溃，调查通常长期拖延，并遭到各级腐败官员的非法干预。她还说，斯里兰卡政府对此一贯采取的立场是，由于 28 年的武装冲突，迄今无法按照法律的要求进行刑事调查。提交人只知道在斯里兰卡有两个案件的肇事者因涉及酷刑被判刑。



情提供任何信息。委员会回顾，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2款的规定，缔约国应本着诚意审查对之提出的所有指控，并向委员会提交缔约国掌握的所有资料。在缔约国未予以答复的情况下，必须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证据，对指控予以必要的考虑。

5.2 委员会还遗憾地指出，缔约国没有对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2条提出的要求作出答复，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提交人的案件期间，采取措施保护提交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委员会回顾指出，采取临时措施对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开展工作至关重要，藐视这项规则就破坏了通过《任择议定书》保护《公约》规定的权利。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93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由于缔约国没有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提出任何意见，而且提交人称，已经证实国内补救办法无效，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因为来文似乎在《公约》第六条及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第七条本身以及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第九条第1款，第十七条和第二十三条第1款之下提出问题。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的要求，参照向委员会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委员会回顾指出，由于缔约国没有作出答复，因此应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证据，给予提交人提出的指控应有的考虑。

7.2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六条提出的诉求，委员会回顾指出，生命权是绝不允许减损的最重要的权利。<sup>13</sup> 委员会还回顾指出，缔约国负有确保个人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不受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私人或实体侵犯的积极义务。<sup>14</sup>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其掌握的无可争议的材料，提交人及其家人受到警方即缔约国工作人员的直接威胁，包括死亡威胁、试图非法强迫他们撤回对警务人员提出的申诉。据报告，2008年9月20日，提交人的丈夫被蒙面男子枪杀，三个月前，有两个人曾告诉提交人一家，他们已奉尼甘布警察之命杀死他们。这次威胁之后，

<sup>13</sup> 关于生命权问题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1982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37/40)，附件五，第1段。

<sup>14</sup> 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0号》(A/59/40(第一卷))，附件三，第8段。

提交人和她的丈夫多次投诉，包括向副总监办公室和警察投诉，但有关部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提交人一家。在这种情况下，鉴于缔约国不予合作，委员会认为其掌握的事实表明，提交人丈夫的死亡应由缔约国承担责任。因此，委员会作出结论，缔约国应对违反《公约》第六条任意剥夺提交人丈夫的生命负有责任。

7.3 关于根据第七条提出的诉求，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提出的下列证据提出质疑，即在 2007 年 11 月 12 日，警察冲进她的住所，殴打她的丈夫，使他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警察用手枪打她，把她 10 岁的儿子一拳打到墙边，用摩托车撞她的女儿，把她撞到地上，后来企图脱她的衣服。根据这些情况，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提交人、其丈夫和他们的两名子女受到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待遇。

7.4 委员会回顾指出，刑事调查和随后的起诉都是《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保护的人权受到侵犯时应该采取的补救办法。<sup>15</sup> 在本案件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大量投诉，但没有一名肇事者被逮捕或受到起诉。缔约国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根据向委员会提供的详细证据，包括提交人指明所有被指控的肇事者姓名，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应对违反与第六条和第七条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 3 款规定的义务承担责任，对提交人丈夫的死亡和提交人及其家人遭受的虐待进行适当调查，并采取适当补救行动。

7.5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九条第 1 款提出的诉求，委员会回顾其判例，<sup>16</sup> 重申《公约》还保护被正式剥夺自由外的人的人身安全的权利。对第九条的解释并不允许缔约国无视对属其管辖但未受拘禁者的人身安全的威胁。就本案案情看，尼甘布派出所的警察似乎以官方身份采取了行动，多次用死亡威胁提交人及其家人。缔约国没有采取行动，没有采取合理适当措施保护提交人和她的家人，委员会得出结论，缔约国违反了提交人及其家人享有《公约》第九条第 1 款保护的人身安全的权利。

7.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警察通过恐吓电话和强行到访在她家骚扰她和家人的指称，包括 2007 年 11 月大肆袭击其住所，以及后来他们害怕住在家里，被迫躲藏无法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采取行动对应委员会采取临时措施保护提交人及其家人的要求，造成持续伤害。缔约国没有提出反

<sup>15</sup> 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9/40(第一卷))，附件三。还见第 1619/2007 号来文，Pestaño 诉菲律宾，2010 年 3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第 1447/2006 号来文，Amirov 诉俄罗斯联邦，2009 年 4 月 2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2 段，及第 1436/2005 号来文；Sathasivam 诉斯里兰卡，2008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4 段。

<sup>16</sup> 见第 195/1985 号来文，Delgado Páez 诉哥伦比亚，1990 年 7 月 12 日通过的《意见》，第 5.5 段；第 711/1996 号来文，Dias 诉安哥拉，2000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第 821/1998 号来文，Chongwe 诉赞比亚，2000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5.3 段。



驳，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七条，对提交人家庭住宅的隐私任意干涉。<sup>17</sup>

7.7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关于违反《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的指称，认为鉴于在本案中缔约国违反了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七条，同时也违反了与这些条款相关联的第二十三条第 1 款。

8. 人权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经委员会审理的事实显示，对提交人丈夫而言，斯里兰卡违反了第六条本身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十三条第 1 款；对提交人本人、其丈夫及两名子女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对提交人本人、其丈夫及两名子女，缔约国违反了第七条本身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十三条第 1 款；对提交人、其丈夫及两名子女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九条第 1 款；对提交人、其丈夫及两名子女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十七条以及相关关联的第二十三条第 1 款。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办法，包括确保将责任者绳之以法、提交人和两名子女安全返回住所，确保赔偿，包括支付充足的赔偿金，向他们道歉。缔约国还应采取措施，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违反情况。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泛分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17</sup> 见第 687/1996 号来文, Rojas García 诉哥伦比亚, 2001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 第 10.3 段。

X. 第 1866/2009 号来文，Chebotareva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Olga Chebotareva (没有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08 年 10 月 18 日(初次提交)
事由:	拒绝签发小型集会许可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的程度
实质性问题:	和平集会权利和由合格、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审讯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一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Olga Chebotareva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66/2009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是 Olga Chebotareva，俄罗斯联邦<sup>1</sup> 国民，1980 年生。她称俄罗斯联邦侵犯了她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布齐德·莱兹赫里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桑贝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玛尔戈·沃特法尔女士。

<sup>1</sup> 《任择议定书》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起对俄罗斯联邦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7 年 10 月 1 日，提交人和一位名叫 Kozlovskaya 的女士向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申请在该市的高尔基广场举行一次公开活动——小型集会，时间是 2007 年 10 月 7 日。活动的目的是纪念 Anna Politkovskaya<sup>2</sup> 被谋杀一周年和抗议该国的政治压迫。她们通知市政府，参加活动的有 45 个人。

2.2 2007 年 10 月 2 日，市政府通知提交人和其他组织者，市政府计划在 2007 年 10 月 7 日举办教师节活动。它说，那些活动将在同一个高尔基广场举行。作为替代办法，市政府建议在另一个地点举行纪念活动。

2.3 提交人说，建议的地点远离市中心。由于地处偏远，集会的目的难以实现。在收到市政府答复的同一天，提交人和其他组织者通过传真告知市政府，他们认为，拒绝集会申请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2007 年 10 月 3 日，提交人和其他组织者收到市政府的另一封信说，没有就集会地点达成协议，因此，组织者不得举行集会。

2.4 也是在 2007 年 10 月 2 日，提交人和其他组织者向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递交了第二次申请，希望能在一个不同地点集会。申请于 2007 年 10 月 7 日举行集会的地点是 Bolshaya Pokrovskaya 大街和 Malaya Pokrovskaya 大街的相交处。第二次集会的目的也是纪念 Anna Politkovskaya 被谋杀一周年。组织者告知市政府，将有 30 个人参加活动。

2.5 2007 年 10 月 3 日，Shimovolos 先生，集会组织者之一，递交了关于第二次集会的补充资料，表明打算进行集会的地点是在“Jan Jak”饭店的右侧，不影响行人和车辆交通。

2.6 2007 年 10 月 4 日，市政府作出答复，再次建议在一个不同地点举行集会，因为它认为，组织者建议的地点是一个行人和车辆交通繁忙的地段。因此，市政府认为，在该地点集会将会危害公共安全。市政府还声称，他们在 Bolshaya Pokrovskaya 大街和 Malaya Pokrovskaya 大街的街角找不到“Jan Jak”饭店。尽管组织者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市政府仍拒绝给予许可。因此，两次集会都没能按计划进行。

2.7 提交人称，如果按照法律，两次活动本来都可以进行，不会对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民众道德构成威胁。她还称，2007 年 11 月 7 日，计划的活动日，该城市的高尔基广场是空的，没有其他活动，虽然市政府说过有活动。

2.8 在未具体说明的一天，提交人和其他组织者向 Nizhegorodsky 区法院提起诉讼，称侵犯了他们的自由集会权利。2007 年 12 月 18 日，Nizhegorodsky 区法院公布判决说，市政府的行为并非违法。提交人称，审理其申诉的法院不是“合

<sup>2</sup> Anna Politkovskaya 是俄罗斯记者、作家和人权积极分子，因反对车臣冲突和当时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而闻名。

格、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因为，据提交人说，它没有审理关于侵犯自由集会权利的申诉，而是重点审理了下诺夫哥罗德市政府的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

2.9 2007 年 12 月 21 日，提交人就 Nizhegorodsky 区法院的判决向 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提出上诉，而后者则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将上诉驳回，维持了下级区法院的原判。

2.10 提交人说，2008 年 5 月 27 日，她还向 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递交了监督审查申请。2008 年 6 月 3 日，该法院将其上诉驳回，认定她有多处违反监督审查申请提交程序规则。

2.11 2008 年 6 月 16 日，提交人第二次向 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递交监督审查申请。2008 年 7 月 24 日，该法院驳回了她的第二次上诉，认定低级法院的判决是由一公共公证处验证的，而不是按法律规定由法官验证的。提交人称，该法院本来就没打算查明案情，因而以纯粹技术理由将上诉驳回。

## 申诉

3.1 提交人称，缔约国拒绝给予集会许可，这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应有的自由集会权利。

3.2 她还称，她在其中对市政府的决定提出质疑的法院审讯不是由一个“合格、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的，因此，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应有的权利。提交人说，该法院不是考虑对她的和平集会权利的种种限制问题，而只是考虑了市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

3.3 提交人还说，在监督上诉期间，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从未考虑其案件情况，只是以纯粹的形式和技术理由将两次监督上诉驳回。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09 年 5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中提供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它说，2007 年 10 月 1 日，提交人提出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广场举行集会的许可申请。缔约国说，市政府当时正准备举办与教师节有关的其他活动，因此，建议组织者选择另一地点集会，同时建议在该城市的另外几个备选地点举办活动。

4.2 缔约国还指出，根据关于聚会、会议、示威、集会和纪念活动的第 54-FZ 号联邦法律，如果公众活动的组织者与地方当局不能就活动地点达成一致意见，组织者就无权举办这种活动。

4.3 缔约国还说，2007 年 10 月 2 日，市政府收到关于举办活动的第二次申请，这次申请的地点是 Bolshaya Pokrovskaya 大街和 Malaya Pokrovskaya 大街的相交处。据缔约国说，组织者没有具体说明活动的准确地点。缔约国争辩说，在两条街的相交点，车辆和行人交通非常繁忙，在那里举办公众活动会危害交通安全。

市政府再次建议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其他区选择活动地点。缔约国援引了关于公众活动的同一联邦法律，认定组织者和地方当局必须就活动地点达成一致意见。

4.4 缔约国还争辩说，Nizhegorodsky 区法院正确地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诉，并得出结论认为，没有任何权利受到侵犯，市政府没有违反法律发布对其活动的禁令，而是建议他们改变活动地点。据缔约国说，法院对提交人关于非法限制她组织活动的权利的指控进行了研究，认为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4.5 缔约国还说，提交人于 2008 年 5 月 27 日和 2008 年 6 月 16 日两次递交的监督上诉都违反了提出监督上诉的程序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 41 章)规定的。它争辩说，提交人有很多机会改正这些程序错误，然后重新提交监督上诉申请，但她没有这样做，她也没有提交请求推翻判决的上诉。

4.6 缔约国还说，由于这些情况，提交人提交来文应当被看作滥用提交权利，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乙)项，还应当被宣布不可受理。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09 年 10 月 20 日的信中回顾说，与缔约国所说相反，她实际上向 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提交了请求推翻判决的上诉，但这一上诉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被驳回。

5.2 提交人还说，监督上诉被 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以形式理由驳回，如：以前的法院判决书副本是由一个公证处验证，而不是由原法院本身验证的；由于根据新法律的规定监督审查申请在一审法院审理其案件之后已经超过六个月的限期。提交人争辩说，她曾请求延长监督上诉期限，但未成功。因此，案件不可以在监督审查程序中审查。

5.3 提交人还称，欧洲人权法院的多项裁决指出，监督上诉不能被看作一种“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sup>3</sup>

5.4 她还重申，集会被禁止是因为组织者要对政治压迫表示抗议，而且，她认为，符合对和平示威的所有要求。提交人再次表示认为侵犯了《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权利。

###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10 年 8 月 13 日，缔约国重申，提交人应当改正其 2008 年 5 月 27 日的监督上诉中的错误，重新上诉。缔约国称，提交人没有适当验证低级法院的裁决，

<sup>3</sup> 为支持她自己的说法，提交人提供了下诺夫格罗德人权联盟以及本案中集会组织者之一 Shimovolos 先生的报告。她还说，无论如何，监督审查的目的都主要是为了核查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是否有严重违反程序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审查案情。另外，也不一定要遵守平等手段原则。

这违反了俄罗斯联邦现行法律。缔约国回顾说，因此，提交人的两次上诉都在没有考虑案情的情况下被驳回。

6.2 缔约国还说，提交人是专业律师，本应了解《俄罗斯联邦宪法》的所有要求，其中要求严格遵守《宪法》和俄罗斯联邦的其他法律(《宪法》第 15 条第 2 款)。缔约国说，提交人没有遵守法律要求是有目的的，提交人从未希望法院考虑案情。

6.3 因此，缔约国坚持认为，提交人滥用了提交个人来文的权利，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乙)项的要求，不能认为她的案件是可受理的。

###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7.1 2010 年 9 月 28 日，提交人提交了补充评论。她辩称，推翻判决上诉经审查之后，法院的裁决即可执行。法院裁决的生效在监督上诉期间不能中止。提交人还援引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据她说，其中法院承认监督上诉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补救办法。<sup>4</sup>

7.2 提交人还辩称，根据《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 363 和 364 条，提出监督上诉的理由是非常有限的。提交人还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个案例，其中，该法院认为监督上诉是一种备选补救办法，因为它是取决于当局而不是申诉人的一种任意性程序。<sup>5</sup>

7.3 提交人承认，《民事诉讼法》第 378 条要求由法院验证受质疑裁决书的副本。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第 36 号决议也肯定了这一要求。提交人辩称，这种决议只是为了管理法院的活动，不能被看作法律。提交人还援引一个公证法，它并不禁止由公证处验证法院的裁决书。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sup>4</sup> 然而，应当指出，宪法法院在其 2007 年 2 月 5 日的裁决中是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补充保护措施”提到监督上诉的，不再称其为“无效的”。宪法法院还提到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监督审查问题时的判例(其中，欧洲人权法院没有说监督上诉程序是“无效的”)。

<sup>5</sup> 提交人援引了“Tumilovich 诉俄罗斯”一案，第 47033/99 号申请，欧洲人权法院 1999 年 6 月 22 日的判决。

8.3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规定的要求，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理由，即：提交人在提交两项监督上诉时没有遵从程序规则。然而，委员会也注意到，提交人向 Nizhegorodsky 区域法院提交了推翻判决上诉，而后者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sup>6</sup> 委员会忆及其以前的判例，根据这些判例，对已经生效的法院裁决的监督审查程序是一种特别补救办法，它取决于法官或检察官的酌处权，<sup>7</sup> 不需要为可受理之目的用尽。根据这些情况，委员会认为，就本案而言，《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不排除对来文的审议。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她的案件未由一个合格、公正和独立的法院审理，因而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的要求。她争辩说，一审法院的法官未能实质性地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她还说，推翻判决上诉和监督上诉法官没有研究她的案情。而缔约国的回答是，有关提交人案件的所有裁决都是合法的、有充分理由的，法院对提交人关于非法限制其组织集会权利的指控都依法作了审查，结论是没有根据。委员会提醒说，第十四条第1款的保障不仅适用于负责在法律诉讼中裁决刑事指控或权利和义务的法院和法庭，而且适用于被依国内法委托执行司法任务的司法机构。<sup>8</sup> 委员会注意到，审理过提交人案件的下诺夫哥罗德各有关法院都是由全职专业法官组成的。它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供充分的具体情况，说明法官的资格、公正性和独立性有问题；或列举实例，说明国内法的适用明显是武断的，或构成了明显错误，或欠缺公正，或法院违背了独立或公正的义务。<sup>9</sup> 根据这些情况，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按照第十四条第1款为可受理之目的证实其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5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提出的申诉为可受理之目的得到充分证实，因此宣布这部分可以受理。

###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5条第1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根据第二十一条她应拥有的自由集会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她被强行阻止举行和平集会(示威集会)。在这方面，委员会提醒注意，《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和平集会权利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受到限制。《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句规定，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

<sup>6</sup> 提交人为提请委员会注意提交了这些法院裁决的副本。

<sup>7</sup> 除其他外，特别是见第 836/1998 号来文，Gelazauskas 诉立陶宛，2003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以及第 1537/2006 号来文，Gerashchenko 诉白俄罗斯，2009 年 10 月 23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

<sup>8</sup> 见关于在法院和法庭面前平等和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评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第 40 号补编，第一卷(A/62/40(第一卷))附件六)，第 7 段；第 1015/2001 号来文，Perterer 诉奥地利，2004 年 7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

<sup>9</sup> 见第 32 号一般性评论，第 26 段。

(a) 按照法律以及(b) 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sup>10</sup>

9.3 在本案中，委员会必须考虑，按照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任何标准，对提交人自由集会权利的限制是否合理。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强调说，限制是按照法律实行的。但缔约国没有向委员会令人满意地证明，阻止有关的两次集会是有必要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另外，缔约国从未反驳提交人的下述说法：2007 年 10 月 7 日在高尔基广场没有举行任何活动；市政府所说有一个与此冲突的教师节活动实际上只是拒绝提交人请求的一个借口。根据这些情况，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本案中，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应有的权利。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款行事，认为面前的事实表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切实补救，包括对提交人所支付任何诉讼费用的赔偿和报销。缔约国还有责任采取措施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侵权事件。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以缔约国的官方语文广泛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10</sup> 见第 1604/2007 号来文, Zaleskaya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 第 10.6 段。



Y. 第 1880/2009 号来文, Nenova 及他人诉利比亚  
(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N.S. Nenova 及他人(由律师 Liesbeth Zegveld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利比亚
来文日期:	2009 年 3 月 31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据称提交人遭受酷刑; 在不公正和歧视性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酷刑、不公正审判、任意逮捕和拘押; 在不公正审判后判处死刑, 缺乏有效补救以及实行歧视
《公约》条款:	第二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 第十条 1 款; 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无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N.S. Nenova 及他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80/2009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1 2009 年 3 月 31 日来文提交人为: Valya Georgieva Cherveniyashka, 生于 1955 年 3 月 22 日; Snezhana Ivanova Dimitrova, 生于 1952 年 8 月 18 日; Nasya Stoycheva Nenova, 生于 1966 年 7 月 2 日; Valentina Manolova Siropulo, 生于 1959 年 5 月 20 日; 以及 Kristyana Venelinova Valcheva, 生于 1959 年 3 月 12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塔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日。提交人均均为保加利亚公民，称由于利比亚违反了《公约》第二、六、七、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以及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她们的权利受到侵犯。<sup>1</sup> 她们由 Liesbeth Zegveld 女士代理。

1.2 2009 年 8 月 5 日，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问题特别报告员拒绝了缔约国提出的请委员会将来文的可受理性与审议来文案情分开的要求。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除 Kristyana Venelinova Valcheva 外，其他提交人在 1998 年 2 月至 1999 年 2 月间作为保加利亚医疗小组的成员抵达利比亚，在班加西港的阿里法塔儿科医院工作。Kristiyana Venelinova Valcheva 于 1991 年抵达利比亚，在案发时已在班加西港的 Hauari 医院工作了六年。

2.2 1999 年 2 月 9 日，提交人与全部为保加利亚人的医疗小组的其他 18 位成员被利比亚拘捕，被逮捕时没有被告知原因。他们双手被绑到背后，被蒙上眼睛拖上一辆汽车带走。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头部和颈部被打，几个小时后他们被带到黎波里的 Al-Nasr 大街的警察署。其中 17 位保加利亚人于 1999 年 2 月 16 日被释放。提交人和 Ashraf El-Hagog Jumaa 先生<sup>2</sup> 于 1999 年 1 月 29 日被逮捕，被指控涉嫌使班加西港阿里法塔医院的 393 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而犯下谋杀罪。他们因犯此罪而将被判处死刑。Kristyana Valcheva 从未在阿里法塔儿科医院工作过。

2.3 提交人在审讯时遭受酷刑逼供。酷刑包括在腿部、脚、手、胸和私处多次遭到电击，妇女被赤裸裸地绑在铁床上。同时脚底还被打。<sup>3</sup> 同时被绑住手和背吊起来，被窒息、被扼住，同时还被以死相威胁，还威胁将伤害他们的家人，在被蒙上眼睛后威胁将让狗来咬他们；被殴打，被抓住头发在地上拖，被烟头烧，将咬人的昆虫放在他们身体上，注入药物，不让睡觉，被感觉隔离，被火焰烧和洗冰凉的沐浴，被关在极为拥挤和肮脏的囚室里，被照刺眼的光。其中一些提交人被强奸。据称这些酷刑持续了约两个月。一旦所有提交人认罪后，酷刑就减少了，但仍然持续。

2.4 1999 年 5 月 15 日，此案提交了人民检察厅，指控提交人及其同犯 Ashraf El-Hagog Jumaa 侵犯利比亚主权，无辜杀人以便破坏国家安全(死刑罪)，同谋犯下上述经策划的罪行；蓄意造成传染病，将阿里法塔医院的 393 名儿童注入艾滋病毒(死罪)，通过向儿童注射艾滋病毒的致命物质预谋谋杀(死罪)，违反利比亚法律和传统的行为(非法生产酒精，在公共场所消费酒精，非法外币交易和非法性关系)。在 1999 年 5 月 16 日，即在他们被捕后约四个月，提交人首次被提交人民检察厅。此后他们每 30 至 45 天就见一次检察官。

<sup>1</sup> 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5 月 16 日对缔约国生效。

<sup>2</sup> 见 El Hagog Jumaa 诉利比亚，第 1755/2007 号来文，意见通过日期 2012 年 3 月 19 日。

<sup>3</sup> Falaqa 方法，一种打脚底的酷刑。

## 初审

2.5 2000 年 2 月 7 日在人民法院(审讯危害国家罪行的特别法院)进行了审判。案子的审讯主要基于他们的供词以及国家元首提出的被告人为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摩萨德特务的指称。2000 年 2 月 17 日在审判开始后 10 天,提交人获得与律师见面的机会,同时得以向法庭指控他们受到酷刑。先前由于向他们施酷刑的人威胁他们,同时由于国家代表一直都在场,他们无法这样做,也无法与律师自由交谈。2001 年 6 月其中两名提交人撤回了供词,声明供词是在酷刑下作出的。<sup>4</sup> 法庭在没有要求调查的情况下驳回了他们的申诉。随后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提出了“无罪”的申诉。

2.6 由于法庭没有收集到支持他们犯下颠覆国家罪的充足证据,案子被暂停审理。2002 年 2 月 17 日人民法院停止诉讼程序,将此案转交给刑事检察厅。检察官撤回了颠覆罪并提交了非法测试药物和蓄意使 426 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新的指控。<sup>5</sup> 在整个期间,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均在拘押中。

## 二审

2.7 2002 年 8 月班加西上诉法院刑事起诉厅维持了检察官的指控,并将此案转交普通刑事法院及班加西上诉法院。这些指控是根据其中一位提交人<sup>6</sup> 和共同被告人向检察官的招供以及在其中一位提交人家的搜索<sup>7</sup> 结果提出的,在这次搜查中警察据称发现了五瓶被污染的血浆。二审在 2003 年 7 月开始。Luc Montagnier 教授和 Vittorio Colizzi 教授被任命为专家。2003 年 9 月这两位教授作证在阿里法塔医院的血样本是在 1997 年被感染的,这是这些护士在这所医院开始工作的一年多前,而且感染在他们被逮捕之后继续存在。专家认为感染的原因不明,并非蓄意。这种医院内部的感染是由非常具体、极具感染性的病毒引起的,是由于失职和卫生条件差造成的。<sup>8</sup> 2003 年 12 月法庭指派了有五位利比亚医生组成的第二个专家小组。2003 年 12 月 28 日第二个专家小组否定了由前两位知名教授提出的调查结果,他们指出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染病并不是由于医院内部感染造成,也不是由于重复使用受感染医疗器械造成的,而是蓄意的行为。被告要求进行进一步的专家审评,但法庭驳回了这一请求。

<sup>4</sup> Kristyana Valcheva 和 Nasya Nenova。

<sup>5</sup> 在向提交人宣读的指控中,受感染儿童人数从一审的 393 人上升到二审中的 426 人。

<sup>6</sup> Nasya Nenova。

<sup>7</sup> Kristyana Valcheva。

<sup>8</sup> “Luc Montagnier 和 Vittorio Colizzi 教授就利比亚班加西阿里法塔医院院内感染艾滋病毒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交的最后报告,巴黎,2003 年 4 月 7 日”,其结论指出“没有发现任何蓄意注射传染艾滋病毒的材料(生物恐怖主义)的证据。按照住院时间对血清阳性反应数据和分子分析结果进行的流行病学分层研究,完全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2.8 2004 年 5 月 6 日班加西上诉法院宣布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因造成 46 名儿童死亡、380 名儿童受感染而被判处死刑。在阿里法塔医院工作的九名利比亚人也被控犯有同样罪行，但在刑事诉讼一开始就被担保释放，同时在审前也未还押。他们被无罪释放。法庭宣布它对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指称犯有酷刑的八名利比亚保安人员没有管辖权，并将他们的案子驳回检察厅。2004 年 7 月 5 日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上诉利比亚最高法院。检察官要求法院撤销死刑并将此案送回班加西上诉法院重审，原因是在逮捕和审讯被控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时存在着“不当”。经过几次推延之后，最高法院废除了班加西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在 2005 年 12 月 25 日将案子驳回的黎波里法院重审。法院拒绝保释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理由是没有充分保障他们能再次出庭接受再审。

### 再审和释放

2.9 的黎波里法院于 2006 年 5 月 11 日开审。检察官再次要求对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判处死刑。提交人再次辩称无罪并重申他们遭受酷刑招供。2006 年 12 月 19 日他们被再次定罪和宣判死刑。法院指出不可以再次审查酷刑指控，因为另一法院已经驳回这些指控。

2.10 提交人于 2006 年 12 月 19 日上诉最高法院。2007 年 7 月 11 日最高法院举行听证，尽管最高法院本应在接到上诉后三个月内举行听证。提交人指称法院只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为时一天，并维持了死刑判决。2007 年 7 月 17 日最高司法理事会宣布根据与受害人家庭达成的赔偿协定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2007 年 7 月 24 日由于利比亚与其他国家政府的谈判，提交人被转移到保加利亚服刑。一到达保加利亚后他们就被立即赦免释放。

2.11 自 2000 年以来提交人提出的酷刑指称没有得到调查。<sup>9</sup> 2001 年 6 月 2 日两位提交人撤回了供词，<sup>10</sup> 指出供词是在胁迫下获得的，并提出了施酷刑的人的名字。直到 2002 年 5 月刑事检察厅才决定调查此事，并要求进行体检。随后向负责调查的保安机构的八名成员加上一名医生和一名口译提出了指控。2002 年 6 月一位由检察官任命的利比亚医生检查了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他认为由于“身体限制”或“殴打”造成的疤痕。班加西上诉法院在 2004 年 5 月 6 日的一项裁决中指出不能对此事作出宣判，因为罪行并非出现在其管辖区域范围内，而是在的黎波里上诉法院的管辖范围内。

2.12 2004 年 5 月 7 日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会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向缔约国发出了关于提交人及其共同被告人案件的紧急呼吁，要求缔约国就酷刑指控和不公正审判提供信息。他还要求说明为何对指称施酷刑的官员没有提起起诉。<sup>11</sup> 缔约

<sup>9</sup> 见上文第 2.5 段。

<sup>10</sup> Kristyana Valcheva and Nasya Nenova.

<sup>11</sup> E/CN.4/2005/7/Add.1.

国在答复时指出公共检察部已将警察的案子提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因为该法院是唯一有权听证此案的法院。对警察、医生和口译的审判于 2005 年 1 月 25 日开始。在听证中警察承认他们对其其中的一些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施行酷刑以获得供词。被告提交了一份专家医疗评估报告，而医疗评估是在指控事实出现 3 年后才进行的；法院搁置这份报告，理由是据正式任命为专家的利比亚医生称，那份医疗报告没有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没有发现酷刑痕迹，而无论如何这类指称的酷刑是在二至三周后就不会留下痕迹的。的黎波里法院于 2005 年 6 月 7 日以证据不足释放了嫌疑人。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提出上诉，但上诉于 2006 年 6 月 29 日被利比亚最高法院驳回。2007 年 8 月 10 日国际媒体报告了穆阿迈尔·卡扎菲总统的儿子赛义夫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被施酷刑，并被威胁将伤害他们的家人。<sup>12</sup>

## 申诉

3.1 提交人指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以及第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

3.2 他们指称 2006 年 12 月 19 日作出的死刑判决以及最高法院 2007 年 7 月 11 日维持判决的决定均是极为不公平和任意审判的结果。死刑违背了《公约》第六条第 2 款。不公平审判以及多项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的行为，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 2 款。将死刑随后改为无期徒刑并不能减轻缔约国对这一条款的义务。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是因为欧洲联盟、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为受感染儿童的家人提供了巨额赔偿并施加了很大压力。

3.3 提交人声称他们遭受酷刑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药物以获取供词，这违背了《公约》第七条。尽管有大量辅助证据以及警察作出的令人信服的证词承认某些酷刑行为，但所有被告均被无罪释放，表明审判是虚假的做戏。提交人强调不能单由他们承担举证责任。他们一得到机会就马上提出了申诉，而在被关押与世隔绝 8 个月后才得到法官的审理。当时他们身上有遭受酷刑的显著痕迹，但检察官和法庭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提交人抗辩他们遭受的虐待性质严重，而且是为了逼供，必须定性为酷刑。

3.4 提交人声称他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受的待遇也违反了第七条。他们回顾在被逮捕之后的 14 个月里他们被关押在警察所，而非监狱，而在最初几天他们与其他 20 多名妇女被关押在一个很小的、肮脏的没有窗户的牢房里。Kristyana Valcheva 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没有窗户、光线阴暗和不透风的小牢房里，牢房面积长 1.8 米宽 1.5 米，里头只有睡觉用的非常肮脏的一张褥子。牢房里没有厕所，她不得不在一个空的牛奶瓶里解手。其他提交人关押的条件也相似。他们几个月都没有洗澡，他们每 24 个小时才得到一次饮水，同时也没有书或杂志。Snezhana

<sup>12</sup> 根据采访记录，赛义夫指出“是的，他们受到电击酷刑，同时威胁他们家人将成为目标。但是，巴勒斯坦医生所指称的大部分都是谎言而已”。

Dimitrova 被迫以阿拉伯语祈祷，信奉伊斯兰教和放弃基督教信仰，将十字架从脖子上拿下来，在地上用脚踩碎并吐上口水。提交人指称他们被剥夺外出透气的机会，不能锻炼身体和与外界、包括家人接触，同时也不能单独看医生。

3.5 提交人认为对他们的逮捕和拘留是任意的。根据利比亚法律他们必须在被逮捕后 48 小时内见检察官。然而，他们直到 3 个月之后，即 1999 年 5 月 16 日才见到检察官。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当局仍然将他们与世隔离，直到 1999 年 11 月 30 日他们才最终允许见家人。因此缔约国违反第九条第 1 款。此外，据称提交人未被立即告知对他们的指控。只有他们见检察官时才被最后告知这些指控，而且没有律师在场；这就违反了第九条第 2 款。最后，提交人是在 2000 年 2 月 7 日才第一次上庭，因此他们没有立即让“司法当局”审理。在 2000 年 2 月 7 日之前他们只见过检察官，这就违反了第九条第 3 款。

3.6 提交人指称他们在被逮捕之后所遭受的待遇构成根据第十条权利被侵犯。他们还提到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称，并补充他们在被关押的共 8 年期间只被允许见过子女和其他家人三到四次。

3.7 提交人指称缔约国违反了他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因为在被关押的前三个月里他们并不知道对他们提出的指控。他们在审判时没有获得口译员的协助，而直至 2000 年 2 月 17 日，即开审 10 天后、被捕一年后他们才有律师为他们辩护。他们因遭受酷刑而被迫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词，同时他们在向检察官和法庭提出证词时没有律师在场，法院在没有提供充足理由的情况下不采纳 Montagnier 教授和 Collizi 医生的专家证词，尽管有一切迹象表明他们的调查结果足以使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免罪。在对 Valcheva 女士家进行第二次搜索时警察“幸运地”<sup>13</sup> 发现五瓶被感染的血浆，这次搜查既没有提交人在场也没有辩护律师在场。这次“发现”<sup>14</sup> 存在着种种漏洞加上检察官从未提交搜查记录，而法院本身也将一次搜查与另一次搜查结果混为一谈，证明这完全是虚假的。提交人还指称审判被无理推迟。<sup>15</sup> 提交人称这些都构成违反《公约》第十四条。

3.8 缔约国在种族、肤色、语言、宗教和国籍基础上加以歧视，因此据称侵犯了提交人在《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四条之下的权利。利比亚当局不公正地逮捕提交人，并给他们定罪，外国人作为替罪羊。提交人之所以被逮捕正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在种族、肤色、语言、宗教和国籍上与利比亚人不同，这违反了《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他们还报告在他们被逮捕之前就有几次外国医务人员被逮捕，这些事例说明存在一项歧视性的政策，旨在将外国人当作替罪羊。他们指出在本案被逮捕的利比亚人几乎立即就被释放或保释，在审判时未被还押，并最终被无罪释放。

<sup>13</sup> 在初次提交的来文中提交人将它放在双引号内。

<sup>14</sup> 对瓶内物质分析是 1999 年 3 月进行的；而对 Valcheva 家的搜索是 1 个月后进行。

<sup>15</sup> 自 1999 年 2 月 9 日逮捕日期起到最高法院 2007 年 7 月 11 日的最终判决之间长达 8 年多。

3.9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措施，提交人指出他们已将指控提交当局；在 2006 年已经提出了关于酷刑、任意逮捕和不公正审判的指控以及关于基于国籍的歧视的申诉。

3.10 关于对侵权行为的补救，提交人要求提供赔偿，包括对受到的身心伤害的财政赔偿。他们还要求敦促缔约国采取措施履行其根据《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应承担的义务，并确保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违反行为。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09 年 8 月 4 日的照会中请委员会宣布来文不予受理，但未能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

4.2 2009 年 12 月 8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缔约国指出它进行了冗长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以查明一个涉及到超过 450 名儿童基本生命权遭受侵犯案件的实情。缔约国认为已根据国际标准为提交人提供了适当审判的所有保障措施。利比亚民间团体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和驻利比亚的外交使团跟踪了案件全程。

4.3 缔约国回顾，1998 年 9 月 30 日利比亚公民 Mohammed Bashir Ben Ghazi 向公共检察部申诉他的 14 个月的孩子在班加西阿里法塔儿童医院住院时感染艾滋病毒。他的孩子被转送到埃及接受治疗，他是在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1998 年 10 月 12 日公共检察部展开调查，并接到更多的申诉。公共检察部接到了来自受感染儿童父母的 233 项申诉，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还发布了一项禁止所有在这一医院工作的外国人出境的禁令。

4.4 司法和公共安全人民委员会秘书作出第 28/1209 号决定，命令对在阿里法塔儿科医院接受治疗的受到艾滋病毒感染的儿童受感染一事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由刑事调查总署署长和高级调查人员以及医生组成。委员会于 1998 年 12 月 9 日开始工作，并最终查明了提交人、一位巴勒斯坦医生和一位保加利亚医生为嫌疑人。委员会在 1999 年 5 月 15 日结束工作，并向总起诉厅提交了一份载有证据和嫌疑人名单的报告，总检察厅传唤了嫌疑人。

4.5 1999 年 5 月 18 日总检察厅将本案提交人民检察厅继续开展调查。1999 年 2 月 17 日人民法院宣布无权审理本案，并将本案提交总检察厅。在刑事法庭开庭审判之前，被告指控他们在调查期间受到了警察的酷刑。起诉厅法官命令总检察厅的一位代表调查这些指控。调查结果报告了起诉厅，起诉厅在 2003 年 7 月 4 日将此案转交班加西上诉法院。法院对此案进行了 20 多次听证。2004 年 5 月 6 日法院宣判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死刑，并裁定对调查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酷刑指控没有地域管辖权。

4.6 从 2002 年 6 月 13 日开始，总检察厅接受了被告关于酷刑指控的证词。同时还接受了负责调查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委员会的证词。向的黎波里上诉法院提交了酷刑申诉，法院于 2005 年 6 月 7 日作出调查委员会无罪判决。提交人和共



同被告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免除死刑的上诉，最高法院于 2005 年 12 月 25 日作出判决，废除了死刑并将此案驳回班加西上诉法院由另一批法官审理。该法院对此案进行 13 次听证。2006 年 12 月 19 日该法院再次宣判提交人和共同被告人死刑。被告决定再次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作出判决。

4.7 被告接受了公平审判，他们获得了全部的法律保障。他们通过一个律师团队行使辩护权。审判是在公开法庭进行的，民间团体和人权组织的不少代表以及驻利比亚外交使团代表均在场。

4.8 关于酷刑指控，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 1999 年 4 月 11 日向负责调查此案的委员会提出了证词。巴勒斯坦医生和两位提交人(Nasya Nenova 和 Kristyana Valcheva)承认他们与其他提交人一道参与了犯罪。随后他们被送交总检察长办公室，由公共检察部的一位成员对他们进行审讯。巴勒斯坦医生和其中一位提交人就他们与保加利亚护士一道参与犯罪作出了详细供认。他们并没有提到调查委员会对他们施酷刑。他们对审理此案的所有不同的司法当局连贯地承认他们参与犯罪。直至人民法院宣布无权受理此案，并将此案转交南班加西一审法院起诉庭，他们才在 2002 年 6 月 3 日告诉法官他们遭受了酷刑。法官立即指示公共检察部调查指控。公共检察部展开了调查，并接受了巴勒斯坦医生、提交人和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证词。同时还下令进行体检。尽管检察部确认这些指控毫无理由，但还是向调查委员会成员提出指控。法院审理了此案，并于 2005 年 6 月 7 日宣布调查委员会成员无罪。

4.9 据缔约国记录，外国组织和外交使团成员在犯罪人在狱期间共进行了 115 次探访。在提交人被拘押期间司法秘书让提交人家人每星期天对他们进行一次探访。同时还允许保加利亚的一个律师团队协助为被告进行辩护。

4.10 至于被告对班加西上诉法院 2006 年 12 月 19 日判决提出的上诉抗辩，缔约国指出最高法院答复了提交人提出的所有抗辩。<sup>16</sup>

### 提交人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10 年 2 月 12 日的答复中重申他们对来文可否受理的论点，其中包括已用尽国内补救措施，同时对他们的指控提供了佐证。他们指出，关于案情，缔约国在意见中只对初次提交的来文中提出的论点作出了抗辩，但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抗辩证据。因此提交人请委员会审理其初次来文。

5.2 关于歧视的问题，缔约国认为所有证据都表明提交人有罪。提交人则声称他们由于国籍受到歧视，因为并不存在他们犯罪的任何证据，尤其是在他们被捕时。1999 年 2 月 9 日提交人和国际医疗小组的 18 名成员均为在班加西不同医院工作的保加利亚人被利比亚警察逮捕，这就是他们无罪的补强证据。在 7 天后其

<sup>16</sup> 2007 年 7 月 11 日利比亚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完全维持了班加西上诉法院 2006 年 12 月 19 日的原判。判决突出强调了被告人在审讯过程各项证词中的矛盾，其中一些证词确认了在审讯期间所作的供词，有的则否定了这些供词。



中 17 人被释放。对提交人的唯一证据是在他们被捕后获得的，其中包括在胁迫下获得的证词和在其中一人家里“意外”发现的五瓶被污染的血浆。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就提交人指控在不公平审判后判处死刑违反第六条，委员会注意到死刑未得到维持。由于被减免，因此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提出的申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委员会认为申诉的这一部分没有得到佐证，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sup>17</sup>

6.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没有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委员会宣布来文不可受理。然而委员会认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以及第十四条和二十六条提出的申诉证据充分，因此符合受理要求。

6.5 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第 1 款以及第十四条和二十六条所提出的问题可予受理。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为了得到他们的供词，他们被用药和施酷刑，而他们的指控在审判时得到体检报告和包括负责调查的警察证人提供的证词所证明。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不能只由他们来承担举证责任，他们在被拘押一年后最终见到法官，于是他们就立即提出了关于酷刑的申诉，尽管他们那时还有遭受酷刑的明显痕迹，但检察官或法庭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随后开展的调查并不是立即或充分的。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据，即其中一些提交人在各不同的司法当局对他们的案子进行审理时连贯表示他们参与犯罪；<sup>18</sup> 而直至 2002 年 6 月 3 日他们才告诉一名法官他们遭受酷刑；而这名法官则立即指示总检察厅对提交人和共同被

<sup>17</sup> 第 971/2001 号来文，Arutyuniantz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5 年 3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09/1995 号来文，Williams 诉牙买加，1997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61/2003 号来文，Kharkhal 诉白俄罗斯，2007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1141/2002 号来文，Gougnina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8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sup>18</sup> 见上文第 4.8 段。

告人的酷刑指控进行调查，总检察厅展开调查并接受了巴勒斯坦医生，提交人和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证词；总检察厅还下令展开体检；而尽管它确认酷刑指控毫无理由，但仍然对调查委员会成员提出了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供信息表明法院于 2005 年 6 月 7 日宣布调查委员会成员无罪。

7.4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在被捕后 14 个月里据称在警察所内而非在监狱里被与世隔绝地关押；同时在前几天里他们与其他 20 多名妇女被关在一个又小又脏没有窗户的牢房里，他们在不符合关押人员最低待遇标准、有辱人格的条件下被单独关押。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根据第七条提出又一项指控，即其中一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而皈依另一宗教。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并未否定这些指控。

7.5 委员会重申了其裁判规程，即举证责任不能由来文申诉人单方面承担，特别是考虑到申诉人和缔约国并不总是能平等地获得证据，而且往往是只有缔约国才掌握相关的信息。<sup>19</sup> 《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含有以下意思：缔约国有责任针对其及其代表的所有违反《公约》的指控本着诚意进行调查，并向委员会提供所能掌握的资料。在申诉人作了一切合理的努力为支持其诉求而收集证据，并且要作出进一步澄清只能依靠缔约国才能掌握的资料，在此情况下委员会可认为申诉人的指控已有证据证实，尽管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或缔约国提出相反的解释。委员会还回顾其裁决规程指出，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就声称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违反禁止酷刑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同时还有义务起诉、审判和惩治负有责任的人。<sup>20</sup> 关于与世隔绝的关押，委员会确认与外界无接触、长期被关押的痛苦。委员会回顾了其关于禁止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其中建议各缔约国应作出规定禁止与世隔绝的拘押。<sup>21</sup>

7.6 有鉴于上述种种，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提交人所受到的待遇构成酷刑，而缔约国提出的解释，包括关于 2005 年 6 月 7 日的黎波里上诉法院的判决，不足以证明在提出了遭受酷刑的明显证据，如体检报告和指控责任人证词中所提出的证据后，进行了立即、充分和公正的调查。委员会根据它所掌握的信息得出结论指出，鉴于提交人所受到的酷刑，以及由于未能对事实进行迅速、充分和公正调查，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7.7 委员会在作出上述结论后决定不再审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条提出的指控。

<sup>19</sup> 第 1412/2005 号来文, Butovenko 诉乌克兰, 2011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sup>20</sup> 第 1588/2007 号来文,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 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第 1780/2008 号来文, Zarzi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第 1781/2008 号来文, Djebrouni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以及第 1811/2008 号来文,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

<sup>21</sup> 《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40 号》，(A/47/40)，附件六，A 节，第 11 段。

7.8 关于第九条，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被逮捕后 3 个月才在 1999 年 5 月 16 日被带见检察官，而直至 1999 年 11 月 30 日前一直被与世隔绝关押，未能允许他们的家属探访，这是违反利比亚法律的。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没有立即向他们说明针对他们的指控；直到他们被带见检察官才最后听到这些指控，而当时没有律师在场；他们是在 2000 年 2 月 7 日才首次出庭，意味着他们没有被立即带见“司法当局”。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并没有否认这些指控。委员会没有得到缔约国提出任何有关解释，因此认为违反了《公约》第九条。<sup>22</sup>

7.9 提交人还指控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委员会就此注意到以下方面：提交人指控在他们被拘押的前 3 个月里没有被告知对他们的指控；他们在审判期间没有获得口译；直至审判开始后 10 天，也就是他们被逮捕后一整年才在 2000 年 2 月 17 日获得一位指派律师为他们辩护；他们在酷刑胁迫下被迫提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词；当他们在检察官面前作证时没有律师在场。此外，委员会还注意到法院在没有提供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否定了 Montagnier 教授和 Collizi 教授的专家证词；警察对 Valcheva 女士的家进行第二次搜查时发现了五瓶被感染的血浆，据称这次搜查是在没有提交人或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检察官据称从未提交搜查的正式报告。此外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指控审判被过分拖延，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争辩提交人得到了公平审判，他们得到了所有的法律保障，同时有律师团队协助行使辩护权，而审判是在公开法庭进行的，民间团体和人权组织以及驻利比亚外交使团的不少代表到场。

7.10 委员会重申其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其中坚信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的权利在一般地保证第十四条第 1 款第二句所述的原则之外，还保障平等机会和权利平等原则，并保证有关诉讼方不受任何歧视。<sup>23</sup> 在本案，委员会考虑到缔约国提供的信息，认为缔约国违反了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公平审判的权利，尤其是不被迫作不利于自己证词的权利以及违反了权利平等的原则，因为未能提供获得证据和专家意见的平等机会，同时侵犯了被告有充足时间和便利准备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也没有机会在审判开始之前获得律师。委员会认为对提交人的审判和定罪构成违反《公约》第十四条。

7.11 有鉴于上述结论，委员会决定不审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提出的指控。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本身和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以及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的情况。

<sup>22</sup> 第 1761/2008 号来文, Giri 诉尼泊尔, 2011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8 段。

<sup>23</sup> 《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 (A/62/40)(第一卷)，附件六，第 8 段。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 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 包括作为缔约国现已采取行动以外的一种选择, 对关于酷刑的指控进行充分和深入调查, 并起诉那些对提交人所遭受的待遇负责的人, 同时向提交人提供适当补救, 包括赔偿。此外还要求缔约国采取行动预防今后发生类似违约情况。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 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 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 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 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 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 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泛分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语本, 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 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Z. 第 1883/2009 号来文, Orazova 诉土库曼斯坦  
(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Svetlana Orazova (由律师 Timur Misrikhanov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土库曼斯坦
来文日期:	2009 年 3 月 1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无正当理由地限制在国内外旅行; 警察非法监视, 包括非法搜查住处、监听电话和截查来往通信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有效补救办法; 迁徙自由/自由出入任何国家, 包括本人自己的国家; 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众健康或公共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及自由采取的必要限制措施; 获得独立和不偏倚法庭公平审理的权利; 对隐私、家庭、住家或通信任意或非法的干预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甲)和(乙)项; 第十二条第 1 和 2 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 第十七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Svetlana Orazova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883/2009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勋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桑贝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Svetlana Orazova 女士，1964 年出生，是土库曼斯坦国民。她宣称，土库曼斯坦侵犯了她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和(乙)项、第十二条第 1 和 2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十七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sup>1</sup> 提交人由律师，Timur Misrikhanov 先生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4 年 1 月，土库曼斯坦边境人员不作任何解释便阻止提交人登上阿什哈巴德飞往塔什干的航班。<sup>2</sup> 自那时起，她就一直既无法前往国外，也不能在本国境内旅行。2008 年 6 月，她的丈夫 A.O.先生也被阻止登上阿什哈巴德飞往莫斯科的班机。他本要前去莫斯科治疗心脏病。当局还禁止她女儿，A.S.女士，当时北京大学的在校生离境出国。<sup>3</sup>

2.2 2004 年 7 月，提交人的父亲，一位达沙古兹区的居民，到阿什哈巴德市求医治病。在阿什哈巴德，她与父亲遭非法逮捕并在警署里被拘押了八个小时。该事件之后，提交人的父亲被送回达沙古兹，而提交人及其家庭成员则被禁止前往达沙古兹探望父亲。提交人称，2005 年一直在阿什哈巴德市与她共同生活的母亲去世，然而，她父亲则因当局禁止旅行，甚至都无法前来参加妻子的葬礼。2005 年 9 月，她父亲辞世，她本人不被允许前往达沙古兹出席父亲的葬礼。

2.3 2007 年 11 月 24 日，提交人与女儿被禁止登上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继上述种种事件之后，提交人曾要求当局澄清对她本人及其家人的旅行禁令。2007 年 12 月 17 日，她向国家外籍人登记署提出了申诉(自 2007 年起改为“土库曼斯坦移民局”)，但却未收到任何答复。然而，在与该机构雇员交谈期间，她得悉旅行禁令是国家安全部下达的指示。然后，她与国家安全部联系，以求搞清楚该限制令的理由，但未获任何结果。然而，在与国安部一位雇员，G.K.先生的会晤期间，她非正式地获悉，之所以下达不准出境和国内旅行的限制令是因为提交人的兄长，Khudaiberdy Orazov 先生，曾任土库曼斯坦部长内阁中的副总理，2001 年离境出国后，加入了海外反对派团体。

2.4 在她向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和检察厅提出的申诉未获得答复之后，提交人即诉诸于法庭。2008 年 2 月 16 日，科彼特达格区法庭拒绝受理她的案件，理由是她未按法律规定先启动庭外解决办法，然而再向法庭投诉，并劝她直接向外籍人登记署或该署的上级机关申诉。2008 年 4 月 16 日，阿什哈巴德市法庭基于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她要求推翻前案的上诉。2008 年 5 月 20 日，最高法院维持了

<sup>1</sup> 1997 年 5 月 1 日《任择议定书》对土库曼斯坦生效。

<sup>2</sup> 据档案材料，2004 年 4 月 8 日提交人向国家安全部提出了申诉，但她显然未得到答复。

<sup>3</sup> 尽管来文提及提交人家庭的其他家庭成员，然而，来文仅代表她本人。因此，她是唯一的据称受害人。

前述各法庭的判决。提交人又向土库曼斯坦总统提出了申诉，然而，此后再无消息。

2.5 2009年1月16日，提交人向土库曼斯坦总检察厅提出了指控侵犯其家人离境出国权的申诉。2009年2月3日总检察厅发函通告提交人，根据2005年12月7日《移民法》第32条，暂行限制她全家人的离境权，而且当时尚无理由撤销暂禁令。2009年2月20日，提交人又提出一请求，要求澄清限制其全家离境出国权的法律理由。2009年3月10日，总检察厅复函引述了《移民法》第32条的同一条款，然而却未阐述下达暂禁令的任何法律理由。总检察厅还说，目前并未限制她女儿，S.的离境出国权。

2.6 提交人说，根据2005年12月7日《移民法》第26条第1款和1995年6月18日《土库曼国民出入土库曼斯坦国境程序法》第1条，土库曼斯坦国民有权出入国境。同一条款还阐明，不得剥夺土库曼国民出入国境的权利，然而，根据《移民法》第32条，不妨暂时限制出境权。下达对出境权的限制令必须符合两项要求：(一) 限制令必须是暂行禁止，即：必须设定禁令的具体有效时限；(二) 此限制必须符合《移民法》第32条第1款所列可暂行限制的11项理由其中的任何一项，即：(1) 当事人知晓构成国家机密的情报——直至依法确立的保密期满为止；(2) 出境申请人身负刑事诉案——直至刑讼结案；(3) 申请人被判定有罪——直至服满刑期，或被解除刑事责任；(4) 申请人回避履行法庭判决规定的义务——直至履行完义务为止；(5) 申请人明知故犯，提交伪造的个人资料；(6) 当事人正处于应征入伍期——直至服满兵役或被解除兵役，然而，出国永久移居则除外；(7) 申请人系民事诉讼的被告——直至法律诉讼结案；(8) 法庭判决宣布申请人系屡犯，犯有危害性极大的罪行，或正受到行政治安监视——直至判决撤销或监视终止；(9) 当有理由认为一旦迈出境，土库曼国民即会沦为人口贩运或奴役的受害者；(10) 申请人以前在国外滞留期间曾犯有违反东道国法律的行径；(11) 当事人离境出国有损国家安全利益。

2.7 提交人宣称，她及其家人均不属上述任何一类被限制出境旅行的人。当局未就限制作出任何正式解释。她所掌握的唯一证据是，国家安全部下达的指示，指令各警署，一旦发现她或其家人打算离开该市区域，即予以扣留。她宣称，这类通常是针对刑事犯下达的指令。提交人称，自2004年以来，他们的所有信件都被拆开，接受检查。她的家庭遭到24小时的监控，电话被监听。

2.8 提交人还宣称，随时国安人员和警察都会登门入室搜查。自2004年以来，她曾向各类国家机构提出过申诉，包括移民局和国家总统，均无济于事。她还说，她无法得到合格的法律援助。继情报局和司法部官员们下达了指令之后，律师们不肯代理她的案件。

## 申诉

3. 提交人宣称，所报告的事实表明，缔约国侵犯了她依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甲)和(乙)项、第十二条第1和2款、第十四条第1款和第十七条第1款享有

的权利，她请委员会认定当局应就其行为致使她所蒙受的精神和物质伤害支付赔偿。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0年3月26日，缔约国发表了意见。缔约国驳斥提交人有关限制迁徙自由的指控毫无根据。缔约国说，提交人的女儿 S. 被北京大学招收入学，并多次自由出境前往中国。2010年1月19日，毕业之后，她返回了土库曼斯坦，而且她不是出入境权受任何限制的对象。

4.2 2007年，提交人的儿子 M. 被俄罗斯联邦专业音乐学院招收入学。他目前暂时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并定期返回土库曼斯坦家中探亲。他的出入境权不受任何限制。至于提交人的丈夫 Ovez, 2007年他飞离土库曼斯坦，前往莫斯科接受心脏手术。然而，他从未在心血管治疗中心登记过，而是前往莫斯科建筑工地打工，并于2008年返回土库曼斯坦。

4.3 缔约国驳斥了提交人关于2005年她被禁止参加其父亲葬礼之说(见上文第2.2段)，指称她与其他亲属系故意不出席葬礼，原因是与其父亲之间就资产之争发生的相关冲突。缔约国还说，除 Khudaiberdy Orazov 先生之外，当局暂限离开阿什哈巴德的名单上并无提交人及其亲属的姓名。

4.4 缔约国还说，据缔约国所掌握的情况，提交人并无合法离境出国的意向，而且国家主管机构未曾试图拦截过提交人离境出国。缔约国还反驳了提交人的指控称她曾从国家全部的一位雇员，G.K.先生那儿打听到的传说，即她兄长，Khudaiberdy Orazov 先生的所有亲戚都被限制离境出国或在国内旅行(见上文第2.3段)。对此，缔约国说，经向 G.K.先生询问，他否认了此事。

4.5 至于提交人关于她及其父亲遭阿什哈巴德市警察逮捕，不提出任何刑事控罪，即被拘押了8个小时的宣称(见上文第2.2段)，缔约国说，并无他们遭逮捕或拘留的记录。缔约国还说，除了她兄长，Khudaiberdy Orazov 先生之外，土库曼斯坦内务部并未对提交人的任何一位亲戚签发过搜查证。

4.6 至于提交人关于国内执法机构监听她的电话、监视她的住所并非法搜查之说(见上文第2.7和2.8段)，缔约国说，根据国家立法，上述任何行动都得事先获得检察官批准；没有档案记录针对提交人曾采取过上述这类行动。

4.7 至于提交人称自从律师获得不得为她代理出庭的指示后，她无法聘雇到合格的法律协助一说，缔约国说，她若不信任国家机构的辩护活动，她可以寻求私人开业律师提供的法律协助(在土库曼斯坦约有40位这类律师及律师事务所)。

4.8 缔约国得出结论，提交人的指控毫无根据。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8年6月23日，提交人发函称，缔约国仍未提供资料，阐明限制她及其家人离境出国权的法律依据。此外，主管机构是否可撤销国家安全部下达的限制



令还尚不清楚。她还说，缔约国称没有限制她自由出入国境的权利，是在误导委员会。

5.2 至于在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私人开业律师，提交人说，一个 5 百万人口的国家仅有 40 名辩护律师。因此，这些律师不仅忙不过来，而且人们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此外，因国家全部官员对之施加的压力，并且有可能会面临丧失开业执照的风险，这些律师从一开始就拒绝出面代理，诸如提交人这类的申诉人。

5.3 关于缔约国辩称只有获得检察主管机构的批准，才可采取任何调查措施之说，提交人坚称，针对诸如她这类人决无监听电话、监视和非法搜查方面的限制。

5.4 提交人确认了缔约国关于允许她女儿离境飞往北京和她儿子飞往俄罗斯联邦就读的情况，但这只是在她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申诉之后才得以放行。提交人本人从未被允许离境出国。

5.5 提交人还重申她的申诉并要求委员会恢复他们离境出国和在本国境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她说，由于对她丈夫离境出国权的限制，他无法前往莫斯科进行心脏手术，因此于 2009 年底去世。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和(丑)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而且国内补救办法已援用无遗。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宣称，她依《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应保障的国境内迁徙自由遭限制，而且她依据第十七条第 1 款指称，她们全家遭 24 小时监视、通信被拆开检查，并称他们是电话被非法监听和遭入户搜查的受害者。鉴于委员会所收悉的资料，委员会认为，这些宣称并无充分证据，达不到受理目的的要求。因此，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规定宣布，上述宣称就《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和第十七条第 1 款提出的问题不可受理。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存在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现象，然而却无法列举任何情况或缘由来佐证此宣称。在无任何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来文此部分内容证据不足，满足不了受理目的的要求，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规定不予受理。

6.5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提出的其余指称得到论据充足，符合受理目的，并着手审理其所涉案情。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参照所收悉的一切资料审议了该来文。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宣称，国家当局对她的迁徙自由权规定了无理的限制，因此，她被阻止离境出国，系违反《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的行为。缔约国驳斥这些为毫无根据的指控。委员会说，从所掌握的材料来看，2009 年 2 月 3 日和 3 月 10 日检察厅复函均确认，根据《移民法》第 32 条规定，对提交人及其家人离境出国权实施暂行限制，但却未具体阐明可合理规定各项限制的法律理由(见上文第 2.5 段)。

7.3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迁徙自由问题的第 27(1999)号一般性意见，据此，迁徙自由是个人自由发展必不可缺的条件。<sup>4</sup>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第十二条第 2 款所列的并非是绝对的权利，且可按第十二条第 3 款所列各项允许的限制规定加以限制，据此，任何上述所列限制都必须依据法律和出于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健康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并应符合《公约》确认的其它权利。委员会第 27 号一般性意见也指出，“如果这种限制仅仅是有利于可允许的意图是不够的，它们还必须是为保护这些意图而必不可少的才行”而且“限制性措施必须符合相称原则；必须符合履行保护的职能”。<sup>5</sup>

7.4 参照 2009 年 2 月 3 日和 3 月 10 日总检察厅的函件(见上文第 2.5 段)，显然清楚确认了提交人所述她的离境出国权遭到暂行限制的指称，并鉴于缔约国就此未作出任何解释，委员会认为，依据《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规定，提交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

8.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缔约国侵犯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第 2 款规定提交人应享有的权利。

9. 按照《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补救应包括立即采取措施恢复 Orazova 女士凭她本人意愿出入境的自由，同时亦给予相称的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步骤，谨防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

<sup>4</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55/40(Vol.I))，附件六，第 A 节第 1 段。

<sup>5</sup> 见，第 27 号来文，第 11 和 14 段；第 1472/2006 号来文，Sayadi 和 Vinck 诉比利时，2008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5 段；第 1585/2007 号来文，Baty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9 年 7 月 3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

资料，说明为落实委员会《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将本《意见》译成该国官方语言并广为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AA. 第 1905/2009 号来文, Khirani 诉阿尔及利亚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Farida Khirani (由阿尔卡拉马人权基金代理)

据称受害人: Maamar Ouaghliiss(提交人丈夫)、Mériem Ouaghliissi 和 Khaoula Ouaghliissi(提交人女儿)以及提交人本人

所涉缔约国: 阿尔及利亚

来文日期: 2009 年 7 月 1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强迫失踪

程序性问题: 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 禁止酷刑和残忍及不人道的待遇; 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被剥夺自由者享有人道待遇的权利; 法律人格获得承认的权利; 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六条第 1 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 至第 4 款; 第十条第 1 款和第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审议了 Farida Khirani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向  
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第 1905/2009 号来文,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根据《议事规则》第 91 条, 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没有参与本来文的审议。

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沃尔特·凯林先生的个人(赞同)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个人(赞同)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 意见

1.1 2009年7月1日来文提交人是 Farida Khirani, 1963年8月25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瓦尔格拉。她代表丈夫 Maamar Ouaghliissi(1958年10月23日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提交来文。她称,他是缔约国违反第二条第3款、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款和第十六条的受害人。提交人也代表她本人及其两个女儿 Mériem 和 Khaoula Ouaghliissi(分别于1988年11月25日和1990年5月1日生于阿尔及利亚吉杰勒)提交本来文。提交人及其女儿认为,她们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行为的受害人。提交人由阿尔卡拉马人权基金代理。<sup>1</sup>

1.2 2009年12月17日,新来文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决定驳回缔约国2009年11月25日关于本来文可否受理问题与案情分别审议的请求。

### 提交人陈述的背景事实

2.1 根据同事的证词,1994年9月27日, Maamar Ouaghliissi 在国家铁路公司工作期间被捕。他是该公司基础设施部的质量检察员。当日中午左右,至少三名自称来自安全部门的便衣人员抵达国家铁路公司总部。他们开着一辆白色的尼桑四轮驱动巡逻车,而通常使用这类汽车的是刑侦警察与军方情报和安全部(情安部)的人。他们找不到 Maamar Ouaghliissi, 就决定等候他,并阻止他的同事离开,很可能是担心他们会去向他报警。大约下午1时,受害人午餐后返回。这些人要求他在两名官员陪伴下,开自己的汽车跟随他们;他们未作任何解释,也未出示逮捕证。

2.2 提交人指出,在前几天以及整一个月中,君士坦丁发生了许多逮捕和绑架,特别是逮捕和绑架地方议会成员和代表以及单纯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活动者和支持者。许多目击者说,警方逮捕的所有人都好几周或好几个月被单独拘禁在君士坦丁警察总部,遭受了系统的虐待,然后转押到情安部所属的第五军区地区研究和调查中心。情安部绑架的这些人被直接带到中心,许多人失踪了。Maamar Ouaghliissi 很可能是作为这一行动的一部分被捕的。这一行动是由君士坦丁警方与情安部协调和计划的。

2.3 被捕之后,国家铁路公司的人事部负责人通知了管理层,后者向君士坦丁第五军区提出了申诉。另外,在逮捕发生之后,家人立即前往君士坦丁警察总部、市内宪兵队和各军营查找。早在1994年10月,受害人的父亲就前往君士坦丁法院,查问受害人是否已经被提交给检察官。由于这些努力毫无结果,他向检察院提出申诉,抱怨其儿子失踪和被绑架。然而,君士坦丁检察院从未同意开展调查或就申诉采取行动,并且检察部门拒绝向其父提供申诉登记号。

<sup>1</sup> 《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于1989年9月12日对阿尔及利亚生效。

2.4 逮捕事件八个月之后，提交人从一个曾被拘押者处听说丈夫被关押在情安部所属的第五军区 Mansourah 军营。Maamar Ouaghliissi 的父亲于 1995 年 5 月前往军营询问，但是士兵将他挡回，否认关押了他的儿子。直到 1995 年底，提交人或其亲属才从陆军义务兵或释放的囚犯那里听说了一些消息，即她的丈夫正被关押在情安部某个军营中。一名士兵在 1996 年提供的消息说她的丈夫当时依然在押。以后，家人再未得到他的消息。

2.5 1998 年，来文提交人向君士坦丁检察院提出关于丈夫被绑架和失踪的申诉。然而，鉴于从来没有对目击者得到过询问，似乎没有开展调查。由于她听说每一省开设了办公室，对失踪者家人的申诉进行登记，因此于 1998 年 9 月 28 日前往其中一处，提出另一申诉。申诉得到了登记，但是似乎没有开展任何调查。

2.6 2000 年 4 月 23 日，宪兵传唤了提交人，对她说，关于她丈夫失踪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2000 年 5 月，她再次被君士坦丁所辖的 Hamma Bouzinae 专区传唤；她得到了一份内务部和地方当局的正式报告，通知她“所开展的调查尚未能够确定有关人员的下落”。没有向她说明开展了什么调查，或者是由哪个当局开展的。2000 年 6 月被君士坦丁检察官再次传唤时，提交人因为继续在各主管当局查询而受到指责，特别是因为她于 2000 年 1 月 15 日向第五军区司令发信，请求提供其丈夫的下落；但该信依然未获答复。2001 年 2 月 6 日，提交人还向司法部发出一封挂号信。然而，尚未得到答复。

2.7 2006 年，作为她努力从宪兵处获得正式失踪证明以领取家庭福利补助的结果，她得到了一份“国难所致失踪正式证明”，但是颁发证明的宪兵部门并未开展任何调查。

2.8 2005 年 6 月 27 日，提交人将案件提交到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然而，鉴于阿尔及利亚当局拒绝为案件提供解释，这一努力也毫无结果。最后，在国家保护和增进人权咨询委员会地方办事处前的数次和平集会中，提交人数次受到警方的苛责和暴打。

##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她的丈夫是强迫失踪行为受害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第十条，以及第十六条本身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提交人还认为，由于 Maamar Ouaghliissi 失踪对她女儿和她本人造成痛苦、并且没有关于其命运的信息，所以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3.2 提交人指出，根据 Maamar Ouaghliissi 长期失踪及其被捕的情节，有理由认为他已在拘押中丧生。她称，根据委员会的第 6 号一般性意见，单独拘押对生命权造成极大的侵犯危险，因为受害者完全处于看守者的摆布，而后者由于环境的性质而不受任何监控。另外，即使失踪没有致命的结果，但是因为缔约国没有履行关于保护基本生命权的责任，使受害者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构成了违反第六条的行为。缔约国没做任何努力来调查他的下落，所以完全没有履行责任来保护

Maamar Ouaghliissi 的生命。因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已经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3.3 根据委员会的案例，提交人指出，强迫失踪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因此，Maamar Ouaghliissi 无限期拘留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与家庭和外界的隔绝，就 Maamar Ouaghliissi 的待遇来说，构成了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七条。提交人还认为，对她本人及其近亲来说，她丈夫的失踪一直并且永远是一个令人心力交瘁的、痛苦和可怕的折磨，因为家人完全不了解受害人的命运；并且如果他已经死亡，也不了解他死亡的情景和埋葬地。另外，Maamar Ouaghliissi 现年 18 岁的女儿 Khaoula Ouaghliissi 尤其受到父亲失踪的影响，至今患有需要不断和经常治疗的长期精神病。提交人援引委员会的有关案例，认为缔约国也侵犯了她自己及其女儿 Mériem 和 Khaoula Ouaghliissi 的权利，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

3.4 另外，提交人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局尚未承认自己曾非法逮捕和拘留 Maamar Ouaghliissi，并且故意隐瞒了其命运的真相。这也是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1 至 4 款的行为。就第九条第 1 款来说，提交人提请注意当局逮捕 Maamar Ouaghliissi 时没有逮捕证，并且没有告知他被捕的原因。他的家人都未再能见到他或者在他被绑架之后与他通信。如他被捕时在场的同事所能证实的那样，逮捕情况表明，Maamar Ouaghliissi 根本没有被告知被捕原因、或者收到过说明逮捕原因的逮捕证；这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2 款。另外，Maamar Ouaghliissi 从来未被提交给法庭或任何其他司法机构，比如在法定拘留期结束时拥有本案管辖权的君士坦丁检察官。提交人指出，单独拘禁本身就可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3 款的行为，并认为缔约国已经违反了这一条款。最后，鉴于 Maamar Ouaghliissi 在整个拘押期间、并且依然无限地处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从未能够质疑他被捕的合法性或向法官申请释放，或者甚至请一个自由的第三方提出这一上诉或者替他辩护。这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4 款。

3.5 提交人还坚称，由于她的丈夫遭到了违反《公约》第七条的单独关押，所以从未得到人道的或尊重人的固有尊严的待遇。因此，他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十条第 1 款行为的受害者。

3.6 Maamar Ouaghliissi 作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因为那些对其失踪负有责任的人拒绝说明他的命运和下落，不承认他已经被剥夺自由。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提交人就此援引了委员会在强迫失踪的判例中所采取的立场。

3.7 提交人也坚称，Maamar Ouaghliissi 作为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实质上不能够行使权利质疑对他拘押的合法性。由于缔约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其亲属的一切努力做出回应，所以没有履行义务，保障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彻底和尽职调查受害人的失踪问题和命运，并让家人了解调查的结果。2006 年 2 月 27 日关于执行《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第：06-01 号法令颁布后，在法律上规定了实行完全和普遍赦免，从而缺乏有效救助的情况更加明显。《宪章》禁止诉诸法律补救办

法来揭发强迫失踪等严重罪行，否则将处以监禁，以确保违法行为的责任人不受法律惩罚。这一赦免法违反了缔约国调查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义务，侵犯了受害者寻求有效救助的权利。提交人认为，就她的丈夫、女儿和她本人来说，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3款。

3.8 提交人最后指出，对违反《公约》的行为提供有效补救办法的义务，是保障《公约》所规定权利的积极义务的关键要素，因此不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六条规定的权利，必然属于侵犯《公约》第二条第3款所规定权利的情形。

3.9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强调，她和家人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警方、法院及其他当局没有开展适当调查。因此，它们不仅未履行缔约国的国际义务，而且未履行国内法的规定，因为《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当刑事警察得知有违法现象发生时，应按国家检察官的指示或依职能进行初步调查”。<sup>2</sup> 君士坦丁检察官尽管两次收到了正式申诉，但拒绝开展调查，履行其法律义务。相反，他甚至指责提交人继续到军方部门查询。虽然缔约国设立了办公室以接待失踪者家人并根据当局的规定而负责开展彻底调查，协助他们寻找亲属，但是却没有帮助受害人的父亲获得任何进一步的信息。缔约国没有开展任何调查，并且官员从未与受害者家人或目击者面谈过。

3.10 提交人坚称，在关于执行《和平和民族和解宪章》的第06-01号法令颁布之后，她在法律上再也没有权利诉诸司法程序。<sup>3</sup> 提交人试图获取的所有补救办法不仅无效，而且现在再不对她适用了。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9年11月25日，在“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与实施《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有关的来文不予受理参考备忘录”及其所附的另一份说明中，缔约国表示反对受理来文。

4.2 缔约国在“备忘录”中称，一些来文指控公职人员或代表公共当局行事的人应为有关期间——1993年至1998年——发生的强迫失踪案件负责，但是审议这些来文时应当考虑到政府努力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国内普遍的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在那一时期，政府要与一些松散的团体作斗争。所以在平民中采取的有些行动引起了误解。平民很难区分恐怖主义集团的行动和执法当局的行为，并经常认

<sup>2</sup> 1966年6月8日经修订和补充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第66-155号法令。

<sup>3</sup> 提交人指出，《宪章》拒绝“任何旨在让国家为故意失踪现象承担责任的指控”。此外，2006年2月27日颁布的法令第45条规定“不能对共和国防卫和安全部队(包括所有部门)成员所采取的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以及保护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任何个人或集体诉讼。所有的指控或起诉都不被主管司法机构受理”。第46条规定，“通过书面或其他形式的行为，利用或以国家遭遇的损害为工具，对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机构造成伤害、危害国家安定、损害为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声誉、或在国际上玷污阿尔及利亚形象的任何人都将被处以3至5年监禁和250,000至500,000第纳尔的罚款”。



为强迫失踪事件是执法当局所造成的。然而，强迫失踪的情况有很多原因，缔约国认为不应归咎于政府。根据很多独立来源提供的数据，尤其是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资料，在该时期的阿尔及利亚，一般概念的失踪人员涉及六种互不相关的情况，没有任何一种可归咎于政府。缔约国列举的情况包括，一些人被其亲属宣布失踪，但是实际上自己秘密返回，以加入武装团伙。他们要求家属宣称他们被安全机构逮捕，以“掩盖行踪”并避免被警察“骚扰”。第二种情况是，一些人被安全部门逮捕后报称失踪，其实是在被释放后乘机躲藏起来。还有一种情况是失踪的人被武装团伙绑架，但因为武装团伙没有被人辨认出来，或是盗用警察或军人的制服或身份证明文件，所以被错误地当成武装部队或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第四种情况是，家人寻找的人因长期的个人问题或家庭纠纷主动放弃亲属，有时甚至离国他去。第五种情况是，家人宣称失踪的人事实上是被追捕的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在敌对武装团伙之间“派系内讧”、“理论之争”或“战利品分赃不均”之后被杀害，葬身丛林。缔约国最后提到的第六种可能性是，报称失踪的人员要么在国内要么在国外，以虚假身份生活。

4.3 缔约国强调，考虑到一般概念失踪所包含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阿尔及利亚立法机构在对《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进行全民公决后，建议在整体框架下处理失踪人员的问题。根据这一方针，在“国难”背景下处理所有失踪人员，向所有受害者提供支持，以使其能够克服这一困难，并使所有失踪受害者及其权利受益人都有获得赔偿。根据内政部所作的统计，申报的失踪案件有 8,023 起，审查了 6,774 起案件，5,704 起案件经核准而获得赔偿，934 起案件被驳回，还有 136 起正在审查之中。已对相关受害人支付了 371,459,390 第纳尔的赔偿。此外，还有 1,320,824,683 第纳尔是以每月抚恤金的方式支付的。

4.4 缔约国还强调指出，提交人未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强调，必须区分政治或行政机关的简单程序、涉及咨询或协调机构的非争讼性补救办法以及诉诸各种司法机构的争讼性补救办法。申诉人向政治或行政机关写了信，向咨询或协调机构提出了申诉，并向检察部门代表(检察长或检察官)递交了请求，但实际上没有启动法律程序并运用上诉和复审等所有可用的申诉手段将其进行到底。在所有这些机关中，只有检察部门的代表有权依法开展初步调查并将案件提交给调查法官。在阿尔及利亚司法系统中，只有检察官负责接收申诉，并在必要时提起刑事起诉。但是为了保护受害者或其权利受益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授权他们可以直接向调查法官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受害者，而不是检察官向调查法官提起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和第 73 条规定的这一补救办法没有得到利用，而受害人本应依此提出诉讼，并促使调查法官进行调查，即使检察部门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4.5 缔约国还注意到，在提交人看来，由于全民公决通过了《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及其执行法律，尤其是第 06-01 号法令第 45 条，因此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为失踪受害者家人提供任何有效和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据此认为没有义务将此案提交有关法院，而是预断法院在实施该法令中的立场和结论。然而，提交人不能援引该法令及其执行条例而免除自己未利用现有司法程序的责任。缔

约国指出，根据委员会的判例，“当事人不能因为其对于补救办法的主观想法或推测而无需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

4.6 缔约国随后又提到了《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及其实施法律的性质、基础和内容。缔约国强调，根据已成为国际和平权的和平不可剥夺的原则，委员会应促进和巩固这一和平并促进民族和解，以使受内乱影响的国家增强能力。为努力促进民族和解，政府通过了《宪章》，其执行法令为犯下恐怖主义罪行和以民间争端条款论处的人规定了终止刑事诉讼以及减刑或加刑等法律措施，但不包括从事集体屠杀、强奸或在公共场所进行爆炸袭击的主犯或从犯。这一法令还提供了正式宣布推定死亡的程序，为处理失踪问题提供支持，使权利受益人作为“国难”受害者获得补偿。此外，还采取了社会经济措施，包括帮助一切被视为“国难”受害者的人再就业和获得赔偿。最后，法令规定了政治措施，禁止任何过去操纵宗教造成“国难”的人从事政治活动，并宣布不受理任何对阿尔及利亚国防和安全部门成员为保护人员和财产、捍卫国家及其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而提起的个人或集体诉讼。

4.7 缔约国指出，除了为“国难”所有受害者设立赔偿基金外，拥有主权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承认民族和解措施是抚平创伤的唯一方式。缔约国坚称，颁布《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就是想避免法庭上的对抗、媒体上的发泄以及政治上的争端。因此缔约国认为，来文的指称属于《宪章》规定的国内整体解决机制范围之内。

4.8 缔约国请委员会：注意提交人对事实和情况的描述多么类似于其他来文提交人的描述；兼顾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注意到提交人并未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注意到缔约国政府设立了全面的国内机制，根据《联合国宪章》与后续条约和公约的原则为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而采取措施，处理和解决这些来文所涉的案件；判定这些来文不可受理并指示提交人诉诸适当的法院。

4.9 另外，在备忘录所附的说明中，缔约国强调它已经考虑了委员会决定合并审议本来文可否受理问题与案情并请它提交对案情的意见以及对可否受理问题的任何新意见的普通照会。缔约国就此提出一个问题，即：提交给委员会的一系列个人来文是否是实际上滥用程序，旨在向委员会提交一个笼统的、委员会对其原因和背景都不了解的历史问题。这些“个人”来文纠缠的是失踪现象发生的总体背景，只是侧重于安全部门的行为，从未提到各种武装团伙的行为，而这些团伙采用了违法的伪装技巧让武装部队来承担责任。

4.10 缔约国坚称，在对可否受理问题做出决定之前，缔约国将不会对这些来文的案情表示意见，因为在审议案情之前，任何司法机构或准司法机构的义务首先是处理先决问题。缔约国认为，关于合并审议可否受理问题与案情的决定——且不说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与它商议——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固有属性上，都严重妨碍来文的适当处理。缔约国指出，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与委员会审议来文可否受理有关的章节与审议案情的章节是分开的，因而可以分开审议这些问题。缔约国强调，特别是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上，这些来文都没有向

国内法院提交过，以允许阿尔及利亚司法机关审议。所提交的来文只有少数送到有权听取上诉的二级刑事调查法院。

4.11 缔约国回顾了委员会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义务的案例，强调指出，提交人仅对胜诉前景有所怀疑或担心延误，并不能免除其用尽这些补救办法的义务。关于《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颁布是否使人无法诉诸这方面任何补救办法的问题，缔约国回答说，提交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提交申诉以供审议，使阿尔及利亚当局至今也无法就《宪章》适用的范围和限度做出决定。此外，根据有关法令的规定，不可受理的诉讼只是那些针对“共和国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按照共和国要求的基本职责采取的行动，即保护人民和财产、捍卫国家及其机构所采取的行动而提起的诉讼。另一方面，涉及国防和安全部队行为的任何指称，如果能够证明是在任何其它情况下采取的，都可由主管法院进行调查。

4.12 最后，缔约国就《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所规定的解决机制而重申了立场。

### 提交人对缔约国可否受理意见的评论

5.1 2012 年 1 月 6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问题的意见提交了评论，并就案情提出了进一步的论据。

5.2 提交人认为，不应由缔约国决定可否提请委员会注意某一具体情况。此外，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的全面解决机制或任何其它立法或其它措施，不应构成宣布来文不予受理的理由。此外，委员会已经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局采取的这些国内措施，本身就是侵犯了《公约》所规定的权利。<sup>4</sup>

5.3 提交人回顾说，1992 年 2 月 9 日阿尔及利亚颁布的紧急状态，不影响向委员会提交个人来文的权利。《公约》第四条规定，紧急状态期间只是《公约》某些条款的效力受到克减，并不影响行使《任择议定书》所规定的权利。此外，近二十年适用这一措施本身，就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四条第 3 款，因为国家未能履行其国际义务，特别是将其已经克减的条款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立即通知其他缔约国。<sup>5</sup> 因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不能以自身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当作本来文不可受理的理由。

5.4 关于提交人没有将案件提交调查法官，没有提起刑事诉讼，从而没有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的说法，提交人指出，人们首先必须为这一诉讼支付押金或“诉讼费”，否则申诉将得不到受理。《阿尔及利亚刑事诉讼法》第 75 条规定，押金额是由调查法官任意确定的，并在实践中成为让人望尘却步的费用，因为起诉人也无法保证一起对安全部门人员的投诉将实际上将导致对他们的检控。

<sup>4</sup> 提交人就此援引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结论性意见，CCPR/C/DZA/CO/3, 2007 年 12 月 12 日，第 7、8 和 13 段。

<sup>5</sup> 提交人援引了委员会关于第四条(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的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2001 年)，第 1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56/40 (Vol. I))，附件六。

5.5 此外，鉴于 Maamar Ouaghliissi 的雇主和家人采取的许多步骤，军事、司法和行政当局都知道他被绑架和失踪，因此在法律上有义务对绑架和任意拘留报案采取行动。这些罪行及其处罚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刑法》之中，特别是第 107、108、109、291 和 292 条；并且检察部门有义务立即开展司法调查，将实施者带上刑事法庭。然而，无人下令调查，Maamar Ouaghliissi 失踪案所涉人员都没有受到询问。因此，缔约国未能履行职责，没有对有关犯罪进行调查和确定事实。

5.6 提交人坚称，凡安全部门负有责任的案件，就不可能对人权侵犯者提起刑事诉讼。根据第：06-01 号法令第 45 条的规定，对于针对共和国国防和安全部门成员的个别或集体指控或申诉，主管司法当局必须宣布不予受理。而且法令第 46 条规定，提交此类申诉的任何人将受到三至五年监禁的惩罚，并且要支付 25 万到 50 万第纳尔的罚款。因此，这项立法“侵犯言论自由和侵犯人人有权就侵犯人权行为在国家国际一级得到有效补救”。<sup>6</sup>

5.7 关于案情，提交人注意到缔约国似乎否认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着大规模和有系统的强迫失踪这一事实。缔约国描绘了一幅完全排除国家工作人员责任的强迫失踪景象。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它承认在登记的 8,023 名失踪者中已经为 5,704 名受害者的权利受益人提供了赔偿。

5.8 当局试图把这些失踪案归咎于国难和恐怖犯罪。这样一来，政府拒不承认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并将他们说成解救国家的人才。

5.9 提交人指出，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缔约国无权要求分别审议案情与来文可否受理问题。相反，这完全是委员会的特权，而缔约国只须“就来文可否受理问题和是非曲直提交解释或声明”。此外，提交人指出，根据久已确立的委员会案例，在缔约国没有对来文案情表达意见的情况下，必须充分考虑提交人的指称。

5.10 提交人确认来文中提供的事实属实，并强调说，缔约国拒绝回答她的指称并自行处理本来文，正是由于安全部门卷入了 Maamar Ouaghliissi 的绑架和失踪案。因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没有答复来文案情问题这一事实，也表明缔约国默认了所指称事实的准确性，因此委员会应将这些事实视为已经得到证明的。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条(子)款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委员会注意到，Maamar Ouaghliissi 失踪案已报告给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然而，委员会回顾到，人权委员会

<sup>6</sup> 提交人援引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CCPR/C/DZA/CO/3，第 8 段。

或人权理事会设立的非常规程序或机制是负责审议并公开报告具体国家或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或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但一般来说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所指的调查或解决程序。<sup>7</sup>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这一条款，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对 **Maamar Ouaghliissi** 案件的审议不导致来文不可受理。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她认为不可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2 和 73 条将此案提交调查法官并在刑事案中要求赔偿。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辩称，受害人被绑架后，国家铁路公司管理层向君士坦丁第五军区投诉过；受害者的亲属在他被捕后立即前往君士坦丁警察总部以及镇上的宪兵队和其他军营查询；受害人的父亲采取步骤，到君士坦丁法院查寻受害人是否已被提交给检察官，就他的儿子被绑架和失踪一事向检察部门提出了申诉，并且前往 **Mansourah** 的情安部军营查询儿子的下落；提交人就她丈夫被绑架和失踪一事而投诉到君士坦丁检察官以及在每一省设立的接待失踪者家人投诉的办事处；她还向第五军区司令官查询关于她丈夫失踪的信息；她也向司法部长寄出挂号信，重申她的投诉并告知他，她以前向君士坦丁检察部门的投诉没有得到处理；她也找了国家宪兵，要求提供正式失踪证书。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第 63 条规定“当刑侦警察得知有违法现象发生时，应按共和国检察官的指示或依职进行初步调查”。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辩称，鉴于所指称不法行为的严重性质，主管部门有责任接手案件，但却没有这样做。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根据第：06-01 号法令第 46 条，任何人对第 45 条涵盖的行动提出申诉，须受到惩罚。

6.4 委员会回顾说，缔约国不仅有义务对指称的侵犯人权、尤其是涉及到强迫失踪和损害生命权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而且有义务对任何被认定损害这些权利的行为人起诉、审判和处罚。受害者的家人多次将 **Maamar Ouaghliissi** 的失踪案告知有关部门，但所有的努力都劳而无获。缔约国也没有提供资料指出事实上存在着有效、可用的补救办法，而 2006 年 2 月 27 日第：06-01 号法令仍在适用，尽管委员会建议缔约国使其与《公约》保持相一致。<sup>8</sup> 委员会重申以前的判例，认为在本案中指称的这样严重罪行的索赔诉讼不能取代检察官应提起的指控。<sup>9</sup> 此外，鉴于法令第 45 条和第 46 条的规定不明确、没有缔约国关于其解释和实际适用的满意信息、并且缔约国没有提供事例说明这一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因此提交人对投诉结果有所顾虑是合理的。委员会裁定，《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并不妨碍本来文的受理。<sup>10</sup>

<sup>7</sup> Celis Laurenano 诉秘鲁，第 540/1993 号来文，1996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7.1 段。

<sup>8</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阿尔及利亚，CCPR/C/DZA/CO/3，第 7、8 和 13 段。

<sup>9</sup> 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第 1588/2007 号来文，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同前，第 8.3 段。

<sup>10</sup> Djebourni 诉阿尔及利亚，第 1781/2008 号来文，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和 7.4 段。

6.5 委员会认定，就指称所提出的《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以及第二条第 3 款所涉问题，提交人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因此开始对来文案情进行审查。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正如委员会在缔约国就提交人的严重指称而提供了一般和综合意见的以往来文中已经强调的，缔约国显然更主张必须在政府应对恐怖主义时期的更大国内社会政治和安全背景之下处理那些要求公职人员或政府授权行事的人员对有关时期，即 1993 至 1998 年之间强迫失踪案件负责的来文。委员会谨重申 2007 年 11 月 1 日对阿尔及利亚的结论性意见<sup>11</sup>及其判例，即：缔约国不得针对那些援引《公约》条款、或者已经或可能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人适用《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条款。未根据委员会意见修正的第：06-01 号法令显然鼓励有罪不罚，因此目前不符合《公约》的规定。<sup>12</sup>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的案情申诉做出回应，并指出，根据它的判例<sup>13</sup>，《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隐含地规定缔约国有责任对它和它的代表违反《公约》行为的一切指称进行真诚调查，并向委员会提供所收到的相关信息。在缔约国没有就此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只要提交人提供了充分证据，就必须对提交人的指称给予正当的重视。

7.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她丈夫是自 1994 年 9 月 27 日被逮捕后失踪的，而且尽管他是在有证人目睹的情况下被捕的，但当局一直否认拘押了他；当局颁发了一份“国难所致失踪正式证明”，本身承认了这一失踪案。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找到 Maamar Ouaghliissi 活着的希望日趋渺茫，他长久失踪让人认为他在拘押时丧生；单独监禁的情况导致生命权受侵犯的风险很高，因为受害者任凭看守的摆布，并且由于环境的性质，看守不受任何监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资料反驳这一指控。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没有履行保护 Maamar Ouaghliissi 生命权的义务。

7.5 委员会了解与世隔绝的无限期拘禁会有多么痛苦。委员会提到，它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第 7 条建议各缔约国采取措施，禁止单独监禁。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Maamar Ouaghliissi 于 1994 年 9 月 27 日被捕，至今下落不明。在缔约国没有满意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对 Maamar Ouaghliissi 而言，这一失踪现象违反了《公约》第七条。<sup>14</sup>

<sup>11</sup> CCPR/C/DZA/CO/3，第 7 (a)段。

<sup>12</sup> 主要见，Djebourmi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10，第 8.2 段。

<sup>13</sup> 同上，第 8.3 段。

<sup>14</sup> 同上，第 8.5 段。

7.6 委员会还注意到 Maamar Ouaghliissi 失踪为提交人及其女儿带来的焦虑和悲苦。委员会认为，它所收到的事实反映出缔约国对她们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sup>15</sup>

7.7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申诉，委员会掌握的资料表明，Maamar Ouaghliissi 被逮捕时没有法院逮捕令、也未被告知逮捕理由；他从未被带到法庭或其他司法机构，无法质疑自己被无限期拘留的合法性。在缔约国没有做出满意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就 Maamar Ouaghliissi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第九条。<sup>16</sup>

7.8 关于第十条第 1 款的申诉，委员会重申，被剥夺自由者不得遭受任何与剥夺自由无关的苦楚或限制，并且必须人道地对待他们，尊重其尊严。鉴于他受单独监禁的情况，且缔约国对此没有提供信息，委员会认定存在着违反《公约》第十条第 1 款的行为。<sup>17</sup>

7.9 关于指称违反第十六条的申诉，委员会重申，根据其一贯的判例，蓄意地使一个人长期得不到法律保护，并且如果受害者最后被外界看到时是在国家当局的掌控中，同时如果其亲属寻求潜在有效补救办法、包括诉诸法院(《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的努力一直受到系统地阻碍，可能等于否认此人的法律人格。<sup>18</sup>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表示没有她丈夫的消息，而缔约国没有就提交人的指称而提供充分的解释。委员会认为，由于 Maamar Ouaghliissi 强迫失踪 17 年以上，被剥夺法律保护，并被剥夺法律人格获得承认的权利，所以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六条。

7.10 提交人援引《公约》第二条第 3 款规定说，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公约》所列权利据称被侵犯的任何人能够获得有效补救。委员会极为重视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建立起处理有关侵权指称的适当司法和行政机制。委员会提到，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指出，如果缔约国不对侵权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可能会引起再次违反《公约》的行为。在本案中，受害者家人多次将 Maamar Ouaghliissi 的失踪案告知主管部门，但所有努力毫无结果。缔约国对提交人丈夫的失踪没有进行任何彻底和有效的调查。此外，自从执行《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的第：06-01 号法令颁布之后，人们再没有提起诉讼的合法权利，从而持续剥夺了 Maamar Ouaghliissi、提交人及其女儿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机会，因为这一法令以判处监禁而禁止为查明强迫失踪等最严重的罪行诉诸法律补救办法。委员会认为，本案事实表明，就 Maamar Ouaghliissi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与《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以及第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就提交人及其女儿而言，违反了与《公约》第七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3 款。<sup>19</sup>

<sup>15</sup> 第 1811/2008 号来文，前注，第 8.6 段。

<sup>16</sup> 第 1781/2008 号来文，前注，第 8.7 段。

<sup>17</sup> 同上，第 8.8 段。

<sup>18</sup> 同上，第 8.9 段。

<sup>19</sup> 同上，第 8.10 段。



8.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规定行事，认为所收到的信息显示，就 Maamar Ouaghliissi 而言，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款和第十六条以及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1款和第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就提交人及其女儿而言，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3款。

9.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3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有效补救办法，主要包括(一)对 Maamar Ouaghliissi 的失踪案进行彻底、有效的调查；(二)为提交人提供关于调查结果的详细信息；(三)如果他还在单独监禁之中，立即释放；(四)如果 Maamar Ouaghliissi 已死，将其遗体归还家人；(五)起诉、审判和处罚对这一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人；以及(六)对提交人及其女儿蒙受的侵权行为给予适当的赔偿，并且如 Maamar Ouaghliissi 在世，也给予适当赔偿。缔约国尽管颁布了第：06-01 号法令，但应确保该法令不妨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权利。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违反行为。<sup>20</sup>

10.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并且按照《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承诺确保其境内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时间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本《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并广为散发委员会的《意见》。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法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20</sup> 同上，第 10 段。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个人(赞同)意见

1. 我完全同意人权事务委员会对 Ouaghlissi 诉阿尔及利亚案(第 1905/2009 号来文)的决定以及关于 Maamar Oughlissi 先生被强迫失踪导致 Maamar Oughlissi 及其妻子 Farida Khirani 与女儿 Meriem Ouaghlissi 和 Khaoula Ouaghlissi 的人权受到侵犯的认定。
2. 然而, 根据以下理由, 我认为委员会还应该裁定缔约国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2 款。我还认为, 委员会也应当在意见之中指出缔约国应当修订第 06-01 号法令, 以确保这类行为不再发生。
3. 自我成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以来, 我一直认为, 委员会遇到没有具体法律要求的情况时令人费解地限制其对违反《公约》行为的裁定权力。只要事实清楚地表明存在此类违反行为, 委员会能够也必须根据法院了解法律的原则审查案件的法律问题。在我对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案的部分反对意见的第 3 至第 5 段中, 可以找到为何这并非意味着不给缔约国辩护机会的法律依据与解释。为避免重复, 我在此提及。<sup>a</sup>
4. 在 Ouaghlissi 案中, 双方都多次提到关于执行《和平与民主和解宪章》的第 06-01 号法令; 提交人认为其部分条款不符合《公约》(见委员会的意见第 3.7、3.10 和 5.6), 特别是第二条第 3 款。
5. 缔约国也援引了第: 06-01 号法令, 但是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它认为, 该法令完全符合适用的国际标准(着重见委员会的意见第 4.6 和 4.8 段)。
6. 因此, 双方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充分的理由, 争辩第: 06-01 号法令是否符合《公约》条款。这一问题正应由委员会通过适用法律而解决; 对于双方的法律意见, 委员会没有必要接受, 但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分析完全或部分地接受和拒绝。
7. 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类似案件的个人意见中, 我从第二条第 2 款的角度解释了委员会为什么应当处理第: 06-01 号法令不符合《公约》的问题, 并且我解释了为什么对受害人适用该法令构成了在本案中违反《公约》这一条款。<sup>b</sup>
8. 这一推理与 Ouaghlissi 案有关系。委员会在本案中完全有权审议与事实有关的法律问题: 2006 年 2 月 27 日, 缔约国通过了第: 06-01 号法令, 禁止诉诸法律补救措施查明强迫失踪这类最严重的犯罪。这保障了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有罪不罚。

<sup>a</sup> Weerawansa 诉斯里兰卡, 第 1406/2005 号来文, 2009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 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

<sup>b</sup> 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 第 1811/2008 号来文, 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 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 第 5-10 段。

9. 就这一立法来说，缔约国通过了有违第二条第 2 款所规定义务的法律，从而本身就是委员会应在决定中提到的一个违反行为，除了委员会所认定的违反行为之外。提交人和 Ouaghliissi 先生本人一直是这一法律条款的受害者；因此，在本案中认定缔约国违反第二条第 2 款，既不是一个抽象的议题，也非仅有学术上的意义。最后，不应当忽视的是，国家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委员会可能在决定每一来文时所呼吁采取的任何补偿措施。

10. 关于这类案件中的补偿问题，委员会在要求保证不再犯方面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 Benaziza 和 Aouabdia 案中，委员会的决定仅载有一个一般性的声明，即：“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违反行为”。<sup>c</sup> 但是没有具体指明应当如何做到这一点。<sup>d</sup> 最近，委员会在 Djebourni 案中阐述如下，“缔约国尽管颁布了第 06-01 号法令，但应当确保该法不妨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权利。缔约国也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违反行为”。<sup>e</sup> 最后，委员会根据非常类似的推理通过了关于 Chihoub 案的决定。<sup>f</sup>

11. 无疑已经有所进步。如我在上述两起案件(Djebourni 和 Chihoub 案)的个人意见中所指出的，有关段落是对赔偿问题采取一个整体方针的实例。然而，由于在保障不重犯问题上存在一些含糊不清之处，需要更多一点进步；特别是，委员会应当坚定地表示反对继续适用一个本身不符合《公约》的法律，因为它干脆就不符合目前人权侵犯案件中的国际补偿标准<sup>g</sup> 在 Ouaghliissi 诉阿尔及利亚案中，委员会重复了这一模式：“缔约国尽管颁布了第 06-01 号法令，但还应该确保该法令不妨碍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罪行的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办法的权利。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违反行为(第 9 段)”。

12. 委员会的推理和决定需要更加连贯一致；就补偿问题来说，需要一个明确和不含糊的裁定——在本案中，指出缔约国需要修订第 06-01 号法令，废除本身不符合《公约》的条款，从而提供一个有效保证，不重复在来文中所审议的某些行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sup>c</sup> 第 1588/2007 号来文，Benaziza 诉阿尔及利亚，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 段；第 1780/2008 号来文，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来文，第 9 段。

<sup>d</sup> 我已经在好几份个人意见中提醒注意这一问题，特别是关于 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的个人意见，前注 3，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第 10-11 段。

<sup>e</sup> 第 1781/2008 号来文，Djebourni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 段。

<sup>f</sup> 第 1181/2008 号来文，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2011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 段。

<sup>g</sup> Djebourni 诉阿尔及利亚，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第 11-16 段；Chihoub 诉阿尔及利亚，委员会委员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部分反对意见，第 11-16 段。

## 委员会委员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得到沃尔特·凯林先生和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附和的个人(赞同)意见

1. 委员会多数已经认定缔约国违反第六条第 1 款，尽管没有肯定受害人已经死亡。我并非不赞成这一认定，但认为第 7.4 段提供的理由过短。

2. 委员会多数的认定是依据 2011 年 10 月委员会在第 1781/2008 号来文的 *Berzig* 诉阿尔及利亚案中所表达的新判例。如在我对该决定的反对意见中指出的，委员会在 *Berzig* 案中未经讨论就背离了强迫失踪案确立已久的判例。在该案中，事实未表明受害者是否已死，但是委员会认定缔约国直接违反了第六条第 1 款，并且与第二条第 3 款无任何关联。最近，在 2011 年 3 月针对同一缔约国的另一案件中，确认的是旧的方针，并且案件事实相似。<sup>a</sup>

3. 在本案中，过去 17 年中没有人看到 1958 年出生的受害人活着。鉴于被捕的情景，提交人指出她的丈夫很可能在拘押中死亡了(见第 3.2 段)。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承认了失踪事实，发出了一份“国难所致失踪正式证明”。最后，缔约国没有提出证据来反驳提交人的意见，包括受害者在拘押期间死亡的意见。

为此原因，最可能的情况是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根据这些情况，委员会认定缔约国违反第六条第 1 款是正确的——这是委员会多数本来应当指出的——而不是仅依据于 *Berzig* 案中委员会对第六条新的、仍有待说明的广义解释。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sup>a</sup> Aouabdia 诉阿尔及利亚，前注 3，特别是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反对意见。

BB. 第 1914/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  
 第 1915/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  
 第 1916/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  
 (2012 年 3 月 21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Saida Musaeva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Erkin Musaev (提交人之子)  
 所涉缔约国: 乌兹别克斯坦  
 来文日期: 2008 年 1 月 18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未尽早将刑事罪嫌犯交法官审讯, 并适当处理酷刑  
 投诉; 庭审程序违反公平审判的保障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任意逮捕和拘留; 尽快接受法官审讯的权利; 为准备辩护获得足够时间和便利的权利; 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3 款; 第十四条第 3 款(乙)、(丁)、(戊)、(庚)项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Saida Musaeva 女士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914、1915 和 1916/2009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材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的个人意见案文附于本意见之后。

## 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为 Saida Musaeva 女士，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生于 1944 年。她的儿子 Erkin Musaev 先生，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生于 1967 年。她称自己的儿子目前正在乌兹别克斯坦服刑，刑期为 20 年，是乌兹别克斯坦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3 款、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3 款(乙)、(丁)、(戊)、(庚)项和第 5 款以及第十五条所载权利的受害者。提交人无律师代理。《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于 1995 年 12 月 28 日对缔约国生效。

1.2 2012 年 3 月 21 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 94 条第 2 款，决定一并审查这三份来文。

## 事实背景

2.1 Erkin Musaev 先生自 1993 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工作，担任过各种职务。他于 2004 年辞职，开始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驻塔什干办事处项目管理者，负责欧洲联盟——开发署旨在协助加强中亚边境和毒品管制的联合方案，即中亚边境管理方案和中亚毒品行动方案。

## 第一次审判

2.2 2006 年 1 月 31 日，Musaev 先生在塔什干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前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参加一场区域会议。在一次检查中，边防人员称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了一个包含机密信息的电脑磁盘。提交人说，没收该磁盘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而且也没有通过检查确定上面是否有她儿子的指纹。提交人之子一直坚称磁盘不是他的，而是官员放进他的行李箱的，因为检查过程中行李一度无人看管。

2.3 2006 年 1 月 31 日晚，Musaev 先生在国家安全部行动司度过，他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受到审讯。2006 年 2 月 1 日，他被关进国家安全局审前调查拘留中心。2006 年 2 月 2 日，一位访问审前拘留中心的军事检察官批准了对他的逮捕。同一天，Musaev 先生受到指控，2006 年 5 月 30 日，他的刑事案件被提交法院。2006 年 6 月 13 日，乌兹别克斯坦军事法院根据《刑法典》第 157 条(计划或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或与他人共谋采取上述行动)、第 301 条(滥用权力或行政渎职)、第 162 条(泄露国家机密)和第 302 条(玩忽[军事]职守)将他定罪，并判处他 15 年监禁。

2.4 提交人称，她的儿子在国家安全局受押期间，调查人员先是给他施加了心理压力，试图逼他认罪。当他在给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两封信中就此提出申诉时(未提供确切日期)，调查人员对他实施了身体强制，使他承认了罪行。Musaev 先生的家人有 10 天时间并不知道他被拘留一事。他的父母在得知他被捕后，曾写信给国家安全局局长，请求批准见他们的儿子，但这一请求被拒绝，显然是为了不妨碍对一起严重刑事案件的继续调查。提交人称，他们被剥夺与儿子见面的权利，是因为儿子受到了身心压力，否则他们会看到他被虐待的痕迹。

2.5 提交人称，对 Musaev 先生提起的刑事诉讼不符合公平审判的要求：他是因为当局在其行李中放了一张包含机密信息的光盘、从而伪造了证据而被捕的。在对他实施的非法逮捕和拘留期间，他没有律师代理，并因遭到刑讯逼供而被迫认罪。随后，他与律师的联系受到不适当的限制。在初步调查结束时，仅给了他一天的时间来了解对他的指控和该刑事案件的卷宗内容，而《刑事诉讼法典》要求在审判开始前，至少须给被告三天的时间来研究案件卷宗。

2.6 提交人还称，在对她儿子定罪时，法院提到了卷宗中没有的证据。具体来说，Musaev 先生被判的罪行是向一位外国代表口头提供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方文件中的机密信息，但提交人称，这些文件并不是该刑事案件卷宗的一部分，也不存在被泄露的问题，因为其中含有国防部长的书面指令，命令 Musaev 先生将文件内容提请外国国防部长注意。如果不得不在法庭上披露文件内容的话，就能清楚地看出，他向外国国民提供的信息是为了完成本职工作而透露的。

2.7 2006 年 6 月 19 日，Musaev 先生向军事法院写信，请求允许与他的律师见面，以便准备上诉。他的请求一直未得到答复，因此他无法准备上诉。随后他又给军事法院写了几次信，请求给他机会研究审判笔录的内容，但未得到答复。2007 年 10 月 8 日，即一审判决一年多以后，Musaev 先生被准许阅读审判笔录的内容，他才得以就所判罪行提起上诉(未提供确切日期)。

2.8 提交人解释说，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军事法院上诉机构驳回了提交人之子及其律师的上诉，维持了 2006 年 6 月 13 日的定罪和判刑。Musaev 先生和他的律师从未收到过上诉判决。

2.9 2007 年 11 月，Musaev 先生向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提出监督复审请求，据提交人称，这一请求未被理睬。他曾数次向最高法院和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申诉，声称在初步调查和法院审判期间侵犯了他的程序性权利，但未得到答复。他还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出了申诉。<sup>1</sup>

## 第二次审判

2.10 2006 年 7 月 13 日，在另一次审判中，Musaev 先生被塔什干市法院根据《刑法典》第 168 条判定犯有诈骗罪，并被处以 6 年监禁，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另外两人，即 I.先生和 K.先生，他们均被处以 3 年监禁和巨额罚款。加上之前 2006 年 6 月 13 日的判决，Musaev 先生最后被判处 16 年监禁。2007 年 7 月 10 日，塔什干市法院上诉机构在上诉判决中维持了原判。Musaev 先生被判在开发署 2005 年为向乌兹别克斯坦海关提供经特殊训练的狗而组织的一次招标活动

<sup>1</sup> 2008 年 5 月 9 日，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通过了第 14/2008 号意见，认定对 Musaev 先生的拘留属任意拘留，侵犯了他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和第十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

中，与 I.先生和 K.先生(某一并未获准在乌兹别克斯坦营业的外国商业公司代表)合伙犯有诈骗罪。

2.11 该团伙被认定通过对正式中标者、一家名为 Tabiat 的私营公司实施诈骗行为，非法占有了开发署为买狗提供的 95,775 欧元中的 25,286 美元。在某一天，Tabiat 公司经理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诉，称在执行投标条款方面存在不合规现象。为此，2006 年 1 月 12 日，检察官办公室启动了刑事调查程序。2006 年 2 月 14 日，即因第一个刑事案件而被审前拘留期间，Musaev 先生获悉了塔什干市检察官对他发布的一项逮捕令的内容。提交人称，不应依照刑法、而应依民法审查这一案件，因为它实质上涉及的是两个商业实体之间的纠纷。

2.12 在第二次刑事诉讼期间，提交人称，为迫使他认罪，她的儿子再次遭到酷刑和身心压力，但提交人未作进一步的解释。她还称，下令逮捕她儿子的是一位检察官，而不是法院。他的辩护权同样受到侵犯，因为在初步调查期间，他没有律师代理，也无法在法院审判开始前熟悉这一刑事案件的卷宗内容。此外，法院拒绝传唤更多对 Musaev 先生有利的证人。

### 第三次审判

2.13 2007 年 9 月 21 日，在由乌兹别克斯坦军事法院进行的第三次审判中，Musaev 先生被判犯有叛国罪(《刑法典》第 157 条)，理由主要包括屡次向外国军官传达机密信息或为向他们传达这类信息提供便利。合并之前的判决，他被判处 20 年监禁。2007 年 10 月 11 日，军事法院上诉机构在上诉判决中维持了这一原判。提交人称，她的儿子和律师都未收到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判决，这使他们无法准备适当的上诉。提交人还称，在这一刑事案件期间，2007 年 3 月 2 日，她的儿子从以前服刑的监狱被转到国家安全部审前拘留中心，并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 2007 年 6 月 5 日。尽管他一再申诉，但在 2007 年 5 月 15 日才得以见到自己的律师，而且无法与律师私下会面。在此期间，虽然他要求提供有关信息，却并未向他正式通知对他起诉的决定。经过无数次申诉，才在 2007 年 9 月 17 日，即法院审判期间向 Musaev 先生提供了起诉书。

2.14 提交人称，调查人员通过采用非法审讯方法和施加身心压力，试图迫使她儿子提供对被起诉犯有间谍罪的另外三人不利的伪证。提交人称，她的儿子在这方面的申诉被法院置之不理。她特别提交了她儿子的律师向法院提出的最后请求的副本(日期不明)，在这份请求中，律师提到卷宗中的证据表明，Musaev 先生在被国家安全局拘留期间，受到严重脑外伤，不得不在塔什干医院接受外科医生治疗。

2.15 她还称，她的儿子在法院审判期间才获许看到对他的起诉书，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典》提出的三天时间要求。法院还驳回了 Musaev 先生提出的传唤和询问更多证人的请求。

2.16 从提交人提交的卷宗文件看，Musaev 先生被控在与欧洲联盟一开发署联合实施的中亚边境管理和毒品行动方案有关的行动中，为外国招聘乌兹别克斯坦

边防人员从事间谍工作提供了便利，而他本人在 2005 年就是被一名外国军方特务招募的。提交人称，这项指控没有根据，因为该外国公民 2006 年才到乌兹别克斯坦：她提供了一份该国驻塔什干大使馆出具的有关证明。Musaev 先生的两名同案被告作证说，2005 年 2 月，他们与提交人的儿子一起，在开发署与该军方特工进行了会面。据说这一证词已为法院所接受。但在开发署开具的证明中，2005 年 2 月至 5 月，三人中只有 Musaev 先生访问过联合国办公地点。提交人认为，这表明对她儿子的指控只是依据假设提出的。

2.17 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对 Musaev 先生被控向外国国民提供的机密信息的机密程度进行了研究，提交人还就该委员会的合法性及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Musaev 先生并不知道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受命研究文件，因此无法质疑研究方法，请求专家回避，就结论提出异议，等等。提交人称，有位证人在法庭上证实，一些专家受到了在委员会结论上签字的压力。Musaev 先生在法庭上提出的再进行一次专家审查的要求被法院驳回，而且法院未作任何解释。

## 申诉

3. 提交人称，上述事实表明她儿子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3 款、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乙)、(丁)、(戊)、(庚)项、第十四条第 5 款以及第十五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10 年 1 月 11 日的普通照会中，就可否受理问题和案情发表了意见。缔约国回顾了案件的事实，并首先指出，Musaev 先生被乌兹别克斯坦军事法院(2006 年 6 月 13 日和 2007 年 9 月 21 日)和塔什干市法院(2006 年 7 月 13 日)判定犯有如下罪行：叛国罪；准备或企图泄露国家机密罪；滥用职权，给军事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罪；玩忽职守罪；以及巨额诈骗罪。他被数罪并罚，最终判处 20 年监禁。2007 年 10 月 11 日，最高法院维持了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判决。

4.2 缔约国报告说，自 2006 年 8 月 3 日起，Musaev 先生一直被关押在别卡巴德市的 UYa 64/21 号监管所，记录显示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肾盂肾炎，但总体健康状况良好。Musaev 先生接受了亲属的 10 次短暂探视和 8 次时间较长的探视，以及律师的两次探视。

4.3 缔约国称，提交人关于对她儿子使用了非法调查手段以及在审查其案件期间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指控查无实据。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认定，所有有关 Musaev 先生的法院裁决都是合法的、有根据的。

4.4 缔约国还指出，Musaev 先生在服刑期间，因违反监狱制度而受到了纪律处罚。在他服刑期间，监狱当局从未允许对他施加身心压力。



## 提交人对缔约国陈述的评论

5.1 2010 年 3 月 5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的意见发表了评论。她首先指出，缔约国未就她所提申诉的是非曲直，特别是就法院没有询问更多证人和再次组织专家审查的问题作出任何答复。提交人称，军事法院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裁决主要是基于国家边境保护委员会两名官员(这两人在对 Musaev 先生的第三次审判中也被判犯有间谍罪)最初的证词，即 2005 年 3 月 Musaev 先生与一名外国官员在联合国会面时他们在场。提交人称，这两名官员后来在 2009 年提出的要求撤销原判的上诉中确认，当时他们是被迫对 Musaev 先生作了伪证。提交人重申，开发署在 2007 年 9 月 17 日的一份信函中证实，这一期间，国家边境保护委员会的两名官员和该外国官员都未访问过开发署。

5.2 提交人还称，她继续向不同机构提出了关于她儿子的权利受到侵犯的申诉，但都没有成功。她还向总统申诉过，要求对她儿子进行重新审判，但没有收到回信。

## 缔约国的补充说明

6.1 2011 年 6 月 14 日，缔约国提供了补充资料。它解释说，其主管当局仔细研究了本来文，并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的指控毫无根据。

6.2 缔约国指出，2006 年 7 月 13 日，塔什干市法院判 Musaev 先生犯有巨额诈骗罪(《刑法典》第 168 条)，2007 年 7 月 10 日，该法院的上诉机构在上诉判决中维持了原判。鉴于 Musaev 先生已在 2006 年 6 月 13 日被判犯有叛国、滥用权力、准备和图谋犯罪、泄露国家机密、玩忽职守等罪行，并被判处 15 年监禁，塔什干市法院决定合并之前的判决，共判处他 16 年监禁。Musaev 先生还被宣布与两名同犯负有连带责任，应向某个 Kh.女士(Tabiat 公司负责人)受到的损害支付 12,250,000 乌兹别克斯坦苏姆<sup>2</sup>的赔偿金。

6.3 根据塔什干市法院的裁决，2005 年，Musaev 先生在开发署担任加强中亚国家边境方案的项目管理人。法院认定他是和同案被告共谋犯罪。他的两名同案被告 I.先生和 K.先生——一家并未获准在乌兹别克斯坦营业的外国注册商业公司(FDN 控股公司)代表——与开发署办事处签署了贸易协定。三人以这些协定作掩护，非法获得现金 25,286 美元，并占有了属于 Tabiat 公司经理 Kh.女士的 3,000 美元。三名共犯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Musaev 先生负责寻找可供该团伙诈取钱财的个人和公司，I.先生和 K.先生则具体负责对上述个人和公司行骗，让其签署伪造的文件。

6.4 缔约国称，受害人 Kh.女士及证人 K.女士、M.女士、V.女士和 A 女士的证词、对 Musaev 先生同案被告的调查笔录、专家审查得出的结论以及卷宗中的其

<sup>2</sup> 当时约相当于 10,000 美元。

他证据都表明 Musaev 先生与所涉犯罪行为有染，而所有这些证据都经过了法庭的适当评估。

6.5 缔约国称，提交人关于初步调查期间侵犯 Musaev 先生刑事诉讼权的指控没有根据。法庭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全面审查，并予以了适当驳回，因为它们被认定与法院掌握的证据相悖。此外，一审法院对调查人员收集并提交法院的所有卷宗证据进行了全面评估。缔约国认为，法院审判期间没有侵犯 Musaev 先生的刑事诉讼权。

###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7. 2011 年 8 月 22 日，提交人指出，她认为缔约国未就来文案情提供任何资料。关于缔约国提到的作为对 Musaev 先生定罪依据的一些证词，提交人称，这些证词实际上并未表明她儿子可能从事了非法活动。提交人认为，法院靠这些证词来对她儿子定罪，这表明审判是不公正的，是以指控的方式进行的。提交人称，2006 年 3 月 9 日进行技术专家审查时，她儿子或其律师不在场，后来也未将结果通知 Musaev 先生，因此，这种审查应被视为不可采信。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委员会注意到曾代表 Musaev 先生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了一份类似的申诉，该工作组在 2008 年 5 月 9 日提出的第 14/2008 号意见中认为，除其他外，Musaev 先生根据《公约》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初步来说，并在无关就可否受理而言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是否属于“别的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无论如何，该机构并非“正在审查”该“同一事项”。因此，鉴于缔约国没有对《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提出任何保留，委员会认为这项规定并不妨碍委员会审查本来文可否受理。

8.3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缔约国也未就此表示异议。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在她儿子进行的第二次审判中，他根据《公约》第十一条和第十五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当局立的是刑事诈骗案，而该案涉及的是应由民法管辖的两个经济实体和贸易协定当事方之间的商业纠纷。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来文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8.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关于调查当局和法院对她儿子进行三次刑事诉讼的方式提出的各种指称，提交人认为，所用方式表明她儿子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某些权利受到了侵犯。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具体反驳这些指控，而是一般性地指出，无论是在初步调查阶段还是法院审判期间，都没有侵犯提交人儿子的刑事诉讼权。委员会注意到，从实质上讲，这些申诉涉及缔约国法院和当局评价事实和证据以及适用法律的方式。委员会忆及其判例认为，应由缔约国法院对每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评价或适用国内立法，除非可以证明这种评价或适用显然具有任意性，或存在明显错误或执法不公。<sup>3</sup> 委员会在适当考虑到所提交的全部资料 and 材料后认为，委员会无法得出该案中的法院程序存在这类缺陷的结论。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就其关于 Musaev 先生根据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指称提供足够的证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在未提供足以详细的资料情况下，笼统地声称她儿子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戊)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在法庭上提出的一些关于询问更多证人的请求被不适当地驳回，而且法院至少有一次拒绝下令进行新的专家审查。由于在其他证人的证言对于认定 Musaev 先生刑事案件客观事实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在处理再次进行专家审查的问题上给出的确切理由等方面，缺乏更具体的信息、解释和卷宗文件，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来文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8.7 关于其他指称，委员会认为可以受理，因为它们在《公约》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丁)项、(庚)项和第 5 款之下提出了问题。

####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联系各当事方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9.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对她儿子的第一和第二个案件进行初步审查的过程中，她的儿子遭受了酷刑和身心压力，致使他承认了有关犯罪行为。她还特别声称，在第三个刑事案件中，她儿子在一次审讯期间，在调查人员试图逼他提供指控两名同案被告犯罪的证词时，脑部受伤(见上文第 2.14 段)，不得不在塔什干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外科手术。提交人还称，她的儿子及其律师就刑讯逼供提出了申诉，包括在法庭上的申诉，但都被置之不理。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具体反驳这些指控，只是指出该案中没有发生侵犯 Musaev 先生刑事诉讼权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缔约方的主管当局没有对 Musaev 先生在审前调查期间和法庭上提出的关于刑讯逼供的申诉予以适当和充分的考虑。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委员会掌握的事实显示存在侵

<sup>3</sup> 除其他外，见 Simms 诉牙买加，第 541/1993 号来文，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裁决，第 6.2 段。

犯 Musaev 先生根据《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 3 款(庚)项享有的权利的情况。<sup>4</sup>

9.3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她的儿子从未被带见法官或法律规定有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其他官员，来证实对他的逮捕和审前拘留是否合法，因为逮捕和拘留他的决定只是由检察官作出的。委员会忆及<sup>5</sup> 其既有判例，其中认为，《公约》第九条第 3 款的目的是将对受到刑事犯罪指控的人员的拘留置于司法监督之下。委员会还回顾，正当行使司法权的固有内容是，行使者是在所处理的问题上独立、客观和公正的机构。在本案情况下，委员会不能确信可以认为公共检察官具有第九条第 3 款意义上的“经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所应具有的必要机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委员会认为违反了这项规定。<sup>6</sup>

9.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她儿子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 Musaev 先生在 2006 年 1 月 31 日被捕后，在第一次审判期间被国家安全局隔离关押，并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遭到讯问，被迫供认了罪行；随后，在审前拘留期间，他与律师的联系受到不适当的限制。关于对他的第二次审判，提交人称她儿子的辩护权受到侵犯，因为在初步调查期间，他没有律师代理。关于第三次审判，提交人称，2007 年 3 月 2 日，她的儿子被带到国家安全局审前拘留中心，并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遭到关押和审讯，一直到 2007 年 6 月 5 日。提交人说，尽管她的儿子一再请求，但他在 2007 年 5 月 15 日才得以见到自己的律师，而且从未与律师私下会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具体反驳这些指控，只是笼统地指出，该案中不存在违反刑事程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必须对提交人的指控给予适当的重视。因此，委员会认为，在本案情况下，提交人陈述的事实表明，Musaev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鉴于这些结论，委员会决定不单独审议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提出的指称。

9.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称，她儿子没有收到军事法院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判决(对他的第三次审判)，因此无法针对该判决提起有效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具体反驳这一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定必须对提交人的指控给予适当的重视。委员会忆及，被定罪人只有在有权看到初审法院推理正当的书面判决——如果国内法规定了多级上诉，则至少是在第一级上诉法院看到这

<sup>4</sup> 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第十四条)的第 32 号(2007 年)一般性意见，第 60 段，以及第 1401/2005 号来文，Kirpo 诉塔吉克斯坦，2009 年 10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

<sup>5</sup> 参见 S. 和 M. Baza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第 959/2000 号来文，2006 年 7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

<sup>6</sup> 参见第 959/2000 号来文，S. 和 M. Baza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06 年 8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8.2 段；第 1449/2006 号来文，Umarov 诉乌兹别克斯坦，2010 年 10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8.6 段。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改变了其制度，自 2008 年 1 月起，建立了一个对逮捕和审前拘留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

种判决——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行使其定罪得到复审的权利。<sup>7</sup> 在本案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向提交人的儿子提供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判决，这侵犯了 Musaev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享有的权利。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14 条第 3 款(乙)项、(庚)项和第 5 款。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规定，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给予 Musaev 先生有效的补救，包括对酷刑和虐待指控进行公正、有效和全面的调查，对负有责任的人提起刑事诉讼；根据《公约》规定的所有保障措施对他进行重新审判或将其释放；为受害人提供充分补偿，包括适当赔偿。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确定成立后，即予以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委员会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为官方语言并广为散发。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7</sup> 例如，见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第十四条)的第 32 号(2007 年)一般性意见，第 49 段。

## 附录

## 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和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的联合意见(部分异议)

1. 我们总体上同意委员会就第 1914、1915 和 1916/2009 号来文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案得出的结论，但希望将我们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框架内军事管辖范围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
  2.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需要审查委员会目前的立场，即认为军事法院对平民的审判符合《公约》规定。这一立场是基于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中的某一段，而该意见已经受到了就委员会以前审议的具体案件提出的一些少数意见的批评。<sup>a</sup>
  3. 仔细研读一下第十四条，即可看出，《公约》甚至都未暗示军事司法有可能适用于平民。第十四条保障获得诉诸司法和正当程序的权利，其中并无一处提到军事法院。各国在许多情况下(总是对人权产生消极后果)都赋予军事法院以审判平民的权力，但《公约》完全未涉及这一问题。
  4. 《公约》的确并不禁止军事管辖权，我们在这里也无意要求取消这种管辖权。但军事刑事司法系统的管辖权是一种特例，必须保持在合适的限度之内，才能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属人管辖权，即军事法院应当审判现役军人，而绝不能审判平民或退役军人；属事管辖权，即军事法院绝不应有权审理涉及侵犯人权指控的案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适用军事司法才能被认为符合《公约》。
-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a</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640/2007 号来文，*El Abani* 诉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不同意见，第 1 至 15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813/2008 号来文，*Akwanga* 诉喀麦隆，2011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费边·萨尔维奥利先生的不同意见，第 1 至 14 段。

CC. 第 2024/2011 号来文, Israil 诉哈萨克斯坦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Arshidin Israil (由律师 Yury Stukanov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哈萨克斯坦  
 来文日期: 2011 年 1 月 28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将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引渡到中国  
 程序性问题: 未遵守临时措施要求  
 实质性问题: 任意拘留; 驱逐  
 《公约》条款: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代表 Arshidin Israil 先生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2024/2011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 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 Arshidin Israil 系中国公民, 维吾尔族, 生于 1972 年, 在首次提交来文时被拘押在哈萨克斯坦的一所单独拘押中心, 其在哈萨克斯坦的庇护申请被驳回, 等待遣返回中国。他认为, 如果缔约国将其遣返, 他在中国将遭受酷刑, 并可能被判处死刑。尽管他没有明确援引《公约》条款, 但其要求似乎涉及《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问题。提交人还声称哈萨克斯坦侵犯了他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二条第 3 款(甲)项所享有的权利,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拉扎里·布济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使其成为受害人。《任择议定书》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对该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 在 2011 年 2 月 1 日对来文进行登记时, 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 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 请缔约国在本案被审查期间不将 Israil 先生引渡到中国。2011 年 4 月 7 日又重申了这一要求。2011 年 6 月 27 日, 提交人的律师通知委员会, Israil 先生已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被引渡到中国。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公民, 维吾尔族。2009 年 7 月, 他还在中国, 通过电话向自由亚洲电台<sup>1</sup> 提供了关于乌鲁木齐事件的情况, 据报告, 在此次事件中一些维吾尔人在示威中被警察打死。提交人由于担心因与外国媒体合作而受迫害, 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离开中国。他非法越境进入哈萨克斯坦, 2009 年 9 月 29 日, 他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在阿拉木图的代表处申请庇护。2010 年 3 月 10 日, 难民署办公室给予他难民身份。

2.2 2010 年 4 月 1 日, 提交人本应前往同意给予他居留的一个欧洲国家。但哈萨克斯坦当局不允许他旅行, 而是将他软禁在家, 他一直受到监视, 不能自由行动。他一直被软禁到 2010 年 6 月 23 日, 期间接受了哈萨克斯坦不同官员的多次询问。由于中国当局提出了对他的引渡要求, 指控他在中国期间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 并危害了公共安全(中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 他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被警方逮捕。提交人报告说, 提交人在中国面临的指控中至少有一项罪名可被处以死刑。他提交了下述文件复印件: 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长的书面命令;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信函; 司法合作请求;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引渡要求, 其中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如提交人被判定有罪, 也不会被处以死刑; 搜查令; 逮捕令; 身份证件。

2.3 2010 年 6 月 25 日, 阿拉木图区法院签发对提交人为期一个月的拘留令, 等待引渡。2010 年 6 月 28 日, 提交人对拘留令提出上诉, 2010 年 7 月 2 日被阿拉木图市法院驳回。阿拉木图区法院分别于 2010 年 7 月 23 日、2010 年 8 月 19 日和 2010 年 8 月 27 日延长了对提交人的拘留期限, 每次延长 1 个月。针对这些决定的上诉均被驳回。2010 年 9 月 9 日, 哈萨克斯坦移民委员会阿拉木图省委员会根据《难民法》第 12 条驳回提交人的庇护申请。2010 年 9 月 20 日, 提交人就庇护申请被驳回事向哈萨克斯坦移民委员会主席提出上诉, 迄今没有答复。2010 年 11 月 22 日, 提交人就庇护申请被驳回事向阿拉木图市法院提出上诉, 2010 年 12 月 30 日被驳回。

2.4 2011 年 1 月 13 日, 提交人向总检察长请求对其解除拘留, 原因是他的拘留已超过《刑事诉讼法》第 534 条规定的期限, 该条规定, 在等候就引渡要求作出决定期间, 拘留不得超过三个月。总检察长未对这一要求作出答复。

<sup>1</sup> 设在美利坚合众国。



2.5 提交人确认，他至此已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 申诉

3.1 在登记来文时，提交人声称，如果缔约国对其实施引渡，他在中国会受到酷刑，并会被判处死刑。这些主张似乎涉及《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尽管提交人并未明确援引这些条款。

3.2 提交人声称，哈萨克斯坦违反了刑事诉讼规定，从而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1款和第二条第3款(甲)项所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在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23日期间对其实施软禁，然后自2010年6月23日至2011年5月30日一直将其拘留，直到将其驱逐，但法律规定在驱逐前只能拘留三个月。

## 缔约国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11年4月1日的普通照会中对来文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缔约国通报说，2009年11月9日，缔约国收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将提交人引渡回中国的请求，其中指控提交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称已对其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指出，中国当局提交了材料，显示提交人因参与恐怖主义行为于1997年被判刑，服刑期满后获释。根据提交的文件(逮捕令、搜查令等等)，提交人被控在参与乌鲁木齐大规模骚乱时从事了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缔约国还获悉，提交人是在被调查期间离开中国的。

4.2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于2009年9月非法越境进入哈萨克斯坦，2009年9月29日向阿拉木图的难民署办公室寻求庇护。2010年2月，难民署官员向提交人发放了难民证。

4.3 由于缔约国《难民法》生效，提交人请求阿拉木图移民委员会给予其难民身份，该项请求被驳回。2010年12月23日，阿拉木图 Almalinsk 区法院确认了这一决定，上诉后阿拉木图市法院于2011年2月9日也确认了驳回其庇护请求的决定。

4.4 据缔约国告，2011年3月3日，提交人就上述法庭的裁决向阿拉木图市法院提出终审上诉。到目前为止，这一上诉尚未作出判决。据此，缔约国认为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理由是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还说，无论如何，只有在阿拉木图市法院作出最终裁决后才能处理提交人的引渡问题。

4.5 缔约国在2011年5月21日的普通照会中就来文的案情提供了补充资料和说明。照会中通报说，继中国请求根据恐怖主义指控将其引渡后，提交人已于2010年6月24日被逮捕。

4.6 缔约国还说，2010年9月9日，阿拉木图省移民委员会在难民署驻哈萨克斯坦特别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审查了提交人2010年6月8日提出的庇护请求。据缔约国称，难民署就本案提出的全部建议都得到考虑。2010年9月14日，提交人的庇护请求被驳回。整个程序也得到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一名代表(姓名未告)

的监督。提交人由难民署提供的一名律师代理。这名律师直接参与了阿拉木图省移民委员会的面谈和会议。该省移民委员会对提交人一案的审查情况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4.7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已就阿拉木图省移民委员会拒绝给予其难民身份一事向一审法院、上诉法庭和终审法庭提出了上诉。本案经过公开聆讯和透明的审查。2011 年 4 月 15 日，终审法庭驳回提交人的要求，法庭裁决生效。提交人依照监督审查程序请求哈萨克斯坦最高法院审查此案(未提供日期)。2011 年 5 月 18 日，最高法院根据监督程序决定下令重审此案。

4.8 缔约国又说，本案中考虑到了难民署的建议。2010 和 2011 年，缔约国当局会见了难民署的高级官员，进行了磋商，并转达了有关提交人的信息。据此，难民署于 2011 年 5 月 3 日正式撤销了最初发给提交人的难民证。

4.9 缔约国还说，阿拉木图省移民委员会的决定是基于经过确认和核实的信息，显示在缔约国或第三国给予提交人庇护会对缔约国或其他邻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哈萨克斯坦当局对提交人的行动实施了两年的主动监控。决定对其引渡不是针对他过去的活动，而是基于他今后会对缔约国造成的威胁。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作出的评论

5.1 2011 年 5 月 23 日，提交人就本案中的程序问题作出澄清，解释说，2011 年 5 月 5 日，提交人向哈萨克斯坦最高法院提出对其案件进行监督审查的要求。律师也报告说，2011 年 4 月 28 日，律师请求总检察长办公室向其提供对提交人引渡令的复印件，因为这时法律已经有所变化，有可能对这类命令提出上诉。

5.2 2011 年 6 月 27 日，律师向人权事务委员会通报说，提交人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被引渡到中国。他指出，引渡其当事人的决定是在 2010 年 9 月作出的，此时没有可能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2011 年 1 月，《刑事诉讼法》得到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 531-1 条下规定可对此类裁决提出上诉，涉及关于强制转移的上诉：这项条款有追溯效力。律师回顾说，他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请求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供引渡令的复印件。他于 2011 年 6 月 7 日收到答复，称如果就引渡令提出上诉，检察官办公室将向主管法院转交所有材料。律师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向阿拉木图 Almalinsk 区法院提出上诉，但尚未作出裁决。

#### 缔约国提供的补充信息

6. 缔约国 2011 年 8 月 12 日提供了补充信息。缔约国指出，提交人的律师声称引渡提交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2010 年 9 月检察官作出的引渡其当事人的决定在当时是不可上诉的。缔约国解释说，检察官办公室于 2010 年 9 月 23 日作出决定。但是，鉴于提交人已申请庇护，对他的驱逐被终止，直到完成庇护程序为止。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定由法庭对引渡令作出审查。哈萨克斯坦《刑事诉讼法》第 109 条规定了对检察官的作为/不作为和决定提出上诉的问题。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如果直接受到检察官的作为/不作为和决定的影响，可向法院提出指

控，前提条件是推迟到审理阶段再核实这种作为/不作为和决定是否合法会导致难以或不可能恢复当事人的权利或自由。因此，在 2010 年的时候是可以对总检察长办公室引渡提交人的决定提出上诉的。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未尊重委员会关于采取临时措施请求<sup>2</sup>

7.1 委员会指出，尽管提交人的来文已根据《任择议定书》得到登记，就此也已向缔约国提出了临时保护措施请求，但缔约国仍将提交人引渡。委员会回顾指出，《公约》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受理并审查声称其《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而成为受害者的个人来文(序言和第一条)<sup>3</sup>。加入《任择议定书》使缔约国有义务与委员会进行诚意合作，以便允许委员会能够审议这类来文，并在审查后将其意见转达缔约国和所涉个人(第五条第 1 和第 4 款)。缔约国采取任何阻挠或破坏委员会审议和审查来文并表达意见的行动都是与上述义务不相符的。

7.2 除了来文中认定的缔约国违反《公约》的任何行为外，如果缔约国采取行动，阻挠或破坏委员会审查指控缔约国违反《公约》的来文，或使委员会的审查无法作决定，使委员会表达的意见无效或无用，就严重违反了其根据《任择议定书》承担的义务。在本来文中，提交人声称如其被引渡到中国，他根据《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所享有的权利就受到侵犯。缔约国已得到关于该来文的通知，但仍在委员会结束审议和审查工作并提出和转达其意见前将提交人引渡，违反了其根据《任择议定书》承担的义务。尤其令人遗憾的是，缔约国在委员会已经按照其议事规则第 92 条采取行动要求缔约国不要引渡提交人之后仍然这样做。

7.3 委员会回顾指出<sup>4</sup>，根据依《公约》第三十九条制定的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采取的临时措施对于委员会在《任择议定书》下发挥作用至关重要。无视该项规则，尤其是通过采取不可逆转的措施，如本案中引渡提交人的行为，破坏了《任择议定书》对《公约》权利的保护。

####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委员会注意到，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sup>2</sup> 例如，见第 1461/2006、1462/2006、1476/2006 和 1477/2006 号来文，Maksudov 等诉吉尔吉斯斯坦，2008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1-10.3 段。

<sup>3</sup> 例如，见第 869/1999 号来文，Piandiong 等诉菲律宾，2000 年 10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

<sup>4</sup> 见第 964/2001 号来文，Saidova 诉塔吉克斯坦，2004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

8.3 关于为满足《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律师作出了合理的努力,试图对相关当局拒绝给予 Israil 先生难民身份并随后决定将其引渡至中国的决定提出申诉,但是缔约国在这期间进行了引渡,从而使这些程序成为无用的举动。

8.4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的指控涉及《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与第二条第 3 款合并理解)、第九条(与第二条合并理解),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满足受理要求,宣布可以受理。

####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根据各方向其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9.2 提交人声称自己起初从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23 日被软禁。2010 年 6 月 23 日,他被拘留,等待引渡。按照缔约国的法律,这种拘留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是在本案中,提交人从 2010 年 6 月 23 日到 2011 年 5 月 30 日一直被拘留,在 2011 年 5 月 30 日被引渡。对提交人被持续软禁以及后来被拘留的所有上诉都没有成功。委员会回顾指出,剥夺自由只有在依照国内法律规定的理由和程序下进行且非任意拘留才是可以允许的。<sup>5</sup>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明确讨论这些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必须对提交人的指控给予应有的重视。据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本案中,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一款与第二条第 3 款(甲)项合并理解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9.3 关于提交人被从哈萨克斯坦引渡到中国是否使他在接收国面临酷刑或其他虐待的真实威胁从而违反了《公约》第七条所载禁止驱回的问题,委员会指出,必须根据缔约国当局在引渡时了解或应当了解到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存在这种真实的威胁。在确定本案是否存在这种待遇的风险时,委员会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sup>6</sup>

9.4 委员会重申,缔约国绝不能通过引渡、驱逐或遣返使个人在回到另一国家时面临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sup>7</sup>。这一原则不因国家安全考虑或有关个人被指控或涉嫌从事的犯罪行为类型而被妥协。

9.5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泛泛提出的论点,即将提交人留在哈萨克斯坦会造成威胁。委员会认为,尽管缔约国没有明确援引,这些论点事实上倾向于确定缔约国尊重了它在《公约》第十三条下的义务,而不是涉及本来文中提出的有关在第六条和第七条下对提交人的可能风险的问题。首先,委员会认为,在引渡提交

<sup>5</sup> 例如,见 Maksudov 等诉吉尔吉斯斯坦(上文脚注 2)。

<sup>6</sup> 同上。

<sup>7</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禁止酷刑或者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47/40),附件六, A 节,第 9 段。

人之时，缔约国当局了解或应当了解存在受到广泛注意的具有可信度的公开报告，称中国对被拘留者诉诸酷刑，而因政治和安全原因被拘押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人受到这种待遇的风险通常很高。<sup>8</sup> 委员会认为，综合上述因素，说明提交人如被引渡将在中国面临真实的酷刑风险。此外，很清楚提交人因严重的罪行而被中国追捕，在中国可能会面临死刑。虽然中国当局在引渡请求中作出声明，指出提交人不会被判处死刑(见以上第 2.2 段)，而缔约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委员会认为，通过与《公约》第七条不符的待遇进行定罪和作出死刑处罚的风险并没有被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也存在违反《公约》第六条的风险。

9.6 委员会回顾指出<sup>9</sup>，如缔约国将在其管辖下的一人移送至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如《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不可弥补的伤害的真实风险的另一管辖之下，缔约国自身可能违反了《公约》。在本案中，委员会的结论是，对提交人的引渡行为构成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行为。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现有事实显示哈萨克斯坦违反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1 款与第二条第 3 款(甲)项合并理解、第六条和第七条以及这两条与第二条合并理解所享有的权利。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包括充分的赔偿。要求缔约国采取切实措施，与接收国合作，监督来文提交人的情况。缔约国应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关于提交人情况的最新信息。缔约国有义务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违约行为。

12. 铭记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或所有受其管辖的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并要求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将其译成缔约国的正式语言，广泛分发。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8</sup> 例如，见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第四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AT/C/CHN/CO/4)，第 11 和 18 段；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E/CN.4/2006/6/Add.6)。提交人还提到大赦国际的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9 年骚乱情况的调查。

<sup>9</sup> 例如，见第 469/1991 号来文，Ng 诉加拿大，1993 年 11 月 5 日通过的《意见》，第 6.2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缔约国根据《公约》承担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问题的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59/40(Vol. I))，附件三，第 12 段。

## 十.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宣布来文不予受理的决定

### A. 第 1606/2007 号来文，A.I.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E.I. (没有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的丈夫 A.I.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6 年 11 月 22 日(首次提交)
事由:	任意拘留和殴打在押嫌疑人；在刑事审判中违反刑事诉讼法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的程度
实质性问题:	审判不公；任意拘留；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公约》条款:	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 E.I. 是白俄罗斯公民，生于 1969 年。她代表她的丈夫 A.I.提交来文，她的丈夫生于 1966 年，也是白俄罗斯公民，在提交来文时，他正在监狱服刑。提交人称，她的丈夫是白俄罗斯<sup>1</sup>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sup>1</sup>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和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白俄罗斯开始生效。

七条、第九条第 1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丙)项、第 3 款(庚)项和第 5 款规定的受害人。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的丈夫在 2003 年 8 月 30 日因被指控盗窃数辆汽车而被逮捕。提交人指出，根据白俄罗斯的法律，没有逮捕他的法律依据，调查人员为了使逮捕他的行为合法而伪造文件。

2.2 提交人指出，其丈夫被捕时，他没有表现出抵抗，没有对他使用武力。提交人说，同一天晚些时候，她的丈夫在鲍里索夫市内务部被明斯克地区执行委员会内务部官员殴打，这些官员想强迫他作对自己不利的证词。2003 年 9 月 1 日，在审讯期间，提交人的丈夫在其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抱怨被殴打。提交人指出，其案件档案中有一份她丈夫 2003 年 10 月 3 日的诊断书，确认身上有伤。<sup>2</sup>

2.3 提交人称，对其丈夫的审判无故拖延。她指出，她丈夫被捕时是军人身份，根据适用法律，应由军事法庭审判。但在 2004 年 1 月 13 日，其案件被移至地区民事法院达六个月。2004 年 6 月 8 日，地区法院法官确定该法院错误接受审议该案件，因为法院没有管辖权。此案随后转至军事法庭。

2.4 2004 年 8 月 4 日，提交人的丈夫被鲍里索夫军事法庭定罪，判以九年徒刑。提交人认为，其丈夫无罪推定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她指出，法庭仅只审查了对其丈夫的定罪证据，没有听取证人关于她丈夫被殴打的证词，其中包括他的律师和一些警察。

2.5 提交人指出，法庭宣布一些证据不可受理，因为这些证据是在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取得的。然而，她说法庭仍根据上述证据作出裁决。她还称，法庭没有解决一些证人的证词之间出现的矛盾，而且法官“歪曲”了一些证人的证词，又在判决中对一些证据作了曲解。她认为，上述事实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规定的无罪推定。

2.6 提交人的丈夫对一审判决向白俄罗斯军事法庭提出上诉，据称该法庭只作了粗略审查，便于 2004 年 10 月 15 日驳回上诉。提交人的丈夫几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监督复核的上诉，高法分别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2005 年 2 月 25 日和 2005 年 10 月 19 日予以驳回。这些上诉包括不公正审判和虐待的指控。提交人称，她丈夫的上诉没有得到适当审议。例如，她指出，法院没有审核其丈夫关于采用武力使其认罪的指控。对 A.I.曾被警察殴打的指控进行了两次调查，第一次

<sup>2</sup> 没有提供诊断书副本，但提交人提供了检察官办公室 2003 年 10 月 1 日和 2005 年 2 月 19 日的裁决副本，该办公室拒绝对调查警察的行为进行刑事调查。从这些裁决看，似乎对提交人丈夫的指控进行过调查。在第一次调查期间，于 2003 年 9 月 4 日对 A.I.进行了体检；这次体检确认他有诸如擦伤等“轻”伤，不会威胁到其健康和性命。检察官询问了提交人、实施逮捕的警察、逮捕提交人丈夫和同案被告时在附近的人，查看了记录这次逮捕情况的派出所日志，说明实施逮捕的警察曾采用“特殊方法”逮捕 A.I.。检察官得出结论，认为 A.I.的伤势与警察在逮捕期间采用武力的证词相符，认为后者合法使用了武力。

调查结束时由检察官办公室裁决认为 A.I. 的指控不成立，拒绝对逮捕提交人丈夫的警察启动刑事检控程序。提交人称，她的丈夫对该项裁决提出上诉，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由驳回其第一次上诉的同一名检察官主持。提交人认为，她的丈夫被剥夺了根据法律应由更高一级法庭对其定罪和判决进行复核的权利，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的规定。

### 申诉

3. 提交人称，所述事实显示缔约国侵犯她丈夫根据《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丙)项、第 3 款(庚)项和第 5 款享有的权利。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缔约国于 2008 年 5 月 2 日指出，提交人的丈夫于 2004 年 8 月 4 日因作为有组织团伙成员，盗窃和盗窃未遂被鲍里索夫驻军军事法院定罪并判以九年徒刑。在提出上诉后，白俄罗斯军事法庭又在 2004 年 10 月 5 日确认了定罪和判决。缔约国详细说明了提交人的丈夫犯罪的情况，重申了判决的内容。

4.2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关于其丈夫在被捕时身体遭受暴力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A.I. 提出申诉后，检察官办公室进行过“核实”，确定提交人的丈夫是在企图盗窃一辆车时被捕；他拒捕，警察为了抓住他，不得不采用“特殊办法”，可能造成轻伤。检察官得出结论认为，实施逮捕的警察合理使用武力，并正式拒绝展开刑事调查。

4.3 缔约国宣布，审判符合适用法律，没有证据显示审理法官对案件结果有个人利益、伪造证据，或犯有任何违反其他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缔约国认为，有罪判决是依据法院对全部证据作出评估后宣布的，法院对所有证据作了“适当的评估”。

4.4 缔约国指出，虽然提交人称其丈夫依《公约》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应该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其申诉的实质是她不同意其丈夫犯罪的认定。缔约国认为，对事实和证据进行评价是各缔约国的主权，不属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监管范围。

4.5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法院裁决指出，在预审程序期间犯下一些侵犯行为与有罪判决相抵是随意解释以及不理解法律术语，特别是“证据”和“证据来源”的含义。缔约国认为，已几次向提交人及其丈夫解释，违反刑事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没有作为有罪判决的依据。因此，提交人关于违反了《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和第十四条第 3 款的说法毫无根据。

4.6 缔约国还对提交人关于其丈夫的审判被无故拖延的申诉作出反驳。缔约国承认，由于错误，案件被分配错法院一段时间，但坚持认为提交人丈夫被羁押额外时间已计入刑期。



4.7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关于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的申诉毫无根据。A.I.提出的所有上诉，包括其向最高法院的上诉，都依法得到复核，他也收到有授权官员签名的答复。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sup>3</sup>

5.1 2008 年 7 月 4 日，A.I.详尽重申了其妻子在首次来文中提出的论点，对检方在法庭提审的大部分证据评估提出质疑，例如，他和同案被告之间电话谈话记录的含义。他重申，法庭的判决部分依据不可受理的证据。他指出，2004 年 8 月 30 日，他被警察殴打，并被迫写了供词。他指出，他对检察官办公室拒绝对虐待他的警察提出刑事指控提出上诉，但其案件被分配给驳回其第一次申诉的同一名检察官。

5.2 A.I.认为，将其案件分错管辖法庭造成诉讼程序拖延六个月，侵犯了他不被无故拖延审判的权利。

5.3 他还认为，确认判决的终审法庭拒绝承认一审期间违反了刑事诉讼程序。他指出，根据国内法规定，应由最高法院进行监督复核，但他的一次上诉却被公民申诉部负责人而非法院驳回。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理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注意到，按《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和(丑)项要求，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并用尽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6.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违反《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 3 款(庚)项、其丈夫受到身心压力使其认罪(见上文第 2.2 和第 5.1 段)的指控，但提交人未能提供涉嫌殴打的详情，特别是涉嫌酷刑的方法或实施酷刑人的身份。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认为两次对 A.I.的申诉进行了调查，并确定毫无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在委员会没有掌握其他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部分来文为受理目的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6.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关于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款的意见，认为根据白俄罗斯法律规定，逮捕其丈夫没有法律依据，调查人员为了证明逮捕其丈夫合理伪造文件。但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没有就此提呈实质性证据，缔约国表示，

<sup>3</sup> A.I.(本案据称受害人)而非其妻子(“提交人”)提供了关于缔约国意见的评论，提交人代表其丈夫向委员会提交首次来文。

A.I.企图偷汽车时被捕。因此，委员会认为可否受理目的，提交人未能证实这一申诉，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关于违反第九条第1款的申诉不可受理。

6.5 关于根据第十四条第1款提出的指控，委员会指出，这些申诉主要涉及对审讯时提具证据的评估，这一事项原则上属国内法院管辖，除非对证据的评估显然是任意或构成司法不公。<sup>4</sup>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刑事诉讼程序存在这类缺陷，因此，委员会认为，为可否受理目的，这部分来文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6.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提到其丈夫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2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判决的依据有一部分是法庭宣布不可接受的证据。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这一点，一审判决列出了法院作出结论所依据的其他一些证据。因此，委员会认为，对可否受理而言，来文的这一部分缺少充分的证据，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不可受理。

6.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认为其丈夫的审判受到不必要的拖延，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3款(丙)项，因为案件被错误转至民事法庭，被重新分配给军事法庭前在民庭达六个月之久，根据国内法规定，军事法庭对其案件有管辖权。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的丈夫于2003年8月30日被捕，2004年8月4日一审定罪，2004年10月15日对其请求撤消判决的上诉作出裁决。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鉴于诉讼的总体时间，以及从其判刑中扣除预审拘留时间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委员会认为为受理目的，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申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部分来文不予受理。

6.8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根据法律，她的丈夫应由更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和判刑进行复审，但被剥夺这项权利，因而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5款。委员会指出，白俄罗斯军事法庭根据上诉对提交人丈夫的裁决进行了复核，判决显示，该机构认真研究了一审法庭对证据的评估，包括检察官办公室对虐待指控调查结果的评估。委员会还指出，最高法院也对A.I.的案件进行了复核。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来文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不可受理。

<sup>4</sup> 见第3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62/40(第一卷))，附件六)，第26段。除其他外，还见第917/2000号来文，Arutyunyan诉乌兹别克斯坦，2004年月3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5.7段；第927/2000号来文，Svetik诉白俄罗斯，2004年7月8日通过的意见，第6.3段；第1084/2002号来文，Bochaton诉法国，2004年4月1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6.4段；第1167/2003号来文，Ramil Rayos诉菲律宾，2004年7月27日通过的《意见》，第6.7段；及第1399/2005号来文，Cuartero Casado诉西班牙，2005年7月25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4.3段。

7.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B. 第 1627/2007 号来文，V. P.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V. P.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06 年 6 月 29 日(首次提交)
事由:	被捕时受到警方虐待和不公正审判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禁止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由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平审理的权利；迅速获悉刑事指控的权利；为准备辩护获得足够时间和设施的权利；在不无故拖延情况下受审的权利；获取法律援助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七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3 款(甲)、(乙)、(丙)和(丁)项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 V. P. 先生是俄罗斯联邦公民，生于 1951 年。他声称俄罗斯联邦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3 款(甲)、(乙)、(丙)和(丁)项，侵犯了他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 月 1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无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俄罗斯联邦萨马拉市的理疗师。他声称 2002 年 3 月 21 日，萨马拉区内政厅(区内政厅)警务部的一队警察在他的工作场所、他同事和患者的面前对他进行了野蛮殴打。他们击打他的面部、扼住喉咙、将手臂扭到背后，还逼迫他承认受贿。

2.2 同一天，他被带到萨马拉区内政厅，据称在那里他被迫承认收取了 B.先生 300 俄罗斯卢布的贿金和一瓶价值 250 俄罗斯卢布的干邑白兰地，提交人不认识 B.先生也从未与其谋面。提交人坚称，B.及其朋友 F.是警方安排的内线，在他既不知情也未同意的情况下，将干邑白兰地和 300 卢布偷偷放入他的诊室，藉此在医院他的诊室内设计了受贿的圈套。B.先生声称提交人为出具虚假医疗证明而索贿并且提出了申诉，根据这一申诉，萨马拉市萨马拉区检察院依据《刑法》第 290 条(贿赂)对他提起刑事诉讼。

2.3 B.先生的上述申诉、警方采取行动的決定、警方的行动计划、收取钱财的报告、致萨马拉市萨马拉区检察院的信函和对提交人刑事立案的決定，所有这些文件的日期均为 2002 年 3 月 21 日，这些文件使受贿指控正式确立。提交人声称，本刑事案件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例如录音或录像、证人证言或其他任何有关指称事实的客观证据。他还指出，对他的刑事指控是基于 B.和 F.提交的证据，而此二人能从对他的刑事立案中获得个人利益。2003 年 5 月 16 日，提交人被判 3 年徒刑，剥夺行医权利 1 年。根据《刑法》第 73 条，剥夺自由被改为缓期执行 3 年。

2.4 2002 年 3 月 23 日，提交人向萨马拉地区法医局提出申请，请求记录警方殴打造成的伤情。身体检查证实有包括擦伤和瘀伤在内的几处外伤，导致他在 3 周内暂时丧失工作能力。<sup>1</sup>

2.5 2002 年 3 月 29 日，提交人向萨马拉市萨马拉区检察院提起申诉，起诉警察滥用职权和使用武力。负责调查 2002 年 3 月 21 日立案的刑事案件的同位调查员对他的指控展开调查。2002 年 4 月 11 日，调查员以缺少犯罪事实为由拒绝对相关警察刑事立案。

2.6 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提交人就 2002 年 4 月 11 日的決定向萨马拉区法院提起上诉。2002 年 7 月 9 日，法院驳回上诉，称《警察法》第 12 条和 13 条规定允许依法使用武力。2002 年 8 月 23 日，萨马拉区法院刑事庭又驳回了提交人要求撤销原判的上诉。

2.7 2002 年 4 月 11 日、2002 年 4 月 22 日、2002 年 5 月 17 日、2002 年 5 月 23 日、2002 年 6 月 13 日和 2002 年 7 月 17 日，提交人向检察院各个机构提出申

<sup>1</sup> 2002 年 3 月 23 日的法医报告证实了下列伤情：面部和右前臂瘀伤、左颈部擦伤、两颊粘膜出血和两颊粘膜伤口。其遭受的瘀伤、擦伤和粘膜出血未损害健康；伤口对健康造成轻度损害，对健康的短期影响可达 3 周。

诉，但他声称仅收到了正式答复。俄罗斯联邦监察专员办公室和萨马拉市萨马拉地区监察员也未能对其申诉进行适当审查。

##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被捕时受到警察虐待，这违反了《公约》第七条。他坚称证人证言和 2002 年 3 月 23 日的法医报告可以佐证他的申诉。

3.2 他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萨马拉区法院审理期间，法官违反了公正和权利平等的原则。本案预审期间，法官承担了原告的角色，试图向提交人交付起诉书副本，而原告从未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222 条的规定在初级侦讯结束时将起诉书送达提交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的规定，法官本应该将本案发回原告，但法官本人却试图将该副本送交提交人。该法官还不允许提交人向原告提问，并且驳回了 he 要求传唤证人、进行法医检查和出具某些文件原件的请求，而原告的所有请求均得到批准。因此，提交人称这违反了公正和平等权利的原则，还坚称他事实上被剥夺了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此外，2003 年 4 月 21 日，他要求法官回避的请求被驳回。

3.3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甲)项，因为他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他只收到了 2002 年 7 月 1 日和 7 月 15 日调查员下达的两份命令，简要说明了他所受指控的性质。<sup>2</sup> 由于他没有充分了解指控的内容，因而无法适当准备辩护。

3.4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因为初级侦讯结束时他本人和律师均未见到刑事案件的全部材料，因此他没有机会准备辩护。

3.5 提交人还声称他由《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保障的在不无故拖延情况下受审的权利受到侵犯。2002 年 10 月 1 日他的刑事案件送达萨马拉区法院登记处。但是直到 2002 年 10 月 25 日法官才对本案进行预审。预审后预定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审理本案，但随后审理又因不明原因推迟。因此，直到 2003 年 4 月 1 日才进行第一次法庭审理。4 个月的拖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 233 条第 1 款，这一款规定法院应在预审日期后 14 日内开始审理刑事案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并不存在任何客观障碍妨碍本案的审理，而且法院也没有为这一拖延提出任何合理解释。

3.6 最后，提交人声称他根据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指出自己无力聘请私人律师，鉴于他的案件从事实和法律角度而言均十分复杂，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有利于司法公正。2002 年为他指派的辩护律师 K. 先生没有积

<sup>2</sup> 2002 年 7 月 1 日的命令(备案可查)中，调查员通知了提交人他的被告身份，提交人在上面签署了姓名。该命令明确指明提交人被控犯有《刑法》第 290 条第 2 款(贿赂)之下的罪行，并列举了提交人作为被告享有的程序性权利。2002 年 7 月 15 日的命令(备案可查)依据《刑法》第 285 条第 1 款(滥用权力)增加了一项新的指控。

极辩护，也没有查阅案件卷宗。提交人因而拒绝了他的服务，并要求法院指派一名更称职的律师。

3.7 2003 年指派的第 2 位律师 G.先生出席了审判的大部分过程。然而，他在庭审第 6 天表示不熟悉案件材料。此外，他不支持提交人在法庭上的请求。因此，提交人拒绝他的援助。

3.8 第 3 位律师 L.先生拒绝支持他的请求，而交由“法院酌情处理”。出于这个原因，提交人也拒绝了他的服务。结果 2003 年 5 月 8 日和 12 日，法庭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审理。他声称律师的消极行为使他丧失了辩护权，还辩称由国家指派辩护律师的做法不足以确保被告得到合适的法律援助。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4 月 21 日，缔约国提出了意见。它指出，2002 年 3 月 21 日，萨马拉市萨马拉区检察院对提交人刑事立案，理由是他为出具虚假医疗证明收取了 B.先生 300 卢布的贿赂和一瓶干邑白兰地。初级侦讯过程中，提交人被控违反了《刑法》第 290 条第 2 款(官员因非法行为收取贿赂)。

4.2 2003 年 5 月 16 日，萨马拉区法院认定提交人犯有受贿罪并处以 3 年徒刑。根据《刑法》第 73 条，剥夺自由被改为缓期执行，缓刑 3 年，同时剥夺行医权利 1 年。2003 年 6 月 27 日，萨马拉地区法院刑事庭复审了对提交人的判决后，废止剥夺行医权利的判决。

4.3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控，缔约国指出审讯期间提交人曾宣称，警察向他出示证件后要求他一起返回办公室。上楼时他很恐惧，从口袋中掏出一些钱<sup>3</sup>放入口中开始咀嚼。由于他没有听从命令拿出口中的物品，一名警察用力把钱从其口中拽出，提交人的口腔黏膜因此受损。G.先生、S.女士、F.先生、B.先生和其他目击证人均确认了这一事实。

4.4 2002 年 3 月 29 日，提交人请求萨马拉市萨马拉区检察院对警察刑事立案，理由是对他滥用权力和使用武力。2002 年 4 月 11 日，调查员在调查据称事实后以缺乏犯罪事实为由拒绝刑事立案。2002 年 4 月 15 日萨马拉区检察院维持了这一决定。

4.5 2002 年 5 月 6 日，提交人向萨马拉区法院就 2002 年 4 月 11 日调查员的决定提起上诉，2002 年 7 月 9 日法院驳回了上诉。法院表示，根据警方行动时在场者给出的说法，以及观看逮捕录像后作出的报告，很显然提交人并未遭到殴打。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适当而且为阻止犯罪行为所必需，警方的行为符合《警察法》第 12 条和第 13 条。2002 年 8 月 23 日，萨马拉区法院维持了 2002 年 7 月 9 日的判决，驳回了提交人要求撤销原判的上诉。

<sup>3</sup> 根据卷宗中现有的材料可以获知，贿金事先经过特殊溶剂的处理，在紫外灯的照射下会发光。此外，这些纸币带有记号(在一份特殊报告中登记了纸币的号码和序号，而且还将纸币复印备份)。提交人被捕时，在他身上查获了这 3 张 100 卢布的纸币。



4.6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甲)项提出的指控, 缔约国指出 2002 年 9 月 28 日, 调查员在两名普通证人 R.女士和 I.女士面前将起诉书副本交给提交人。他断然拒绝接受这份副本。预审期间提交人本人确认, 调查员在两位陌生女士的陪同下来找过他。<sup>4</sup> 遭到提交人拒绝后, 又以普通邮件向他发送了一份起诉书副本, 还将另一副本送达他的律师。<sup>5</sup>

4.7 2002 年 10 月 25 日预审期间, 提交人申诉称他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 法官准备为其提供相关副本, 但他再次拒绝接受。法官根本没有承担原告的角色; 她这样做是为了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47 条第 4 节第 2 款的规定, 确保提交人收到起诉书副本的权利得到尊重。提交人主动拒绝接受起诉书副本, 这并不构成侵犯他就本人所受指控得到及时、详细的通知的权利。他就本人所受指控及其作为被告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及时、详细的通知, 因此《刑事诉讼法》第 171 和 172 条规定的程序得到了适当尊重。提交人没有反驳上述事实。

4.8 提交人所称无法向原告提问的指控没有依据。虽然《刑事诉讼法》第 275 条规定原告有权审问被告, 但现行法律不保障被告向原告提问的权利, 因此提交人在这方面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

4.9 提交人及其律师在庭审期间提出的所有要求(即传唤证人、进行法医检查、要求得到某些文件的原件)均得到了法庭的适当考虑。<sup>6</sup> 较之于辩护方提出的请求, 起诉方有更多的请求获得法庭批准, 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被理解为违反了公正和平等权利的原则。关于提交人要求法官回避的请求, 缔约国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4 条第 4 款的规定, 对由一名法官审理的刑事案件中的法官提出的回避请求应由所涉法官审议。法官充分审议了这一请求, 并在 2003 年 5 月 8 日萨马拉区法院的裁决中加以反映。<sup>7</sup>

4.10 提交人辩称对他的定罪不合法, 撤销原判上诉和监察复审程序对此均进行了审议并因理由不充分而驳回。为提交人定罪不仅依据了提交人所指证人的证词(见上文第 2.3 段), 还依据了其他证人的证词和其他证据。

4.11 关于缔约国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的指控, 缔约国指出 2002 年 7 月 16 日, 调查员通知提交人及其律师初级侦讯已经结束, 他们有权了解刑事案件

<sup>4</sup> 2002 年 10 月 25 日的审理记录(备案可查)证实了这一说法。

<sup>5</sup> 根据 2002 年 10 月 25 日的预审记录(备案可查), 原告确认曾以挂号信向提交人发送了一份起诉书副本, 投递记录也备案可查。此外, 根据 2003 年 4 月 17 日的裁决, 邮政部门确认发给提交人的挂号信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投递至他的住址。因为提交人不在家, 信件投入他的邮箱。2002 年 10 月 7 日、14 日、21 日和 28 日发送的其他信件亦如此投递。

<sup>6</sup> 根据 2003 年 4 月 21 日的审理记录(备案可查), 法院满足了提交人传唤几名证人作证的请求, 法院还给出了拒绝进行额外法医检查的理由。

<sup>7</sup> 2003 年 4 月 21 日, 法官下达了一份裁定书, 说明了她所做判决的理由(备案可查)。其中向提交人说明, 《刑事诉讼法》第 231 条规定在预审期间决定由一名法官还是一组法官审议一宗案件。由于提交人未在 2003 年 4 月 1 日、14 日和 17 日的审理期间提出反对由一名法官审理他的案件, 因此对于他在庭审期间提出的由一组法官审理此案的要求不予考虑。



的材料。同日，审讯被推迟至 2002 年 8 月 21 日。案件卷宗共有 240 页，此前提交人见到了 64 页(包括起诉书、他的审讯报告、他的解释、请求和要求及进行法医检查的决定)。2002 年 7 月 16 日至 7 月 24 日，提交人每天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均可以查阅案件卷宗，但他平均每天只看了两个小时。

4.12 2002 年 7 月 25 日，提交人在两名普通证人面前拒绝接受至萨马拉区检察院阅读案件卷宗的通知。2002 年 7 月 29 日上午 9 时，提交人再次被传唤，但他上午 12 点才到庭，而且拒绝等待他的律师，也没有查阅任何资料。2002 年 7 月 30 日和 31 日，他还以受到萨马拉区法院传唤为由拒绝前往检察院。2002 年 8 月 1 日，他因律师不在场而没有查阅案件卷宗。2002 年 8 月 2 日至 7 日，他没有去检察院，而未给出任何理由。2002 年 8 月 9 日上午 9 时 15 分至 10 时 50 分，他查阅了案件卷宗，随后又因健康问题为由拒绝查阅。医疗急救队认定他的健康状况没有问题。2002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20 分至 11 时 37 分，他查阅了案件卷宗。2002 年 8 月 27 日，他查阅了卷宗第 24 页和 25 页。

4.13 2002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0 日，提交人没有到检察院查阅案件卷宗，还毫无理由地拒绝接受任何传唤，尽管他充分了解自己有义务在传唤令指明的时间内前往检察院。2002 年 9 月 20 日卷宗查阅期结束。因此，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2002 年 7 月 16 日至 2002 年 9 月 20 日)，提交人仅在 9 天中查阅了卷宗。2002 年 9 月 20 日之后，他从没有为此要求获得额外的时间。然而，从 2002 年 10 月 2 日卷宗存放在法院起一直到 2003 年 4 月 14 日审议案情期间，他都可以另外查阅案件卷宗，而且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因此，他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辩护。

4.14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提出的指控，缔约国反驳说本刑事案件是于 2002 年 10 月 1 日递交至法院的。2002 年 10 月 11 日，法官将预审日期定在 2002 年 10 月 25 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7 条第 3 款，法官应在法院受理案件 30 天内确定预审时间)。本案预定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审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233 条第 1 款规定的时限(刑事案件应在预审后 14 天之内开庭审理)。2002 年 11 月 8 日，本案未获审理，因为 2002 年 10 月 28 日提交人就法官开始审议案情的决定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2002 年 11 月 1 日又提出补充上诉)。

4.15 2002 年 11 月 25 日，本案被发回萨马拉区法院，定于 2002 年 12 月 17 日审理。当日，提交人因健康问题提出暂停诉讼的请求，法院批准了这一请求。

4.16 重新开庭的日期定在 2003 年 4 月 1 日，此时提交人再次声称他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于是审理推迟至 2003 年 4 月 14 日，以便原告向邮局求证有关文件的送达情况。2003 年 4 月 14 日没有举行审理，因为替换了原告，新指派的原告要求获得 3 天时间熟悉案件卷宗。这一请求没有受到提交人反对，获得了法院的批准。<sup>8</sup> 案件审理始于 2003 年 4 月 17 日。因此，法院是依据客观原因推迟审

<sup>8</sup> 2003 年 4 月 14 日的审理记录(备案可查)证实了这一事实。

理，而且几次是应提交人的要求或是因为他提起上诉而推迟。据此，提交人在不无故拖延情况下受审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

4.17 至于据称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缔约国指出初级侦讯和法庭预审期间，曾指派 K.先生为律师。但是提交人拒绝他的法律援助，理由是他“不专业”。随后法院为其指派了另一名律师 G.先生，他熟悉案件卷宗而且参加了所有庭审。然而，2003 年 4 月 28 日，提交人拒绝他的援助。2003 年 5 月 7 日，提交人拒绝了指派的第 3 名律师 L.先生的法律援助，还请求法院指派一名称职的律师。

4.18 由于提交人不断以律师专业水平低为由拒绝法律援助，法院未能成功地为他提供援助，有鉴于此，法院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审理。提交人从未表明他希望由哪位专门的律师代理。此外，他本人也可以聘请私人辩护律师。

4.19 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受委派律师的专业性。他们均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积极运用了程序性权利，包括参与审查证据、询问证人、向法院提出请求及就此表达看法。因此，提交人的指称未得到案件卷宗材料的佐证，而且没有事实根据。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08 年 6 月 14 日的评论中反驳了缔约国说他“口中有钱”及没有受到警察殴打的论点，声称他的逮捕录像显示了相反的情形，而且法医报告可以佐证他的指控。

5.2 他坚称所谓的“目击证人”直接参与了警方为他设计的圈套，并不是客观证人，是警方事先“召来”参与对他进行“蓄意陷害”的。他再次申明以上第 2.2 和 2.3 段提供的信息。他声称对他的刑事指控依据的仅是警察及其他参与“蓄意陷害”者的证词。他还提及欧洲人权法院对 Teixeira de Castro 诉葡萄牙一案的判决<sup>9</sup>。法院在判决中称，Teixeira 先生因警方唆使犯罪而获罪这一事实意味着从一开始他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就明确受到剥夺。因此，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5.3 关于以邮件向他发送起诉书副本而他在普通证人面前拒绝接受副本的说法，提交人声称他从未收到过副本邮件，案件卷宗中没有任何经他签署的收条。此外，所谓的“普通证人”是编造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法院传讯，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庭审记录中<sup>10</sup>。他进一步指出，既然原告有权询问被告，那么被告也对原告拥有同样的权利，他还回忆称，法官不允许他向原告提问。

<sup>9</sup> 第 25829/94 号申请书，欧洲人权法院 1998 年 6 月 9 日的判决。

<sup>10</sup> 根据 2003 年 4 月 21 日的审理记录(备案可查)，提交人要求上述证人出庭。法院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是似乎被告没有能够确保他们到庭。

5.4 提交人再次申明法官试图向他交付起诉书副本，这违反了公正的原则。他重申法官驳回了他要求传唤证人作证、进行法医检查和出具某些文件原件的请求，而原告的所有请求均得到了批准。法院驳回了他要求法官回避的请求，而未提供任何理由。<sup>11</sup> 因此，他被剥夺了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而原告却在支持对他的刑事指控方面获得了明显的程序性优势。

5.5 提交人进一步反驳了缔约国以下说法：缔约国指称他拒绝阅读案件卷宗而又不说明原因。他援引自己的健康问题为由(见上文第 4.12 段)，而且申明他仅有时间熟悉卷宗的一小部分内容。他坚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8 条，证明被告及其律师查阅了案件卷宗的唯一文件是为此做出的报告，而且被告及其律师均应在报告上签名。他本人和他的律师均没有在 2002 年 7 月 15 日的有关报告上签名。他坚称自己不熟悉案件材料，也从未拒绝查阅材料。2002 年 7 月 17 日，他向萨马拉区检察官申请延长案件卷宗期 4 个月。他的律师 K. 先生也不熟悉案件卷宗。

5.6 关于缔约国对其案件审理中的不正当拖延的意见(见上文第 4.14 至 4.16 段)，提交人坚称，他只是自 2002 年 12 月 17 日至 12 月 31 日生病两周，这一情况不能作为推迟审理案件 4 个多月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3 条第 1 款，本应不迟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开庭审理本案。然而，出于不明原因，法院没有遵守这一期限<sup>12</sup>，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

5.7 关于缔约国辩称他得到了合格的法律援助，他重申了此前的指控并强调指出，2003 年 5 月 8 日和 12 日是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审理他的刑事案件。因此，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

###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6.1 2011 年 7 月 15 日，缔约国提出了补充意见。它反驳提交人受到警察虐待的指控，并且指出提交人援引的法医报告显示有下列伤情：面部和右前臂瘀伤、右颈部擦伤、两颊粘膜出血和两颊粘膜伤口。由于提交人被逮捕时试图吞咽收取的贿金，没有对警察的指令做出反应并且做出了反抗，警察用力按住他的双手并挤压其颊骨，防止他吞下钞票。使用武力是在阻止犯罪行为所需的范围之内，而且符合《警察法》第 12 条和第 13 条。

6.2 提交人对警察刑事立案的请求被驳回，而且法院在要求撤销原判的上诉和监察复审程序中均维持了这一判决。此外，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也考虑了他提出的虐待指控，并认定提交人提出该指控是为了规避刑事责任。法院还应提交人的要求就其申诉听取了两名证人(提交人的同事 Z. 女士和 I. 女士)的证词。

<sup>11</sup> 备案可查的材料显示了与此相反的情况。见上文脚注 7。

<sup>12</sup> 尽管提交人未说明拖延的原因，并提到“原因不明”，但是缔约国在其意见部分的第 4.14 至 4.16 段提供了反驳提交人指控的相关资料。

6.3 此外，法院还在判决中明确指出，不能将警察的行为视为陷害。法院为此援引最高法院合议庭 2000 年 2 月 10 日关于贿赂和商业贿赂案件司法惯例的第 6 号裁定书，其中规定不能将警方在收到索贿申诉后采取的行动视为陷害。2002 年 3 月 21 日，B.先生提出了此类申诉，其申诉被迅速录入萨马拉区内政部犯罪记录册。同日，警方将要在行动中使用的钱币交给了 B.先生。<sup>13</sup>

6.4 至于提交人指称证人能从对他的刑事诉讼中获得个人利益，缔约国指出 S.女士已经说明，2002 年 3 月 21 日警方对第一医院一名医生的受贿行为采取行动期间，她应邀作为普通证人参与。另一名应邀作为普通证人的 G.先生也做出了同样的说明。这些证人出庭作证并且了解作伪证的刑事责任。在询问相关证人期间，提交人并未申明他们能从对他的刑事诉讼中获得利益。<sup>14</sup> 在要求撤销原判的上诉书中，他也没有提出这一请求。

6.5 提交人称，他拒绝接受起诉书副本时普通证人 R.女士和 I.女士在场，这一指称是编造出来的，对于这一指称，缔约国重申了此前的意见，并补充说提交人从未在撤销原判上诉书中提出这一请求。

6.6 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提出的要求，缔约国重申了此前的意见，并补充说案件卷宗查阅报告(2002 年 7 月 15 日)上没有提交人及其律师的签名，是因为他们于 2002 年 7 月 16 日才得知初级侦讯已经结束并了解到他们查阅案件卷宗的权利。他们在初级侦讯结束通知报告上面的签名可以证实这一点。提交人及其律师看到了记录提交人被捕情况的录像带。虽然他们当时没有在报告上签名，但是案件卷宗查阅时间表上面出现了他们的签名：2003 年 7 月 16 日下午 4 时至 5 时 45 分他们两人都观看了录像。

6.7 缔约国还重申了关于提交人指称其案件审理中出现不正当拖延的意见，并指出提交人没有在撤销原判上诉书中提出这一请求。

6.8 对于提交人指称自己没有获得合格的法律援助，缔约国进一步重申了此前的意见，并指出提交人拒绝了第一名律师 K.先生的援助，理由是他“为调查方工作而且其行为违背了他的利益”，而在提交委员会的来文中援引的理由却是 K.先生没能够查阅案件卷宗。然而，案件卷宗材料证实，K.先生和提交人一起在 5 天内查阅了卷宗材料，他还在 2002 年 9 月 30 日收到了起诉书副本。

6.9 指派的第二名律师 G.先生确保提交人在法庭诉讼期间得到了辩护。他支持了提交人的当庭请求还向当事各方提了问题，审判记录证实了这一点。提交人指称 G.先生没有查阅案件卷宗也没有支持提交人当庭请求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例如，检察官请法庭宣读了证人 K.先生的证言，了解了有关报告的内容后，律师和提交人都同意当庭宣读报告。<sup>15</sup> 法院还批准了律师的请求，同意给他查阅

<sup>13</sup> 见上文脚注 3。

<sup>14</sup> 本段中缔约国提供的资料经 2003 年 4 月 21 日的审理记录(备案可查)证实。

<sup>15</sup> 2003 年 4 月 17 日的法庭审理记录(备案可查)证实了这一点。

案件卷宗的时间。<sup>16</sup> 然而，G.先生查阅了案件卷宗后，提交人却拒绝了他的法律援助。

6.10 基于上述原因，缔约国坚称提交人滥用了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缔约国的结论是，提交人根据《公约》提出的所有指控均无事实依据。

### 提交人的进一步评论

7.1 关于受到警方虐待的指控，提交人在 2011 年 8 月 22 日的信函中重申了此前的评论，并且坚称两位证人 Z.女士和 I.女士的证言佐证了他的指控。他认为缔约国承认他被捕时在场的证人 G.女士、S.女士、F.先生和 B.先生是被警方强行召集参与对他的“蓄意陷害”。此外，缔约国没有出具任何证据证实他犯有受贿罪。

7.2 提交人还重申了上文第 5.3 段提出的观点，并且声称由于普通证人 R.女士和 I.女士是编造出来的而且从未接受法庭询问，<sup>17</sup> 他无法在请求撤销原判的上诉中提及二人。

7.3 关于缔约国所称他拒绝了解案件卷宗的说法，提交人重申了此前的意见。他还声称缔约国没有为案件审理中的不正当延误提出任何理由<sup>18</sup>，撤销原判上诉中没有提出此项指控是因为不正当延误本身不能作为撤销或修改判决的理由。

7.4 关于法律援助不足的问题，提交人再次提出指控，并且补充说他的辩护律师均未代表他提出撤销原判上诉或监察复审申请。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缔约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已经达到。

8.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称在被捕时受到虐待，2002 年 3 月 23 日的法医报告也有相关记载。它还注意到缔约国反驳此项指控，称使用武力程度适当，而且为阻止提交人损毁证据(吞咽贿金)所必需。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提交人对警察提起的申诉因缺乏犯罪事实被驳回，撤销原判上诉和监察复审程序均维持了这一决

<sup>16</sup> 2003 年 4 月 23 日的法庭审理记录(备案可查)证实了这一点，法院同意给律师查阅案件卷宗的时间，并将审理推迟至 2003 年 5 月 7 日。

<sup>17</sup> 见上文脚注 10。

<sup>18</sup> 缔约国在其意见中反驳了这一论点，见上文第 4.14 至 4.16 段。

定。委员会注意到双方给出的事件版本大相径庭，但是缔约国对于使用武力本身没有做出争辩。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举出的法医报告记载了以下伤情：面部和右前臂瘀伤、右侧颈部擦伤、以及构成轻微伤害的两颊粘膜出血和两颊粘膜伤口。他还注意到缔约国解释称，警察使用武力，用力按住提交人的双手并挤压其颊骨，防止他吞下收取的贿金。考虑到缔约国为逮捕行动期间使用武力的程度提出的正当理由，再考虑到卷宗资料对于申诉中所指称事实是否存在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委员会得出结论，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申诉以满足受理要求，并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8.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申诉，即他要求法官回避的请求被驳回，他要求传唤证人作证和进行法医检查的要求也被法院拒绝，而原告提出的所有请求均得到了批准。缔约国反驳称，法院批准了提交人要求传唤证人的请求，这一点有法庭审理记录为证。至于提交人要求传唤证人作证和进行额外法医检查的请求，法院也说明了拒绝的理由。此外，法院及时审议了提交人要求法官回避的申请，并在驳回申请时下达了裁定书，说明了驳回申请的合法依据。

8.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指控主要涉及事实和证据的评价，委员会还忆及其判例，即通常不是由委员会，而是由缔约国法院来审查或评价事实和证据，除非委员会可以肯定，审判的做法或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价明显存在任意性或构成执法不公。<sup>19</sup> 委员会注意到它收到的庭审记录等材料并未表明法院的公正受到影响，平等权利原则受到违反或对提交人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削弱。委员会因此得出结论，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申诉以满足受理要求，并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8.7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没有收到起诉书副本，从而没有充分了解他所受刑事指控的性质，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甲)项。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提交人在普通证人面前断然拒绝接受起诉书副本。缔约国还数次以挂号信将有关副本寄送提交人，而且在卷宗中可以查到投递确认记录。此外，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收到调查员 2002 年 7 月 1 日和 15 日下达的两份命令，简要说明了他所受指控的性质。2002 年 7 月 1 日的命令(备案可查)含有事实概述并且明确指出提交人被控违反了《刑法》第 290 条第 2 款(贿赂)。提交人签名确认他明白所受指控也获悉本人作为被告的程序性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

<sup>19</sup> 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2/40(Vol. I))，附件六，第 26 段；除其他外，见第 541/1993 号来文，Simms 诉牙买加，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第 1616/2007 号来文，Manzano 等诉哥伦比亚，2010 年 3 月 19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6.4 段；第 1532/2006 号来文，Sedljar 和 Lavrov 诉爱沙尼亚，2011 年 3 月 29 日通过的关于不可受理的决定，第 7.3 段。

为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其申诉以满足受理要求，并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8.8 提交人指控称他本人和律师均不了解刑事案件材料，因此没有机会准备辩护，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关于这一指控，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供了详细资料，说明为提交人及其律师提供了时间和设施，供其熟悉案件卷宗(第 4.11 至 4.13 段)。鉴于这些资料，委员会认为这项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以满足受理要求，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8.9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丙)项指称其案件的审理出现不正当拖延，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声称推迟审理提交人的案件是基于客观原因，其中包括提交人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后又因健康问题为由请求暂停诉讼，以及新指派的原告请求了解案件卷宗，提交人没有反对这一请求。鉴于上述说明，委员会认为这项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以满足受理要求，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不予受理。

8.10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称，他拒绝缔约国提供的法律援助后，其案件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审理，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拒绝了政府指派的 3 名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理由是他们没有熟悉刑事案件的材料，也没有支持他在法庭上的要求。缔约国反驳了这些论点，称法院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可以怀疑指派的这些律师的专业性。从委员会得到的庭审记录中可以获悉，指派的 3 名律师均看过案件卷宗也履行了律师职责，包括询问证人、参与证据审查及支持提交人当庭的请求。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这项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以满足受理要求，并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予受理。

9.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C. 第 1634/2007 号来文, Korneenko 诉白俄罗斯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Viktor Korneenko (没有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7 年 4 月 18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没有执行委员会关于第 1274/2004 号来文的意见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的程度

实质性问题: 审判不公; 有效补救; 结社自由

《公约》条款: 第二条; 第十四条; 第二十二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 Viktor Korneenko 是白俄罗斯公民, 生于 1957 年。他称白俄罗斯<sup>1</sup> 侵犯了他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和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 事实背景

2.1 2006 年 10 月 31 日, 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了提交人提交的另一份来文, 即第 1274/2004 号来文, 裁定他是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十二条款第 1 款规定的受害者。理由是解散提交人担任主席的“公民行动”协会, 缔约国不当限制了他结社自由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 在白俄罗斯, 未经注册的协会运作属于非法,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凯林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sup>1</sup>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和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白俄罗斯开始生效。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有权获得适当补救，包括重组“公民行动”协会以及获得补偿，缔约国应避免在今后发生类似违反规定的情况。委员会还要求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

2.2 2006 年 11 月 29 日，提交人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最高法院和 Gomel 地区执行委员会司法部(司法部)提出申诉，要求他们遵照执行委员会的意见。2006 年 12 月 15 日，总检察长办公室答复说，他可以要求对 Gomel 地区法院关于解散“公民行动”的裁决进行监督复审，但这项请求应符合白俄罗斯国内法律。2006 年 12 月 18 日，最高法院答复说，提交人的案件已由国内法院复审，包括采用监督复审程序，澄清说根据《宪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俄文和白俄罗斯语是官方语言，因此向法院提交的所有其他语言文件均应翻译成这两种语言之一。

2.3 2006 年 12 月 19 日，司法部答复说，Gomel 地区法院关于解散“公民行动”的裁决已经执行。提交人可在实施后三年内就执行裁决寻求监督复审。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把在第三国领土内撰写的文件符合法律规定并翻译为官方语言之一，对所译文件妥为核证。司法部强调，委员会的意见是建议性的，即非强制性的。

2.4 提交人在后来的某日请求最高法院对解散“公民行动”的裁决进行监督复审。2007 年 3 月 13 日，最高法院驳回其申诉，理由是法定的三年期限已过(见上文第 2.3 段)。

2.5 提交人回顾指出，白俄罗斯禁止未经注册登记的协会或被法院解散的协会活动。因此，如果“公民行动”根据委员会的意见恢复活动，他会受到刑事起诉。

## 申诉

3.1 提交人称，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规定，对白俄罗斯生效的每项条约都对其具有约束力，白俄罗斯应本着诚意予以实施。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缔约国不得援引国内法作为不执行一项条约的理由。白俄罗斯最高法院拒绝遵照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证明白俄罗斯不加解释就拒绝尊重提交人根据《公约》规定应享的权利，拒不为其提供补救。提交人认为，这造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二条的后果。

3.2 提交人称，最高法院拒绝考虑委员会的意见，侵犯了他在法庭面前平等的权利，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规定。对委员会的意见不加考虑，不能视为是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的公平审判。提交人还称，白俄罗斯这样的司法机构不是独立和无偏倚的。<sup>2</sup>

<sup>2</sup> 在这方面，提交人援引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2001 年根据第 2000/42 号决议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E/CN.4/2001/65/Add.1, 2001 年 2 月 8 日)。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5 月 2 日，缔约国回顾指出“公民行动”协会 2003 年 6 月 17 日由 Gomel 地区法院裁决予以解散，这项裁决经上诉由最高法院于 2003 年 8 月 14 日确认。2003 年 11 月 21 日，最高法院驳回提交人关于监督复审的申请。在随后“核审”法院裁决是否合法的过程中，副总检察长未发现有任何理由对这些裁决提出质疑。缔约国解释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 439 条的规定，提交人可以再次向检察官办公室申请监督复审，鉴于他没有这样做，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37 条的规定，在上诉后法庭裁决开始生效三年内可提出监督复审的申请，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交意见时，上诉期限已过。

4.2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一再滥用其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来文的权利，包括没有用尽国内法律补救办法。缔约国强调指出，在是否通过可否受理决定的问题上，委员会应严格遵守《任择议定书》的规定。

4.3 缔约国宣布，Gomel 地区法院 2003 年 6 月 17 日的裁决合法，认为本案没有证据显示缔约国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和第十四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

4.4 缔约国解释说，白俄罗斯采用权利分离的原则。根据《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法院。根据法律来确定司法系统的组织结构；法官是独立的，在执法时只遵循法律。《司法组织和法官地位守则》(下称《守则》)进一步加强了司法的独立性。司法权只能由法官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实施。司法系统的统一性主要通过所有法院遵守司法程序的应用规则和以国家预算对法院供资予以确保。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10 年 2 月 2 日指出，缔约国应该按照《公约》第二条的规定向其提供有效补救，落实委员会的意见。<sup>3</sup>他指出，国内立法没有规范执行委员会意见的条款。

5.2 提交人解释说，2009 年 4 月 23 日，他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说委员会的意见是建议性的。

5.3 提交人重申，运作被法院解散的协会在白俄罗斯是犯罪行为。2009 年 12 月 23 日，在答复提交人的合作者之一向 Gomel 地区执行委员会法律部提出重建“公民行动”协会的申诉时，后者发出警告，指出根据《刑法典》，以协会名义开展任何行动均可判处两年以下徒刑。

<sup>3</sup> 提交人指出，迄今为止，白俄罗斯不仅没有执行委员会关于其申诉的意见，而且在委员会判定违反第二十二条款的若干其他案件中也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例如第 1039/2001 号来文，Zvozskov 等诉白俄罗斯，第 1296/2004 号来文，2006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和第 1296/2004 号来文，Belyatsky 等诉白俄罗斯，2007 年 7 月 24 日通过的《意见》。

5.4 提交人还指出，他曾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执行委员会关于第 1274/2004 号来文意见的申诉，检察官办公室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通知他说，他有权利仅只按照国内法提交监督复审的申请。根据《民法典》第 437 条和第 438 条的规定，监督复审的申请须在上诉后法庭裁决生效三年内提出。2007 年 3 月 5 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院长提出监督复审的申请，2007 年 3 月 13 日以同样的理由，即错过截止期予以驳回。国内立法没有规范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法律准则，缔约国机构自主拒绝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证明白俄罗斯拒绝确保公民享有《公约》确认的权利，不为他们提供有效的补救。

5.5 提交人重申，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法院拒绝履行缔约国的国际义务，使其有理由宣称他被置于法院面前受歧视的地位。法院拒绝启动诉讼程序，不复核其申诉的案情，因此不应视为是由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的公平审判。他认为，拒绝给他公平审判的机会是因为国内法院相互依赖和偏袒，上述事实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应该享受的权利。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注意到，本提交人实质上只提交了关于缔约国未能落实委员会关于第 1274/2004 号来文意见的申诉。

6.3 委员会指出，关于缔约国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问题是委员会规定的现行后续程序事项。委员会还指出，尽管提交人现在援引《公约》第二条和第十四条第 1 款，其申诉并未涉及其享有《公约》权利问题的新事态发展，没有超出其未能就违反委员会既定规定获得补救的内容。根据这些情况，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根据《公约》提出另外的申诉，没有涉及委员会业已就提交人先前来文<sup>4</sup>作出决定范围以外的问题。有鉴于此，委员会裁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所审议的来文不可受理。

7.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裁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和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4</sup> 见第 1114/2002 号来文，Kavanagh 诉爱尔兰，2002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关于不予受理的决定。

D. 第 1749/2008 号来文, V. S. 诉白俄罗斯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V. S.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7 年 5 月 18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拒绝一个宗教组织向法院申诉的权利
程序性问题:	缺乏身份(属人理由); 申诉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向法院申诉的权利; 诉讼; 合格、独立和无偏倚的司法当局; 宗教自由权; 在礼拜、仪式和实际生活中表明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 第十八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一条;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为 V.S., 是白俄罗斯国民, 生于 1965 年, 来文提交时住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他声称白俄罗斯侵犯了他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十八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没有律师代理。

###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是白俄罗斯的福音路德教宗教联盟(宗教联盟)宗教法庭的秘记, 该联盟由白俄罗斯部长理事会下属宗教和民族问题委员会于 2001 年 1 月 8 日办理登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查本来文：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拉扎里·布兹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记并于 2004 年 2 月 16 日由同一国家机关予以再次登记。宗教联盟具有全国性地位，覆盖所有属于其组成部分的宗教群体的活动。

2.2 2006 年 11 月 24 日，俄罗斯部长理事会下属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受权人(受权人)向宗教联盟发出关于违反“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书面警告。宗教联盟被要求在两个月之内向登记机关通报为纠正这一违反行为所采取的措施。2006 年 11 月 24 日的书面警告的最后一段指出，可在一个月内向最高法院上诉。

2.3 根据“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第 37 条第 2 节，如果书面警告中所指出的违反情况未在 6 个月之内处置或在一年之内又重犯，登记机关可启动司法程序解散宗教联盟。在法院做出裁决之前登记机关有权中止该组织的活动。

2.4 2006 年 12 月 10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对 2006 年 11 月 24 日的书面警告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2006 年 12 月 22 日，最高法院以下列理由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a)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58 条，认为公共当局的非法行动(或不作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的法人有权根据本条确定的程序和在法律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申诉。但是，“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并没有设想一种对发给宗教组织的书面警告提出上诉的程序；(b)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45 条第 1 款，如果申请人没有向法院提出这样的起诉的权利，法院因无管辖权应拒绝启动诉讼程序。因此，最高法院因无审查申诉人投诉的管辖权而拒绝启动诉讼程序。

2.5 2007 年 1 月 18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对 2006 年 11 月 24 日的书面警告向高级经济法院提出上诉。2007 年 1 月 23 日，高级经济法院因无管辖权拒绝了申诉人的投诉。它进一步指出，作为书面警告依据的“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第 37 条并没有规定宗教组织对这种警告提出上诉的权利。

2.6 2007 年 2 月 15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请求白俄罗斯总统、部长理事会和国民议会(议会)众议院立法、司法和法律问题委员会使用其立法领导权使“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与宪法保持一致，以确保宗教组织的对公共当局给它们发出的书面警告向法院提出上诉的宪法权利。

2.7 2007 年 2 月 15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向宪法法院提出对白俄罗斯宪法第 60 条做出解释的申请，该条规定“每个人都应在法律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得到合格、独立和无偏倚法院对其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2.8 2007 年 2 月 27 日，申诉人被众议院立法、司法和法律问题委员会主席告知该委员会没有立法领导权。

2.9 2007 年 3 月 16 日，申诉人被司法部副部长告知，该部对于法律是否适用某个具体案子无解释权，也无权对公共当局的行动进行评估。他被提醒说“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并没有提供对宗教组织发出的书面警告提出上诉的可能性；对白俄罗斯的法律草案的制定程序做了解释。

2.10 2007 年 3 月 27 日，申诉人被人权、民族关系和大众媒体委员会主席告知，他在 2007 年 2 月 15 日信中提出的问题已同受权人进行了讨论，后者的意见是对“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进行修改在那个时候是不实际的。

2.11 2007 年 4 月 5 日，宪法法院确认白俄罗斯宪法第 60 条保障司法保护的權利，应直接适用——尽管在“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中没有肯定的条款规定可对发给宗教组织的书面警告向法院提出上诉。它还提到刑事诉讼法第 29 条所规定的对侵犯法人权利的公职人员的行动提出上诉的程序。

2.12 2007 年 4 月 20 日，副受权人对申诉人 2007 年 2 月 15 日写给白俄罗斯总统和部长理事会的信做了答复，告知宗教联盟，接续宪法法院 2007 年 4 月 5 日的裁决，“每个人——包括宗教组织——的司法保护权得到直接适用宪法第 60 条的保障。”因此，无需修改“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

2.13 2007 年 10 月 17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根据宪法法院 2007 年 4 月 5 日的裁决再一次对 2006 年 11 月 24 日的书面警告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2007 年 10 月 29 日，最高法院又一次驳回申诉人的上诉，理由如下：(a) 2006 年 12 月 22 日，最高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45 条第 1 款拒绝根据宗教联盟书记提出的申诉启动诉讼程序，这一裁决已经生效；(b) 根据 2001 年 6 月 28 日白俄罗斯最高法院全会第 7 号裁决和民事诉讼法第 247 条第 2 款，如果法院根据同一法律第 245 条第 1 款的拒绝启动诉讼程序已经生效，不得以同样理由向法院重复申诉。

2.14 根据 2006 年 11 月 24 日的书面警告，宗教联盟被要求，除其他外，按照内政部 2000 年 9 月 25 日第 157 号命令把公章和公函信笺带来。就此，申诉人指出，现有的公章是部长理事会下属宗教和民族问题委员会主席于 2002 年 6 月 17 日批准的。2007 年 6 月 28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致函受权人，信中附上了新公章的设计样本并请求批准。“公民请愿”法规定对于公民的书面申请须在一个月之内答复，但与此相反，对于申诉人 2007 年 6 月 28 日的申请没有收到过答复。申诉人提出，一方面，宗教联盟组织被要求按照法律带公章和公函信笺来，而另一方面，就是这同一个受权人却对宗教联盟关于批准新的设计样本的请求不做答复。因此，根据他的说法，2006 年 11 月 24 日书面警告中指出的违反法律的情况无法纠正，宗教联盟可在任何时候如上文第 2.3 段所描述的那样遭遇解散程序和中止活动。

2.15 2007 年 10 月 21 日，申诉人代表宗教联盟又给受权人发了一封信，这次是请求批准向“上帝福音城市布道团”的九名成员于 2007 年 12 月 8 日至 18 日来白俄罗斯参加宗教联盟的活动发出邀请。2007 年 11 月 23 日，申诉人收到副受权人的一封信，通知他只要宗教联盟的公章不符合内政部 2000 年 9 月 25 日第 157 号命令，就不能考虑他的批准邀请的请求。

## 申诉

3.1 申诉人称，缔约国当局违反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在白俄罗斯对信奉路德教的权利加以无理限制。他提出，宗教联盟对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

公共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不构成任何威胁。至少在受权人的 2006 年 11 月 24 日书面警告中没有将上述任何一项归罪于宗教联盟。

3.2 提交人进一步提出，虽然宪法第 60 条保障司法保护权，由于在“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第 37 条中没有规定对发给宗教组织的书面警告可向法院上诉，因此人们就不可能利用这一权利。因此，他声称，由于剥夺了他的向法院上诉的权利，缔约国当局侵犯了他在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下应有的、获得有权力的独立和公正的法庭的公平公开审理的权利。提交人补充说，如果宗教联盟被解散的话，<sup>1</sup> 路德教就会被剥夺其集体和公众礼拜、仪式和实践的权利。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 2008 年 5 月 2 日，缔约国重申了上文第 2.4 段中所概括的事实，并补充说，提交人没有根据监督复查程序对最高法院 2006 年 12 月 22 日的裁决提出上诉。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8 年 6 月 14 日，提交人提交了他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他重申他的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最初申诉并指出，缔约国对他在公约第十八条下的申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5.2 提交人提出，虽然他不同意受权人在 2006 年 11 月 24 日书面警告中提出的一些说法，但由于在“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中没有条款显示法院有权处理向宗教组织发出的书面警告，因此他无法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补充说，尽管他多次请求有立法领导权的公共当局修改“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但“法律冲突”仍未解决，因此，宗教组织不可能利用宪法规定的司法保护权。

5.3 提交人指出，鉴于缔约国的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58 条驳回了他对 2006 年 11 月 24 日书面警告的申诉，他们本来同样应考虑到宪法和白俄罗斯所批准的相关国际条约。

5.4 提交人提出，根据实践判断，白俄罗斯的监督复查程序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因此，他向宪法法院提出对宪法第 60 条做出解释的请求。尽管宪法法院于 2007 年 4 月 5 日证实宪法第 60 条应直接适用，但提交人 2007 年 10 月 17 日的再次申诉被最高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再次驳回。

### 缔约国的进一步意见

6.1 2008 年 7 月 31 日，缔约国重申了上文第 2.4 段中归纳的事实并提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33 条第 4 款，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可向翻案法院上诉。同时，

<sup>1</sup> 自 2011 年 8 月 15 日起，宗教联盟是白俄罗斯具有全国性地位的正式注册登记和运作的宗教组织。

民事诉讼法没有禁止监督复查程序对这种裁决提出上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36 条，唯一不可通过监督复查程序提出上诉的裁决是最高法院院长团的裁决。

6.2 宗教联盟没有利用根据监督复查程序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的权利，因此，提交人的关于白俄罗斯的监督复查程序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说法毫无事实或实践根据。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条(子)款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他是第十四条第 1 款下他的向法院申诉的权利被侵犯的受害人，因为最高法院两次拒绝审议提交人代表宗教联盟对受权人发出的书面警告提出的上诉。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实质上是声称宗教联盟的权利被侵犯。尽管他是宗教联盟的书记，但该宗教组织有自己的法人资格。本案中所提及的所有国内补救措施实际上是以宗教联盟的名义而不是提交人的名义提出的。<sup>2</sup> 鉴于任择议定书规定只有个人才可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因此委员会认为，声称不受公约保护的宗教联盟的权利被侵犯的提交人并没有任择议定书第一条所规定的身份。

7.4 关于提交人称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下他的权利被侵犯，委员会注意到本来文是以提交人本人的名义提交的，而受权人的书面警告是针对宗教联盟的宗教法庭而不是作为路德教个人信徒的提交人的。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副受权人的只要宗教联盟的公章不符合内政部的具体命令就不能考虑他的批准邀请“上帝福音城市布道团”的九名成员的请求是对在白俄罗斯信奉路德教的权利的无理限制。

7.5 在这方面，委员会谨提醒一个人只能在任择议定书第一条的意义上声称是受害者——如果其人确实受到影响的话。<sup>3</sup> 如何具体地采纳这一要求只是个程度问题。诚然，在一些情况下，施加给作为法人的宗教组织的限制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会直接侵犯个人信徒在公约下的权利。然而，在本案中，提交人没有，例如，解释“上帝福音城市布道团”的九名成员无法访问白俄罗斯对于他本人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宗教或信仰所带来的具体后果。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提

<sup>2</sup> 见第 502/1992 号来文，S.M.诉巴巴多斯，1994 年 3 月 31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6.2 和 6.3 段；第 737/1997 号来文，Lamagna 诉澳大利亚，1999 年 4 月 7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6.2 段。

<sup>3</sup> 第 35/1978 号来文，Shirin Aumeeruddy-Cziffra 等诉毛里求斯，1981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



交人没有为可否受理目的提供证据证明他可在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下提出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和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英文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E. 第 1752/2008 号来文, J. S.诉新西兰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J. S. (由律师 Tony Ellis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新西兰

来文日期: 2007 年 10 月 3 日(首次提交)

事由: 迟迟不对精神病院拘留病人进行司法审查

实质性问题: 及时诉诸司法的权利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没有提供有力证据; 公众利益问题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第九条第 4 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五条第 2(b)款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0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 J.S., 新西兰国民, 于 1964 年 11 月 20 日出生。他声称他被违背其意愿地拘留在精神病医院, 由此向缔约国法庭提出的诉讼程序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第九条第 4 款; 和第十四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权利。他由律师 Tony Ellis 先生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被诊断患有双极性/分裂情感障碍, 但这一病患可以通过服用处方药物控制。自 2002 年到其提交来文之前, 他被五次送进医院, 接受强迫治疗令。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沃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其母亲声称，他有爆发性行为，例如从阳台跳下，在公共场所赤身裸体，经常发生幻觉，在高速公路上抛弃其车辆等。特别是他情绪高涨时过度地花费钱财，包括在几乎没有存款的情况下购买两处公寓，出于对他行为的担忧，其母亲于2006年10月27日与北岸的两个社区的医疗队进行了联系。

2.2 2006年10月28日，提交人被送到了医院的急救室。在他到达医院时，一名护士叫提交人的母亲向她通报情况，并询问她或其他亲戚再对J.S.进行检查时是否能够到医院来和他一起住在医院，因为这是1992年《精神保健强制性评估和治疗法》(《评治法》)第9(2)(d)所要求的。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件事，向提交人通报了这一情况。然后，人们通知他，他可以指定其他人。他没有提供任何姓名，但确认他愿意进行评估进程。精神评估的结论是J.S.的精神混乱，需根据《精神保健强制性评估和治疗法》进一步评估与治疗。诊所的报告强调他可能致他人于危险，他判断力极差，他的自立能力很差。提交人拒绝接受有关文件的副本，并变得非常暴躁，企图离开医院。

2.3 2006年10月29日，值班的精神科住院医生发表了一份初步评估证书，提交人被收入Tahuratu精神保健室。提交人在医院里一直住到2007年1月10日。

2.4 2006年11月1日，提交人根据《评治法》第16节提出要求进行司法审查，对医疗报告提出争议，他争辩说他的精神并没有不健全，他的病例不属于紧急状况。因此，他被武断地拘留在医院里。<sup>1</sup>他还认为，他要求一名律师给予帮助的请求遭到拒绝，在对他进行检查时，没有家庭成员在场，侵犯了《评治法》。2006年11月1日，他要求释放的请求被拒绝，同时发表了一份医疗证书，表明提交人还需要14天的评估与治疗。2006年11月8日，区法庭也拒绝了要求审查的第二次申诉。

2.5 同时，2006年11月8日，提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了针对区精神保健服务Waitemata区保健局局长(区保健局)要求获得释放的人身保护令状。他声称，没有遵守《评治法》规定的法定拘留要求，特别是他有权利了解法律要求，如评估检查应在其家庭成员、照料者，或关注其福利状况的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第二，他被非法地拘留，因为他并不患有《评治法》所界定的精神混乱。第三，用来证实其拘留是合法的证据是毫不相干的。2006年11月16日，最高法院声明，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评估的决定有悖于《评治法》，但该决定本身并不意味拘留无效。关于提交人的精神状况以及其拘留的合法性，法庭指出，人身保护最适宜的诉讼，例如涉及拘留实际行为的合法性。提交人申诉中所提出的问题并非是人身保护申诉中适宜提出的问题，而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的问题。因此，提交人的申诉被拒绝。2006年11月21日，提交人就此裁决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指控高等法院并没有评估他是否是被武断拘留的，其释

<sup>1</sup> 来文提交人提到了Winterwerp诉荷兰(1979年)2 EHRR 387, 第402页, 第39段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判例法。

放是否被无理拒绝了，侵犯了《评治法》，以及 1990 年《新西兰权利法法案》(《新西兰权利法》)。这一上诉于 2006 年 12 月 12 日被驳回。同一天，在提交人得知被驳回之前，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越级上诉，要求不置理在当时尚未发布的上诉法院的延误裁决，在最高法庭假期休庭之前审讯该案件。

2.6 2006 年 12 月 13 日撤回越级上诉，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许可。提交人根据《人身保护法》第 17 节要求获得紧急与优先审讯。<sup>2</sup> 2006 年 12 月 14 日，最高法院宣布于 2007 年 2 月 13 日进行记录审讯。最高法院指出，要求律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来文是不现实的。此外，最高法院无法凑满五个法官的法定人数，因为其中一名法官其女儿是区卫生局(被告人)的一名成员，鉴于这一事实，他必须回避，在那段时间无法得到代理法官。2006 年 12 月 15 日，提交人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在 2006 年 12 月 20 日和 2007 年 2 月 12 日之间因最高法院的圣诞假期和夏日假期没有安排任何紧急审讯，由最高法院所造成的延误导致了实际上无法诉诸司法。缔约国一而再三地未能提供在假期阶段运作的有意义的司法制度，因而无法及时地审查其拘留的合法性，提交人要求最高法院下令司法部赔偿法律损失，即赔偿其因人身保护程序所支付的费用。此外，提交人提出，上诉法院进一步地造成了全面拖延，没有作为优先和紧急事项处理他的上诉，侵犯了缔约国的国际义务，侵犯了《人身保护法》第 17 节。

2.7 2007 年 2 月 14 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许可，因为提交人已从医院释放，从住院病人变为门诊病人，因此不可能审议人身保护。该项裁决没有论及提交人有关法律损失的申诉。

2.8 2007 年 3 月 1 日，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赔偿法律损失。他提请法院注意，他在提出上诉许可申诉时提出了这一申诉。他认为，由于该国政府一而再三的不能保障假期阶段司法系统的运作，因而他无法质疑其拘留的合法性。由此，可以认为，最高法院没有与该案的被告区卫生局联系，而为赔偿最高法院诉讼的法律损失与司法部联系。此外，提交人接受了高等法院的法律援助，但在上诉法院中没有提出法律援助的要求，因为他的律师给予他错误的咨询。尽管他要求人身保护的申诉在这些审议中被驳回，他告诉最高法院，由于诉讼程序时间的极其冗长，他将提出一项要求赔偿法律损失的申诉。2007 年 3 月 7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其要求法律损失的申诉。法院认为，要求赔偿损失的申诉是针对司法部的，而司法部并非本案的当事方，而且延误的主要原因是提交人的律师要求在审讯之前有一定的准备时间。

2.9 提交人进一步争辩，由于他被认为患有精神病，他遭受到精神病治疗服务部门和司法部的非法歧视，他打算就此进一步地提出国内诉讼。

2.10 提交人认为，2007 年 2 月 14 日最高法院驳回其要求上诉许可的申诉，因而用尽了国内所有补救。

<sup>2</sup> 来文提交人的律师通报最高法院他估计当事双方可在 4 天内出庭。

## 申诉

3.1 提交人指出，他被武断地拘留在精神病医院，无法迅速地获得司法补救，因而缔约国侵犯了《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第九条第 4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

3.2 就《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甲)和(乙)项，提交人声称《新西兰人权法》并没有完全实施《公约》，不具备“最高法”的地位，并且可以由任何其他《议会法》取代。他进一步认为，《公约》并没有直接用于缔约国的法律系统，司法并没有有效地确保权利的享有。《新西兰权利法》第 6 节声明在解释一项司法时，解释最好与《新西兰权利法》所规定的权利与自由相符。然而，根据《新西兰权利法》第 4 节，并不允许法院删除不符合《新西兰权利法》或者《公约》主要立法<sup>3</sup>。提交人指控，缔约国没有遵守《公约》第二条第 2 款的要求。他指出，和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6 条和 27 条并读的委员会有关《公约》<sup>4</sup> 缔约国所承担的一般法律义务性质的第 31 条一般性评论意见(2004)，缔约国不能以其国内立法或者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考虑，为其不遵守公约辩解。因此，缔约国没有这样做侵犯了《公约》第二条 2 和第 3 款内所载的义务。

3.3 提交人提到第九条第 1 款，指出区法院两次没有充分地评估他被拘留在精神病医院的武断行为，特别是他的拘留缺乏依据，没有遵循法律所规定的要求(评估与疗法)。

3.4 提交人提出，缔约国没有向司法制度提供足够的资源，没有为保障最高法院的正常运作对假期阶段作出充分的安排，侵犯了他在第九条第 4 款之下的权利，因为他要求法院在无理延误情况下对他的拘留的合法性和他诉诸独立司法机构的权利作出裁决。<sup>5</sup> 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司法机构在没有任何延误下行事，而且不能以只有四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作为理由。人身保护程序的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太过分了，侵犯了其《公约》第九条第 4 款所规定的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

3.5 就《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而言，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不受理其要求赔偿法律损失的申诉可视为部分地侵犯了其诉诸司法的权利。他还争辩，司法制度缺乏财政和行政独立性。独立性意味着法院必须被认为是独立的。然而，最高法院完全无视提交人有关审讯日期和有关司法独立性的备忘录，没有采取步骤要求更多的法官，而将延误的责任怪罪于提交人。因此，提交人认为，最高法院不能被视作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不能表明其是独立的。此外，最高法院没有足够的法官不仅仅影响了诉诸司法的权利，而且还违背了法制本身。

<sup>3</sup> 来文提交人提出委员会关于新西兰第三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A/39/40, 第 185 段)，在该段内委员会建议缔约国“法院应该有权力删除《权利法案》确认的不符合《公约》的立法。还建议所有人凡其公约所规定的权利遭到侵犯应予以补救。”

<sup>4</sup> 《第五十九届大会正式记录，第 40 号增补》，第一卷(A/59/40(Vol.1))，附件三。

<sup>5</sup> 整个人身保护程序需三个月零六天。在提出上诉和上诉法庭作出裁决之间的时间为 21 天，在提出上诉许可申诉和最高法庭作出裁决之间的时间为两个月零一天。

3.6 提交人声称，在 12 月或者 1 月提出上诉所得到的待遇不如一年中其他时间提出的上诉，并在这方面提到了《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歧视。他指出，最高法院没有努力委任可以审查其上诉许可申诉的第五名法官，并且在他提出申诉的同一天，最高法院决定没有代理法官能凑足法定人数，这表明法庭并没有努力寻找一名替代法官，其行政安排未能够掌控这样的局势。

3.7 提交人请委员会考虑国内申诉费用<sup>6</sup>以及委员会的申诉程序费用，作为委员会可要求的一部分补救。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7 月，缔约国提交了其有关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缔约国指出，2006 年 10 月 28 日，在提交人的母亲和地方保健当局，Waitemata 区保健局(保健局)的精神病保健工作人员的联系下，由一名心理医生对他进行了评估。除了根据《人身保护法》进行的程序外，根据《评治法》规定，提交人作为强制性的病人应受到检查。提交人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和 11 月 8 日向区法庭两次提出要求司法审查的申诉。2006 年 11 月 15 日，卫生局向区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其根据《评治法》下达允许提交人继续接受强制性照料的命令。2006 年 11 月 22 日，区法院在提交人的请求下，下令拟定第二份意见。法院还下令提交人应该暂时留在医院内。2006 年 12 月 6 日，区法院在上诉法院的人身保护诉讼程序的结果出来之前维持其裁决，再一次延长其暂时留在医院的时间。2006 年 12 月 18 日，区法院下达了准予强制性治疗的裁决。从 2006 年 12 月 22 日至 2007 年 1 月 10 日，由于进一步医疗评估的结果，他的状况有了积极的改观，允许他回家，每次时间约为 5 天。

4.2 缔约国认为鉴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而且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及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 96(b)、(c)和(f)，来文因属人管辖不予以受理。

4.3 就关于侵犯《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甲)与(乙)的申诉，缔约国的法院没有直接履行国际义务，因为缔约国具有双重法律制度。而且，《公约》第二条并没有要求直接应用《公约》。第二，在提交人的来文中并没有提出因侵犯《公约》的实质性权利因而侵犯第二条的指控。因而，作为一项大众诉讼，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这些申诉为属人管辖不予以受理。

4.4 关于侵犯《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的申诉，<sup>7</sup> 这些申诉被宣布为不可受理，因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提交人向委员会提出了指控，这些指控既没有在国内程序审理，缔约国的法院也没有确定其为事实问题，没有向缔约国法庭提出任何有关武断程序和不公正的申

<sup>6</sup> 来文提交人声称他在上诉法庭花费了 23,196.77 新西兰元，在最高法院花费了 14,303.00 新西兰元。

<sup>7</sup> 请见上述说明。

诉。而且，这些申诉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据《评治法》提交人作为强制性病人被拘留是因为诊所评估确认他的精神健康状况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构成严重的威胁。所采取的措施是根据诊所和司法的观察做出的。对提交人进行治疗完全有合法的理由，并不构成歧视。

4.5 关于侵犯第九条第 4 款的申诉，这些申诉应被宣布为不可受理，因为缺乏事实佐证，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并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与《公约》的条款不符。提交人的指控并没有揭示任何不合理的延误的例子。第九条第 4 款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对拘留进行及时和不断的司法监督，这条早已履行。在提交人强制性照料的 10 个星期内，其持续的拘留受到法庭的独立监察，法庭在七次对此进行审议，维持了这一措施。对提交人提出的要求审查的申诉进行了审讯，并在提出申诉的当天作出了裁决。他一审中提出人身保护令的申诉在 6 天内就进行了审讯，并在两天之后作出了裁决，尽管案件复杂，并在每次审讯都要纳入补充依据，但他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以及之后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诉都分别在三星期内和两个月内进行审讯并作出裁决。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提交人拘留的心理照料目的，人身保护诉讼程序的时间长度是合理的，并且在委员会或欧洲人权法庭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4.6 此外，提交人还可以采取其他的司法手段。提交人原本可以根据《人身保护法》第 11 节争取暂时释放，或者根据《评治法》第十六条要求进行司法审查，或者对不属于人身保护程序裁决的非法行为的其它指控均可采取其他的民事诉讼程序。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原本能紧急处理一项要求暂时释放的申诉。提交人也原本可对其作为强制性病人拘留提出质疑，例如在他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所改进时提出这样的质疑，向区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诉。事实上区法院也根据《评治法》紧急审查了两起要求审查的申诉。因此，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最后，缔约国认为，最高法院评估了提交人要求许可的申诉，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干预的情况，认为所提议的上诉需要相当多的准备时间。就国内法院的调查结果，特别是新西兰最后上诉法院的调查结果，由于有关武断或不正义的申诉不可置信，委员会没有理由考虑这一意见。

4.7 至于未赔偿法律损失，侵犯了第十四条第 1 款的申诉，缔约国认为来文不符合《公约》的条款和/或无确凿证据，未用尽国内补救，和属人管辖等理由，应被宣布为不可受理。首先，《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缔约国的立法都未要求在诉讼程序失败后赔偿损失，在本案内，法院拒绝受理提交人的上诉和要求上诉许可的申诉。第二，在提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人身保护申诉时向其提供了公共法律援助。然而，他在其律师的咨询之下没有在以后的审讯中要求这一援助。第三，提交人并没有对法院拒绝赔偿损失的申诉的裁决提出上诉。缔约国进一步争辩，这一申诉是建立在无理延误的申诉之上的，这一申诉没有得到证实。

4.8 就高等法院没有作出公共声明要求补充法官，以及高等法院缺乏行政独立性的问题提出的侵犯第十四条第 1 款的申诉，因为提交人要求国家法院审查调查结果，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因而该申诉不符合《公约》的条款和/或没有足够的

证据，被宣布为不予以受理。首先，提交人申诉依据的前提是法院需要补充法官，这造成了不合理的延误。然而，并不存在此类延误。第二，提交人声称，缔约国的法院将提交人的案件作次要性的，没有考虑其紧急性，缔约国提到，委员会不审查国家法院的事实评估，除非其肯定法庭公然侵犯其公正的义务，行事武断或者其调查结果相当于否认正义。第三，提交人原本可在审讯其许可申诉之前要求暂时释放，但他决定不这样做。

4.9 关于提交人请求委员会考虑将在委员会进行诉讼程序的法律损失作为所建议的一部分补救，缔约国认为，这一请求不予以受理，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缔约国进一步指称，即使来文的某些部分成立，鉴于来文中纳入众多毫无价值和/或完全无关的材料也应禁止给予此类不恰当的补救。<sup>8</sup>

###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与案情的意见的评论

5.1 就缔约国关于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甲)和(乙)项的意见，对这些条款的侵犯应该与提交人所遭受的侵犯《公约》第九条第 4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行为一起阅读。因此，这些诉讼不应该视为大众行为。提交人认为，《新西兰权利法案》阻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直接应用《公约》第九条第 4 款和第十四条第 1 款，请求委员会裁定缔约国并没有为个人提供有效的法律补救充分实施《公约》。

5.2 至于缔约国关于第九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的意见，提交人澄清说，他仅作为背景资料提到了这些条款，并没有宣称侵犯了这些条款。

5.3 就缔约国第九条第 4 款的意见，和申请临时释放的可能性，有争议的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有司法管辖权颁发暂时释放法令。根据《人身保护法》第十一节，仅高等法院有司法权颁发此令。因为在审讯涉及优先和紧急事项的最后申诉之前，暂时释放申诉不审查实质性权利，因而提出暂时释放申诉毫无意义。关于人身保护令诉讼程序的时间框架，提交人认为，为了避免不合理的延误，最高法院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干预之下，原告和被告的律师除外，进行审讯，处理优先和紧急最后诉讼。

5.4 至于缔约国关于第十四条第 1 款的意见，以及拒绝支付法律费用的问题，提交人声称，由于最高法院，在一定的程度上由于上诉法院，造成的不必要延误的直接结果使得诉讼程序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应该由缔约国支付法律损失。提交人提出，他并没有请求最高法院推迟审讯，仅告诉最高法院需要二至四天的准备时间。他进一步澄清说，他要求对不合理延误负有责任的一方赔偿损失，即司法部而不是被告——卫生局，因为卫生局在这方面并没有错。

5.5 至于缔约国关于第十四条第 1 款的意见，以及最高法院未能够公开委任新法官，提交人重申，延误的主要理由是无法向最高法院的法庭委任足够的法官。

<sup>8</sup> 根据缔约国，欧洲人权法院在同样的情况下采取的方法。



法院本身在其关于提交人法律损失诉讼的判决中承认“《2003 年最高法院法》允许有限的人员在那段时间可以行使该职责”。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需根据其议事规则第九十三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件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提交人认为，在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进行的人身保护诉讼程序分别为 21 天和两个月零一天，过度冗长，侵犯了第九条第 4 款所规定的他享有无延误地对其拘留合法性做出裁决的权利。他争辩，最高法院没有特别重视此类紧急诉讼程序，并且在休假期间没有尽责地保障最高法院的运作。缔约国指称，在这十个星期内，提交人处于强迫照料之下，其连续的拘留受到法院的独立监察，法院在七种情况下审议了这一措施。提交人要求审查的申诉得到了审讯，并在提出申诉的同一天作出了裁决。提交人首次要求人身保护令的申诉在六天内得到审讯并在两天之后作出裁决，而上诉是在三星期内作出裁决的。

6.4 根据案件的情况，并有鉴于区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处理了提交人对其拘留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诉的长度，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为受理之目的证实其针对《公约》第九条第 4 款提出的申诉，因此，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该申诉不予以受理。

6.5 至于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拒绝赔偿其法律费用侵犯了第十四条第 1 款规定的权利，委员会指出，提交人能够从区法院至最高法院追诉其补救，并在一审中得到法律援助，提交人在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并没有要求得到法律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并没有证实最高法院拒绝“法律费用”如何构成阻碍其诉诸司法，侵犯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行为。

6.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无视其要求在 2006 年 12 月确定一个审讯日期的备忘录，没有采取步骤召集更多的法官，缺乏行政和财政独立性，因而最高法院不是独立的机构。它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缔约国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没有准予提交人的请求的主要理由是上诉的复杂性以及法院评估要求律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来文是不现实的。根据缔约国的意见，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充分证实按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的有关缔约国法院缺乏独立性的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该申诉不予以受理。

6.7 关于提交人按照《公约》第二条第 2 款和第三条(甲)和(乙)提出缔约国没有充分履行《公约》以及《公约》并没有在缔约国的法律系统中直接应用的事实的申诉，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属于非常一般的性质，与确定本案件事实是否侵犯

《公约》的行为毫无关系。因此，鉴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该申诉被宣布为不予受理。

7. 因而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及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F. 第 1789/2008 号来文，G.E.诉德国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G.E.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德国  
 来文日期： 2008 年 3 月 17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基于年龄的歧视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提出的保留  
 实质性问题： 《公约》第二十六条所述歧视行为  
 《公约》条款： 第二十六条；第十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2008 年 3 月 17 日的提交人 G.E.先生是德国国民，1935 年出生。他称德国违反了《公约》第一、第二、第二十六和第十七条。《公约》及《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76 年 3 月 23 日和 1993 年 11 月 25 日对德国生效。<sup>1</sup> 提交人无律师代理。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莱兹赫里·布齐格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委员会委员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和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提出的两项个人意见附于本决定之后。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1 条，委员会委员 Walter Kaelin 先生未参与通过本决定。

<sup>1</sup> 缔约国在批准《任择议定书》时作出如下保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第五条第 2 款(子)项作出保留，即委员会的职权不适用于以下来文：(a) 已被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b) 所申诉的侵权行为是《任择议定书》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效以前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c) 所申诉的违反[上述《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涉及上述《公约》所保障范围之外的权利。”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医生，持内科专科医生执照，并作为“指定医师”提供医疗服务。<sup>2</sup> 他于 1973 年由巴登执照委员会选为指定医师，执照有效期不限。

2.2 2003 年 3 月 31 日，提交人的执照根据《社会法》(*Sozialgesetzbuch*)第五卷第 95(7)节被收回，该章节相关部分称：

“指定医师的执照在以下情况下到期：执照人死亡、退休或搬离为其颁发执照的地区。此外，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指定医师年满 68 岁的日历季度末，其执照即到期。”

2.3 提交人称，根据该法，医师实际上一旦满 68 岁就不得从业且被剥夺了收入。对于相关人员遭受的损失，法律中的这些规定未提供任何赔偿。

2.4 购买私人保险的病人仍可接受 68 岁以上医生的治疗。另外，1999 年 5 月 1 日前获得执照的医生有权作为指定医生工作至少 20 年，这样算来，一名 1992 年获得执照的 54 岁的医生可以工作到 2012 年，即直到 74 岁。

2.5 2002 年 2 月 11 日，提交人向 Karlsruhe 社会法院(*Karlsruhe Sozialgericht*)申请临时赔偿，法院于 2002 年 4 月 3 日驳回了申请，称其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尚未受到他质疑的该项法律规定的影响。提交人未就该决定上诉联邦社会法院。提交人称，该法院曾驳回类似的案件，且法院在他的执照被收回之前修订该项规定的可能性不大。

2.6 他于 2002 年 7 月 12 日就第 95(7)节法规的合法性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质疑。提交人称这是“可允许的”备选法律手段。2002 年 8 月，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宪法申诉，认为其不可受理。对联邦宪法法院的决定不可上诉。

### 申诉

3. 提交人称，《社会法》第 95(7)节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因为它基于年龄进行歧视。他还称，他根据《公约》第十七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该法构成了任意或非法干涉其隐私。<sup>3</sup> 他称，从公共福利的角度，该法既不合理也不必要。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8 年 9 月 23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申诉可否受理的意见。缔约国质疑来文的可受理性有两个原因：缔约国对《任择议定书》提出的保留以及未用尽国内补救。

<sup>2</sup> 在德国，指定医师与公共医疗保险公司签约，为医疗保险由政府支付的病人提供服务。这种制度下，所谓的“指定医师”为享受公共医疗保险的客户进行治疗，提供服务并获取报酬。

<sup>3</sup> 提交人还指控了违反《公约》第一和第二条的行为，但未提出论据支持其申诉。

4.2 缔约国认为对《任择议定书》的保留之(c)款适用于本来文。缔约国在保留中称，对于“所申诉的违反[上述《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涉及上述《公约》所保障范围之外的权利”的来文，委员会无权处理。本来文主要申诉的是提交人自由从业或选择职业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缔约国称，这些权利不受《公约》保护。因此，由于德国的保留，指控缔约国因侵犯这些权利而违反了第二十六条并基于此提出的申诉不可受理。

4.3 关于根据第十七条(不在保留范围之内)提出的申诉，缔约国称，《公约》第十七条第1和第2款保护隐私和家庭权。缔约国称，本案中这些权利未受影响，提交人真正想要保护的是其自由择业权。这些权利不受《公约》保护，因此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来文不可受理。

4.4 缔约国质疑来文可受理性的另一原因是未用尽国内补救。缔约国称，提交人向 Karlsruhe 社会法院提交的临时赔偿申请被认为不可受理而驳回。法院认为，申请备案之时，赔偿没有必要。缔约国称，提交人未能就该决定提出可受理的申诉或就案情启动法律程序，故其申诉中的案情从未经过审查。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用尽《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中规定的国内补救。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在 2008 年 10 月 25 日的评论中称，缔约国称对《公约》第二十六条提出了保留，这点不能作为论据，因为德国于 1973 年批准了《公约》，因此缔约国有义务适用《公约》的规定。提交人称，缔约国通过一项法律时必须确保该法不带有歧视。

5.2 至于缔约国称提交人未用尽一切国内补救，提交人称，已用尽所有“现实的”国内补救。提交人称，他于 2002 年 2 月 11 日向 Karlsruhe 社会法院提出的申诉于 2002 年 4 月 3 日被驳回。提交人称，其执照定于 2003 年 3 月 31 日收回，因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向社会法院提出任何其他申诉。提交人还称，各社会法院一再发布决定，驳回与其提交的申诉类似的申诉。因此他使用了“可允许的”备选法律手段，于 2002 年 7 月 12 日直接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诉。

5.3 提交人称，进一步利用社会法院已没有意义，因为德国所有的国家法院都已得出结论称第 95(7)节的规定合法并符合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法律。提交人还称第 95(7)节的规定违反了欧洲法律，但称个人不得向欧洲法院提出申诉。

5.4 提交人称，2008 年 10 月 12 日，德国议会取消了第 95(7)节规定的指定医师法定年龄限制。提交人认为该规定已废除，因为它不能服务于公共福利，也不能服务于社区利益。

####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6. 提交人在 2010 年 2 月 4 日的信函中还称，欧洲法院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第 95(7)节规定的法定年龄限制的判决。该判决中，欧洲法院决定，有关规定不符合欧洲共同体的法律。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按照人权事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3 条，委员会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必须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决定来文是否可以受理。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在论据中出于其对《任择议定书》的保留之(c)款质疑委员会是否有权处理本案，该项称，委员会的职权“对所申诉的违反[上述《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涉及上述《公约》所保障范围之外的权利的来文不适用”。按照缔约国在提交的材料中对提交人的申诉的解读，申诉的主要内容是指控其择业和从业权受到侵犯，这些权利不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范围内。但委员会认为，本来文涉及关于《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平等和不歧视的自主权利受到侵犯的指控。因此委员会有权继续审议来文是否达到受理标准。

7.4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规定的要求，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提交人未用尽国内补救。提交人称他因时间不够无法在执照被收回前就 Karlsruhe 社会法院的初步决定提出上诉。提交人还称，鉴于之前已有几项驳回上诉的决定，在该法第 95(7)节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判上诉成功。提交人还称，他于 2002 年 7 月 12 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质疑第 95(7)节规定的合法性，法院于 2002 年 8 月驳回申诉，称其不可受理，原因是相关法律对提交人尚不适用。委员会在所获资料中注意到，Karlsruhe 社会法院宣布提交人的临时赔偿申请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在提交申请时尚未受到有关法律的影响，且在联邦宪法法院作出上述决定后未向法院提交可受理的临时赔偿申请，也未就案情启动法律程序。委员会忆及，为利用国内补救，提交人必须表现出尽职并达到该程序的要求。<sup>4</sup> 委员会还忆及其判例，称仅怀疑可用补救的有效性不能作为提交人不使用这些补救的理由。<sup>5</sup> 因此，来文在这方面未达到《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

<sup>4</sup> 见第 No.433/1990 号来文，A.P.A. 诉西班牙，1994 年 3 月 25 日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6.3 段；第 982/2001 号来文，Bhullar 诉加拿大，2006 年 10 月 31 日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7.3 段。

<sup>5</sup> 见，除其他外，第 550/1993 号来文，Robert Faurisson 诉法国，1996 年 11 月 8 日通过的《意见》，第 4.3 段；第 727/1996 号来文，Paraga 诉克罗地亚，2001 年 4 月 4 日通过的《意见》，第 5.5 段。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2款(丑)项，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 附录

## 委员会委员杰拉尔德·L.纽曼先生提出、委员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和岩泽雄司先生联合签名的个人意见(同意)

我同意委员会的意见，认为提交人的来文因未用尽国内补救而不可受理。这一结论是结案的充分基础。然而多数委员借此机会在《决定》第 7.3 段中讨论了缔约国对《任择议定书》的一项保留并对该保留作了站不住脚的解读，我无法同意决定中的该部分内容。

德国对《任择议定书》的保留之(c)款认为，委员会的职权不适用于“所申诉的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涉及上述《公约》所保障范围之外的权利”的来文。从表述和上下文来看，该项保留的意图显然是在提交人所指控的歧视涉及《公约》第二十六条之外其他条款中的其他权利时限制委员会处理与第二十六条有关的申诉的职权。因此，在第二十六条起“从属”作用<sup>a</sup>，即类似《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十四条中的非歧视规则的作用的案件中，该保留将削弱委员会的职权。

我完全同意多数委员的立场，认为《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平等和不歧视的权利是自主权利而不仅是从属权利。在早前著名的 *Broeks* 和 *Zwaan-de Vries* 一案中，<sup>b</sup> 委员会认为退休金权方面基于性别的歧视涉及《公约》第二十六条，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未保障任何单独的退休金权，这是正确的决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批准《公约》时未对第二十六条提出保留，因此实质上受第二十六条完整含义的约束。但 1993 年德国批准《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时提出了上述保留，意图防止基于第二十六条这种自主性的来文提交委员会。

委员会在《决定》第 7.3 段中认为，该保留不适用于提交人关于年龄歧视的申诉，因为提交人在申诉中确称第二十六条中的平等和不歧视的自主权利受到了侵犯。这种解读不仅不符合保留的明确含义，还似乎剥夺了保留的含义。所有关于歧视的申诉，包括 *Broeks* 和 *Zwaan-de Vries* 一案中的申诉，都可称为与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自主权利有关。

<sup>a</sup> 参见缔约国在第 1115/2002 号来文中的论述，*Petersen* 诉德国，2004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4.2 段。

<sup>b</sup> 第 172/1984 号来文，*Broek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82/1984 号来文，*Zwaan-de Vrie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



我认为这种无效的解读毫无道理。正相反，如果该保留(如具有允许性)意味着关于年龄歧视的申诉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那正是因为该申诉是自主而非从属性——这是该保留的含义。德国的保留可能不具允许性，但多数委员未提及这一问题，而是称该保留不适用于提交人的申诉，原因是否则它将对所有申诉都不适用。

我在此不探讨保留是否具有允许性，因为我认为既然委员会已决定来文因未用尽国内补救而不可受理，就没什么必要触及该问题。委员会在以往的几项决定中一直拒绝讨论该保留，称提交人的申诉不可受理的原因是未用尽补救，<sup>c</sup> 或甚至称申诉缺乏证据。<sup>d</sup> 本案在解读和允许性方面本可照此办理。但多数委员讨论的是解读问题，且给出的答案并不令人信服。我已讨论过多数委员的解读，允许性这一更为困难的问题留待有朝一日收到真正有需要的来文时再作分析。

[有英文本(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c</sup> 第 1188/2003 号来文，Riedl-Riedenstein 诉德国，2004 年 11 月 2 日通过的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7.2 段。

<sup>d</sup> 同上，第 7.3 段；第 1516/2006 号来文，Schmidl 诉德国，2007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6.2 段；第 1292/2004 号来文，Radosevic 诉德国，2005 年 7 月 22 日通过的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7.2 段；第 1115/2002 号来文，Petersen 诉德国，2004 年 4 月 1 日通过的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 6.8 至 6.9 段。

## 委员会委员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提出的个人意见

1. 我不满意委员会处理 E.诉德国一案的方式(第 1789/2008 号来文)。缔约国以本国对《任择议定书》的保留为依据质疑委员会的职权,而委员会未解决该问题即决定申诉因未用尽国内补救而不可受理。
2. 处理来文时合理且有序的方法是,有职权问题,如本案,应先解决职权问题。只有当委员会宣称具有相关职权时才能开始审议有关可受理性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初步反对意见的内容(例如重复、未用尽国内补救、误用提交来文的权利等)。委员会决定案件可受理后可进而审查案情。特殊情况下,视案件性质,委员会可能需同时审查可受理性和案情的某些方面(例如缔约国称未用尽国内补救、申诉是出于司法不公),但无论如何必须先解决职权问题。
3.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E.诉德国一案的决定中得出结论称(我同意这一结论)未用尽国内补救,并指出《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单独的平等和不歧视的权利,这符合其令人称赞的一贯立场,即第二十六条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公约》涵盖的权利。
4. 但我无法同意《决定》第 7.3 段末的论述,委员会在该处作出结论称,德国的保留之(c)款——该表述是德国在批准《任择议定书》时提出的——与提交人的申诉无关,因为来文只提到其平等和不歧视的自主权利可能受到了侵犯。
5. 保留中的该段表述称,如果来文申诉的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涉及上述《公约》所保障范围之外的权利,则委员会的职权不适用。不可否认的是,提交人 G.E.先生在申诉中提及了因适用《社会法》第 95(7)节而产生的基于年龄的歧视,称该行为可能侵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认为这些行为令其难以或无法从事医生的工作。
6. 工作权和其他工作场所权利不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范围之内(人人有权享受的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除外<sup>a</sup>);因此,G.E.先生在受审议的来文中提出的论据与缔约国批准《任择议定书》时提出的保留直接相关。委员会以不具说服力的论述解决其职权问题,并且回避从德国的保留是否有效这一角度审议本案,而这才是委员会应采取的做法。
7. 委员会在处理来文方面的第一项职权是“关于其职权的职权”,此处一般认为某一国际机构有权决定委员会是否具有相关职权。因此我认为,认为德国的保留之(c)款适用于 G.E.先生的案件(这倒是的,但不是由于委员会在其《决定》第 7.3 段中提出的原因),或只因未用尽国内补救就决定不审查保留是否有效,两种做法都不对。关于可受理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委员会的职权,缔约国质疑委员会的职权是更应如此。

<sup>a</sup>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

8. 从德国对 G.E.一案的评论来看, 该国显然质疑委员会的职权, 并为此明确引用了本国的保留, 对此《决定》第 4.2 段也有所承认。未解决职权问题而先处理关于可受理性的其他问题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做法, 但这违背了人权委员会这类国际保护机构应遵循的法律上的逻辑。

9. 德国在保留的第三段中明确表示委员会的职权不应适用于“所申诉的违反[……]第二十六条的行为, 涉及上述《公约》所保障范围之外的权利”的来文。

10. 有关段落构成了直接影响《公约》中某项规定——即第二十六条——的保留。但 1973 年缔约国批准《公约》时并未就上述条款提出保留。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九条(1969 年), 一国可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一项条约时提出保留。

11. 德国在 1993 年批准《任择议定书》时才提出该保留, 其中第三段提及《公约》第二十六条。委员会审议了德国的第五次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称, “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 德国维持保留意见, 特别是对《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款不可减损的权利的保留意见, 以及缔约国在批准《任择议定书》时所持保留意见, 这部分地限制了委员会在《公约》第二十六条方面的权限。”<sup>b</sup>

12. 本案中, 委员会应宣布自身有权解决有关事项, 但不是由于《决定》第 7.3 段末提出的原因。本案中委员会的职权有两个依据。首先, 德国的保留之(c)款无效, 因为它属于未适时, 即未在批准《公约》时, 而是在 20 年之后提出的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的保留。仔细研究该保留则可得出结论认为, 它其实不仅指委员会的职权, 也指第二十六条的实际内容, 意在限制该条款。

13. 其次, 委员会处理本案的职权还有一个补充依据, 即有关保留也不符合《任择议定书》的实质内容, 因此同样无效, 因为该保留试图让委员会不得以限制性且不符合委员会的理解的方式解读涉及国际人权法律基本原则的条款(正是平等保护及无所歧视的原则)。

14. 只有从德国的保留之(c)款无效这一角度解决了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后, 委员会才应进而作出结论称 G.E.先生的申诉因未用尽国内补救而不可受理。

[有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本, 西班牙文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 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b</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 对德国第五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04 年 3 月 30 日通过(CCPR/CO/80/DEU, 第 10 段)。其中请缔约国考虑撤销其保留。

G. 第 1800/2008 号来文, R.A.D.B.诉哥伦比亚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R.A.D.B.(由律师 Alberto León Gómez Zuluaga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哥伦比亚

来文日期: 2006 年 6 月 19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工会特权; 任意驳回投诉; 对可执行判决的上诉

程序性问题: 对申诉的证实; 滥用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由合格、独立和不偏不倚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理; 组建和加入工会以维护其利益的权利; 享有不受歧视的平等法律保护

《公约》条款: 第二条; 第十四条第 1、2 和 5 款;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六條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第三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 R.A.D.B.是哥伦比亚公民。他称他是哥伦比亚违反《公约》第十四条和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 2 款和第 3 款, 以及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六條行为的受害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1976 年 3 月 23 日对哥伦比亚生效。提交人由律师 Alberto León Gómez Zuluaga 先生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曾在国营哥伦比亚港马丽蒂诺德圣玛塔港区码头(哥港圣玛塔码头)<sup>1</sup>工作多年, 还身任马丽蒂诺德圣玛塔港区码头(圣玛塔码头)工人工会区领导人, 并任哥伦比亚工人联合会(哥工联)马格达蒂纳省分会主席。根据第 01/1991 号法

\* 委员会以下委员参与审查本来文: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sup>1</sup> 根据提交人提供的证件, 他于 1979 年 7 月 18 日至 1993 年 12 月 31 日受雇于哥港圣玛塔码头。

案对哥港圣玛塔港区码头进行了清算，因此于 1994 年 1 月 1 日解雇了提交人。为了协助清算进程，依据上述法案设立了哥伦比亚港清算问题社会责任基金(哥港社责基金)。

2.2 提交人辩称，鉴于他身任工会领导人的地位，他受工会法权的保护(*fuero sindical*)。这就意味着受此法权保护的人不可仅凭劳资法官的批准，即可予以解雇、调转或降级。

2.3 提交人向第一劳资法庭提出起诉，状告在就一切意义而论，取代了哥港圣玛塔码头的法律实体——哥港社责基金，要求恢复他原有的职务。1996 年 6 月 7 日，法官认可了提交人的要求，责令恢复当初解雇他之前所任的职务，并支付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至恢复生效之日期间每天的工资 75,891.83 哥伦比亚比索。鉴于对此裁决未提出上诉，于是，1996 年 6 月 19 日，下级法院宣布起裁决生效。

2.4 尽管提交人一再催促，但哥港社责基金却未履行裁决。2001 年 12 月 1 日，在裁决颁布了五年之后，圣玛塔司法辖区高等法院的劳务庭出于一翻查案卷目的，翻阅到了此案卷，并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推翻了下级法院的此裁决。提交人指出，他在上诉过程中已经得悉，劳资庭针对同一被告(哥港社责基金)业已下达了裁决，责令恢复受工会法权保护工人的职务。

2.5 据提交人称，查卷复审程序对他的案件不适用，因为此处所涉立法是《劳资诉讼法》，一项特殊的准则规定，只有当裁决完全有损于雇主而且不得上诉，才有必要复审。

2.6 提交人还称，在清算之前和期间，哥港圣玛塔码头的腐败案曝光，案情牵涉到公司各级的雇员。这导致公众舆论对审理法官的压力，主要涉及雇员如何行使工会责任问题。2001 年，总检察厅针对几名被控罔顾是非，下达偏袒哥港社责基金雇员的裁决，或批准弄虚作假解决方案的劳资事务法官进行了追究。这种情况说明了高等法院在法律未更改的情况下，分别于 1996 年和 2001 年，对同类案件采取的不同处置。

2.7 提交人针对高级法院的裁决，提出了法律保护的诉求。此项上诉遭到劳资问题上法庭的驳回；并于 2002 年 8 月 27 日，被最高法院刑事上诉庭驳回。<sup>2</sup>

<sup>2</sup> 据提交人所附的裁决，劳资问题上法庭认为，审理保护诉求的法官未被授权干预司法审理期间下达的裁决，因为这会构成对普通法庭所辖事务的任意干涉行为。此外，刑事上诉庭认为，就提交人的具体案情而论，雇主是否必须先经法庭批准是解雇的先决条件问题。对此，刑事上诉庭的推论如下：“当圣玛塔司法辖区高等法院劳资事务庭裁定无必要满足此要求时，并不是依据已经废除或不适用的标准下达的裁决。相反，法庭参照案情下达的裁决，是要解释制约问题的观念，以寻找出解决争端的办法。法庭的裁决不是不可接受或反复无常之举。裁决是基于围绕着上诉，特别是 R.A.D.B 的案情、《实质性劳资法》第 405 条和现行《集体协议》第 10 条第 3 款等若干方面的考虑。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不仅国有实体的清算构成了，不必事先获得司法管辖机构批准，结束雇用关系的合法原因，而且，鉴于企业已经停止存在，而且也不存在可以安置他的相等或更高的职位(……)，因此恢复职位也是‘从实际至法律均无法兑现的。’当出于翻查案卷的目的，复审 R.A.D.B 的案情时，圣玛塔司法辖区法院的劳资事务庭并未完全任意地无忽略《实质性劳资法》第 405 条所述的情况。准则与其适用之间，有一道解释程序”(原文如此)。

2.8 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复查先前的裁决，但他的案件未被选为复查案。因此，提交人认为，他已援用无遗所有国内补救办法。

##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所述事件构成了违反《公约》第十四条和与之相关联的第二条第2和3款以及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六條的行为。

3.2 关于第十四条，提交人辩称，他享有公正和正当程序的权利遭到侵犯。他声称，既不尊重他获得一个合格、独立和不偏不倚法庭公正和公开审理的权利，也不尊重他不遭受不应有拖延的权利。他说，一审法庭的裁决宣布判决可执行，加上被告方(哥港社责基金)未给予回应，形成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即：他的权利得到确认，并且再确认。被告若认为宣布一审法庭的裁决可执行是任意之举，那么就必须寻求对此法定行为的复审。一审法庭下达了裁决五年之后，二审法庭才作出判决，这一事实构成了违法行为。此外，提交人辩称，当高等法院曲解援用国家立法，不能维护一审法庭的判决，从而造成了有利于国有雇主的状况。因此，提交人辩称，法庭并未作为权利的保障人行事，而只是作为政府的保护人审案，这就违背了独立和不偏不倚的原则。他还强调，宪法法院因未保护受侵害的权利，犯有司法不公之举。

3.3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條，提交人辩称，若不保护法定工会权，构成了政府违反结社自由权的行为，因为这正是依法设立的国有实体，哥港社责基金，取代原本就是国有实体的，哥港圣玛塔码头所犯的违法行为。高等法院的裁决，是经劳务上诉庭大多数通过的政治决定形成的结果。国家政府耍手腕以被揭露出来的无数腐败现象为据，开展普化宣传运动，贬污哥港圣玛塔码头工人。这导致公众舆论对司法机构施加压力。

3.4 关于《公约》第二十六條，提交人坚持，高等法院没有可站得住脚的理由，颁布与对同类案件下达的判决相异的裁决。提交人援引了承认工会特权的类似裁决，并责令平反对未经授权遭到驳回的案件。若法庭的裁决要更改判例，就必须说明更改的理由。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8年10月6日，缔约国的普通照会认为来文不可受理。缔约国否认，1996年6月7日，一审劳资法庭下达的一审裁决不受上级法庭的复核。判决最终经复核，因为裁决对直接担负哥港圣玛塔码头和哥港社责基金劳资责任的缔约国不利。

4.2 缔约国否认对哥港圣玛塔码头施加过压力，以及未依法对此案下达的裁决。高等法庭采取的立场与宪法法院针对公共实体结构调整所涉工会特权的司法判例相符。关于提交人提出的法律保护请求，高等法院的劳资上诉庭与刑事上诉庭均以高等法院未任意从事为由驳回了上述请求。

4.3 缔约国认为，就委员会准备就已经国家法庭审查过的事实或证据进行重新评估的案情而论，来文并未为受理目的，提供充分的佐证。缔约国引述委员会的案例和求美洲人权系统的案例，提醒地指出委员会并复审国家法庭对事实和证据的裁决。提交人仅表示他不认同高等法院下达的裁决，并表示期望委员会作为上诉法庭审核此事是否在国内层面得到适当的处置。委员会审议本案的唯一理由是要看所下达的裁决是否属任意性，或违背了上诉人的应有程序，但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过。提交人曾获得了若干补救办法并得到了依法下达的若干裁决，每次裁决都阐明了为何不能受理他的上诉。

4.4 提交人并未作出令人信服解释，说明自高等法院下达裁决到向委员会提出案件期间拖延了四年零六个月的理由，因此，缔约国坚持认为这样的拖延构成了滥用来文提交权的行为。

###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5.1 2008年7月15日，缔约国就案情发表了意见。

5.2 据缔约国称，1993年1月21日，宪法法院裁定，责令清算哥港圣玛塔码头的第1/1991法令符合宪法。1992年颁布的第035、036和037号法令致使公司清算生效。为此，1992年的第035号法令第24条阐明，“根据1990年第50号法案第5(e)条，清算哥伦比亚港构成了终止雇用的正当理由”。根据第035号法案第3条，提交人现为养恤金领取人。<sup>3</sup>

5.3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缔约国坚持，提交人在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庭上得到了公正的审判。他得以提出上诉，而且法庭裁决具备应有的实证。经由主管机构受理解决了上级法庭复审的问题，而且1999年12月1日，宪法法院第962/99号裁决认定为处理得当。法院确认，“鉴于支付所确认的索赔款系为国家直接承担着与劳资相关的义务和对哥港圣玛塔码头和哥港社责基金的责任，必须就部分或完全不利于哥港社责基金的一审裁决进行复审(……)。诸如保护国家财政资源原则的实效；为维护普众利益履行加大防范腐败危害影响的保护职责的力度；增强严格恪守行政道德的职责；和保障国家资源保有等均是所审查案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法庭和法官均既不可忽视这些情况，也不可就哥港圣玛塔码头和哥港社责基金的劳资申诉案情中揭露出来的种种臭名昭彰的行政腐败劣迹熟视无睹”。此外，2002年11月7日，总检察长下达指令，重申上级法庭必须强制复核就哥港社责基金问题下达的一切不利裁决。

5.4 缔约国还指出，由于企业清算引发了许多劳资案，因此，涉及法庭必须清理掉积压案件，避免毫无理由地拖延结案工作。尽管国内立法并没有规定上级法庭对裁决复审所允许的时限，但还是开展了清理案件工作。

<sup>3</sup> 第3条：依据1991年第1条所列特别权力颁布的现行立法和条例，承认公务员可据此享有的退休、残疾和老年养恤金，表明领取者终结了他们各自的就业合同及其法定和既定的应有权益。

5.5 鉴于根据规约请求法律保护的规则，宪法法院无义务审理每一桩关于保护问题裁决，未进行复审不可被视为剥夺公正的行为。

5.6 缔约国重申，提交人显然期望委员会作为第四审理法庭行事，再就驳回他的上诉是否得事先经司法批准问题展开辩论。国内法庭并未就提交人的上诉下达胜诉裁决，并不证明即是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行为。

5.7 关于有权获得不受拖延的审理，缔约国辩称，本案情据称的拖延，并未造成对提交人增添的伤害。为确保国内上诉的结案时间所采取的步骤，并非即相当于无理由的拖延。

5.8 关于《公约》第二十二条，缔约国重申，吊销提交人的就业合同是清算哥港圣玛塔码头所致。清算是依据 1/1991 号法案规定实施的，而且不可被理解为旨在违反结社自由的举措。1992 年为执行 1/1991 年第 1 号法案颁布的第 035 号法令确定承认退休即意味着终止雇用合同。因此，在清算过程期间，废除个人的工会特权不能被理解为对工会领导人的施压行为。

5.9 关于《公约》第二十六条，缔约国回顾就委员会案例来看，只要这类差别是系为合理而且客观的标准，那么并非所有不同的处置均相当于歧视。缔约国宣称，高等法庭的裁决符合宪法法院采纳的理解标准。2003 年 5 月 26 日，宪法法院的裁决裁定就实际的政府结构重组案而论，没有必要要求事先获得司法批准再废除具有工会特权的职位，因为与就业相关的关系或联系源于一般法律定义，并且因为实体的结构重组授权是基于实际宪法准则，而且其中包括撤销其它的一些职位在内。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6.1 2009 年 10 月 10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的意见发表了评论。他辩称，宪法法院关于工会特权的解释左右摇摆。然而，自 2003 年中期以来，司法判例一直坚持，国营实体的结构重组或清算期间，必须得到司法批准才可对受工会特权保护的公务员解职。以 2005 年的第 T-235 号裁决为例，宪法法院裁定，当国营实体进入行政重组或清算进程时，应先与劳资事务法官商讨，从而该法官可确定这样的重组情景是否为可对受工会特权包括的工人进行解职、调任或降职合理缘由，而一旦确如所述，即应下达对采取上述行动的事先批准。

6.2 缔约国并没有意识到，劳资诉讼程序的规则限制高等法庭仅对完全不利于工人的裁决进行复审。然而，1992 年宪法法院的决定废除了上述劳资规则的实效。提交人辩称，为了袒护政府的疏忽行为更改诉讼规则是不可接受的。

6.3 提交人坚持，违反应有程序行为的理由如下：

(a) 五年多过去了，政府未遵循 1996 年 6 月 7 日责令通过哥港社责基金，恢复提交人职位的裁决。然而，履行司法裁决是法治的基本条件，无视司法裁决，构成了违反应有程序和落实司法的权利。提交人重申，即使是对正在经受清算程序的实体下达的裁决，裁决亦责令要恢复他的原职；



(b) 确认在一审法院下达了裁决五年之后，高等法庭才受理了此案；

(c) 高等法庭非法设定该庭有权推翻一审庭的裁决。依据法律，原裁决不受复审。高等法庭诉诸复审程序，侵犯了一审庭的独立性；

(d) 宪法法院未就法律保护的请求下达裁决。虽然哥伦比亚法律制度规定可酌情对这类保护请求进行复审，然而，法院则界定了某些可适用的标准，包括必须推翻无视宪法理念的司法裁决。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任何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鉴于从高等法庭下达裁决直至向委员会提交来文，期间拖延了四年零六个月，由此构成了滥用来文提交的原因，来文应被视为不可受理。委员会说，根据自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委员会所收到来文适用的委员会新议事规则第 96 条(c)项，委员会应确定来文未滥用提交权。滥用提交权原则上并不以基于属时理由的延迟提交为据，下达不予以受理的决定。然而，当提交人援用无遗了国内补救办法五年之后，或适用时在其它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得出结论 3 年之后，才提交来文，则有可能构成滥用提交权的行为，除非考虑到来文所涉的所有情况，有理由可说明推迟提交的原因。与此同时，委员会应适用其现行案例，据此，当在提交来文之前，在无充分理由情况下，已经延迟了极长一段时期，则不妨认为存在着滥用情况。<sup>4</sup> 委员会说，继高等法庭下达了裁决之后，提交人提出了法律保护的请求，保护请求问题至 2002 年 8 月 27 日已了结。委员会认为，就本案而论，自援用无遗国内补救办法以来所耽搁的时间，并未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所述的滥用提交权行为。

7.4 关于提交人称违反了依据《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应有程序权的申诉，委员会认为，这些申诉基本涉及缔约国的法庭对事实的评估和国内立法的适用问题。委员会回顾其司法案例，据此，核查每起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是所涉缔约国法庭的责任，除非可以证明，这类评估或适用明显具有任意性，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或执法不公现象。<sup>5</sup> 委员会研究了当事各方提交的材料，包括提交人向委员会

<sup>4</sup> 见第 1233/2003 号来文，Tsarjov 诉爱沙尼亚，2007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6.3 段；第 1434/2005 号来文，Fillacier 诉法国案，2006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4.3 段；第 787/1997 号来文，Gobin 诉毛里求斯，2001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6.3 段。

<sup>5</sup> 见委员会关于第十四条，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2/40(第一卷)，附件六]，第 26 段)。还见第 1616/2007 号来文，Manzano 诉哥伦比亚，2010 年 3 月 19 日通过的决定，第 6.4 段。

提出的申诉中所述的关于对法律保护请求的裁决，并注意到提交人就缔约国法庭对国内立法解释所持的不同意见。考虑到案件种种所涉情况，委员会认为，所提交的材料并未证明，上述司法审理程序存在着缺陷。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就其申诉提供充分实证以证明存在着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现象，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可受理。

7.5 关于违反《公约》第二十二和二十六条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称，解雇他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二十二条所列结社自由权的行为，而国内法庭对类似提交人案件下达的裁决则与对提交人的判决截然不同，这就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二十六条的行为。对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为了受理目的，拿出充分实据证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因为他身任工会领导人职务才解雇他。此外，就此问题所作的裁决与其本人案件所述的裁决不同，因此，难以从这些裁决推测出可认为发生了《公约》第二十六条所述任何形式歧视的理由。因此，委员会认为，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由于缺乏证据，上述申诉不可受理。

8.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可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以及提交人和律师。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H. 第 1802/2008 号来文，L.O.P.诉西班牙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L.O.P. (由律师 José Luis Mazón Costa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08 年 4 月 15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无道理的转狱；歧视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对申诉的证实；滥用来文提交权  
 实质性问题： 个人隐私和家庭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的权利；无歧视地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權利  
 《公约》条款： 第十七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三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通过以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2008 年 4 月 14 日来文的提交人是西班牙公民 L.O.P.，出生于 1946 年。他声称自己是西班牙违反《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和第二十六条的受害者。《任择议定书》于 1985 年 4 月 25 日对西班牙生效。提交人由其律师 José Luis Mazón Costa 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目前，提交人因为贩运毒品罪和危害公众健康罪而正在监狱中服刑。2003 年，他从马德里省的 Alcala Meco 监狱转移到了 Zuera 监狱(Zaragoza)，但是没有被告知任何理由。后来他又被转移到了 Valladolid 监狱和 Daroca 监狱(Zaragoza)。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拉扎里·布济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提交人声称，转移监狱没有考虑到他的家庭生活权利，因为他的女儿居住在马德里附近的 Guadalajara。

2.2 提交人被列入了需要特别观察的囚犯名单(FIES 名单)。他认为，将他列入名单的依据并非《普通监狱法》，而是总监狱长发出的内部通知。列入 FIES 名单的后果包括：转移监狱；更换牢房；任何时候均可搜查牢房；监视所有活动以及拦截通讯。

2.3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提交人认为，国内法院不接受这样的观点：转移监狱影响被拘留人员的基本的家庭生活权利。在这一方面，他提到，马德里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支持国内法院的做法。关于被列入 FIES 名单的问题，提交人说，宪法法院维护了 FIES 名单的合宪性。

2.4 提交人认为，如果在本案中申请保护宪法权利也是无用的。他说，在修订了《宪法法院法》之后，只有具有“特别宪法意义的”案件才能申请保护宪法权利。因此，这个程序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当于申请对判决进行特别审议。

##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将他任意调往远离家庭的监狱阻碍了他同家人的联系，从而违反了《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

3.2 他还争辩说，将他列入 FIES 名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种做法迫使他在比其他囚犯更为严厉的条件下服刑，因而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第 1 款。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 2008 年 10 月 15 日的普通照会中指出，来文不可受理。它声称，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或者理由，用以支持他关于违反《公约》的指控；他没有就所提出的指控用尽所有国内解决办法。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曾经向监狱管理部门、视察监狱的法官、省级高等法院或者宪法法院提出过任何投诉。它还指出，提交人曾经几次向委员会提交来文，<sup>1</sup> 但是从来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和提供任何证据。因此，他求助于委员会的行动是滥用提交来文制度。

4.2 缔约国争辩说，《宪法》和《公约》都不承认关于只在一地服刑或者就近服刑的权利。提交人没有能够证明他的家人住在 Guadalajara。此外，申诉所提到的监狱(Daroca 监狱)离 Guadalajara 只有 146 公里。

<sup>1</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曾经审议过提交人以前提出的两份来文。2006 年 8 月 11 日，委员会宣布第 1387/2005 号来文不可受理，认为“就受理之目的而言，根据第十四条第 5 款提出的申诉没有经过充分证明”。2008 年 4 月 18 日，委员会在其关于第 1360/2005 号来文的决定中指出，有关事实未能说明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

4.3 鉴于来文明显滥用《公约》的宗旨，缔约国要求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以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为由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如无此可能，它则请委员会宣布缔约国没有违反《公约》。

#### 提交人对缔约国可否受理意见的评论

5.1 2009 年 2 月 15 日，提交人对于缔约国的意见进行了评论。他声称，高等法院和宪法法院驳回了其他一些囚犯就转移监狱问题提出的上诉；因此，国内补救办法是无效的。

5.2 提交人回顾了委员会的判例，其中表明：没有必要用尽毫无成功希望的解决办法。<sup>2</sup> 他还指出，从他的监狱档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想尽办法争取调往其他监狱服刑。

5.3 关于他被列入特别观察囚犯名单的问题，提交人重申，他在监狱中遭到了不人道的和歧视性的待遇。他描述了对于被列入名单的囚犯所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不定期地转移监狱；随时搜查身体和牢房；拦截通讯(包括信函)；限制同外界的联系；24 小时监视以及限制工作机会。

5.4 他声称，没有可能对这些措施提出质疑，因为根据西班牙的判例法，法院一再维护 FIES 制度的合法性。他重申，已经不可能再向宪法法院申请保护宪法权利，因为宪法法院只负责审理具有“特别宪法意义的”案件。

####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6.1 2009 年 2 月 10 日，缔约国就案情提出了意见。

6.2 缔约国重申，提交人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或者理由，用以支持他关于违反《公约》的指控；他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他求助于委员会的做法是滥用提出来文制度。

6.3 缔约国还说，提交人是一名著名的毒枭，曾经因为领导大型的贩毒集团而被多次定罪。他曾经因为危害公众健康罪而被关押 4 年 4 个月。目前他正在服刑，罪名是非法贩运毒品和危害公众健康。两罪并罚，他作为主犯被加重判处 13 年 5 个月 25 天。<sup>3</sup> 他曾经被转移了几次监狱，有时是出于司法原因(出庭受审)；有时是因为他被归入具体的囚犯类别或者指派他从事某些活动；有时是出于管理或者安全的原因。

6.4 缔约国指出，从 2007 年 7 月以来，提交人一直在监狱中服刑。目前他被定为 2 级囚犯(接受普通监狱管理的囚犯)。他在 Guadalajara 的家庭同监狱相距不到 150 公里。从 2008 年 1 月 26 日至 4 月 26 日，他的女儿两次探监；他的女朋友 9

<sup>2</sup> 见第 1305/2004 号来文，Victor Villalón Ventura 诉西班牙，200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决定。

<sup>3</sup> 缔约国附上了罪证的概要和定罪书。

次探监。<sup>4</sup> 关于提交人的关押条件，缔约国表示，自从提交人进入 Daroca 监狱以来，从来没有换过牢房；搜查他的牢房只是常规事项；而且从来不在夜里搜查。

6.5 缔约国重申，《公约》并不承认关于囚犯在住家附近的监狱中服刑的权利。它还提到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标准》规定，必须按照其性别、年龄、犯罪记录、关押的法律依据以及给予待遇的必要性，将不同类型的囚犯关押在不同的监狱或者监狱中的不同部分。

6.6 缔约国指出，将囚犯安排在不同的监狱是基于对程序和犯罪因素、每一个囚犯的犯罪记录、地位和个人状况的评估；同时还要考虑到每所设施的不同目的(重新融入社会、拘留和关押等等)。提交人被列入 FIES 名单，具体来说是被列入有组织犯罪类别。这是总监狱长根据其犯罪活动以及《联合国反对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公约》第 2 条决定的。囚犯可在法院中对此提出质疑。

6.7 关于提交人被列入特别观察囚犯单的问题，缔约国解释说，凡是个人和犯罪情况相同的囚犯，无论是否列入名单，其待遇都是一样的，都不会改变监狱对他们的管理，也不会影响《公约》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FIES 名单是一个数据库，旨在提供关于某些类别高度危险囚犯的广泛信息以及提供特别保护。有关部门根据国内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将囚犯分配到具体的监狱或者拘留中心，分配地点同是否列入名单无关。

6.8 缔约国指出，在关于监狱系统不尊重囚犯权利的案件中，法院有义务为所发生的侵权事件作出补救。就提交人的案件而言，没有记录显示曾经发生过侵权事件或者曾向法院提出过申诉。

6.9 因此，缔约国重申其要求：委员会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其理由是：提交人没有用尽现有的国内补救办法；来文明显滥用《公约》的宗旨。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7.1 提交人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和 12 月 14 日对缔约国的意见作出了评论。

7.2 他重申以前作出的评论，并且提到了马德里高等法院 2009 年 7 月 8 日的裁决，其中否决了囚犯在住家附近的监狱中服刑的权利。<sup>5</sup> 提交人认为，他已经表明国内补救办法是无效的。

7.3 他还说，自从他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以来，他又被转移监狱(先是被转移到距离马德里 360 公里的 Alicante 省 Villena 监狱；后来又被转到 Salamanca 的监狱)。他强调指出，在 2003 年至 2009 年期间，他曾经 7 次转移监狱。其中，除

<sup>4</sup> 四次夫妻团聚访问、三次家庭访问和两次普通访问。

<sup>5</sup> 马德里高等法院行政司第八科 2009 年 7 月 8 日第 1413/2009 号决定中(档案号 622/2008)指出：“监狱管理条例不承认囚犯有权在住家附近的监狱中服刑；当然，《宪法》也不承认这项权利”。

了马德里的监狱之外，其他监狱都远离他的家庭住地。<sup>6</sup> 十分明显，将囚犯转移到离家很远的监狱不利于他的人格的自由发展。毫无道理地将提交人调往离家遥远的监狱构成对他家庭生活的虐待性干预。为此，提交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

7.4 关于他被列入 FIES 名单的问题，提交人重申了施加于被列入名单囚犯的限制，并且提到了禁止酷刑委员会对西班牙 2002 年第 4 次定期报告的审议。<sup>7</sup> 提交人指出，尽管产生了严重后果，但是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就列入 FIES 名单的问题或是就此提出起诉的现有程序问题，向囚犯发出书面通知。

7.5 提交人说，在 Zuera 监狱(两次)和 Villena 监狱期间，他因为被列入 FIES 名单而遭到了限制。<sup>8</sup> 在 Daroca 监狱和 Valladolid 监狱他获得了正常待遇。目前，提交人正在 Topas 监狱(Salamanca)中服刑，他获得了普通囚犯的正常待遇。2008 年 9 月 3 日，他通过律师就拦截通讯的问题向监狱管理总局提出了投诉。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87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规定，委员会已经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个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8.3 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声称：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因为提交人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侵权行为的投诉事前并未向国内法院提出。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声称：由于缔约国确立的判例法不利于他的声称，现有的司法补救办法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

8.4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时指出，仅仅怀疑补救办法的有效性不能免除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方面对提交人的要求。<sup>9</sup> 委员会指出，本来文所指的国内判例法不能说明申请司法或者行政复核对提交人的案件无效。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证

<sup>6</sup> 从 2003 年以来，提交人曾经被调往以下监狱(按时间顺序)：马德里省的 Alcalá Meco 监狱、马德里的 Zuera 监狱以及 Valladolid、Daroca、Villena 和 Topas (Salamanca)等监狱。

<sup>7</sup> 文件 CAT/C/CR/29/3 第 11(d)段指出：“委员会对被列入接受严密监视名单(FIES)的某些囚犯的恶劣的关押条件表示关注。根据所收到的信息，接受一级严密监视的囚犯必须大部份时间呆在牢房中；在有些情况下每天只有 2 小时的放风；不准参加小组活动、体育活动和工作；必须接受极为严格的安全措施。一般来说，这些囚犯的关押条件似乎与旨在促进他们融入社会的 management 方法不相符合，可被视为《公约》第十六条所禁止的待遇。”

<sup>8</sup> 提交人在被关押在 Villena 监狱期间，曾经遭受的限制包括：不定期的牢房搜查；被迫裸体；更换和搜查牢房；以及通信检查(包括来自其律师的信函)。

<sup>9</sup> 例如，第 1623/2007 号来文，Guerra de la Espriella 诉哥伦比亚，2010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1511/2006 号来文，García Perea 诉西班牙，2009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决定，第 6.2 段。

明他曾经就远离家庭或者因为被列入 FIES 名单而受到限制等情况向有关部门提出过申诉。因此，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认为，来文由于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是不可受理的。

9.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来文不可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西班牙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I. 第 1816/2008 号来文，K.A.L.和 A.A.M.L.诉加拿大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K.A.L.和 A.A.M.L. (由律师 Nataliya Dzera 女士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未成年儿子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08 年 9 月 17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将提交人及其儿子遣送回巴基斯坦

程序性问题： 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措施；指控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遣返后可能被任意剥夺生命和遭受其它人权侵害

《公约》条款： 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第二十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 2 款(b)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如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1 提交人是 K.A.L.和 A.A.M.L.，都是巴基斯坦国民，分别生于 1970 年和 1963 年。他们代表自己本人及其未成年的儿子 A.L.和 K.L.提交来文。他们也是巴基斯坦国民，分别生于 1992 年和 1995 年。他们声称，如果将他们从加拿大驱逐回巴基斯坦，将侵犯他们依《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七条享有的权利。他们由律师 Nataliya Dzera 代理。

1.2 2008 年 10 月 10 日，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采取行动，决定不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发布关于临时措施请求。

\* 参加本来文审查的委员会委员有：拉扎里·布兹德、克里斯蒂娜·沙内、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沃尔特·卡林、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尤利娅·安托阿内拉·莫措克、杰拉尔德·纽曼、迈克尔·奥弗莱厄蒂、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奈杰尔·罗德利、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克里斯特·特林和马戈·瓦特瓦尔。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及其未成年儿子在巴基斯坦一直居住到 2001 年。他们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教徒，在巴基斯坦，这是一个宗教少数群体。2001 年 8 月 25 日，提交人及其两名儿童在商业移民类(企业家签证制)下抵达加拿大。他们一到加拿大，K.A.L.就开始在一家私营的日托中心担任助理教员的工作，A.A.M.L.则受雇于一家私营公司 Bensus International, 担任托运部负责人。

2.2 2004 年 2 月 3 日，移民和难民局移民司向他们发出离开令，因为他们没有满足当时生效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即《移民法》)规定的在抵达两年之内必须在加拿大作为企业家的居留条件。提交人根据《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第 63 (3) 条向移民上诉分庭提出上诉。该分庭认为 A.A.M.L.在他原来受雇的 Bensus International 投资 100,000 加元，不能作为是“对加拿大经济的重大贡献”。K.A.L.担任助理教员的工作也不能认为是重大贡献。他们的上诉以及随后关于准予申请司法审查的申请分别于 2005 年 9 月 22 日和 2006 年 1 月 13 日被驳回。2006 年 4 月 13 日，提交人以人道主义和同情为由申请永久居住，但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被驳回。此外，2007 年 9 月 21 日，提交人就被驳回的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申请准许司法复审；2007 年 10 月 31 日，对关于维持将他们遣返到巴基斯坦的动议申请准许司法复审。申请于 2008 年 1 月 10 日被驳回。与上诉申诉的同时，提交人于 2006 年 2 月首次提出关于遣返前风险评估的申请。他们声称，“他们提出申请的目的是，由于他们在加拿大的投资而申请加拿大移民局的保护”。<sup>1</sup> 他们特别强调，他们为了搬迁到加拿大而将他们在巴基斯坦的企业关闭；他们在达到了两年居住的条件过后四个月才作了投资；这一企业为加拿大创造就业。他们还指出，他们的家属已经定居下来，并融入了加拿大社会。在他们可能在巴基斯坦遇到的风险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申诉。2006 年 4 月 26 日，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驳回了这项申请。这名官员回顾说，遣返前风险评估的目的不是用作对先前的决定的一种上诉机制，而是根据可能遭到镇压的风险、酷刑风险、生命危险、残忍和不寻常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等事实或证据来进行评估。该官员指出，提交人没有提到他们返回巴基斯坦所涉的风险，只是将他们的指控局限于他们希望留在加拿大，并对一个有生存力的企业作了投资，从而他们能符合企业家移民的条例。

2.3 2007 年 10 月，在提出准予对驳回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进行复审的申请后，提交人第二次提出关于遣返前风险评估的申请。他们声称，由于他们在宗教上属于少数的地位，将他们驱逐到巴基斯坦，会使他们处于迫害、酷刑、生命危险或者残忍和不寻常的待遇的风险之中，他们也不能要求巴基斯坦当局向他们提供保护。因此，基于他们对返回的恐惧，他们要求根据《移民法》第 96 和第 97 条被承认为难民和需要保护的人。他们解释说，他们在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以及第一次的驱逐前风险评估申请中没有引述这些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位法律

<sup>1</sup> 提交人的第一任顾问 M.P.咨询公司的信，2006 年 2 月 28 日。

顾问不是律师，这位顾问告诉他们说，由于他们不是难民地位申请人，因此他们以这些理由提出驱逐前风险评估是没有胜诉的可能性的。

2.4 提交人声称，自从他们离开巴基斯坦以后，宗教少数群体以及青年妇女的安全等情况恶化。什叶派伊斯玛仪教的情况在 2006 年和 2007 年都有恶化，他们受到巴基斯坦当局的歧视，得不到它们的保护。法律不仅歧视妇女，而且他们还面临强奸或其他形式暴力的严重风险，即使在被警察拘留时也如此。他们叙述了他们在到达加拿大前所遇到的一些歧视。他们被逊尼派称为“Kaafir”，这是一个贬义词，意为“异端者”。他们被当作下等人，他们如果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就有可能卷入殴斗。A.A.M.L.在他的企业遭到勒索，并威胁要绑架他的儿子。卡拉奇有一个街道有许多伊斯玛仪教徒居住，因为那里离他们的清真寺很近，但 K.A.L.在她第一个儿子怀孕 8 个月时在那里的一条街上有人跟踪，她不得不逃离。因此她决定再也不单独上那条街了。提交人还提到 2007 年 4 月 23 日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四名带枪的男子冲进 A.A.M.L.母亲的家，抢走了一些贵重物品，并威胁说，如果他们得不到屋内所有宝贵物品，他们就会绑架她的孙儿。这表明他们在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时面临的困难。他们指出，她母亲的家伊斯玛仪教街区，他们的清真寺就在附近，其他三个伊斯玛仪教家庭也遭到抢劫。提交人就巴基斯坦宗教少数群体的情况恶化问题提交了报告，特别是报告说当局没有采取行动控制对行使少数派信仰的人敌对行动，而且警察和司法机构没有能力保护他们。<sup>2</sup> 他们说，因此伊斯玛仪教派在巴基斯坦没有安全的地方。

2.5 2007 年 10 月 31 日向提交人转交了对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的驳回书，限定他们在 2008 年 1 月 25 日离开。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在报告中特别表明，提交人没有表示由于属于宗教少数群体而将矛头特别指向他们，他们所述的事件没有严重到构成“迫害”的程度。因此，提交人推迟了在申请复审对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驳回中关于停止遣返的动议的庭审；2007 年 11 月 12 日根据《移民法》第 72(1)条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申请准予起诉并对遣返前风险评估裁定作司法复审。2008 年 1 月 21 日，提交人提出关于停止遣返的申请，2008 年 1 月 22 日，加拿大联邦法院予以批准，维持到就准予司法复审遣返前风险评估的申请作出最后裁定后。2008 年 5 月 26 日，联邦法院驳回了对遣返前风险评估作司法复审的申请，所涉的事件“没有严重到根本侵犯申请人的尊严的严重程度，也没有表明申请人由于是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而被当作矛头所指”。他还说，在司法复审方面，法院的作用不是重新衡量提供的证据，特别不是“处理巴基斯坦的国家保护问题，因为这不是驱逐前风险评估官员驳回驱逐前风险评估申请的理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sup>2</sup> 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别人权报告》—巴基斯坦，2006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巴基斯坦，2007 年；《大赦国际报告》—巴基斯坦，2007 年。

##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如果他们被迫返回巴基斯坦，加拿大会违反《公约》第六条第1款、第七条、第九条第1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1款和第二十七条。<sup>3</sup>

3.2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没有充分评估他们对遭迫害的恐惧、他们的生命危险以及安全风险，因此也没有适当评估将他们遣返到巴基斯坦会对他们造成的不可补救的伤害。

3.3 提交人强调说，缔约国当局，包括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都认为他们的论点和证据可信，尤其是以下几点：他们属于宗教少数群体的事实，他们对为何在第一次遣返前风险评估以及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因中引述这些情况的原因所作的解释，提交人的母亲在宣誓证词中所述的事件，在来到加拿大前使他们受害的事件，以及年轻妇女在巴基斯坦遭到强奸的风险，特别是在被警察拘留期间。

3.4 提交人认为，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的决定过于依赖他们以企业家签证来到加拿大的事实，而疏漏了他们在第一次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中引述的对遭到迫害的恐惧。这项决定过分强调需要对他们重复发生这样的事件才能认为他们在巴基斯坦有实际的严重风险。他们还指出该官员没有考虑到 2006-2007 年巴基斯坦宗教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情况恶化，原因是 2004 年 4 月 1 日的一份文件说巴基斯坦除了一些暴力事件以外，局势总的来说是各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他们的结论是，遣返前风险评估没有适当评估这些事件以及他们在回到自己祖国时会面临的危险的严重程度。

3.5 提交人辩称，加拿大联邦法院 2008 年 1 月 22 日的裁定中的推理，准许临时停止遣返，以及随后关于司法复审的决定，都导致了荒唐的结果。

3.6 提交人于 2008 年 9 月 9 日收到了对他们第二次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因申请的驳回书，但后来他们没有向加拿大的法院提出关于审议这项驳回的任何申请，而是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向人权事务委员会送交了一份来文。他们指出，即使他们向联邦法院再次申请停止遣返，例如停止到研究了他们的第二次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申请后，这项申请也会被驳回的，因为联邦法院已经对他们的保护申请作出了最后裁定，同一事项不能两次提交联邦法院。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4 月 6 日缔约国就可否受理和案情问题提出意见。它说，2008 年 5 月 22 日，提交人以人道主义和同情的考虑为由第二次申请永久居住，他们依据的是 2007 年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申请中所述的同样的关于风险的指控，即：由于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属于宗教少数群体，因此可能遭到迫害、酷刑、生命危险、残忍和不正常待遇或处罚的风险。他们提出这项申请的依据还有：他们已融入了加拿大社会。2008 年 9 月 9 日，关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申请被驳回。

<sup>3</sup> 他们没有将上述各条与具体指称联系起来。

加拿大当局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认为提交人如果必须在加拿大以外申请永久居住签证而会面临不寻常、不应当或者不相称的艰苦问题。

4.2 提交人可以提出申请，要求准予对 2006 年 4 月 26 日负面的遣返前风险评估决定进行司法复审，对 2008 年 9 月 9 日负面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因的決定进行司法复审。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因此，由于没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和第五条第(2)款(b)项用尽国内补救措施，因此整个来文应该被宣布为不可受理。<sup>4</sup> 缔约国回顾说，在过去，如果提交人没有要求联邦法院准许申请司法复查，委员会则因没有用尽国内补救措施而宣布来文不可受理；<sup>5</sup> 禁止酷刑委员会也提到联邦法院的司法复审在确保难民制度的公正性方面的效力。<sup>6</sup> 它也不承认联邦法院的两项决定会导致荒唐的结果。对临时停止遣返和司法复审所适用的检验标准适用于不同的目的，因此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但这不会使这些程序产生矛盾或荒唐的结果。它最后认为，对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作司法复审的驳回，在事实上或法律上都不会对联邦法院审查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因的决定的可能性及其效力产生影响。它回顾委员会的判例，即只仅仅对国内补救措施的效力不能作为不予以用尽的一个借口。

4.3 关于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第 1 款的申诉，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6(b)条，这些申诉都缺乏充分的证据，应该宣布为不可受理。关于《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缔约国辩称，在引渡或驱逐的情况下，确保个人不受到权利遭侵犯的实际风险，是它的责任。它坚持说，没有证据表明提交人除了单纯的怀疑以外可能会受到实际的风险，这种实际的风险就是说：驱逐所必然可预见的后果是它们将被杀害，遭到酷刑或者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者巴基斯坦国不能保护他们。关于巴基斯坦人权情况的主要报告没有表明什叶派伊斯玛仪教少数群体会受到人身威胁，侵犯人权情况本身的存在并不足以说明提交人的指控有根据。例如，2007 年《美国国务院关

<sup>4</sup> 缔约国声称，司法复审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补救措施，在来文可否受理方面是必须用尽的一种措施。它提出的意见援引委员会在第 654/1995 号来文，Adu 诉加拿大，1997 年 7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2 段中的判例；第 603/1994 号来文，Badu 诉加拿大，1997 年 7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2 段中的判例；第 604/1994 号来文，Nartey 诉加拿大，1997 年 7 月 18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中的判例；第 939/2000 号来文，Dupuy 诉加拿大，2005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7.3 段中的判例；以及第 982/2001 号来文，Bhullar 诉加拿大，2006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中的判例。

<sup>5</sup> 缔约国的意见提到委员会第 1580/2007 号来文，F.M.诉加拿大，200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3 段中的判例；以及第 1578/2007 号来文，Dastgir.诉加拿大，2008 年 10 月 30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的判例。

<sup>6</sup> 缔约国的意见提到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第 66/1997 号来文，P.S.S.诉加拿大，1998 年 11 月 13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中的判例；第 86/1997 号来文，P.S.诉加拿大，1999 年 11 月 18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的判例；第 42/1996 号来文，R.K.诉加拿大，1997 年 11 月 20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7.2 段中的判例；第 95/1997 号来文，L.O.诉加拿大，2000 年 5 月 19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6.5 段中的判例；第 183/2001 号来文，B.S.S.诉加拿大，2004 年 5 月 12 日通过的决定，第 11.6 段中的判例；以及第 273/2005 号来文，T.A.诉加拿大，2006 年 5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第 6.3 段中的判例。

于人权做法的国别报告》只提到 2006 年的一次孤立的对伊斯玛仪礼拜场所的袭击以及在卡拉奇以外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暴力，大多数发生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至于妇女的情况，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强奸，包括警察的强奸事件发生率很高，有时还将强奸作为惩罚的手段。但是，巴基斯坦当局颁布了《妇女保护法案》，可能会使强奸事件有所减少。关于遵守《公约》第九条第 1 款的问题，缔约国说，提交人没有具体说明这项权利是如何遭到侵犯的，他们也没有引述到达巴基斯坦后遭到拘留的任何风险。缔约国认为，即使提交人的指控指得是正式剥夺自由以外存在的人身安全权，<sup>7</sup> 他们也缺乏证据。缔约国还坚持认为，提交人没有证明他们不能被重新安置到本国的其他地区。<sup>8</sup>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来文的依据是与在国内诉讼中为证明他们实际的人身风险而向加拿大当局提供的同样的事实和证据。它回顾说，如果不是明显地说国内法庭的评估是任意的或者等同于剥夺司法，那么委员会则没有责任重新评估缔约国的国内机构已经评估的事实和证据。

4.4 至于遵守《公约》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七条的问题，缔约国说，提交人的申诉缺乏证据，应宣布为不可受理。关于第十八条，它依据它就提交人在《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第 1 款方面的指控而提出的论点。它指出，提交人从来没有向警察申诉过他们在第十八条下的权利受到逊尼教派极端分子的侵犯。此外，它回顾了委员会在“Dawood Khan 诉加拿大”中的判例，<sup>9</sup> 该判例说，本案中的提交人从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缺乏或得不到巴基斯坦政府的保护。关于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七条，提交人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在回到巴基斯坦后这些权利将如何遭到侵犯。关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程序仔细考虑了提交人的子女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回到巴基斯坦的影响。此外，第二十四条如果独立于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九条第 1 款，则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如果后面几项权利没有遭到侵犯，前面的一项同样也没有遭到侵犯。<sup>10</sup> 此外，缔约国辩称，关于违反《公约》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七条的申诉与《公约》不符，因此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6(d)条按属事理由宣布为不可受理。首先，域外实施《公约》应属例外，其中所保障的权利基本上具有域内性质。第二，委员会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明确界定《公

<sup>7</sup> 缔约国的意见引述委员会第 195/1985 号来文，Delgado Paez 诉哥伦比亚，1998 年 4 月 4 日通过的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第 5.5 段中的判例，以及第 711/1996 号来文，Dias 诉安哥拉，2000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中的判例。

<sup>8</sup> 缔约国的意见引述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183/2001 号来文；B.S.S.诉加拿大，2004 年 5 月 12 日通过的《意见》中的判例；以及第 245/2004 号来文，S.S.S.诉加拿大，2005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的决定，该决定规定，重新安置到国家另一地区，虽然会造成困苦，但不能认为等同于酷刑。

<sup>9</sup> 第 1302/2004 号来文，Khan 诉加拿大，2006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5.6 段，委员会在该意见中就第十八条认定，“即使非国家人员在巴基斯坦蓄意胁迫提交人，以影响他自由地拥有或归依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他也没有表明国家当局不能或不愿保护他”。

<sup>10</sup> 缔约国的意见引述关于第二十四条的第 17(1989)号一般性意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第 1069/2002 号来文，Bakhtiyari 诉澳大利亚，2003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9.7 段中的判例。



约》的实施范围，它在非本国国民要受到遣返方面限制了缔约国的义务，易于陷于可能会有不可挽回的伤害的实际风险，并可能会在《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方面产生问题的情况。<sup>11</sup> 但是，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二十七条没有禁止缔约国将人遣返到可能不提供充分保护的另一国，否则，对《公约》所有条款赋予域外权利，实际上会剥夺国家对从其境内驱逐外国人的主权。

5. 尽管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请法律顾问对缔约国提出的意见作出评述，并且随后分别于 2010 年 2 月 23 日、2010 年 12 月 17 日和 2011 年 6 月 15 日发出三份催促函，但提交人仍然没有对缔约国的意见作出评述。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提出的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它是否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关于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b)项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没有就 2006 年 4 月 26 日关于驳回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以及 2008 年 9 月 9 日关于驳回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因的决定提出司法复查。它还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诉，即：关于对 2008 年 9 月 9 日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因的决定作司法复查的一项申请以及对停止遣返的另一项申请都会被驳回，因为联邦法院已经在 2008 年 5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对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作司法复查的申请的驳回书中就指控的风险和保护必要性作出了决定。

6.4 关于提交人对 2006 年 4 月 26 日关于驳回遣返前风险评估的决定没有申请司法复查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申请没有依据向委员会提出的同样的指控，而是依据他们留在加拿大的愿望以及 K.A.L.在根据原来的《移民法》第 23.1(1)(a)至(d)条在加拿大进行投资的义务方面的情况。委员会注意到，据缔约国说，遣返前风险评估不能当作对以前作出的决定的一个上诉机制，而是用来作为一种评估手段，以确定申请人是否可能受到迫害、酷刑、生命危险或者残忍和不寻常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在司法复查中，“联邦法院只需要考虑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的决定是否‘合理’，这意味着它属于可能、可接受的结果的范围，在事实和法律上都是经得起辩护的。”它还注意到，提交人第二次提出遣返前风险评估的申请，他们在申请中指控，将他们遣返到巴基斯坦，会使他们遭受个人风险，有可能遭到迫害、酷刑、生命危险或者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遣返前风险评估官员于 2007 年 10 月 31 日驳回了这项申请。联邦法院于 2008 年

<sup>11</sup> 关于《公约》第二条的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关于《公约》缔约国应履行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缔约国的意见还引述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例法：Soering 诉联合王国，第 14038/88 (1989)号申请，第 86 段；Z 和 T 诉联合王国，第 27034/05(2006)号申请。

5 月 26 日驳回了关于司法复审的申请。缔约国就联邦法院的决定没有以不用尽国内补救措施为由提出争论。

6.5 关于提交人没有申请对 2008 年 9 月 9 日驳回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决定作司法复审的问题，委员会观察到，这第二次关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申请，其依据是遭受迫害的风险、酷刑、生命危险或者残忍和不寻常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它还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申请对联邦法院的这项决定作司法复审，在 2008 年 5 月 26 日该法院拒绝对第二次遣返前风险评估作司法复审后，也会被驳回的。鉴于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程序具有可以灵活斟酌的特性，<sup>12</sup> 委员会认为，就《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b)项而言，提交人没有必要申请对 2008 年 9 月 9 日驳回人道主义和同情理由的决定作司法复审。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这项规定下的要求已经满足。

6.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可以受理该来文的问题提出质疑，因为提交人没有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七条充分地证实他们的申诉。至于后面的三个条款，它还注意到，缔约国对其可予受理的问题提出质疑，因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它们不符合《公约》。

6.7 委员会回顾说，无论是在即将要实行的遣返所至的国家，还是在随后可能将人遣返到的任何国家，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实际存在《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所设想的那种不可挽回的伤害风险，那么，缔约国就有义务不将任何人引渡、驱逐、驱赶或遣返出境。<sup>13</sup>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以下方面就巴基斯坦情况不断恶化的问题提出了指控：宗教少数群体、强奸的风险或者暴力侵害妇女的其他形式、当局缺乏有效保护。它还注意到在离开巴基斯坦前影响到提交人的事件。加拿大当局研究了这些申诉，得出结论说，提交人没有面临受迫害、受酷刑的实际风险、生命危险或者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提交人没有对缔约国的意见提出评述，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申诉，即如果他们被遣返到巴基斯坦，他们会面临实际风险。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1 款、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 1 款和第二十七条提出的申诉，就可否受理问题而言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

<sup>12</sup> 见第 1959/2010 号来文，Jama Warsame 诉加拿大，2011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4 段。意见第 333/2007 号来文，T.I. 诉加拿大，禁止酷刑委员会，2010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第 6.3 段；以及第 304/2006 号来文，L.Z.B. 诉加拿大，禁止酷刑委员会，2007 年 11 月 8 日通过的决定，第 6.4 段。

<sup>13</sup> 关于《公约》第二条的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公约》缔约国必须履行的一般性法律义务的性质(2004)，第 12 段。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并通过法律顾问转达给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J. 第 1819/2008 号来文, A.A.诉加拿大  
(2011 年 10 月 31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A. A.(由律师 Mai Nguyen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加拿大

来文日期: 2008 年 9 月 23 日(首次提交)

事由: 将提交人遣送回伊朗, 在那里她有可能遭受石刑或强迫婚姻

程序性问题: 对申诉的证实

实质性问题: 若被遣返有可能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或待遇; 可能遭到逮捕和任意拘留; 在法庭和法院面前人人平等;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提交人作为女性受到的歧视

《公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 款;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第 1 款; 第十九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如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1 2008 年 9 月 23 日来文提交人是伊朗公民 A.A., 1973 年出生。她声称加拿大侵犯了她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 1 款及第十九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 d 款、第三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第 1 款

\* 参加本来文审查的委员会委员有: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拉扎里·布兹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法萨拉先生、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内拉·尤利娅·莫措克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b 项所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8 月 19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的代理人是魁北克律师团的律师 Mai Nguyen。

1.2 2008 年 10 月 24 日，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特别报告员要求缔约国不要将提交人遣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因为委员会正在审查其案件。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声称，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2 月，她在伊朗与一个她以为已经离婚但事实上已婚的男子保持着关系。2004 年 3 月，提交人被伊朗警察当局逮捕，理由是与已婚男子保持“非法关系”。随后，当局将她拘留了 4 天，并以严厉处罚相威胁，比如石刑，目的是让她承认该非法关系。

2.2 提交人被拘留期间，她的父亲请求她的表兄帮忙把她弄出来，作为 Sepah 的高级上校，她的表兄有地位，有影响力。<sup>1</sup> 作为回报，表兄要求提交人嫁给他，做他的第二任妻子，否则将恢复对她的诉讼。提交人的父亲虽然反对这桩强迫婚姻，但为了让女儿获释，他佯装答应了。表兄出面干预后，被拘留了 4 天的提交人获释了。

2.3 为了逃避与表兄的强迫婚姻，提交人试图获得去加拿大的旅游签证，她的姐姐住在加拿大。然而，2004 年，她的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在此期间，提交人的表兄开始对她和她的家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明确威胁说如果她不跟他结婚的话，将恢复对她的刑事诉讼。2005 年 5 月 26 日，在一个人的帮助下，提交人终于离开伊朗前往奥地利，为了获得签证，她给了那个人一大笔钱。在奥地利，提交人找到了她定居该国的兄弟，两周后，她申请了难民身份。

2.4 6 月 28 日，定居在加拿大的提交人的姐妹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以威胁的口吻询问提交人的下落。2005 年 7 月，提交人的兄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跟他通话的人自称与伊朗驻奥地利大使馆有合作关系。那个人要提交人的兄弟明白他有办法让提交人的日子不好过。在此期间，提交人也从留在伊朗的父母那里得知，伊朗安全部门的人在她的表兄指使下对他们进行骚扰，想要知道她的下落。她的表兄还告诉他们说，他知道她在哪里，他已经派人去收拾她了。

2.5 提交人表示，由于感到在奥地利已经不再安全，她于 2005 年 8 月 20 日持假护照离开该国前往加拿大。到达加拿大 6 天后，提交人向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申请难民身份。2006 年 4 月 12 日，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驳回了她的申请，理由是提交人关于其表兄的存在、从离开伊朗到在加拿大避难之间的那段时间的说法缺乏可信性，并且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她在奥地利和加拿大提交了避难申请。

2.6 2006 年 5 月，提交人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批准和司法复查申请，对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了上诉，2006 年 7 月 19 日，该申请被驳回。

<sup>1</sup> “Sepah”或“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准军事组织，直属于伊朗革命领袖，国家元首。

2.7 2006 年 12 月，提交人向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提出遣返前危险评估申请，2007 年 1 月 15 日该申请也被驳回，理由是提交人的说法不可信。

2.8 2007 年 1 月，提交人向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提出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2007 年 2 月 6 日，提交人被采取遣返回伊朗的措施，该措施预计将在 2007 年 3 月 11 日执行。

2.9 2007 年 2 月 21 日，提交人就关于遣返前危险评估申请的决定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批准和司法复查申请。2007 年 2 月 27 日，提交人还向联邦法院提出了暂停执行驱逐申请。2007 年 3 月 6 日，联邦法院批准了暂停执行驱逐，直至其就对关于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的决定提出的司法复查申请做出裁决。2007 年 6 月 27 日，联邦法院批准了对该决定进行司法复查的申请。然而，2007 年 12 月 13 日，法院就实质问题驳回了关于遣返前危险评估申请的决定提出的司法复查申请。据提交人称，该决定做出后，暂停执行驱逐就不再适用。

2.10 2008 年 3 月 20 日，由于担心被指派对其提出的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进行审查的官员有失公正，因为该官员先前驳回了她提出的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提交人请求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另外指定一名官员来审查其长期居留申请。2008 年 4 月 1 日和 16 日，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告知提交人，尽管她提出了异议，但有关官员仍负责审查其申请。2008 年 6 月 27 日，提交人提出的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被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驳回。

2.11 2008 年 7 月 25 日，提交人向联邦法院提出批准和司法复查申请，对关于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的决定提出上诉。2009 年 2 月 25 日其申请被驳回。2008 年 7 月，提交人还对关于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的决定提出了申诉，请求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进行干预，目的是让该部行使自己的酌处权，赋予她在加拿大长期居留的权利。2008 年 8 月 1 日，该部拒绝干预提交人的案件。随后，2008 年 9 月 30 日，提交人被传唤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并被勒令获取机票和有效的旅行证件，以便在 2008 年 10 月 31 日之前返回伊朗。提交人声称她就这样用尽了可用的国内手段。

2.12 在此期间，2006 年 6 月，一张要求提交人到伊朗法院回应“非法关系”指控的传票被送到其父母的住处。

2.13 在逗留加拿大期间，提交人加入了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据提交人称，该组织旨在支持在蒙特利尔的伊朗妇女，促进妇女的平等和基本权利。

## 申诉

3.1 提交人确信，上述事实证明，缔约国侵犯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 1 款及第十九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二条 d 款、第三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第 1 b 款)所保障的权利。提交人指出，如果被遣返回伊朗，她有可能遭到逮捕、拘留、迫害和酷刑，因为在这个国家对她的起诉

还没有判决，还因为她的表兄带来的威胁。她还强调了她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中的活动——尤其是她的政治言论、她反对伊朗现政权以及她的女权主义观点——，以及她脆弱的身体状况。

3.2 提交人确信，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 2006 年 4 月 12 日做出的驳回其避难申请的决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是错误的。提交人提请委员会注意一个事实：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没有怀疑过她作为一个单身女子，与一个已婚男人保持非法关系，这在伊朗可能招致酷刑或残忍待遇，比如石刑。提交人还说，伊斯兰刑罚制度所规定的对所谓“通奸”妇女施以绞刑和用石刑等死刑的做法在伊朗仍然盛行，监测妇女权利状况的独立机构多次揭露过这种做法。据提交人称，除此之外还要在死亡走廊里等待，这本身就是一种残忍的做法。提交人表示，她属于伊朗妇女这个社会群体，因此有可能被判犯通奸罪，并当众受罚，处罚形式是专门对妇女规定的。据提交人称，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并未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她作为女性所要遭遇的危险。

3.3 提交人指出，伊朗当局密切监视伊斯兰教反对者在其他国家的活动，伊朗当局轻易便可得知她参加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活动的情况，因此她有可能在伊朗遭到迫害和拘留。据提交人称，在伊朗，反对政权的一切政治党派都遭到严厉镇压，妇女的权利受到侵犯，包括用石刑、鞭打、任意拘留和长时间拘留、即决处决、失踪和滥用酷刑。提交人声称，她在加拿大的政治活动是在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做出决定后新出现的情况，负责审查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和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长期居留申请的官员忽略了这一事实。该官员认为，作为证据提交的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的信函没有证实该组织是伊朗当局所认定的一个反对派团体，但这些信明确指出了由于提交人参与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的活动，她在伊朗有性命之虞，因为在这个国家，主张男女平等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提交人有理由认为该官员侵犯了她在法律面前不受性别歧视的待遇平等权(《公约》第二条和第二十六条)及其不担心报复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权(《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第十三条和第十九条)，还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之规定，因为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的这名官员有失公正。提交人之所以说该官员有失公正，是因为对驱逐前危险评估审查申请和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长期居留申请做出驳回决定的是同一官员。该官员对提交人和伊朗政权的反对者有偏见，这使他得出了不合理的、有倾向性的和与证据相反的结论。

3.4 此外，提交人认为，关于其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的 2007 年 1 月 15 日决定以及联邦法院驳回其对该决定提出的司法复查申请的判决都是在没有有效审查所提交的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程序侵犯了提交人被一名独立和公正的负责做出决定的人倾听的权利。提交人还说，不管是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还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长期居留申请都并非有效的手段。关于移民和难民保护的法律将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中可接受的证据限制为避难申请被驳回以来出现的证据。至于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长期居留申请，这涉及一位部长纯粹基于人道主义做出的决定，因此并非以法律为依据。

3.5 最后，提交人指出，如果回到伊朗，其已经脆弱的健康状况很可能恶化。2008 年 2 月的心理评估报告证明，提交人有创伤后压力、焦虑和抑郁综合症，这是因为她在伊朗曾遭到逮捕，遣返风险又加剧了她的症状。据提交人称，负责对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长期居留申请做出决定的官员武断地否定了这份心理评估报告，这让人有理由怀疑其公正性。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的非正式照会中，缔约国申明它没有义务放弃将提交人遣返回伊朗，即使伊朗有可能侵犯与第二条有关的《公约》第九条、第十九条或第二十六条所述权利。《公约》缔约国不应为没有达到严重和不可挽回程度的违反《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缔约国确信，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之规定，对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六条的指控不属委员会属物理由管辖权范围。缔约国还说，无论如何，提交人没有证实这些条款明显遭到了违反。

4.2 缔约国强调说，第二条没有赋予独立的补偿权，只是确定了缔约国所承担的法律义务的范围。

4.3 缔约国强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就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控而言，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没有证明如果被遣返回伊朗的话她真的有可能会遭受酷刑或遭到残忍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特别是，提交人声称她被控与一名男子有非法关系，该说法被认为不可信，她也没有证明她在离开之前或之后批评过伊朗政权。例如，提交人未能提供基本信息，让人可以核实她的表兄的存在、她在伊朗遭到逮捕或对她的指控等情况是否属实——伊朗法院传票复印件的有效性无法证实。此外，提交人没有对她在拥有有效护照和出境签证的情况下为何迟迟没有离开伊朗做出合理的解释。加拿大当局确信，无论如何，非法关系在伊朗可能会招致鞭打，而不是用石刑，用石刑只适用于通奸者。不过，提交人没有证明她被遣返后有可能遭受鞭刑。至于提交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中的作用，加拿大当局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能说明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是一个反对伊朗政权的团体：这主要是一个促进伊朗妇女在加拿大的融入和权利的组织。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提交人参与了反对伊朗政权的活动。缔约国的结论是，在伊朗普遍存在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行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提交人自己有可能遭受《公约》第七条所述的待遇或处罚。缔约国还说，提交人拥有大学文凭，离开伊朗前在伊朗有工作，并且她的父母一直住在伊朗，是自由人。缔约国称，没有什么会妨碍提交人恢复在伊朗的生活。

4.4 关于第十三条，缔约国强调说，提交人共有 3 次机会陈述反对驱逐自己的理由：首先是对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陈述——尤其是由委员会成员听取陈述——，随后是提交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和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缔约国指出，审查避难申请、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和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

留申请的官员考虑了提交人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提交人的说法不可信。

4.5 缔约国明确指出，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程序的目的是确定被采取驱逐措施的人所面临的风险，依据的是可以证明存在此种风险的新证据。缔约国提醒说，委员会曾多次断言该申请是一种有用和有效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处理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的官员在研究提交人所提交的所有证据后得出结论说，这些证据无法推翻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的结论。

4.6 缔约国指出，在加拿大的判例中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同一官员既对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做出决定，也对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做出决定，这并不影响申请处理中的公正性。在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的情况下，官员仔细研究了所有证据——包括一开始提交的证据和关于伊朗妇女状况的文献证据——，其结论是不存在任何让人有理由担心提交人在伊朗的自由和安全的风险。

4.7 至于对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的批准和司法复查申请，缔约国指出，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所承认的，<sup>2</sup> 该手段并非一个简单的手续，因为如果申请人证明存在抗辩理由的话，法院会审查案件实质，而提交人未能证明这一点。缔约国确信，提交人试图让人对加拿大做出的决定进行复审；然而，委员会的作用并非复查国家法庭的裁决，明显不合理的裁决除外。缔约国的结论是，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根据第十三条提出的请求不可受理，因为不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

4.8 据缔约国称，就涉及《公约》第十四条的部分而言，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来文不可受理，因为与遣返一个外国人有关的程序所适用的不是第十四条，而是第十三条，并且，提交人同样未能证明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

4.9 关于所谓的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条款的行为，缔约国指出，委员会无权就这些违法行为做出裁决。

4.10 缔约国请委员会宣布该来文不可受理，缺乏依据，原因如前所述。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09年9月21日，提交人对缔约国的意见做了评论。首先，她指出，遣返官员命令她去伊朗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旅行证件，尽管她有理由担心一旦出现在该使馆，她的安全堪忧。

5.2 提交人声称，不是要委员会成为重新评估事实或证据材料的第四个机构。提交人主要是指出在本案中实施的严重不法行为、明显的错误、滥用程序以及负责做出决定的官员的不公正。

<sup>2</sup> 缔约国援引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T.A.诉加拿大案件(第 273/2005 号来文)中的决定，2006 年 5 月 15 日的决定，第 6.3 段；以及在 L.Z.B.诉加拿大案件(第 304/2006 号来文)中的决定，第 6.6 段。

5.3 提交人指出，加拿大判例明确指出避难申请者享有真实性推定，除非存在怀疑的理由，否则不能推翻其真实性。由于这一判例，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不应以缺乏证据为由来断定避难申请人的说法缺乏可信性。提交人还说，2008年6月27日就关于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长期居留申请的决定的批准申请和司法复查申请被联邦法院无端驳回。提交人声称，审查驱逐前危险评估申请的官员不受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就可信性做出的结论约束，他可以评估整个案卷，但他在本案中没有这样做。

### 缔约国的补充评论

6.1 2010年9月17日，缔约国告知委员会，它通过加拿大驻伊朗使团进行了补充调查，目的是核实提交人提交的伊朗传票复印件的真实性，事实证明在2006年，该传票发出之日，没有也不曾有过 Fardis 2 区法庭 14 部门，即该文件所示的出庭地点。这个事实强化了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得出的结论，即其调查表明，在伊朗，就刑事案件而言，不会把传票寄给家人，只会寄给当事人。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还得出结论说，如果被传唤的人不在规定日期回应法庭的传唤，法庭可以缺席宣判处罚结果。

6.2 缔约国强调，它同意在委员会审查该案件的情况下不驱逐提交人，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提交人去伊朗大使馆申请旅行证件。

6.3 缔约国重申其最初关于来文可受理性和内容的保留意见。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并且所有可用的国内手段已经用尽。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a)和(b)项规定的条件已经具备。

7.3 委员会表示自己无权审议提交人依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的来文，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宣布来文不可受理。

7.4 至于据称违反《公约》第二条的行为，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缔约国强调说该申诉不可受理，因为不能独立援引第二条。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只适用于《公约》第二条的违法指控不可受理。不过，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援引该条的时候联系了第二十六条，因此，将审议据称违反与第二十六条相关联的第二条的行为。

7.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自称是违反第二十六条的行为的受害者，声称自己在避难程序期间遭受了基于其女性身份的歧视，但没有提供该申诉的依据。提交



人没有证明确定难民身份的程序，正如对她适用的程序，由于她的女性身份而有明显的歧视。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该申诉不可受理。

7.6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为其根据《公约》第九条和第十九条提出的请求提供依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该请求不可受理。

7.7 关于提交人提出的与《公约》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有关的申诉，委员会指出，《公约》第十四条第1款和第十三条所述公正、公平和平等保障可适用于履行裁判职能的所有机构。<sup>3</sup> 不过，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提交人共有3次机会就反对驱逐自己提出论据——尤其是有被聆听的机会。委员会还注意到，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与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都广泛评估了提交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并且这两个机构的决定经过了联邦法院的复审。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对这部分申诉提供依据，以便其被受理，因此，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部分申诉不可受理。

7.8 就《公约》第七条而言，委员会指出，缔约国不应通过引渡或驱逐措施将人送回他国而让其面临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风险。<sup>4</sup> 委员会指出，一般是由《公约》缔约国的机构来评估事实和证据材料以确定是否存在这样的风险。<sup>5</sup>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不论是移民和难民地位委员会还是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都详细研究了提交人提供的口头和书面证据材料，但它们的结论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提交人申诉的风险所依据的事实，并且提交人的说法缺乏可信性。对提交人在伊朗的经历及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伊朗妇女联合会中的活动进行的广泛核实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加拿大当局断定对提交人来说不存在遭遇《公约》第七条所述待遇的实际风险。此外，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为其基于程序存在明显不合法之处的说法所提出的请求提供足够的依据，因此宣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该请求不可受理。

8.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第三条，来文不可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其中法文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3</sup> 见第32号一般性意见(第14条)，2007年8月23日的决定，第7段；以及委员会在Everett诉西班牙案件中做出的不可受理决定，第961/2000号来文，2004年7月9日的决定，第6.4段。

<sup>4</sup> 见第20号一般性意见(第七条)，1992年3月10日的决定，第9段；以及委员会在下述案件中做出的不可受理决定：A.C.诉荷兰，第1494/2006号来文，2008年7月22日的决定，第8.2段；Khan诉加拿大，第1302/2004号来文，2006年7月25日的决定，第5.4段；以及P.K.诉加拿大，第1234/2003号来文，2007年3月20日的决定，第7.2段。

<sup>5</sup> 见委员会在Pillai等人诉加拿大的案件中做出的决定，第1763/2008号来文，2011年3月25日的决定，第11.2段。

K. 第 1850/2008 号来文, S.L.诉捷克共和国  
(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一〇三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S.L. (没有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捷克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6 年 3 月 14 日(首次提交)

事由: 以公民身份为由在归还财产问题上实行歧视

程序性问题: 滥用来文提交权; 基于属时理由不予受理; 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公约》条款: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一条; 第三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如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2006 年 3 月 14 日来文的提交人 S.L.先生是美国公民, 现住美利坚合众国, 1927 年 4 月 6 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 Hradec Králové。她称她是捷克共和国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的受害人。<sup>1</sup> 她没有律师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1968 年 8 月, 提交人和她的丈夫 P.L.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国, 在那里获得了难民地位。1970 年 6 月 23 日, 布拉格市级法院以非法离境罪缺席判处他们 7 个月监禁, 并没收其房产。1970 年, 国家将该房产出售给当时的国际贸易部副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 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先生、岩泽雄司先生、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sup>1</sup> 捷克共和国通知它将继承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1991 年 3 月 12 日对《任择议定书》的批准书, 所以《任择议定书》于 1993 年 1 月 1 日对捷克共和国生效。

部长 I.P.先生。后来由他的女儿继承，以后又转手。1977 年，提交人和她的丈夫成为美国公民，也就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资格。

2.2 1991 年，提交人的丈夫联系了律师，但被告知，由于第 87/1991 号法律，他在失去捷克公民资格后，已无法利用法律手段索回他的房产。之后，他写信给新的房主，要求其将该房产归还给作为合法拥有人的他，但遭到拒绝。P.L.逝世后，这对夫妇的儿子与另一名律师取得联系，询问归还其房产的事。2003 年 5 月 20 日，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已没有办法要回房产，因为《财产归还法》不适用于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的捷克人。提交人和她的丈夫从未申请恢复捷克公民身份，因为他们认为申请与否都一样。

2.3 提交人说，由于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 1997 年 6 月的决定，她已经没有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可以用尽。宪法法院在这一决定中拒绝对类似案件取消《财产归还法》中关于公民资格的条件。

### 申诉

3. 提交人称，捷克共和国适用第 87/1991 号法令，在归还财产问题上要求具有公民资格，侵犯了她依据《公约》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5 月 21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它就提交人陈述的事实作出了说明。

4.2 缔约国认为，因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家补救办法，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应宣布来文不予受理。

4.3 缔约国还认为，由于提交人对 1970 年没收的房产知之甚少，而且是在被没收近 40 年后才要求收回的，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宣布来文不予受理。尽管承认委员会在判例中说《任择议定书》并没有规定提交来文的任何固定时限，提交的延误并不等于滥用，但缔约国认为，拖延四十年属于滥用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权利。

4.4 缔约国还认为，分析这种情况，还必须考虑另一延误，即在国内法院对提交人案件未有任何判决的情况下，从最近的法律相关事实日期算起的时间。在本案中，缔约国认为，最近的法律相关事实是“《财产归还法》允许向拥有有争议财产的法律责任人提交请求时限结束的时间”。它说，提交人是在援引《财产归还法》采取步骤的正常时限过去 11 年之后才提交本案件的，而且提交人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延迟属于合理的事实。

4.5 缔约国又指出，所指的房子和地块已于 1970 年成为国家的财产，而《任择议定书》是在这之后很久才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批准的。

4.6 关于案情，缔约国回顾委员会根据第二十六条作出的判例，其中认为，基于合理和客观标准的区别对待，不等同于《公约》第二十六条意义内受禁止的歧

视行为。<sup>2</sup> 缔约国说，提交人未能遵守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要求，因此归还财产的要求现行法律不予支持。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1 年 3 月 21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的评论。关于提交人提交来文延误问题，她说，为向国家主管当局投诉设置时限是不合理的，延误还因为需要时间收集必要信息和准备文件，而且是从国外处理这一过程的。提交人还提到了该程序开始时她的家庭境况。

5.2 提交人回顾了她的家人两次与律师接触，以便在国内法院启动法律诉讼，从而达到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目的。在这两次会面中，律师都劝告提交人、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不要根据捷克法律推进这一案件，因为胜诉的可能性甚微。

5.3 关于案情，提交人说，她申诉她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因为国籍要求使她索回房产无望。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说提交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鉴于向委员会提交来文的延误，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宣布属于滥用来文提交权，不予受理。提交人称，已经没有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造成缔约国所说的拖延 11 年的原因有：其家人联系的律师告诉他们不要起诉所耽搁的时间；缺少有关信息；从国外获取和提供信息和文件的延误。

6.4 委员会引述它的既有判例：为了《任择议定书》的目的，在国内补救办法已知无效的情况下，提交人不需要用尽这些补救办法。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家人于 1991 年和 2003 年两次获悉，由于第 87/1991 号法令规定的先决条件，如果她和她的丈夫不再是捷克公民，则无法要求归还房产。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注意到，其他索赔人质疑有关法律违宪也无一胜诉；委员会早些时候在类似案件中提出的《意见》仍未落实；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宪法法院还是于 1997 年 6 月

<sup>2</sup> 参见第 182/1984 号来文，Zwaan-de Vries 诉荷兰，1987 年 4 月 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2.1 段至第 13 段。

裁定第 87/1991 号法令(财产归还法)合宪。<sup>3</sup> 委员会认为对提交人而言没有有效的补救措施可以用。<sup>4</sup>

6.5 委员会注意到,《任择议定书》没有规定提交来文的时限。对委员会 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所收到来文将适用新的议事规则第 96 条(c)款。根据该款,委员会应确定该来文不构成滥用提交权。滥用提交权原则上是因提交延误,基于属时理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基础。然而,一份来文如果是在提交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5 年后提出的,或是在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结束 3 年后提出的,便可构成滥用提交来文权,除非考虑到围绕来文的所有情况有正当的延迟提交的理由。在此期间,委员会对已过去特别长的时间才提交,而且没有充分说明延误理由的来文,委员会都会适用这一判例。<sup>5</sup>

6.6 提交人提交本来文延迟的期间,不能从用尽国内补救措施之日起计算,因为提交人从来没有利用被认为无效的国内补救办法。还必须指出,提交人没有表示过她和她的丈夫是因害怕报复或类似考虑才没有在国内法院提起法律程序的。提交人在 2006 年 3 月提交了本来文。提交日期是在提交人和她的丈夫被告知没有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以后近 15 年,是在委员会通过关于 Simunek 案的《意见》<sup>6</sup> 之后近 11 年,是在缔约国宪法法院确定这一问题没有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后近 9 年。提交人说延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家境困难,在国外进行的法律诉讼存在许多后勤不便。在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后的类似延误情况下,委员会认定属于滥用提交权。<sup>7</sup>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拖延极不合情理而且过久,从而构成滥用提交权,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不予受理。

7. 据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3</sup> Pl. US 33/96-41, 捷克共和国宪法法院的决定, 1997 年 6 月 4 日。

<sup>4</sup> 委员会还对以下来文作出了类似的结论: 第 1484/2006 号, Lněnička 诉捷克共和国, 2008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 第 6.3 段; 第 1497/2006 号, Preiss 诉捷克共和国, 2008 年 7 月 17 日通过的《意见》, 第 6.5 段; 第 1742/2007 号, Gschwind 诉捷克共和国, 2010 年 8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 第 6.4 段。

<sup>5</sup> 还参见以下来文: 第 1223/2003 号, Tsarjov 诉爱沙尼亚, 2007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 第 6.3 段; 第 1434/2005 号, Fillacier 诉法国, 2006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第 4.3 段; 第 787/1997 号, Gobin 诉毛里求斯, 2001 年 7 月 16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第 6.3 段。

<sup>6</sup> 第 516/1992 号, Simunek 等人诉捷克共和国, 1995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

<sup>7</sup> 见第 1582/2007 号来文, Kudrna 诉捷克共和国, 2009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第 6.3 段; 第 1583/2007 号, Jahelka 诉捷克共和国, 2010 年 10 月 25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 第 6.4 段。

L. 第 1858/2009 号来文, Y. M. 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Y. M. (不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07 年 10 月 20 日(初次提交)
事由:	海关人员出于民族歧视进行非法逮捕和虐待
程序性问题:	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未证实申诉
实质性问题:	得到补救的权利; 禁止酷刑、残忍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 任意逮捕和拘留; 为非法逮捕或拘留得到赔偿的权利; 受到人道待遇和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 由独立和公正法庭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 在任何地方作为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得到承认的权利; 禁止歧视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 3 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3、5 款; 第十条第 1 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 第十六条; 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了如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2007 年 10 月 20 日来文的提交人是 Y.M. 先生, 车臣籍俄罗斯公民, 1949 年生。他称俄罗斯联邦侵犯了他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 3 款, 第七条, 第九条第 1、3、5 款, 第十条第 1 款, 第十四条第 1 款, 第十六条

\* 下列委员会成员出席了本来文的审议: 布齐德·莱兹赫里先生、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先生、瓦尔特·卡林先生、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女士、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女士、杰拉尔德·纽曼先生、迈克尔·奥弗莱厄蒂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马拉特·萨桑贝耶夫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玛尔戈·沃特法尔女士。

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自 1992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没有代理。

##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格罗兹尼。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他的住房被俄罗斯空军摧毁，因此，他不得不离开车臣到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疆区居住。1998 年 6 月 19 日，提交人在库仑达居住区买了一些奶粉以备将来以较好的价钱卖出。当时，他和另外一人(A)正用一辆卡车装着奶粉向阿尔泰边疆区海关方向前进。但是，在 Znamenka 居住区周边、距离俄罗斯联邦边界和海关约 50 米的地方，他们被阿尔泰边疆区海关官员和边防军逮捕。提交人称，所有官员都拿着枪；这些官员一发现他们是车臣人，就立刻逮捕了他们。

2.2 在枪口下，提交人和他的伙伴被迫将奶粉从卡车上卸下来又装上去。<sup>1</sup> 提交人称，由于用力过多，他的血压升高了，心脏也感到疼痛。他几次请求提供医护都被置之不理。1998 年 6 月 19 日至 25 日，他一直在被关押中。<sup>2</sup> 在这一期间，他遭受了酷刑，被强迫供认进行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sup>3</sup> 最后，在没有供认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他被释放。

2.3 由于他是车臣籍，当局根据《海关法》第 276 条(“逃避海关检查运送货物和/或车辆通过俄罗斯联邦海关边界”)给他编造了一个案件。<sup>4</sup> 根据库仑达海关关长 1998 年 7 月 10 日的裁决，他被处以 519.50 俄罗斯卢布的罚款。<sup>5</sup>

2.4 海关当局命令将其从俄罗斯联邦驱逐到哈萨克斯坦，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的俄罗斯国籍。<sup>6</sup> 他在哈萨克斯坦移民局被登记为俄罗斯公民，但 1998

<sup>1</sup> 根据提交人 2002 年 3 月 20 日向 Barnaul Oktyabrsk 区法院的申诉(见档案)，海关官员要求他和他的伙伴卸车以便检查他们是否在奶粉袋下运输武器。检查完后，海关官员自己将奶粉装上了车(这与提交人所说他被迫自己装车是矛盾的)。

<sup>2</sup> 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支持提交人的说法，即 1998 年 6 月 19 日至 25 日他在被关押中。似乎这些说法在法庭上也从未提起。

<sup>3</sup> 提交人在法院从未提到这一遭受酷刑的情况。从提交人向法院的多次申诉来看，他曾被海关官员要求卸车，他声称这种活动使感到不适，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因此，他似乎认为这些就是酷刑。提交人从未提到任何具体形式的酷刑和虐待(如殴打或其他形式的身体侵犯)。

<sup>4</sup> 1993 年 6 月 18 日《海关法》第 276 条内容如下：“运送货物和/或车辆通过没有海关检查的俄罗斯联邦海关边界，即从俄罗斯联邦海关为进行检查设立的某些地点之外通过，或在规定的通关时间之外通过，而没有任何私运标示的，可处以相当于作为犯罪直接对象的货物和/或车辆价值的一倍至三倍的罚款，同时没收有关物品或收缴其价款或包括没收作为犯罪直接对象的货物和/或车辆，没收用于运输这类商品的车辆，或包括收缴作为犯罪直接对象的货物和/或车辆的价款和没收用于运输这类货物的车辆”。

<sup>5</sup> 根据 1998 年 7 月 10 日的裁决(见档案)，提交人被判定违反了《海关法》第 276 条(见上面脚注 4)。宣布裁决的官员考虑到一些减轻罪行情节(如提交人是初次违法，在调查期间与当局进行了合作，同意了海关的商品估价)。因此，当局没收了奶粉(1,229 公斤)，并对他处以相当于其汽车价值的十分之一的罚款(519.50 卢布)，但未没收汽车。



年 7 月 10 日的裁决将他说成哈萨克公民。提交人辩称, 由于上述裁决, 他被拒绝入境俄罗斯联邦。

2.5 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 提交人就上述裁决向阿尔泰海关提出上诉, 但上诉于 1998 年 8 月 10 日被驳回。提交人又在某一天向库仑达区法院递交了上诉。1998 年 12 月 29 日, 该法院推翻了库仑达海关关长的裁决, 并命令结束提交人的案件。然而, 1999 年 6 月 29 日, 阿尔泰边疆区法院主席团又将库仑达区法院的决定推翻, 命令将提交人的案件发回重审。1999 年 12 月 17 日, 库仑达区法院决定维持库仑达海关关长 1998 年 7 月 10 日的裁决。

2.6 1999 年 6 月, 提交人又针对阿尔泰海关和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向 Barnaul 的 Oktyabrsk 区法院提出申诉, 请求为其物质和精神损失给予赔偿。Oktyabrsk 区法院于 2001 年 8 月 1 日和 2001 年 12 月 27 日将申诉驳回。

2.7 在一个未具体说明的日期, 提交人就 Oktyabrsk 区法院的决定向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民事法庭提出上诉, 该法庭于 2002 年 2 月 13 日推翻了 Oktyabrsk 区法院的决定, 并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2.8 2002 年 4 月 2 日, Barnaul 的 Oktyabrsk 区法院决定驳回提交人的赔偿请求。2002 年 4 月 3 日, 提交人就此决定向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民事法庭提出上诉, 后者于 2002 年 5 月 15 日决定维持 Oktyabrsk 区法院 2002 年 4 月 2 日的决定。提交人的监督审查申请于 2003 年 10 月 16 日、2003 年 11 月 27 日和 2006 年 3 月 1 日被阿尔泰边疆区法院驳回, 于 2004 年 7 月 21 日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驳回。

2.9 提交人提交申诉称, 下列各方侵犯了他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sup>7</sup> 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sup>8</sup> 应有的权利: 库仑达海关官员、Oktyabrsk 区法院(2006 年 1 月 21 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主席团(2006 年 2 月 10 日)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2006 年 1 月 3 日)。然而, Oktyabrsk 区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分别于 2006 年 3 月 1 日和 2006 年 2 月 9 日将其申诉驳回。

2.10 2009 年 2 月 10 日, 即委员会登记其初次来文(2009 年 1 月 12 日)之后, 提交人向委员会提交了与最初报告的事实无关的新指控。<sup>9</sup> 他称, 2006 年 8 月 14 日, 按照格罗兹尼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的公民接待时间表, 他去见一位法官。但是, 法警不准他进入法院的房舍。当他正要离开时, 法院的秘书向他走

<sup>6</sup> 提交人提供了俄罗斯联邦 2003 年 3 月 15 日和 2004 年 3 月 19 日颁发的印有其姓名的两本护照的副本。

<sup>7</sup> 见《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6 条(俄罗斯联邦公民)、第 21 条(禁止酷刑和虐待)、第 22 条第 2 款(活动自由)、第 19 条第 2 款(平等和不歧视)、第 27 条(迁徙自由)和第 45 条(国家对个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sup>8</sup>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六条。

<sup>9</sup> 第二次来文 2009 年 4 月 25 日被转交缔约国。



来，并请他进去。当他进入法院大楼时，法警袭击了他，夺去他的袋子，抢去他的护照。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应法院秘书的邀请进来的，是来见一位法官的，他有心脏病，但他们根本不听。

2.11 不管他如何解释，还是有约 10 名法警围住了他，说他看着就可疑，并威胁说，如果他不离开大楼，就关押他 15 天。一名法警抓住他的脖子和腰部，将他举起扔到法院门外，当时他的胸部(心脏一侧)撞在一个门把手上。因此，他陷入休克，心脏病复发，开始丧失知觉。然后，他被拖入法院大楼，带到法警队长面前。他要求提供医护，但被置之不理。他被关押了几个小时。被释放后，他立即去了一个医疗机构，该机构出具了一个报告，其中记录了他被伤害的情况。

2.12 2006 年 8 月 18 日，提交人向车臣共和国检察院提出申诉，2006 年 8 月 28 日，接到通知说，他的申诉已被转交最高法院。2006 年 8 月 30 日，最高法院副院长通知提交人说，将对他的指控进行调查，并在 2006 年 9 月 11 日之前将结果通知他。因为到那一天之后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提交人于 2006 年 9 月 25 日和 2006 年 9 月 29 日再次向最高法院副院长提交了申诉。2006 年 9 月 15 日，提交人向格罗兹尼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申诉了遭受虐待的情况。他称，他的所有申诉都没有得到答复。2008 年 4 月 22 日，车臣共和国检察院通知提交人说，他的申诉已被转交格罗兹尼地区调查部。2008 年 7 月 19 日，在审查了通过调查收集的材料之后，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检察院下属的 Lenin 地区调查委员会以缺少犯罪事实为由拒绝针对有关法警开立刑事案。

## 申诉

3.1 提交人称，他根据《公约》第二条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他根据《俄罗斯宪法》应有的权利由于他是车臣人和车臣共和国的现实情况而没有得到保障。

3.2 提交人说，他受到与《公约》第七条所规定相反的待遇。因此，他患有并被确诊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重度抑郁综合症，这些都有医疗报告为证，特别是 Omsk 诊疗中心 1998 年 6 月 26 日和 1999 年 8 月 9 日出具的报告和 Ekibastuz 精神神经病中心(哈萨克斯坦)2004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报告。

3.3 提交人称，他是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5 款的受害者。他被非法逮捕和拘留，因此，有资格得到赔偿。

3.4 海关官员违反第十条第 1 款，对他施加酷刑以迫使他供认进行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

3.5 提交人称，他根据第十四条应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为他没有被给予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而这一权利是《俄罗斯宪法》所保障的俄罗斯联邦公民的权利。另外，提交人还称，他的辩护权也受到侵犯，因为俄罗斯联邦 Barnaul Oktyabrsk 区法院在 2004 年 4 月 2 日审议他的案件时法院拒绝了他请求在法庭向作为证人的 A 先生进行调查的动议。

3.6 提交人称，根据《公约》第十六条他应有的在法律面前作为一个人被承认的权利受到侵犯，1998年7月10日库仑达海关关长的裁决和随后缔约国法院的认定都证明了这一点。

3.7 提交人称，由于他的籍贯，他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应有的权利没有受到尊重。与其他俄罗斯公民不同，他不被允许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购买和运输奶粉。他说，《海关法》第276条涉及移动货物和车辆通过俄罗斯联邦海关边界的责任。但他却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被捕。

3.8 关于他的与在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所发生事件有关的第二批指控，提交人称，《公约》第二条第3款被违反，因为由于他的籍贯俄罗斯联邦没有尊重和保证他的权利。当他向法院申诉时，缔约国也没有保证他的由合格机构给予司法补救的权利。

3.9 他称，他受到狱警的不人道待遇，因而使他的生命遭受危险，这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受虐待之后，他犯了心脏病，俄罗斯医学研究院 Bakulev 心血管外科研究中心为此出具了医疗报告。<sup>10</sup> 提交人还称，上述事实构成了对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1和3款应有权利的侵犯。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9年6月29日，缔约国提供了意见。缔约国说，2006年6月25日，阿尔泰海关署库仑达海关以违反海关条例、经由海关规定之外地点移动货物和车辆通过海关边界为由对提交人提起诉讼。根据档案材料，1998年7月10日，库仑达海关关长裁定，对提交人处以罚款和没收货物的惩罚。提交人多次对上述裁决提出上诉，但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都驳回了他的上诉。

4.2 2001年10月27日，他的申诉被 Barnaul 市 Oktyabrsk 区法院驳回。2002年2月13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民事法庭推翻了 Oktyabrsk 区法院的裁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2002年4月2日，Oktyabrsk 区法院第二次将提交人的申诉驳回。2002年5月15日，阿尔泰边疆区法院民事法庭决定维持这一决定。提交人后来根据监督审查程序提出的申请于2003年11月27日被阿尔泰边疆区法院驳回，于2004年7月21日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驳回。

4.3 据缔约国说，提交人称他因为籍贯被追究违反海关条例的责任，但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一指控。因此，法院认定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缔约国还表示，不可能对提交人案件的材料进行研究，因为阿尔泰海关在案件保留期限过去以后已于2005年将有关材料销毁。考虑到自提交人报告的事件发生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不可能再核实提交人所说库仑达海关官员对他的身体和精神

<sup>10</sup> 根据医疗报告，提交人在2008年2月28日至3月12日期间做了治疗。提交人自诉心痛、心动过速、呼吸困难。医院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绞痛、心源性肝硬化。报告未提到殴打伤或其他伤。

伤害。虽然提交人已经用尽所有可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但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权利受到缔约国侵犯的情况下，应当宣布提交人的案件不可受理。

4.4 至于提交人关于他受到格罗兹尼市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法警虐待的第二次申诉，缔约国说，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检察院下属的 Lenin 地区间调查委员会对提交人的指控作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当局多次拒绝启动刑事诉讼，因为缺乏犯罪事实。关于这件事的最后一次裁决是 2008 年 12 月 25 日作出的。然而，提交人未能按照俄罗斯联邦的刑事诉讼法规提出上诉。由此可见，他没有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此，应当宣布其申诉不可受理。

4.5 2009 年 8 月 27 日，缔约国提交了补充意见。它认为，提交人所引用医疗文件上的印鉴痕迹模糊，其来源值得怀疑。缔约国回顾说，提交人没有对拒绝启动刑事诉讼的裁决提出上诉，因此争辩说，在其第二次申诉中提出的要求不可受理，因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提交人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提供了评论。他称，在 1998 年 7 月 10 日的裁决中他被称为哈萨克斯坦国民(而不是俄罗斯联邦国民)，这证实了他关于因他是车臣籍而被追究违反海关条例的指控。2005 年他的案件材料被销毁这一事实不能作为宣布其来文不可受理的依据。提交人还称，缔约国关于医疗报告来源可疑的说法没有依据。

5.2 关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当局拒绝对法警提起诉讼的裁决，提交人称，他不知道有这一裁决，也从未见到和签署这一裁决。他说，他所针对的是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 2006 年 9 月 15 日对他的虐待问题(至今没有答复)，并回顾了后来于 2006 年向最高法院提交的申诉。因此，他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

5.3 2009 年 10 月 25 日，提交人提供了进一步评论。他回顾了 2006 年他向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车臣共和国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诉。他称，2008 年 7 月 19 日，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检察院下属的 Lenin 地区间调查委员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审议了对其关于虐待的指控的调查材料，以缺乏犯罪证据为由拒绝了提起刑事诉讼。提交人重申，他从未看到更未签署 2008 年 12 月 25 日的一个类似裁决。另外，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不应适用于他的案件，因为补救被不合理地拖延了。

### 委员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关于提交人最初根据《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5 款、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承认提交人用尽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因此，它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满足了《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

6.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指控说，海关官员违反《公约》第七条，对他施加了酷刑和虐待。虽然提交人提供了他认为可支持其指控的一些医疗报告，但委员会注意到，没有一个报告提及他的诊断情况和症状(即强迫性神经官能症、重度抑郁综合症、心脏问题和高血压)与其所称的虐待有什么联系。另外，没有一个报告提到显示曾遭受殴打或其他形式虐待或酷刑的损伤。因此，由于缺乏支持其指控的其他证据，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未能为可受理之目的证实其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申诉不可受理。

6.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5 款提出的申诉，即他有资格为被非法逮捕和拘留获得赔偿。委员会注意到，面前没有任何资料，不论是提交人自己的申诉还是法院的有关裁决，能证明提交人如他所说被拘留了六天，或证明他向法院提出了关于非法逮捕和拘留的指控。由于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提交人曾被非法逮捕和拘留，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5 款提出的申诉没有为可受理之目的得到充分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申诉不可受理。根据上述结论，提交人根据第十条第 1 款提出的指控，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由于没有充分证实也不可受理。

6.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提出申诉说，他没有受到公正审判，但也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或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因此，这项指控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因而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6.7 鉴于提交人能提交并向法院陈述其多次申诉，委员会认为，他所称没有按照《公约》第十六条被“作为法律面前的一个人”得到承认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一申诉不可受理。

6.8 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称，海关当局对他的制裁和国内各级法院对其案件的审理都是基于他的车臣籍这一歧视性原因，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资料以支持这一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一申诉不可受理。

6.9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在 2009 年 2 月 10 日第二次来文中根据《公约》第七条和九条第 1 和 3 款提出的补充申诉，即所谓 2006 年 8 月 14 日格罗兹尼 Staropromyslovsk 区法院的法警对他的虐待。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反对受理提交人根据第七条提出的申诉，因为他未就 2008 年 12 月 25 日的裁决(其中，当局以缺乏犯罪证据为由拒绝对各法警提起刑事诉讼)向法院提出上诉。提交人声称，他不知道有关裁决，他从未收到这项裁决，所以也就无法就它提出上诉。在这方面，在缔约国没有任何相反资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不妨碍它审议提交人来文的这一部分。

6.10 但是，委员会也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供明确的资料和证据以支持他根据《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控。提交人引用的 2006 年 8 月 15 日的医疗报告并不能确立提交人的心脏病(见上面第 3.9 段脚注 10)与所称法警的虐待有什么联系。而且，缔约国对提交人所引用医疗报告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在这些情况下，同时注意到 2006 年 8 月 15 日的医疗报告不能确立提交人的医学检查结果与所提出指控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一申诉因未充分证实不可受理。

6.11 在没有任何资料或证据支持提交人关于他于 2006 年 8 月 14 日被逮捕和拘留的申诉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这一申诉从未向法院提出，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提交人未能为可受理之目的证实他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1 和 3 款提出的申诉，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这一申诉不可受理。

7.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可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M. 第 2058/2011 号来文, O.D.诉俄罗斯联邦  
(2012 年 3 月 26 日第一〇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O. D. (由 Konsul 律师事务所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俄罗斯联邦  
 来文日期: 2011 年 1 月 13 日(首次提交)  
 事由: 提交人因交通违规被判罪  
 程序性问题: 《公约》对本申诉不适用  
 实质性问题: 由公正的法庭公正审理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举行会议,  
 通过如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提交人 O.D., 俄罗斯联邦国民, 生于 1968 年。他声称是俄罗斯联邦侵犯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之下权利的受害者。<sup>1</sup> 提交人由“Konsul”律师事务所代理。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称, 2009 年 5 月 28 日, 他与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监察局的某位官员发生了冲突, 因为他批评这位官员的工作, 说他无缘无故地阻碍交通。这位官员反而指责提交人用车撞了他并离开事故现场, 按照国内法, 其行为分别构成行政违法。对提交人提出了指控, 2009 年 7 月 7 日, 根据《俄罗斯联邦行政诉讼法》第 12.27 条第 2 款, 他被 Krasnoyarsk 地区法院治安法官判定犯有行政违法, 即离开事故现场。他被判处 13 日监禁。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 拉扎里·布基德、克里斯蒂娜·沙内、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瓦尔特·卡林、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安托阿尼拉·尤利亚·莫托科、杰拉尔德·纽曼、迈克尔·奥弗莱厄蒂、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奈杰尔·罗德利、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马拉特·萨尔先巴耶夫、克里斯特·特林和马戈·瓦特瓦尔。

<sup>1</sup> 《任择议定书》自 1991 年 10 月 1 日起对俄罗斯联邦生效。

2.2 提交人就该判决向苏维埃 Krasnoyarsk 地区联邦法院上诉，该法院 2009 年 7 月 21 日的裁决修正了该判决，将提交人的刑期减为五日监禁。提交人向 Krasnoyarsk 专区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监督审查要求分别于 2010 年 2 月 4 日和 2010 年 7 月 4 日被驳回。

2.3 提交人称，法院的裁决依据的是有关执法人员、即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监察局那位官员提出的论据、陈述和证据，他本人及其律师的解释遭到无理拒绝。提交人指出，他仅被判定犯有离开事故现场的过错，未被判定造成该事故，而且事故的事实未经调查或确定。提交人认为，根本没有发生事故。他曾充分努力反驳交通安全监察局的证据(如他的汽车保险杠上的污迹及其来源等)，称没有证人证词确认事故的事实；并指出了该官员的说法与后者向法院提出的医疗证明之间的矛盾之处。

2.4 提交人称，他已用尽了所有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

### 申诉

3. 提交人声称自己是俄罗斯联邦侵犯其受《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保护的受到公正审讯权利的受害者。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4.1 在审议来文所载任何申诉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4.2 关于提交人所说他根据第十四条第 1 款应有的权利受到结果侵犯的申诉，委员会认为，这些指控主要与缔约国法院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价有关。委员会回顾了在这方面的判例，并重申，一般而言，应由有关国内法院审查或评价事实和证据。<sup>2</sup> 根据收到的资料，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举出充分的理由来支持其论点，即存在此种任意性或拒绝司法。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来文不予受理。

5.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方和提交人。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提交大会的本报告的一部分。]

<sup>2</sup> 除其它外，见第 No.541/1993 号来文，Simms 诉牙买加，1995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6.2 段；第 1212/2003 号来文，Lanzarote 诉西班牙，2006 年 7 月 25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6.3 段；第 1537/2006 号来文，Gerashchenko 诉白俄罗斯，2009 年 10 月 23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的决定，第 6.5 段。

## 十一. 根据《任择议定书》采取的后续行动

1. 1990 年 7 月, 委员会设立了依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所提《意见》后续行动的监督程序, 同时也设立了《意见》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职位。克里斯特·特林先生自 2010 年 3 月(第一〇一届会议)一直担任该特别报告员。
2. 1991 年, 特别报告员开始要求缔约国提供后续行动资料。《意见》中一旦认定存在违反《公约》情况的缔约国, 一律要求其提供后续行动资料。自 1979 年以来通过的 916 份《意见》中, 有 764 份《意见》在结论中认定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
3. 委员会曾试图对缔约国的后续行动答复进行分类, 此种分类必定带有主观性和不够准确, 因此不可能在统计上对后续行动答复作出明确划分。很多后续行动答复可能令人满意, 显示缔约国愿意落实委员会的《意见》, 或愿意为申诉人作出适当的补救。也有些答复则不令人满意, 因为它们要么根本不触及委员会的《意见》, 要么只涉及其中的某些方面。有些答复只是简单地指出, 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已超出法定时限, 不能赔付。还有些答复干脆表示, 缔约国没有提供补救的法律义务, 但会出于照顾申诉人而提供补救。
4. 其余的后续行动答复, 有的从事实或法律依据等方面质疑委员会的《意见》和结论, 有的过了很久还就申诉的是非曲直作出评述, 有的允诺将调查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或表示缔约国因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执行委员会的《意见》。
5. 在许多情况下, 秘书处还从申诉人那里获悉, 委员会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执行。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也有申诉人通知委员会其建议已得到落实, 尽管缔约国自己并没有通知委员会。
6. 下表列出截止第一〇四届会议(2012 年 3 月 12 日至 30 日)委员会在《意见》中认定存在违反《公约》情况的缔约国作出后续行动答复的全部情况。其中指出, 后续行动就执行委员会《意见》而言是令人满意或不令人满意, 缔约国与《意见》后续行动特别报告员之间的对话是否在继续。一些案件之后有脚注, 表明对后续行动答复的分类有困难。
7. 截止第一〇四届会议, 委员会为了能够较全面、系统和透明地披露《意见》所涉问题后续行动的评估结果, 决定就报告期内已收到缔约国答复的案件, 简要说明后续行动的现有评估结果(见本报告第五章(第一卷))。下表还说明了结束和中止后续对话的决定。
8. 各缔约国以及申诉人或其代理人在前一份年度报告(A/66/40)之后提出的后续信息, 见本报告第六章(第一卷)。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阿尔及利亚(15)	992/2001, <i>Bousroual</i> A/61/40				X	X
	1085/2002, <i>Taright</i> A/61/40				X	X
	1172/2003, <i>Madani</i> A/62/40				X	X
	1173/2003, <i>Benhadj</i> A/62/40				X	X
	1196/2003, <i>Boucherf</i> A/61/40				X A/64/40	X
	1297/2004, <i>Medjnoune</i> A/61/40				X A/67/40	X
	1327/2004, <i>Grioua</i> A/62/40				X	X
	1328/2004, <i>Kimouche</i> A/62/40				X	X
	1439/2005, <i>Aber</i> A/62/40				X	X
	1495/2006, <i>Madoui</i> A/64/40				X	X
	1588/2007, <i>Benaziza</i> A/65/40				X	X
	1780/2008, <i>Aouabdia</i> 等人 A/66/40				X	X
	1781/2008, <i>Berzig</i> A/67/40					X
	1811/2008, <i>Djebbar</i> 和 <i>Chihoub</i> A/67/40					X
	1905/2009, <i>Ouaghliissi</i> A/67/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安哥拉(2)	711/1996, <i>Dias</i> A/55/40	X A/61/40		X A/61/40		X
	1128/2002, <i>Marques</i> A/60/40	X A/61/40		X A/61/40		X
阿根廷(4)	400/1990, <i>Mónaco de Gallichio</i> A/50/40	X A/51/40				X
	1458/2006, <i>González</i> 等人 A/66/40					X
	1608/2007, <i>L.M.R.</i> A/66/40					X
	1610/2007, <i>L.N.P.</i> A/66/40					X
澳大利亚(25)	560/1993, <i>A.</i> A/52/40	X A/53/40, A/55/40, A/56/40		X		X
	900/1999, <i>C.</i> A/58/40	X A/58/40, CCPR/C/80/FU/1, A/60/40, A/62/40				X
	930/2000, <i>Winata</i> 等人 A/56/40	X CCPR/C/80/FU/1, A/57/40, A/60/40 A/62/40 和 A/63/40				X
	941/2000, <i>Young</i> A/58/40	X A/58/40, A/60/40, A/62/40 和 A/63/40		X		X
	1014/2001, <i>Baban</i> 等人 A/58/40	X A/60/40, A/62/40		X		X
	1020/2001, <i>Cabal</i> 和 <i>Pasini</i> A/58/40	X A/58/40, CCPR/C/80/FU/1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澳大利亚(续)	*注：缔约国答复载于 CCPR/C/80/FU/I。缔约国称，一个囚室关押两人的情况并不多见，已提请维多利亚省警方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不再发生类似情况。缔约国不承认提交人有权得到赔偿。委员会认为将不再在后续行动程序下进一步审议此案。					
	1036/2001, <i>Faure</i> A/61/40	X A/61/40				X
	1050/2002, <i>Rafie</i> 和 <i>Safdel</i> A/61/40	X A/62/40 和 A/63/40				X
	1069/2002, <i>Bakhitiyari</i> A/59/40	X A/60/40, A/62/40		X		X
	1157/2003, <i>Coleman</i> A/61/40	X A/62/40				X A/62/40
	1184/2003, <i>Brough</i> A/61/40	X A/62/40				X A/62/40
	1255, 1256, 1259, 1260, 1266, 1268, 1270 和 1288/2004, <i>Shams, Atvan, Shahrooei,</i> <i>Saadat, Ramezani, Boostani,</i> <i>Behrooz</i> 和 <i>Sefed</i> A/62/40	X A/63/40				X
	1324/2004, <i>Shafiq</i> A/62/40	X A/62/40 和 A/63/40				X A/62/40
	1347/2005, <i>Dudko</i> A/62/40	X A/63/40, A/64/40				X A/63/40
	1442/2005, <i>Kwok</i> A/65/40	X A/67/40				
	后续对话已结束。来函表明 建议的执行情况令人满意 (见 A/67/40, 第六章)。					
	1629/2007, <i>Fardon</i> A/65/40	X A/66/40, A/67/40		X		X
	1557/2007, <i>Nystrom</i> 等人 A/66/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澳大利亚(续)	1635/2007, <i>Tillman</i> A/65/40	X A/66/40, A/67/40		X		X
奥地利(5)	415/1990, <i>Pauger</i> A/57/40	X A/47/40, A/52/40, A/66/40		X*		
	716/1996, <i>Pauger</i> A/54/40	X A/54/40, A/55/40, A/57/40, A/66/40, CCPR/C/80/FU/1		X*		
*注：虽然缔约国已根据委员会的裁决对其法律作出修正，但该法律无追溯效力，提交人本人也没有获得补救。在第一〇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结束该案件的后续审查，参照缔约国迄今采取的措施，认为已得到部分满意的解决。						
	965/2001, <i>Karakurt</i> A/57/40	X A/58/40, CCPR/C/80/FU/1, A/61/40				X
	1086/2002, <i>Weiss</i> A/58/40	X A/58/40, A/59/40, CCPR/C/80/FU/1, A/60/40, A/61/40				X
	1454/2006, <i>Lederbauer</i> A/62/40	X A/63/40				X
阿塞拜疆(1)	1633/2007, <i>Avadanov</i> A/66/40				X	X
白俄罗斯(29)	780/1997, <i>Laptsevich</i> A/55/40				X A/56/40, A/57/40	X
	814/1998, <i>Pastukhov</i> A/58/40				X A/59/40	X
	886/1999, <i>Bondarenko</i> A/58/40	X A/59/40, A/62/40 和 A/63/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白俄罗斯(续)	887/1999, <i>Lyashkevich</i> A/58/40	X A/59/40, A/62/40 和 A/63/40				X
	921/2000, <i>Dergachev</i> A/57/40				X	X
	927/2000, <i>Svetik</i> A/59/40	X A/60/40, A/61/40 和 A/62/40				X A/62/40
	1009/2001, <i>Shchetko</i> A/61/40				X	X
	1022/2001, <i>Velichkin</i> A/61/40				X A/61/40	X
	1039/2001, <i>Boris</i> 等人 A/62/40	X A/62/40				X
	1047/2002, <i>Sinitzin, Leonid</i> A/62/40				X	X
	1100/2002, <i>Bandazhewsky</i> A/61/40	X A/62/40				X
	1178/2003, <i>Smantser</i> A/64/40	X A/65/40		X A/65/40		X
	1207/2003, <i>Malakhovsky</i> A/60/40	X A/61/40		X		X
	1274/2004, <i>Korneenko</i> A/62/40	X A/62/40				X A/62/40
	1296/2004, <i>Belyatsky</i> A/62/40	X A/63/40				X
	1311/2004, <i>Osiyuk</i> A/64/40				X	X
	1316/2004, <i>Gryb</i> A/67/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白俄罗斯(续)	1354/2005, <i>Sudalenko</i> A/66/40				X	X
	1377/2005, <i>Katsora</i> A/65/40				X	X
	1383/2005, <i>Katsora</i> 等人 A/66/40				X	X
	1390/2005, <i>Koreba</i> A/66/40				X	X
	1392/2005, <i>Lukyanchik</i> A/65/40	X A/66/40				X
	1502/2006, <i>Marinich</i> A/65/40	X A/66/40				
	1553/2007, <i>Korneenko</i> 和 <i>Milinkevich</i> A/64/40	X A/65/40		X A/65/40		X
	1604/2007, <i>Zalesskaya</i> A/66/40				X	X
	1750/2008, <i>Sudalenko</i> A/67/40					X
	1772/2008, <i>Belyazeka</i> A/67/40					X
	1820/2008, <i>Krassovskaya</i> A/67/40					X
	1838/2008, <i>Tulzhenkova</i> A/67/40					X
比利时(1)	1472/2006, <i>Sayadi</i> A/64/40				X	X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1)	176/1984, <i>Peñarrieta</i> A/43/40	X A/52/40				X
喀麦隆(6)	458/1991, <i>Mukong</i> A/49/40				X A/52/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喀麦隆(续)	1134/2002, <i>Gorji-Dinka</i> A/60/40	X A/65/40			X	X
	1186/2003, <i>Titiahongo</i> A/63/40				X	X
	1353/2005, <i>Afuson</i> A/62/40	X A/65/40			X	X
	1397/2005, <i>Engo</i> A/64/40	X A/67/40		X		X
	1813/2008, <i>Akwanga</i> A/66/40				X	X
加拿大(11)	27/1978, <i>Pinkney</i> 第十四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一卷				X	X
	167/1984, <i>Ominayak</i> 等人 A/45/50	X A/59/40,* A/61/40, A/62/40				X A/62/40
	*注：这一报告表明，资料是 1991 年 11 月 25 日提供的(未公布)。后续行动资料显示，缔约国在答复中表示，补救措施包括一个价值 4,500 万加拿大元和 95 平方英里保留地的一揽子综合福利方案。Lubicon 湖乐队是否还将得到更多赔偿，谈判仍在进行中。					
	694/1996, <i>Waldman</i> A/55/40	X A/55/40, A/56/40, A/57/40, A/59/40, A/61/40		X		X
	829/1998, <i>Judge</i> A/58/40	X A/59/40, A/60/40	X A/60/40, A/61/40			X* A/60/40
	*注：委员会决定，监测来文提交人的最终处境，并酌情采取适当行动。					
	1051/2002, <i>Ahani</i> A/59/40	X A/60/40, A/61/40		X		X* A/60/40
	*注：缔约国作了一定的努力落实委员会的《意见》，但委员会并未明确表示落实情况令人满意。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加拿大(续)	1465/2006, <i>Kaba</i> A/65/40	X A/66/40				X
	1467/2006, <i>Dumont</i> A/65/40	X A/66/40, A/67/40				X
	1544/2007, <i>Hamida</i> A/65/40	X A/66/40				X
	1763/2008, <i>Pillai</i> 等人 A/66/40	X A/67/40				X
	1792/2008 <i>Dauphin</i> A/64/40	X A/65/40		X A/65/40		X
	1959/2010, <i>Warsame</i> A/66/40				X	X
中非共和国(1)	1587/2007 <i>Mamour</i> A/64/40				X	X
哥伦比亚(16)	45/1979, <i>Suárez de Guerrero</i> 第十五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一卷	X A/52/40*				X
	*注：委员会就此案建议，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就 Maria Fanny Suárez de Guerrero 死亡向其丈夫提供赔偿，并修订法律，确保充分保护生命权。缔约国表示，根据第 288/1996 号授权法设立的部长委员会已建议对提交人作出赔偿。					
	46/1979, <i>Fals Borda</i> 第十六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一卷	X A/52/40*		X		X
	*注：委员会就此案提出建议，采取充分的补救措施，并要求缔约国修订法律，以落实《公约》第九条第 4 款规定的权利。缔约国指出，鉴于委员会并未提出具体的补救办法，根据第 288/1996 号授权法成立的部长委员会没有建议向受害人作出任何赔偿。					
	64/1979, <i>Salgar de Montejó</i> 第十五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一卷	X A/52/40*		X		X
	*注：委员会就此案提出建议，采取充分的补救措施，并要求缔约国修订法律，以落实《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规定的权利。缔约国指出，鉴于委员会并未提出具体的补救办法，根据第 288/1996 号法成立的部长委员会没有建议对受害人作出任何赔偿。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哥伦比亚(续)	161/1983, <i>Herrera Rubio</i> 第三十一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52/40*				X
	*注：委员会建议为补救 <i>Herrera Rubio</i> 先生所受违约行动的损害采取有效的措施，并进一步调查上述违约行动，对违约行为采取适当的行动，并采取步骤确保类似的违约行为今后不再发生，缔约国向受害人提供了赔偿。					
	181/1984, <i>Sanjuán Arévalo</i> 兄弟 A/45/40	X, A/64/40 A/52/40*		X		X
	*注：委员会借此机会表示欢迎缔约国说明针对委员会《意见》所采取的任何有关措施，特别是请缔约国通报委员会调查 <i>Sanjuán</i> 兄弟失踪案的进展情况。鉴于委员会并未提出具体补救措施建议，根据第 288/1996 号立法成立的部长委员会没有建议向受害人提供任何赔偿。					
	195/1985, <i>Delgado Páez</i> A/45/40	X A/52/40*				X
	*注：根据《公约》第二条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对来文提交人遭受的违约行动予以补救，包括予以适当赔偿，并确保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违约行为。缔约国提供了赔偿。					
	514/1992, <i>Fei</i> A/50/40	X A/51/40*		X		X
	*注：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向提交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委员会认为，补救包括保证提交人经常与她的女儿们联络，同时缔约国保证有利于来文提交人的判决得到执行。鉴于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补救措施建议，根据第 288/1996 号法令成立的部长委员会没有建议向受害人提供任何赔偿。					
	612/1995, <i>Arhuacos</i> A/52/40				X	X
	687/1996, <i>Rojas García</i> A/56/40	X A/58/40, A/59/40				X
	778/1997, <i>Coronel</i> 等人 A/58/40	X A/59/40				X
	848/1999, <i>Rodríguez Orejuela</i> , A/57/40	X A/58/40, A/59/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哥伦比亚(续)	859/1999, <i>Jiménez Vaca</i> A/57/40	X A/58/40, A/59/40, A/61/40		X		X
	1298/2004, <i>Becerra</i> A/61/40	X A/62/40				X A/62/40
	1361/2005, <i>Casadiegos</i> A/62/40	X A/63/40				X
	1611/2007, <i>Bonilla Lerma</i> A/66/40					X
	1641/2007, <i>Calderón Bruges</i> A/67/40					X
科特迪瓦(1)	1759/2008, <i>Traoré</i> A/67/40					X
克罗地亚(2)	727/1996, <i>Paraga</i> A/56/40	X A/56/40, A/58/40				X
	1510/2006, <i>Vojnović</i> , A/64/40	X A/65/40, A/66/40	X			
捷克共和国(27)*	*注：所有这些涉及财产的案，另参阅第 A/59/40 号文件所载缔约国落实结论性意见的答复。					
	516/1992, <i>Simunek</i> 等人 A/50/40	X A/51/40,* A/57/40, A/58/40, A/61/40, A/62/40				X
	*注：一位提交人确认《意见》得到部分执行。其他人说其财产未退还给他们，或他们未得到赔偿。					
	586/1994, <i>Adam</i> A/51/40	X A/51/40, A/53/40, A/54/40, A/57/40, A/61/40, A/62/40				X
	747/1997, <i>Des Fours Walderode</i> A/57/40	X A/57/40, A/58/40, A/61/40, A/62/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捷克共和国(续)	757/1997, <i>Pezoldova</i> A/58/40	X A/60/40, A/61/40 和 A/62/40				X
	765/1997, <i>Fábryová</i> A/57/40	X A/57/40, A/58/40, A/61/40, A/62/40				X
	823/1998, <i>Czernin</i> A/60/40	X A/62/40				X
	857/1999, <i>Blazek</i> 等人 A/56/40	X A/62/40				X
	945/2000, <i>Marik</i> A/60/40	X A/62/40				X
	946/2000, <i>Patera</i> A/57/40	X A/62/40				X
	1054/2002, <i>Kriz</i> A/61/40	X A/62/40				X
	1445/2006, <i>Polacek</i> A/62/40				X	X
	1448/2006, <i>Kohoutek</i> A/63/40	X A/66/40				X
	1463/2006, <i>Gratzinger</i> A/63/40				X	X
	1479/2006, <i>Persan</i> A/64/40				X	X
	1484/2006, <i>Lnenicka</i> A/63/40				X	X
	1485/2006, <i>Vlcek</i> A/63/40				X	X
	1488/2006, <i>Süsser</i> A/63/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捷克共和国(续)	1491/2006, <i>Fürst Blücher von Wahlstatt</i> A/65/40				X	X
	1497/2006, <i>Preiss</i> A/63/40				X	X
	1508/2006, <i>Amundson</i> A/64/40				X	X
	1586/2007, <i>Lange</i> A/66/40				X	X
	1533/2006, <i>Ondracka</i> A/63/40				X	X
	1563/2007, <i>Jünglingová</i> A/67/40					X
	1581/2007, <i>Drda</i> A/66/40				X	X
	1615/2007, <i>Zavrel</i> A/65/40				X	X
	1742/2007, <i>Gschwind</i> A/65/40				X	X
	1847/2008, <i>Klain 和 Klain</i> A/67/40					X
刚果民主共和国(14)*	*注：后续磋商的详情，见 A/59/40。					
	16/1977, <i>Mbenge</i> 第十八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X
	90/1981, <i>Luyeye</i> 第十九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61/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刚果民主共和国(续)	124/1982, <i>Muteba</i> 第二十二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61/40	X
	138/1983, <i>Mpandanjila</i> 等人 第二十七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61/40	X
	157/1983, <i>Mpaka Nsusu</i> 第二十七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61/40	X
	194/1985, <i>Miango</i> 第三十一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61/40	X
	241/1987, <i>Birindwa</i> A/45/40				X A/61/40	X
	242/1987, <i>Tshisekedi</i> A/45/40				X A/61/40	X
	366/1989, <i>Kanana</i> A/49/40				X A/61/40	X
	542/1993, <i>Tshishimbi</i> A/51/40				X A/61/40	X
	641/1995, <i>Gedumbe</i> A/57/40				X A/61/40	X
	933/2000, <i>Mundyo Busyo</i> 等人 (68 名法官) A/58/40				X A/61/40	X
	962/2001, <i>Mulezi</i> A/59/40				X A/61/40	X
丹麦(1)	1177/2003, <i>Wenga</i> 和 <i>Shandwe</i> A/61/40				X	X
	1554/2007, <i>El-Hichou</i> A/65/40	X A/66/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多米尼加共和国(2)	193/1985, <i>Giry</i> A/45/40	X A/52/40, A/59/40		X		X
	449/1991, <i>Mojica</i> A/49/40	X A/52/40, A/59/40		X		X
厄瓜多尔(2)	277/1988, <i>Terán Jijón</i> A/47/40	X A/59/40*		X		X
*注：根据此报告，资料是 1992 年 6 月 11 日提供的，但未公布。从后续行动档案来看，缔约国在答复中只转交了国家警察局对 Terán Jijón 先生犯罪案件的两份调查报告副本，包括他在 1986 年 3 月 12 日就参与犯罪所作的陈述。						
赤道几内亚(3)	319/1988, <i>Cañón García</i> A/47/40			X		X
	414/1990, <i>Primo Essono</i> A/49/40	A/62/40*			X	X
	468/1991, <i>Oló Bahamonde</i> A/49/40	A/62/40*			X	X
	1152 和 1190/2003, <i>Ndong</i> 等人和 <i>Mic Abogo</i> A/61/40	A/62/40*			X	X
* 缔约国没有作出答复，但与特别报告员会晤了几次。						
芬兰(1)	779/1997, <i>Äärelä</i> 等人 A/57/40	X A/57/40, A/59/40				X
法国(4)	1620/2007, <i>J.O.</i> A/66/40	X A/67/40		X		X
	1760/2008, <i>Cochet</i> A/66/40				X	X
	1876/2009, <i>Singh</i> A/66/40				X	X
	2002/2010, <i>Casanovas</i> A/66/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格鲁吉亚(3)	626/1995, <i>Gelbekhiani</i> A/53/40	X A/54/40		X		X
	627/1995, <i>Dokvadze</i> A/53/40	X A/54/40		X		X
	975/2001, <i>Ratiani</i> A/60/40	X A/61/40				X
德国(1)	1482/2006, <i>Gerlach</i> A/63/40	X A/64/40				X
希腊(3)	1070/2002, <i>Kouldis</i> A/61/40	X A/61/40				X
	1486/2006, <i>Kalamiotis</i> A/63/40	X A/64/40				X
	1799/2008, <i>Georgopoulos</i> 等人 A/65/40	X A/66/40, A/67/40				X
圭亚那(9)	676/1996, <i>Yasseen</i> 和 <i>Thomas</i> A/53/40	A/60/40* A/62/40			X A/60/40	X
	728/1996, <i>Sahadeo</i> A/57/40	A/60/40* A/62/40			X A/60/40	X
	811/1998, <i>Mulai</i> , A/59/40	A/60/40* A/62/40			X A/60/40	X
	812/1998, <i>Persaud</i> A/61/40	A/60/40* A/62/40			X	X
	862/1999, <i>Hussain</i> 和 <i>Hussain</i> A/61/40	A/60/40* A/62/40			X	X
	838/1998, <i>Hendriks</i> A/58/40	A/60/40* A/62/40			X A/60/40	X
	867/1999, <i>Smartt</i> A/59/40	A/60/40* A/62/40			X A/60/40	X
	912/2000, <i>Ganga</i> A/60/40	A/60/40* A/62/40			X A/60/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圭亚那(续)	913/2000, <i>Chan</i> A/61/40	A/60/40* A/62/40			X	X
	* 缔约国没有答复, 但与特别报告员会晤过几次。					
匈牙利(3)	410/1990, <i>Párkányi</i> A/47/40	X*		X		X
	*注: 缔约国于 1993 年 2 月作出答复(未公布), 提及的后续行动资料表明, 由于没有具体的授权法, 无法向提交人作出赔偿。					
	521/1992, <i>Kulomin</i> A/51/40	X A/52/40				X
	852/1999, <i>Borisenko</i> A/58/40	X A/58/40, A/59/40		X		X
冰岛(1)	1306/2004, <i>Haraldsson</i> 和 <i>Sveinsson</i> , A/62/40 后续对话已结束。来函表明 建议的执行情况令人满意 (见 A/67/40, 第六章)。	X A/63/40, A/64/40, A/67/40				
意大利(1)	699/1996, <i>Maleki</i> A/54/40	X A/55/40		X		X
牙买加(98)	92 起案件*					X
	*注: 见 A/59/40。收到了 25 份详细的答复: 在 19 份答复中, 缔约国表示将不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在 2 份答复中, 缔约国应允将进行调查; 在一份答复(第 592/1994 号来文 — Clive Johnson 案, 见 A/54/40)中, 缔约国宣布提交人已获释。有 36 份一般性答复表示死刑已减缓; 31 起案件没有收到后续行动答复。					
	695/1996, <i>Simpson</i> A/57/40	X A/57/40, A/58/40, A/59/40, A/63/40, A/64/40				X
	792/1998, <i>Higginson</i> A/57/40				X	X
	793/1998, <i>Pryce</i> A/59/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牙买加(续)	796/1998, <i>Reece</i> A/58/40				X	X
	797/1998, <i>Lobban</i> A/59/40				X	X
	798/1998, <i>Howell</i> A/59/40	X A/61/40				X
哈萨克斯坦(1)	2024/2011, <i>Israil</i> A/67/40					X
吉尔吉斯斯坦(14)	1275/2004, <i>Umetaliyev</i> 和 <i>Tashtanbekova</i> A/64/40	X A/65/40				X
	1312/2004, <i>Latifulin</i> A/65/40	X A/66/40				X
	1338/2005, <i>Kaldarov</i> A/65/40	X A/66/40				X
	1369/2005, <i>Kulov</i> A/65/40	X A/66/40				X
	1402/2005, <i>Krasnov</i> A/66/40	X A/66/40, A/67/40		X		X
	1461, 1462, 1476 和 1477/2006, <i>Maksudov, Rakhimov, Tashbaev,</i> <i>Pirmatov</i> A/63/40	X A/65/40				X
	1470/2006, <i>Toktakunov</i> A/66/40	X A/67/40				
	后续对话已结束。来函表明 建议的执行情况令人满意 (见 A/67/40, 第六章)。					
	1503/2006, <i>Akhadov</i> A/66/40	X A/67/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吉尔吉斯斯坦(续)	1545/2007, <i>Gunan</i> A/66/40	X A/67/40		X		X
	1547/2007, <i>Torobekov</i> A/67/40					X
	1756/2008, <i>Moidunov</i> 和 <i>Zhumbaeva</i> A/66/40	X A/67/40		X		X
拉脱维亚(2)	884/1999, <i>Ignatane</i> A/56/40	X A/57/40	X			
	1621/2007, <i>Raihman</i> A/66/40				X	X
利比亚(11)	440/1990, <i>El-Megreisi</i> A/49/40				X	X
	1107/2002, <i>El Ghar</i> A/60/40	X A/61/40, A/62/40				X A/62/40
	1143/2002, <i>Dernawi</i> A/62/40				X	X
	1755/2008, <i>El Hagog Jumaa</i> A/67/40					X
	1782/2008, <i>Aboufaied</i> A/67/40					X
	1880/2009, <i>Nenova</i> 等人 A/67/40					X
	1295/2004, <i>El Awani</i> A/62/40				X	X
	1422/2005, <i>El Hassy</i> A/63/40				X	X
	1640/2007, <i>El Abani</i> A/65/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利比亚(续)	1751/2008, <i>Aboussedra</i> 等人 A/66/40				X	X
	1776/2008, <i>Ali Bashasha</i> 和 <i>Hussein Bashasha</i> A/66/40				X	X
马达加斯加(4)	49/1979, <i>Marais</i> 第十八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A/52/40			X*	X
	*注：根据年度报告(A/52/40)，提交人表示他已获释。未再提供资料。					
	115/1982, <i>Wight</i> 第二十四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A/52/40			X*	X
	*注：根据年度报告(A/52/40)，提交人表示他已获释。未再提供资料。					
	132/1982, <i>Jaona</i> 第二十四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A/52/40			X	X
尼泊尔(3)	155/1983, <i>Hammel</i> A/42/40 《决定选编》第二卷	A/52/40			X	X
	1469/2006, <i>Sharma</i> A/64/40	X A/64/40, A/66/40, A/67/40				X
	1761/2008, <i>Giri</i> 等人 A/66/40	X A/67/40				X
	1870/2009, <i>Sobhraj</i> A/65/40	X A/66/40, A/67/40				X
	786/1997, <i>Vos</i> A/54/40	X A/55/40		X		X
荷兰(5)	976/2001, <i>Derksen</i> A/59/40	X A/60/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荷兰(续)	1238/2003 <i>Jongenburger Veerman</i> A/61/40				X	X
	1564/2007, <i>X.H.L.</i> A/66/40				X	X
	1797/2008, <i>Mennen</i> A/65/40				X	X
新西兰(2)	1368/2005, <i>Britton</i> A/62/40	X A/63/40				X
	1512/2006, <i>Dean</i> A/64/40	X A/65/40			X	X
尼加拉瓜(1)	328/1988, <i>Zelaya Blanco</i> A/49/40	X A/56/40, A/57/40, A/59/40				X
挪威(2)	1155/2003, <i>Leirvag</i> A/60/40	X A/61/40	X* (A/61/40)			X
	*注：预计将收到有关后续行动的进一步资料。					
	1542/2007, <i>Aboushanif</i> A/63/40	X A/65/40				X
巴拿马(2)	289/1988, <i>Wolf</i> A/47/40	X A/53/40				X
	473/1991, <i>Barroso</i> A/50/40	X A/53/40				X
巴拉圭(3)	1407/2005, <i>Asensi</i> A/64/40	X A/65/40, A/66/40				X
	1828/2008, <i>Domínguez</i> A/67/40					X
	1829/2008, <i>Benítez Gamarra</i> A/67/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秘鲁(14)	202/1986, <i>Ato del Avellanal</i> A/44/40	X A/52/40, A/59/40, A/62/40 和 A/63/40				X
	203/1986, <i>Muñoz Hermosa</i> A/44/40	X A/52/40, A/59/40				X
	263/1987, <i>González del Río</i> A/48/40	X A/52/40, A/59/40				X
	309/1988, <i>Orihuela Valenzuela</i> A/48/40	X A/52/40, A/59/40				X
	540/1993, <i>Celis Laureano</i> A/51/40	X A/59/40				X
	577/1994, <i>Polay Campos</i> A/53/40	X A/53/40, A/59/40				X
	678/1996, <i>Gutiérrez Vivanco</i> A/57/40	X A/58/40, A/59/40, A/64/40				X
	906/1999, <i>Vargas-Machuca</i> A/57/40				X A/58/40, A/59/40	X
	981/2001, <i>Gómez Casafranca</i> A/58/40	X A/59/40				X
	1058/2002, <i>Vargas</i> A/61/40	X A/61/40 和 A/62/40				X
	1125/2002, <i>Quispe</i> A/61/40	X A/61/40				X
	1126/2002, <i>Carranza</i> A/61/40	X A/61/40, A/62/40				X
	1153/2003, <i>K.N.L.H.</i> A/61/40	X A/61/40, A/62/40 和 A/63/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秘鲁(续)	1457/2006, <i>Poma Poma</i> A/64/40	X A/65/40				X
菲律宾(11)	788/1997, <i>Cagas</i> A/57/40	X A/59/40, A/60/40, A/61/40				X
	868/1999, <i>Wilson</i> A/59/40	X A/60/40, A/61/40, A/62/40		X A/62/40		X
	869/1999, <i>Piandiong</i> 等人 A/56/40	X N/A				X
	1089/2002, <i>Rouse</i> A/60/40				X	X
	1320/2004, <i>Pimentel</i> 等人 A/62/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3/40, A/64/40, A/66/40, A/67/40				
	1421/2005, <i>Larrañaga</i> A/61/40				X	X
	1466/2006, <i>Lumanog</i> 和 <i>Santos</i> A/63/40	X A/65/40, A/66/40				X
	1559/2007, <i>Hernandez</i> A/65/40				X	X
	1560/2007, <i>Marcellana</i> 和 <i>Gumanoy</i> , A/64/40				X	X
	1619/2007, <i>Pestaño</i> A/65/40	X A/66/40				X
	1815/2008, <i>Adonis</i> A/67/40					X
葡萄牙(1)	1123/2002, <i>Correia de Matos</i> A/61/40	X A/62/40, A/67/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大韩民国(119)	518/1992, <i>Sohn</i> A/50/40	X A/60/40, A/62/40				X
	574/1994, <i>Kim</i> A/54/40	X A/60/40, A/62/40, A/64/40				X
	628/1995, <i>Park</i> A/54/40	X A/54/40, A/64/40				X
	878/1999, <i>Kang</i> A/58/40	X A/59/40, A/64/40				X
	926/2000, <i>Shin</i> A/59/40	X A/60/40, A/62/40, A/64/40				X
	1119/2002, <i>Lee</i> A/60/40	X A/61/40, A/64/40				X
	1321 和 1322/2004, <i>Yoon,</i> <i>Yeo-Bzum</i> 和 <i>Choi, Myung-Jin</i> A/62/40	X A/62/40 和 A/63/40 A/64/40				X
	1593-1603/2007, <i>Jung</i> 等人 A/65/40	X A/66/40				X
	1642-1741/2007, <i>Jeong</i> 等人 A/66/40	X A/67/40		X		X
罗马尼亚(1)	1158/2003, <i>Blaga</i> A/60/40				X	X
俄罗斯联邦(16)	712/1996, <i>Smirnova</i> A/59/40	X A/60/40				X
	763/1997, <i>Lantsov</i> A/57/40	A/58/40, A/60/40		X		X
	770/1997, <i>Gridin</i> A/55/40	A/57/40, A/60/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俄罗斯联邦(续)	888/1999, <i>Telitsin</i> A/59/40	X A/60/40				X
	815/1997, <i>Dugin</i> A/59/40	X A/60/40				X
	889/1999, <i>Zheikov</i> A/61/40	X A/62/40				X
	1218/2003, <i>Platanov</i> A/61/40	X A/61/40				X
	1232/2003, <i>Pustovalov</i> A/65/40	X A/66/40, A/67/40		X		X
	1278/2004, <i>Reshnetnikov</i> A/64/40				X	X
	1304/2004, <i>Khoroshenko</i> A/66/40				X	X
	1310/2004, <i>Babkin</i> A/63/40	X A/64/40, A/66/40				X
	1410/2005, <i>Yevdokimov</i> 和 <i>Rezanov</i> A/66/40				X	X
	1447/2006, <i>Amirov</i> A/64/40	X A/65/40, A/66/40				X
	1577/2007, <i>Usaev</i> A/65/40	X A/66/40				X
	1605/2007, <i>Zyuskin</i> A/66/40				X	X
	1866/2009, <i>Chebotareva</i> A/67/40					X
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1)	806/1998, <i>Thompson</i> A/56/40				X A/61/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塞尔维亚(1)	1556/2007, <i>Novaković</i> A/66/40	X A/66/40, A/67/40		X		X
塞拉利昂(3)	839/1998, <i>Mansaraj</i> 等人 A/56/40	X A/57/40, A/59/40				X
	840/1998, <i>Gborie</i> 等人 A/56/40	X A/57/40, A/59/40				X
	841/1998, <i>Sesay</i> 等人 A/56/40	X A/57/40, A/59/40				X
南非(1)	1818/2008, <i>McCallum</i> A/66/40				X	X
西班牙(22)	493/1992, <i>Griffin</i> A/50/40	X A/59/40,* A/58/40				X
*注：根据这份报告，资料是 1995 年提供的，但未公布，从后续行动档案来看，在 1995 年 6 月 30 日的这份答复中，缔约国不同意委员会的意见。						
	526/1993, <i>Hill</i> A/52/40	X A/53/40, A/56/40, A/58/40, A/59/40, A/60/40, A/61/40, A/64/40				X
	701/1996, <i>Gómez Vásquez</i> A/55/40	X A/56/40, A/57/40, A/58/40, A/60/40, A/61/40				X
	864/1999, <i>Ruiz Agudo</i> A/58/40				X A/61/40	X
	986/2001, <i>Semey</i> A/58/40	X A/59/40, A/60/40, A/61/40				X
	1006/2001, <i>Muñoz</i> A/59/40				X A/61/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西班牙(续)	1007/2001, <i>Sineiro Fernando</i> A/58/40	X A/59/40, A/60/40, A/61/40				X
	1073/2002, <i>Terón Jesús</i> A/60/40				X A/61/40	X
	1095/2002, <i>Gomariz</i> A/60/40				X A/61/40	X
	1101/2002, <i>Alba Cabriada</i> A/60/40				X A/61/40	X
	1104/2002, <i>Martínez Fernández</i> A/60/40				X A/61/40	X
	1122/2002, <i>Lagunas Castedo</i> A/64/40				X	X
	1211/2003, <i>Oliveró</i> A/61/40				X	X
	1325/2004, <i>Conde</i> A/62/40				X	X
	1332/2004, <i>García 等人</i> A/62/40				X	X
	1351 和 1352/2005, <i>Hens 和 Corujo</i> A/63/40				X	X
	1363/2005, <i>Gayoso Martínez</i> A/65/40	X A/66/40				X
	1364/2005, <i>Carpintero</i> A/64/40					X
	1381/2005, <i>Hachuel</i> A/62/40				X	X
	1473/2006, <i>Morales Tornel</i> , A/64/40	X A/66/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西班牙(续)	1493/2006, <i>Williams Lecraft</i> A/64/40	X A/65/40, A/66/40	X			
	1531/2006 <i>Cunillera Arias</i> A/66/40					X
斯里兰卡(14)	916/2000, <i>Jayawardena</i> A/57/40	X A/58/40, A/59/40, A/60/40, A/61/40				X
	950/2000, <i>Sarma</i> A/58/40	X A/59/40, A/60/40, A/63/40				X
	909/2000, <i>Kankanamge</i> A/59/40	X A/60/40				X
	1033/2001, <i>Nallaratnam</i> A/59/40	X A/60/40, A/64/40				X
	1189/2003, <i>Fernando</i> A/60/40	X A/61/40		X A/61/40		X
	1249/2004, <i>Immaculate</i> <i>Joseph</i> 等人 A/61/40	X A/61/40				X
	1250/2004, <i>Rajapakse</i> A/61/40				X	X
	1373/2005, <i>Dissanakye</i> A/63/40				X	X
	1376/2005, <i>Bandaranayake</i> A/63/40				X	X
	1406/2005, <i>Weerawanza</i> , A/64/40				X	X
	1426/2005, <i>Dingiri Banda</i> A/63/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斯里兰卡(续)	1432/2005, <i>Gunaratna</i> A/64/40				X	X
	1436/2005, <i>Sathasivam</i> A/63/40				X A/65/40	X
	1862/2009, <i>Pathmini Peiris</i> 等人 A/67/40					X
苏里南(8)	146/1983, <i>Baboeram</i> 第二十四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51/40, A/52/40, A/53/40, A/55/40, A/61/40				X
	148 至 154/1983, <i>Kamperveen,</i> <i>Riedewald, Leckie, Demrawsingh,</i> <i>Sohansingh, Rahman, Hoost</i> 第二十四届会议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51/40, A/52/40, A/53/40, A/55/40, A/61/40				X
瑞典(2)	1416/2005, <i>Alzery</i> A/62/40	X A/62/40				X
	1833/2008, <i>X.</i> A/67/40					X
塔吉克斯坦(22)	964/2001, <i>Saidov</i> A/59/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0/40, A/62/40*, A/67/40				
	973/2001, <i>Khalilova</i> A/60/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0/40, A/62/40*, A/67/40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塔吉克斯坦(续)	985/2001, <i>Aliboev</i> A/61/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A/62/40*, A/67/40				
	1042/2002, <i>Boimurudov</i> A/61/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2/40, A/63/40, A/67/40				
	1044/2002, <i>Nazriev</i> A/61/40	X A/62/40, A/63/40				X
	1096/2002, <i>Kurbonov</i> A/59/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A/59/40, A/60/40, A/62/40*, A/67/40				
	* 缔约国未答复，但与特别报告员会晤了几次。					
	1108 和 1121/2002, <i>Karimov,</i> <i>Askarov</i> 和 <i>Davlatov</i> A/62/40  委员会决定结束 A. Davlatov 先生案的后续对话，但中止 Karimov 先生、Askarov 先生和 N. Davlatov 先生案的对话，认为 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令人满意 (见 A/67/40, 第六章)。	X A/63/40, A/67/40				
	1117/2002, <i>Khomidova</i> A/59/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0/40, A/67/40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塔吉克斯坦(续)	1195/2003, <i>Dunaev</i> A/64/40				X	X
	1200/2003, <i>Sattorova</i> A/64/40	X A/65/40, A/67/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1208/2003, <i>B. Kurbanov</i> A/61/40	X A/62/40, A/67/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1209/2003, 1231/2003 和 1241/2004, <i>Rakhmatov, Safarov</i> 和 <i>Salimov</i> , 和 <i>Mukhammadiev</i> A/63/40	X A/67/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1263/2004 和 1264/2004, <i>Khuseynov</i> 和 <i>Butaev</i> A/64/40	X A/65/40, A/67/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1276/2004, <i>Idiev</i> A/64/40	X A/65/40, A/67/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塔吉克斯坦(续)	1348/2005, <i>Ashurov</i> A/62/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7/40				
	1401/2005, <i>Kirpo</i> A/65/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 认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 令人满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6/40, A/67/40				
	1499/2006, <i>Iskandarov</i> A/66/40					
	1519/2006, <i>Khostikoev</i> A/65/40  委员会决定中止后续对话，认 为其建议的执行情况不令人满 意(见 A/67/40, 第六章)。	X A/66/40, A/67/40				
多哥(4)	422- 424/1990, <i>Aduayom</i> 等人 A/51/40	X A/56/40, A/57/40		X A/59/40		X
	505/1992, <i>Ackla</i> A/51/40	X A/56/40, A/57/40		X A/59/40		X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3)	232/1987, <i>Pinto</i> A/45/40 和 512/1992, <i>Pinto</i> A/51/40	X A/51/40, A/52/40, A/53/40		X		X
	362/1989, <i>Soogrim</i> A/48/40	X A/51/40, A/52/40 A/53/40, A/58/40			X	X
	434/1990, <i>Seerattan</i> A/51/40	X A/51/40, A/52/40, A/53/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续)	523/1992, <i>Neptune</i> A/51/40	X A/51/40, A/52/40 A/53/40, A/58/40		X		X
	533/1993, <i>Elahie</i> A/52/40				X	X
	554/1993, <i>La Vende</i> A/53/40				X	X
	555/1993, <i>Bickaroo</i> A/53/40				X	X
	569/1996, <i>Mathews</i> A/43/40				X	X
	580/1994, <i>Ashby</i> A/57/40				X	X
	594/1992, <i>Phillip</i> A/54/40				X	X
	672/1995, <i>Smart</i> A/53/40				X	X
	677/1996, <i>Teesdale</i> A/57/40				X	X
	683/1996, <i>Wanza</i> A/57/40				X	X
	684/1996, <i>Sahadath</i> A/57/40				X	X
	721/1996, <i>Boodoo</i> A/57/40				X	X
	752/1997, <i>Henry</i> A/54/40				X	X
	818/1998, <i>Sextus</i> A/56/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续)	845/1998, <i>Kennedy</i> A/57/40				X A/58/40	X
	899/1999, <i>Francis</i> 等人 A/57/40				X A/58/40	X
	908/2000, <i>Evans</i> A/58/40				X	X
	928/2000, <i>Sooklal</i> A/57/40				X	X
	938/2000, <i>Siewpersaud</i> 等人 A/59/40				X A/51/40, A/53/40	X
土耳其(2)	1853/2008 和 1854/2008, <i>Atasoy</i> 和 <i>Sarku</i> A/67/40					X
土库曼斯坦(4)	1450/2006, <i>Komarovsky</i> A/63/40				X	X
	1460/2006, <i>Yklymova</i> A/64/40					X
	1530/2006, <i>Bozbey</i> A/66/40					X
	1883/2009, <i>Orazova</i> A/67/40					X
乌克兰(3)	781/1997, <i>Aliev</i> A/58/40	X A/60/40		X A/60/40		X
	1412/2005, <i>Butovenko</i> A/66/40				X	X
	1535/2006, <i>Shchetka</i> A/66/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乌拉圭(39)	<b>A.</b> [5/1977, <i>Massera</i> 第七届会议  43/1979, <i>Caldas</i> 第十九届会议  63/1979, <i>Antonaccio</i> 第十四届会议  73/1980, <i>Izquierdo</i> 第十五届会议  80/1980, <i>Vasiliskis</i> 第十八届会议  83/1981, <i>Machado</i> 第二十届会议  84/1981, <i>Dermitt Barbato</i> 第十七届会议  85/1981, <i>Romero</i> 第二十一届会议  88/1981, <i>Bequio</i> 第十八届会议  92/1981, <i>Nieto</i> 第十九届会议  103/1981, <i>Scarone</i> 第二十届会议  105/1981, <i>Cabreira</i> 第十九届会议  109/1981, <i>Voituret</i> 第二十一届会议  123/1982, <i>Lluberas</i> 第二十一届会议]  <b>B.</b> [103/1981, <i>Scarone</i> 73/1980, <i>Izquierdo</i> 92/1981, <i>Nieto</i> 85/1981, <i>Romero</i> ]	X 收到 43 份后续答复 (见 A/59/40*)		X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乌拉圭(续)	<p><b>C.</b> [63/1979, <i>Antonaccio</i> 80/1980, <i>Vasiliskis</i> 123/1982, <i>Lluberas</i>]</p> <p><b>D.</b> [4/1977, <i>Ramirez</i> 第四届会议</p> <p>6/1977, <i>Sequeiro</i> 第六届会议</p> <p>25/1978, <i>Massiotti</i> 第十六届会议</p> <p>28/1978, <i>Weisz</i> 第十一届会议</p> <p>32/1978, <i>Touron</i> 第十二届会议</p> <p>33/1978, <i>Carballal</i> 第二十届会议</p> <p>37/1978, <i>De Boston</i> 第十二届会议</p> <p>44/1979, <i>Pietrarroia</i> 第十二届会议</p> <p>52/1979, <i>Lopez Burgos</i> 第十三届会议</p> <p>56/1979, <i>Celiberti</i> 第十三届会议</p> <p>66/1980, <i>Schweizer</i> 第十七届会议</p> <p>70/1980, <i>Simones</i> 第十五届会议</p> <p>74/1980, <i>Estrella</i> 第十八届会议</p> <p>110/1981, <i>Viana</i> 第二十一届会议</p>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乌拉圭(续)	139/1983, <i>Conteris</i> 第二十五届会议					
	147/1983, <i>Gilboa</i> 第二十六届会议					
	162/1983, <i>Acosta</i> 第三十四届会议]					
E.	[30/1978, <i>Bleier</i> 第十五届会议					
	84/1981, <i>Dermitt Barbato</i> 第十七届会议					
	107/1981, <i>Quinteros</i> 第十九届会议]					
<p>*注：后续行动资料是 1991 年 10 月 17 日提供的(未公布)。A 节之下所列案件：缔约国表示 1985 年 3 月 1 日重新设立民事法庭。1985 年 3 月 8 日的大赦法适用于 1962 年 1 月 1 日至 1985 年 3 月 1 日犯有政治罪或政治目的罪的主犯、共犯和从犯的所有个人。根据这一法律，对所有犯有蓄意谋杀罪的个人的判刑进行了重新量刑或减刑。根据《国家绥靖法》第十条，释放了根据“保安措施”监禁的所有个人。对复审案件涉案人，受理上诉的法庭不是宣判无罪，就是判定有罪。根据 11 月 20 日第 15.783 号法令，从前担任公职的所有个人可恢复原职。B 节之下所列案件：缔约国指出，第 15.737 号法令赦免了这些个人，并在 1985 年 3 月 10 日释放了他们。C 节之下所列案件：1985 年 3 月 14 日释放了这些个人；第 15.737 号法令适用这些案子。D 节之下所列案件：从 1985 年 3 月 1 日起，所有受到当时政府管制期间违反人权行为侵害的受害者都可提出赔偿要求。从 1985 年到目前为止，已提出了 36 项索赔诉讼，其中 22 项针对任意拘留，12 项要求退回财产。政府于 1990 年 11 月 21 日赔偿 20 万美元了结了 Lopez's 案。Lilian Celiberti 女士提起的诉讼案尚未结案。除了上述提及的案件外，没有其他受害者向国家提出索赔诉讼。E 节之下所列案件：1986 年 12 月 22 日国会通过了第 15.848 号法令，即所谓的“废止国家起诉权”。这项法律废止了国家权力机构对 1985 年 3 月 1 日以前军人和警察为政治目的或根据上级的命令犯下罪行的起诉权。停止了所有尚未结案的诉讼。1989 年 4 月 16 日，这项法律得到公民投票的支持。这项法律要求调查案情的法官将其向司法部门提交的关于失踪受害人的报告提交给行政部门，由行政部门负责开展调查。</p>						
	159/1983, <i>Cariboni</i> A/43/40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X
	322/1988, <i>Rodríguez</i> A/51/40, A/49/40				X A/51/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乌拉圭(续)	1887/2009, <i>Peirano Basso</i> A/66/40					X
	1637/2007, 1757/2008, 和 1765/2008, <i>Canessa Albareda</i> 等人 A/67/40					X
乌兹别克斯坦(32)	907/2000, <i>Siragev</i> A/61/40	X A/61/40				X
	911/2000, <i>Nazarov</i> A/59/40	X A/60/40		X		X
	915/2000, <i>Ruzmetov</i> A/61/40				X	X
	917/2000, <i>Arutyunyan</i> A/59/40	X A/60/40		X A/60/40		X
	931/2000, <i>Hudoyberganova</i> A/60/40	X A/60/40		X A/60/40		X
	959/2000, <i>Bazarov</i> A/61/40	X A/62/40				X A/62/40
	971/2001, <i>Arutyuniantz</i> A/60/40	X A/60/40				X
	1017/2001, <i>Strakhov</i> 和 1066/2002, <i>Fayzulaev</i> A/62/40				X	X
	1041/2002, <i>Tulayganov</i> A/62/40				X	X
	1043/2002, <i>Chikiunov</i> A/62/40				X	X
	1057/2002, <i>Korvetov</i> A/62/40	X A/62/40				X A/62/40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乌兹别克斯坦(续)	1071/2002, <i>Agabekov</i> A/62/40				X	X
	1140/2002, <i>Khudayberganov</i> A/62/40				X	X
	1150/2002, <i>Uteev</i> A/63/40	X A/64/40		X		X
	1163/2003, <i>Isaev</i> 和 <i>Karimov</i> A/64/40	X A/65/40				X
	1225/2003, <i>Eshonov</i> A/65/40	X A/66/40				X
	1280/2004, <i>Tolipkhudzhayev</i> A/64/40	X A/66/40				X
	1284/2004, <i>Kodirov</i> A/65/40	X A/66/40				X
	1334/2004, <i>Mavlonov</i> 和 <i>Sa'di</i> A/64/40				X	X
	1378/2005, <i>Kasimov</i> A/64/40				X	X
	1382/2005, <i>Salikh</i> A/64/40	X A/65/40				X
	1418/2005, <i>Iskiyayev</i> A/64/40	X A/65/40				X
	1449/2006, <i>Umarov</i> A/66/40	X A/66/40				X
	1478/2006, <i>Kungurov</i> A/66/40				X	X
	1552/2007, <i>Lyashkevich</i> A/65/40	X A/66/40				X

缔约国及 违约案件数	来文编号、提交人 和委员会相关报告	从缔约国收到的 后续行动答复	答复 令人满意	答复 不令人满意	无答复	后续行动 对话在继续
乌兹别克斯坦(续)	1585/2007, <i>Batyrov</i> A/64/40	X A/66/40				X
	1589/2007, <i>Gapirjanov</i> A/65/40	X A/66/40				X
	1769/2008, <i>Ismailov</i> A/66/40				X	X
	1914-1915-1916/2009, <i>Musaev</i> A/67/40					X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1)	156/1983, <i>Solórzano</i> A/41/40 《决定选编》第二卷	X A/59/40*		X		X
*注：根据这一报告，资料是 1995 年提供的(未公布)。在这项答复中，缔约国指出未能与提交人的姐(妹)联络上，而提交人也未向缔约国提出索赔诉讼。答复中没有提及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开展的任何调查。						
赞比亚(5)	390/1990, <i>Lubuto</i> A/51/40	X A/62/40			X	X
	821/1998, <i>Chongwe</i> A/56/40	X A/56/40, A/57/40, A/59/40, A/61/40, A/64/40, A/66/40				X
	856/1999, <i>Chambala</i> A/58/40	X A/62/40			X	X
	1132/2002, <i>Chisanga</i> A/61/40	X A/61/40, A/63/40, A/64/40, A/65/40				X
	1859/2009, <i>Kamoyo</i> A/67/40					X